

许钦彬◎著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

易与古文明

张涛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许钦彬，高级经济师，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生于山东的克拉玛依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2001年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公司改制后任安泰炼化工程公司副总经理。对中国古代易学思想文化研究情有独钟，并有所创获，已出版《周易卦爻辞真解》《周易卦爻辞新解》《解读〈地母经〉》《解读〈推背图〉》《易学与汉语关系论稿》等专著多部。



张涛 主编

易与古文明



许钦彬◎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作者与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的合影



作者与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第一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学刊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老先生的合影





作者与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张涛先生的合影



作者与中国周易学会秘书长、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学刊编辑部主任、新加坡易经研究会学术顾问林忠军教授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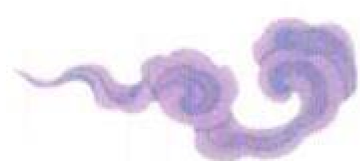




作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周易文化研究系列”编辑委员会副主编邓瑞全教授的合影



作者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周易文化研究系列”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宋月华女士的合影





作者与张涛教授、邓瑞全教授等中国易学文化研究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一起探讨交流中国易学文化时的情景



作者在由克拉玛依日报社与克拉玛依区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克拉玛依日报》和《新疆石油报》以及克拉玛依网全程支持的“准格尔大讲堂”上讲解“易与古文明”时的图片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余敦康

主　编

张　涛

副主编

邓瑞全　宋月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瑞全　王　岗　王　铁　王晓毅　任士英　关志国
刘长林　刘炳良　孙照海　邢东田　许钦彬　吴长庚
汪学群　杨效雷　张　涛　范立舟　胡汉生　胡友鸣
贾桂荣　袁江玉　董晓宇　韩增禄

编辑部主任

邓瑞全（兼）

编辑部主任助理

魏　玮　杨春花

主　办

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中心

协　办

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　序

《周易》乃六经之首，大道之源，易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其简约的语言，抽象的内涵，玄妙的术理，神秘的意境，吸引着古往今来众多成功人士的关注。由于人们对《周易》的研究热情始终不减，便产生了大量整理、诠释和研究类的易学著作，由此易学长盛不衰，成为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其中，经的部分又包含上经和下经，由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组成。相传伏羲画八卦，周文王被囚羑里而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传的部分则分为七种，共十篇，分别是《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和《说卦》、《序卦》、《杂卦》，又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作。故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周易》成书的历程概括为“人更三世，世历三古”。

《周易》最初主要被视为卜筮之书，其思想内涵、文化价值是在易学研究长期发展、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被发掘出来、彰显出了的。惟其如此，才孕育了丰富多彩、兼收并蓄的易学文化。两汉时期是《周易》象数学发展到极致的时期，很多易学大家如孟喜、京房，焦延寿、郑玄等，纷纷著书立说，诠释易学。魏晋南北朝是象数易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扫落象数、重新确立义理派研究方法的王弼易学。此后，在《周易》学术研究领域里，义理派渐占上风。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周易正义》采用的就是王弼之本，使王弼易学成为学术正统。宋代易学在延续历史的同时，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图”、“书”之学的兴盛，如精于此道者的陈抟易学的产生。周敦颐、邵雍等，则是象数易学的大家。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家的易学，则主要坚持了义理派的立场，并使之发扬光大。清初易学基本继承宋易，到了清中期，不少学者逐渐转向对汉易的辑佚、整理和考证。这样，就形成了易学史上的所谓“两派六宗”。

晚近以来，易学研究更呈现出不断开拓、持续发展的喜人景象，不仅有传统的象数派、义理派，更有科学易学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易学流派产生，还产生了一大批造诣精深、著述丰富的易学名家、名著，开创了易学文化研究的崭新局面。这些都使得《周易》这部古老的文化经典、智慧经典依然保持着非凡的魅力和

持久的感召力、影响力。

另一方面，千百年来，民间的易学爱好者围绕着《周易》，不断地从民俗习惯、道德伦理、文化艺术等角度对其进行挖掘，这便是民间易学文化。与坚持《周易》学术研究的学院派、精英派不同，民间易学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植根于民间文化和平民百姓，吸收、借鉴学院派、精英派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的成果，通过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其现实需求，从而构成了易学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这也恰恰说明了《周易》文化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学术文化的不断繁荣，民间易学文化更是突飞猛进，影响激增，甚至成为当代"易学热"的重要推手。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便缘起于这样一个背景和氛围。可以说，系列中每一著作的推出，都凝聚着易学研究工作者孜孜以求、辛勤探索的汗水，展示着易学文化研究全方位、立体性、高水平发展的最新信息和丰硕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易文化研究系列》必将继承和发扬易学文化研究的优良传统，并使之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编委会

2010 年 11 月

序

今天，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文明是外来的，就是所谓的“东学西来”和“西学东渐”。而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文明在世界上沉暗无闻的原因，与最早研究文明起源的学者们大都是一些西方人有关，而且他们又都是从研究欧洲文明起源入手的，也几乎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在近代史上比较强势不无关系。

还有一些对中国考古学和国学研究比较深入的学者们，始终都在坚定地认为中国自己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明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发育、繁衍的，对一百来年在我国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和西方甚至国内有些知名学者的“东学西来”和“西学东渐”之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

在中国，“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智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

文明是一个系统，可分为两个方面，即社会意义的文明和文化意义的文明，在这二者之中又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会意义的文明，一般标志着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达到了新的阶段，包括：(1) 社会内部出现了阶级和等级制度，并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 神权与军权的结合构成了王权并世袭化，作为王权统治工具的官僚机构、军队和国家［有土地、领土范围等物质概念］也已形成，进入了文明社会。

文化意义的文明，却标志着思想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一般包括：(1) 文字的使用；(2) 手工业技术的进步（通常以冶金术的出现为代表）；(3) 具有了丰富的精神世界（如原始宗教的发展和相关的祭祀礼仪的程式化，以及道德伦理规范和文明教化）。

在文明史的研究中，每当人们识别和判断远古时代某一区域或民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或文明社会时，常常需要一些个标志性的器物［文物］。这些器物［文物］非常重要，能够严谨准确地判定出文明的性质和程度。正是由于一百多年来考古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就成了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资料和证据。

“文明”与“文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准确地说，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

的状态，其中包含文化、技术、思想、认识、精神、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的发展程度，是一种具有灵魂的精神，而绝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文化、技术、组织等。

由于文明不但是一个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网络，从中可看出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所以文明属于人类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那么文明的诞生也一定与某种先进的系统思想和文化认识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或者说，文明一定是直接建立在这种先进的思想文化体系基础之上的，而与地区的联系则是间接的。本书就针对世界文化意义的文明方面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进行了详细论述。

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定有其自身的脉络。在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虽然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文明，但这种文明却比较松散，就实质而言，缺少一个从大自然的变化中提炼出的、可以凝聚的中心思想文化；就表现形式而言，缺少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即所谓的图腾）和文化核心器物，并不能将他们的思想文化表里如一地合并为一个体系，呈现出来。

而我们中国的系统文明，自 9000 年甚至 10000 年以来，有一条非常清晰可以说是纲领性的主脉，就是龙的思想文化，具体集中反映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上。这个系统文明的内在灵魂有一门综合学科叫“易”，还有一部巨著《周易》在支撑着，贯穿始终，而外在的形式［形体］却集中表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太极八卦符号和图案以及“龙”与“凤”的标志性器物上，这样就将中国龙的思想文化表里如一地合并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具有魂魄和生命力的文明生命体系，呈现了出来。

而易学思想文化的地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又一直没有被撼动过，说明她与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

今天我们研究远古的文明，倘若还仅以古文献来建构上古史体系，就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对于远古文明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的，商代以前上古史的研究基础就是考古学。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

我们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早期文明社会和国家都是先于文献的传世就出现了，而有的学者也提出，“文明”与“国家”是不同步的，其中有的学者就认为文明早于国家。而能够直接反映或说明这个问题的唯一凭据，就是古代人们活动环境的遗留物质，即考古学术语中所说的遗迹、遗物［文物］、遗址、遗存之类。

考古学是在发掘过程中，依据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确定其时代的早晚和先后顺序，从而观察人类的活动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样，人们只要通过考古学的方法，通过那些考古发掘出的遗存或文物，即可观察到文明的标志（如宗教礼

器、祭祀中心、铜器、文字、城市之类)。如果这样就能够找到最早的文明，当然是最直接方便的了，可操作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可现实并不是这样的理想，对远古文明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十分广泛、跨多个学科的系统学术领域。其中就有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这两个学科，虽然它们可以互补、互益，但却不能相互替代。所以这个课题既要本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尊重历史和事实，还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必须根据大量人类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探讨各个文明时期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才能对各个文明作出客观公正的科学评价。

对远古文明的研究，既是理论的问题，也是考古学的实践问题。我们对于中国的上古历史文化从信古到疑古再到考古这样一路走过来，正好说明这一点。其中的田野考古发掘是基础，但对于发掘出的遗迹、遗物、遗址等考古学现象的阐释或解释也是至关重要的。而阐释的方式也往往会涉及一些我们平时一直都不会或没有关注的学科（如中国哲学范畴中最古老的易学文化)，阐释的高明与否，则要看其知识结构、理论水平以及各方面的素养如何了。值得注意的是，理论贵在创新，贵在根据新情况提出新问题，结合中国的实际做出新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一理论模式。

重建过去、说明真相是历史学者的智慧和任务，但是在今天看来，如果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仅仅依靠历史学家们独立来完成这项任务，恐怕将是非常困难的事，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中国古代哲学［易学］等多种学科相互结合。

今天，凡是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有识之士只要说起中国的思想文化，都会自然地想到孔子。这是因为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我们国家对华夏文化的挖掘与整理，都始终停留在文字和器物等历史文化考古的“外围层”。真正能够触及到思想文化的历史核心内容却很薄弱，今天所说的“文化出口”不过是春秋以后的观念形态和思想价值观。而即使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孔子和其他的诸子百家，也不过只代表了中国五千年思想文化中的后半部分，那么前半部分甚至更早的呢?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舞台上，孔子曾继承了前人的思想，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中国春秋时代以前的古人思想集大成为一大流派，被后人称为儒家思想，孔子本人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追捧，其思想学说代表了中国文明中优秀的思想文化。

即使在当代，凡是和我们有文化交流的国家，都会认为孔子是代表中国文化的领军人物，却从没有人提出并研究过孔子的那些思想文化源头又是来自哪里。

是孔子自已独创的吗？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又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

《易》为中国的群经之首，从孔子曾为《易》作传，就可见《易》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从这也可以看出孔子独到的思想是汲取于《易》的。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有四。"可以看出在《周易》之前，曾有《连山》和《归藏》，说明《易》可以从我国的殷商末年一直倒推到夏，甚至更远古。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说过，开启人类智慧大门的钥匙有三把：一是数字(数学)；一是字母（文字）；一是音符（音乐）。而雨果可能并不知道数字、文字、音乐所包含的人类智慧和文化文明信息，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中却也是同样拥有非常重要和无可替代的地位，这些信息在本书中也都有描述。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称赞道："《周易》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当代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也赞美道："八卦是东方科技史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曾说：《易》是中国思想界的"源头活水"，应给《易》以正确的评价。而且现在很多哲学家与史学家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论断。在《周易》诞生之前的7000～6000年，即在距今九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新石器与旧石器交替的时期，中国智慧的古人就创造了中国哲学范畴中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并将《易》的思想文化渐应用到了生活实践当中。

由于任何科学本身都有一个不断地发现、解释、发展的过程，各个学科领域的探索与发展都离不开哲学与智慧，对历史、考古、易学、文化、文明的研究也是一样的。笔者在作品中的逻辑分析和论述观点，也只代表一家之言，阐述的准确与否，还有待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易学、文化、文明研究学家们来下最后的结论，语言描述及作品中的错误之处，也希望更多的读者、学者、专家给予批评和斧正。

最后，我要特此向对本书进行审读和推荐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北师大史学研究所易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易学研究基地成员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张涛先生，以及北京师范大

学史学研究所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邓瑞全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所有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了大量信息支持和能力支持的考古研究学家们、音乐研究学家们、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专家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各界的领导和朋友们都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12年8月作者于克拉玛依市金龙镇



开　篇 ……………………………………………………………… 1
小　结 ……………………………………………………………… 4

上篇　从没有文字到产生系统文字的时代文化

第一章　衣 ……………………………………………………………… 7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 7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 9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 ………………………………………… 15
小　结 ……………………………………………………………… 16

第二章　食 ……………………………………………………………… 18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 18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 29
小　结 ……………………………………………………………… 32

第三章　住 ……………………………………………………………… 38
第一节　贾湖文化遗址和大地湾文化遗址 ……………………… 38
第二节　河姆渡文化遗址 ………………………………………… 40
第三节　西水坡文化遗址 ………………………………………… 42
第四节　牛河梁文化遗址 ………………………………………… 43
小　结 ……………………………………………………………… 45

第四章 行 …… 48

第一节 贾湖文化 …… 48
第二节 红山文化 …… 56
第三节 河姆渡文化 …… 64
第四节 凌家滩文化 …… 65
第五节 大汶口文化 …… 73
第六节 良渚文化 …… 75
小 结 …… 77

第五章 从太阳文明中诞生的凤文化 …… 87

第一节 仰韶文化与菘泽文化 …… 87
第二节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 91
第三节 红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 …… 92
第四节 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 …… 98
第五节 商周文化 …… 100
第六节 汉唐及以后的文化 …… 108
小 结 …… 119

第六章 从自然万物中提炼的龙文化 …… 125

第一节 仰韶文化 …… 125
第二节 西水坡文化 …… 126
第三节 红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 …… 128
第四节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 132
第五节 商周文化 …… 136
小 结 …… 144

上篇总结 …… 151

中篇 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

第七章 贾湖文化时期的易学 …… 161

第一节 贾湖古人的智慧 …… 161
第二节 贾湖文化时期的音学、天学、历法 …… 166

第三节 贾湖文化时期的数学、度量衡 …… 194

第八章 贾湖人的“数”之哲学 …… 204

第一节 先天八卦 …… 206
第二节 后天八卦 …… 216
第三节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事物具有自然关系的逻辑体系 …… 225

第九章 远古时期易学中的天学 …… 242

第一节 天学 …… 242
第二节 与天学和万事万物具有自然联系的太极图 …… 246
第三节 传说中的伏羲氏与女娲 …… 254

第十章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时期的易学 …… 258

第一节 龙马与《河图》 …… 258
第二节 龟甲与《洛书》 …… 261
第三节 玉版与八卦 …… 263

第十一章 易学与汉语言 …… 265

第一节 易学与汉语言相关联的类比归类 …… 265
第二节 声音与口腔中各部位之间的易学逻辑关系 …… 273
第三节 汉语言中天地人合的易学哲学思想 …… 279

第十二章 殷商时期的易学文化 …… 285

第一节 殷商时期的天学与六十甲子表 …… 285
第二节 周易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 …… 288
第三节 易学与逻辑学、占卜学 …… 294
第四节 《周易》中提到的鬼神、祭祀与心理学的描述 …… 303
第五节 《周易》中有关中医与疾病的描述 …… 311
第六节 易学中“太一生水”的准确之意 …… 312
小 结 …… 314

第十三章 周以后的易学文化 …… 316

第一节 商周时起卦的阴阳符号 …… 316
第二节 易学中“太极、无极［戊己］”的准确之意 …… 317
第三节 中国名称的由来 …… 320

第四节　将易发扬光大的老庄与孔子 …… 325
第五节　古诗词、建筑、歌舞、作战中的易学思想 …… 341
第六节　战国时期的易学 …… 345
第七节　汉以后的易学与应用 …… 348

第十四章　易学与《周髀算经》 …… 358

第一节　《周髀》 …… 358
第二节　《周髀算经》中涉及的易学之数、词汇、概念 …… 361
第三节　《周髀算经》中几处有争议的描述 …… 366
小　结 …… 378

第十五章　易学与萨满文化和傩文化 …… 381

第一节　萨满教与萨满文化 …… 381
第二节　萨满教的本质与易学文化 …… 395
第三节　傩文化 …… 399
第四节　傩文化的本质与易学文化 …… 407
第五节　萨满文化和傩文化中的共同易学特征 …… 409
小　结 …… 417

第十六章　“丝绸之路” …… 421

中篇总结 …… 439

下篇　外国文化和文明与易学文化

第十七章　两河流域文化与易学文化 …… 447

第一节　苏美尔文明与易学文化 …… 447
第二节　古巴比伦文明与易学文化 …… 463
小　结 …… 483

第十八章　哥贝克力巨石阵遗址反映出的文化 …… 484

第十九章　尼罗河流域文化与易学文化 …… 490

第一节　古埃及的自然、地理、历史 …… 490

第二节 古埃及文字与易学文化 …… 492
第三节 古埃及人所崇拜的多神与易学文化 …… 495
第四节 古埃及二元性思维方式与易学文化 …… 498
第五节 古埃及“三合一新年”与易学文化 …… 501
第六节 哈夫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以及太阳神庙与易学文化 …… 508
第七节 古埃及星占学与易学文化 …… 513
第八节 古埃及的分野与易学文化 …… 520
小 结 …… 524

第二十章 古希腊文化与易学文化 …… 525

第一节 古希腊的地理与神话 …… 525
第二节 古希腊哲学、数学观与易学文化 …… 526
第三节 古希腊的星占学 …… 529
第四节 古希腊星占学与易学文化 …… 531
小 结 …… 536

第二十一章 古罗马及之后的西方文化与易学文化 …… 537

第一节 古罗马星占学与易学文化 …… 537
第二节 西方星占医学与易学文化 …… 539
第三节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易学文化 …… 543
小 结 …… 545

第二十二章 阿拉伯文和字母与易学文化 …… 546

第二十三章 美洲大陆文化与易学文化 …… 561

第一节 人面岩画与易学文化 …… 561
第二节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文物与易学文化 …… 568

下篇总结 …… 570

后 记 …… 590

参 考 文 献 …… 594

|开 篇|

一

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的起源地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到目前为止，讨论仍在继续。

现代科学考古的一部分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的南部，那里是现代人的故乡，即“非洲起源说”。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人类起源的地区是多样性的，认为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大陆各自起源，即“多地区进化说”。

较早提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的，是美国的两位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他们提出，现代人祖先可追溯到大约15万年前，非洲人由非洲大陆向世界其他各大洲迁移。至于其他各洲的原始人，有一些科学家推断他们被冰川严寒全部自然消灭，也有一些科学家推断他们全被非洲人的后裔征服并取代。

他们认为关于非洲的后裔来到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在6万~5万年前，那些非洲后裔来到中国定居下来，生息繁衍，并取代了原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原始人。笔者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臆想罢了。

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欧洲被普遍接受，但仍然有不少科学家持不同的观点，尤其以东亚及中国学者的反驳声音最为响亮，他们的观点是“多地区进化说”。

在中国，很多专家都在寻找各种证据用以反驳“非洲起源说”。他们认为，中国现代人是由中国本地直系祖先传承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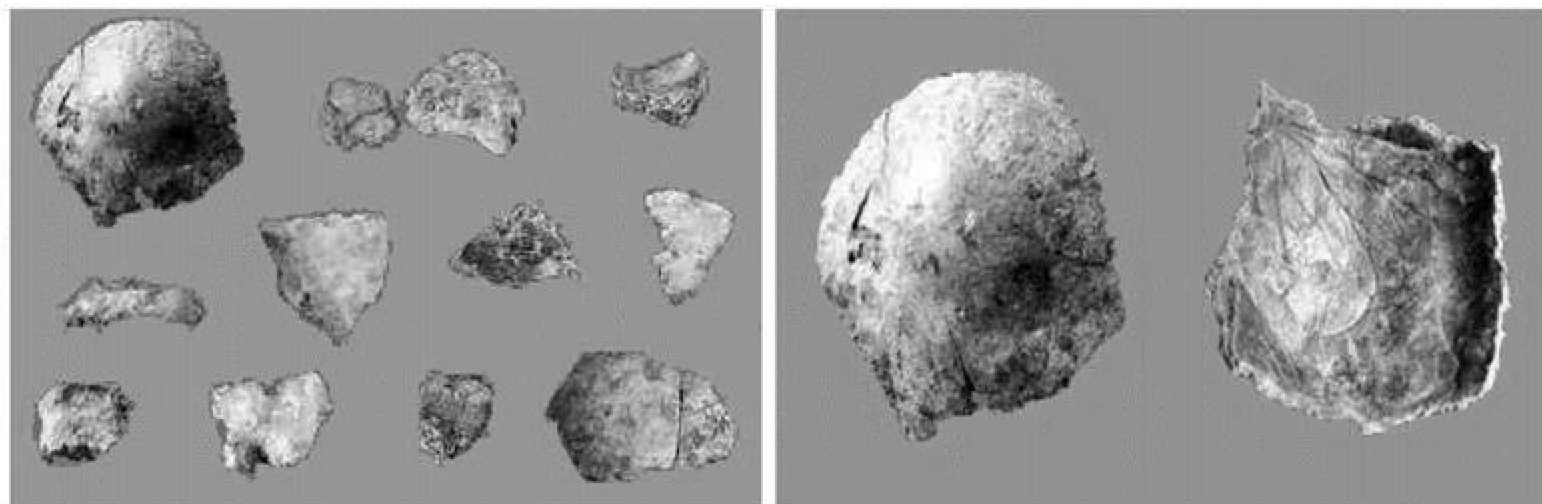
中国专家所掌握的主要证据是：在中国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湖北建始人，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20几万年前的长阳智人，2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等古人类遗迹。这些从200万年到1万多年遗迹的化石证据都没有间断过，说明中国本地从原始人类到现代人类的直系演化进展是连续的。以此证明，中国人是从自己的祖先演化而来的，与“非洲人”根本

无关。

但此学说由于分别缺少20万年前和5万年前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时期的化石证据，而这一时期又是古人类学（统称为现代人）研究的敏感时段，所以一直不被西方学者认可。

二

2007年12月17日，在河南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在9号探方深5米处发现一块较完整的古人类头顶骨和一些顶骨、枕骨、颞骨的断片，共计16块。其眉脊较突、前额低平、枕突隆起、骨壁较厚，保存和石化程度均较好，未见变形（组图0－1），复原后就可以成为一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



组图0－1　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出土的部分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断片以及头盖骨中一块较为完整的顶骨

此次发现头盖骨的原始地层，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属首次发现，考古记录真实完整。而且是直接发现了人类的骨骼，而不仅是动物骨骼及器皿。

同时，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同层取样，进行了光释光测年实验。经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等十余位权威专家科学严谨的研讨，认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许昌灵井古人类遗址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层位明确可靠，是我国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从与其同层伴存的灭绝动物群比例和光释光测年的初步实验结果判断，许昌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出土层位的时代，距今10万～8万年，这是古人类学研究的敏感时段。

2008年1月22日，中国国家文物局联合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在河南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距今10万～8万年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不仅是河南省发现的第一个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更是我国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中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这个发现，填补了中国没有10万~5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的空白和我国古人类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缺环，对于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和中国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是我国古人类考古的一次令人振奋的重大发现。

这样，除了非洲外，中国也就成了大致连续不断的古人类化石发现地，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人类进化系统之地。

这个不争的事实，使许多中国古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中国人是从古猿人独立发展过来的人种。说明距今10万~8万年在地球表面，在世界亚洲中国的中原大地上，就已经有了晚期智人，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许昌人"，中国的现代智人很可能就起源于"许昌人"。

三

1965年，许昌市许昌县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细石器及打制石器，就引起了史前考古界的重视。

2005年6月至今，河南省文物局组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260平方米，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和动物化石，共计3万余件。

而且，通过考古专家对出土的与晚期智人化石同时代的石器分析来看，说明这些石器还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的特征（图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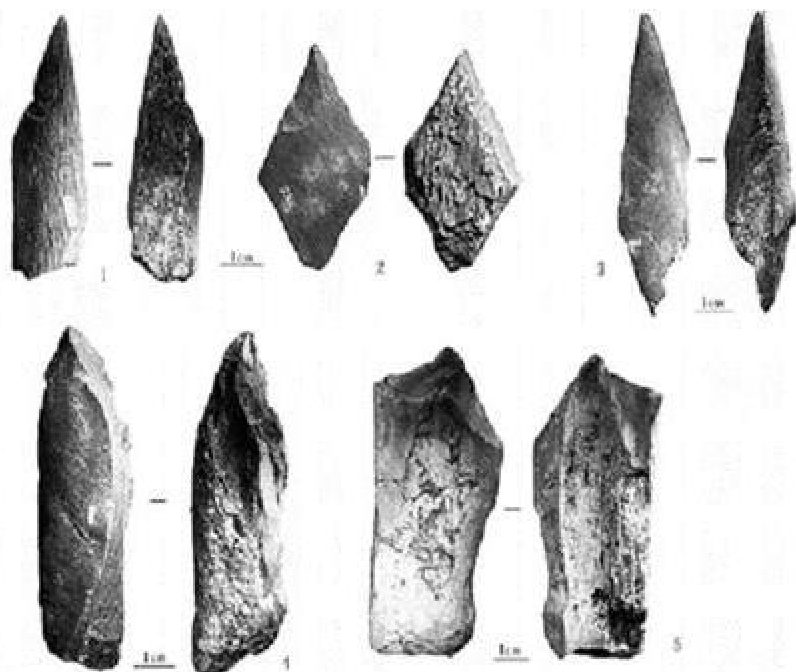


图0-2

这样，这些出土的石器就能够充分说明，中国的晚期智人早在距今10万~8万年间，就已经具有了锐与钝、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守、饱与饥的阴阳概念，会利用打制的石器来充当捕猎、生活、进攻与防卫的工具了。

如果说人类能够感到饱与饥、进攻与防守是动物的生理本能，那么能够认识到主动与被动、锐与钝就是人类心理思想的总结与转变。这也充分说明，人类早期的文明雏形或萌芽，已经在那个时候以手工制造石器工具的方式，在中原大地上开始醒目地显现了。

在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上，从使用石器到能够打制石器和骨器工具，作品一定是集智慧与概念、构思与设计、技巧与技术共同结合于一体的完美产物。

在文明的概念中，含有智人创造的文化。石器工具的制作，从概念、构思、设计到手工、打制、技术，就是智人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

小结

中国的现代智人起源于“许昌人”。遗址中发掘出土的石器、骨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信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石器工具的制作，标志着人类已开始进步，文化已开始起源，所以本书在开篇就拉开了其所要阐述的主题——文明起源。

上 篇

从没有文字到产生系统文字的时代文化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提出，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是按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的顺序来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价值的。

就是说从远古到现在，人类的生存、进化、发展与心理的需要，都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规律。远古时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环境条件下，人类在大自然中求生存时，最基本的需要，首先也是生理的需要，说穿了就是衣、食、住、行的问题。

《吕氏春秋·爱士》中说道：“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就是说衣服可以用来御寒，食物可以用来充饥。饥饿寒冷，是人类的大害这就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过去的人类就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在生存，现在人类的生存依然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在生活，将来的人类也一定会遵循这样的规律去生存。



| 第一章 |

衣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一　仙人洞文化遗址

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发现于1981年春，同年及1983年进行了两次挖掘，发现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和用火遗迹。

仙人洞的文化遗物包括数以万计的石制品、数量较多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以及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等。另外还有灰烬和人类化石。

仙人洞的堆积有6米多，主要部分属于旧石器时代，但时代应有早晚之分，文化遗物也有早晚之别。按研究者的意见，骨制品的时代可能在距今4.5万~2万年之间（图1-1）。类似的骨角器制作技术在西欧出现的时代是在距今2万~1万年之间。

文化遗物中有鱼叉1件，系用偶蹄类动物的肢骨制成的，为双排倒钩式，是使用切削和刮削等技术加工的。标枪头1件，尾部残缺，器身呈扁锥体，也是用动物的肢骨制成的，制法是先刮削成形，然后再通体研磨。骨针3件，用象门齿或动物肢骨制成，长度在60~80毫米，直径在3~4毫米，针孔采用对钻技术钻成。[①] 骨针的用途非常明确，就是用于缝制毛皮衣服。

二　山顶洞文化遗址

山顶洞遗址位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猿人遗址的顶部，1933~1934年发掘

---

①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第154页。

期间，发现有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及大量的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及装饰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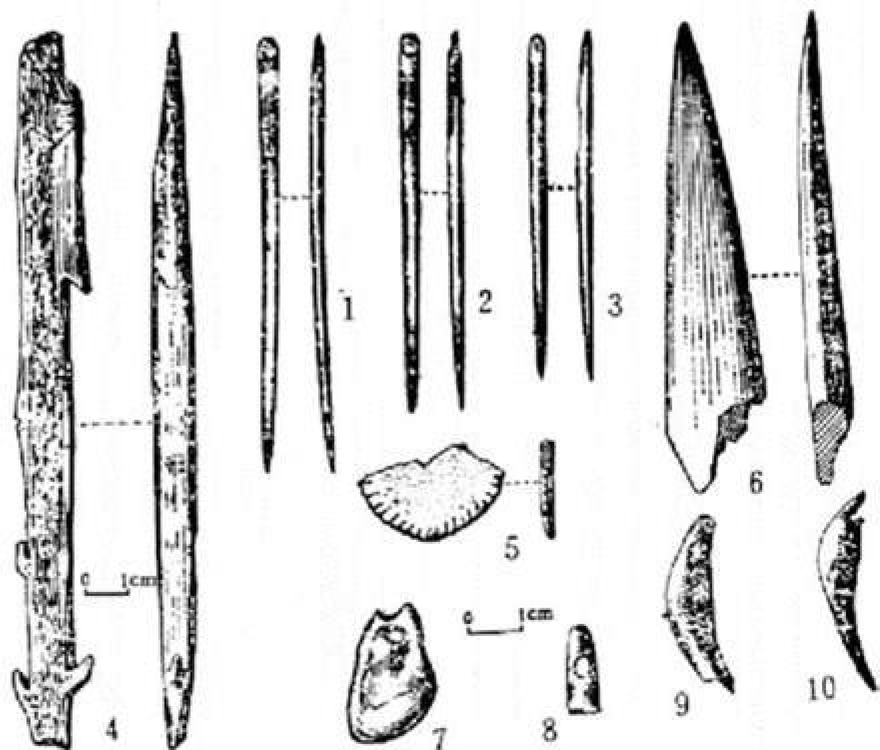


图1－1　仙人洞骨制品与装饰品

1～3. 骨针　4. 鱼镖

5. 穿孔蚌壳　6. 矛头　7. 穿孔兽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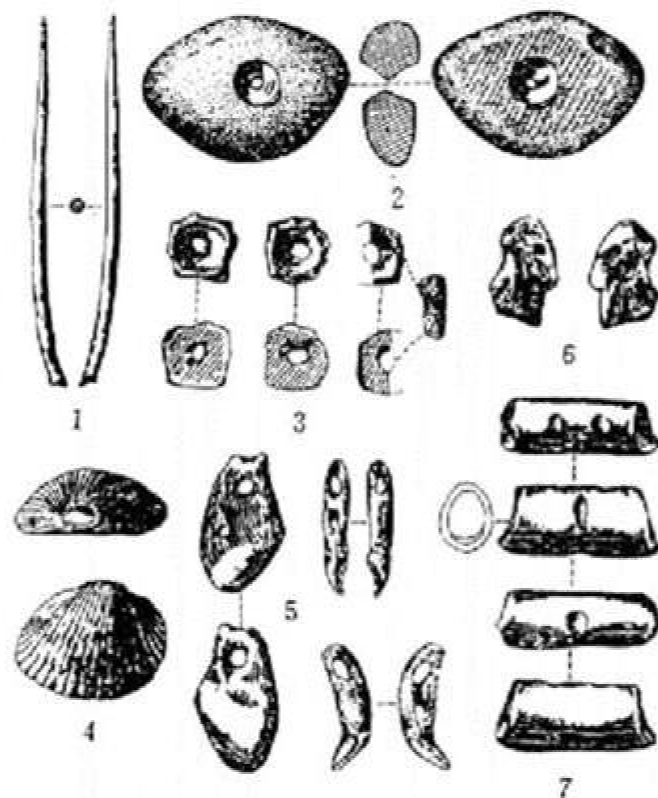


图1－2　山顶洞骨制品与装饰品

1. 骨针　2. 石坠　3. 石珠　4. 海蚶壳

5. 穿孔兽牙　6. 青鱼眼上骨　7. 骨管

关于该遗址的绝对年代测定，最新结果表明文化层堆积的年代为距今2.7万～1.8万年左右。从发掘出人类化石的特征来看，是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类型。

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制品及装饰品。有一件骨针在骨角制品中最具有代表性。它是用鲩鱼（草鱼）的眼上骨刮削磨制而成，骨针保存较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针身微弯，尖部很圆锐，最大直径处3.3毫米。针孔则是用尖状器刮挖成的。①

还有一件赤鹿角在骨角制品中也具有代表性，但用途不详。不过，骨针的用途非常明确，是用于缝制毛皮衣服的。

如果说能够感到饱与饥、寒冷与温暖、进攻与防守是动物的生理本能，那么能够认识到主动与被动、锐与钝、暴露与遮盖就是对动物生理本能的总结与转变。

这说明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古人们，就已经具有了饱与饥、寒冷与温暖、锐与钝、进攻与防守、主动与被动、暴露与遮盖、害羞与遮掩、美丽与丑陋等阴阳概念，已经可以磨制矛头和骨针式的骨器了，通过利用骨针和兽皮来缝制衣服御寒，通过利用鱼镖和矛来捕猎、进攻、防守，通过利用石珠和穿孔兽牙来装饰美化自己。

随后，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技术也被带进了新石器时代。

---

①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第39页。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中国新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中期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晚期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①]

一 贾湖文化遗址

贾湖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东，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贾湖遗址的地层比较单纯，主要为裴李岗文化遗存，绝对年代为公元前7000～前5800年。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55000平方米。

贾湖遗址经过1984～1987年5个季度的大规模发掘，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基45座，灰坑300个，墓葬300多座，陶窑10座。其中发现了依次扩建的多间房及壕沟。发现珍贵文物标本3000余件。质地有陶、石、骨、牙等，器形种类主要有陶鼎、陶罐、陶壶、陶碗、陶杯、骨鱼镖、骨镞、骨针（其中有的针孔细如发丝，图1－3）、骨锥（图1－4）、骨刀、杈形器、骨笛、石磨盘、磨棒、石斧、石镰、石铲、石凿、石刀、石钻、石砧、砧帽、石环等。[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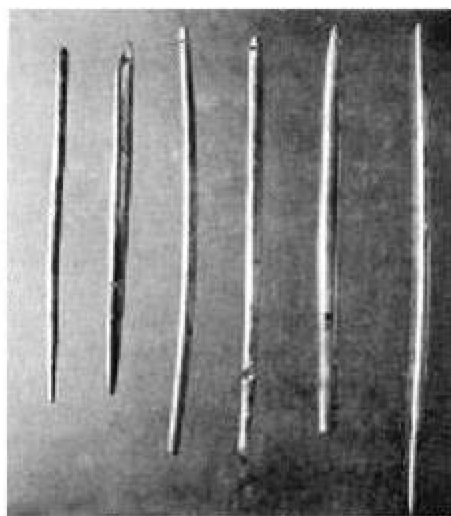


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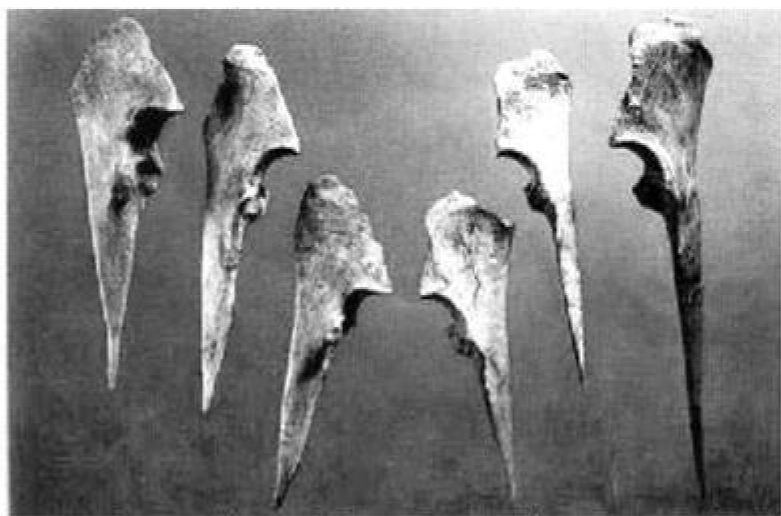


图1－4

①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第17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骨针与骨锥的用途非常明确，是用于缝制毛皮衣服的。

另外，通过考古发现，骨针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等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屡有发现，仅武安磁山遗址就发现33支，另有所谓的骨梭针4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针较多，长短不一，大多精巧细致，长度在6.4～15.7厘米之间。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甚至还出土了用兽骨制成的储藏针的针管。[①]

二　河姆渡文化遗址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余姚，1972年浙江省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和姆渡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中出土了不少与纺织有关的石制、骨制、木制工具，如陶纺轮（图1－5、组图1－6）、木纬刀、木织轴、骨椎、骨管状针织网，而且还出土了苘麻的双股麻线。



图1－5　现藏于宁波博物馆有五行图案的河姆渡第二期文化陶纺轮

河姆渡出土的物品，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测定，年代为距今6960±100年。[②]

中国古人开始利用植物纤维的时候，由于单根纤维很细，抗拉强度较差，所以就将多根纤维搓（或捻）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强度。绳索就是最早的捻合纤维实例（图1－7）。[③]



组图1－6　距今7000～6500年的河姆渡文化纺轮

绩和纺是加工纤维的两种原始技术，绩源于搓绳技术，纺是先把纤维松解，再把多根纤维捻合成纱线的技术。

由于纤维轻，曲度大，这样搓出的纱往往不太均匀。人们便在一根捻杆的下

①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32页。

②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21页。

③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第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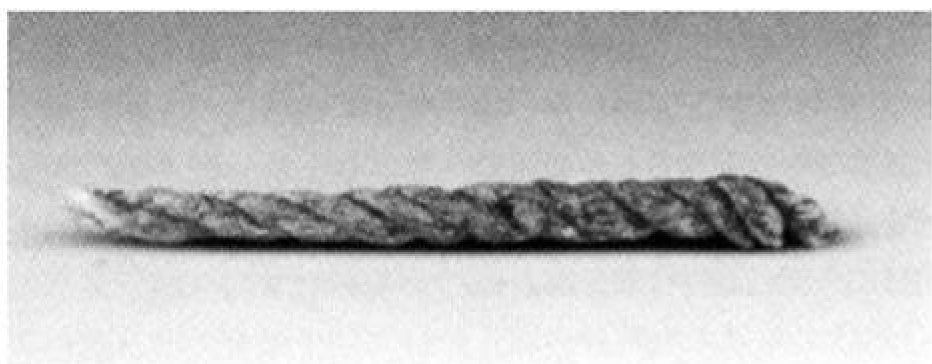


图1-7 河姆渡文化第一期文化粗绳子

端坠一重物，利用此重物的重力将一堆乱麻似的纤维拉细拉直，同时当人们用手指将捻杆转动时，就可以利用不断旋转的惯性，捻出麻花状均匀整齐的纱线，后来人们将多根纤维捻合成纱线的过程就称为“纺”。

这个重物被称为纺轮（缚盘），人们在陶纺轮中间的圆孔里插上拈杆（缚杆），就组成了纺织工具（纺专）（图1-8）。[①] 在纺专不断旋转后，将捻过的纱缠绕在拈杆上，就成了“纺纱”（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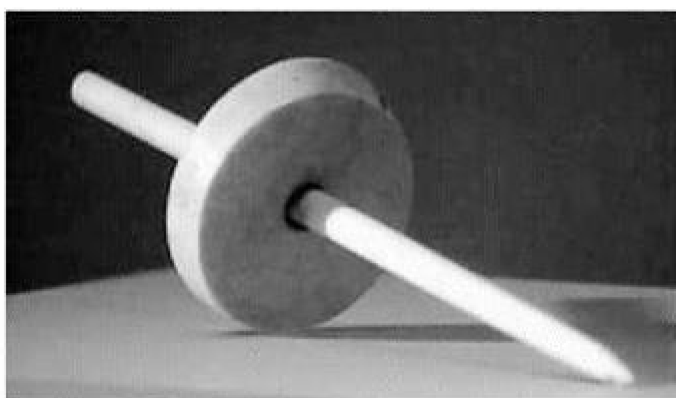


图1-8 浙江余杭瑶山11号墓出土的玉纺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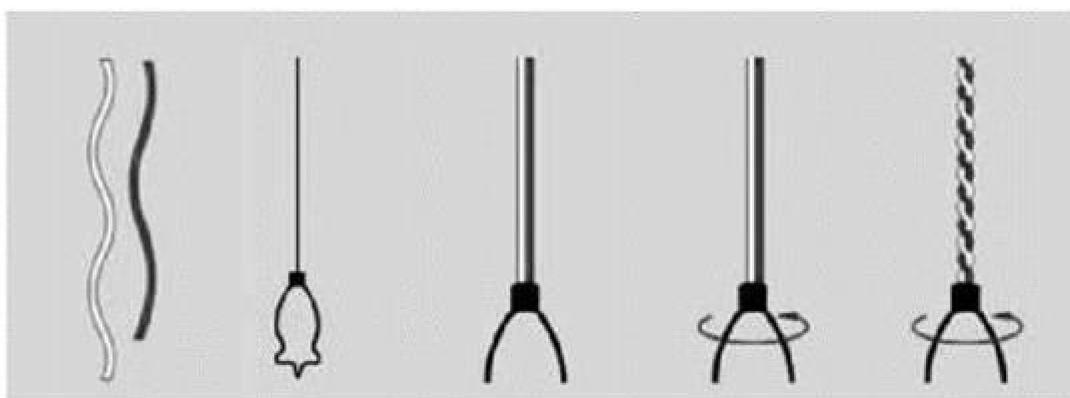


图1-9 纺纱操作过程示意图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土织布机部件中，有类似理发用的牙剪的木锯形器，齿状和齿与齿间距均匀，残留6齿，是用于固定经纱的，还有骨梭形器，用于引纬穿经（图1-10、图1-1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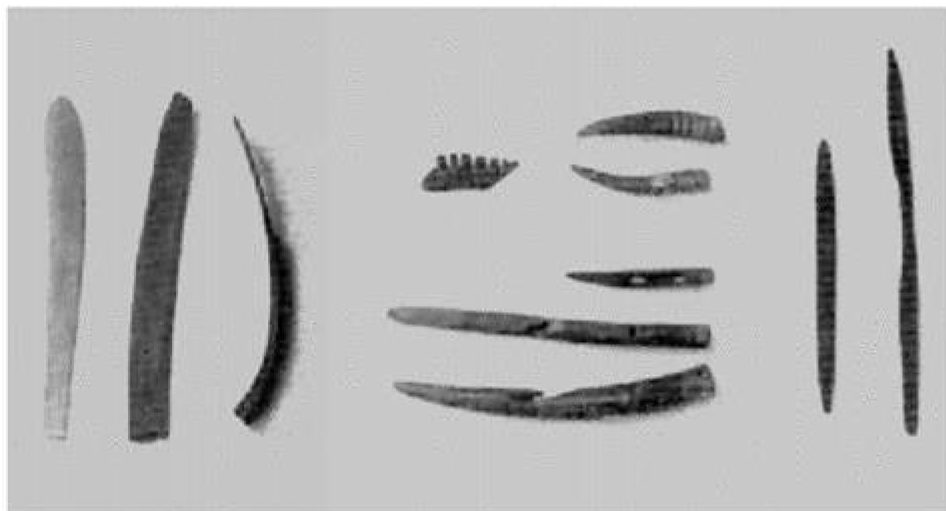


图1-10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土织布机部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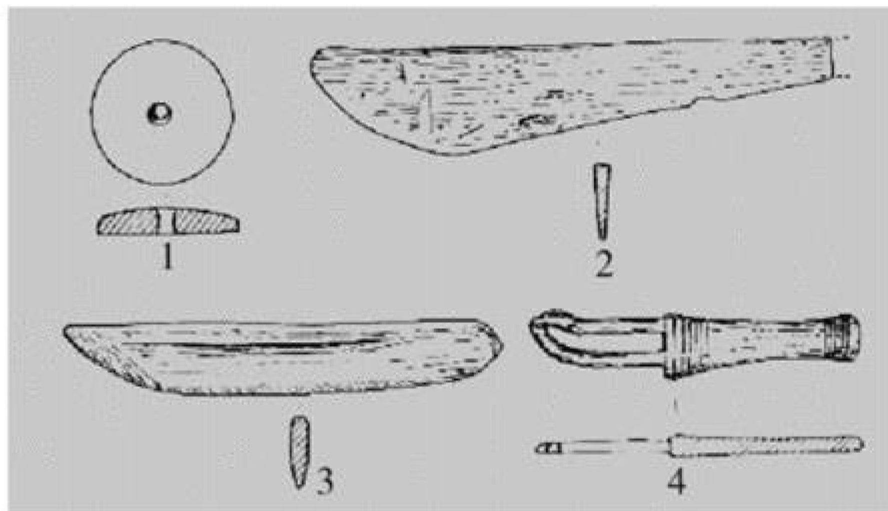


图1-11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文化木纺轮和刀

1. 纺轮 2. A形刀 3. A形刀 4. B形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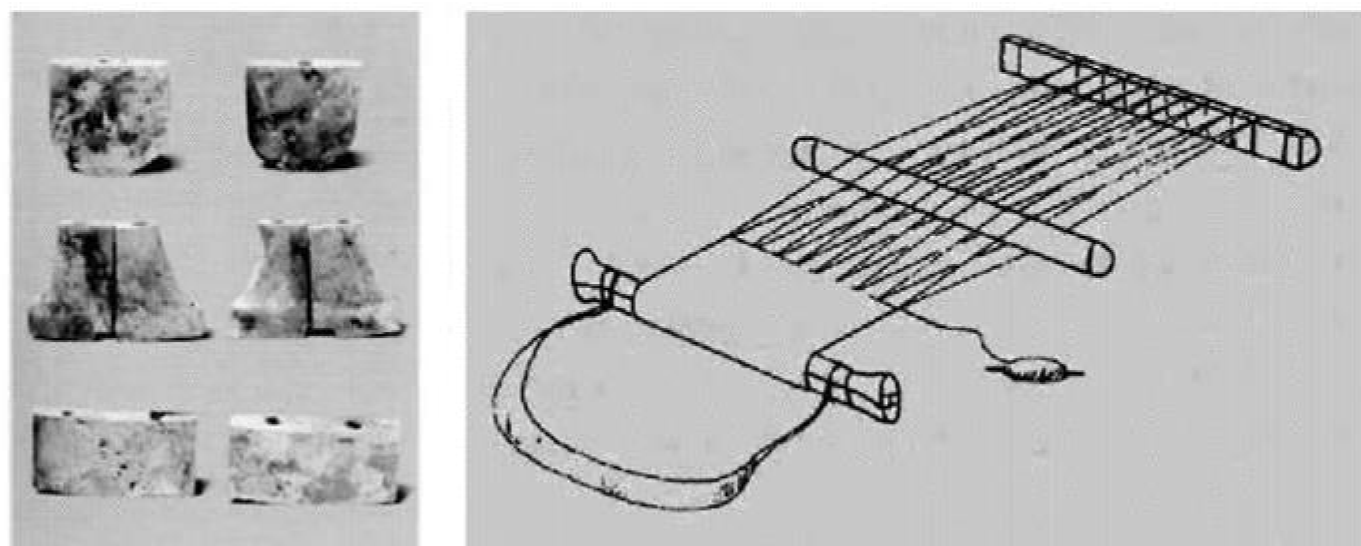
①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33页。

②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第99页。

以上考古发现说明，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河姆渡人，已经开始利用原始织机进行纺织生产了。

三 良渚文化遗址

1986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杭州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23号墓地中，发现了一整套原始腰机部件玉饰品，这是新石器时期原始织机最为完整的发现，可以将良渚织机进行复原（组图1－12）。① 良渚文化的起讫年代为距今5500～4500年。②



组图1－12 良渚原始腰机部件玉饰品及复原后的织机图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织机部件上的象牙盖帽形器（图1－13）雕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这意味着河姆渡先民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生产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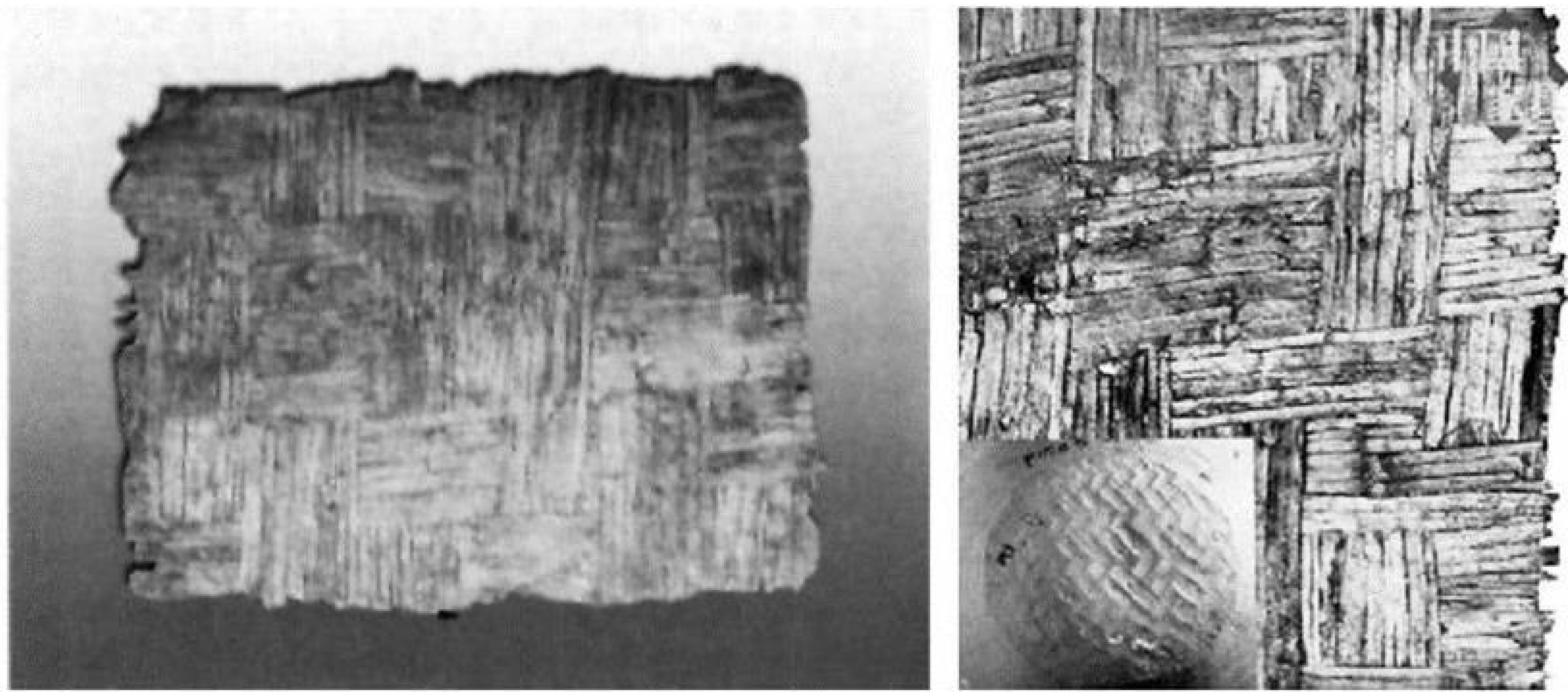
图1－13 刻有蚕形的第二期文化象牙盖帽形器

另外，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苇席（组图1－14）③，意味着河姆渡先民已经具有了“经纬”—“阴阳”的文化概念。

葛纤维也是早期人们所利用的重要纤维之一。1972年，在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遗址第十层文化堆积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葛布残片。其中有一块呈几何纹暗花的编织残片，底部由两根纬纱纠绞与一根经纱编织而成，花部依靠纬纱的上下穿绕成圈，

---

①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35页。
② 王宁远：《遥远的村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7页。
③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第78页。



组图1－14 河姆渡文化第一期文化芦苇编织物

说明葛布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已有生产。这件葛布残片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葛纤维织品，现藏在南京博物院。[①]

四 西阴村文化遗址

1926年，我国考古界前辈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获得了半个茧壳（图1－15）。经鉴定，它属于野生的桑蚕茧。此茧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28年，这半个茧壳经美国Smithsonia学院鉴定，确为蚕茧。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西阴村的这个蚕茧进行了复原研究，测得原茧长1.52厘米、茧幅0.71厘米，茧壳被割去部分约占全茧的17%，推断为桑蟥茧。但池田宪司却在多次考察后认为，这是一种家蚕茧，只是当时的家蚕进化不够，茧形还较小[②]。

西阴村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5500年。这半个茧壳的发现，是可见证中国远古丝绸技术的重要物件，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五 青台文化遗址

青台遗址位于郑州荥阳市青台村，1981年至1987年，郑州文物考古所在青台遗址发掘出土了两口婴幼儿的瓮棺。

在一个瓮棺中，发现一个蹲坐姿势的婴幼儿头骨与肢骨上黏附着灰白色炭化

①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22页。
②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18页。

丝织物。在另一个瓮棺内婴幼儿的腿骨和脚骨上也发现黏附着褐灰色炭化纺织物碎片及块状织物结块。遗址中还发现了与纺织品有关的纺轮、骨针、骨匕、陶刀和合股的麻绳残段。

这是迄今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时代最早、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绸实物，是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的物品，年代距今约5600年。

这一重大发现的意义还远不止此。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鉴定分析，这些丝织物残片向世人明确无误地确认了如下几个事实：

1. 青台先民们已经能够进行多粒蚕茧合并抽丝，以适应制帛经丝纬丝的制作工艺。

2. 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残片是平纹组织的纨［纱］、绞经组织的罗的实物，青台先民们的织造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3. 青台先民们已经采用了炼染工艺进行织物着色。

4. 在青台遗址发掘中，从不同底层的瓮棺中出土了不同规格的平纹麻布实物。经分析，这些麻布密度较高，麻纱的直径较细，麻布的经纬密度均匀，经纬纱比较整齐，证明当时已经完成了由纺织向机织的过渡。也就是说，当时居于青台一带的先民们已经能使用原始织机（腰机）进行织布了。

从丝纤维来看，其单蚕丝面积为36~38平方微米，截面呈三角形，丝线无捻度，是典型的桑蚕丝。从织物结构来看，青台村织物有平纹织制的纱和以两根经丝成组的绞织纱织物，被称为“罗”（图1-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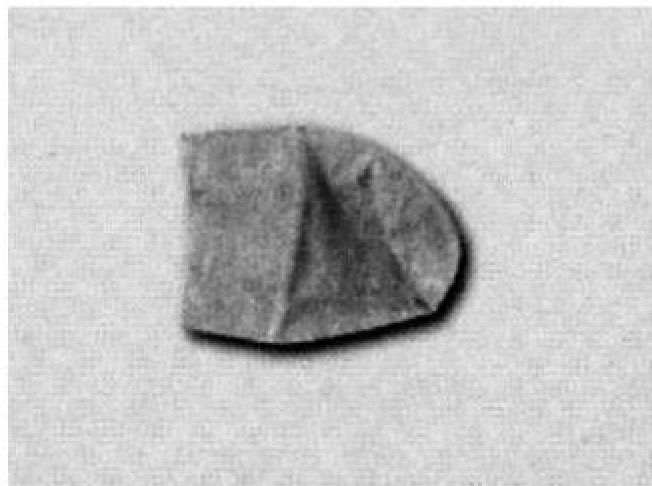


图1-15　半个茧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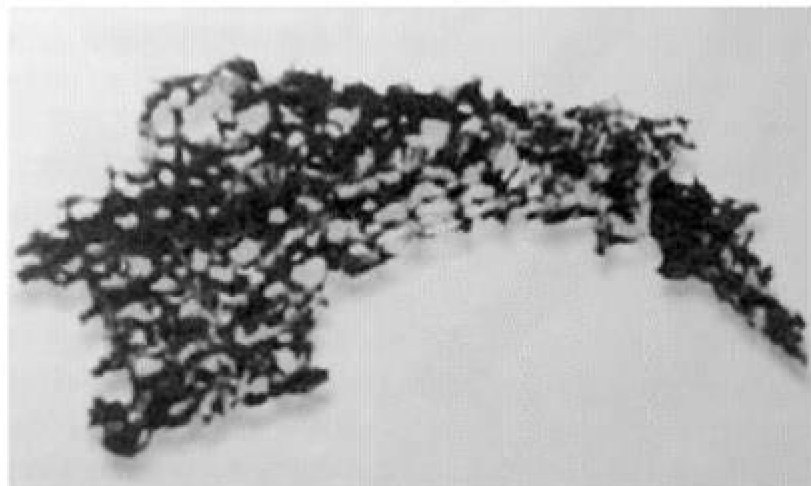


图1-16　荥阳青台遗址中发现的丝织品

这样，在新郑具茨山上轩辕庙中供奉的嫘祖，与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的婴幼儿瓮棺，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却与墓葬中的纤维纺织遗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①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20页。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晚期

一　钱山漾文化遗址

1958 年，浙江考古工作人员在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竹筐，竹筐内有一些纺织品及线带之类的实物。经当时浙江纺织研究所及后来的浙江丝绸工学院鉴定，其中一部分为麻（图 1－17），① 一部分为丝，从而可以证明其中有绸片、丝带和丝线（图 1－18、图 1－19、图 1－20）。② 经^{14}C 测定，钱山漾遗址年代距今约 4750 年。



图 1－17　浙江湖州钱漾山遗址出土的麻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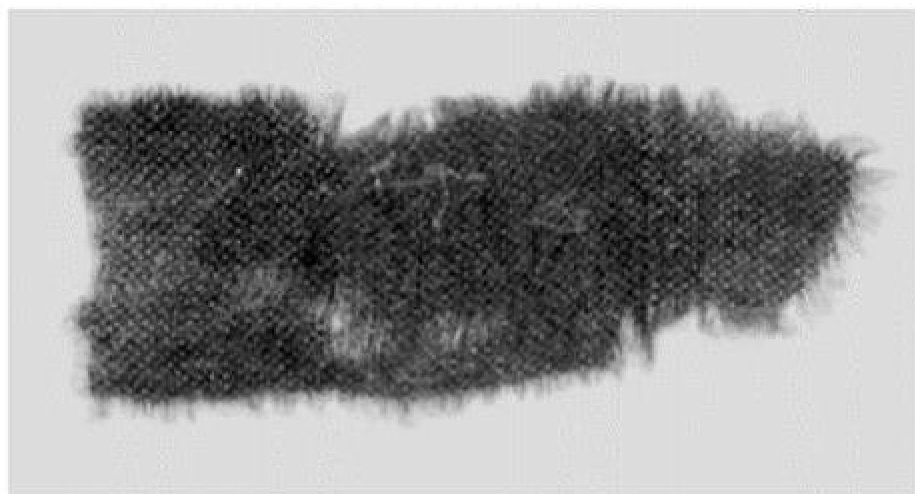


图 1－18　浙江湖州钱漾山遗址出土的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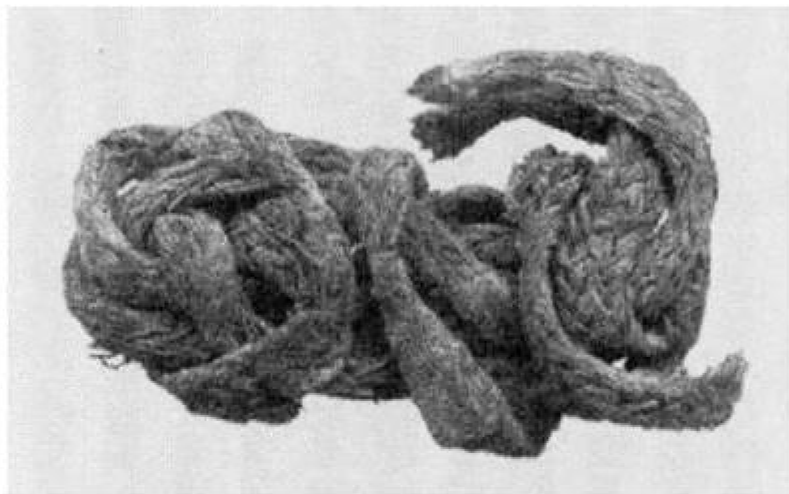


图 1－19　浙江湖州钱漾山遗址出土的丝带



图 1－20　浙江湖州钱漾山遗址出土的丝线

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绸片是由蚕丝借助于丝胶黏合成生丝，作经丝和纬丝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丝带是用几根捻丝再并捻成丝线，瓣结而成，贯穿在平纹组织中间的细长带子。

---

①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第 19 页。
② 俞为洁：《饭稻衣麻》，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 117 页。

二　屈家岭与马家窑文化遗址

在距今约5000～4600年的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和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遗址等许多遗址，也发掘出了许多文化纺轮（图1－21、图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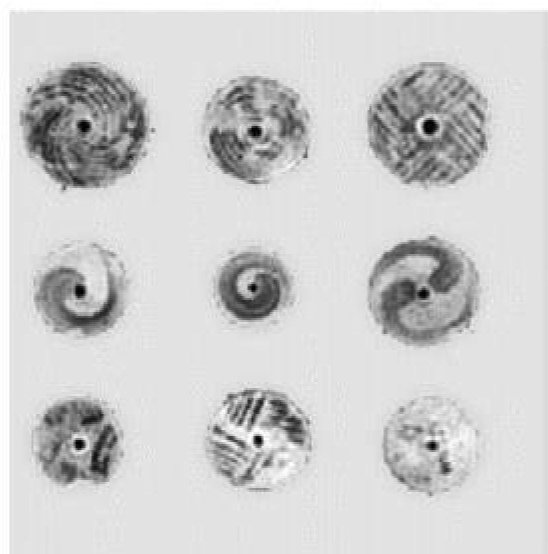


图1－21　屈家岭文化纺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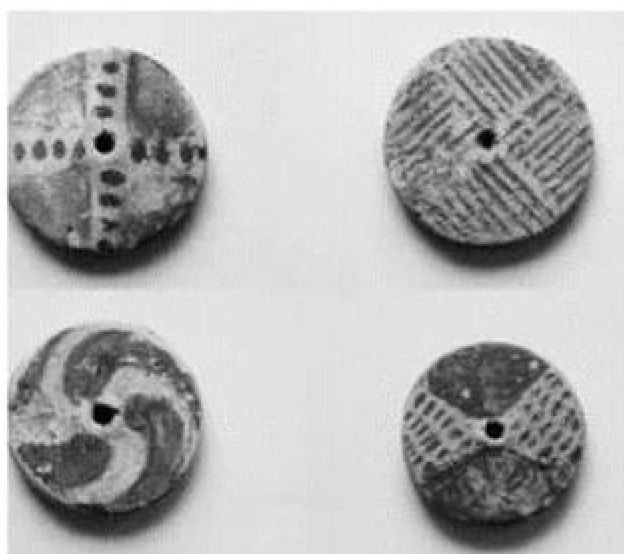


图1－22　马家窑文化纺轮

这说明，我国最早的纺织品已经出现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约7000～5000年前，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已出现麻纺织业和丝织业。从出土实物来看，当时已出现了原始的织造工具和编制工具，能生产出绞编织物、斜编织物和平纹织物，织物的颜色也已出现，说明我国的纺织业在这一时期已有了初步发展。

小结

第一，骨针与纺轮是两种出土最多的与早期纺织业相关的实物。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比较普遍利用野生纤维缝制兽皮用于御寒、遮羞，也说明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古人们，就已经具有了寒冷与温暖、主动与被动、暴露与遮盖、害羞与遮掩、美丽与丑陋的阴阳概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能比较普遍地利用野生纤维、动物绒毛及蚕丝来纺线、织布、制衣了。

第二，而只有用纺轮纺出的纤维纱线作为材料，才能进一步用于腰机进行经纬织布。这说明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意识里，就已经有了经［阳］纬［阴］、经［天］纬［地］的文化概念，并且已经成功地应用到生活实践中。

第三，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带有五行图案的纺轮来看，说明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意识里，就已经有了五行的文化概念。从屈家岭和马家窑出土的纺轮上的图案来看，说明那个时候人们在的意识里，就已经有了四季旋转与运动变化的知识

概念。

第四，在新郑荥阳青台遗址中发现的丝织品与嫘祖发明纺织的传说，在黄帝（嫘祖的丈夫）的故乡有熊（新郑）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五，如果再继续细究，我们还可以将纺轮与纺织文化追溯到贾湖文化时期（距今 9000～8000 年）。在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已经有了用于纺线的石纺轮（图 1－23）①和陶纺轮。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贾湖的石、陶纺轮是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纺织用具。纺轮的出现，说明贾湖的先民对旋转力和拉力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和成功的实践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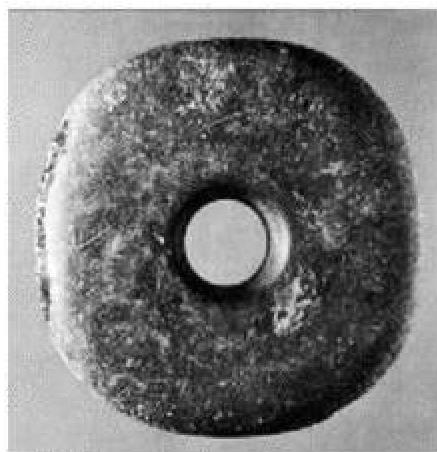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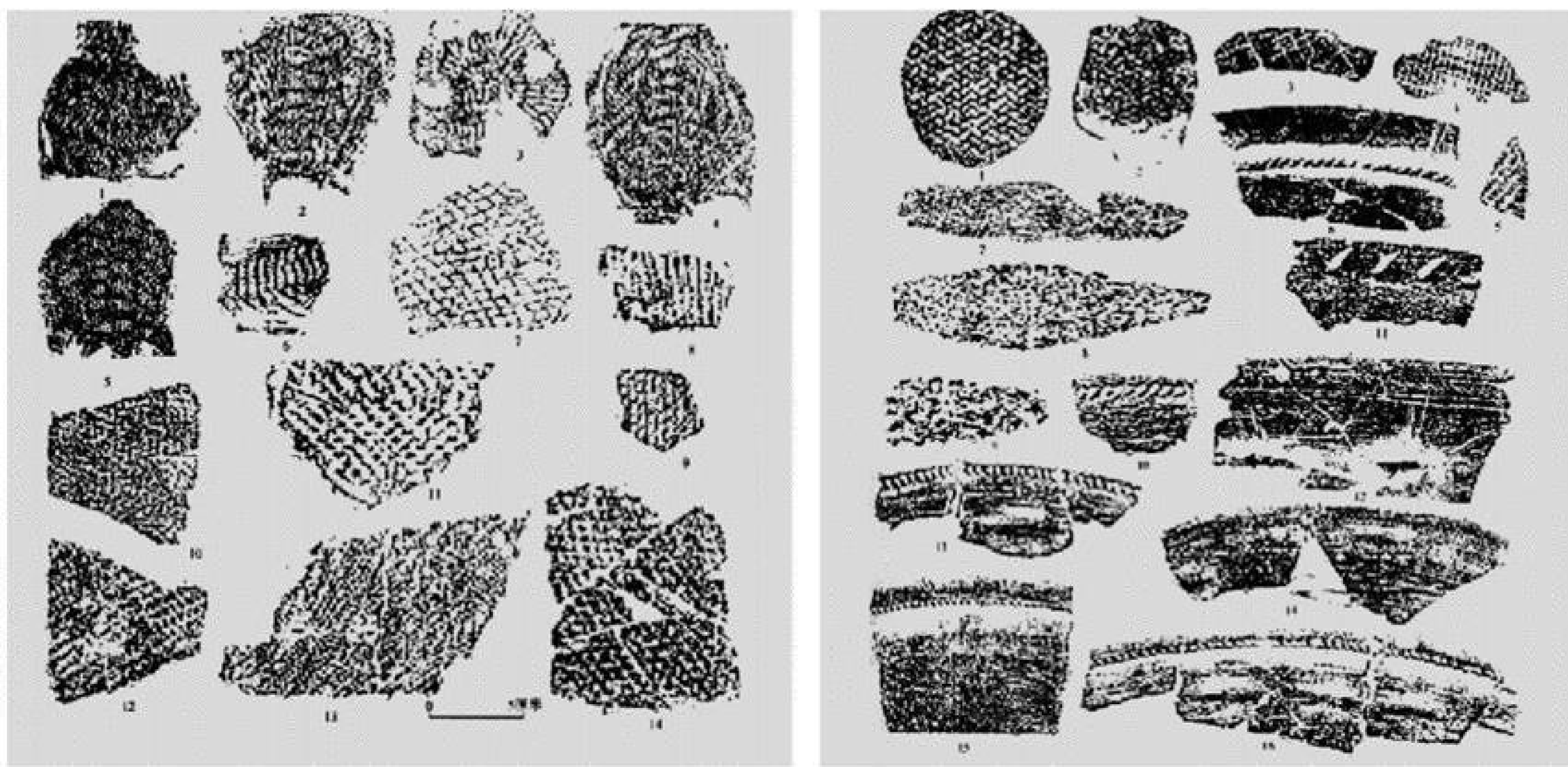


图 1－23 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纺轮

贾湖遗址发掘出的大量日常生活用的陶器上有大量规整的经纬形式的网绳纹、方格纹、席纹、网纹印痕（组图 1－24）②，特别是宽度不足 1 毫米的细绳纹印横以及细如发丝的针孔③，均说明贾湖的先民已经具有了经［阳、天］纬［阴、地］的文化概念，还说明当时纺织手工业已经成功地应用在生活实践中。



组图 1－24 陶器上的纹饰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九。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 205、211 页。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 953 页。

| 第二章 |

食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一　贾湖文化遗址

2001 年在舞阳贾湖遗址，发掘面积达 300 余平方米，发现房基 8 座，灰坑 66 座，陶窑 3 座，墓葬 96 座，发现陶、石、骨各种质料遗物数百件。同时发现并发掘出大量我国最早的炭化稻料（图 2 – 1）①、豆粒等植物种子，各类鱼、鳖、龟、鹿、猪、狗等动物骨骼。发掘出的石磨盘和磨棒②（图 2 – 2）、石铲等实物资料，表明约 9000 ~ 8000 年前这里已有了人工栽培稻，这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以及这一时期原始先民生产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图 2 – 1　遗址出土的炭化稻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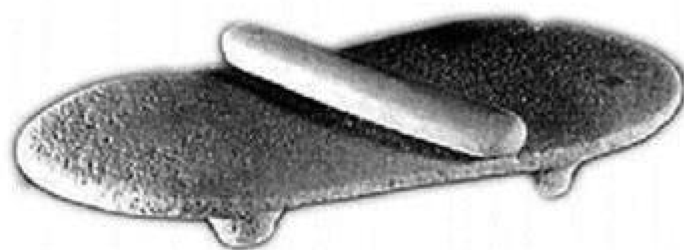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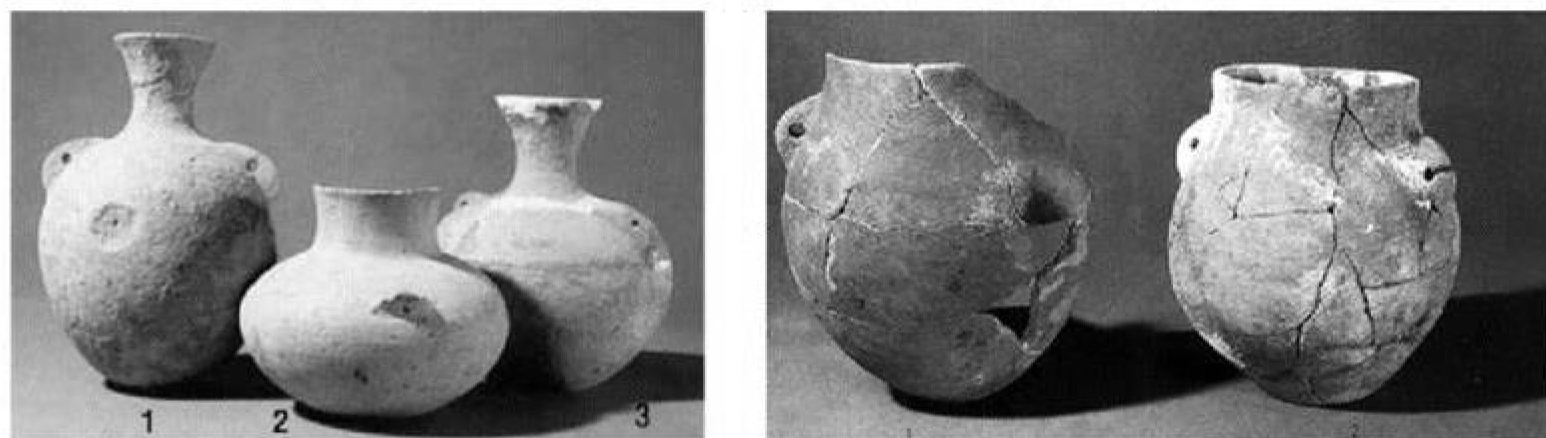
图 2 – 2　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2004 年 12 月，经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贾湖遗址主要发掘者张居中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教授帕特里克·麦克戈温博士联合，对贾湖出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图版一八四。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 382、38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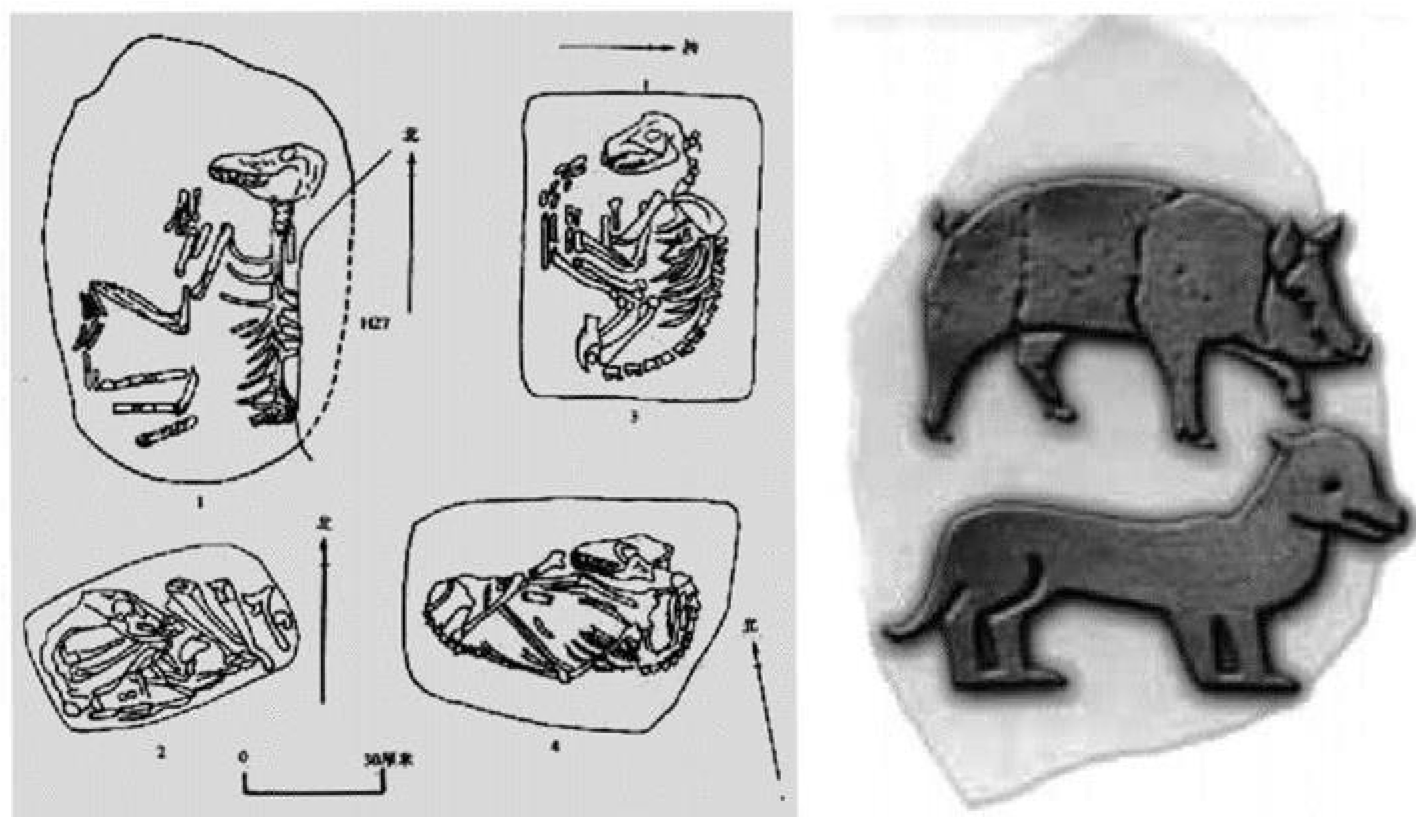
土的陶器（组图 2－3）[1] 上的附着物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距今约 9000～8000 年前的贾湖人已掌握了原始的酿酒技术，开始酿酒，其主要成分有稻米、山楂、蜂蜜、葡萄等。



组图 2－3　盛酒的陶器

目前，这一古配方已复原成功。说明贾湖先民在那个时代的生活非常富足，粮食产量不但能满足人们食用之需，而且还有富余的粮食用于深加工——酿酒，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

在贾湖遗址发现 10 个专门藏兽坑。经鉴定，所藏动物均为狗（组图 2－4）。[2] 发掘出土的动物亚化石相当丰富，经鉴定有 20 多种。其中家养或可能家养哺乳动物有家猪、羊、黄牛、水牛等。国内外专家研究成果表明，公认世界上狗的驯化家养和猪的驯化圈养也始于同时期的贾湖。遗址内还有其他动物。这表明我们的祖先贾湖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相当丰富。



组图 2－4　兽坑平面图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五。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 130 页。

二　彭头山文化遗址

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李家岗、曹家湾和下刘家湾，湖北宜都城背溪和枝城北（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年代，距今约 8500 ~ 7000 年），陕西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都发掘出了现已知最早的稻谷遗存。除了贾湖和八十垱，其余遗址的稻谷遗存差不多都是在“红烧土”或陶片中发现的稻壳碎片（图 2 –5）[①]，贾湖遗址则是在房间和窖藏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偶尔也有一些稻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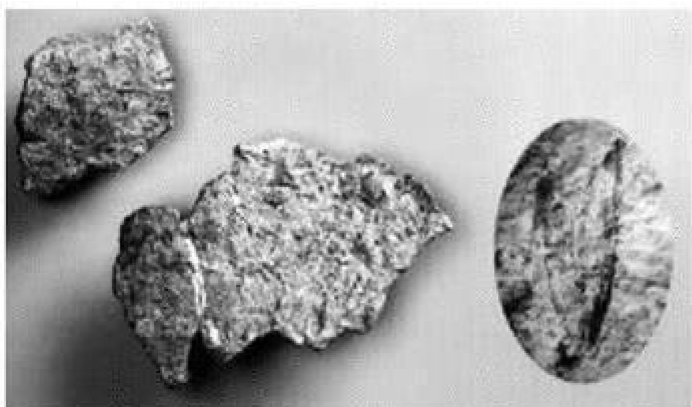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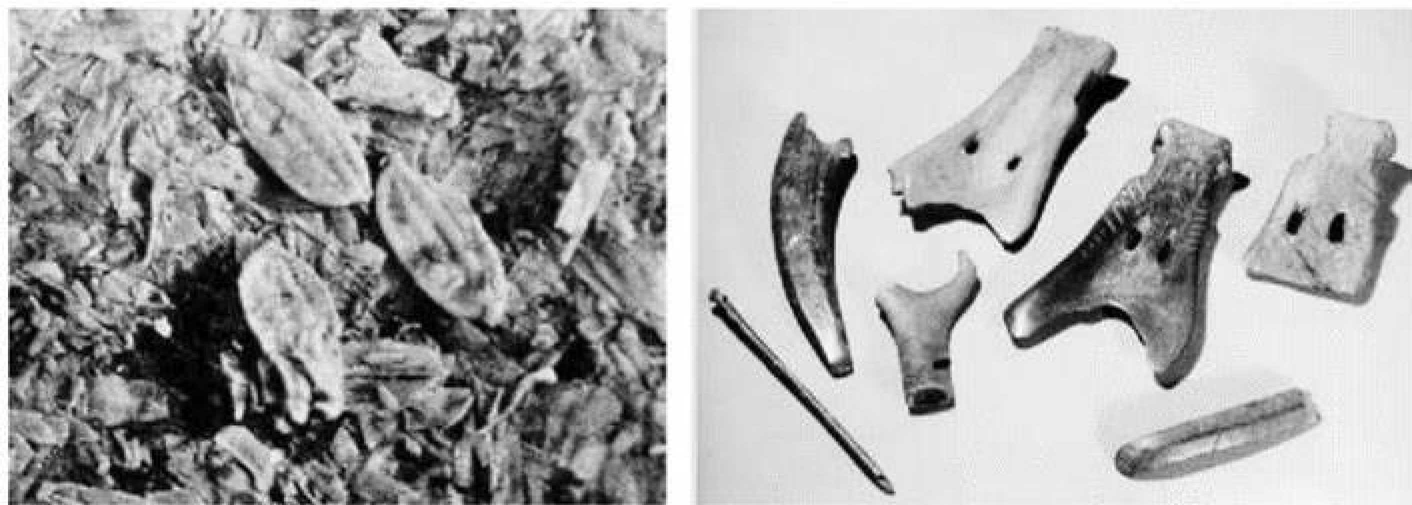


图 2 –5　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的含有稻谷壳的陶片

三　河姆渡文化遗址

在长江下游偏南的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 ~ 6500 年）遗址，也发掘出了大量堆积着的稻谷，以及用于耕作的骨耜（梠）（组图 2 –6）。[②]



组图 2 –6　河姆渡遗址中堆积的稻谷和骨耜及其他骨器

2004 年 5 月至 8 月在宁波市江北区以北 27 公里的慈城镇八字村傅家山，发现并发掘出了河姆渡文化遗址。考古队勘探了 4 万多平方米，发掘面积 725 平方米。考古发现，遗址地层堆积共分 8 层，堆积深度 2. 1 ~2. 5 米，在第 7 层和第 8 层发现了重要的原始村落遗迹。从中出土了大量石器、玉石器、骨器(图 2 –7)、

---

①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 35 页。

② 张光直、徐苹芳、严文明、王幼平、张仲培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 36、37 页。

陶器、木器和象牙器在内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雕刻艺术品，同时还发掘出了众多食物果实、植物种子和动物骨骼，其中可复原的器物达470余件。这是宁波市继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后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保存较完整的一处史前文化遗迹。

专家们从考古出土器物推断，在7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踩着我们今天同样踩着的大地，头顶同一片蓝天，过着以耜耕农业为主，渔猎和采集经济并存的河姆渡文化早期类型的新石器时代生活。

而从宁波傅家山遗址出土的河姆渡文化装饰器物中，出现最多的是鸟的形象。尤其是一块象牙雕鹰头（图2－8），两面雕凿，宽鼻钩喙，双眼圆睁，形象极其凶猛，其中曲线的圆润光滑令观者无不赞叹。这说明，早在7000年前的宁波傅家山人就已经具有了太阳鸟的文化概念。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第四期文化陶豆盘中，有一个豆盘内带有抽象的四鸟日纹图案。金文馨认为，四鸟日纹图案是原始八卦的先声，是河姆渡先民原始历法的写实（图2－9）。[①]



图2－7　傅家山出土的骨耜



图2－8　象牙雕鹰头器



图2－9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四鸟日纹图案陶豆盘

以上实物说明，河姆渡文化地区的先民早在7000～6500年前就已经对太阳有了系统的了解，并且把太阳进行了形象化处理，形成了太阳鸟的文化比喻观念，将他们所认为的太阳的圆周运动成功地表现在生活必需品和艺术中。

四　大地湾文化遗址

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中国甘肃省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

①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第160、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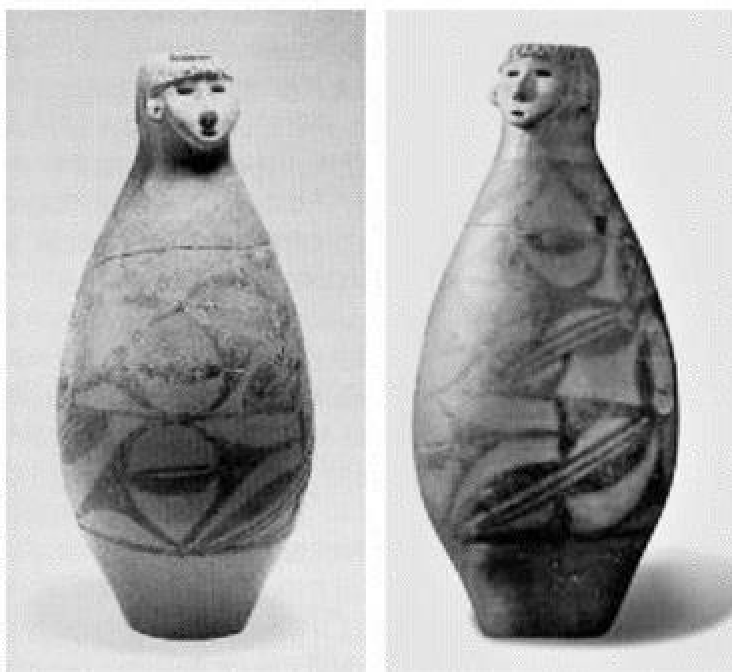
店村东，坐落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和相接的缓坡山地上，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

1958年，甘肃省文管会发现该遗址，1978～1984年，省文物工作队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3800平方米。大地湾考古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文物近万件，发现房址241座、灶址104个、灰坑和窖穴321个、窑址35个、墓葬70余座、壕沟9条。

大地湾遗存包含五个文化期，据碳素年代测定，其时代约为距今7800～4800年，上下跨越达3000年左右。在我国新石器考古中，无论规模、遗迹遗物丰富程度，还是研究价值，大地湾文化遗址均超过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

第一期即前仰韶文化，距今7800～7300年，它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这批最早开发陇原的先民在那时就创造发明了我国最早的彩陶，同时还种植生产了我国第一批粮食品种——黍。

在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堪称新石器时代用于盛饮用水的陶塑精品——人头形小口彩陶瓶（组图2－10）[①]，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人物造型细致而生动，特别是头发的式样表现得很具体。其两侧和底部都能看出是披发，前额上齐刷刷垂着一排如现代女性喜留的“刘海儿”，双耳也都有垂系饰物穿孔。腹部以黑彩画三横排大致相同的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图案样式与河南陕县庙底沟文化（即仰韶文化中期）的陶器花纹格式大致相同（组图2－11）。[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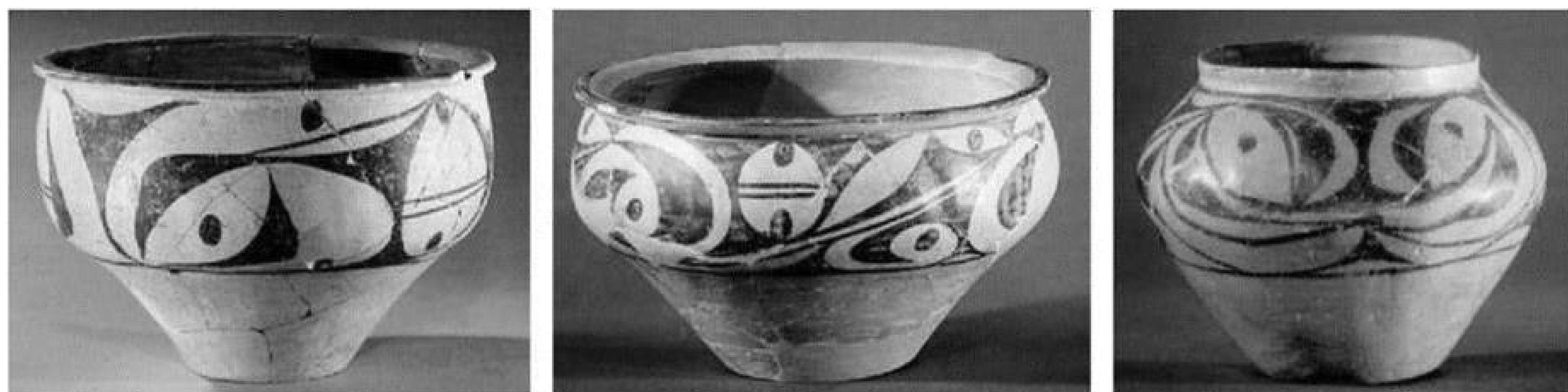
组图2－10　人头形小口彩陶瓶

这说明，大地湾地区的先民已经有了将少女、花瓶与八卦中的“兑”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概念，并且成功地应用到生活必需品中。

陶器上使用黑色直线条带、三角、菱块或以曲线条带、圆点、凹边三角及月牙形的装饰图案，分别始于西阴文化和半坡文化。[③] 这说明，那时的先民已经有了阴阳的文化概念，并且体现在生活艺术中。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即使是拿今天大家都知道的现代艺术表现手法与大

①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86页。
② 华梅：《古代服饰》，文物出版社，2004，第15页。
③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44页。



组图 2－11 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西阴文化彩陶盆

地湾地区先民对人头形小口彩陶瓶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一下对比，可以看出现在我们采用的也不过就是那时的形象思维方式，将少女性感的形体与花瓶联系在一起，用花瓶［兑］来插鲜花（比喻少女），用花瓶［兑］衬托青年女子身材的美丽与魅力，这与汉字“兑”具有少女和花瓶之意的形象思维创造和写意（表意）也正好是符合的（组图 2－12）。

五 半坡文化遗址

1954～1957 年发掘的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据 ^{14}C 测定并经校正，确定年代为公元前 4800～前 4300 年。已发掘出 45 座房屋、200 多个窖穴、6 座陶窑遗址、250 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 1 万件，还有粟、菜子遗存。其中房屋有圆形、方形半地穴式和地面架木构筑之分。

遗址出土的常见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一人面鱼纹盆（图 2－13）① 和绘鱼纹盆（图 2－14）为 1955 年出土，高 16.5 厘米，口径 39.5 厘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另外，从其他陶器上还发现了 22 种刻画符号，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

---

①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 67 页。



组图 2－12



图 2－13　人面鱼纹盆

1976年陕西临潼姜寨出土了彩陶人面纹葫芦瓶和人面鸟鱼纹葫芦瓶（高29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6.5厘米。见组图2－15）[①]，属半坡文化，现藏于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



图2－14 绘鱼纹盆



组图2－15 人面纹葫芦瓶和人面鸟鱼纹葫芦瓶

特别是人面鱼纹盆的口沿上正对着人面和鱼的位置绘出了四条直道，在人面和鱼的交接的位置绘出了四条三角道，这一下就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易学文化中八卦里的四正（子午卯酉，东南西北）和四隅（寅申巳亥，东北、东南、西南、西北）的知识概念。

说明那时的先民，已经有了阴［鱼］阳［人面太阳］、昼夜、寒暑交替轮回的文化概念，以及有了中国易学文化中八卦、四正、四隅的知识概念，并且已经体现在生活艺术中。

在出土的一件半坡文化的陶罐瓶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口有运动感的9条画纹，下腹部有运动感的原始八卦的八角纹，符合上（天、乾、圆、运动、九数）和下（地、坤、腹、运动、八方）的八卦数理（组图2－16）。[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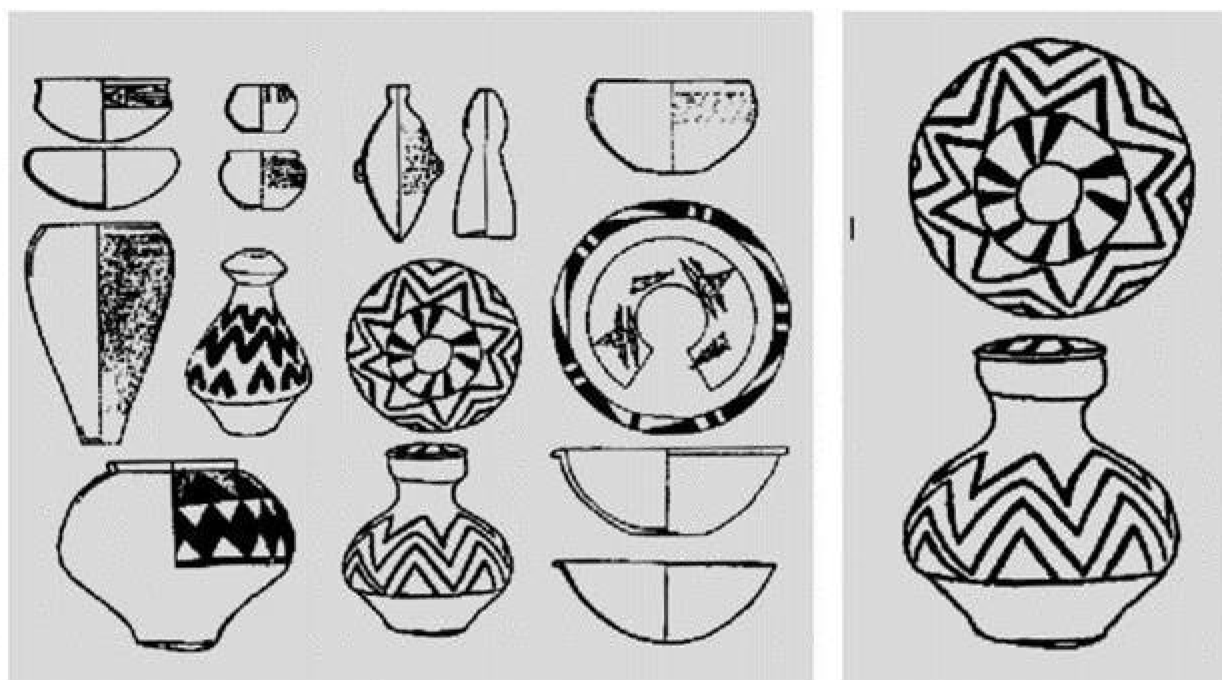
另外，从半坡遗址出土的113件陶器和陶片上还发现了27种刻划符号；从姜寨遗址中，发现了129件陶器陶片，符号38种，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组图2－17）。[③]

半坡遗址的陶器刻划符号发表后，引起了古文字专家学者的重视。国内第一个发表文章进行研究的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半坡彩陶上的刻划，其“意义止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

① 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彩页。

②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45页。

③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52、55页。



组图 2－16　半坡文化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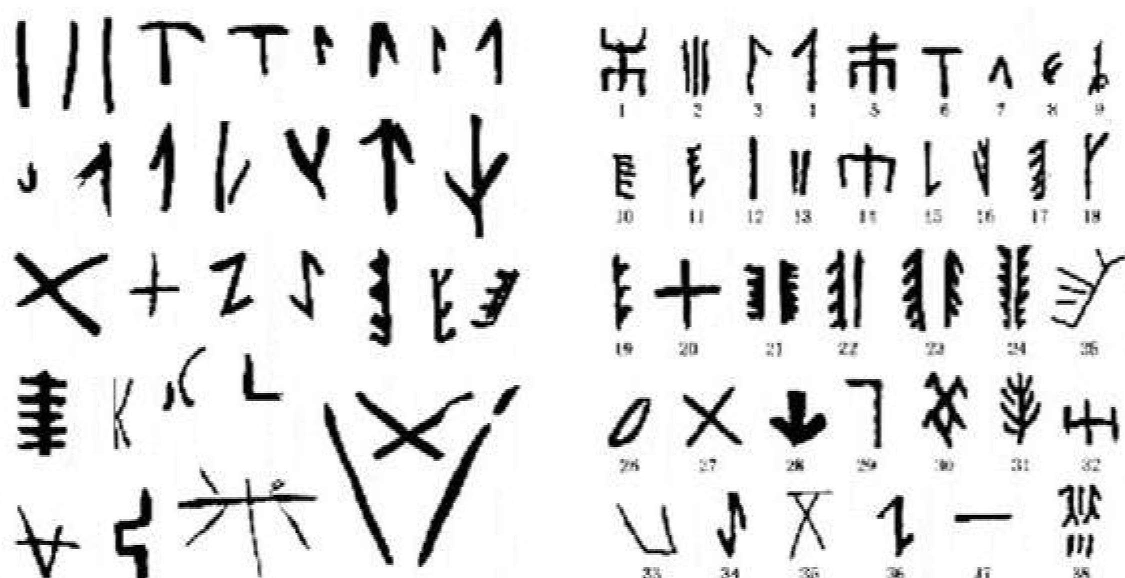


图 2－17　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它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是汉字发展的历史。”郭沫若先生还依据半坡的发现，结合其他出土资料、现存民俗和文献记载，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

另外，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类型，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1000～2000 年，但出土的陶器符号，却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类似。在青海乐都柳湾的 226 座具有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发掘出 679 件彩陶壶罐的下腹部或底部，发现有用毛笔之类工具在入窑烧制之前绘写的符号（组图 2－18）。[①]

①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 63、64 页。



组图 2－18 青海柳湾遗址出土的彩绘符号

另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期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 50 多种（图 2－19），① 时代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类型之后的庙底沟类型相当。

以上考古发现说明，在那时候，长江中游与黄河中上游的文化交往中，早中晚期的仰韶文化和甘肃东部介于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之间的石岭下类型，都对大溪文化有过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对大溪文化的影响甚为深刻。

1986 年，在安徽蚌埠吴郧乡双墩村发掘了一处距今 7000～6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及残片上有 146 例 59 种之多的刻划符号（图 2－20）。② 据整理者研究认为，这些符号包括了“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制、饲养家畜、纪事于记数”等内容，“尽管仍是符号，却具备了文字的某些特征”。③



图 2－19 大溪文化中的刻划符号



图 2－20 蚌埠双墩村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①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 66、68 页。

②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 67 页。

③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画初论》，《文物研究》总第 5 辑，黄山书社，1989。

蚌埠双墩村遗址位于江淮流域，在这里出土发现的一批数量可观、时代相当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再一次表明至少在距今7000～6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先民已具有一定水平的用符号记事或表现某些概念的能力。

另外，在良渚文化陶器上也有刻划符号（图2－21）[①]，在上海马桥遗址出土的属于良渚文化第五期的陶器残片上发现有类似于原始八卦的符号(图2－22)[②]，在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陶罐上发现有类似于原始八卦的八角星符号（图2－23）。[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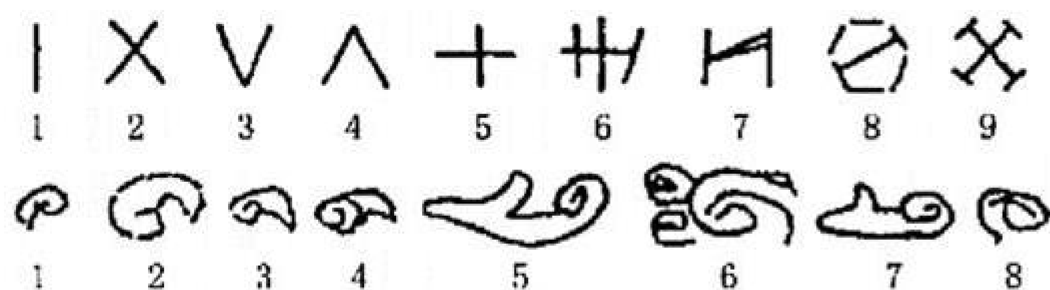


图2－21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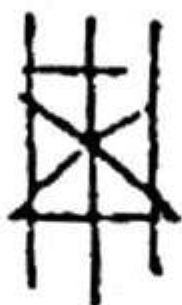


图2－22　马桥遗址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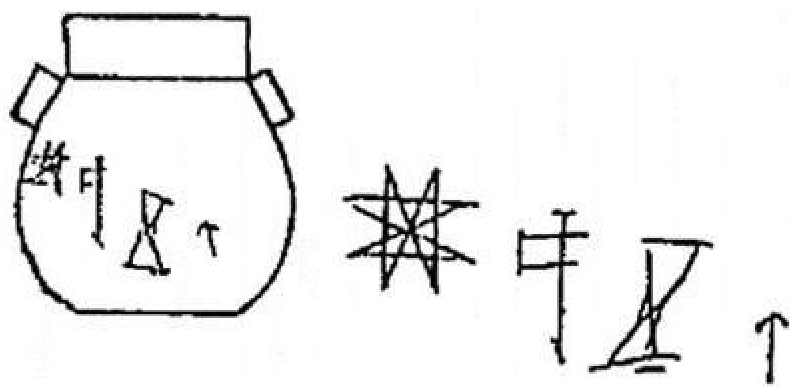


图2－23　江苏吴县澄湖出土陶罐上的八角星符号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以上所有出土的刻符，都与考古研究整理者认为的“纪事于记数”颇符合，“纪事于记数”中的“数”就说到了实处。这就说明考古研究整理者已经发现了人类的早期智者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最早都是从“数”开始的，智者们利用“数”的时代也就是“结绳记事”的时代。

但是笔者在此所说的“数”，是“一”到“八”这八位“数”，这是在远古还没有诞生文字的时代，就被中国早期的智者们赋予了能够分类和包容万事万物的系统概念，以及神圣的哲学之意，是能够包罗万象、万事、万物的。

如果我们把“数”与原始八卦的符号结合起来，就可以断定在没有诞生系统文字的时代，中国早期的智者们就已经具有了将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能

①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86页。
②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87、88页。
③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87、88页。

够归类在易学之“数”中的系统能力。这符合西方哲学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万物皆数”的观点。

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虽然没有诞生出系统的文字，但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里的“一”到“八”位的每一个“数”都可以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库。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一　大汶口文化的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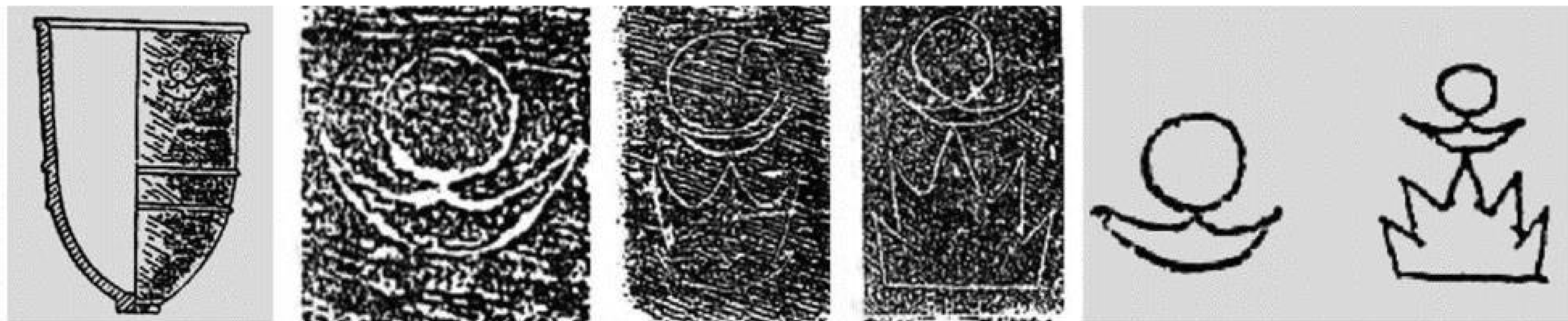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

它前承当地的北莘文化，后接当地的龙山文化，依据当时已有的^{14}C测年数据，并与邻境地区同期文化进行比较，推定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500～2300年，中早期和中晚期的分界分别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前后。[①] 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目前已发现的陶器符号主要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其年代大体与仰韶文化晚期乃至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

在陶尊上刻划的符号（组图2－24），发现于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两遗址中，后来这种刻划的符号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遗址又陆续有所发现。[②]



组图2－24　大汶口文化陶器及放大后的符号

① 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第21页。

②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72、73页。

这说明那时的先民已经有了日月、阴阳、文明的文化系统概念，有了最早的刻符或图画“易”字，并且已经在生活艺术当中体现了出来。因为，“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智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所以“易”也是中国远古文化中最早的“文明”之意。

1963～1966年，南京博物院两次对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绘有原始八角形符号的彩陶盆、彩陶豆（图2－25、组图2－26）。①



图2－25　绘有原始八角形符号的彩陶盆



组图2－26　泰安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

据已发表的资料，方心八角形纹符号最早见于大汶口遗址。在该遗址发掘过程中，采集到10件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片。其中有一块略有残缺的绘有方心八角星纹图案。在山东邹县野店遗址出土的一件属大汶口文化中期的一件彩陶盆腹外壁上，绘有4个类似于原始八卦的八角形符号。

二　崧泽文化遗址

在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有方心八角形图案的出土文物有两件，一件在陶壶底外面，一件在黑衣灰陶豆把上，两件均属崧泽中层文化（图2－27）。根据^{14}C对崧泽中层人骨测定，这两件绘有原始方心八角形符号的文物绝对年代在距今5800～5100年。

这说明，那时在很广大的地区，人们已经有了阴阳、八卦、九宫的文化系统概念，并且已经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中。

如果我们把从“一”到“八”这八位“数”，与泰安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和

① 张敬国主编《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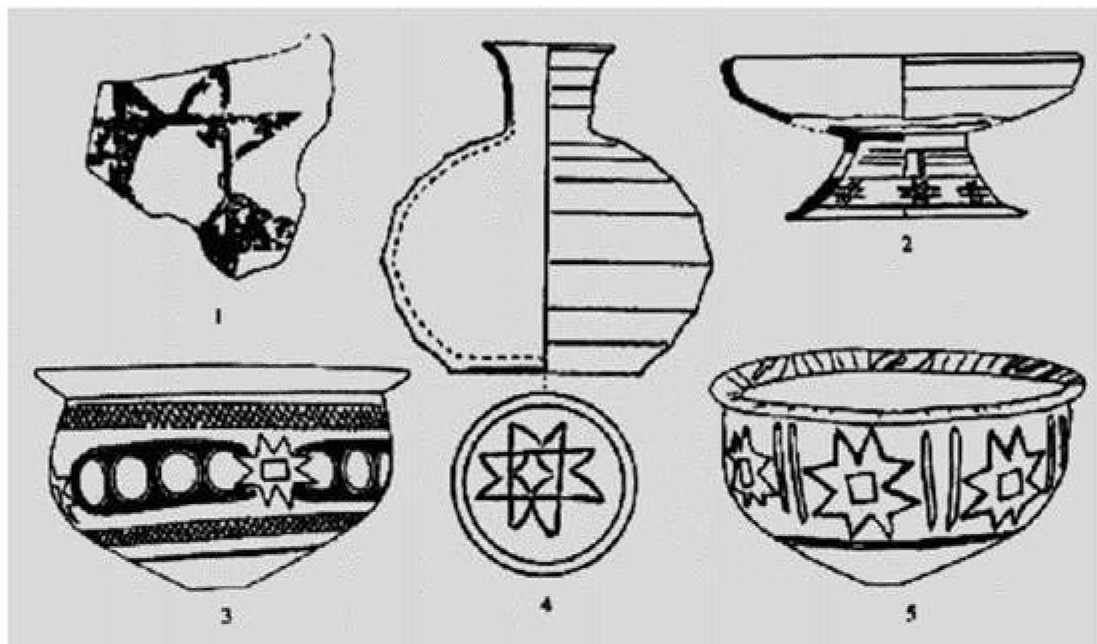


图 2－27 陶器上的八角纹

1. 彩陶片（大汶口） 2、4. 彩陶豆、彩陶壶（崧泽） 3、5. 彩陶盆（邹县野店、邳县大墩子）

崧泽文化的八角星纹结合起来，就可以断定在没有诞生系统文字的时代，中国早期的智者们是将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归类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系统文化之“数”中的。这与古希腊哲学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万物皆数”的观点也是符合的。

另外，从山东兖州王因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彩陶杯（高 16 厘米）与从湖北枝江关庙山出土的大溪文化桶形彩陶杯图纹（组图 2－28）[①] 来看，说明当时的人们对阴阳的系统概念是很清晰的。

三 陶寺文字遗址

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带有文字的扁壶（图 2－29）。该扁壶距今约 4000 年，鼓凸面一侧朱书“文”字，在扁平的另一面亦朱书一字，但目前尚未确认为何字。有专家认为，殷墟甲骨卜辞中已见“文”字，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文”字，与之相差无几。殷墟甲骨文是较为成熟的汉字文字系统，陶寺扁壶上的“文”字，证明甲骨文早在商代以前就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史。

当然，这几个字符的重大意义显然并不只在于它的具体含义，而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它的存在和出现。单从字符的意义上说，陶寺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是还不能算做最早和最古老的，因为在它之前，从山东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过更为简单的字符，甚至在距今 7000～4500 年的仰韶文化遗迹中也已发现过字符。

---

①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 54、57 页。



组图 2－28　大汶口文化彩陶杯和大溪文化桶形彩陶杯　图 2－29　写有“文”字的陶寺扁壶

与此前发现的字符相比，陶寺字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字”的成分多了，“符”的成分少了，且变随意刻划为正式书写；二是陶寺字符不但是伴随着趋于定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的出现而出现的，而且也已明显地带有了社会性和智慧性的文明含义。

所以我们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上，可以最直接地感受到那时的人们在追求文明和崇尚文化时，已可以用文字来表达了。

小结

在中国当代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中，有一位已经故去多年的考古学老前辈叫苏秉琦，曾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苏先生曾用三句话概括考古学在重建中国早期历史方面的重要贡献：(1) 中国有超过百万年的文化传统的根系；(2) 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两个农业体系而言）；(3)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对贾湖遗址出土的 1000 多粒炭化稻米（其中 197 粒较完整）的形态学分析表明，与野生稻相比 80% 以上的炭化米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与现代栽培稻近似，因此可以肯定贾湖古稻已被驯化为栽培稻。

然而，从每个层次几乎都存在偏粳、偏籼、籼粳中间型及野生稻型炭化米来看，贾湖古稻群体中的变异很大，是一个粒形上包括籼、粳、中间型及平野的混合群体（与现代已分化很彻底的籼、粳稻品种不同），并且在距今 9000 ~ 8000 年的 1000 年中，粒形的长与宽逐渐增加，而长宽比却逐渐变小，体积逐渐变大，而接近现代栽培稻的趋势，这有三种可能：

一是普通野生稻曾经发生了粒形偏粳或偏籼的突变。

二是这些突变类型与以异花授粉为主的普野发生了天然杂交，从而出现了从

偏粳、偏籼、中间型到普野粒形的分离（我们在普野与粳或籼稻的杂交试验的后代中，经常可以看到上述的分离情况）。

三是虽然那时人类的选择能力还很弱，但可以看出，已经朝着稻米容积加大（粒形短、宽、厚）人为改良的增产方向在逐渐进步了，结果就形成了与其野生祖先普野显著不同的栽培稻。

栽培稻的起源问题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由于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早期稻作遗存最多的国家，又是丰富的野生稻资源的传统分布区，又有着独立发展且具有古老传统的举世瞩目的稻作文化，因而中国栽培稻起源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栽培稻的起源，目前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认识。

一是阿萨姆—云南说。但据最新公布的野生稻资源调查结果，与栽培稻起源有关的普遍野生稻也只在景洪、元江两县有零星分布，大量的只是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这就使云南说处于不利的地位。

二是华南说。但这一论点至今也未能得到丰富的早期稻作遗存材料的足够支持。

三是长江中下游—华南说。因有彭头山、河姆渡等考古材料的支持，又有野生稻资源的分布（或靠近现今野生稻分布区），因而目前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

四是黄河流域说。因这一论点过于依靠文字训诂，对考古学和年代学资料引用不当，故而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五是认为淮河上游和长江中游是中国栽培稻起源中心。

纵观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几支早于7000年前以稻作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会发现，像彭头山文化及稍后的城背溪文化、皂市文化和李家村文化，均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而贾湖文化则分布于淮河上游地区。这两个地区地域相连而又自成单元，气候相近又有区别，文化相似又各有特征，又都发现有早于8000年的丰富稻作文化遗存，应是栽培稻起源研究的中心和重点。

栽培稻的最初起源地，应有以下四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一是该地必须发现有我国最早的栽培古稻遗存；

二是该地当时还必须发现有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遍野生稻；

三是该地当时要具备适于栽培稻及其野生祖先种生长发育的气候与环境条件；

四是当时该地或其附近要有以栽培稻为主要食品，并具有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古人类群体，以及相应的稻作农业生产工具。

上述四条，缺一不可。前两条是成为中国稻作发祥地的直接证据，第三条是成为发祥地必须具备的客观环境条件，第四条也至关重要。

龙虬庄遗址的发掘者张敏先生在认真研究了龙虬庄文化遗存与周围诸考古学文化的异同后指出，江淮东部的原始文化来源于淮河上游和贾湖类型，同样，其稻作农业的来源亦应为贾湖类型文化。也就是说，淮河流域有着与长江流域同样古老的稻作文化传统。但是淮河流域是以栽培偏粳（粳型稻）为主，与长江流域栽培偏籼（籼型稻）为主明显不同。由此可认为，淮河流域自8000多年以来，由于自然环境即水热因子的左右和稻种无数代的遗传变异，逐渐形成了一个同纬度粳稻栽培带，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栽培和食用粳稻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区。

人类将普遍野生稻逐渐驯化为栽培稻的过程中，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是大体同时发生并且同步发展的，只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使稻种向粳、籼两个不同的方向进化，最终形成了两个亚种。由于淮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可能较长江流域更为恶劣一些，所以淮河流域的先民在5000年前已先于长江流域完成了稻种的选育优化，使粳稻的生物形态定型化。

由此，可以说，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于这个地区，并非由长江流域传来。

淮河流域文化传统在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传统交往的同时，对周围文化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一技术首先普及于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之后，稻作栽培技术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其中粳稻栽培技术向北从淮河下游沿山东沿海地区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中部传到日本列岛；籼稻栽培技术向南广布于华南地区，进而传至印度支那和东南亚。

由于气候逐渐趋于干冷，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北亚热带的北界南移至淮河干流以南，黄淮地区先民的稻作农业逐渐被粟作农业所取代，这一带才成为旱作农业的传统地区。①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舞阳贾湖》，从中可以看出，贾湖先民在8000多年前就具有了将野生稻逐渐驯化为栽培稻的能力，同时也说明：

第一，贾湖先民在那时就具有了农业育种和优化的初步科研意识和能力。我们知道，不管是农业种植的生产也好，还是农业科研的育种也好，必须要严格遵循大自然的节气规律，如果错过了节气，那么农业的种植将会一无所获，这是大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890～896页。

自然的法则与客观规律，谁也更改不了。

第二，说明那个时候贾湖先民已经总结出了历法，并掌握了节气系统的规律。因为音产生于律，律产生于历，历产生于农业，农业产生于人对食物的需求。而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来看，贾湖先民在那时已经掌握了音韵的系统规律（笔者在后面将会论述）。

另外，本节之所以挑选了大量出土的陶器与陶片，关键是要在人们使用食器的图案和绘纹中发现那时候人们的思想文化。

第三，虽然在新石器时代还没有诞生系统的文字，但人们已经具有的阴阳思想系统文化已经以艺术形式体现在那些生活必需品当中。

从组图 2－30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人阴阳学说的系统思想在陶器图案上的艺术表现力，甚至可与后世西方毕加索的艺术相媲美（详参本书外国篇总结）。



组图 2－30 具有阴阳思想图案的陶器

第四，通过以大汶口文化为首的诸多史前遗址出土的绘有原始八角形的符号（图 2－31）[①] 可以看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的广大地区，中国先民们就已经有了阴阳、八卦、九宫的文化系统概念，再加上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画的符号，说明中国远古的先民们已经有了日月、阴阳、文明的文化系统概念，并且都已经以艺术的形式体现在生活必需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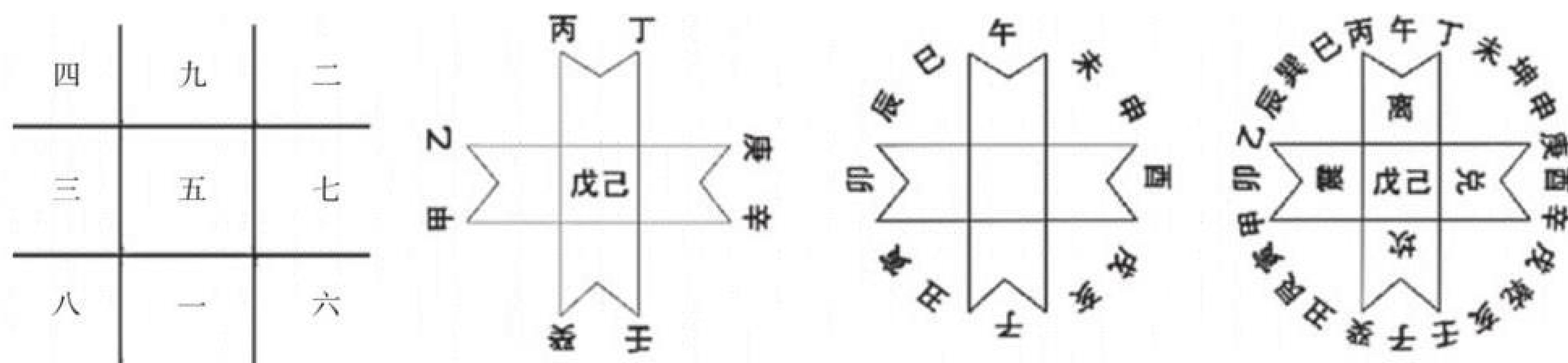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47 页。



组图 2－31　史前原始八卦八角形符号

1. 大溪文化（湖南安乡汤家岗出土）　2、8. 崧泽文化（上海青浦崧泽出土）　3. 薛家岗文化（江西靖安郑家坳出土）　4～6、11、12. 大汶口文化（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山东邹县野店出土）　7、9、10. 良渚文化（江苏吴县澄湖、江苏海安青墩出土）　13. 小河沿文化（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出土）　14. 马桥文化（上海马桥出土）

笔者通过研究认为，以上所有出土的刻符都与考古研究整理者认为的“纪事于记数”的观点是符合的。由于那时中国还没有诞生系统的文字，再加上神秘的易学绝不轻易外传的原因，所以组图 2－31 中的刻符无非就是在用于表达后来出现的那些“数”与“字”的意义（组图 2－32）。



组图 2－32　九宫八卦二十四山

虽然那时还没有诞生出系统的文字，但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里的“一”到“八”位的每一个“数”都可以是一个信息系统包或信息系统库。

如果我们把“纪事于记数”中的“数”与原始八卦的符号和九宫八卦二十四山（组图2－32）结合起来，就可以断定在没有诞生系统文字的时代，从“一”到“八”（即后来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位“数”被赋予了神圣的哲学之意，包罗了万象、万事、万物；甚至是从“一”到“九”、从“一”到“十”（即后来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从“一”到“十二”（即后来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从“一”到“二十四”这些数字，也都被赋予了神圣的哲学之意，包罗了万象、万事、万物，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数”在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里都可以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包或信息系统库。这与西方哲学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万物皆数”的观点是符合的。

| 第三章 |

住

第一节　贾湖文化遗址和大地湾文化遗址

一　贾湖文化遗址

在贾湖遗址的考古过程中，发现聚落已有一定的布局，环濠聚落的雏形已经出现；墓葬区、作坊区已逐渐从居住区中分离出来；出现数组居住遗址共存于同一聚落的现象。烘烤居住面和墙壁的建筑技术的出现，也为其他同时期遗址所罕见。依次扩建的多间房现象也不见于其他遗址，干阑［栏］式建筑遗址的发现，也是同类遗址中最早出现的。①

笔者认为，从贾湖遗址的考古过程中发掘出的大量石斧、石锛、石凿等木匠工具（图3－1）② 来看，人们居住在带榫卯的木结构干阑［栏］式建筑里，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图3－1　贾湖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锛、石凿

干阑［栏］式建筑的出现，说明贾湖人已经具有了联结、连接、搭接的阴阳概念，更严格地说，贾湖人在那时就已经具有了像河姆渡文化干阑［栏］式建筑中的卯［阴］榫［阳］连接技术。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卷，科学出版社，1999，第524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图版一五一。

在贾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给死人居住的一期的墓葬与居址有杂处现象，这表明氏族公共墓地尚未形成。同时，对死者埋葬位置不同，很可能表明此时人们对灵魂不死的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说，把死者埋于房前屋后，可能反映了人们认为死者死后的灵魂仍不会远去，与活着的人继续共同生活，而到二期之后，观念为之一变，氏族公共墓地的形成似乎表明，阴阳两界的系统观念已经出现了。

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对婴儿尸体的处理。贾湖人对夭折的婴儿也实行瓮棺葬，这与后继的仰韶时代文化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瓮棺底部有圆形穿孔，学界一般将这种现象认为是供儿童灵魂出入的孔道，以便婴儿灵魂早日再生。但也有人认为是一种惜子之情，不忍早夭小儿灵魂远离自己的亲人。不管是哪一种认识，均与人类的灵魂不死观念有关。①

笔者认为，人类的灵魂在阴阳两界交替往生的观念，正好表现出了中国易学系统文化理论中宇宙大自然中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一物一太极”的，都像天体、太阳、地球、动植物的生命在循环、旋转、轮回着运动变化一样，说明贾湖人在那时就已经具有了中国哲学中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系统理论知识。

二　大地湾文化遗址

陇原大地上大地湾遗址的考古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它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了甘肃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证明了甘肃先民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曾作出过不朽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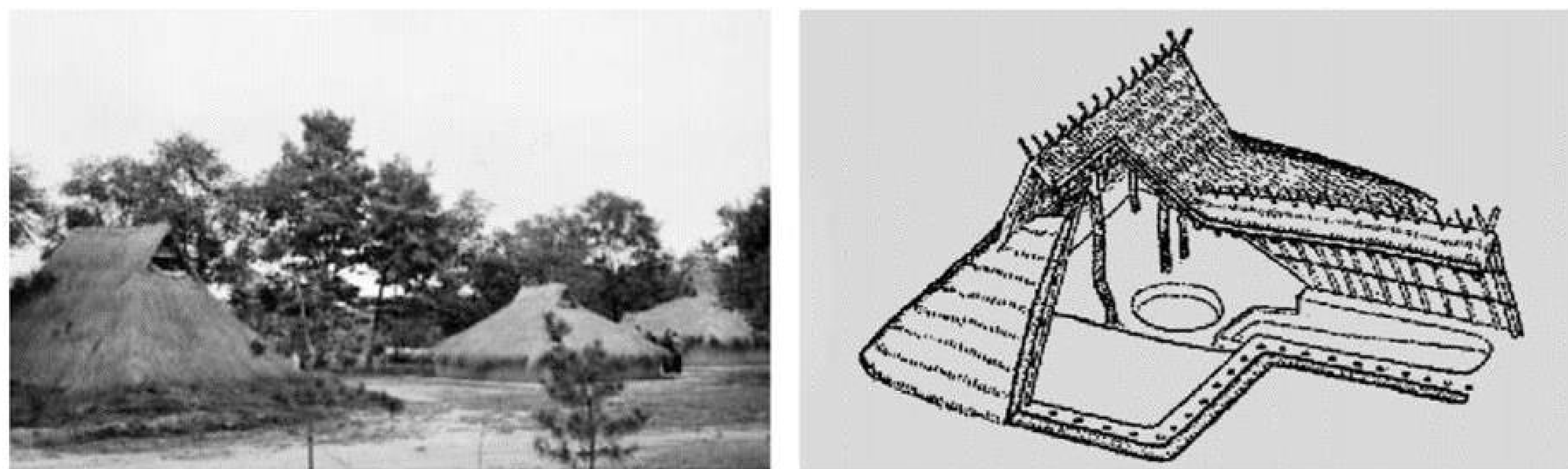
通过发掘，发现在第二期即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约6500～6000年的先民们就已经具有了较完整的原始氏族村落，可称为“陇原第一村”。

到第四期即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500～5000年，此时的聚落由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迅速扩展到整个遗址。山坡中轴线分布着数座大型的原始会堂式建筑，周围为密集的部落或氏族。其中的大型建筑420平方米，居住面为料浆和砂石混凝而成的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既有主室和侧室，又有后室和门前附属建筑，其保存之好、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工艺之精湛均为中国史前建筑所仅见（组图3－2）。②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第971页。

②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85～87页。



组图 3－2　大地湾遗址复原图

第二节　河姆渡文化遗址

带榫卯的木结构干栏长屋建筑遗迹在河姆渡遗迹第一期文化中保存最多，可谓鳞次栉比。这些建筑遗迹排列较有规律，在第一次挖掘时揭露十三排木桩，第二次挖掘时揭露十二排木桩和四个木构圆形栅栏圈。排桩由桩木、板桩和圆木组成。两次挖掘至少发现有六组（栋）以上建筑（图 3－3）。

这种建筑一般是下部打桩，形成架空的房基，桩上固定横梁，再铺以木板为居住面的干栏［阑］式建筑。在挖掘现场，有用于连接梁架的柱头榫，用以连接地栿或地板梁的柱脚榫、受拉杆件（联系梁）、带销钉口榫、燕尾榫、平身柱与梁枋交接榫卯、转角柱榫卯、直令栏杆榫卯眼、企口板、带凹槽构件以及刻花木构件等（组图 3－5）。[①]

在第二期文化层又发掘出了“井”字形，并带有榫卯木结构的古井（图 3－4）。[②]



图 3－3　木构圆形栅栏圈建筑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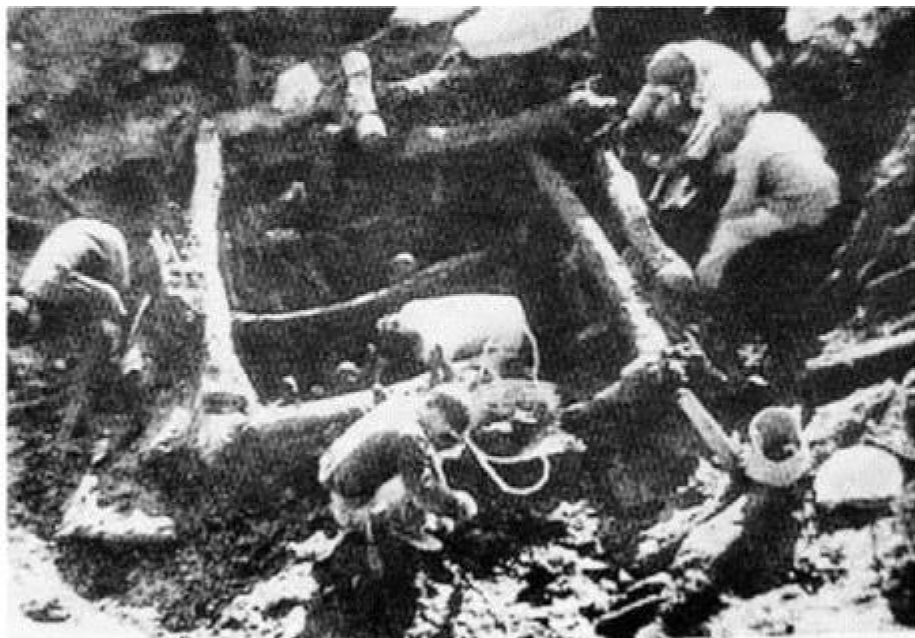


图 3－4　榫卯木结构的古井

①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第 19～23 页。

②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第 83 页。

2004 年 5 月至 8 月，在宁波市江北区以北 27 公里的慈城镇八字村傅家山，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挖掘出了宁波市区范围内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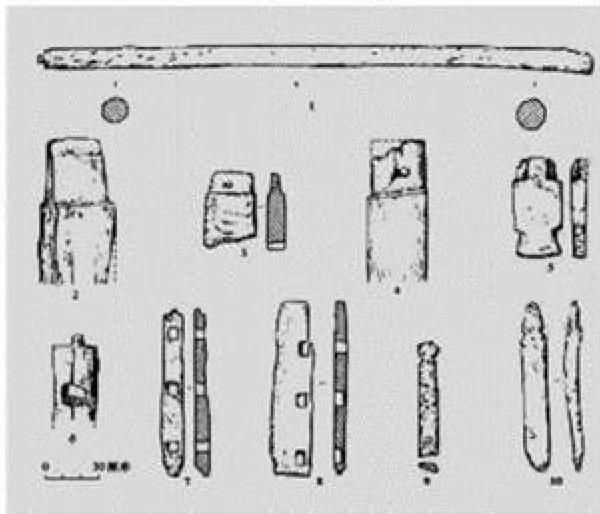
河姆渡遗址早就证明，我们的先民不仅有着勤劳的双手，还有着丰富的智慧，而傅家山原始村落遗迹不但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还发现了比河姆渡文化遗址更高超的建筑技艺。

发掘出来的村落遗址长 30 余米，宽 16 余米，有规律地分布着 7 ~ 8 排木桩，四散残留着桩木、木板以及带有榫和卯孔的构件。让我们惊喜的是，傅家山原始村落中存在着两种建筑类型。

一种与此前发掘的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干栏式建筑相同，由桩木和横木结合构成地基，横木由去枝后的树干充当，类似于现代的地龙骨，然后在两侧打下支撑板或板桩，将横木夹住不得移动，然后再在地基上筑起架空的长条形干栏式建筑。还有一种是柱坑式建筑基址，此类建筑先挖柱坑，在坑底垫有一块或多块木板，再在上面立柱，立柱都进行过加工，柱径较大，横截面近长方形，以四柱构成一间。

专家认为，这两种建筑都是在较潮湿的低洼地区特有的，说明先民们为了适应史前宁波地区的气候环境，运用丰富的智慧创造出了特有的建筑文化。





组图 3 – 5　带榫卯的木结构建筑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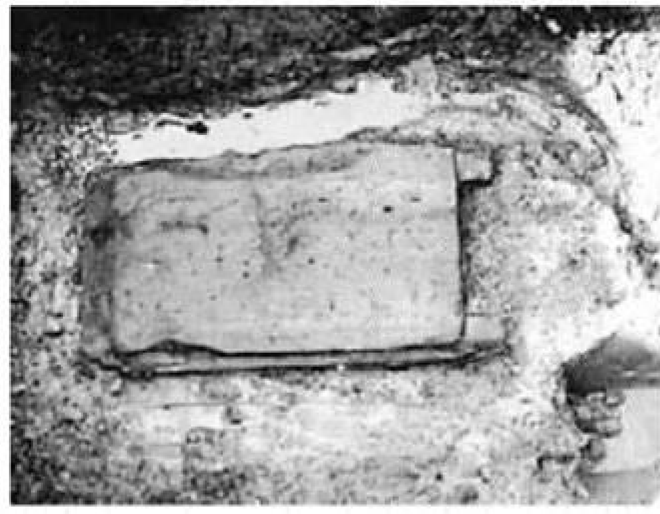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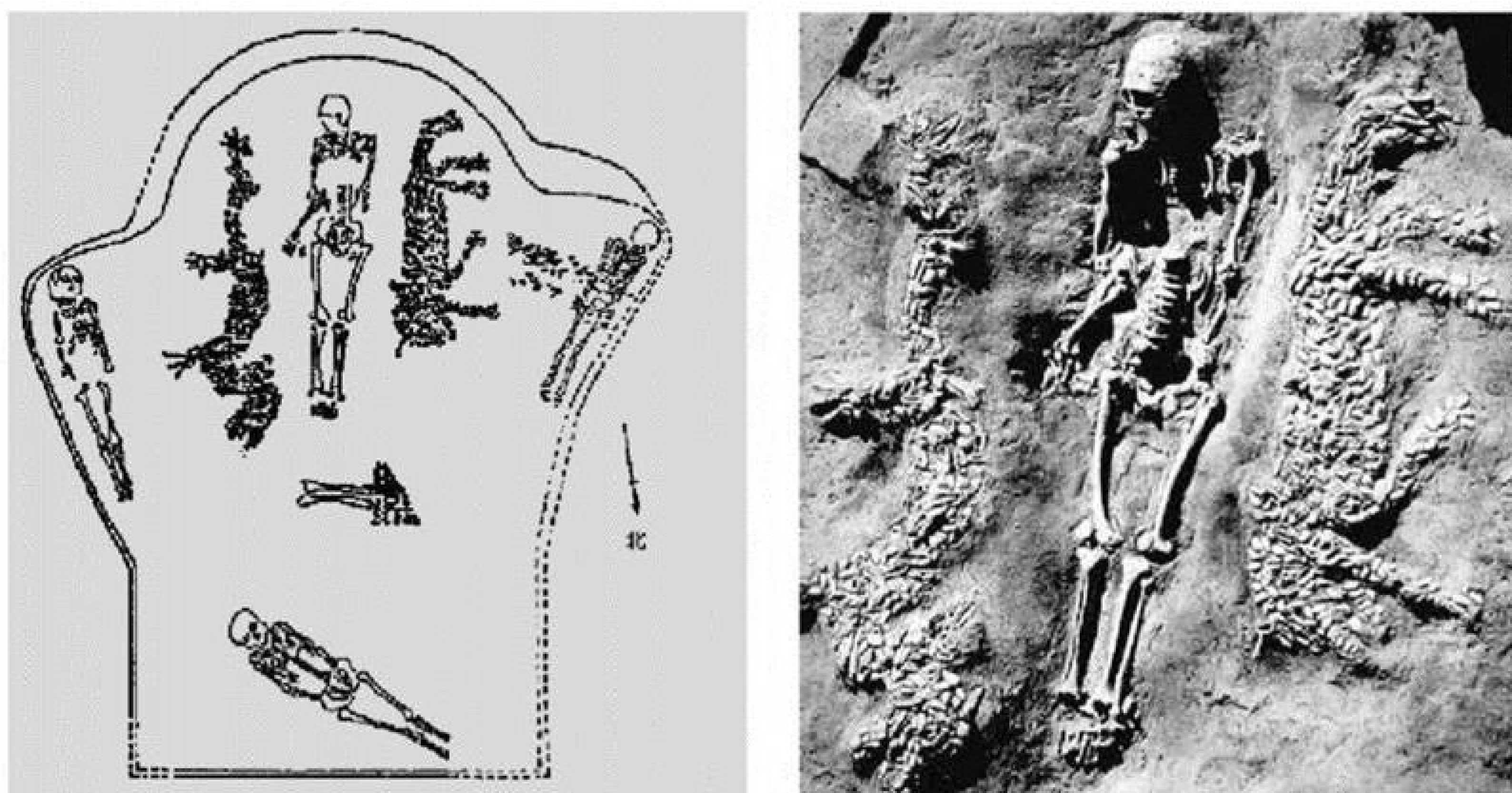
图 3 – 6　傅家山遗址出土的双榫凹槽板

不过，最令考古队激动的是，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些带榫卯的建筑构件（组图 3 – 5），特别是三块双榫槽板，板的一端两侧有两个方榫，另一端齐平，两侧凿出圆弧形凹槽（图 3 – 6）。这种构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是首次出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邬向东认为，这说明 7000 年前还存在着比干栏式更先进的建筑工艺。

说明那时在河姆渡地区，人们已经有了阴［卯口］阳［榫头］的文化概念，并且已经实践应用在了建筑艺术当中。

第三节　西水坡文化遗址

1987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濮阳市文管会、博物馆、文物队对濮阳西水坡遗址进行了挖掘，出土的遗迹有房基、窖穴和墓葬。其中在 M［墓］45 发掘出了一具尸骨旁用蚌壳摆有龙虎图案形制的墓葬（组图 3－7）。



组图 3－7　M［墓］45 平面图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测定，置于 M45 内的蚌塑龙年代距今 6460±135 年，属仰韶文化时期。由于蚌塑龙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象最逼真、龙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龙形象，因此被考古专家称为“中华第一龙”。[①]

我们发现，给死人居住的墓也遵循了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运动法则与客观规律。墓主人头南脚北，东方摆置着蚌塑龙，西方摆置着蚌塑虎，正符合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青龙属东方［生、升］、白虎属西方［杀、死］的概念。



图 3－8　蚌塑龙与虎

在 45 号墓最南端也发掘出了第三组蚌塑遗址，蚌塑出了龙与虎的形象（图 3－8）[②]，这组龙虎相背、运动左旋的形态，也表现出

① 张满飏主编《伏羲时代的社会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 29 页。

② 张满飏主编《伏羲时代的社会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 85 页。

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天体、东西、春秋在旋转、轮回、运动、变化的概念与状态。

从西水坡文化遗址出土的这两组蚌塑龙虎可以看出，在仰韶文化那个时期居住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就已经有了历法知识，而且他们使用的历法还是一年十二月历，因为只有一年十二月历才能将一年划为四季，才能有东西和春秋与青龙白虎对应，而十月历是将一年划成了五季，五季就没法把东西和春秋与青龙白虎对应起来。

另外，在176号坑的组塑中，除龙、虎之外，还有凤、鹿、龟、蜘蛛、石斧等。[①] 笔者认为，这正好又与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五行对应了起来。

凤：同风，对应春、东、东南和震［辰］、巽［筭］，属木；
蜘蛛：同罗、网罟、光线，对应夏、南和离［罗］，属火；
鹿：同牛羊类，对应四季月、中［土］，属土；
石斧：同肃杀、权力，对应秋、西、西北和兑［夺］、乾［键］，属金；
龟：同鱼鳖类，对应冬、北和坎［习赣］，属水。

第四节　牛河梁文化遗址

牛河梁文化遗址[②]属于红山文化晚期遗存，是距今约5000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遗址处在中国辽宁省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的像一条蜿蜒蟠龙一样的努鲁尔虎山山间谷地中间（图3－9）[③]，因其山下的牤牛河而得名。

此地本属地形起伏多变的区域，但遗址群所处的地段却相对开阔，便于对众多的墓地及祭祀址进行统筹安排。但令人惊奇的是，站在山台和女神庙所在的梁顶，顺着台和庙的山势走向向南远眺，在群山之中首映眼帘的是一座山形酷似猪首（或龙首、熊首）的山峰，山峰正面与女神庙和山台南北遥相对应。这恐怕并不是巧合，而是运用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特意选择和精心设计的结果。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丧葬文化中，历来讲究墓地“风水”的选址，尤其重视墓

---

① 张满飚主编《伏羲时代的社会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0页。
②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122页。
③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第10页。

地所处地势的走向与朝向，直到近代都是如此。5000 年前人们在牛河梁建庙筑台、设计墓域走向时，很可能已考虑到与此“神山”的相互呼应。甚至整个遗址群的轴线，都有可能是朝向此山而设。这并非神话。种种迹象显示，牛河梁遗址群选址之刻意、规划之严密、规模之宏大、内涵之复杂已远非普通墓地所可比拟。①

按照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先生的看法，将神庙、庙北方台与圆台连为一线，便构成了牛河梁遗址群的一个大致轴线。以此轴线再看积石冢地点的分布，就会注意到这种现象：女神庙与庙北方台的东西两侧各有两处积石冢，它们依轴线而左右对称（图 3－10）。梁下圆台的东西两侧也各有一处积石冢，两者不仅对称，甚至距圆台等距。其余 7 处积石冢则顺坡势走向依次设置于女神庙（组图 3－11）与圆台之间。调查发现，在这片墓地群与相关祭祀址所在的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已不见任何居住遗址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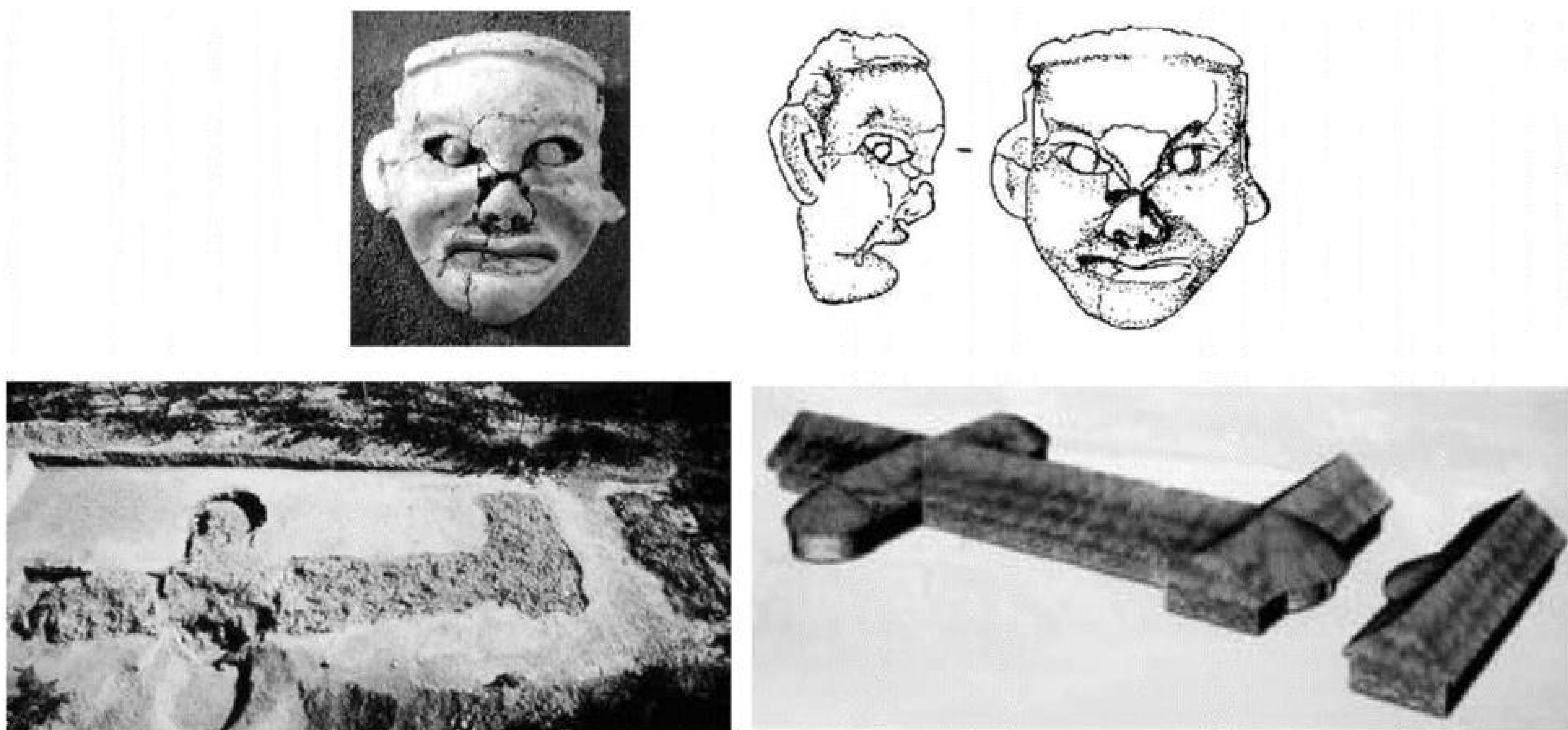


图 3－9　赤峰红山后地势及遗址分布示意图


图 3－10　牛河梁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

从女神庙与庙北方台的东西两侧积石冢依轴线左右对称布局上来看，就像北京故宫与十三陵在一个轴线上一样。另外，除牛河梁遗址群外在的坛、庙、冢之外，从众多墓中陆续出土了许许多多表达太极、龙文化的随葬玉器，并且这些玉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122 页。



组图 3－11 牛河梁女神头像及女神庙遗址和复原图

器还都与萨满教有关。

虽然在牛河梁这片墓地群与相关祭祀址所在的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见任何居住遗址，但笔者认为，居住在红山地区距离现今 5000 年前的中国古人，在那时就已经有了易学文化体系中形象和逻辑思维以及建筑风水的观念、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

小结

第一，从河姆渡遗迹的建筑文化来看，距今 6960±100 年的河姆渡人就有了阴［卯口］阳［榫头］的文化概念，并且已经成功地应用在了建筑艺术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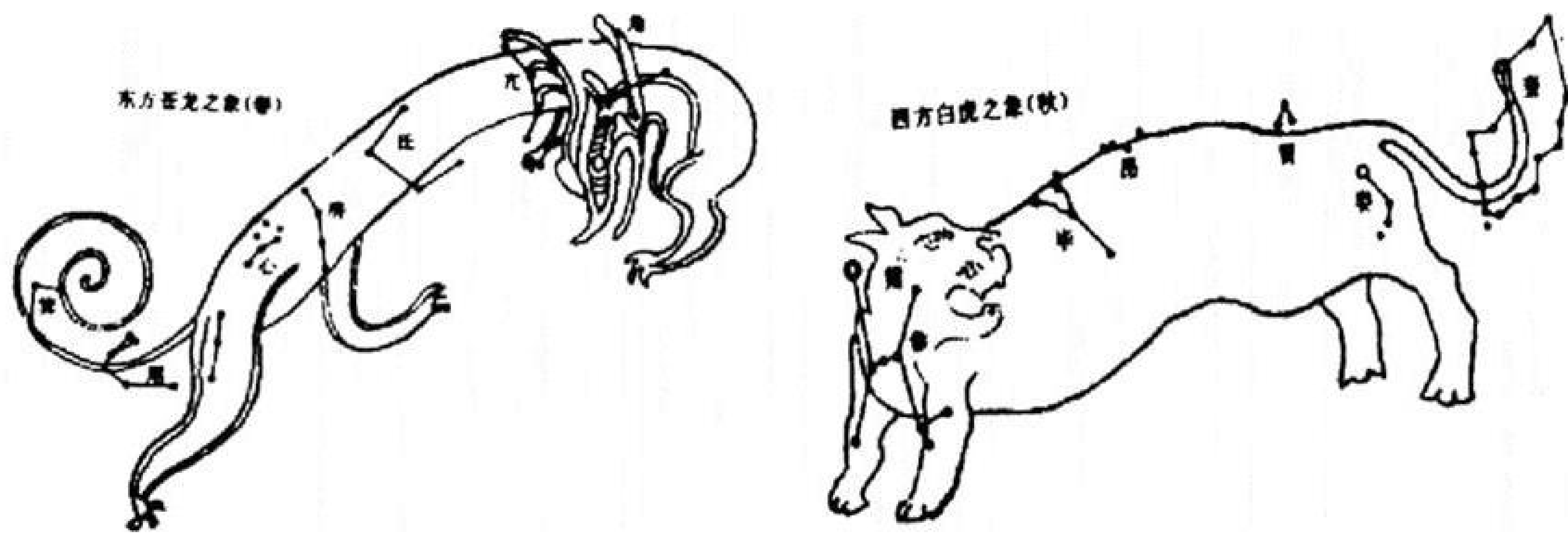
考古发现，舞阳贾湖的先民在 8000 多年前就具有了将野生稻逐渐驯化为栽培稻的能力，说明贾湖先民在那时就能严格遵循大自然的节气规律，进行农业的优化育种了。同时也说明，贾湖先民那时就已经总结出了历法，并掌握了节气的系统规律。

中原大地上，舞阳与濮阳的直线距离不过 200 多公里，又都是农业生产之地，那么这种历法中的节气知识，濮阳的西水坡人肯定也是知道的。

在中国的易学文化体系中，本身就包括天学（或天象学）和历法知识。

青龙对应“四象”中的春天，也对应在春天仲春之气（春分）的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会出现天体黄道上的“龙星”，所谓“龙星”就是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的东方青龙，是古人的形象思维将几组星宿进行了拟人化的组合，表示万物在春天皆开始了生命的希望。

白虎对应“四象”中的秋天，也对应在秋天仲秋之气（秋分）的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会出现天体黄道上的“虎星”，所谓“虎星”就是由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组成的西方白虎，是古人的形象思维将几组星宿进行了拟人化的组合，表示万物在秋天皆开始了萧条与死亡（组图 3－12）。[1]



组图 3－12　东方七宿青龙图和西方七宿白虎图

如果我们站在 45 号墓的北边，面对墓主人躺着的平面，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左前方（墓主人的东方）摆出了青龙的图案，而且死者左边的殉葬者面朝上（代表出生）。在我们的右前方（墓主人的西方）摆出了白虎的图案，而且死者右边的殉葬者面朝下（代表死亡）。在我们的前方（墓主人的北方）也摆着一具殉葬者，面部朝上，头部朝向东南方（代表投胎、孕育）。

最关键的是，在墓坑的中心［核心］，用蚌壳摆出了一个极形似于符合勾股定理的三角形“矩”，还有由两根腿骨组成的极类似于圆规的“规”。

这样，整个墓坑中的形制，就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个圆的生生死死的轮回图。这一切都是后人为死者所制作的，是活着的人们寄予墓主人再次投生的希望。

这既符合中国易学中周而复始地运动变化之意，也符合中国殡葬风俗中活着的人对死者所寄予的希望，还符合大自然运动变化的核心“规矩”。

第二，从西水坡墓葬形式来看，那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天象与一年十二个月的历法，并且已经成功地应用在了民俗殡葬的文化当中了。

第三，从 176 号坑的凤、鹿、龟、蜘蛛、石斧组塑，可以看出那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中国哲学中易学思想文化体系里的五行概念。虽然那时还没有文字，但已经用可以归类的动物表现了出来，并且已经成功地应用在了民俗殡葬的文化中了。

第四，在第三组蚌塑遗址中，从蚌塑的龙与虎的形象来看，这组龙虎相背、

① 常秉义：《周易与历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第 193、194 页。

运动左旋的形态，也表现出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天体、东西、春秋在旋转、轮回、运动、变化的观念。

第五，从牛河梁遗址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来看，可以看出，在红山地区，距今5000年前的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以及建筑风水的观念、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

以上考古发现说明，那时的人们所掌握的易学思想文化中的系统知识，就是从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并且已经成功地应用到建筑、祭祀和殡葬的文化中。

| 第四章 |

行

本章所讲的行，并不是指“出行”，而是指“行为”。本章即通过已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探索分析出太古或远古古人的行为和思想，甚至他们的文化与文明。

第一节　贾湖文化[①]

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的贾湖文化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7000 ~ 前 5800 年），有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1986 年 5 月到 1987 年，考古工作者在贾湖遗址 M78、M73、M121、M253、M263、M233、M270、M282、M344、M441 墓葬中，发掘出了许多两头洞通、开有一系列侧孔、呈土黄色的骨管。

经鉴定，骨管是用鹤类飞禽翅膀上的尺骨截去两端骨关节后，再钻孔而成。这些骨管的形制比较一致，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呢？由于形制与笛子十分相像，发掘者首先想到，会不会就是笛子呢？

骨管的构造与今天的笛子很相像，但它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骨管两端开口，没有吹孔。这样的骨管能否吹奏呢？

发掘工作结束不久，考古工作者携带从 M282 出土的 20 号 7 孔骨管到北京，并请音乐家鉴定，请笛子演奏家演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室主任萧兴华首先肯定它就是古笛，中央民族乐团的笛子演奏家宁保生用斜吹的方法进行了演奏，从而得知这支骨管的大致音程关系。

---

①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 992 ~ 1012 页。

专家指出，尽管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没有吹孔，但它却仍属于吹奏乐器。至今在河南民权县白云寺还将竹筹当作法事乐器进行吹奏，而舞阳贾湖出土的这些骨笛就恰恰是筹的前身。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与筹和塔吉克族的鹰骨笛、哈萨克族的斯布斯额，都是用一端作为吹口，只是吹奏时要将乐器（骨笛、筹）斜持，使吹口与嘴唇形成45度的倾斜角，利用声波的震荡使乐管的边棱发音。筹的演奏兼具萧之哀婉、笛之悠扬，给人一种荡涤尘埃、飘然出世的感觉，因此它多用作法事活动。由于筹与新石器时代的舞阳贾湖骨笛是一脉相传的，所以筹乐也就被称作音乐的活化石。

第一次测音工作是在1987年11月3日，萧兴华约请了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研究员，武汉音乐学院院长童忠良教授及徐桃英、顾伯宝工程师一行五人，由萧兴华、徐桃英吹奏，顾伯宝操作仪器，黄翔鹏和童忠良监测，用闪光频谱测音仪对20号7孔骨笛进行了测音。经测音后，大家慎重地认定舞阳贾湖骨笛是我国最早的乐器之一，已具备了音节形态，并初步认定对贾湖骨笛的深入研究可能会揭开我国远古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些奥秘。

第二次测音是在1992年6月，萧兴华与顾伯宝工程师第二次赴郑州，对发掘出的其中5支骨笛进行修复和测音，发现舞阳贾湖骨笛可以吹奏出四声、五声、六声和完整的七声音阶。根据这个测音结果，对产生不同年代的骨笛进行了综合分析与研究，发现了不同时期制作的骨笛在音阶形态上的发展与变化，初步说明远在七八千年前，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已奠定了中国民族音乐文明的基础，并认定河南舞阳贾湖骨笛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音乐考古的最大发现之一。

根据地层关系和^{14}C测定年代，贾湖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骨笛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与贾湖文化的分期基本一致。

一　遗址早期（公元前7000～前6600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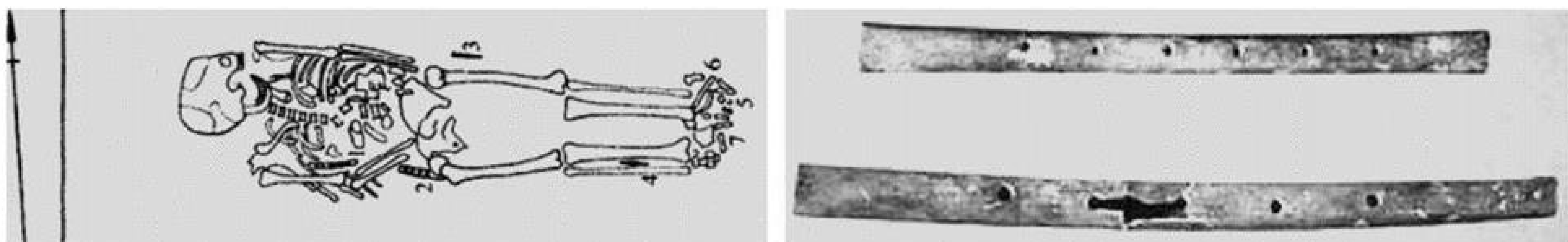
其中，341号墓的2支骨管（1号、2号），已有轻度石化迹象（组图4－1）。[①] 根据考古学常识，凡有石化痕迹的骨器，正是漫长历史年代作用的结果，年代至少有10000年。因此，它们的年代没有问题。

341号墓中的1号、2号古笛开孔数目、形制和奏出的音阶很不一样。

1号骨笛（五孔），发音的自然音序为：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图版二〇和彩版三九。



组图 4－1　341 号墓 1 号、2 号骨笛出土位置示意图及 341 号墓的 2 支骨管

1 ＝$^{\#}$D　　　　3　5　6　$\dot{1}$　$\dot{3}$　$\dot{6}$

音阶变化为：　　1　3　5　6　$\dot{1}$　（主音：$^{\#}$D6）

1 号骨笛所发出的四声音阶属于音阶的早期形态，它的形成至少有 9000 年，甚至是 10000 年以上的历史（骨管已有轻度石化迹象），就自然音序而言，用 3、5、6、$\dot{1}$ 四个音为主干音，有时也可以构成一些完美的曲调。

现在流行在河南舞阳、叶县、驻马店地区的民歌中，就有很多用这四个音（或者它的变体）构成的音调，如《一人一马一杆枪》就是例证。

一人一马一杆枪

（驻马店地区）

3　3 5 | 6　6· | 6·　5 | 6　— | 5 3　5 6 |

（领）一　人　一　马　（齐）嗨　哟　（领）一　杆

$\dot{1}$　$\dot{1}$ | 5　5 6 | $\dot{1}$　$\dot{1}$ ‖

枪　啊　（齐）嗨　嗨　嗨　哟

我们从 M341 中的 1 号古笛（五孔）1　3　5　6　$\dot{1}$ 的发音自然音序上可以排出它的音分值如下：

	1	3	5	6	$\dot{1}$
	宫	角	徵	羽	宫
音分值	0	400	700	900	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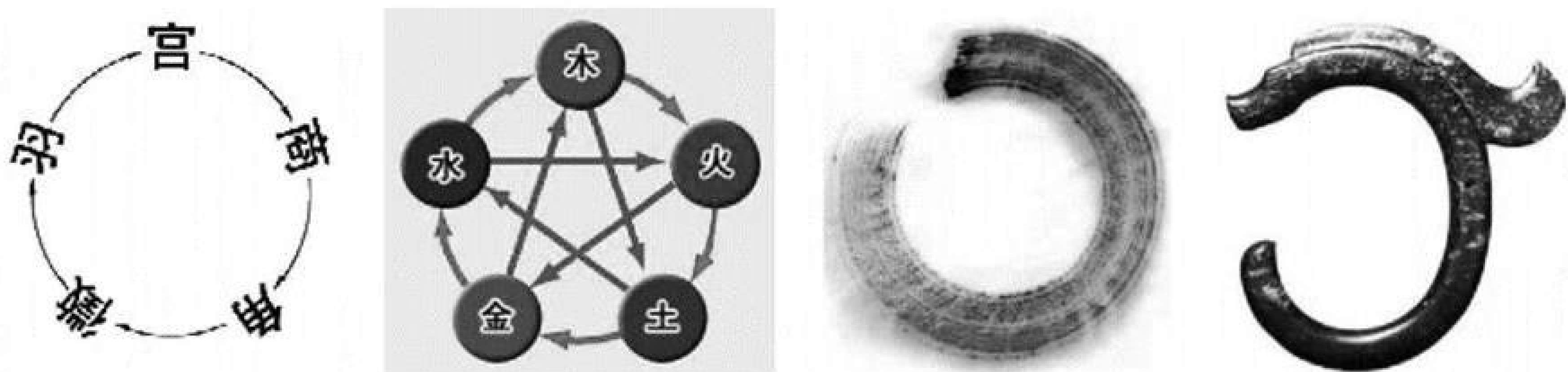
从累积的音分值上，我们就可以看出，1 号五孔骨笛从 1 到 $\dot{1}$ 刚好是 1200 音分，如果我们把 100 音分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音韵学的这个太极单元中，十二律就产生了。

2 号骨笛（六孔），发音的自然音序为：

1 ＝#A　　　　1　2　3　5　6　$\dot{1}$　$\dot{3}$

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　（主音：#D6）

341 号墓 2 号骨笛的音阶变化为 1、2、3、5、6、$\dot{1}$。可以看出从 1 到 $\dot{1}$，实际就是完成了一个“宫—商—角—徵—羽—宫”的完整的循环、旋转、轮回、升级系统（组图 4－2）。



组图 4－2

2 号古笛开有六孔，从骨笛的音序上可吹奏出完整的五声音阶，即 1 2 3 5 6 $\dot{1}$ $\dot{3}$ 的音序，从这个自然音序来看，它显然是在五孔音笛的基础上改革发展而成，它保留了 1 号骨笛的 3 5 6 $\dot{1}$ 四声音阶的音型，派生出了 1、2、3、5 四个音组成的新的四声音型，使音乐的表述能力大大拓宽，在河南上蔡县（距舞阳约 70 公里），至今还有像《五姊妹梳头》那样只使用 1、2、3、5 四个音的民歌。

五姊妹梳头(号子)

1＝C $\frac{2}{4}$　　　　(上蔡县)

$\dot{1}$ $\dot{2}$ $\dot{1}$ $\dot{2}$ | $\dot{5}$ $\dot{3}$ | $\dot{2}$ $\dot{1}$ $\dot{2}$ $\dot{1}$ | $\dot{1}$ — | $\dot{5}$ $\dot{3}$ |
(领) 高 高 山　上　一　座　楼　(合) 夯

$\dot{2}$ $\dot{1}$ | X X | $\dot{3}$ $\dot{3}$ $\dot{3}$ | $\dot{3}$ $\dot{2}$ $\dot{1}$ | $\dot{1}$· $\dot{2}$ | $\dot{1}$ — |
着 (夯 落) (领) 姊妹 五　个　去 梳　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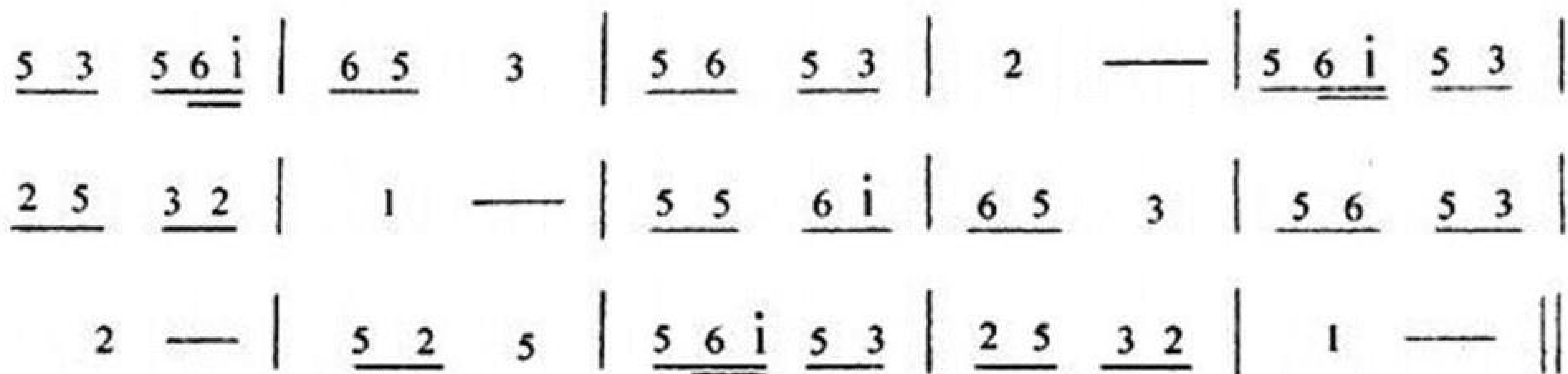
$\dot{5}$ $\dot{3}$ | $\dot{2}$ $\dot{1}$ | X X ‖
(合) 夯　着　(夯 落)

专家认为，1 号骨笛制作的年代里，以 1、3、5、6 四个音为主，吹奏的音只是构成小调调式的基础音，2 号骨笛制作的年代应该晚于 1 号骨笛，它增加了一个按指孔和一个音，使骨笛由四声音阶发展成为完整的五声音阶，既可以吹奏自然小调的音乐，也可以吹奏自然大调的乐曲。由于这两支骨笛无制作计算痕迹，

说明在那个时期是五度律的高度使用期。

贾湖初期的骨笛早于9000年之前就制作出来了，已经可以吹奏四声和五声音阶构成的音调，证明五声音阶在中原地区确实源远流长。9000年来，它的因子一直存在于当地的人民中。当地的《孙中山先生之歌》正是用1235和356i̇两种序列进行或反向进行的，我们也由此可以推出在八九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唱歌和乐器演奏之间存在着密切、相互影响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之歌 (许昌县)



我们从341号墓中的2号古笛（六孔）1、2、3、5、6的发音自然音序上可以排出它的音分值如下：

	1	2	3	5	6
	宫	商	角	徵	羽
音分值	0	200	400	700	900

从累积的音分值上我们就可以看出，2号六孔骨笛从1到6刚好是900音分，如果我们把100音分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音韵学的这个太极单元中，就出现了一个9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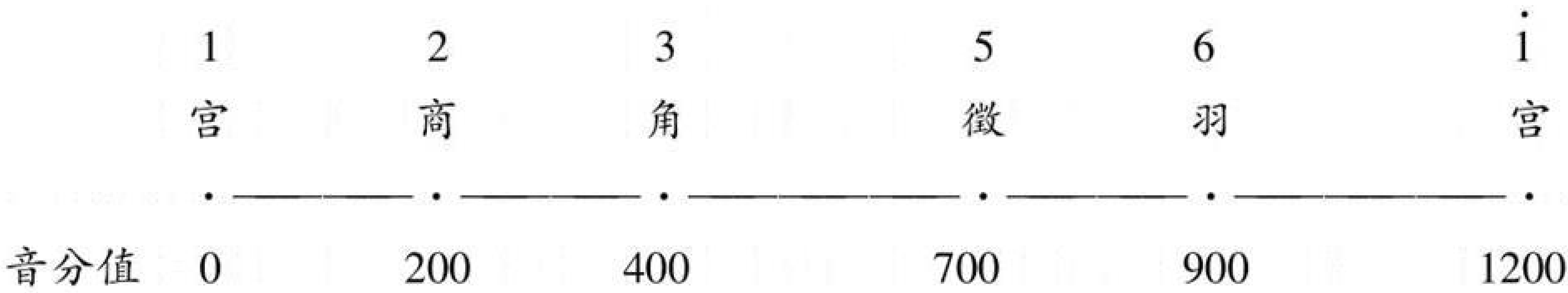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先天八卦中只有8个数，9除8会余1，1为键［乾、天、龙、圆、○］。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后天八卦中有9个数，9为最大的阳数。在后天八卦中，9既为罗［离、丽、太阳、文明、文化、火、飞禽］，也处在上位［天位、天、龙、圆、○］。

如此，在中国文明中被后人称之为“天籁”的五音——“宫、商、角、徵、羽”系统就这样诞生了。这又与后人在《诗经·鹤鸣》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的描述不谋而合。

如果我们再把341号墓中2号古笛（六孔）的发音自然音序按1、2、3、5、6、

i̇ 重新排列，那么它的音分值又如下：



从累积的音分值上我们可以看出，2 号六孔骨笛从 1 到 i̇ 刚好是 1200 音分，如果我们把 100 音分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音韵学的这个太极单元中，一个循环、轮回、螺旋上升的十二平均律系统就产生了，相应的在一年的历法这个太极单元中，十二个月就产生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中国智慧的古人认为，所有的太极单元都反映了共同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所以他们把周而复始的十二吕律、十二个月、十二个时辰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律吕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季节	仲冬	季冬	孟春	仲春	季春	孟夏	仲夏	季夏	孟秋	仲秋	季秋	孟冬
月份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在中国的贾湖时代有用于表达十二律吕、十二个月（十二个月中二十四节气的每个节和气都是与 50［一个太极、大衍之数］音分对应的）、十二个时辰的系统文字，但从贾湖骨笛的实际测音来看，这些观念、词汇却以“数”的形式，确实已经存在于那个时代了。所以笔者敢用这些中国最古老的易学系统中的概念、词汇来表达描述。

同时，这个十二平均律的系统概念非常重要，它既关系到天文学体系的建立（其中一项就是将一年的历法可分为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每个节和气都是 50［一个太极、大衍之数］音分），也关系到了星占学体系的建立。天文学与星占

学在文明开始的时候，是仰观天象得来的知识，它们本身就像密不可分的同一个自然体系。任何一个民族文明的开始产生，最先都离不开天文学和历法。

二　遗址中期（公元前6600～前6200年左右）

其中，282号墓出土2支骨管（20号、21号，图4－3）[①]，钻有7孔，能奏出六声和七声音阶，说明那时的贾湖先民就已经具备了音乐七声音阶的结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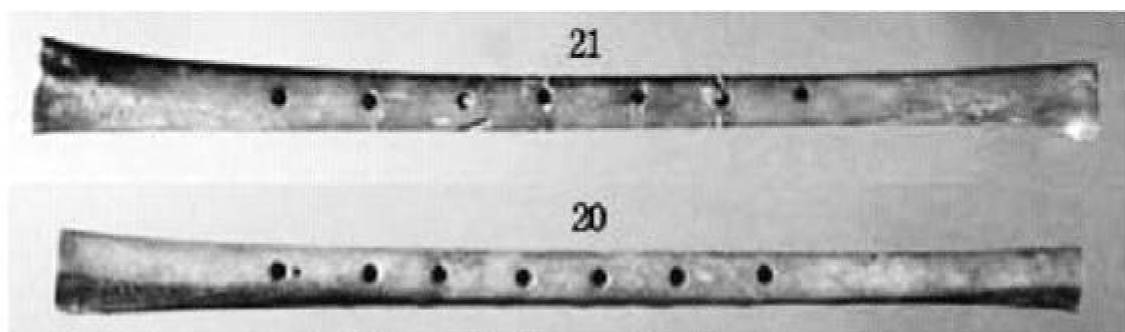


图4－3　282号墓出土2支骨管

20号骨笛（七孔），音阶变化为：1　2　3　5　6　♭7　1̇　（主音：D6）
自然音序为：#F5、A5、B5、C6、D6、E6、#F6、#A6

21号骨笛（七孔），音阶变化为：1　2　3　5　♭6　♭7　1̇　（主音：D6）。
自然音序为：#F5、A5、#A5、C6、D6、E6、#F6、A6

282号墓20号骨笛（七孔）就更能说明到了贾湖时代的中期，贾湖人在音韵上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应用十二平均律了，在历法上更是准确自如地应用每一年的十二个月了（参本篇第二章小结）。

三　遗址晚期（公元前6200～前5800年左右）

其中，253号墓出土2支骨管（4号、9号，图4－4）[②]，分别钻有八孔、九孔，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阶以外的一些变化音。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四〇。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三九。

4 号八孔骨笛，音阶变化为：

1 2 3 4 5 6 7 $\dot{1}$（主音：$^{\#}$A5），1 2 3 $^{\#}$4 5 6 7 $\dot{1}$（主音：$^{\#}$D6），1 2 ^{b}3 4 5 6 ^{b}7 $\dot{1}$（主音：C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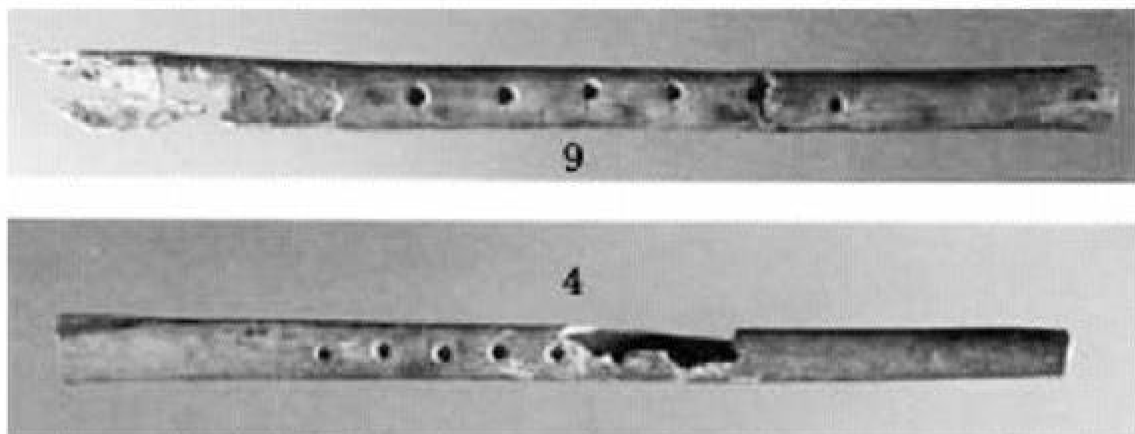


图 4－4　253 号墓出土 2 支骨管

253 号墓的 4 号骨笛管开八孔，比中期的 282 号墓出土的 2 支骨笛多开一孔，音律上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测音数据，若以$^{\#}$D6 为主音，可以排列出如下七声音阶：$^{\#}$F5、A5、$^{\#}$A5、C6、$^{\#}$C6、D6、$^{\#}$D6、F6、G6。

贾湖骨笛长度都在 17.3～24.6 厘米，直径在 0.9～1.72 厘米，其制作材料系用鹤翅上的尺骨制作而成，制作规范，形制固定。

贾湖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骨笛发音准确，音质也较好，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完整的现代乐曲，这样就把人类的音乐史向前推进了 3000 年。

随着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说明贾湖先人在距今 10000～9000 年前，就已经掌握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音韵学里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系统概念，并且成功地应用到乐器的制作和演奏中。

此外，人类学家在选取了贾湖人颅骨宽度、鼻翼宽度、上齿槽弓特征和牙齿大小这四个基本指标进行了测量后，结果表明，贾湖人的每一项指标都与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特征相吻合，从用贾湖颅骨复原出的贾湖人相貌上来看，贾湖人与同时期长江以南地区和长江以北地区的人种有明显区别，更接近于中原人（图 4－5）。

另外，在他们的一些随葬品中，还发现有大量完整成组的龟甲卜筮工具（图 4－6）①，龟甲的腹腔中藏有颜色不同（阴阳）、数量不等的石子。甚至在 341 号和 282 号还摆放着龟甲，也表明贾湖原始先民不但崇尚中国哲学中易学八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四三。

卦的智慧，而且把易学体系当作了文明、文化的象征，具有了应用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相生相克的逻辑原理，进行卜筮算卦的行为能力，已经开始盛行算卦，这对中国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 4－5　贾湖颅骨复原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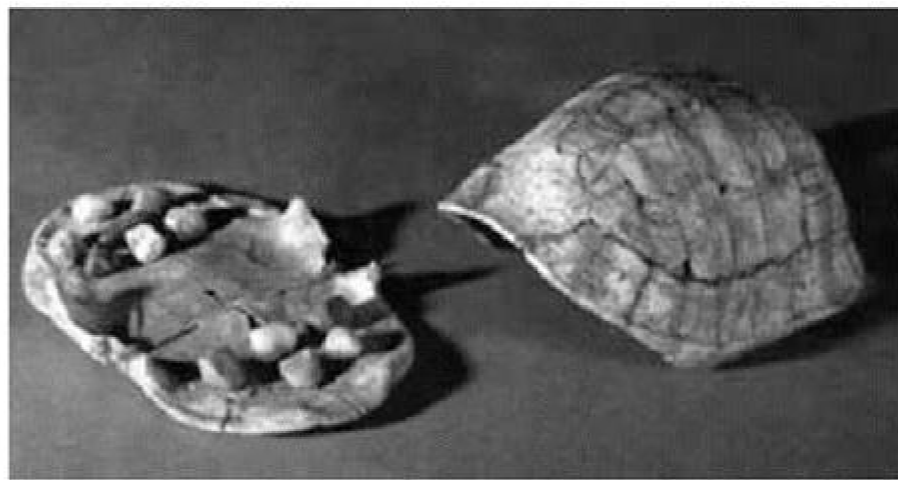


图 4－6　龟甲及内装石子用于卜筮

第二节　红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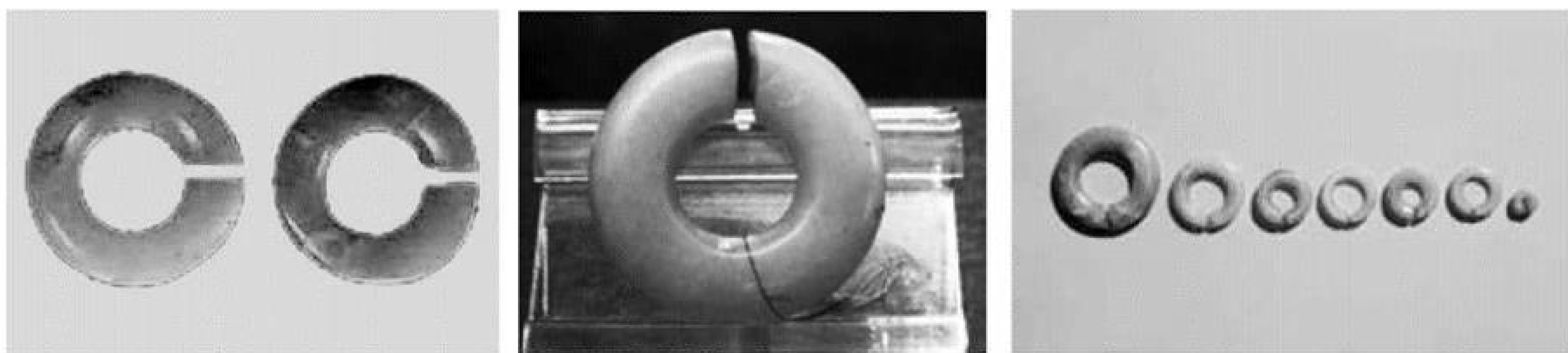
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在西辽河流域内蒙古地区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发现了兴隆洼先民聚落遗址（图 4－7），该遗址距今约 8000 年（公元前 6200～前 5400 年）左右，面积约 6 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久远、居住面积最大（最大房屋面积达 140 余平方米）、房屋排列最整齐有序的远古人类村落，它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较好、时代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聚落遗址，是中国建筑史上 8000 年前的奇迹，也是全国唯一对新石器中期先民住地经过全面揭露、布局清楚的一处聚落。该遗址是 20 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村”、“中华始祖聚落”，其中部分文物古迹堪称中国之最，被国务院 1996 年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4－7　兴隆洼遗址

一　玉玦

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近 10 次发掘。发现有聚落房址、环形壕沟、墓葬、灰坑等大量遗迹。其中，除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外，还发现了中国迄今年代最早的磨光玉器——玉玦和玉耳玦（组图 4－8），年代在距今约 8200～7500 年，将中国的玉文化历史一下提前了 3000 年，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首次发现。



组图 4－8　玉玦和玉耳玦

这些玉玦通体碧绿光滑，线条流畅，给人以圆润简约之感，向世人展示着世界最早的玉文化。可是古人为什么把这些原本磨制出来的一个好端端的、完美的环形，非得要豁开一个口呢？答案只有一个：古人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将龙的文化以图腾一样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表现出龙形的头与尾。而作为玉耳玦，当然也具有了便于佩戴的作用。

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崇尚玉文化的民族，常用晶莹剔透、冰洁高雅的玉石来制作自己崇拜的文化图腾，而从红山文化地区的墓葬中出土的玉龙一直延续到距今约 5000 年，说明中华民族在使用石器的新石器时代，就将石头中的上乘极品——玉石和无比尊崇的龙文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用晶莹剔透的物质——玉石来代表清澈浩瀚的天体和宇宙，用玉石雕磨成玉龙来当作可视、可触的外部图腾，来表现像龙一样的天体宇宙系统的圆形运动和变化，来表现龙的崇高与伟大，来表现龙的神秘与神圣，来表现中国龙文化体系的圣洁与博大精深。

这种玉玦形式的龙，虽然与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形玉龙和玉璧、玉环、玉镯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却是一致的。所以说，这种玉玦和 C 形玉龙、玉璧、玉环、玉镯一样，只不过都是中国龙文化体系的一种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

二　骨笛

1986 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还发现了一支骨笛（图 4－9），这支骨笛的主人是 40～45 岁男性。在房址出土的物品中，仅骨器就 74 件，除这支骨笛之外，一件人头盖骨牌饰也充分证明了骨笛主人的领袖地位。骨笛出土后，起初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大部分人认为它是骨哨（打猎用），一直存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库。后来，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赤峰学院院长席永杰教授提出，这支五孔骨哨可能是笛子，应当拿回来研究。经鉴定，这支骨笛是由东北地区一种常见的禽类动物“大鸨”的骨骼制成，长约 18 厘米，笛身一侧依然清晰可见不均匀排列的 5 个音孔，骨头里没有骨髓，而是呈蜂窝状，一端呈扁圆形用于吹奏，另一端呈喇叭状，可以起到扩音的作用，因此音色分外悠扬。

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技术手段对骨笛进行了精心的复原修补和试验。经赤峰市竹笛研究会会长杨国庆试吹，从这支在兴隆洼沉默了 8000 年的骨笛中，终于发出了一个完整的八度音阶，并且能够吹奏《牧歌》、《欢乐颂》等乐曲（图 4－10）。

杨国庆说：“从它的音阶关系来说，它有 7 个音级，与现在的 7 声调式轻音乐音节的结构是一样的。从这个骨笛上来看，可以说，在 8000 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了 5 声调式，懂得了 7 声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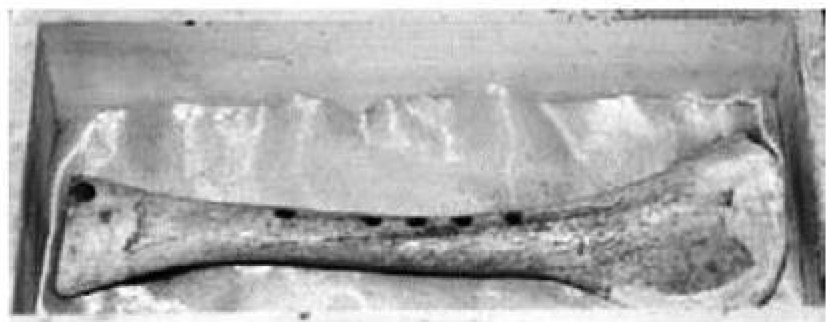


图 4－9　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骨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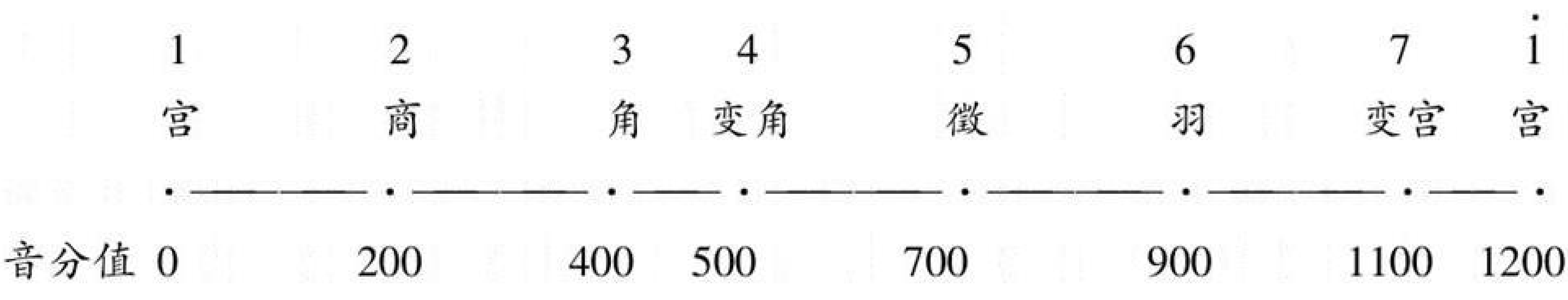
图 4－10　杨国庆现场吹奏乐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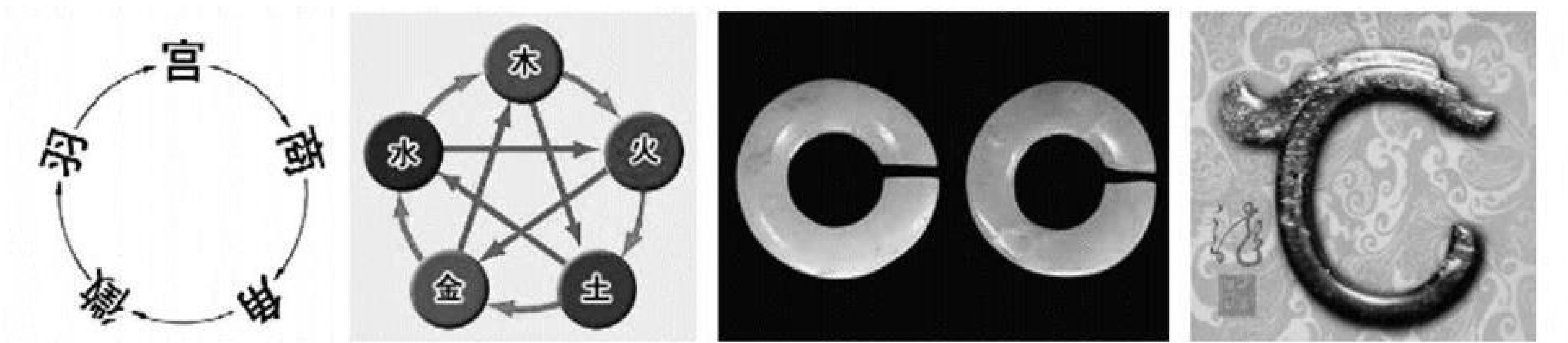
2009 年 4 月 13 日上午，在兴隆洼骨笛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一曲《国歌》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悠扬的曲子，使在场的考古学、历史学专家们和媒体记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太神奇！”“太震撼！”“太不可思议！”人们纷纷惊叹于 8000 年前的骨笛竟能演奏如此完整的乐曲。

席永杰教授认为，这支骨笛的成功演奏，表明早在约 8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认识了音乐性质，熟悉了音乐理论，掌握了乐器制作技巧。今天我们仍能奏响那时的骨笛，既让人激动，也使我们重新审视了古人类科技发展水平和古人类的社会形态和物质、精神生活，同时也为研究古代音律、音阶、音韵、校音等提出了新的乐器理论课题。兴隆洼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源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兴隆洼骨笛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介绍，经过科学复原和专业测试，8000 年前兴隆洼骨笛材质、音域和演奏指法的谜底已经揭开，这是目前发现的西辽河流域最早的、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这一研究成果表明，8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认识了音乐和掌握了制作乐器的技术，从而把中国的民族音乐和乐器史提前了 3000 年。同时也佐证了在 8000 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中，还有许多处于中华文化领先地位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这只骨笛的八度音阶进行一下排列，就会出现从 1、2、3、4、5、6、7 再到 $\dot{1}$ 的一个循环，这实际就是完成了一个“宫—商—角—徵—羽—宫”的完整的循环、旋转、轮回、升级系统（组图 4－11）。





组图 4－11　循环、旋转的龙形不同示意

从累积的音分值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支骨笛从 1 到 $\dot{1}$ 刚好是 1200 音分，如果我们把 100 音分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音韵学的这个太极单元中，就表现出了一个循环、轮回、螺旋上升的十二平均律系统，相应的在一年的历法这个太极单元中，就表现出了一年的十二个月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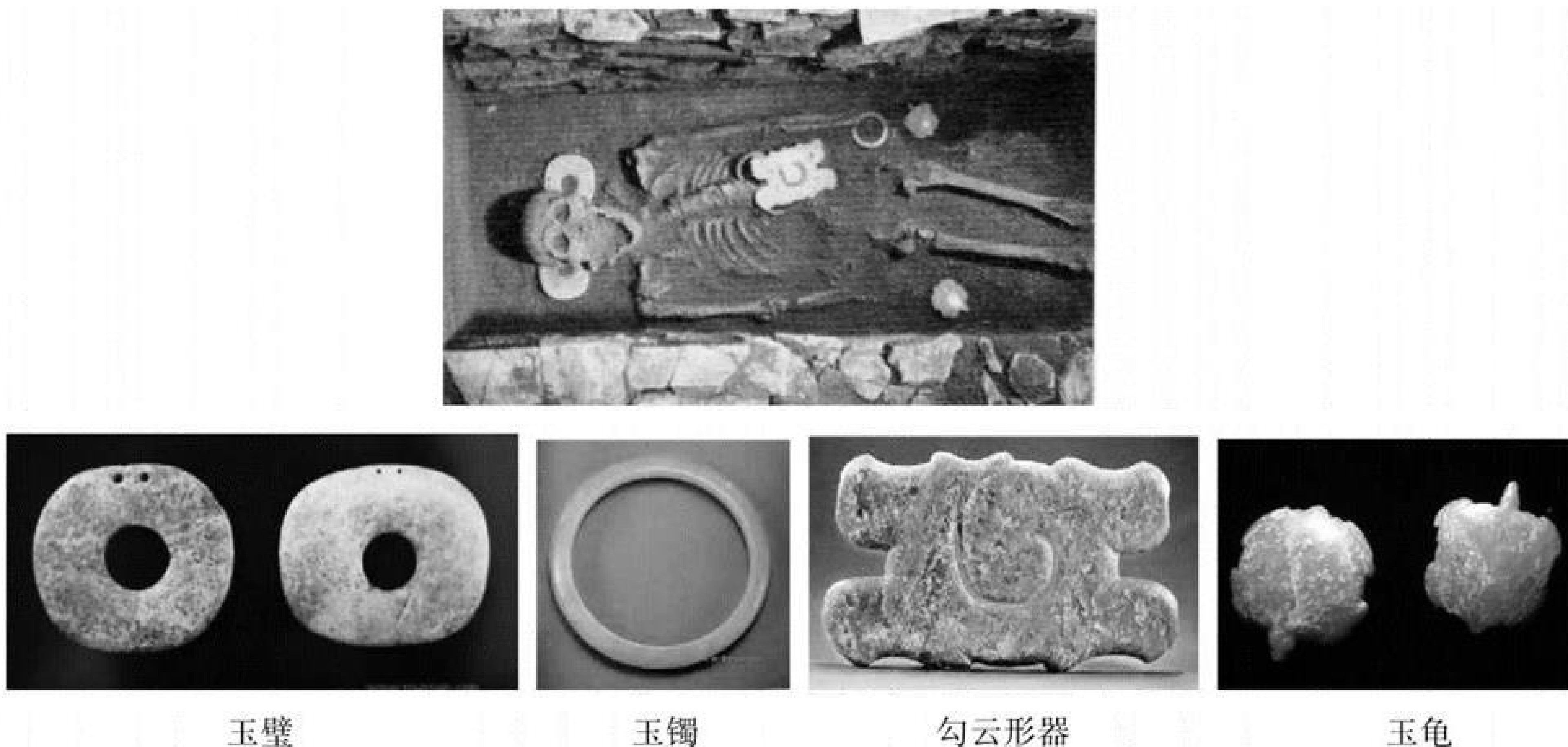
三　太极八卦、龙文化与萨满

在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4号墓，墓主人头枕箍形玉器，胸部放置了2件玉龙，随墓主人的尸骨一起出土（组图4－12）。[1]



组图4－12　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4号墓出土的尸骨及玉器

在牛河梁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墓主人头骨的两侧各置了一块圆盘形玉璧，胸部放置了一件勾云形器，手腕处戴着一个玉镯，双手处又各置了一个玉龟，随墓主人的尸骨一起出土（组图4－13）[2]，说明此墓主人也曾是这个地区的中心领袖或最高首领。



玉璧　玉镯　勾云形器　玉龟

组图4－13　牛河梁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出土的尸骨及玉器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3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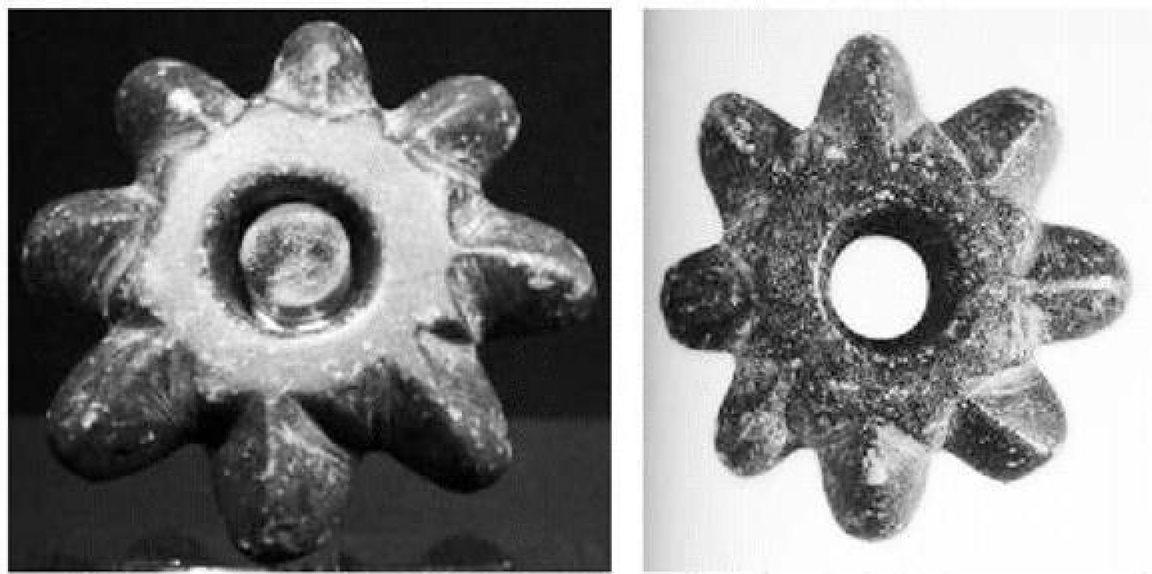
②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371页。

迄今为止，在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出土了大量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勾云形器（组图4－14），[1] 这些勾云形器都是极其形似一些如龟鳖一类卵生的拟物［或动物，或事物，或景物］化的抽象形体，尤其是其形既像海龟、玳瑁的四肢，又像是浪花或云朵。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这些勾云形器的中部，就会发现它们的中间都采用镂空的雕法，雕刻出了一个空［阴］实［阳］相衬、阴阳相间的太极漩涡旋转图案。



组图 4－14　红山文化时期的勾云形器

另外，在赤峰敖汉旗萨力巴乡七道湾子遗址出土了一件表现八卦的碧玉多头器（组图4－15），直径11厘米，厚3.2厘米，孔径2.5～3厘米，现藏于敖汉旗博物馆。



组图 4－15　七道湾子遗址出土的碧玉多头器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348页。

如果我们把勾云形器中间部位阴阳相间的太极旋转图案与宇宙星系的旋转状态图（组图4－16）进行一下比对，再把玉龙表现循环、轮回、旋转的运动变化状态结合在一起，并与表现八卦的玉器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肯定，早在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中国智慧的古人就已经能够熟练地应用易学太极八卦文化体系来表现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运动和变化了，并且将易学龙文化体系外在的图腾也更加拟物［动物、事物］化和形象化了。



组图4－16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古方在其论文《萨满教特点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一些启示》中提出，红山文化玉器与萨满教是有关联的。

我们知道，萨满教是一种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它的崇拜对象极为广泛，有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一些民族普遍信仰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常赋予火、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云雾、冰雪、彩虹、祖神、偶像和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将其视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各类神灵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各主其事，各行一方。而易学中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卦就分别代表着以上这些许许多多事与物、自然现象与自然的哲学、科学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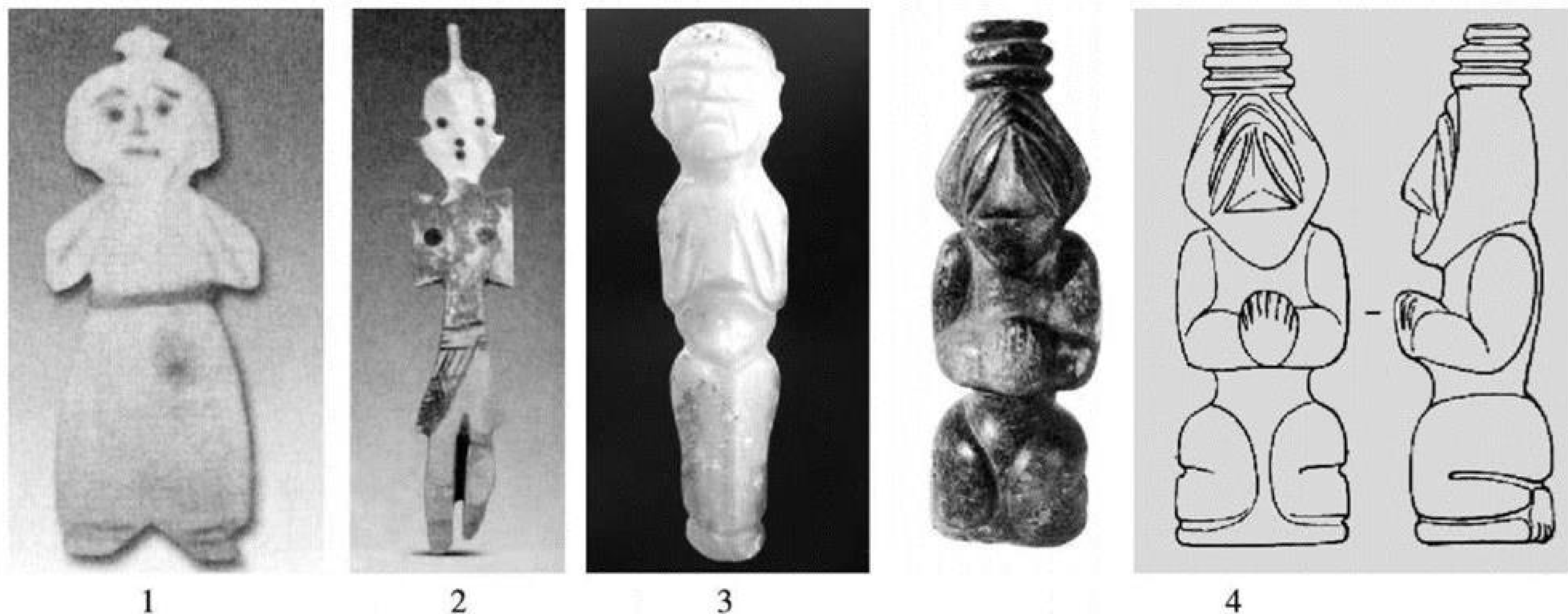
萨满教供奉的神灵偶像用石、骨、木刻削或草扎、兽皮毛编结（组图4－17）① 而成，也有彩绘在兽皮或纸上的，多类似人形。制作完成后须经祭祀方具有神圣的性质，这就是萨满教的偶像崇拜。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326页。

萨满教也具有三界的观念，他们认为宇宙分上、中、下三界，上层为天堂，为众神和最权威的神灵所居；中界是人和动植物所在；下界是阴间，而只有巫师萨满能通达上下两界，疏通三界之事。

萨满教会时常进行为婴儿找回灵魂、送魂、祈求猎物、求雨和止雨、咒术与法术、占卜、跳神的行为活动。就是在现代中国民间的民俗当中，也有占卜、祈求、法术和咒术这样的事情，所以笔者认为，这与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占卜和天地人合的思想非常相似。

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半砬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蚌饰和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人，以及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石人造型上来看，都非常明显地显现出了祈求、祈祷时的虔诚神态，特别是它们手臂的造型与现代鄂伦春族萨满神偶手臂的造型几乎是一致的（组图4－17）。



组图4－17

1. 鄂伦春族萨满神偶　2. 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蚌饰

3. 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人　4. 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石人

萨满教曾经流行于欧亚大陆，特别是以中国周边地区的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信仰者居多，“萨满”（Shaman）一词来自通古斯—满语，直译为“无所不知的人”。通过这个“无所不知的人”，我们就能非常明确地认定，萨满教曾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占卜预测是有着极深厚的渊源的。

由此，这些表现中国易学太极系统文化的玉器出现在这些萨满的墓中，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把牛河梁女神庙、大型祭坛与墓葬中出土的表现中国易学文化的玉器以及现代这些地区还在流行的萨满教整合起来，整体联系在一起进行剖析就会发现，那时中国红山地区的文明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河姆渡文化[①]

在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骨哨和陶埙（图 4 – 18、图 4 – 19），数量很多。仅第一次考古发掘，在第四文化层中就出土了 45 件。骨哨是截取鸟禽类肢骨中段制成，长度 6.1 ~ 11.8 厘米不等，哨身中空而略弧曲，呈细长圆管状，横断面为不规则的圆形。在凹弧一侧，两端各钻一圆孔或椭圆孔，多数骨哨只有两个音孔，个别骨哨上端一侧稍凹，应该是吹孔。有件骨哨出土时内腔还保存着一根充作拉杆以变换音阶的鸟禽肢骨，这成为我们揭示骨哨使用方法的重要依据。

河姆渡的骨哨是狩猎活动中的一种拟声工具，但是骨腔中带有拉杆的骨哨，可以证明，它还应该是一种吹奏的乐器。吹奏骨哨时，人以手指按住音孔，随着气流的强弱变化，结合手指头的一按一放，便可发出不同的声响。带有拉杆的骨哨，则需配合气流与拉杆的推移来变换音阶，吹奏出不同的音乐。

此外，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了多件三音孔陶埙（图 4 – 20），三个音孔呈倒品字形，吹奏时的指法可以有全闭的一种、开一孔音的三种、开二音孔的三种、全开的一种等八种指法。经初步测试后略去同音的结果，尚有六种指法能得出不同音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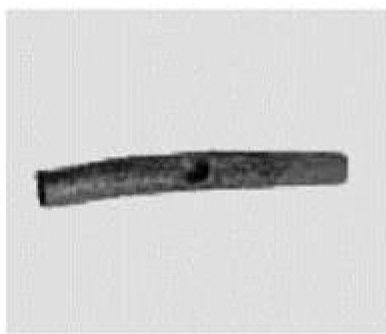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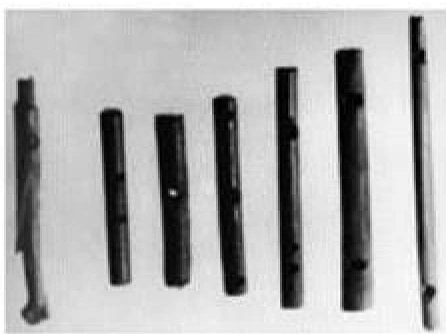



图 4 – 18　河姆渡骨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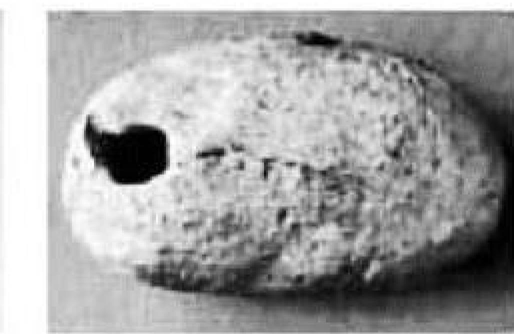


图 4 – 19　河姆渡陶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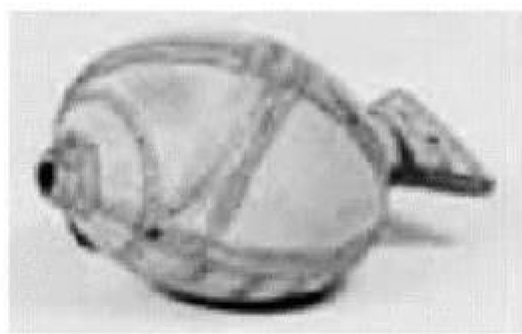


图 4 – 20　火烧沟遗址鱼形陶埙

专家测试了其中 9 个完好的埙。由于埙体大小不等，各埙全闭孔的音最多相差达一个八度。又因为各埙孔位大致相同，所以每埙都能发四个音，但所构成的三个相邻音程又只有 4 个埙大致相同，另外 5 个则彼此大多不相同。由此可知，五声音阶的应用已相当成熟，专家认为，此时有可能已经应用六声、七声音阶。

这说明，中国远古时代的河姆渡地区和其他地区，也都或多或少地掌握具有

---

①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6，第 40 ~ 41 页。

了中国易学文化中音韵学里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系统概念，并且成功地应用在了乐器制作和演奏上。

第四节　凌家滩文化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1985 年，凌家滩村民在村后山坡上建坟掘坑时，发现地下埋藏有许多陶片、玉片等文物，长岗乡政府及时上报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再由县文管所转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 1987 年 6 月开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凌家滩遗址开始了正式发掘。到目前为止，在已发掘出土的 66 座墓葬，1300 余件陶器、玉器、石器中，有精美的玉鹰、玉人、玉版、玉龟、玉璜、玉冠、玉勺等玉器，而在所有史前文化遗址中，凌家滩出土玉器最多，而玉器是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贵族们用来象征权力文化的专用礼器。

另外，还发现了发现一座祭坛，一处大规模红陶土块广场，一口水井，一条壕沟，一处石器作坊，三组巨石建筑遗存等遗址。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丰富文物，以其深蕴的历史文化信息震撼了国内外学术界，使巢湖地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史上，确立了无可争辩的重要地位。从此，这座默默埋藏了 5000 多年的重要文化遗址横空出世。

这座规模宏大的遗址，方圆 160 万平方米，一眼望不到边际，就是以后稍晚出现的城市面积也不一定比它大。根据测定，凌家滩遗址的时代距今约 55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

这个城市沿河而建，四周一条大型围壕形成了城市与外界相隔离的“护城河”，用来防御外界的侵袭。内部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

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和庭院区，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从这个区域出土了大量陶片。

第二区域是 3000 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考古专家认为这里是部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这座古城的中心，它反映出当时的高度文明和强势力量。

在广场中间有一口红陶土块砌成的水井，井水清澈可饮，经地质专家鉴定，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现代意义的水井，这说明当时的居民有了公用的生活用水。

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中央有一处约一米高的祭坛，陪葬品有玉器、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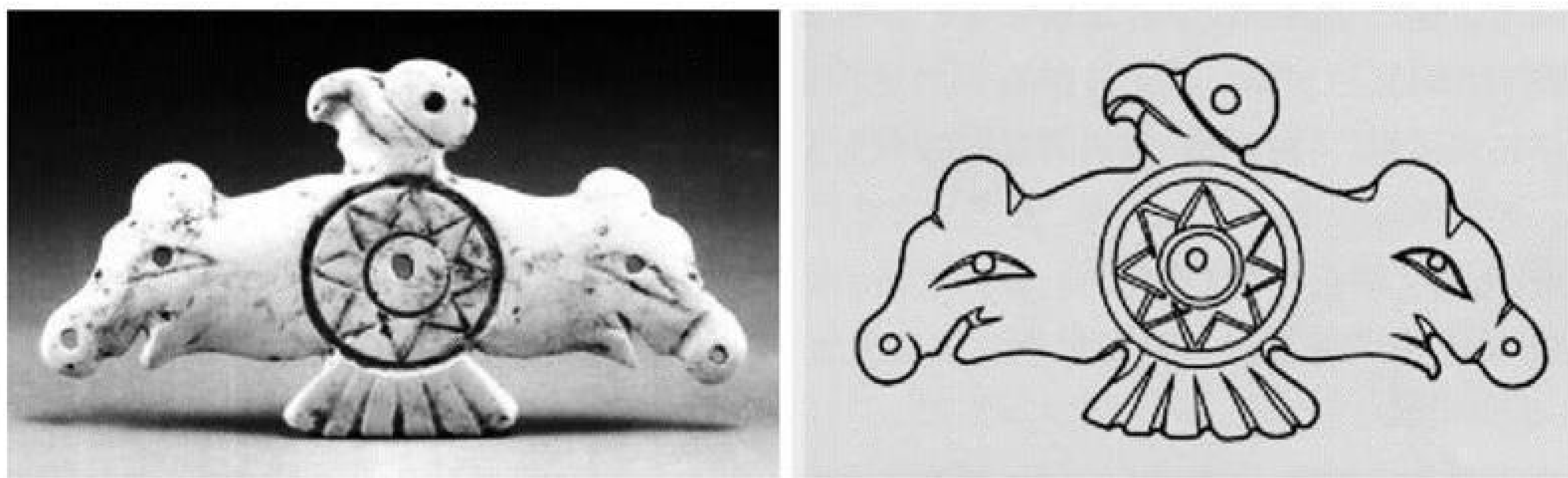
和陶器等。考古队与台湾古玉研究专家合作，利用先进的偏光立体显微镜，对上百件精美的凌家滩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和测试，发现凌家滩人已经用上了高超的冶金技术。

中国著名城市历史研究专家、同济大学董鉴泓教授认为，一个文明发源地能不能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防御性设施、手工业作坊和商业集市这四大要素。凌家滩具备了以上条件，这里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又有护城濠沟，还有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

而一个城市一定是它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所以它当之无愧是一座城市［郭、国］。考古学家们发现，那也是一个“天下万国”或“天下万邦”的时代。

在此之前，考古界公认中国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凌家滩遗址的发现，使中国城市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玉鹰（组图4－21）材料采用灰白色透闪石，形状尾羽展开呈扇形齿纹，头略仰并侧向一面，呈展翅飞翔状。头部雕琢十分逼真，眼睛为一面钻的圆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展翅的两翼雕琢似猪头或似别的动物形象。在胸部核心部位，阴刻出了规整的内外两个圆圈和八角星纹，中心圆内还有一孔。①



组图4－21　凌家滩出土的玉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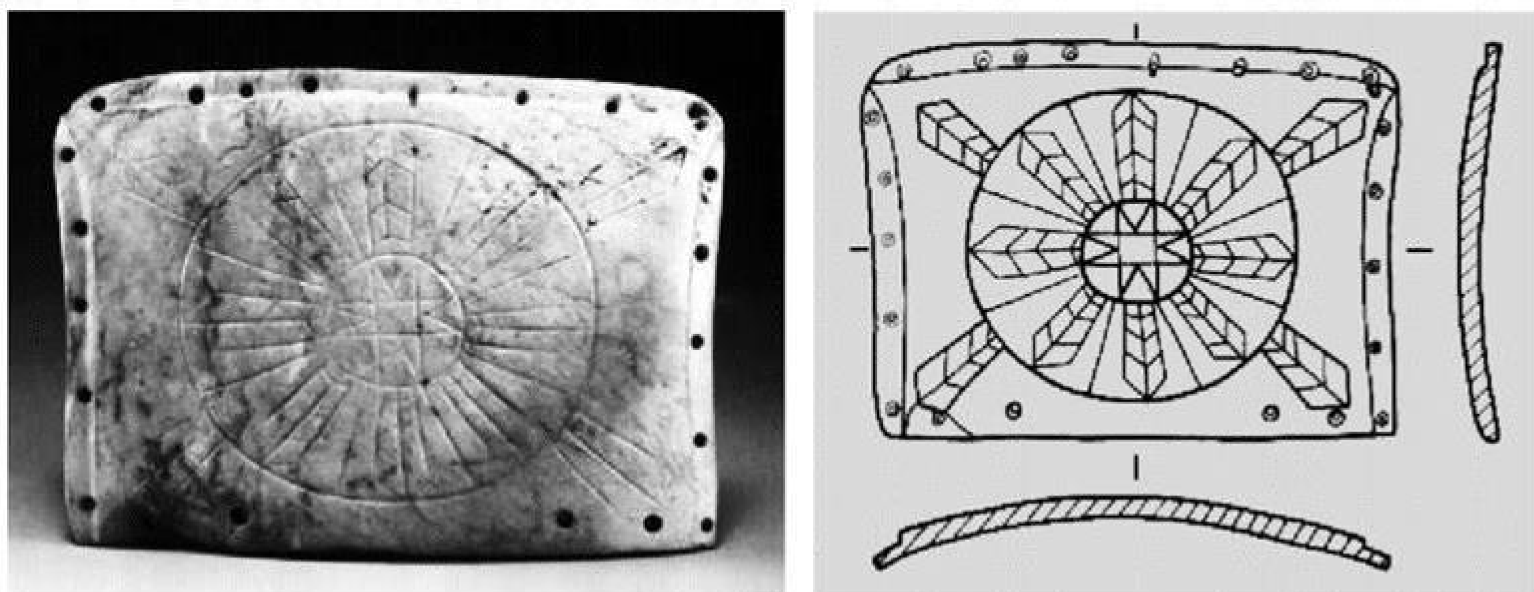
玉鹰表现出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将太阳形象思维拟人化地比喻成太阳鸟的观念，也表现出了太阳从日出到日中天再到日落的运动状态过程。内外两个圆圈和八角星纹则更明确地表示出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早期的核心——八卦，也表现出了那时的人们就具有了以崇尚先天大自然、崇尚太阳、崇尚八卦为核心的自然宗教的文明观念。

另外，太阳鸟也是东夷人的图腾，在红山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也出现过鹰鸟图形。玉鹰在凌家滩的出现，表明凌家滩先民的文化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四。

的东夷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都发生过交融和碰撞。

玉版（组图 4－22）正面呈长方形，反面呈内凹形状，两短边各对钻 5 个圆孔，一长边对钻 9 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各对钻两个圆孔。玉版中部刻一小圆，小圆外又刻一大圆，小圆内刻一方心八角星纹，两圆之间平分八等份，每等份内又刻一圭形纹饰，在大圆圈外与长方形玉版四角对应之处，又各刻一圭形纹饰。①



组图 4－22　凌家滩出土的玉版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玉版是夹放在龟甲里面一起同时出土的，这也同时反映出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典型的占卜工具，也是凌家滩出土玉器中与中国文明有关的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考古专家认为，玉版上雕刻的纹饰，反映了 5000 年前凌家滩人的原始哲学思想。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圭形纹饰表示东西南北四方和八方，应与季节有关。玉版毫无问题地显示出了度数、方隅、以八数为天地之维纲的形象思维。这无疑是一件崭新而能引人入胜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瑰宝。

可是，凌家滩的智者为何非要将玉版的正面制作成凸起来的形状？为何非要将背面制作成凹下去的形状？平板不是更容易制作吗？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原来这是凌家滩的智者想要明确表达阴阳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阳面［凸、图、文明、文化］与阴面［凹、陷、黑暗］的结合，就这样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玉版小圆内刻着的方心八角星纹恰恰就是与以大汶口文化为首的、诸多遗址出土的绘有原始八角形的符号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的广大地区，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阴阳、八卦、九宫的文化概念。

玉版上两圆之间雕刻的八个纹饰，又可继续分为 24 条放射状的直线，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和二十四山、二十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二。

四节气的系统概念。玉版四个角的纹饰，又恰好表示出了中国易学文化中四隅（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丑辰未戌四季月）的系统概念。也至少说明了在这个时期，凌家滩地区的人们使用的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的历法。

二十四山（图4－23）由甲、乙、丙、丁、庚、辛、壬、癸这八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地支，以及乾、坤、艮、巽这四个卦所组成。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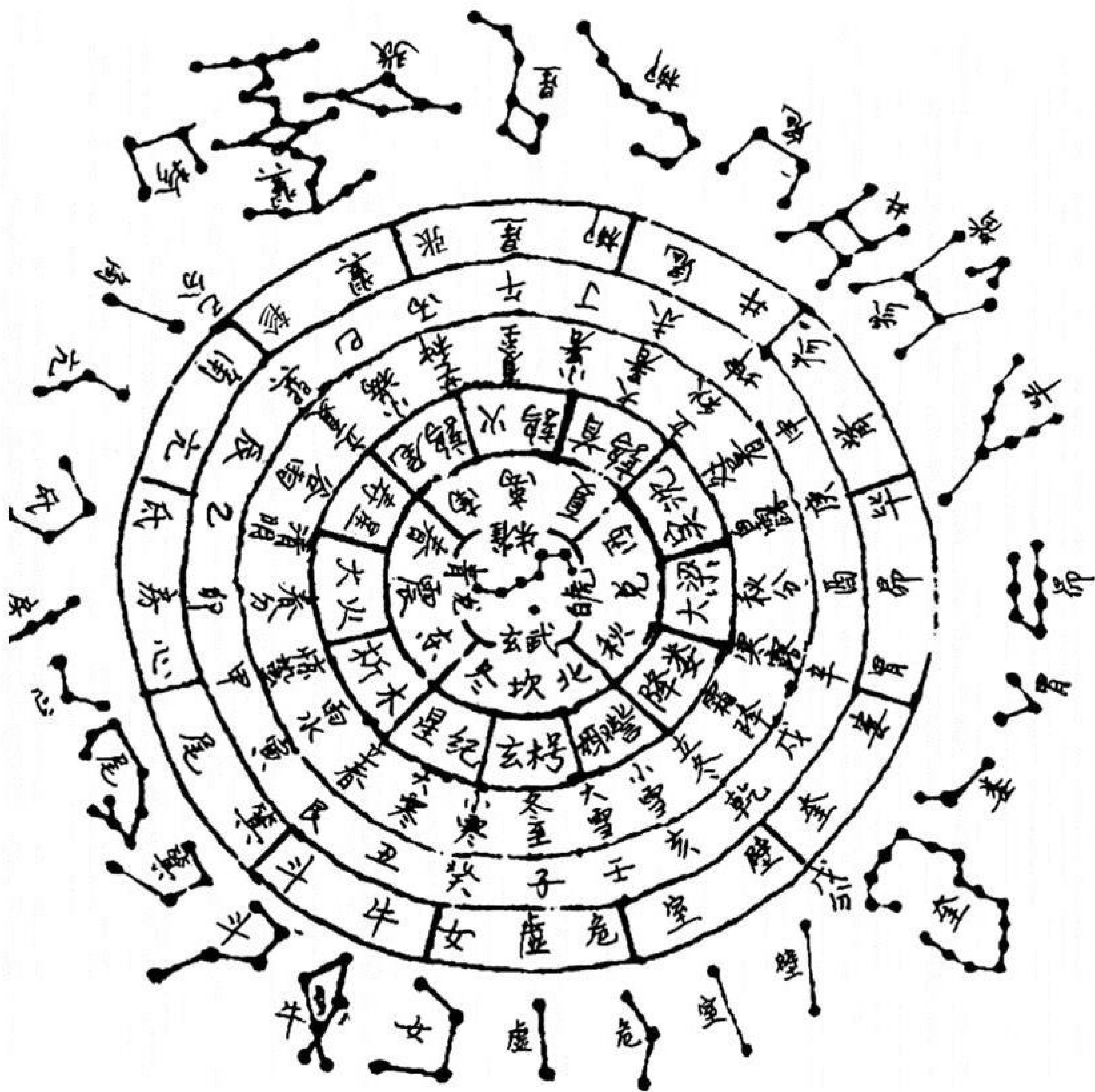


图4－23　二十四山和二十四节气图

这二十四山的天干中没有戊、己这两个天干，表示太极是无极（戊己）的，任何事物既没有绝对的中心极点，也没有绝对的外围边缘。

这二十四山的八卦中没有震、兑、坎、离这四个正卦，可震卦却用天体黄道带上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的东方青龙、春天代表了；

① 常秉义：《周易与历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第208页。

兑卦却用天体黄道带上的“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组成的西方白虎、秋天代表了；坎卦却用天体黄道带上的“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组成的北方玄武、冬天代表了；离卦却用天体黄道带上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组成的南方朱雀、夏天代表了。

二十四节气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其中的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是十二个节，表示这一日就像人体的关节一样，可以发生转折了，进入节这一天，就真正地转入节所相应的一月。

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是十二个气，表示这一日是此月中气最浓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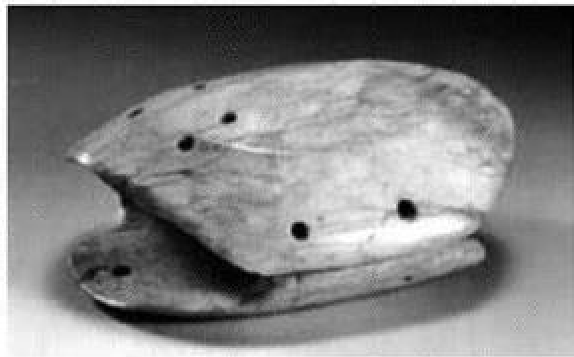


图 4－24　凌家滩出土的玉龟

玉龟（图 4－24）出土时，龟中的空腹中夹放着玉版，背甲龟纹琢磨出了十分逼真的效果，玉背甲和玉腹甲两部分由孔和暗槽相连。①

按照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形象思维，背甲为天，腹甲为地，中间玉版所刻易学八卦的哲学思想为人，这不是非常明确地反映出凌家滩人在那时就已经具有了成熟的天地人和的自然哲学观吗？这也表明凌家滩的原始先民，已经具有了应用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卜筮算卦的行为能力，并且将卜算作为了文化文明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此外玉版夹放于龟甲里面，和文献所说“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玄龟负书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鱼河图》），不是如出一辙了吗？

玉龙（图 4－25）材料采用灰白色透闪石。阴线刻出眼、鼻、口、吻部、龙须、头雕两角的龙，呈出了首尾相连的圆形。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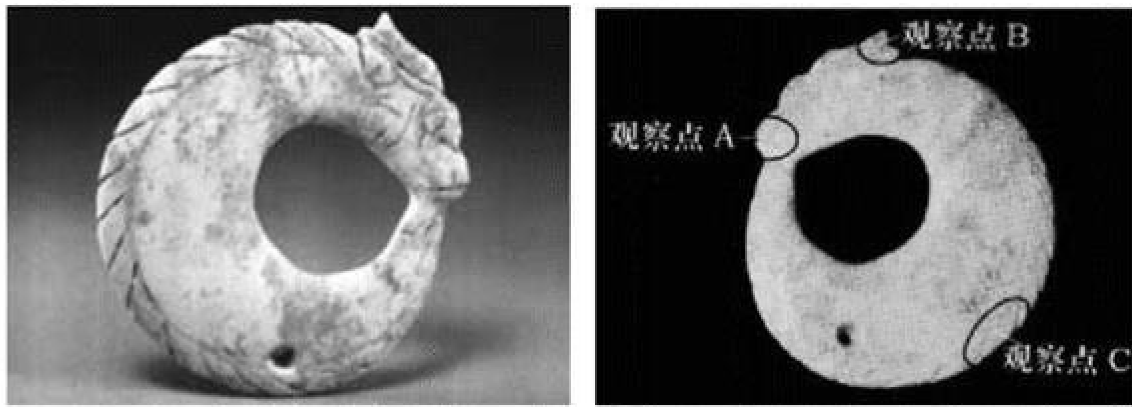


图 4－25　凌家滩出土的玉龙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三。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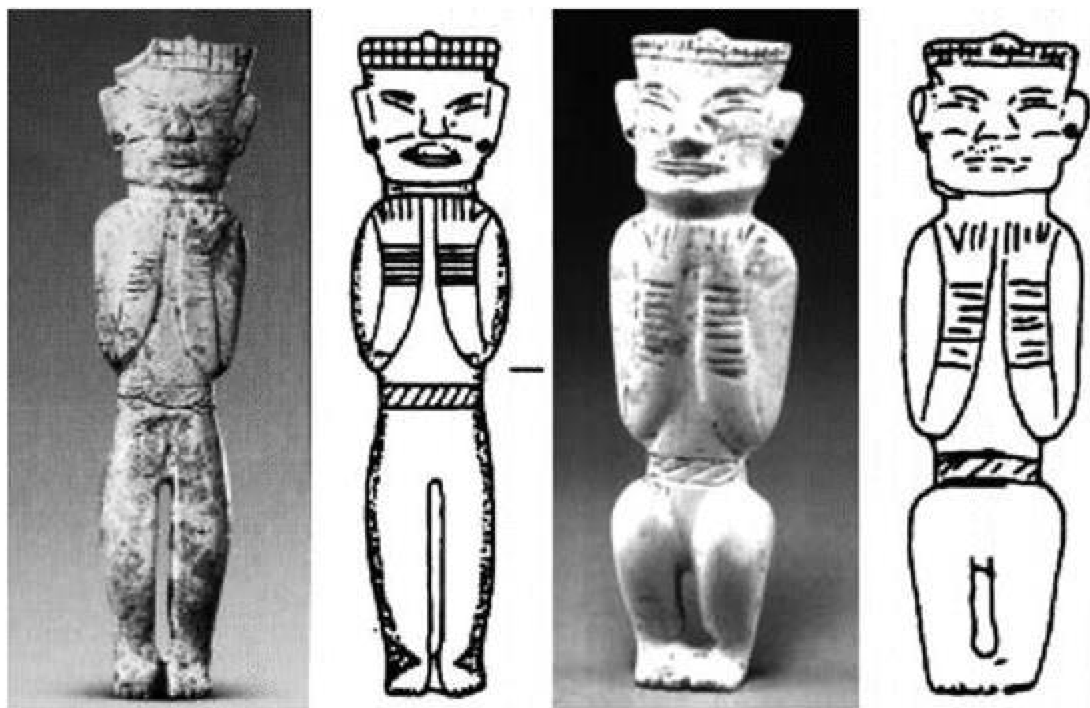
凌家滩出土的5300年前的圆雕玉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条形象逼真的玉龙，形状强烈而又鲜明地表现出中国龙的传统特征。虽然在中国南北方史前考古学文化中都有不同的龙题材出现，但凌家滩玉龙与古人想象中的龙形象最相似，表明中国龙的系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

凌家滩出土的圆雕玉龙，真实地反映出了凌家滩人在5300年前对宇宙大自然及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它们都像所有的卵生动物一样，是在积极循环、旋转运动着的过程中轮回变化着。宇宙大自然与万事万物，都像是天［乾、龙、思想］与地［坤、龙、身体］一样，在这样运动的状态中进行着生生死死的变化。

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龙文化源远流长，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壳塑龙和红山文化的玉龙，再到凌家滩出土的圆雕玉龙，5000多年的漫长时空，在龙文化上就这样如此神奇地叠合了起来，真令人不可思议。这足以说明巢湖流域的龙文化与西水坡文化和红山文化也都发生过交融和碰撞，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自然宗教及文明的崇拜与虔诚。

凌家滩共出土6件玉人，3件坐姿，3件站姿。玉人都是双臂弯曲紧贴胸前，呈现出作祈祷之状，反映了凌家滩先人已有强烈的原始宗教意识，早已告别了精神世界的蒙昧期。

玉人（组图4－26）都戴方格纹圆冠，系斜条纹腰带，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纺织业，并且纺织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也反映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服饰文化。从人们的衣裤、帽子、腰带等穿着上来看，既体现出了城乡差别，也反映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服饰文化。玉人双耳有耳孔，手臂上有刻纹，表明它们既戴耳饰，也戴手镯。①



组图4－26　凌家滩出土的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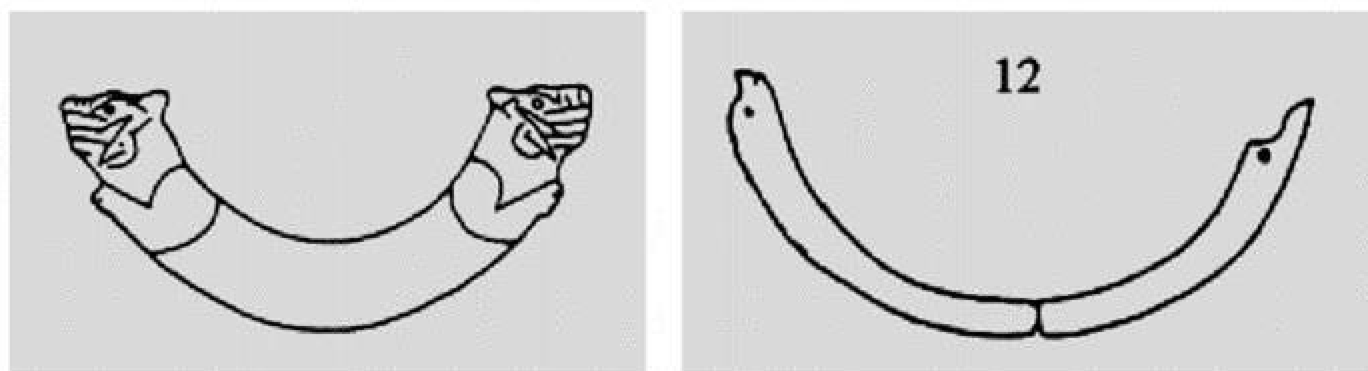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三、二、五。

玉人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剃须工具，表现出玉人绅士风度和已享有相当高的物质文明。凌家滩玉人都呈长方形面孔，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嘴，身材比例匀称，面部表现出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同现在的中国人一脉相承。这有力地证明了5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人种一直未变，文化传承也未变。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文明都曾出现过原有本土文明的中断和人种的变迁，唯有中华文明历史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另外，凌家滩出土的玉人，也非常明显地显现出了祈求、祈祷时的虔诚神态，这种造型与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半砬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蚌饰造型和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人造型，以及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石人造型，与现代鄂伦春族萨满神偶的造型几乎是一致的，特别是它们手臂呈现出了祷告时才有的姿态（组图4－17）。

此外，凌家滩还出土了20多种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璜之集大成。

其中虎首璜和龙凤璜（组图4－27）最富考古价值。专家认为，虎首璜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它和玉戈等兵器的出土，说明当时已有战争行为和军事结盟现象存在。龙凤璜则显示了中国龙凤系统文化的源头，这种合婚的信物，表明凌家滩先民已实行族外婚，在婚姻制度上已迈入一个文明的新阶段，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①]



组图4－27 凌家滩出土的虎首璜和龙凤璜

笔者认为，不论是虎首璜和龙凤璜，还是其他形状的玉璜，它们都是用形象思维在表达易学基础知识里夏至这一天太阳的日出点与日落点形成的半合火局，即寅（日出点）戌（日落点）或卯（东方、日出点）戌（西北方、日落点）合化火（太阳、光明、光亮、白昼、文明）。表达出了“合”的意思，后来就演变成了“合符”之意，只不过虎首璜和龙凤璜比其他玉璜雕刻得更加精细、形象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114页和彩版四。

一些而已。

玉璜这种形象与良渚文化里的三叉形器所要表达的意思极为相似，只不过三叉形器表达的是寅午戌三合火局，而玉璜表达的是半合局而已。

即使在今天安徽民居的墙头文化艺术（组图4－28）当中，依然还保存着那种玉璜的造型，将距今5500年左右凌家滩古人对太阳的崇拜，对生命的礼赞，对三足太阳鸟、光明、希望等文化的追求，在形象思维的皖南建筑文化写意中，圆满、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组图4－28　安徽民居的墙头艺术

凌家滩遗址仅发掘了总面积的1/800，就已经有了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据考古专家描绘，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这一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远远早于人们过去所作的估计。

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对于研究我国数学、力学、几何、机械原理、原始八卦和天文学的起源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显示凌家滩文化在5500年前处于全国最先进的地位。

目前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定凌家滩遗址是我国古代早期文明起源源头之一。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前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教授说："凌家滩玉器的发现，对于玉器文化的深入研究乃至聚落演化历史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起始阶段不可多得的实例。"

专家认为，凌家滩古城展现出的失落久远的灿烂文明，将使中华民族文明史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对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大文化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第五节　大汶口文化

1959 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与宁阳堡头村附近遗址的第 10 号墓，发掘出土了一批大汶口文化龙山时代早期（年代约公元前 3300 ~ 前 2600 年）的随葬品，有玉铲、玉臂环、骨雕桶、象牙雕桶、象牙梳（长 16.2 厘米，图 4 – 29）①、鳄皮制品和一些精美的陶器等。其中的象牙梳就采用了透雕法，柄端既雕出了代表日、月、星的三个圆，还雕刻出了新石器时代最原始精美的太极图案。史前时代至历史时期无数器物、遗迹上的 S 纹、反 S 纹、漩涡纹大多是太极图的简式或其变形、衍生物。

大汶口的先民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将 11 个乾卦（代表阳、宇宙、苍天、运动、变化）符号形成了一个大的 S 形图案，包围着两个坤卦（阴、地球、大地、运动、变化）符号，中间还有两个表达阴阳相合、天地相交的 T 形符号。这个大的 S 形状，又形成了一个就像宇宙中的星系图（图 4 – 30）和先天八卦图（图 4 – 31）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一样的排列顺序。



图 4 – 29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



图 4 – 30　宇宙中的星系图



图 4 – 31　先天八卦图

1977 年，考古学家在山东胶县三里河畔的一片高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

①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 118 页。

期的墓葬群，在一位约60岁的老太太墓中，出土了一件玉璇玑（图4－32）。迄今为止，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制作年代最早。

玉璇玑，像一个长了牙的璧，外缘有三个朝同一方向飞翘的牙，间距相等，有的其间雕刻扉棱一样的小齿。“璇玑”二字，源出《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西汉学者孔安国释：“在，察也；璇，美玉也；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

第一位详细描述璇玑的人，是清末的吴大。在《古玉图考》中吴大绘制了一幅《璇玑图》，并注释：“璇，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是玉外郭有机牙三节，每节有小机括六，若可铃物，使之运转者，疑是浑天仪中所用之机轮，今失其传。不知何所设施。”北宋李公麟曾画过一幅《璇玑图再叙》。所谓“璇玑图”，是指晋代苏蕙的回文旋图诗。李公麟效苏之回文旋图诗，并跋：“回文诗图，古无悉通者。予因究璇玑之义，如日星之左右行天，故布为经纬，由中旋外，以旁循四旁。”同时代的一位女词人朱淑真在《苏若兰璇玑图诗图记》中，解释颇详：“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一度之中，所谓居其所而斡旋之。”

璇玑究竟是什么？孔安国的解释十分明白：玉璇玑是一件帝王观测到了天象的旋转，而仿造天象进行旋转的玉雕器物，在尧舜为帝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名字叫璇玑。孔安国作注的《尚书》原藏于孔子旧邸的一堵墙壁内，汉景帝年间发现，是汉朝唯一一部古文《尚书》全本。

所以笔者认为，玉璇玑实际就是古人用于描述宇宙天体、龙卷旋风、激流漩涡等能够像龙一样进行轮回盘旋运动变化（图4－33）的仿行器物，与古人仿天之圆而作璧、仿地之方而作琮的用意相似，也是古人表达太极龙文化图腾的另一种方式。



图4－32　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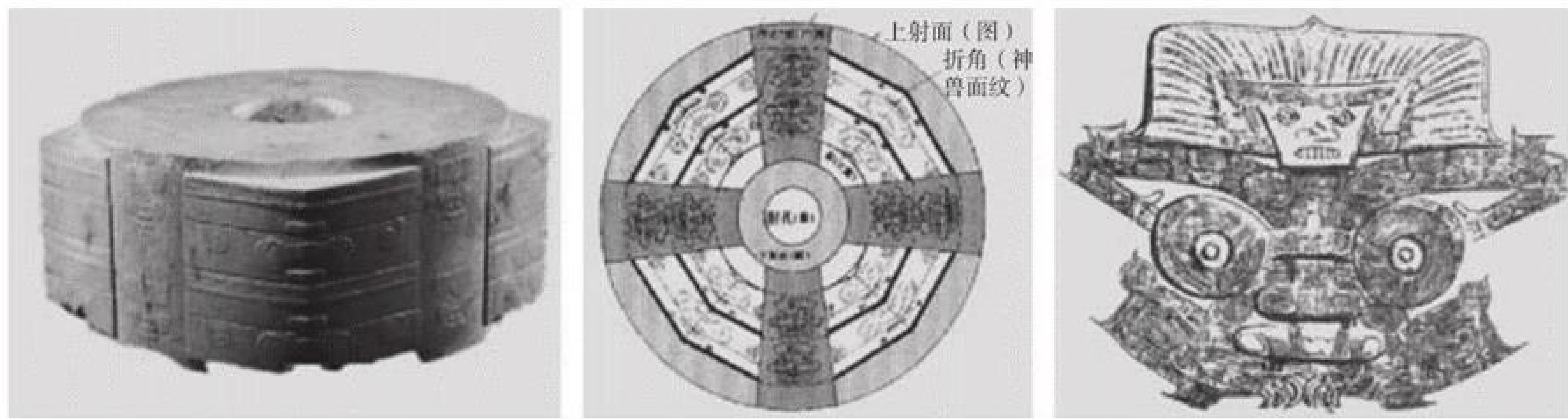


图4－33　宇宙中的星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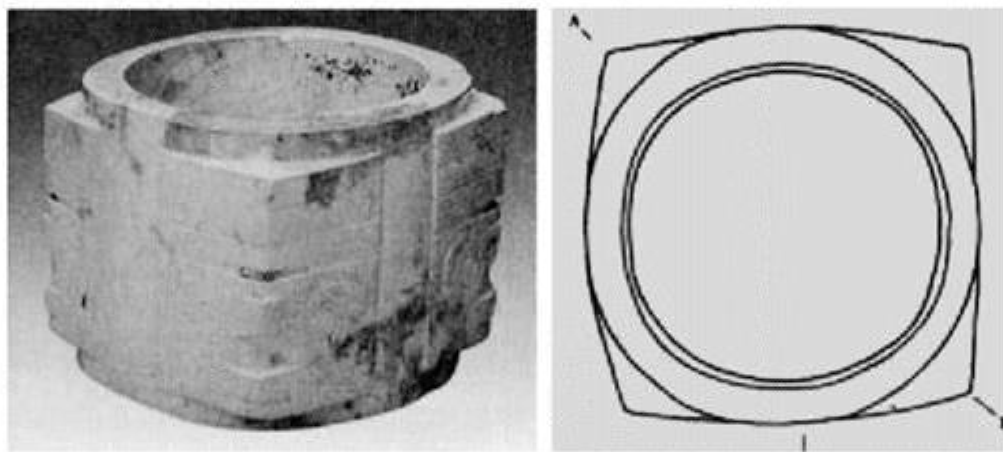
第六节 良渚文化

1986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文化发现地——余杭县长命乡反山，发掘到了良渚文化的大墓，共清理出了 11 座墓葬，出土了大批文物。目前，又在这里发掘出土了施工考究、规模宏大的良渚文化时代的城［郭、国］墙遗址。良渚文化是继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其年代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且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

其中，从反山 M12 中出土的一件 M12：98 玉琮（组图 4－34）[①] 的形制上，就可以看出古代良渚人已经具有了天圆地方和四隅八方的系统文化观念。从余杭瑶山 M12：01 玉琮（组图 4－35）[②] 也可以看出此信息。



组图 4－34　反山 M12：98 玉琮及图案



组图 4－35　瑶山 M12：01 玉琮

反山 M12：98 玉琮的四隅八方上，都刻着神徽图案，从其中四正方（东南西北）上的整体图案来看，既似一个叉开两腿站立的整体之人，又似一个人的整体面部。站立之人两手臂插向胸部乳房之位，形成了整体面部的眉毛。站立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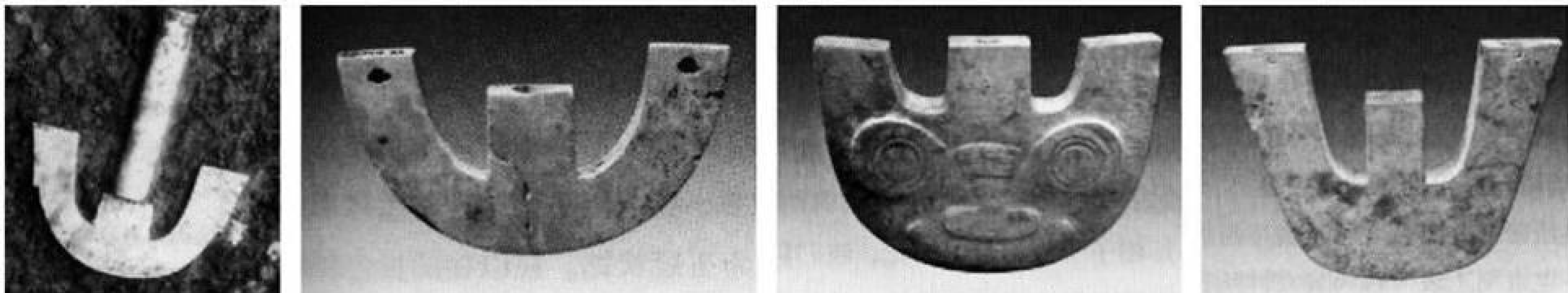
---

① 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 96 页。
② 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 97 页。

的乳房之位又形似两个明显突出的大眼睛，肚脐部位有一明显的大鼻子，两腿之间的生殖器之位又有一嘴。从玉琮上的图案就可以看出，古良渚人已具有了易学文化体系中“一物一太极”的文化思想观念。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既可以把人体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太极，也可以把面部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太极，还可以把人体脖子以下部位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太极。身体两臂与面部眉毛对应；身体两乳（心脏位，属火）与面部眼睛（属火）对应；肚脐（丹田位，可呼吸）与鼻孔对应；生殖器、肛门（属水）与嘴（属水）对应；腿部与脖子对应。

从余杭反山、瑶山还出土了许多三叉形器（组图4－36）①，专家从三叉形器的造型分析，其与圆雕的玉鸟颇具相似之处，玉鸟在构形上，双翅与鸟尾也恰构成三叉的形状，鸟翅的前缘也均为圆弧形，与三叉形器之边缘同出一辙。从反山与瑶山所出的5件玉鸟来看，除反山M15玉鸟出土于头部而未出三叉形器外，其余均与三叉形器同出。玉鸟一般位于墓主人下肢部位，正构成巫师的扮神装束与法器的呼应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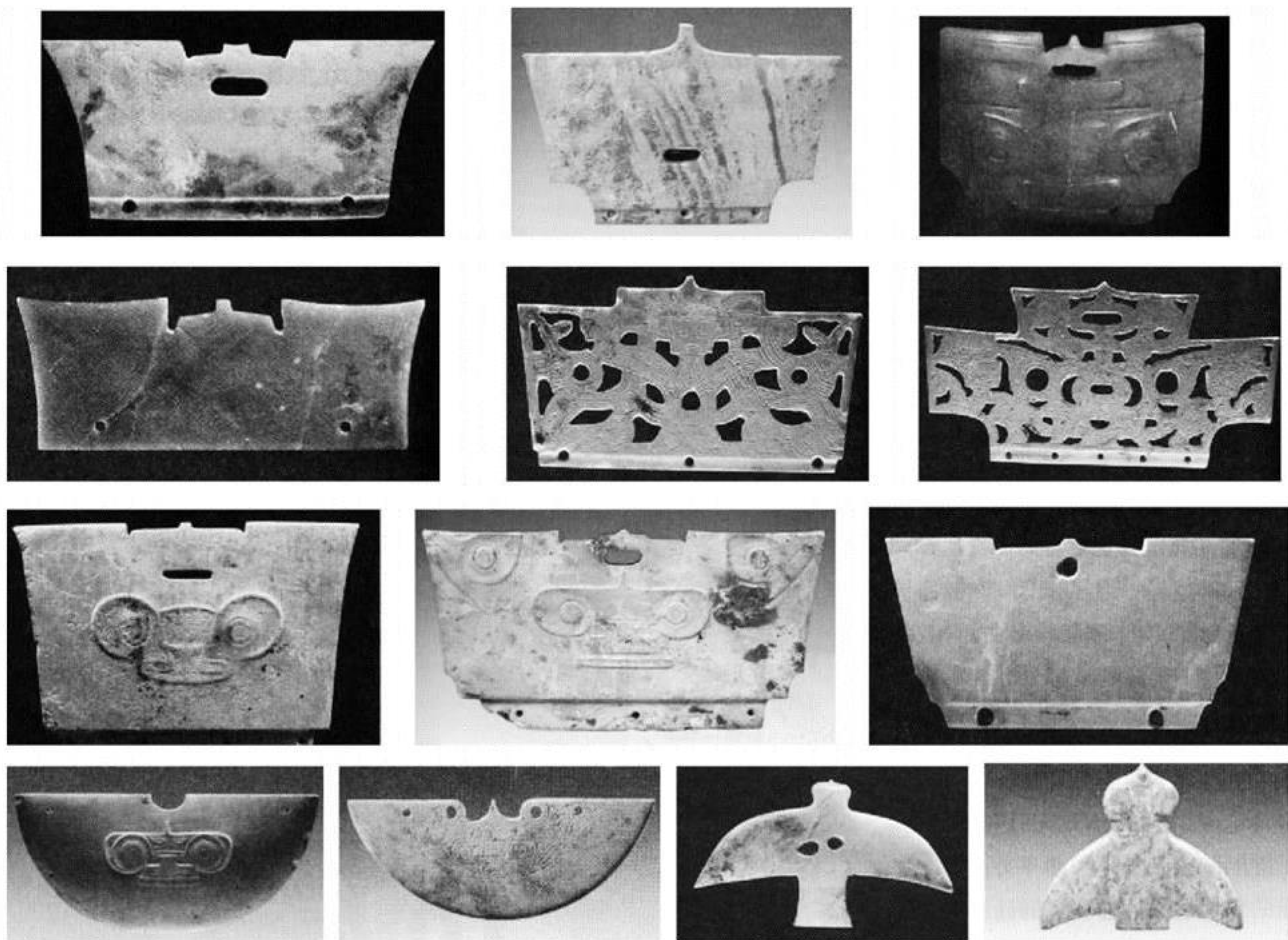
组图4－36　反山、瑶山出土的三叉形器

笔者认为，三叉形器与玉鸟都是良渚古人用形象思维在表达易学基础知识里夏至这一天太阳鸟的日出点、日中天点与日落点形成的三合火局，即寅（日出点）午（日中天点）戌（日落点）合化火局，表达出了三足（三点）太阳鸟（火、太阳、光明、光亮、白昼、希望、文明）之意，以及三点可确定出一个圆环运动轨迹的概念。

我们再仔细观看从余杭反山、瑶山出土的许多既像冠状物又像玉璜的玉器（组图4－37）形状②，就会发现这些玉器都是既形象又抽象地在夸张表达太阳鸟的两翼，在突出表现太阳鸟展翅高飞的那种形态的同时，又非常巧妙地隐含了太阳鸟的头部，说明良渚古人的祭祀，实际也是在崇尚太阳（火、太阳、光明、光亮、白昼、文明），崇尚自然，崇尚文明。

① 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55页。

② 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63、73、82、116、118页。



组图 4－37 反山、瑶山出土的冠状物、玉璜、玉鸟玉器

所以笔者认为，冠状物、玉璜这两种既形象又抽象的玉器，与良渚文化里的三叉器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都表达的是易学文化体系中基础理论的寅午戌三合火局，是良渚古人用形象思维在表达易学基础知识里夏至这一天太阳鸟的日出点、日中天点与日落点形成的三合火局，即寅（日出点）午（日中天点）戌（日落点）合化火局，表达出了三点（左翅、头、右翅）太阳鸟（火、太阳、光明、光亮、白昼、文明）之意，以及三点可确定出一个圆环运动轨迹的概念。

在周易八卦的离卦中，就归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其中就包括了禽鸟、亮丽、火、太阳、光明、光亮、白昼、文明等。在没有文字的时代里，智慧的远古人只用玉鸟就把离卦所有代表的事物囊括其中了。

小结

一　中国的声与音

在老子的《道德经》第二章所描述的“音声相和”中就明确地指声和音是

两回事。比如，在惊蛰节的这一天，惊雷在天空中炸开，余音在大气层中回荡，响声和回音在被大地不停地吸收的同时，给大地巨大的能量和丰富的养料，并将沉睡了一冬的冬眠之物也唤醒了，所以大自然中的声和音本身就是两回事。中国智慧的古人根据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和变化规律，将“声”和“音”作为两个概念，纳入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

声指发出的响声，属阳性，同升；音指响声之后产生的回音或余音，属阴性，同阴。先有声，后有音，声与音就像是车与辙的关系一样。

从舞阳贾湖出土的各类骨头来看，9000 年前的贾湖地区，动物种类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能够制作骨笛的材料也是非常丰富的，可为何出土的贾湖骨笛却都是用飞禽翅膀上的尺骨来制作的呢？

答案只能是，贾湖先人已经掌握了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声→升→对应→飞禽翅膀→飞扬”的观念，知道只有用飞禽用于飞翔的翅膀上的尺骨制作出的乐器所达到的声音飞扬的效果，才能真正符合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天地人和的文化观念，这是在努力追求易学文化中的那种声音正在飞扬的极致效果，那种音乐能使人沉醉于飘忽的极致意境。

二　中国的五声音阶

对于古人为什么要用“宫、商、羽、角、徵”作为音阶的系统名称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一致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在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阴阳两仪、四象、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山、二十四节气都能够系统完整地旋转一个周天太极，就像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循环旋转的龙一样，与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是完全对应的。

中国古人对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进行一个完整系统地整体认识，都是在某一个太极中系统地整体认识事物，即一物一太极的世界观。这个对事物的整体思想认识，既包含着形象思维，也包含着逻辑思维。

这样在五行的集合系统概念中，就纳入了“金、木、水、火、土”与“宫、商、角、徵、羽”和“东、西、南、北、中”等系统知识。如此，在中国古代用的乐理知识中，作为音节的系统名称就是“宫、商、羽、角、徵”（相当于［用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专用词汇讲就是“像”］现代简谱中的 1、2、3、5、6）了。

其实，五音与天文学和人体也有紧密的联系，在星宿中，与“木、火、土、金、水”五星系统也是可以对应的。在人体中，与“呼、笑、歌、哭、呻”五

声系统也是可以对应的。

可是，以《河图》之数为物理根源中的五声“呼、笑、歌、哭、呻”是转变不成五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代简谱1、2、3、5、6）的，因为这其中的五声是由于人的五志——“怒、喜、思、忧、恐”而发出的，而五音是大自然中本身就具有的。那么，人如何也能人为地发出一个模仿大自然的五声，与模仿大自然的五音结合起来呢？这就要通过自然界中“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系统物质制作出来的器物，来发出响声和回音了。这样“角、徵、宫、商、羽”与“木、火、土、金、水”的五种系统器物（乐器）所发出声音的音（注意：音节与音是两个概念）也就非常像地自然对应了起来。《汉书·律历志》在描述音乐时说：“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即人们用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五声），用陶埙（土）、匏笙（木）、竹管（木）、木柷（木）、皮鼓（水）、丝弦（火）、石磬（金）、金钟（金）这八种乐器（八音），演奏出声音旋律，就成了音乐：“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

如此众多的乐器合奏，演奏的乐曲如此繁复，没有音阶是不能想象的。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说明贾湖人在音乐实践中，已具备了相当的文明高度。五声音阶系统之所以在中国音乐历史上有长期的影响，是因为五声体系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系统思想是分不开的。

三 中国的七声音阶

中国七声音阶起源的时间，历来有争议。有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力主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的七声音阶是很晚的时候从国外传入的，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只有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另有一些音乐史学家认为，中国的七声音阶大约起源于商代早期。

中国先秦时期的音乐，主要是西周礼乐所用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相当于现代简谱1、2、3、5、6）构成的曲调，似乎没有七声音阶。那么，中国古代的七声音阶是何时才出现的？中国的五声音阶是否为落后于西方的证明？为了解决这些困扰人们的难题，音乐史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揆诸文献，事实并非如此。《战国策·燕策三》记载，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临行到易水河边将分手时，荆轲在好友高渐离的伴奏下，唱起了离别歌，曲调先用“变徵之声”，接着用“慷慨羽声”。

所谓“变徵”，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音阶名称，它的位置在徵音之前，而比徵

音低半音，相当于今天的升高半音的 4（fa），这个音就突破了五声音阶的范围，使一些音乐史学家感到迷惑不解。

郭沫若等学者提出，荆轲所用变徵之声是否从两河流域，即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传入中国的？这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是中国史学界曾经严肃讨论的问题。

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国音乐史家试图通过对出土乐器的测试，解决中国七声音阶起源的时间问题。由于那时出土的中国古代最原始的乐器是埙，所以有关的研究是从对史前陶埙的测音开始的。半坡出土的一音孔陶埙，距今约 6700 年，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小度音程。时至今日，我国民间的劳动号子，依然是小三度居多。半坡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埙从一音孔发展到两音孔，包含的都是小三度的音程关系。

如果用西周以来的沿用阶名表示三音孔陶埙的音阶序列，可以发现大多数是以“宫、角、徵、羽”作为骨架，而缺少“商”音；甚至有了“清角”，但依然没有“商”音。

《国语·周语》记载乐官伶州鸠在回答周景王的询问时，提及武王伐纣与七声音阶的联系，所以近代有学者认为，武王伐纣时可能已经有了七声音阶。

但是，学者发现安阳殷墟出土的武丁时代的五音孔陶埙，音列已经相当完备，表明至迟在晚商，完整的七声音阶系统已经出现。并且安阳殷墟出土的埙已在十一音之间有了半音关系，只差一个音就构成了完整的“十二律”体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晚商音乐中已经有若干变化音可供使用，并有可能产生某些具有变化音特点的调式。

安阳出土之埙除了以 C 为宫的七声音阶各音以外，还有清商、清角、清徵和闰四个变化音。从甘肃三音孔埙到晚商五音孔埙，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有几件甘肃陶埙没有出现五声音阶中的主要音阶“商”，却率先出现了“清角”。可以说明“二变”的出现并非一定晚于五声。

商代出现七声音阶系统，并不是说商代就是音阶的原创时代，其原创的时代应该还要远远早于此时。商代只是七声音阶出现的下限。那么它的上限又在哪里呢？贾湖古笛的出土，给中国七声音阶起源的时间，下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

因为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是要系统地、整体地认识事物。而音产生于律，律又产生于历，历又产生于农业生产，农业产生于人对食物的需求。它们之间又在同一个自然的太极系统中相辅相成地紧密关联着、伴生着。而贾湖先民在那时就具有了农业育种和优化的初步科研意识和能力，说明那时的贾湖先民已

经总结出了历法，并掌握了节气的系统规律。

那么，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来看，也足以说明贾湖先民在那时已经掌握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关于乐理的系统规律。

就音乐领域而言，数与律又是密不可分的。不论是弦乐器的弦长，还是管乐器的孔径，它们与律（在此指音高标准）之间都是有比例关系的。这样，根据大自然的变化法则和客观规律，就能通过计算确定出乐器的音阶关系，所以律与数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四 关于 C6①

贾湖文化中的古笛虽然在制作的时间上有 1000 多年的差距，在早、中、晚各期所制作出的骨笛中，不论其形制、调高、音阶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每支骨笛上都发出 C6 这样一个共同的音高，它们分别是：

早期：M341：1（C6 +35）、M341：2（C6 +8）

中期：M282：21（C6 +12）、M282：20（C6 -30）

晚期：M253：4（C6 -50、C6 -48、C6 -26、C6 -40）

从贾湖文化三个时期的 C6 音高对比上我们不难看出，在 1000 年间，C6 的音高虽然小有变化，但是它们的音高相当接近，与今天全世界公认的 C6 音高相距甚微，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律”是中国音乐里的标准音高，相当于欧洲乐理中的音名（C、D、E、F、G、A、B）。各个“律”的音高叫做“律高”，十二律之首“黄钟”是“标准音高”，其他各律的音高根据它都能推算出来，其意义相当于欧洲乐理中的标准音高 A1，但只是“意义”上相当，实际意义并不相同。

十二吕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六吕		○		○		○		○		○		○
六律	●		●		●		●		●		●	

我国历代的黄钟律高，浮动于 # C1 ~ A1 之间，所以我们通常说的“黄钟律高相当于 C1”只是一种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十二律吕可与欧洲音乐音名相对应。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 1012、1016 页。

对应	1（$\dot{1}$）		2		3	4		5		6		7
吕律名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欧洲音名	C	#C ♭D	D	#D ♭E	E	F	#F ♭G	G	#G ♭A	A	♭B #A	B

基于“黄钟律高相当于C1”的假设，欧洲乐理中的7个字母音名（基本音阶的音名）相当于中国易学文化中音韵学里的南吕、应钟、黄钟、太簇、姑洗、中吕、林钟等7个音名，如下表所示。

极似	6	7	1（$\dot{1}$）	$\dot{2}$	$\dot{3}$	$\dot{4}$	$\dot{5}$
欧洲基本音名	A	B	C	D	E	F	G
吕律名	南吕	应钟	黄钟	太簇	姑洗	中吕	林钟

全音　半音　全音　全音　半音　全音

欧洲音名体系的依据是根据物理学中的振动频率，其意义是纯数据概念的，而中国音乐的律名是建立在哲学、美学基础上的，并与历法、数学、度量衡等许多方面紧密的联系着。

古人把十二吕律与四季的十二个月、昼夜的十二个时辰周而复始地联系在了一起，又基本上是间隔均匀的。

吕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季节	仲冬	季冬	孟春	仲春	季春	孟夏	仲夏	季夏	孟秋	仲秋	季秋	孟冬
月份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已有了共同音高的基本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制作的曾侯乙编钟，它的主调音也是C，它是人们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果，由此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5000多年时间里，人们对C6有着共同认识和肯定。从战国至今的2000多年时间里，它的地位更加巩固，并与世界上公认的音高相近，一则说明它在全人类当中有着共识，二则说明很有可能贾湖的C6音高就曾经是世界音乐音高中的基准音，三则说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乐理曾经是全世界音乐的源头。

五 贾湖古笛的制作技术①

舞阳骨笛一般长20多厘米，直径约1.1厘米，圆形钻孔都分布在同一侧，一般为七孔，制作规范。中期靠后一点时间所制的骨笛上大多都画有等分记号，表明制作之前先经过度量、计算，然后划线，再钻孔。主孔旁钻有的小孔，专家认为是调音孔，可见制作者已有声律规范的认识，开孔后先要试音，如果音律不谐，再开小孔作微调。其中282号墓21号骨笛没有发现开孔计算留下的痕迹（图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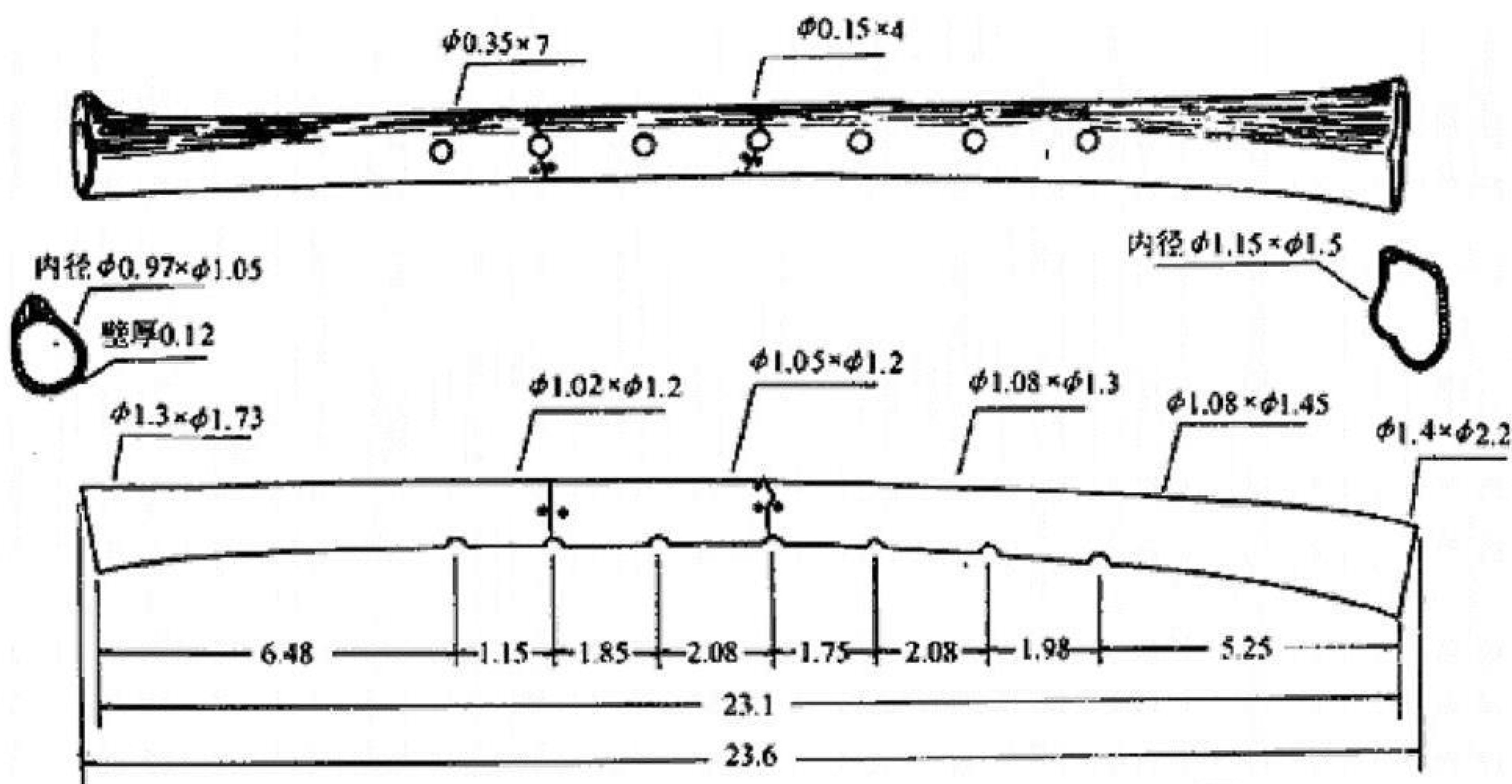


图4－38 282号墓21号骨笛线图

20号骨笛（图4－39、图4－40）在开孔时，在预先计算的开孔点上也有所调整，即把原先计算的第二孔的位置向下移动了0.1厘米，使第一孔与第二孔的音距为300音分，原第三孔的位置也向下移动了0.1厘米，使第二孔与第三孔的音分值调整到200音分，而第三孔与第四孔之间的音距也成了200音分。通过调整两个音孔位置，彼此的音距与音分数与今天的十二平均律的音距和音分数完全相同，并且形成了1、2、3、5四个声音组合的、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说明，距今9000～8000年的贾湖人对十二平均律系统就已经具有了认识和应用的能力。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第1012、1016页。



图4－39　笛身的制作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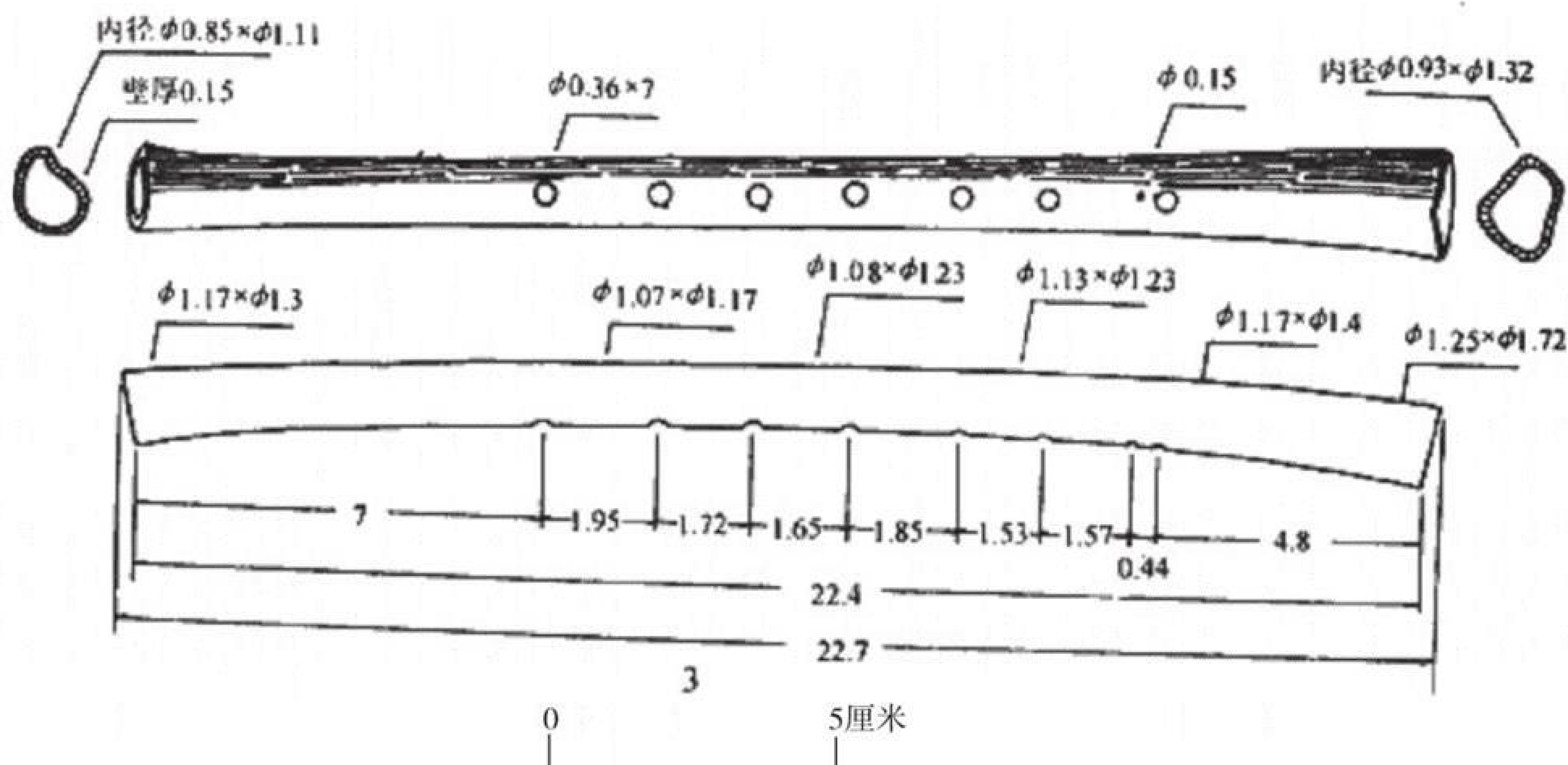


图4－40　282号墓20号骨笛线图

282号墓20号骨笛在开第七孔时，先开一小孔，经过人耳的审听，发现此孔比实际需要的音略高，于是在它下方0.44厘米处再开了一个正式的音孔（图4－40）。贾湖中期偏后的墓葬出土的骨笛，大多可见计算开孔位置时的刻度，说明了贾湖的先民制作骨笛采用的是经验与计算相结合的方法。

专家推断，20号骨笛是墓主人对21号骨笛的仿制品，仿制过程显然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在确定20号骨笛的主音后，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并力求使两支骨笛在音高上取得一致。21号骨笛第四孔的主音音高是D6—32，而20号骨笛第四孔的主音音高是D6—30，两支骨笛第四孔发出的绝对音高只差2音分，即现代人确定的半音的1/50，这在当时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情况下，能确定出两支骨笛的基本相同的主音音高，难度是极大的，这说明古人在对声音的自然敏感度上远远超过了今人。

341号墓1号骨笛全长20.9厘米，两端的骨头节已被锯去，但断面尚可见刻

痕，当是锯割前所画的记号。骨笛通体呈棕色，把握光滑，显然是长期使用之物。经测音，1 号骨笛如果以$^{\#}$D6 + 15 为主音，则此笛的自然音序为：

1 =$^{\#}$D　　　3 5 6 $\dot{1}$ $\dot{3}$ $\dot{6}$

按音阶排列为：　　1 3 5 6 $\dot{1}$ （主音：$^{\#}$D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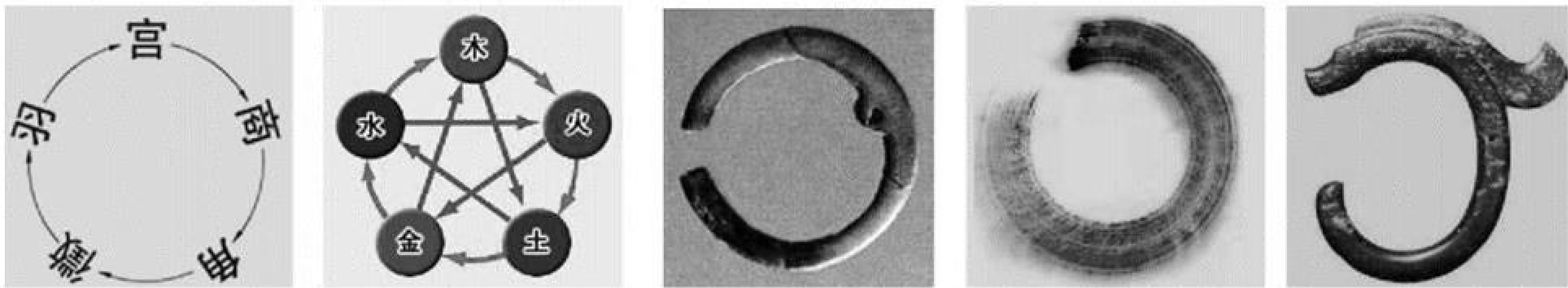
341 号墓 1 号骨笛实际为四声音阶，它与 341 墓 2 号骨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和时间上的差别。如果说四声音阶是旧石器音乐水平的最高体现，五声音阶的出现则是新石器时期的一个飞跃。

341 号墓 2 号骨笛（6 孔），发音的自然音序为：

1 =$^{\#}$A　　　1 2 3 5 6 $\dot{1}$ $\dot{3}$

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 （主音：$^{\#}$D6）

从 341 号墓 2 号骨笛的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我们可以看出从 1 到 $\dot{1}$，实际就是完成了一个“宫—商—角—徵—羽—宫”的完整的循环、旋转、轮回、升级系统过程（组图 4 - 41）。



组图 4 - 41　循环旋转的龙形不同示意图

通过两支骨笛自然音序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知道 1 号骨笛相邻两音的距离比较远，自然音序中只有一个大二度音程，而在 2 号骨笛的自然音序中却有三个大二度音程。这一重要发展，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从对开放式的粗犷型到密集的细微型表现方式的追求，这是音乐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发展。在贾湖文化延续的 1200 年的历史时期中，分别制作出了能演奏四声和五声音阶的骨笛、六声及不完备七声音阶的骨笛、七声以及带有变化音的骨笛，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渐进性。所经萧兴华先生说：“要揭开一万年以来中国音乐文化文明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由于中国音乐的律名是建立在哲学、美学基础上的，并与历法、数学、度量衡等许多方面紧密的联系着，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的贾湖人就已经有了度量衡的标准与概念，并且度量衡的知识水平还相当高，已经能用计算的方法制作乐器了。

六 凌家滩文明

通过凌家滩出土的玉器，特别是玉版上的图案（两圆之间雕刻的八个纹饰，又可继续分为24条放射状的直线），非常明确地表达出了那时的凌家滩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中国易学文化中八卦、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和二十四山、二十四节气的文化知识以及天干、地支、天学的文化知识。

七 大汶口文明

大汶口出土的玉梳及玉梳上的图案说明那时的大汶口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并将新石器时代最原始精美的太极图案雕刻在了玉梳上。

| 第五章 |

从太阳文明中诞生的凤文化

第一节 仰韶文化与菘泽文化

仰韶文化是贯穿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距今 7000～5000 年的时间，是中国考古学上发现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它大体上以豫西、晋南及关中地区为中心向周围扩散，西达甘青洮湟下游，北至内蒙古中南部、晋北、晋西北的长城沿线，东至豫东北地区，南至汉水中上游等地。从遗址分布范围的广大及稠密度等情况来看，仰韶文化当是黄河流域经过长期发展的一种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中的主体文化之一。①

从仰韶文化庙底沟护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呈现出了一幅黑鸟驮日图②，其实这就是一幅太阳鸟的图案，与其他庙底沟文化型的太阳鸟图案（图 5－2）所表达的写意都是一致的。



图 5－1 黑鸟驮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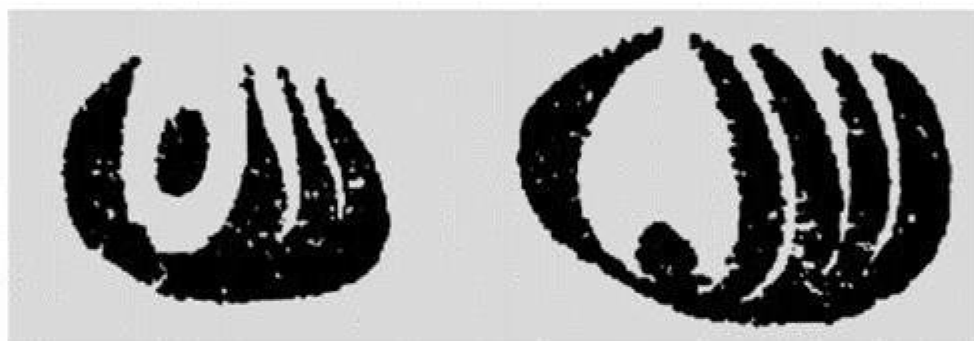


图 5－2 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图案

从这幅黑鸟驮日图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殷商末年周文王在著《周易》鼎卦时的形象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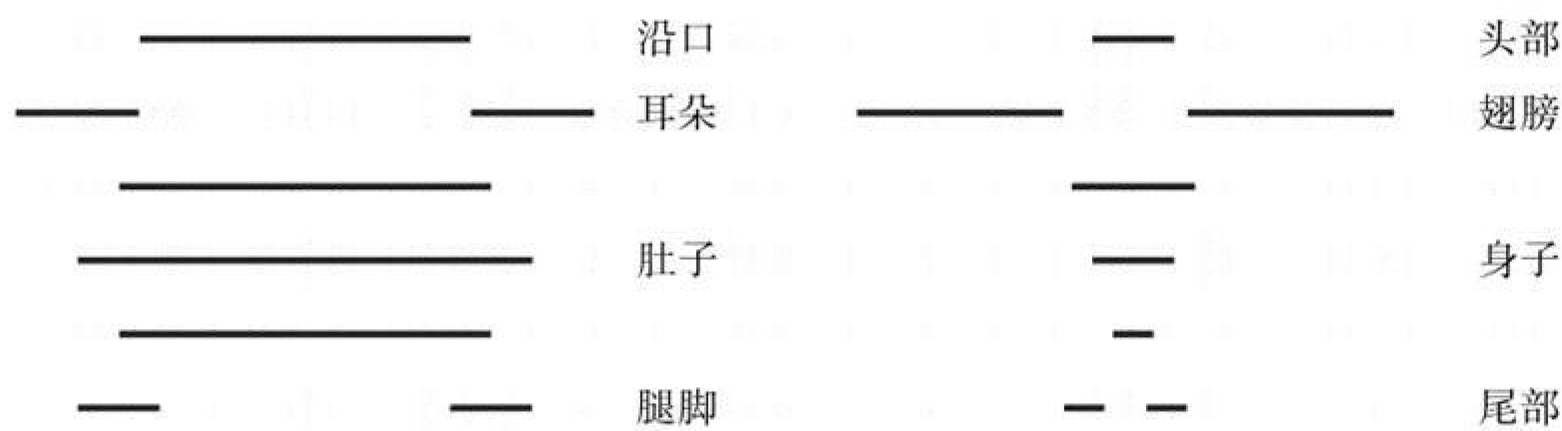
---

① 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第 104 页。

②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19 页。



符号稍作演变，就形象地变出了“鼎”和火鸟的写意。




三足鼎


火鸟

组图 5－3　鼎卦符号的写意

从鼎的形象符号上，我们既可以看出三足鸟伸展双翅驮着一团火（太阳）正在乘风飞翔升起的形象，也可以看出三足鼎伸着双耳［双翅］驮着一个圆形口盖正在屹立的形象。

这样，鼎的形象与黑鸟驮日图的写意（组图 5－3），竟用那么相似的一个鼎卦符号就表达出来了。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理论中，鼎卦的上卦为离［太阳、火焰、圆形、三数］，下卦为巽［飞鸟、大风］。而三足鼎又表达出了三点可以确定一个平面、三点可以确定一个圆环以及圆满、太阳、文明、事业、目标、成熟等之意。

这样一个形象思维的鼎卦符号，就把三足鸟驮日和三足鼎的形象给活脱脱地表达了出来。

另外，从仰韶文化其他很多遗址出土的文物图案上，也可以看出许多与太阳

鸟和太阳纹有关的写意图案。

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彩陶细颈瓶（图5－4）[①]，瓶肩上绘有一只尾巴翘起的鸟和一条高扬着头的鱼，鸟的尖嘴啄着鱼尾，鱼弧形盘曲，环游回顾，这就是有名的7000多年前的鸟鱼纹（也称龙凤纹）。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组合在一起，无疑有沟通天地、阴阳之意。这个图案与半坡文化人面鱼纹盆（图5－5）中拟人化的太阳脸之意如出一辙，人面就是无字时代的人们将太阳进行了拟人化的描述写意。另外，还有仰韶文化彩陶钵绘有的玄鸟纹（图5－6）[②]也同样表达出了太阳鸟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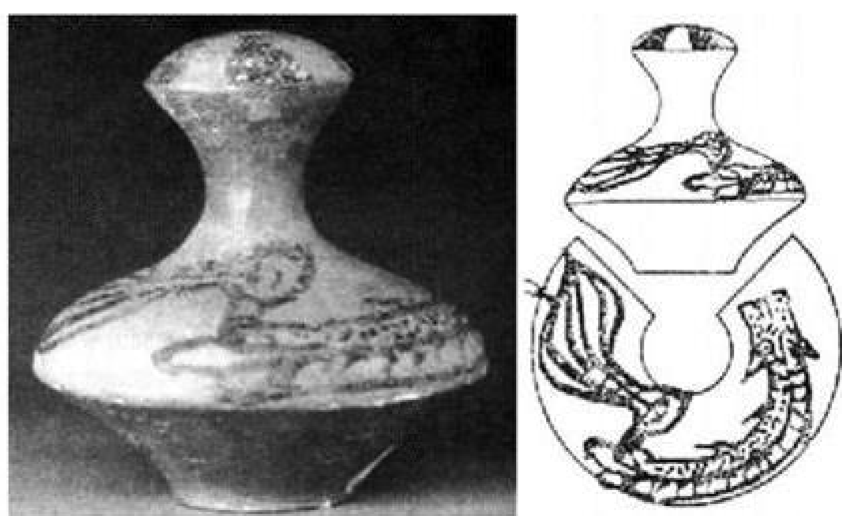


图5－4　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彩陶细颈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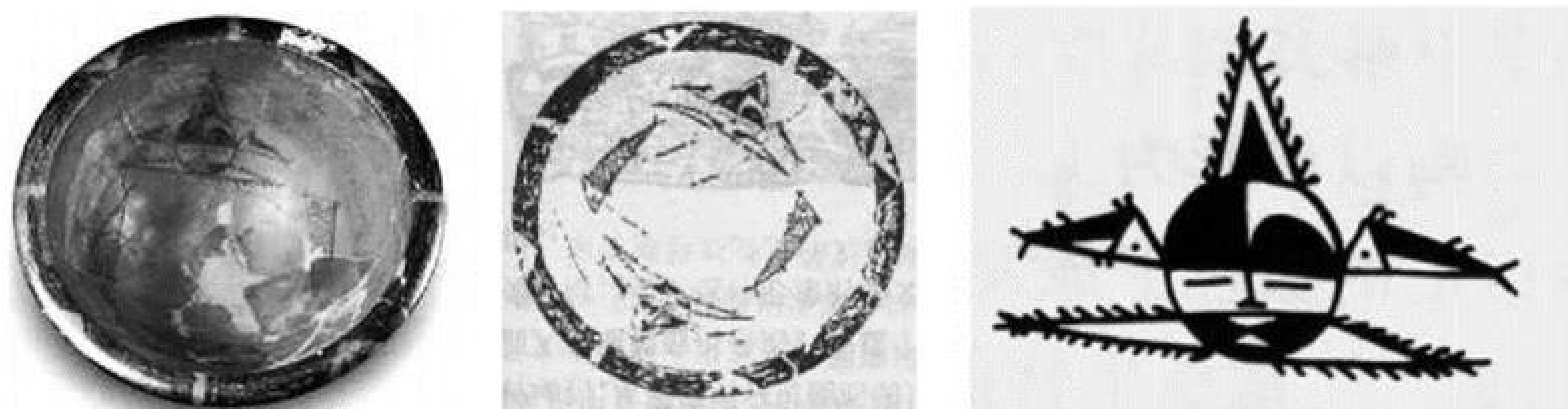


图5－5　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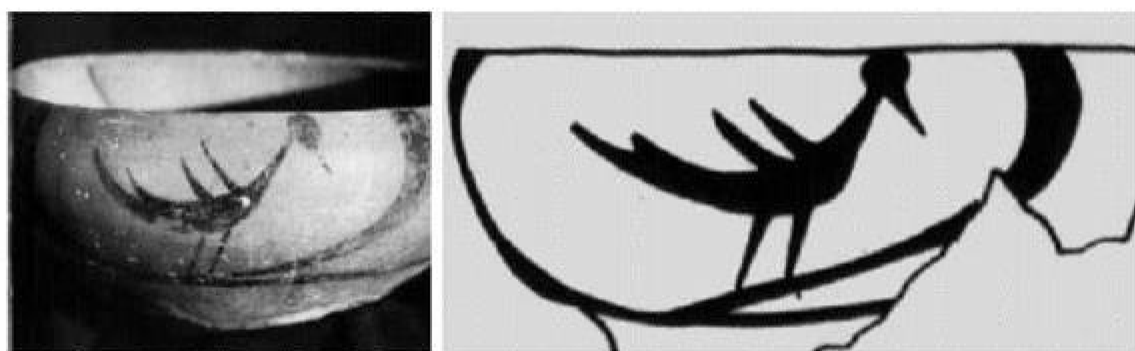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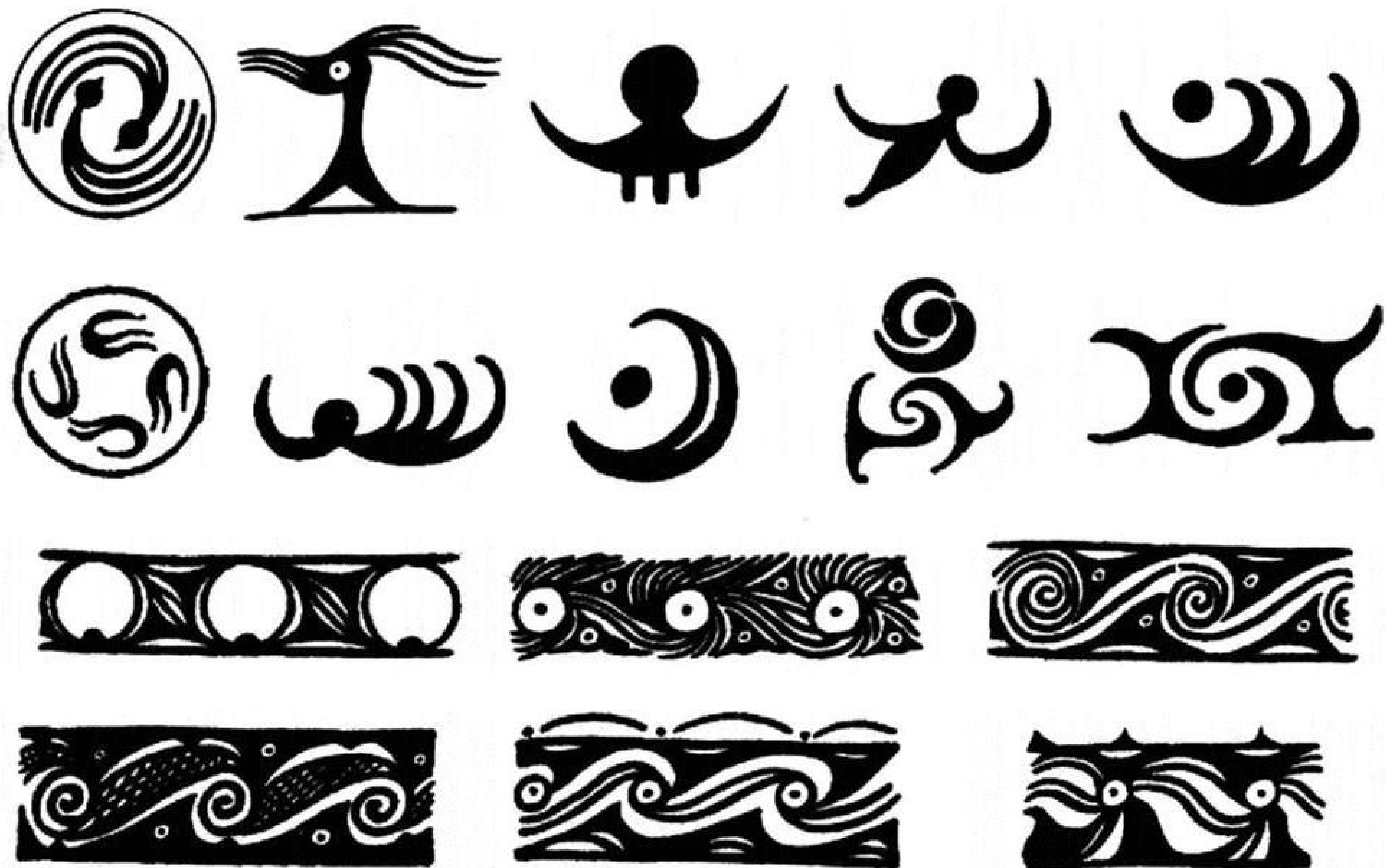


图5－6　仰韶文化彩陶钵绘有玄鸟纹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36页。
②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13页。

从大量仰韶文化时期的太阳图案（组图5－7）中[①]，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距今7000～5000年的时间里，中国远古的人们就开始了对太阳的崇拜，已经共同拥有了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概念，并且通过艺术品的写意图案体现出来。特别是组图5－7中许多极似S纹、反S纹、漩涡纹等纹饰，基本上都是后来的太极图的简式或其变形，而这组纹饰图案也只是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型大量出土的文物纹饰中筛选出来的极少一部分。



组图5－7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型

另外，在太湖青浦菘泽文化（与仰韶文化晚期部分重合，距今5800～4900年）遗址出土的陶罐瓶底上，有一幅三足太阳鸟的图案（图5－8）[②]，也反映了中国远古的古人们就开始了对太阳的崇拜，已经共同拥有了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概念，且运用到艺术品的写意图案中。



图5－8　菘泽文化的三足太阳鸟图案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48页。
②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104页。

第二节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从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500年）和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形制上①，也可以生动地看出与三足太阳鸟正在引吭而鸣的动态艺术造型是极其相似的（组图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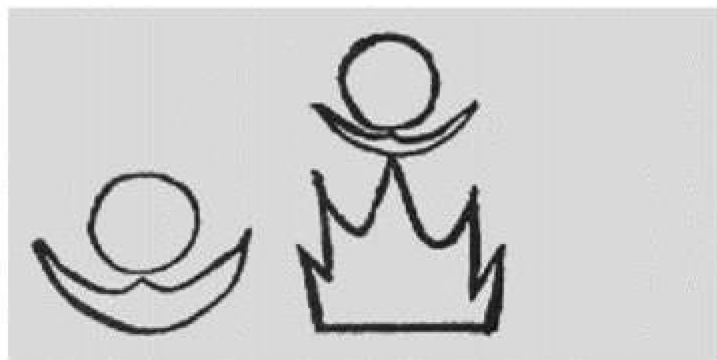


组图5-9　大汶口文化夹砂白陶鬶（左）和龙山文化黄陶实足鬶（右）与引吭对比图

这样生动的造型，既反映了中国远古的人们就开始了对太阳的崇拜，也反映出了远古的人们已经拥有了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概念，以及三点可确定出一个圆环运动轨迹、三点可确定一个平面和三足鼎立的观念。而且，他们还通过写意的手法在生活艺术品当中表现得如此完美、非常形象，让我们现代人都叹为观止。

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离卦，先天之数又恰为3，这样，三足鸟的形象与寓意就耐人寻味了。将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图5-10）与仰韶文化马家窑陶器符号（图5-11）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已经完全拥有了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希望、文明的文化观念，并且已经在生活艺术品中体现出来。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彩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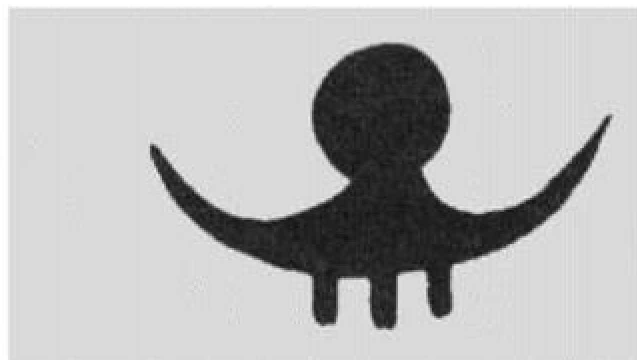


图 5-10　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图 5-11　仰韶文化马家窑陶器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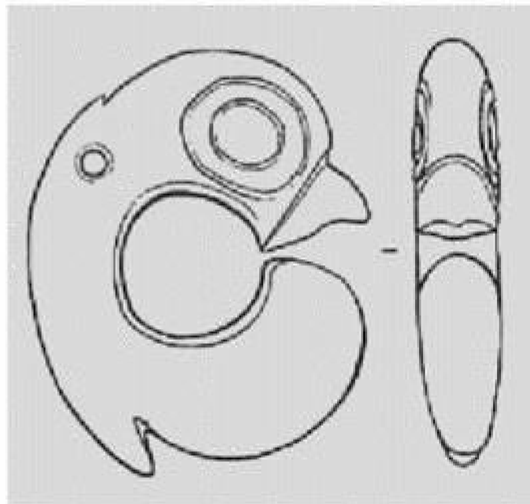
而最早的“易”字也恰恰是由日与月两字所组成的，并且“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尧典》也有“睿智文明”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

第三节　红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

一　红山文化

内蒙古巴林右旗曾出土一件属于红山文化（距今 6000～5000 年）的鸟形玉佩饰（组图 5-12）①。这件玉佩饰呈卷曲扁柱体，首尾相对地圈成一个有缺口的圆；鸟的眼睛很大，呈双重环状；额部隆起，无冠；嘴部突出，喙尖；翅尾向下，尾端秃圆；肩部有孔，供穿系佩挂。鉴于此鸟与一般的凡鸟有别，又与红山文化的玉龙造型一致，所以它是凡鸟的升华和抽象，也是表达太阳鸟运动变化的动态艺术文化造型。





组图 5-12　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的鸟形玉佩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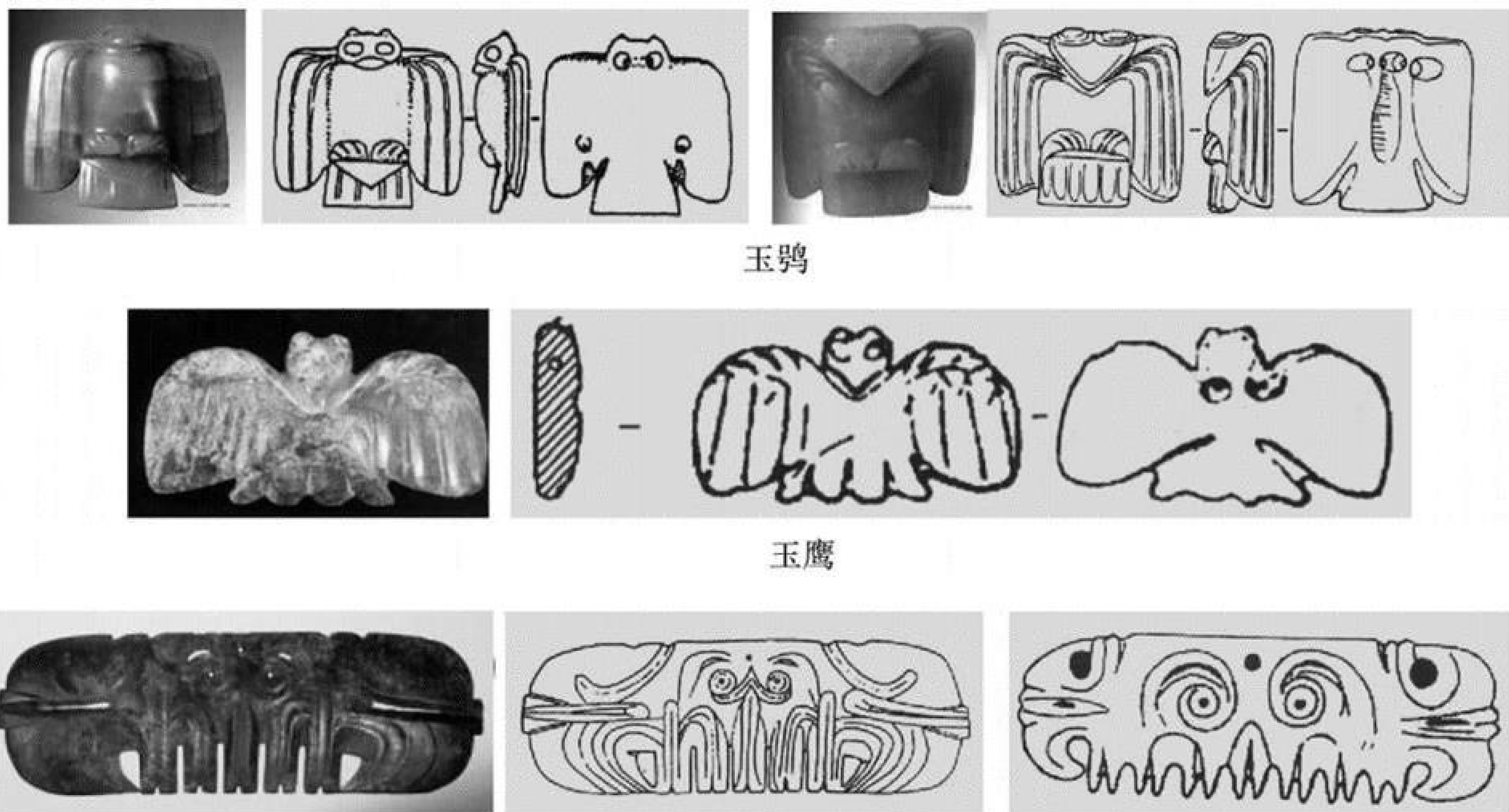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37 页。

在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4号墓，墓主人头顶放置了一件玉凤，身体和手臂处放着三个玉镯，随着墓主人的尸骨一起出土（组图5－13）。这件玉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玉凤，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组图5－13　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的尸骨和玉器

在红山文化区域的范围内，出土了许多玉鸮、玉鹰、鸮形勾云形等玉器（组图5－14）[①]，这些玉凤、玉鸮、玉鹰、鸮形勾云形等鸟的生动造型，既反映出中国远古红山地区的古人们就开始了对太阳的崇拜，也反映出他们已经拥有了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观念，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



玉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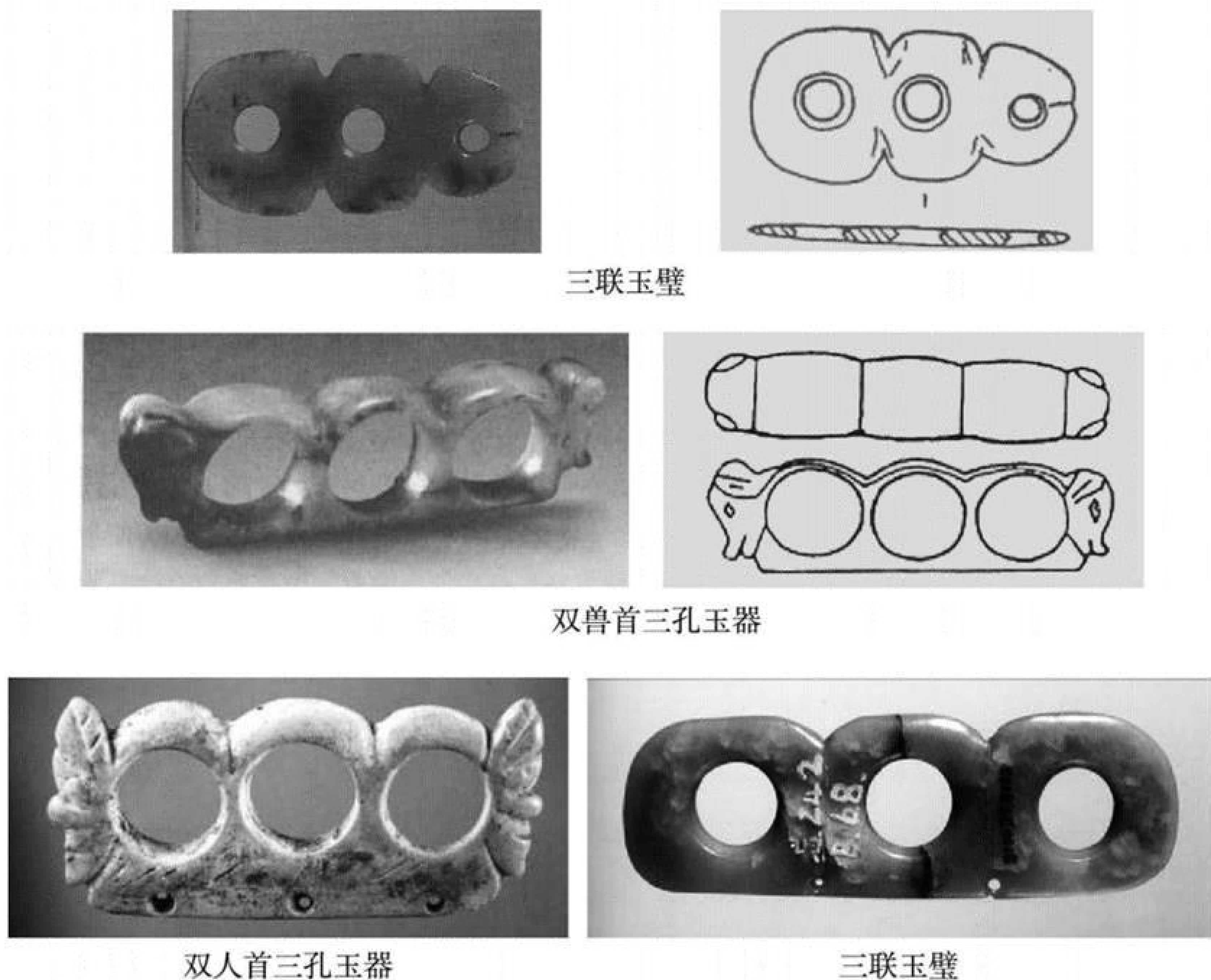
玉鹰

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1号冢第27号墓出土的鸮形勾云形玉器　　弗利尔美术馆的鸮形勾云形玉器藏品

组图5－14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341、276、349、280、362、350、270、271页。

在红山文化区域的范围内，出土的各种三孔玉器和三联玉璧等玉器（组图 5－15）①，笔者认为这样的三个圆孔与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柄端的三个圆孔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三个圆孔连在一起既代表日月星的意思，也代表了日出升、日中天、日落的意思。它既反映了红山地区的古人们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对天学的基本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太阳运动规律的基本认识。


三联玉璧

双兽首三孔玉器

双人首三孔玉器　　三联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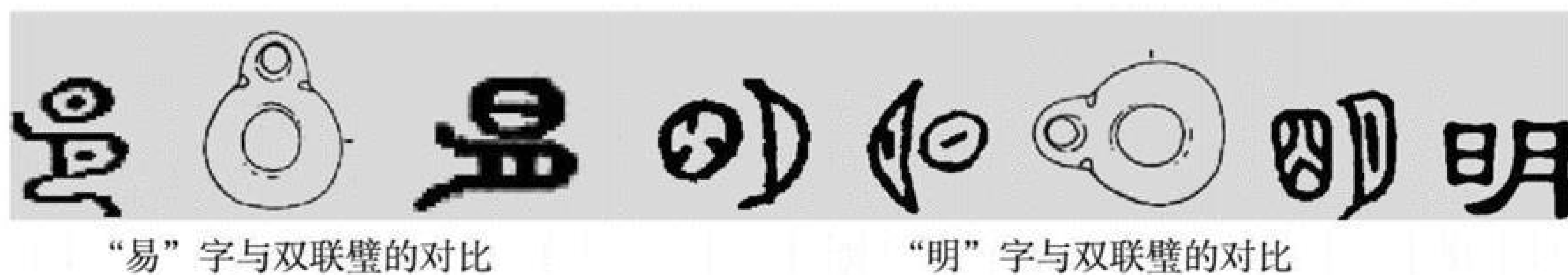
组图 5－15　三孔玉器和三联玉璧等玉器

特别是在红山文化区域的范围内出土的双联玉璧（组图 5－16），笔者认为这个双联玉璧既是日月和中国早期“易”字的生动造型，也是中国早期“文明”中“明”字的生动造型。它既反映了红山地区的古人们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明白了日月的变化在大自然中具有自然运动的法则和客观变化的规律，也反映出了他们已经拥有了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观念，表现了他们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279、3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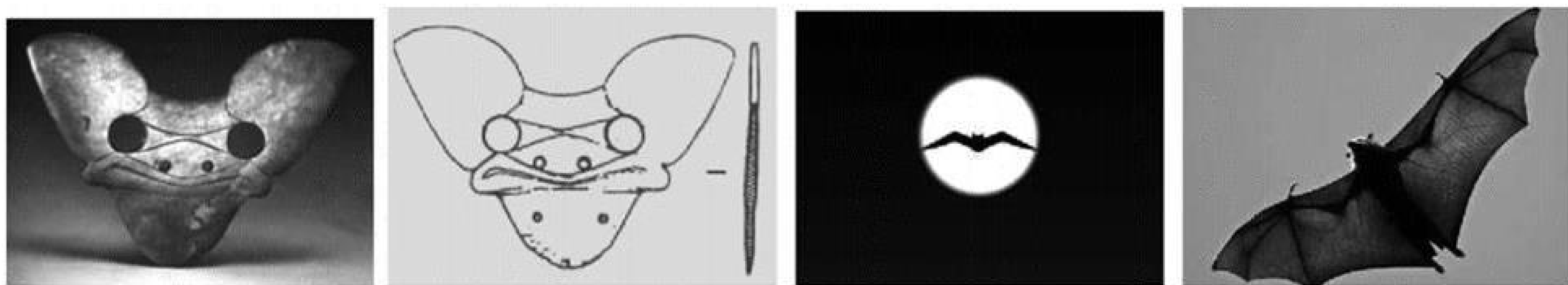
红山文化时期的双联璧与日月同辉的情景对比



“易”字与双联璧的对比　　“明”字与双联璧的对比

组图 5-16

在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中，有一件兽面玉器酷似蝙蝠的面部（组图5-17）[①]。我们都知道蝙蝠是在夜间和天空活动飞翔的动物，它的头部与老鼠的头部非常相似，而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鼠既为子，也为黑夜，还为月，这样我们一下就把这件酷似蝙蝠面部的兽面玉器与黑夜和月光联系在了一起。它反映出了中国红山地区的古人们在5000年前的远古就有了对光明的渴望和对文明的追求，就像人们在黑夜里对月光和光明的渴望一样。只不过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又取谐音，将蝠与福（福气）也联系了起来。



组图 5-17　兽面玉器

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出土的玉璜（图5-18）[②]，也是用形象思维在表达易学基础知识里夏至这一天太阳的日出点与日落点形成的半合火局或六合火局，即寅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276页。

②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276页。

(日出点)戌(日落点)合化火(太阳、光明、光亮、白昼、文明)与卯(东方日出)戌(西方日落)合化火(太阳、光明、光亮、白昼、文明),表达出了“合”的意思。同时,也与太阳鸟用两个翅膀在进行展翅高飞的造型非常相似。所以,笔者认为在红山文化中的玉鸟与玉璜一样,实际也都是在表现太阳鸟和太阳鸟展翅高飞的造型,表现了他们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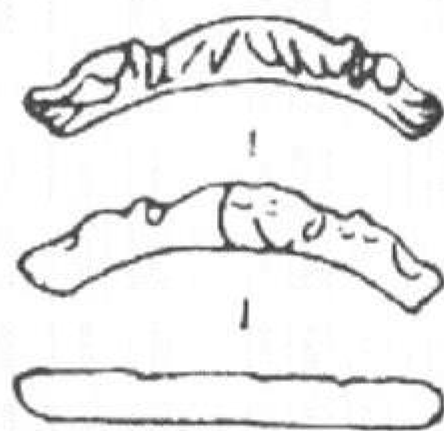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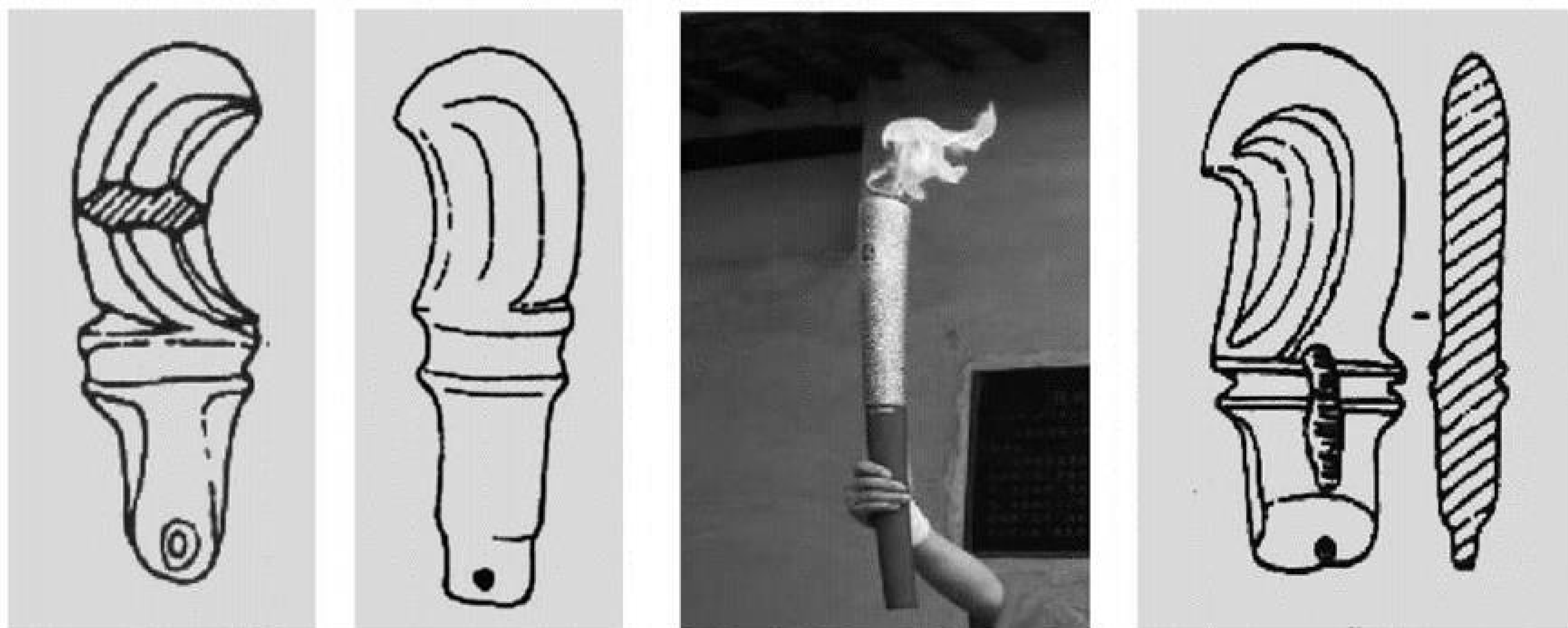


图5-18 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璜

在红山文化区域的范围内,出土了一些钩形器(组图5-19)①,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些钩形器的造型,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柄把,整体酷似一个点燃的火把。既然它们都在墓葬中出现,那么我们一下就与现代殡葬墓穴中的长明灯联系在了一起。它同样反映出了中国红山地区的古人们在那时就有了希望死者在阴间也需要光明照亮人生之路的想法,这也是他们对火与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的另外一种具体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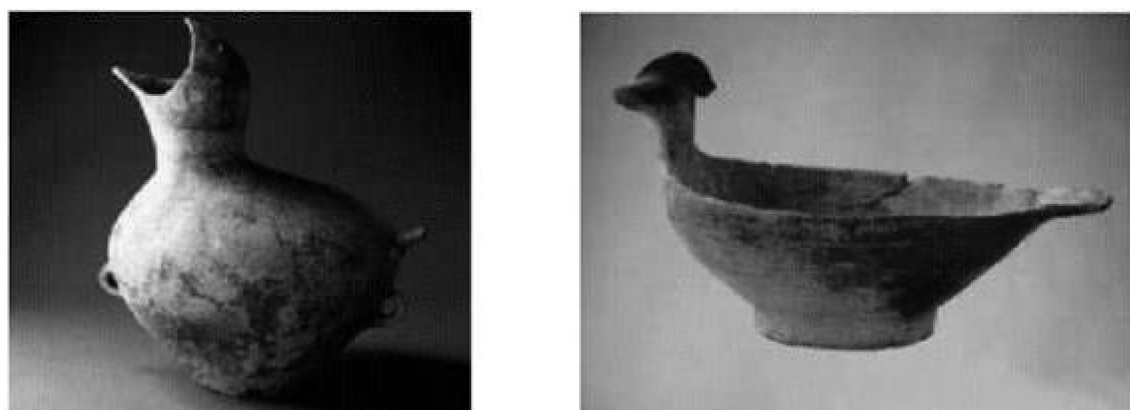


组图5-19 红山文化时期的钩形器与火把对比图

从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仿鸟形陶壶和凤形陶杯(组图5-20)形制上,也可以生动地看出鸟儿正在引颈高歌和漫游的动态艺术造型。这样生动的造型,也反映出了红山地区的古人们对太阳鸟的崇拜,并且能用写意的手法在生活艺术品当中表现得如此完美、非常形象,让我们也叹为观止。

原始的文明与宗教、祭祀、祈祷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人和凌家滩出土的玉人与现代鄂伦春族萨满神偶作一下比较(组图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350、270、2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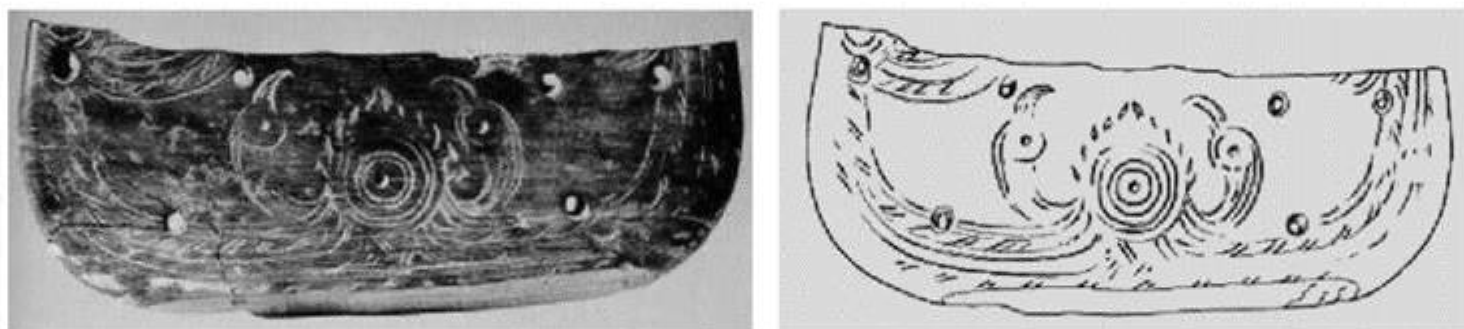


组图 5－20　红山文化的仿鸟形陶壶和凤形陶杯

4－17)，再把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和玉凤结合在一起来看，就会豁然开朗：原来那时红山地区和凌家滩地区的古人们，以及他们所信奉的萨满教，其实都是与中国最古老的文化文明体系——易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　河姆渡文化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象牙蝶形器（组图 5－21）[①] 上，刻着连体双鸟朝阳纹图案。出土的连体鸟纹骨匕柄上（图 5－22）[②]，刻着两组连体鸟纹的翘头图案。从图案的形态上也可以看出，河姆渡人是在表达寅午戌三合火局（太阳的运动）的意思。这实际也是河姆渡人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第四期文化玛瑙璜（图 5－23）[③] 的造型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组图 5－21　象牙蝶形器上的连体双鸟朝阳纹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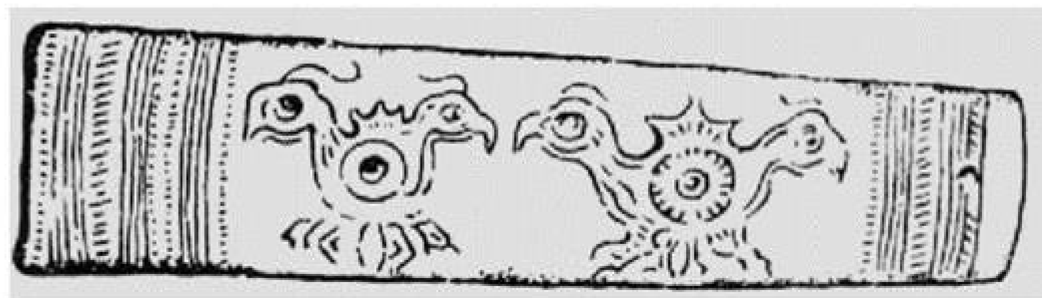


图 5－22　骨匕柄上的两组连体鸟纹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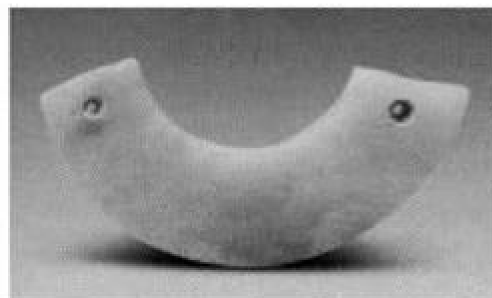


图 5－23　第四期文化玛瑙璜

①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彩页、第 47 页。
②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彩页、第 88 页。
③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彩页、第 7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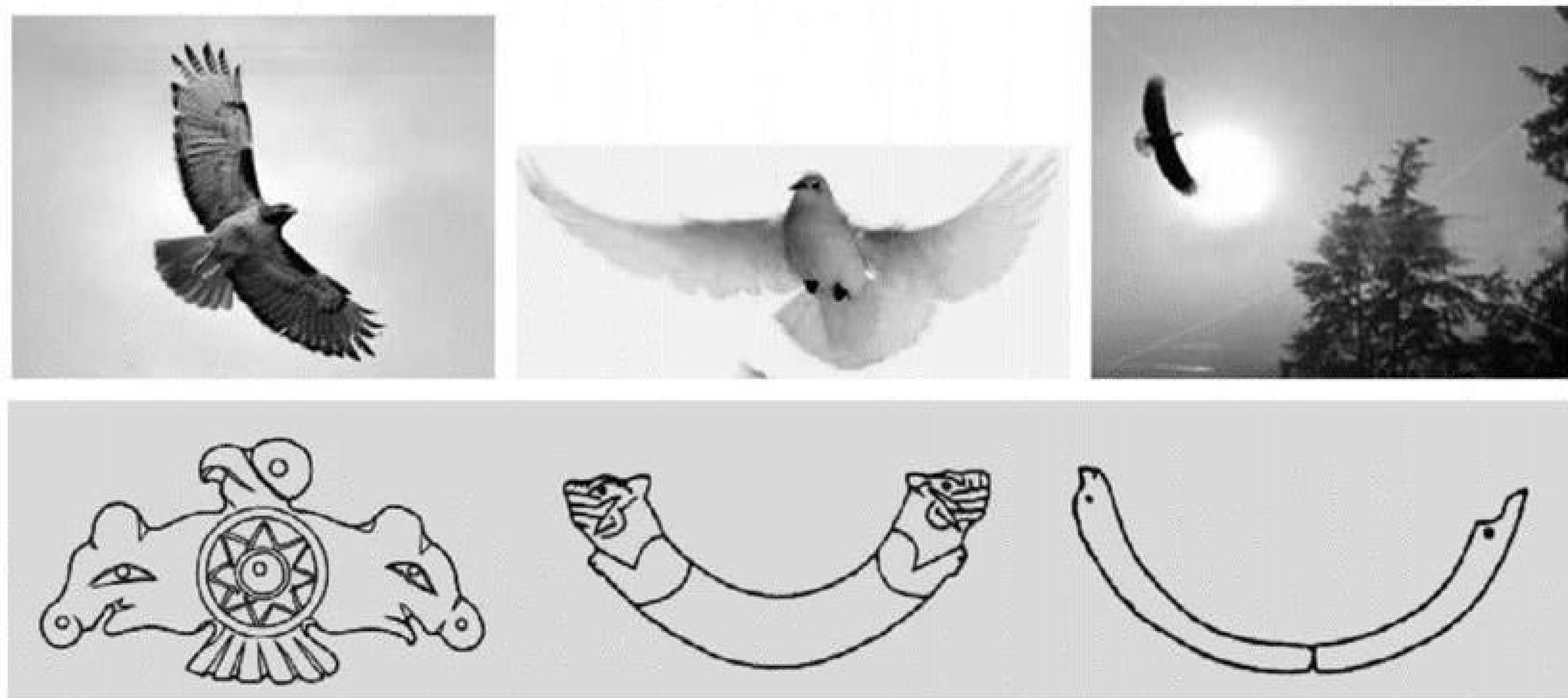
在河姆渡出土的陶豆盘（图2－9）中，有一个豆盘内带有抽象的四鸟日纹图案。金文馨先生认为四鸟日纹图案是原始八卦的先声，是河姆渡先民原始历法的写实。其实，河姆渡地区的先民早在距今7000～6500年前就已经有了太阳鸟的文化观念，并且将太阳所做的圆周运动成功地表现在了生活必需品和艺术中。

而从宁波傅家山遗址出土的河姆渡文化装饰器物中，出现最多的是鸟的形象。尤其是一块象牙雕鹰头（图2－8），两面雕凿，宽鼻钩喙，双眼圆睁，形象极其凶猛，其中曲线的圆润光滑令观者无不赞叹，说明早在7000年前的宁波傅家山人就已经具有了太阳鸟的文化观念。

第四节　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

一　凌家滩文化

在凌家滩出土的玉鹰和玉璜（组图5－24），也都表现出了太阳鸟和太阳鸟展翅高飞的造型。



组图5－24　凌家滩出土的玉鹰和玉璜

二　良渚文化

在良渚文化中，出土的冠状物、玉璜（组图4－37）这两种既形象又抽

象的玉器，与玉鸟所要表达的意思也都是一致的，与凌家滩的玉鹰和玉璜一样，都表达的是寅午戌三合火局（太阳），以及三点可确定出一个圆环运动轨迹的观念，这也是良渚人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

在浙江吴兴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带盖壶上，绘有一幅三足走凤图（图 5-25）[①]。该凤纹的各个部分都做了变形处理，变成了三角形头、长方形颈、梯形加流线型翼、扫帚状尾、方头足的几何图形。这只凤一边雄赳赳、气昂昂地展翅向前迈步，一边回头反顾着既像太阳或火焰似的翅膀，同时又像自己驮着一个太阳和一团火焰。这个既像太阳又像翅膀的图案又极似一只正在瞪着的大眼睛。

在上海青浦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琮上，有一组兽面四凤纹（图 5-26）[②]。兽面做了非常夸张的处理，以两个大的圆圈表示出了一对正在瞪着的大眼睛，两边的四凤也很别致地扬头展翅，身尾蜷成一个线团状或太阳状。



图 5-25　草鞋山墓葬出土的三足走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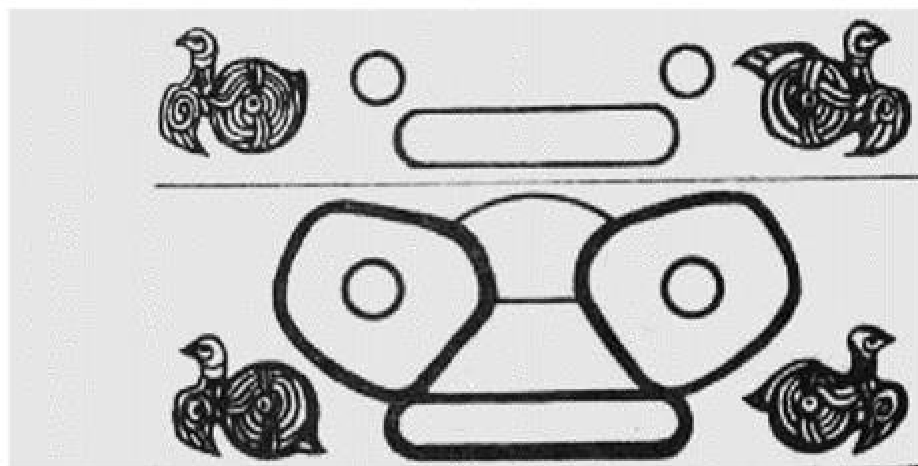


图 5-26　上海青浦墓葬出土的一组兽面四凤纹

笔者认为，在中国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火焰、太阳、眼睛、飞鸟、亮丽都归类在离卦中，而且人体部位中只有眼睛最亮丽，就像大自然中的火焰与太阳一样。这也是良渚人用易学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了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

三　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距今 4600～4000 年，因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此地有一个多达 50 处的大规模遗址群。该文化已经发现有铜块、玉器和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一个文明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106 页。

②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106 页。

时代。

该遗址曾出土一件透雕凤形玉佩（图5－27）[①]，图案竟与后来甲骨文中出现的各种“凤”字形象（图5－28）[②] 几乎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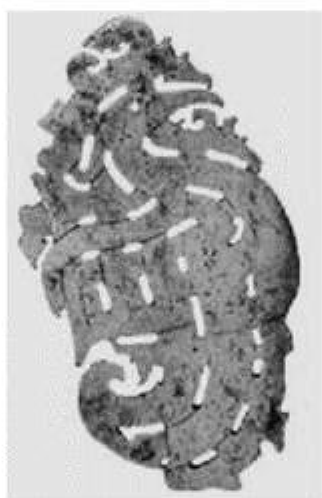


图5－27　石家河文化的透雕凤形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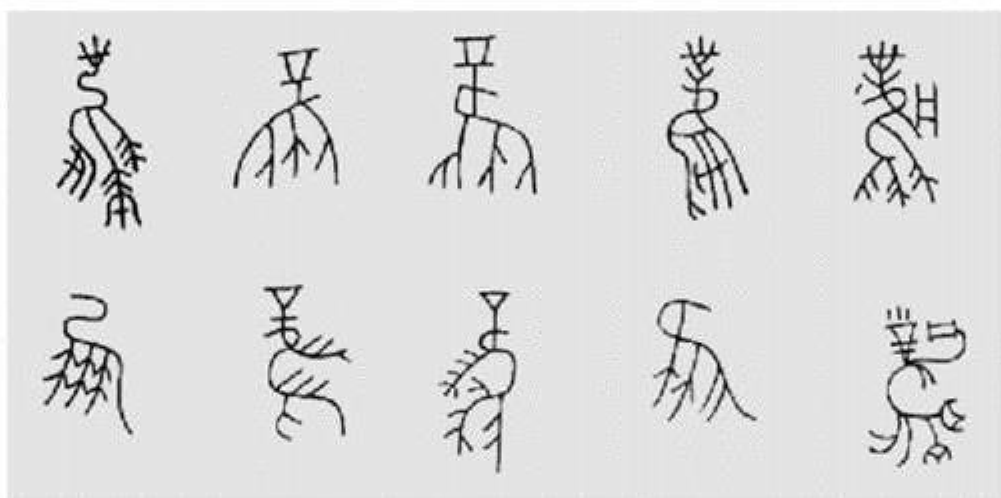


图5－28　甲骨文中出现的各种“凤”字

第五节　商周文化

一　三星堆文明

1980年，在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广汉南兴镇的三座黄土堆下，出土了一座城池遗址和大量的青铜器。据专家认为，其遗址的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它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古巴国文化，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被称为三星堆文明。

在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古巴蜀凤鸟形青铜器、铜眼形器以及铜鸡、铜鸟头和铜太阳形器（组图5－29），也充分显现出了古巴蜀地区的文化文明与中国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火焰、太阳、眼睛、飞鸟、亮丽都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所以，笔者认为这也是古巴蜀人在应用易学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了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渴望，对文明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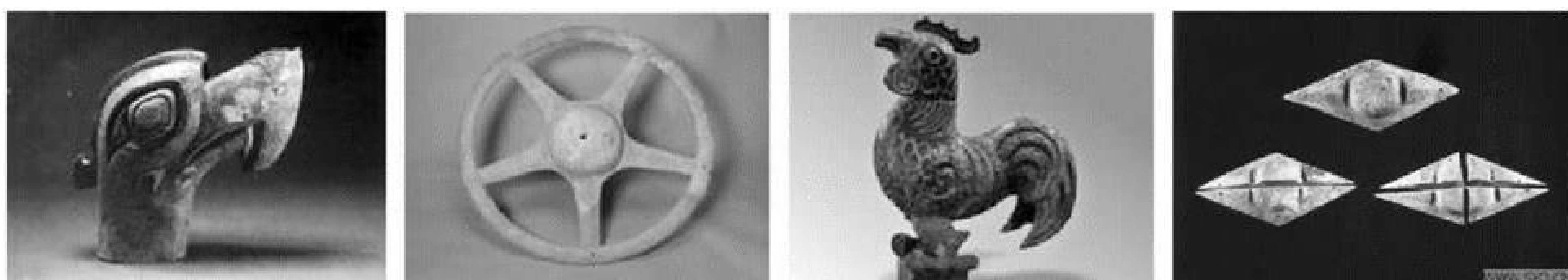
---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107页。

②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90页。



三星堆出土的古巴蜀凤鸟形青铜器



铜鸟头　　铜太阳形器　　铜鸡　　三星堆青铜眼睛

组图 5－29

二　金沙遗址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从金沙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达千余件，包括：金器 30 余件、玉器和铜器各 400 余件、石器 170 件、象牙器 40 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金沙遗址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 17 世纪初～前 11 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 11 世纪～前 771 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 年～前 476 年）。

2001 年，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四鸟绕日金饰。此金饰外径 12.5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厚 0.02 厘米，重 20 克。其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 12 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的相同的鸟构成。头、爪较大，颈、腿长且粗，身体较小，翅膀尤其短小。张开的喙微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四鸟等距离分布于内层漩涡纹的周围，首足前后相接，向着同一方向飞行，飞行的方向与内层漩涡旋转的方向相反。

如果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这幅图案，该太阳神鸟金饰的内层图案就像是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有关专家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研究者指出，太阳神鸟金饰以

简练生动的图像语言，透露了有关古蜀国太阳神话传说的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古蜀国极为盛行的太阳崇拜习俗。

这幅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像是空中旋转的火球或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图案，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漩涡就如同一个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而且四只飞行的神鸟还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

2005 年 8 月 16 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宣布，采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组图 5 - 30）[①]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组图 5 - 30　太阳神鸟图案

其实该金饰图案上的太阳神鸟，就是在表现中国易学文化中八卦里的离卦。12 条弧形齿状芒饰也是在明确表示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四只等距分布逆向飞翔的鸟，则表达了太阳自身的运动和一年中的四季。这是古代先民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然与太阳的崇拜，对光明与希望的向往，对文明的追求。

另外，在此遗址还出土了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通长 6. 6、通高 5. 1 厘米、重 67 克的铜尖喙鸟（图 5 - 31），也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了古人对自然与太阳的崇拜，对光明与希望的向往，对文明的追求。



图 5 - 31　铜尖喙鸟

专家们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目前推测它的性质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

---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50 页。

另外，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遗址中的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三 殷墟文明

殷墟是商朝盘庚至纣的王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自清朝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起，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陆续挖掘出土了一批批殷商时期刻在龟甲上的中国最古老的系统汉字——甲骨文。从 1928 年起，考古工作者经过近 60 年的挖掘，从 10 多万片大量带文字的甲骨文片中，整理出了约 4500 个单字，基本具备了汉字的结构，这些文字都用于了内容丰富的卜辞记录刻写。

在商朝，除了甲骨文以外，所发现的文字记录还有金文（铭文、钟鼎文）、陶文、简册和帛书等，所以周人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具有系统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

甲骨文是中国古人最早在殷商时期就系统地采用了文字用于记录国家大事的铁证，而古汉字中的天干和地支则是在记录国家大事的时间日期时所必不可少的文字，其中的六十甲子表（图 5－32）[①] 就是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天干循环六次和地支循环五次组合起来的产物。



图 5－32 从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六十甲子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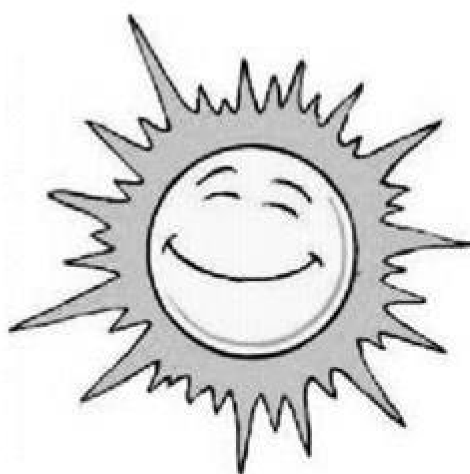
① 许钦彬：《易学与汉语关系论稿》，齐鲁书社，2008，第 33 页。

在殷商末年，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的西伯侯周文王，历经艰难险阻，冒着随时被杀头的危险刻苦钻研易学，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反复推演八卦，最终著成了中国最伟大的第一部经典之作——《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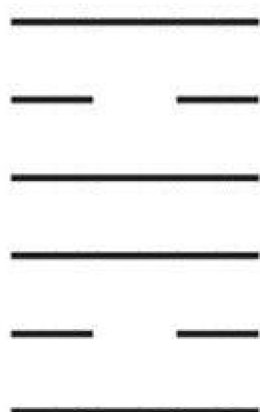
《周易》这部书，是古人根据大自然中平衡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通过人的左脑控制逻辑思维、右脑控制形象思维的规律，以及阴阳、左右、平衡、和谐的原理，把八卦两两互相组合而成了六十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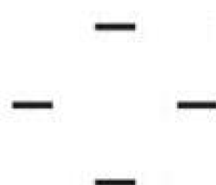
《周易》可以用于占卜，里面有一个罗［离］卦，描述的就是太阳的运动法则，以及从宇宙大自然中太阳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总结出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组图 5 – 33)。

罗［离］



形象符号　　太阳写意　　网罗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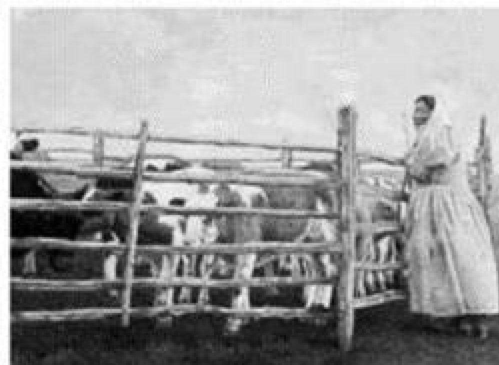












组图 5 – 33　离卦符号的自然写意

卦辞：

罗［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的光芒四射，就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网罗各方。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是有利的征兆，亨通啊！就像畜养的母牛一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这种奉献的精神其实就像网罟一样，以此为用，就像利用围栏畜养牝牛一样，吉利呀。

罗［离］（主体现象）

▬▬▬▬ 兄弟己巳火　世

▬ ▬ 子孙己未土

▬▬▬▬ 妻财己酉金

▬▬▬▬ 官鬼己亥水　应

▬ ▬ 子孙己丑土

▬▬▬▬ 父母己卯木

罗［离］卦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共同写意了一个自然现象——太阳和它的光线，对卦辞要应用中国古人左脑的逻辑思维和右脑的形象思维方式来准确解读。其核心之意就是，只要你拥有像太阳一样的文明去舍得、释放、付出了，就能够像太阳的光线一样，网罗、控制、掌握住一切，这是人类非常需要的文明法则和规律。这也是商周时代的人们对自然与太阳的崇拜，对光明与希望的向往，对美好文明的追求。

四　商周青铜文明

商代也是青铜器走向繁盛的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相比，青铜器的出现，反映了生产力的进步。而青铜器上的纹饰，也从原始彩陶上的比较民间化的粗放、简约、朴拙、自然，转向了规整、庄严、细腻的方向。

商代乃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凤纹图案，大多都是一足、瞠目、卷尾的形象，因而被称为夔凤（组图5－34、图5－35、组图5－36、图5－37）。[①②③④] 其实，这实际还是古人用易学文化中形象思维的方式在描述太阳鸟，是商周时代的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108、109页。

② 杜久明主编《中国殷墟》，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第248页。

③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111页。

④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113页。

人们对自然与太阳的崇拜，对光明与希望的向往，是对文明的追求。





组图 5－34　商代父乙簋和其他一些青铜器上的夔凤纹



组图 5－35　殷墟出土的玉长冠鸟



图 5－36　西周凤纹丰尊



图 5－37　春秋凤纹尊

从商代的玉凤（图 5－38）[①] 造型上，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②]（图 5－39）形象。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凤鸟、靓丽［亮丽］就被归在离卦中，实际还是古人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了中国殷商时期的古人对太阳鸟的崇拜，对希望与文明的追求。



图 5－38　商代玉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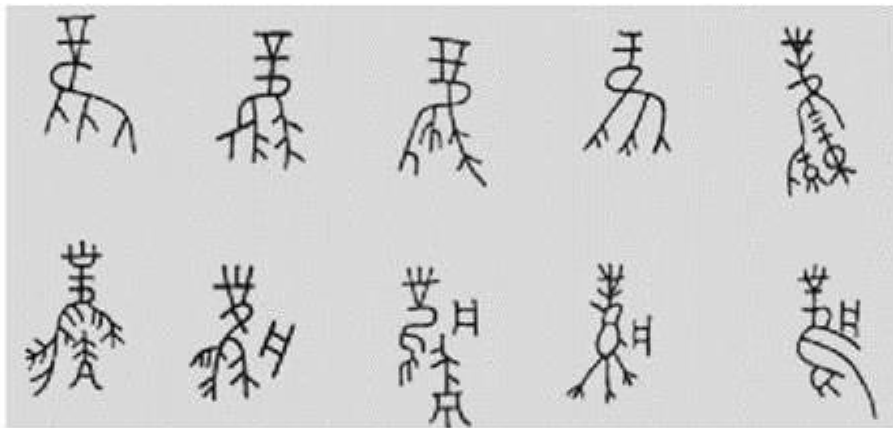


图 5－39　甲骨文中的“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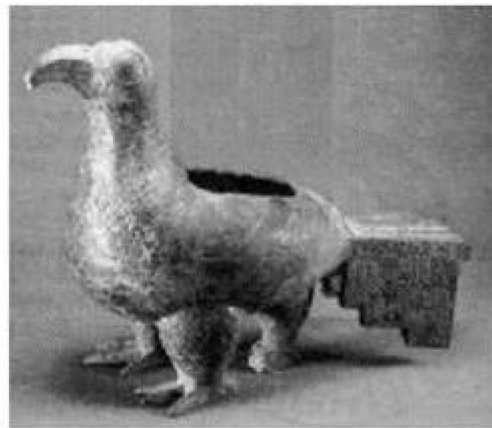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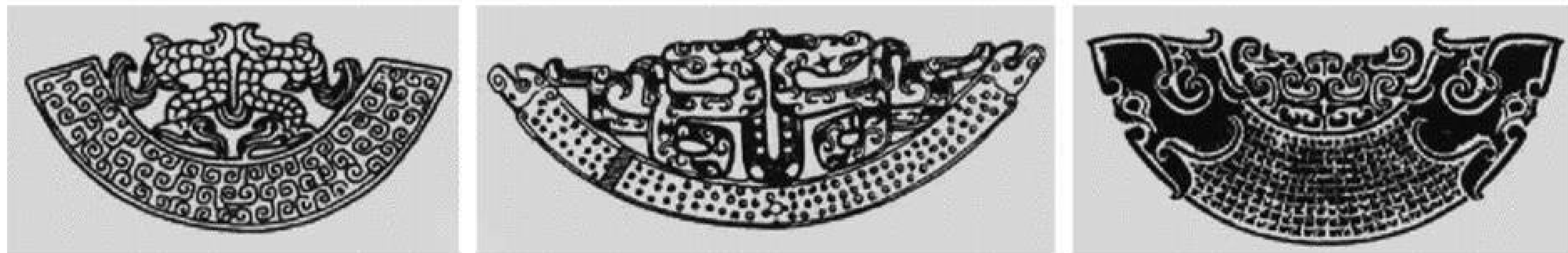


图 5－40　西周三足乌尊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110 页。

②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90 页。

西周的三足乌尊（图5－40）[①]，也是人们拟人化地将太阳变成了三足太阳鸟铜器，以及三点可确定一个平面的概念。西周的玉珩（组图5－41）[②]，就是人们拟人化地突出了飞鸟的两只展翅，巧妙地隐含了飞鸟的头部，将太阳夸张地变成了展翅飞翔的太阳鸟玉器，以及三点可确定出一个圆环运动轨迹的概念。实际还是古人用易学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了中国西周时期的古人对太阳鸟的崇拜，对希望与文明的追求。



组图5－41　展翅飞翔的太阳鸟玉珩

五　狮子山遗址

1982年，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遗址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即306号墓。该墓出土了铜鼎、铜罐、铜豆等一批青铜器，其中的一件铜质房屋模型是此墓最珍贵的随葬品，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音乐、建筑、宗教信仰等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铜屋通高17厘米、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平面作长方形，三开间，进深三间。正面敞开，无墙和门，仅立圆形明柱两根。屋顶、后墙及四阶均饰勾连回纹。八角柱各面S形勾连云纹，柱顶为一大尾之鸟。室内跽坐六人，作演奏状。此器是罕见的先秦青铜房屋模型，专家称之为春秋伎乐铜屋（组图5－42）。



组图5－42　春秋伎乐铜屋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52页。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56页。

古人对金属统称“金”，青铜器称为“吉金”，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这件青铜器作品，不是一般的房屋，是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制度拟仿写真，是青铜器中的精品，纹饰多以云气纹象征精神如音乐般不灭，流连天地人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从房屋形制上看，高耸的屋顶，似一个冠的束发之带，具有明显的西周风格，顶部的一只鸟雀造型又似凤鸟向天鸣，明显具有凤鸟崇拜的特征。房屋为竹木结构，装饰样式为竹编窗棂，柱子划出房屋的三开间，即正房、左右偏房，这是一种中规中矩的中国式房屋营造法式。

里面的六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屋顶有一只凤鸟，音乐为鸣凤之音，象征着凤鸾和鸣，乐器有凤吹（指笛、笙、箫一类的管乐器）、凤管（指笙）、凤箫（古管乐器名，即排箫）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交流开放、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百工发达、百家争鸣的时期。周朝的文化主要体现在礼和乐上，从《诗》《书》《礼》《乐》《易》《春秋》上也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人们是非常注重音乐的。

第六节　汉唐及以后的文化

一　器皿

古代的人们深受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的影响，直到汉、唐时期，人们还在用易学系统文化中形象思维的方式，沿用着三足鸟的形象[①]（组图 5－43）来比喻太阳，比喻人们在向往着光明与未来、希望与文明。


汉代三足鸟画像石


汉代三足鸟图案


唐代三足鸟

组图 5－43　汉唐时的三足鸟形象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53、160、161 页。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四方中的南方和四季中的夏天，都被归纳进了离卦，从汉代的四神纹（图 5－44）[①] 和南方朱雀图（图 5－45）[②] 中就可以看出，只要用一只鸟就可以完全概括表达出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离卦里的火、太阳、南方、夏天、亮丽、白昼、希望与文明等意。


图 5－44　汉代四神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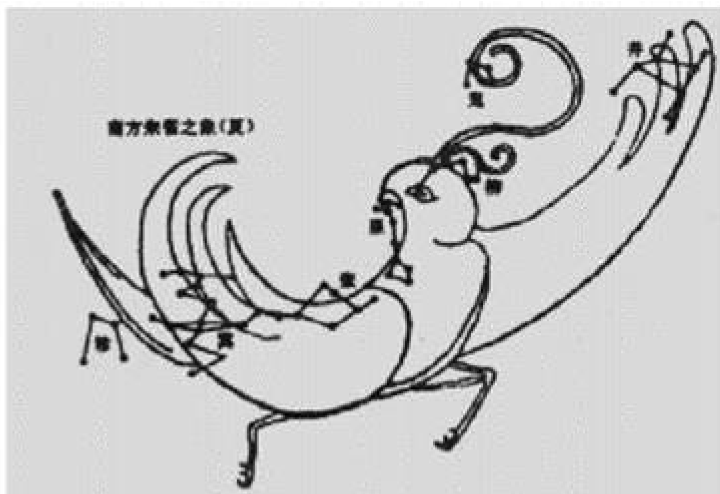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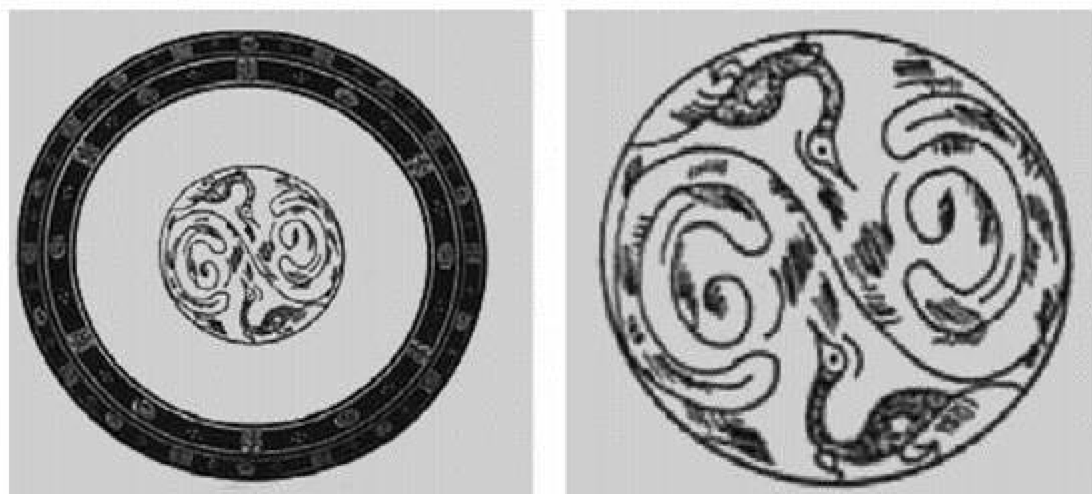


图 5－45　南方朱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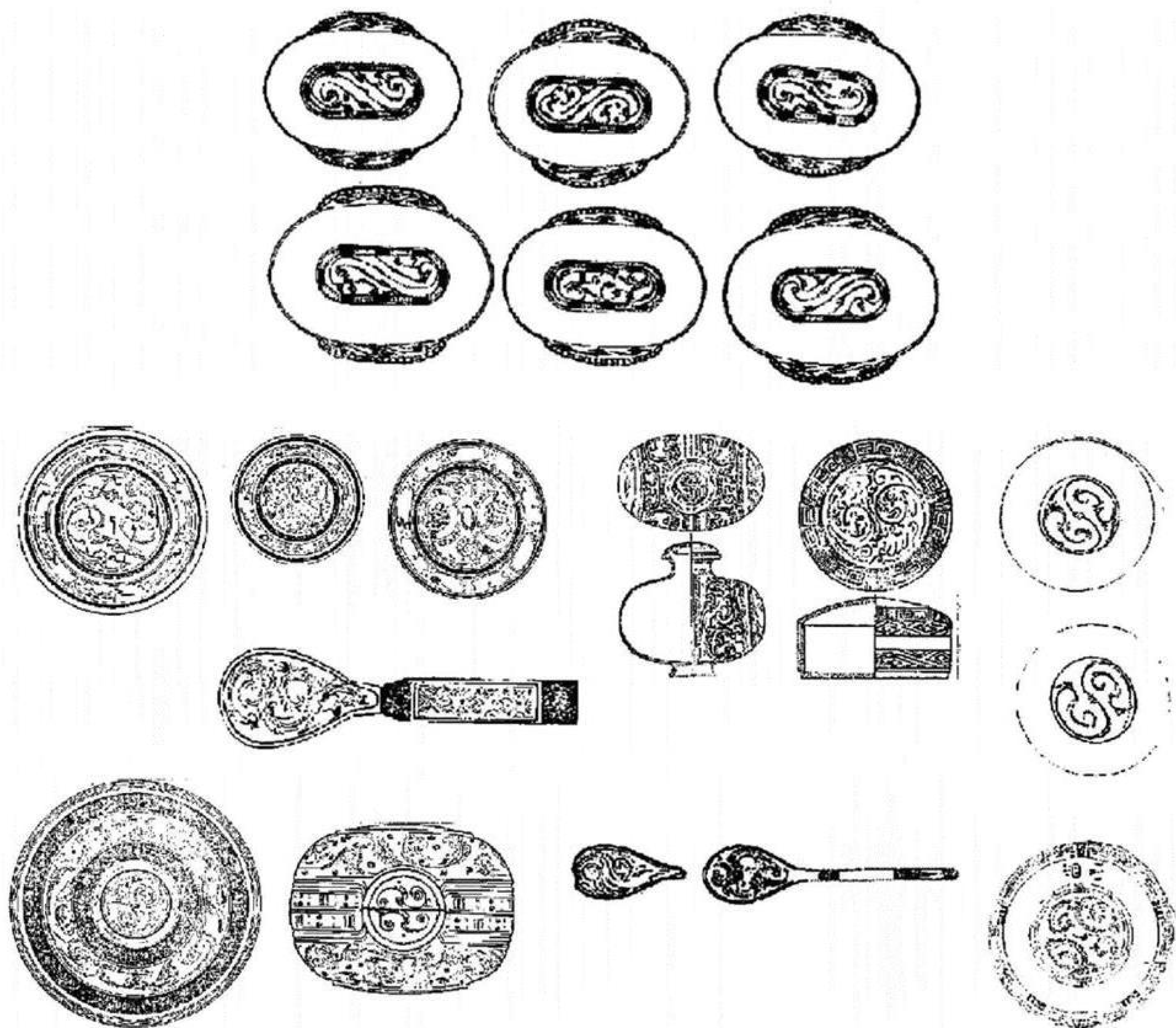
1995 年 3 月至 7 月由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绵阳市博物馆联合发掘，从绵阳永兴双包山西汉 2 号木椁墓出土了西汉时期绘有太极图的木胎漆盘共 20 件。该墓下葬的年代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前，距今已有 2100 多年，绵阳出土的这件西汉木胎漆盘和西汉时期的太极图样式对中国古老的易学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具有重大的历史及学术价值和意义。

组图 5－46 右图绘于木胎漆盘的内底中央，整体上为圆形的太极图，又由“S”形曲线分为阴阳两仪，该图以耳朵形象为基本造型，对称的阴阳两仪部分极形似为两个耳形，在两个耳形的耳垂部分又构画两只凤鸟，凤鸟头部、眼睛、尖嘴均指向耳朵漩涡中心，呈互相呼应之势，从中可以看出凤鸟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所占有的位置和分量。


组图 5－46　永兴双包山西汉 2 号木椁墓出土的绘有太极图的木胎漆盘及中心放大图

①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第 121 页。
② 常秉义：《周易与历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第 193 页。

这与史前时代至历史时期许多器物、遗迹上的S纹、反S纹、漩涡纹大多是太极图的简式或其变形的样式就连续对应了起来。目前发现在已经出土的汉代的许多漆器中（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的漆器、江苏邗江姚庄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安徽霍山出土的漆器、湖北云梦睡地虎出土的漆勺等），上面都带有这种形似太极图变形或简似的S纹、反S纹、漩涡纹（组图5－47）。



组图5－47　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绘有S纹、反S纹、漩涡纹的太极图案漆器

二　建筑

汉阙是汉代的一种纪念性建筑，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表建筑，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堪称国宝级文物，因此有石质“汉书”之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

汉阙成对地建在城门或建筑群大门外，常置于帝王所居的宫门前面，用于表

示威仪。它常是两个一组，因左右分列且分立于行道两旁，两者之间并没有建筑物连接，中间形成缺口，当中阙然，故称阙（古代“阙”、“缺”通用）。阙实质上是立在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一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小建筑，每阙由正阙和副阙组成，各阙一般由阙基、阙身、阙顶三部分组成。它的雏形是古代墙门豁口两侧的岗楼，在人们能够建造大型门屋后，便演变成门外侧的威仪性建筑，防御功能逐渐减弱。据文献记载，西周时已有阙，现存最早的遗物是汉代的，是了解汉代建筑的珍贵资料。

现存汉阙主要有：河南登封县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山东济宁市嘉祥武氏阙，四川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四川绵阳市平阳府君阙、雅安县高颐阙、重庆忠县乌杨阙、丁房阙、无铭阙。其中乌杨阙是保存最好的汉阙，现存于国家级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为首镇馆之宝（组图5-48）。



组图5-48　乌杨阙的斗拱飞檐造型

汉代是建阙的鼎盛期，都城、宫殿、陵墓、祠庙、衙署、贵邸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的墓地，都可按一定等级建阙。西汉长安城未央宫的东阙、北阙，建章宫的凤阙、圆阙，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阙。传说凤阙高20余丈。这些巨阙除凤阙尚有夯土残址外，都已堙灭，现存的只是一些东汉或西晋的小型石造祠阙和墓阙，最高者不过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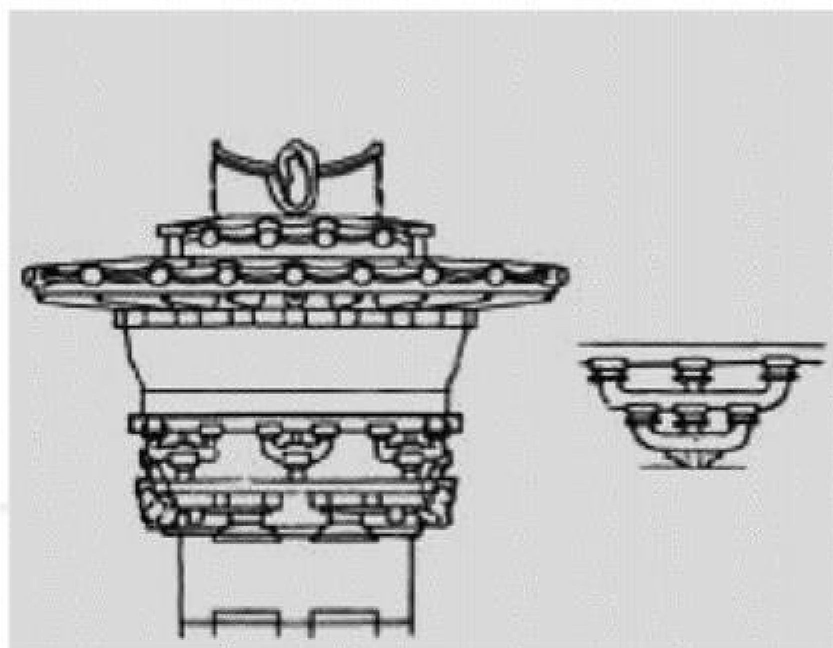
现存石阙中，基本完整的有25座，计四川16座，河南、山东各4座，北京1座，均用块石雕琢后砌成。其中4座为祠庙阙，余均为官、民墓阙。

高颐墓阙及石刻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城东7公里的许姚桥。高颐墓阙及石刻在四川现存的石阙中，是保存最为完整、最精美的一处。阙身是五层石块砌筑而成，今存的东、西两阙相距13米，东阙的题款曰："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高君字贯方"，西阙的题字是："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碑的铭文隐约可见，记载了高颐阙的建造年代。

在河南登封太室山脚下的中岳庙不远处，有太室阙、少室阙与启母阙，并称"中岳汉三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嵩山地区在汉代时共建筑了五座石阙，其中一座在嵩山南面的箕山之上，叫许由庙阙，另一座在中岳南麓，叫灵星坛阙，是圆形石阙，这两座石阙现已不存。

我们从今天还存在的汉阙那种斗拱飞檐的造型上（组图5－49），可以看到中国的早期建筑文化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是有关联的，特别是顶部的造型就是将太阳比喻成了三足鸟正在空中展翅或正在飞翔的形象，它们与汉代雀、鹊的写实雕刻艺术造型极为相似（组图5－50）。





汉高颐墓阙的斗拱飞檐造型



启母阙的斗拱飞檐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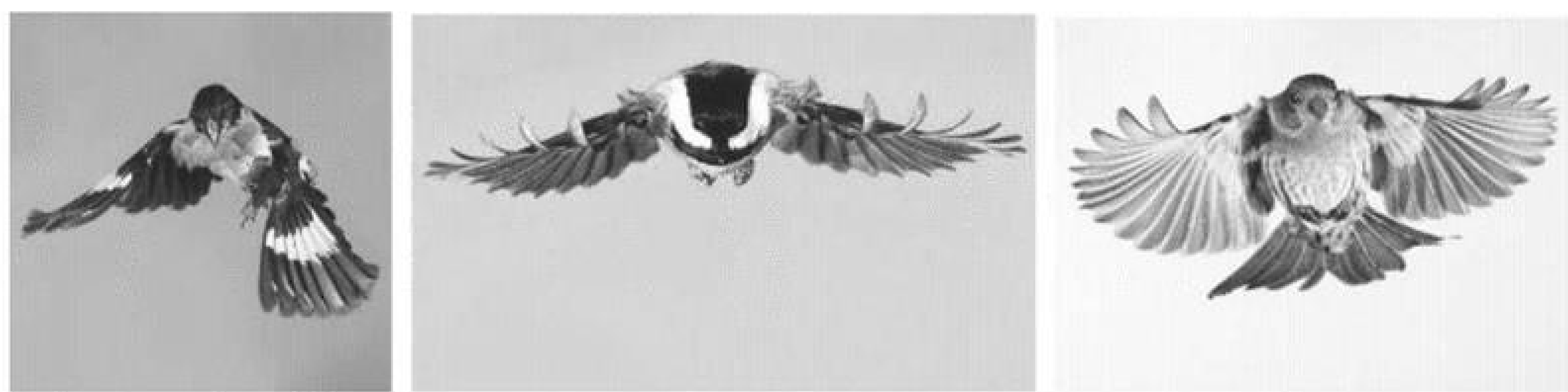
顺义东汉陶楼飞檐抹角拱造型

组图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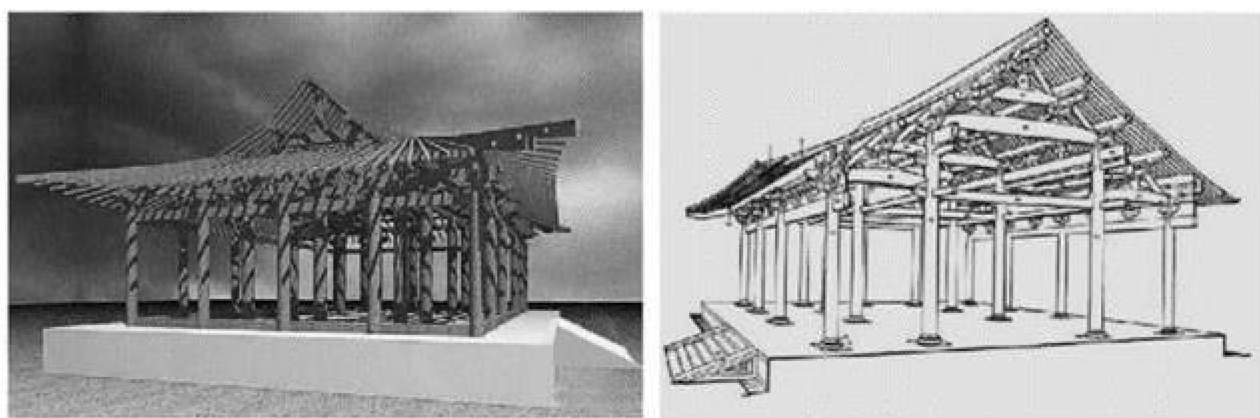


组图 5－50　汉代雀、鹊的写实雕刻艺术造型

这一点我们只要通过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通过雀与鹊在空中的飞翔瞬间姿态与中国古老的斗拱飞檐建筑造型进行一下对比就可得知。我们把中国古建筑斗拱飞檐上的屋脊主梁与雀鸟的脊梁对应起来，把屋顶上的檩［谐音翎］条与雀鸟翅膀上的一根根羽管对应起来，把椽子、铺在屋面上的茅草和羽毛对应起来，就无比形象地得出中国古建筑的屋顶就像鹰、雀等鸟类正在飞翔的一种意境（组图 5－51）。



雀与鹊的空中飞翔瞬间姿态



斗拱飞檐的中国古代建筑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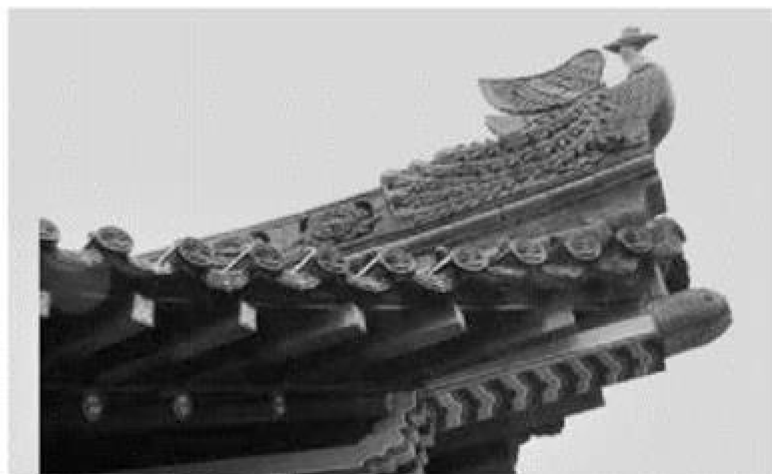
飞翔的意境

组图 5－51

飞檐是我国传统建筑檐部形式之一，屋檐上翘，若飞举之势，常用于亭、台、楼、阁、庙宇、宫殿等建筑上。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专业术语名称中，斗拱飞檐屋顶的角也被称为“翼角”，顾名思义它与雀鸟的翅膀是有关的，这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符号、菘泽文化三足太阳鸟图案中太阳鸟两头翘起的翼角应当是有联系的（组图5－52）。


燕子飞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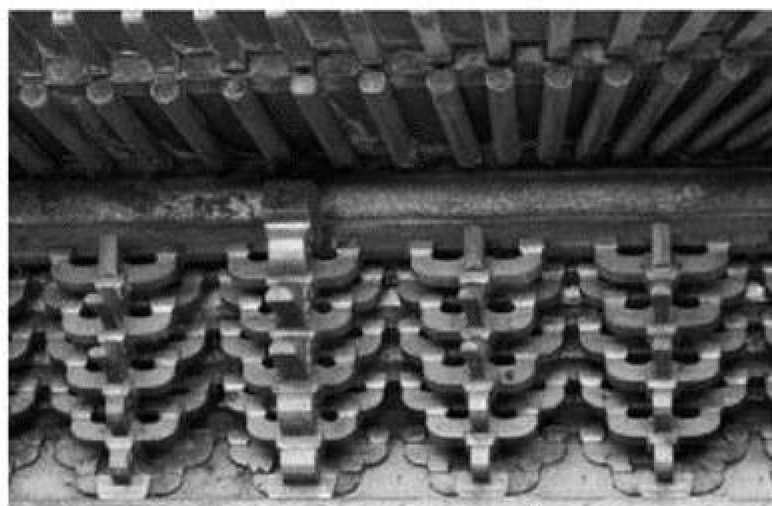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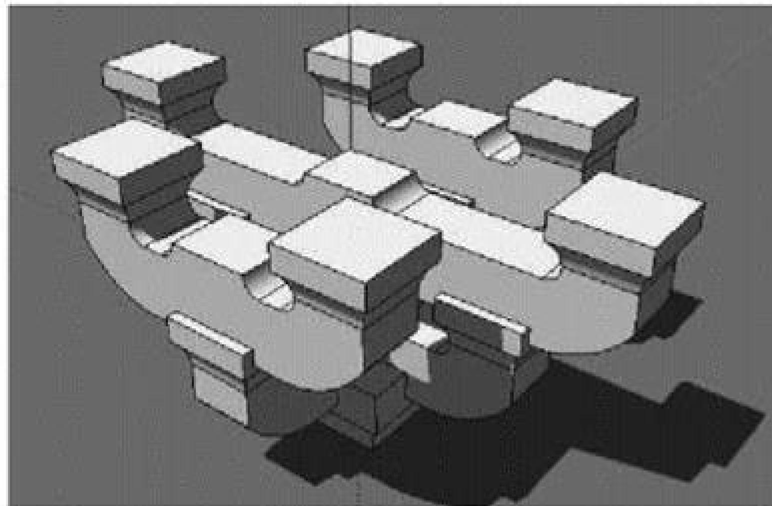

翼角



斗拱飞檐的翼角

组图5－52

斗拱是中国建筑特有的一种结构，常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呈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的造型也是两头翘起的形式（组图5－53），也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符号、菘泽文化三足太阳鸟图案中太阳鸟两头翘起的翼角非常相似，与从凌家滩出土的两头翘起的玉璜也极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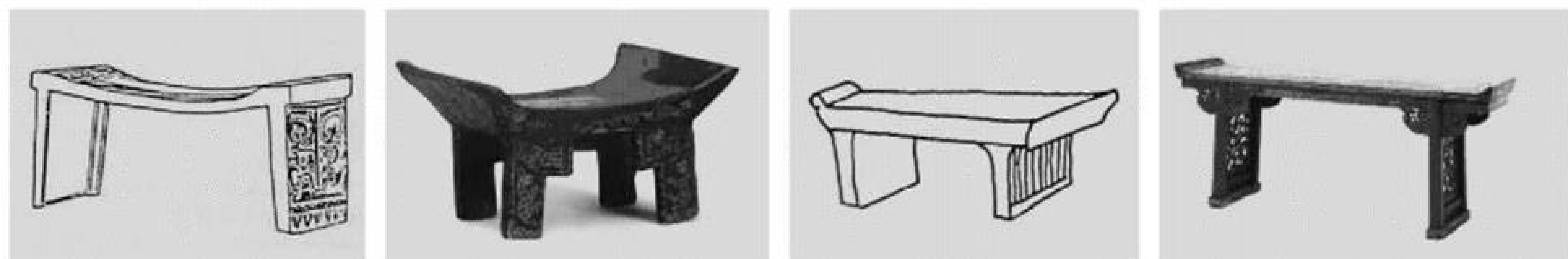
组图5－53　斗拱

所以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时候的雀、鹊、阙同音，因此“阙”既有宫阙之意，也有雀、鹊、飞鸟、飞翔之意，并且还都与太阳鸟、文明、顶、上、天、皇等概念有关。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官帽、座椅、俎案、翘头案、条案的造型以及今天中国大地上依然还存在的那种古建筑飞檐斗拱、两头翘起的飞翔艺术造型（组图5－54），将距今约7000～5000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远古的古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对生命的礼赞，对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的追求，在形象思维的中国建筑文化的写意当中完整、完满地保留了下来。



安徽民居的墙头艺术



商代饕餮蝉纹俎　　春秋漆俎　　唐代陶俎　　明代翘头案



古代官帽　　条案　　座椅

组图5－54

可想而知，如果古人没有这种用于追求表现文明的外在主导意义存在，而仅仅是为了实用美观的话，他们是绝不可能会采用这种既浪费材料又费时的设计理念的。

三　服饰

汉服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殷商时期。殷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

冕服是周天子在祭祀、登基、婚礼、朝会、寿日、册封等重大文明礼仪活动时专用的衣服，代表周代服装设计的最高等级。因此，西周时代出现的冠冕服装（图5－55）反映出了周代礼仪制度的成熟与完备。



图5－55　冕服玉人［西周］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宽大与窄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没有纽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

秦汉时期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饰。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大与窄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组图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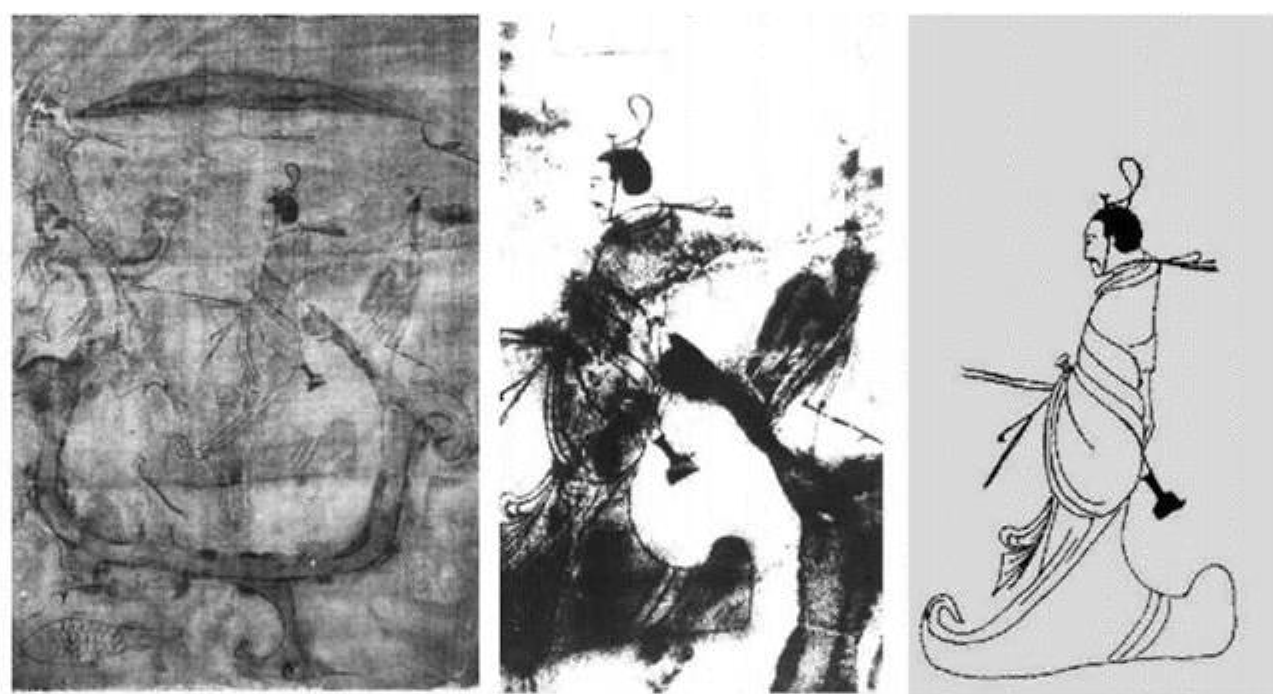
春秋战国楚曲裾式单衣图
（参长沙楚墓人物龙凤帛画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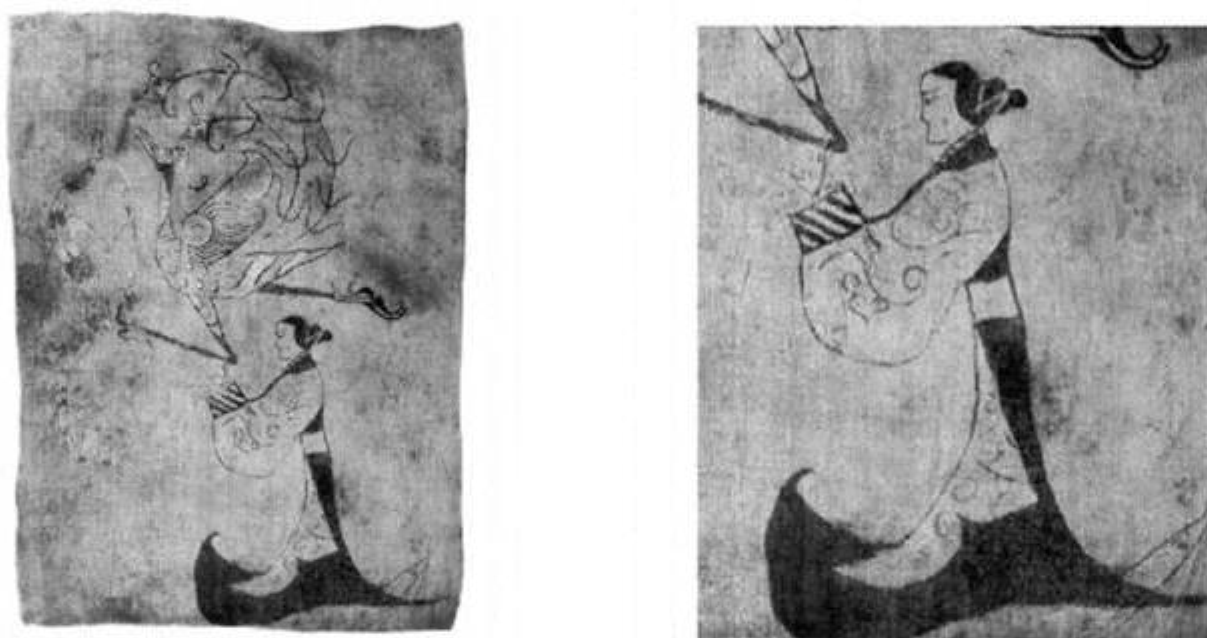
秦汉曲裾式绕襟深衣图
（参马王堆1号汉墓帛画墓主人及侍从像绘制）

组图5－56

从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帛画，被人们唤作《人物驭龙图》的图中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中绘着穿深衣的楚国女子的图中从汉代射礼图和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人物穿着的服装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衣袖都是宽大的样式（组图57）。由此可以看出，自周至汉的服装在袖子上是着实下了一番工夫的。那么，这样的款式表明古人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又代表了古人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和意境？



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人物驭龙图》及图中人物白描放大图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及图中人物放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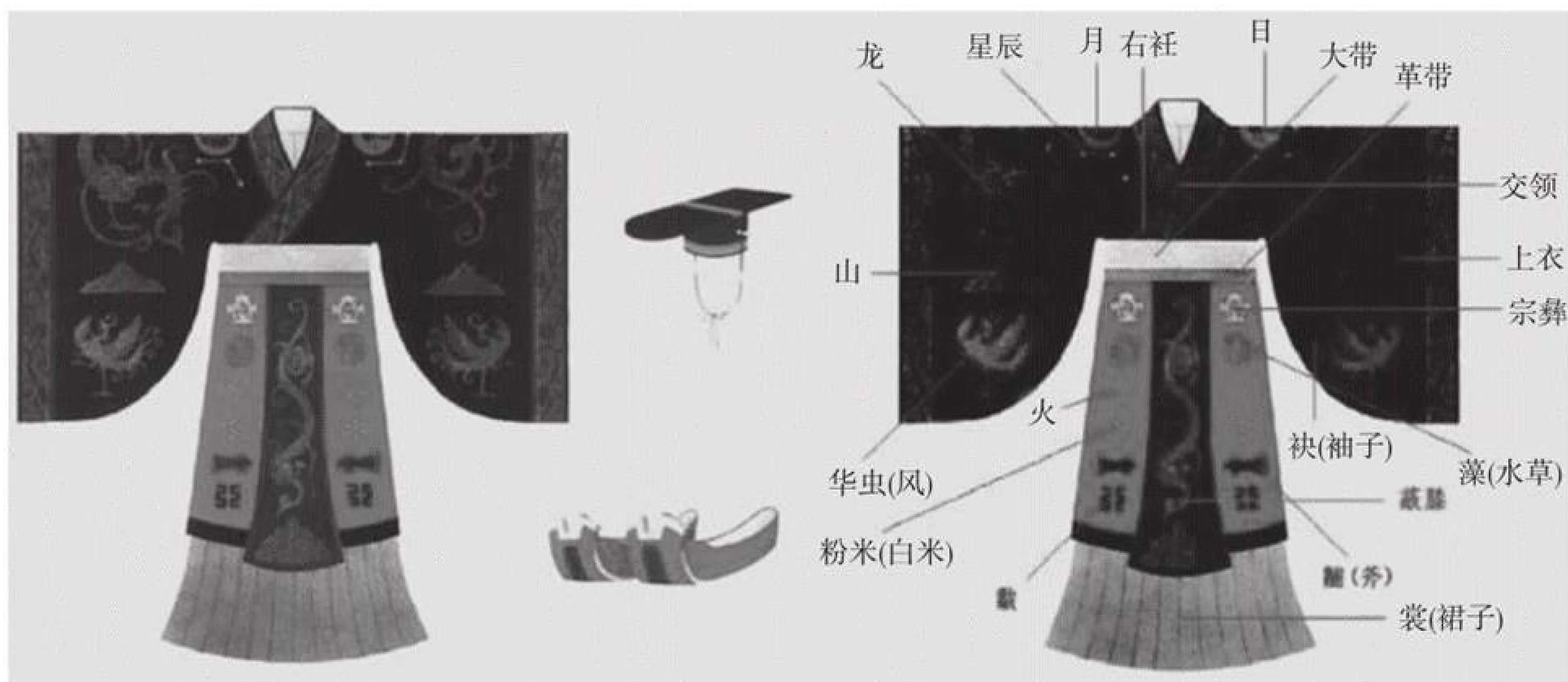


汉代射礼图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画

组图 5－57

汉代皇帝冕服图、冕冠图、赤舄图是根据文献记载和参考山东济南汉墓出土陶俑、沂南汉墓出土画像石图案资料以及服装上的纹样大多采用同时期的砖画、漆画、帛画及画像砖等复原绘制的。冕服常为皇帝、公侯等用作祭祀、登基、婚礼、朝会、寿日、册封等重大文明礼仪活动时专用的衣服。冕冠，是古代帝王臣僚参加祭祀典礼时所戴礼冠，顶部有一块前圆后方的长方形冕板，冕板前后垂有“冕旒”（组图 5－58）。



组图 5－58　汉代冕服

冕服上衣采用青黑色，象征天；下裳黄赤色，象征地。上衣画有六种不同的纹样，而下裳则绣有六种不同的纹样，这些纹样合称十二章纹。帝王服饰的十二章纹是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等 12 种图案。这 12 种图案各有寓意。日、月、星辰代表光辉，山代表稳重，龙代表变化，华虫［雉鸡］代表文采，火代表文明、能量，粉米代表滋养，藻代表纯净，宗彝代表智勇双全，黼代表决断，黻代表去恶存善。

从春秋与秦汉用于加冕、祭祀、成人礼等重大文明礼仪活动的宽大长袖服装上我们可以看出，服装是人类文明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法，就能看出它具有鸟雀正在展翅飞翔的形象与意境，因为只有宽大的长袖才能无比形象地表现出雀鸟那种展翅飞翔的形态（组图 5－59），而男人头上的发髻或官帽［冠］则无比形象地展现出了雀鸟［太阳鸟］头上冠子［或羽冠］的形态。可想而知，如果古人没有这种用于追求表现文明的外在主导意义存在，而仅仅是为了好看，他们是绝不可能会采用这种既浪费布料还浪费缝制工时的设计理念的。这也将距今约 7000～5000 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远古的古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对生命的礼赞，对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的追求，在

形象思维的服装文化的写意中完整、完美地保留了下来。



组图 5－59　春秋与秦汉服装

小结

第一，太阳神鸟金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自从有了文字之后，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太阳和神鸟的记载。

> 《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也。"
>
> 《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
> 《山海经·大荒经》："帝俊生中容……使四鸟。"

在中国传说的远古神话中，太阳鸟（组图 5－60）就是阳乌和凤凰，凤凰的凰（皇）字，又正像太阳鸟的形象一样，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皇帝，都与太阳、太阳鸟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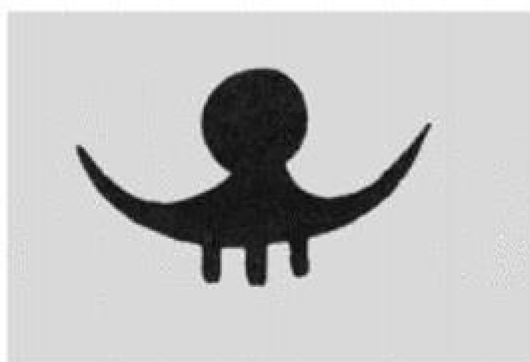
组图 5－60　太阳鸟

第二，如果我们把大量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商周文化的考古资料串起来，就会实证出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就古已有之的太阳崇拜习俗。到了汉代有关太阳鸟的出土文物就更多了，所有的这些实物都能够证明中国远古时代的先民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在崇拜太阳、向往光明、追求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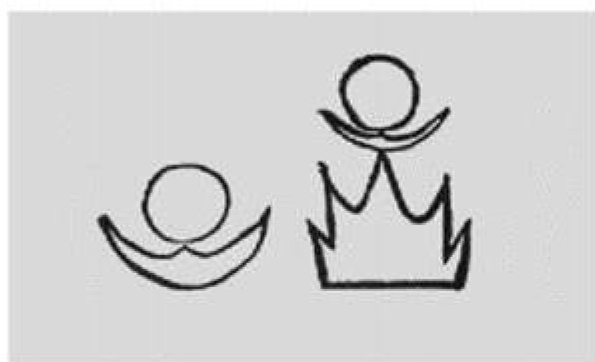
特别是从今天还存在的道观、寺庙、亭台楼阁等中国古建筑那种飞檐斗拱的飞翔造型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仰韶文化时期的古人是在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三足太阳鸟飞翔的形象（组图 5－61）。



飞翔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符号



大汶口文化符号



菘泽文化三足太阳鸟图案



亭



寺



阁

组图 5－61

古时候的道观、寺庙、亭台楼阁，都是古人用于放置对人类文化文明有着积极、突出贡献的圣人塑像以及牌位的场所，也是进行文化教育的场所。道观和寺庙的建筑文化的表征造型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们能直接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对自然、文明、宗教文化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人们衷心地希望人类的文化、文明能像太阳一样，逐渐升起、普照天下。

有关太阳鸟的图案也反映出了距今约 7000 ~ 5000 年，中国古人就知道万物只有沐浴了阳光才能生长、人类的生命只有在思想上沐浴了精神的文明才能长久的道理。

所以一直到今天，有识之士们也同样有着一个共识，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只要在思想上具有了精神的文明和文化才能长久；一个国家的生命同样只要在思想上具有了精神的文明和文化才能长久；一个企业的生命也是一样，只要在思想上具有了精神的文明和文化才能长久。所有具有物质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所有具有精神文明文化的生命才是久远的。

人类的肉体与思想也是一样的，肉体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而只有思想精神与文明文化的生命才能代代相传、恒久长远。

在今天，中国大地上依然还存在着古建筑那种飞檐斗拱的飞翔造型证明了远古时期文化的存在，延续着距今约 7000 ~ 5000 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远古的人们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了对文化的表征，对太阳的崇拜，对生命的礼赞以及对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的追求。即使在现代遗留下来的中国古建筑文化当中，依然圆满、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当时人们形象思维的写意。

积极向上腾飞的建筑风格，也仿佛在说只要认准了的追求是正确的，就要积极向上地去努力，千万别放弃，就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去追求。这么一种拟人的表现手法，就是表示《易经》中的乾（键）——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

第三，最早的“易”字也恰恰是由日与月两字所组成的，并且“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实，这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系统理论中的象数易学（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针对《周易》中乾卦的二爻变动后，而推论演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像龙一样人格化的太阳，当它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开始升起来的时候，太阳的光芒就像人类的希望、文化和文明一样，开始照耀、网罗各方和万物了。

乾（主体现象）		同人（变化现象）	
———	父母壬戌土　世	———	子孙壬戌土　应
———	兄弟壬申金	———	妻财壬申金
———	官鬼壬午火	———	兄弟壬午火
———	父母甲辰土　应	———	官鬼己亥水　世
═══	妻财甲寅木	— —	子孙己丑土
———	子孙甲子水	———	父母己卯木

【逻辑分析】

二爻（地面位、运行位、转换位）妻财（能量）寅（驿马星、升起、展示）木动旺生合四爻（半天空位、轨道位、过程位）官鬼（壮观、壮丽）午火（活力）和世（自己）六爻（天空位、结果位）父母（自然、目标、事业、安全、成功、佑护）戌土成官鬼（壮观、壮丽）火局（活力、光芒、光明、文明）。

变卦二爻（地面位、运行位、转换位）子孙（能源、生物、生机、生命、自由、规律）丑土刑动、刑旺应（此事）六爻（天空位、结果位）子孙（能源、生物、生机、生命、自由、规律）戌土与初爻（地表位、基本位、基础位、开始位）父母（自然、目标、事业、成功、佑护）卯木六合成兄弟（势能、势力、帮助）火局（活力、光芒、光明、文明）。

这样，通过主卦与变卦的逻辑分析，就把《易·文言》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意给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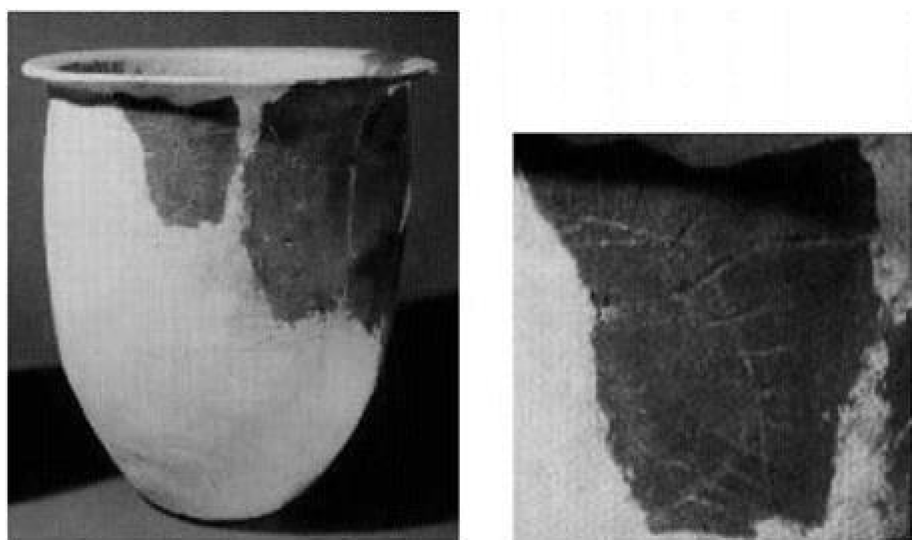
第四，太阳的崇拜对文明的追求，既可以用中国的凤文化来表达，也可以说这种崇拜和追求就是中国的凤文化。如果细究起来，我们还可以追究到更早的贾湖文化（距今约9000～8000年）时期。

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与太阳崇拜有关的第一手材料是H190：2A卷沿罐（组图5－62）[①]，在口沿下用直线刻划成一近圆形圆圈，周围还刻出放射性直线，虽然系烧后所刻，显得手法拙朴，且残缺近一半，但一个光明四射的太阳图像仍十分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H190为一残半地穴式房址，属于贾湖文化第三期，距今约8200～7800年。从中国所有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来看，太阳崇拜最早出现于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

第二手材料就是从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刻和龟甲刻符（图5－63、图5－65）[②]，如果我们应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系统理论中的知识概念，就能够把从贾湖文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二，第970、971页。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四七、四八。



组图 5-62 贾湖遗址卷沿罐口沿下呈放射直线的近圆形圆圈

化遗址出土的石刻和龟甲刻符之意串接起来，归为一类——文明。



图 5-63 贾湖石刻符



图 5-64 甲骨文的“申、雷、电”字

如果我们把古人所造甲骨文中带雨字头的那个“雷”字和“电”字（图 5-64）①，与贾湖文化中的石刻符进行参照对比，就会发现它极似大自然的形象，也极似贾湖文化之后五六千年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申”（神）“电”字。从甲骨文中的“申”字的结构上来看，其实就是雷电的象形描述，就好像天神发怒时，发出的雷电使人们害怕，所以也有跪拜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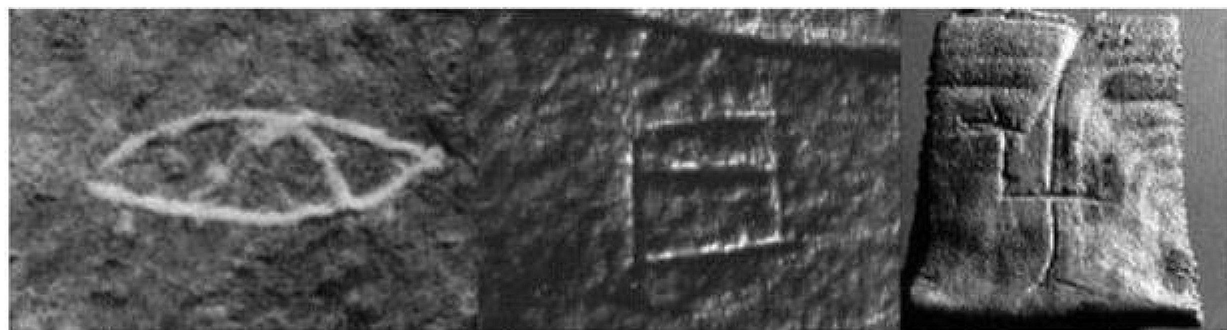


图 5-65 贾湖龟甲刻符

贾湖文化中的龟甲刻符（图 5-65），一个极似人眼形象的“目”字，另一个极似太阳形象的“日”字，还有一个极似火焰形象的“火”字。这四个刻在贾湖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的符号，是仅有的极似中国象形文字的刻划符号。我们都知道中国古文字系统的创造与建立就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四七、四八。

与中国易学文化中形象思维的独特方式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既可以将它们看成“符”，也可以将它们看作“字”，这一点也不奇怪。

而且，有三个极似“目”“日”“火”字的刻符却没有刻在别的骨器或物件上，而是都刻在了用于占卜的龟甲之上，这就非常值得耐人寻味了。我们知道，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的一个作用是占卜，这在远古时期非常重要，贾湖先民在实施重大行动前也要占卜。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系统理论中，古人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可以将人看作是一个小的独立太极，可以将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大的独立太极，而人体只有眼睛才能够与大自然中的太阳对应，会发出五行属火的光芒。“目”、“日”、“火”与“雷”、“电”的五行属性都属火，又都归类在八卦的离卦中，而离卦其中又包含着雷电、火神、太阳、白昼、眼睛、光明、希望与文明等意思。而“目”、“日”、“火”也都与人心对应，人的心智与神志又是心神合一、对应相通的。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只要运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理论知识，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贾湖先人的呈放射直线的近圆形圆圈和刻符写意串接起来进行解读了：它们都是远古的贾湖先民用易学文化中形象思维的方式，在崇拜太阳神、向往光明、追求希望与文明的心声。

| 第六章 |

从自然万物中提炼的龙文化

第一节　仰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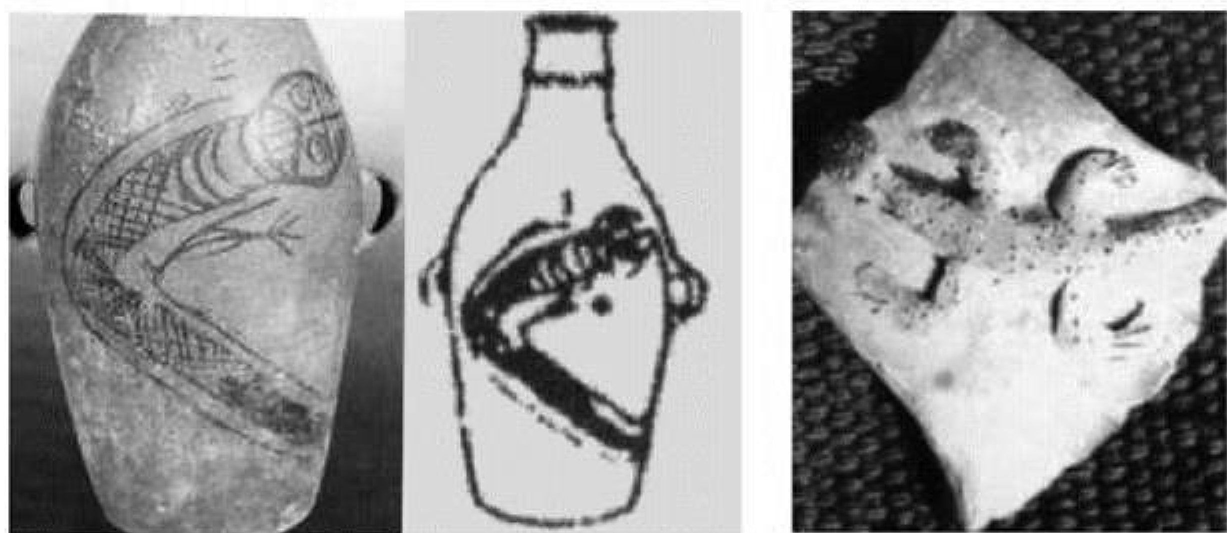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彩陶细颈瓶（图 5-4），瓶肩上绘有的鸟鱼纹（也称龙凤纹），把飞鸟同鱼组合在一起，就有沟通天地、阴阳之意。鸟鱼纹与仰韶半坡文化人面鱼纹盆（图 5-5）中的太阳脸与鱼的图案如出一辙，其中的人面就是无字时代的人们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对太阳进行了拟人化的写意。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鱼代表了阴、龙、月、黑夜、寒冷等文化概念之寓意，太阳则代表了阳、飞禽、人面、暑热等文化概念之寓意。这样，鸟鱼纹（也称龙凤纹）的头尾相接和人面鱼纹的轮回交替图案，就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明确表达出了阴阳、昼夜、寒暑、龙凤等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在交替轮回的文化观念。

交替轮回的文化观念又正好与大的易学——龙文化观念是对应的。这样，中国远古的古人在距今约 7000～5000 前，就用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将龙文化的观念明确地表现在了生活艺术品中。

在人面鱼纹盆的边沿口上，正对着人面和鱼的位置画有四条横道，代表着易学文化体系中四正（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上下左右）等系统寓意；在人面和鱼的交接位置画有四条三角形道，代表着易学文化体系中四隅（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季春、季夏、季秋、季冬）等系统寓意。四正和四隅正好又组成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八卦的系统文化概念，八卦的轮回交替就刚好组成了一个大的龙文化——易学思想文化体系。

仰韶文化时代的蜥蜴龙（组图6－1）[1]，也是中国远古的先人在距今约7000～5000年前用易学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将龙文化的概念明确地表现在了生活艺术品当中的证明。



组图6－1　仰韶文化时代的蜥蜴龙

第二节　西水坡文化

河南濮阳西水坡文化中的蚌塑龙与虎（组图3－7、图3－8，距今6460±135年），则反映出了中国殡葬文化风俗中活着的人对死者所寄予的重新投胎去生还做人的观念。

45号墓主人头南脚北，东方放置着由蚌塑成的龙，西方放置着由蚌塑成的虎，而且这组龙虎相背着呈左旋运动形态，正符合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青龙属东方［春、生、升］、白虎属西方［秋、杀、死］以及一年四季的历法观念。

这两组用蚌壳摆设的青龙、白虎与1972年从马王堆出土的棺椁盖上绘的青龙白虎的图案和人们想要表达的愿望是一致的，它们都没有摆塑和绘制四兽中的另外两兽——朱雀和玄武，这充分说明，在远古时期人们的头脑中就具有了一些相应的易学文化系统知识。

另外，在176号坑的组塑中，除龙、虎之外，还有风、鹿、龟、蜘蛛、石斧等。笔者认为这正好又与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五行对应了起来。

风：同风，对应春、东、东南和震［辰］、巽［筭］，属木；

蜘蛛：同罗、网罟、光线，对应夏、南和离［罗］，属火；

---

①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彩页。

鹿：同牛羊类，对应四季月、中［土］，属土；
石斧：同肃杀、权力，对应秋、西、西北和兑［夺］、乾［键］，属金；
龟：同鱼鳖类，对应冬、北和坎［习赣］，属水。

而五行之间相互生克的中国哲学逻辑关系，也正好形成中国龙文化中易学思想文化体系里的基础观念，形成了一个大的轮回圆圈。

在本篇第二章中提到，舞阳贾湖的先民能在8000多年前就已经总结出了历法，掌握了二十四个节气的规律，并具有了将野生稻逐渐驯化为栽培稻的能力。中原的舞阳与濮阳直线距离不过200多公里，又都是农业生产之地，那么这种历法中的节气知识，濮阳的西水坡人肯定也是知道的。

中国的易学文化体系以及“易”字，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易”既可代表大自然，也可以是一部书，其中包括天学（或天象学）和历法知识。

青龙（组图3－12）对应“四象”中的春天，也对应在春天仲春之气（春分）的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会出现“龙星”，所谓“龙星”就是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的东方青龙，是古人的形象思维将几组星宿进行了拟人化的组合，表示万物在春天皆开始了生命的希望。

白虎对应“四象”中的秋天，也对应在秋天仲秋之气（秋分）的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会出现“虎星”，所谓“虎星”就是由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组成的西方白虎，是古人的形象思维将几组星宿进行了拟人化的组合，表示万物在秋天皆开始了萧条与死亡。

从这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西水坡地区的人们使用的就是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的历法。因为只有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的历法才能将一年划为四季，才能有东西和春秋与青龙白虎对应，而不是一年十个月的历法，十月历是将一年划成了五季，五季就没法把东西和春秋与青龙白虎对应起来。

西水坡文化中的蚌塑龙与红山文化时代的龙所表达的意义又有所不同。蚌塑龙主要是古人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为了表达四方中的东方、四季中的春天，是活着的人给予死者的投胎做人、重新生还的希望。而红山文化时代的龙所要表达的是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就像始终在和谐轮回旋转着一样。但西水坡文化中的蚌塑龙与虎的造型，就非常形象、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天学里的天体、东西、春秋在旋转、轮回、运动、和谐变化的龙文化观念与形态。

第三节　红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

一　红山文化

从红山文化（距今约8200～5000年）时期玉玦、玉龙[①②]（图6－2、图6－4、图6－5、图6－6、图6－7、组图4－8）的旋转、运动造型来看，中国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的方式逼真地表现出了宇宙大自然中的太空苍穹，所有生物和万事万物的生命运动和变化自始至终都在积极遵循着循环、旋转、轮回（图6－3）和谐的自然法则和规律。



图6－2　内蒙古赤峰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C形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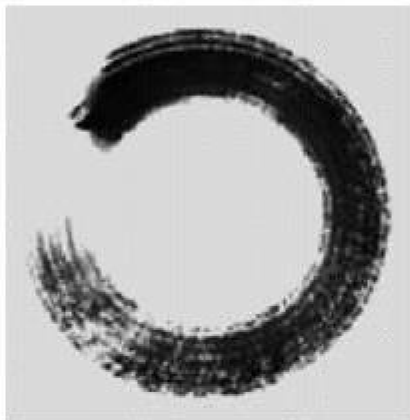


图6－3　太空苍穹或生物运动变化的符号写意



图6－4　牛河梁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C形玉龙



图6－5　赤峰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C形玉龙



图6－6　赤峰敖汉旗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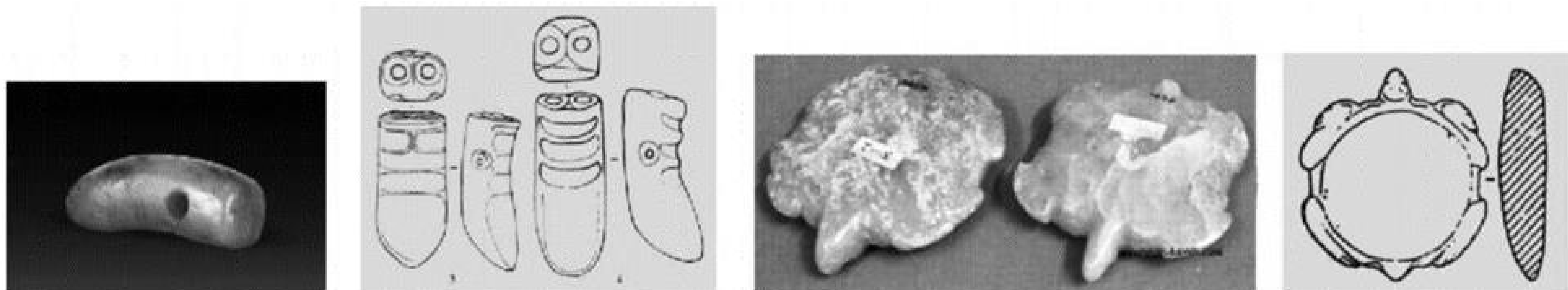
图6－7　赤峰巴林右旗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

蚕是一种完全变态的昆虫，会不断循环轮回变化着呈现出卵、幼虫、成虫、蛹、飞蛾，蛾再产卵，卵再变化到飞蛾的各种形态，它既能够入地，也能够飞上

①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彩页、封皮。

②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278、276、309、340页。

天，呈现出了像龙一样的特征。龟是一种卵生的动物，在它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也会不断循环轮回变化着呈现出从卵变成龟，龟再产卵，卵再变化到龟的形态。龟既能够入水，也能够上陆地，是水陆两栖动物，也呈现出了像龙一样的特征（组图6－8）[①]。



组图6－8 红山文化时期的玉蚕和玉龟

所以，在红山文化时期，在这个龙文化圈里生活着的中国古人，用形象思维和各种动物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他们深深喜爱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和龙的文化体系。

二 东西及东南早期的玉器

近代考古新发现显示，中国东北内蒙古至辽西一带出土的约8000多年前东亚最早的玦饰，可能也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耳饰。黑龙江一带玦饰出现的年代约在距今7000前，同期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也出现了玦饰。在北纬60°的雅库特，曾出现过距今5000～4000年的玦饰，是现今已知玦饰的北限。长江中下游从距今7000～6000年前开始，玦饰已经相当流行。岭南在距今4500年前后才出现玦饰。泰国北部平原和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及北部湾沿海地区，约在距今4000年前亦相继出现玦饰。越南南部和马来西亚等地玦饰的出现，要迟至距今约3000年前。在岛屿上，日本本州岛及九州岛在距今约7000～6000年前的阶段，玦饰已全面分布。从韩国釜山南端之景岛区出土的玦饰距今约5500～5000年，而往南的台湾岛及菲律宾群岛与岛屿的玦饰年代的上限，距今约4000年。

非常奇怪的是，在日本、韩国等多地发现的这些玉器[②③]（图6－9、图6－10、图6－11、组图6－12），造型竟然与中国龙文化的特征一模一样。

---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276页。

②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第173页。

③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482、494、4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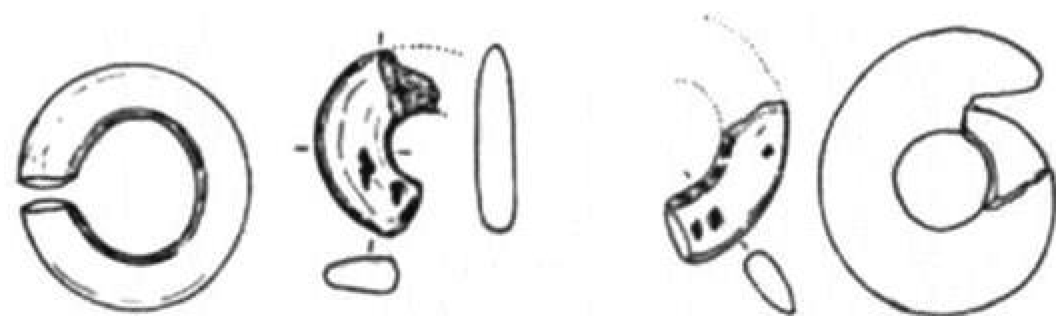


图 6 –9　日本北海道等地出土的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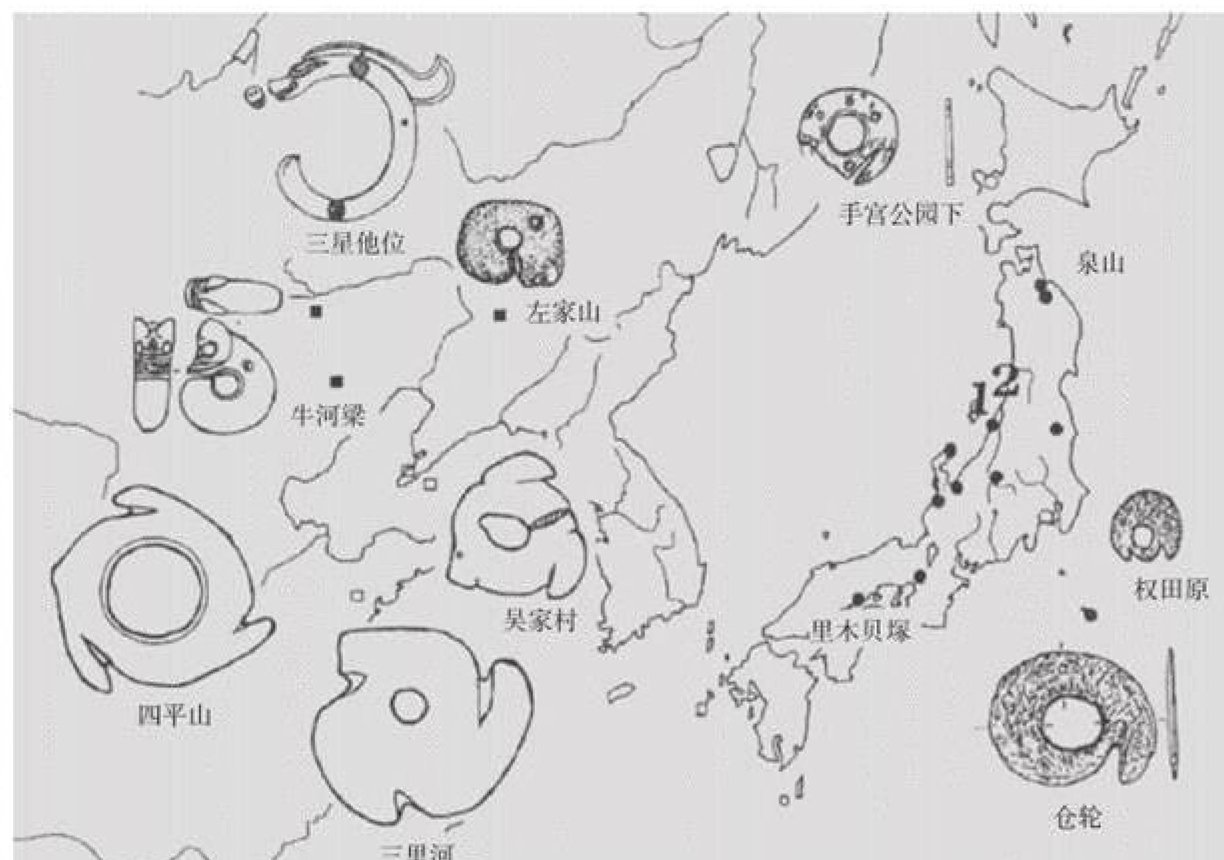


图 6 –10　日本“の”字形坠饰及其分布与中国北方地区龙形玉器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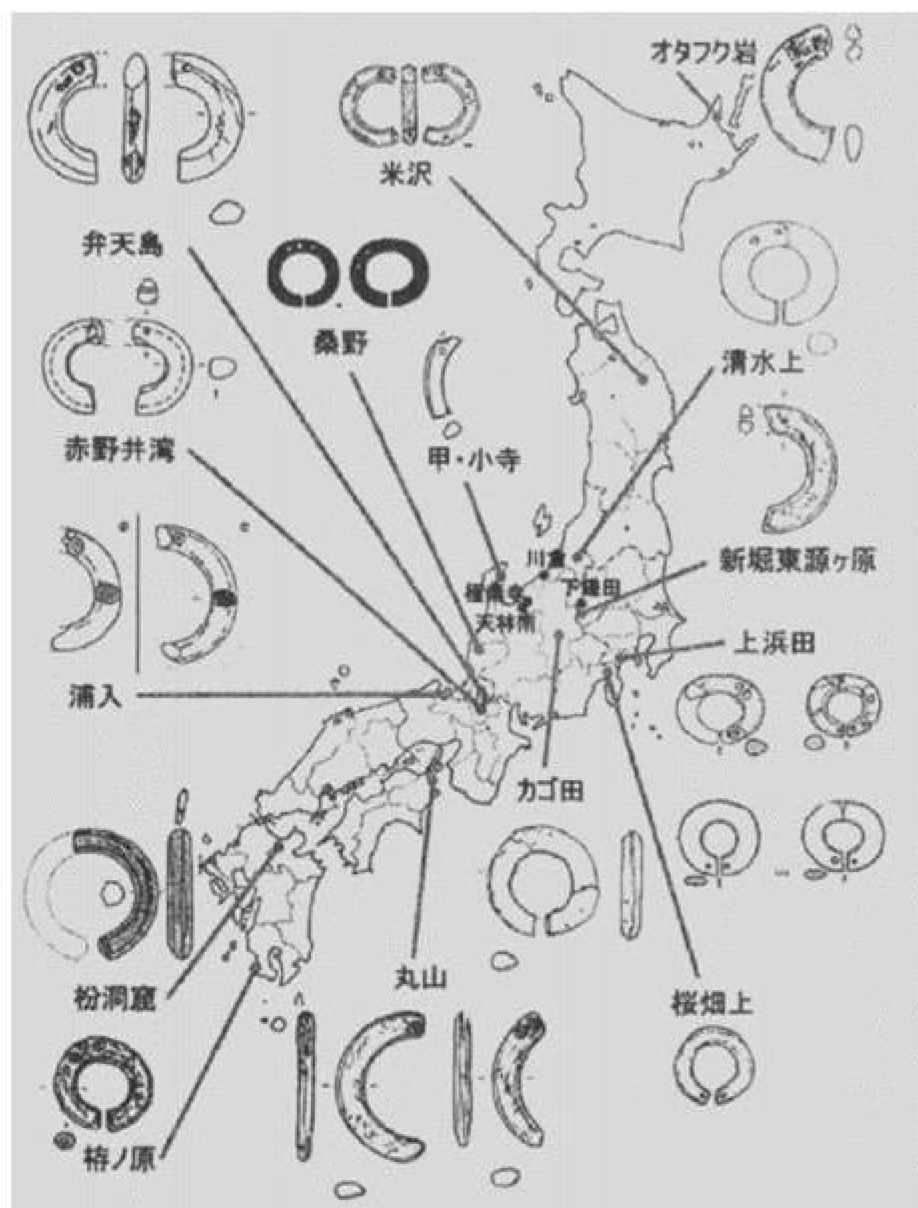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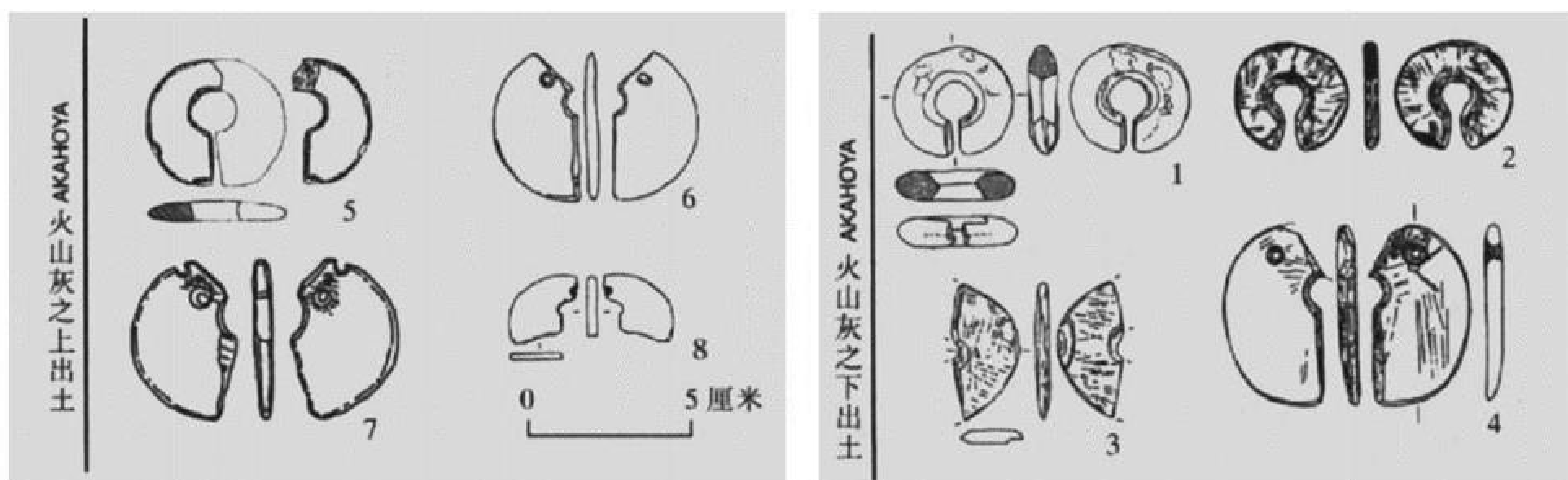


图 6 –11　日本早期环状玦饰分布图



组图6－12　日本九州出土的早期玦饰

笔者认为，这大概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甚至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二是在那个时代，就曾经有人将这种中国的龙文化漂洋过海传播到了这些地区。

三　河姆渡文化

在河姆渡出土的陶豆盘（图6－13）中，有一个豆盘内带有抽象的四鸟日纹图案。金文罄先生认为四鸟日纹图案是原始八卦的先声，是河姆渡先民原始历法的写实。

在宁波傅家山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可复原的玉石器有璜、环、玦（图6－14）等，多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装饰品，却反映了7000年前宁波傅家山人就已经具有了龙文化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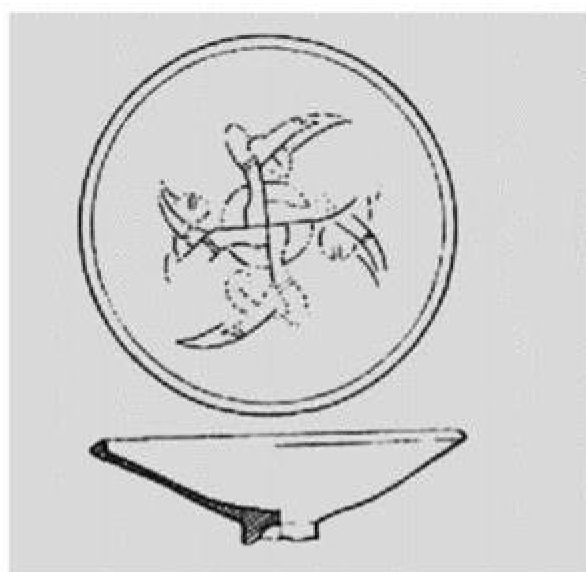


图6－13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抽象四鸟日纹图案陶豆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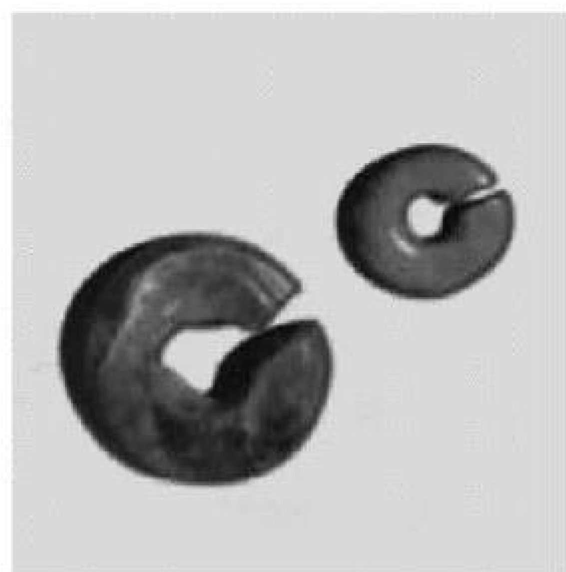


图6－14　河姆渡文化玉玦

其实这时河姆渡文化地区的先民已经有了太阳鸟和龙的文化观念，并且将他们所认为的太阳所做的循环旋转、每日和四季太阳轮回的圆周运动以及龙的文化

理念，成功地表现在了生活必需品和艺术当中。

四　凌家滩文化

从凌家滩文化（距今约5500年左右）时期玉龙（图4－25）[①] 的旋转、运动造型来看，它与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时期玉龙的旋转、运动造型可以说是几乎一样。

这也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明凌家滩的智慧古人也用形象思维的方式逼真地表现出了自然宇宙中的太空苍穹，表现了所有生物和万事万物的生命运动和变化自始至终都遵循着循环、旋转、轮回、和谐的自然法则和规律；二是说明同一时期的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虽相隔几千公里，却始终进行着南北密切地大交融和大碰撞。

第四节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一　大汶口文化

考古学以山东胶县三里河畔发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的玉璇玑为源（图4－32），按出土玉璇玑的遗址年代为序，排列出了玉璇玑的一个流传路线：5000年前，玉璇玑在山东东部出现，到了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璇玑在辽宁东部沿海登陆。不久，从山东向西进入河南，又传入陕西。商周之际，由中原向北南分流，传入河北、湖北。

笔者认为，玉璇玑实际就是古人用于描述宇宙天体、龙卷旋风、急流漩涡等能够像龙一样进行轮回盘旋运动变化（图4－33）的仿行器物，与古人仿天之圆而作璧，仿地之方而作琮的用意相似，也是古人表达龙文化图腾的另一种方式。

二　龙山文化

山西境内汾水下游的临汾盆地发现许多龙山文化遗址，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处，墓地使用时间距今约4600～4000年，陶寺墓地是整个龙山文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二。

化圈中规模最大、最能反映龙山的社会特征的一处墓地。

从陶寺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组图6－15）随葬品,[①]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盘中彩绘蟠龙的旋转、运动形式，与红山文化时期和凌家滩文化时期玉龙的旋转、运动造型相互对比，也可以说是几乎一样。



组图6－15 陶寺大型墓随葬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这说明从红山文化时期一直到龙山文化时期，在中国远古大地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积极地崇拜、遵循、使用、延续、支撑着龙的文化。

三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继菘泽文化之后在太湖流域发展起来的一支特征明显且内部认识高度统一的地域文化。从整个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的环形玉器、C形玉器和环形龙首纹的玉器形制上来看，与红山文化时期和凌家滩文化时期玉龙的那种旋转、运动造型相比，形象思维的程度可以说几乎一致，只不过红山文化时期C形龙的形象具有细腻刻画的头部，而良渚文化时期C形龙虽然没有头部和尾部形象，却有着头部和尾部的示意，基本表达出了循环、旋转、渐进的龙文化。

笔者认为，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表现龙文化造型的玉器可以分为三种级别，第一种表现龙文化造型的玉器材料非常好，制作精度和工艺的级别也非常高（组图6－16）[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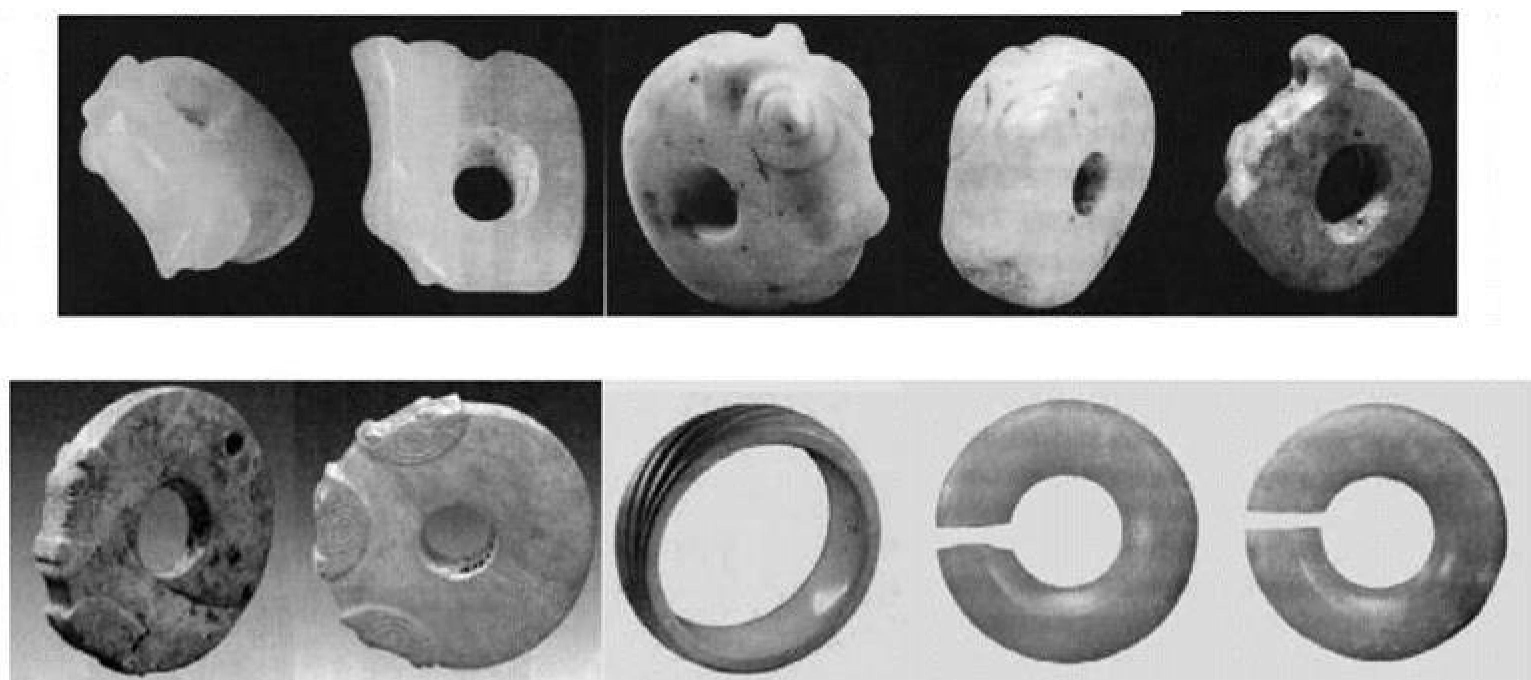
第二种表现龙文化造型的玉器不管从材料上还是从制作工艺上，级别都很一般（组图6－17）。[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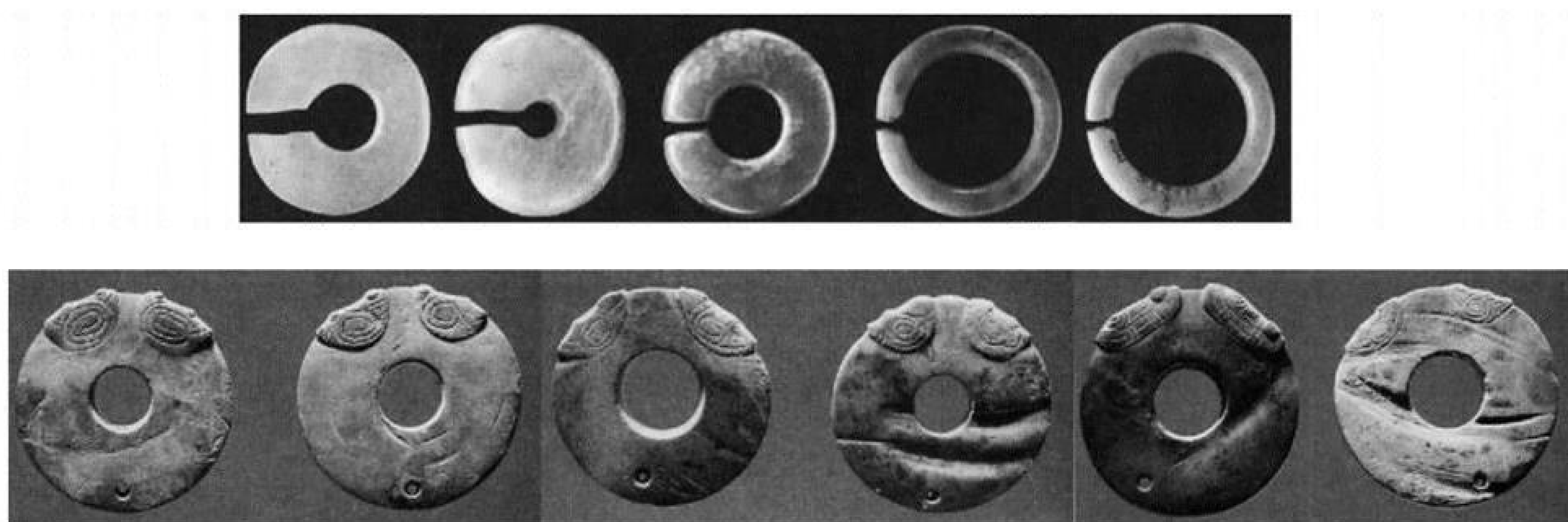
---

①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第106页。

② 刘斌：《神巫的世界》，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133、135、161、164、176页。

③ 刘斌：《神巫的世界》，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1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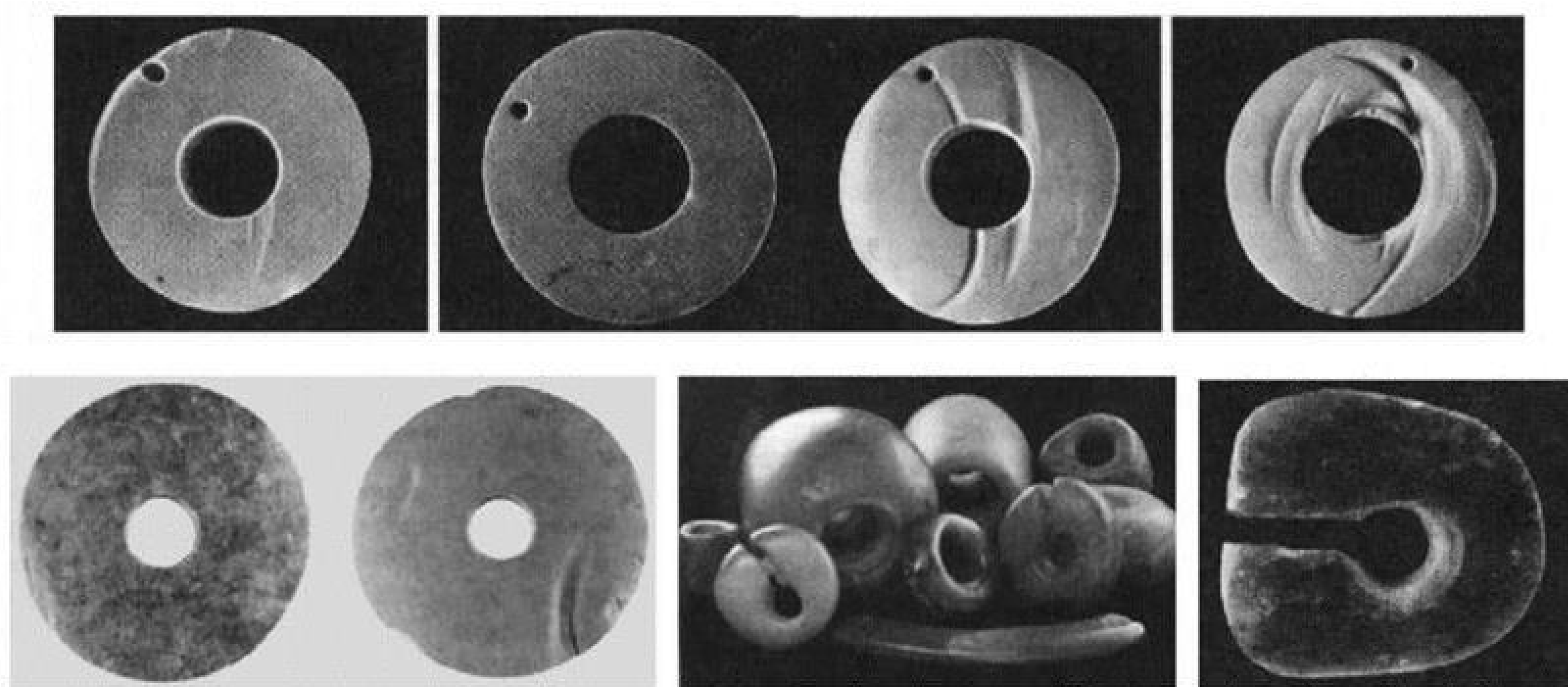




组图6－16　良渚文化第一种表现龙文化造型的玉器

组图6－17　良渚文化第二种表现龙文化造型的玉器

第三种表现龙文化造型的玉器不管从材料上还是从制作工艺上，级别都不太好（组图6－18）。[①]



组图6－18　良渚文化第三种表现龙文化造型的玉器

① 刘斌：《神巫的世界》，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第161、164、176页。

出现这三种级别的原因，笔者认为大概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可能使用这三种表现龙文化玉器的古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二是从良渚文化这三种表现龙文化玉器造型的精密与粗糙程度来看，价位不同，可能是使用这三种表现龙文化造型玉器的古人的经济实力不同。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共同具有龙文化造型的玉器，说明了从红山文化时期一直到良渚文化时期，在中国远古大地上的南北方生活着的人们，他们通过形象思维的方式，用环形和C形的玉器形象逼真地表现出了宇宙大自然中的太空苍穹、所有生物和万事万物的生命运动和变化。同时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自始至终地都在积极地崇拜和遵循着大自然中循环、旋转、轮回、和谐的自然法则和规律。

四　二里头文化

2002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二里头队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调查夏商时期的宫殿时，于该宫殿区内发掘出二里头二期的贵族墓葬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副人骨架和绿松石龙形器饰物（组图6－19），这件龙形器长约70厘米、头宽约15厘米、身宽约4厘米，呈饕餮纹面饰夔龙形态，而且在龙形器饰物的中部还有一带玉舌的铜铃，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前后，约为中国古史中的夏代中后期。



组图6－19　绿松石龙形器与绿松石铜牌饰

专家表示，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种类繁多，缺的仅是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后的夏时期的龙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以及一批龙文化遗存的发现与辨识，填补了这个缺环，使得中国龙文化遗存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现今的连续发展演变的线索得以揭示。

另外，1981年，在被称为夏都遗址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曾出土几件绿松石铜牌饰，其中以一件平面呈长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的绿松石铜牌饰最为精致。铜牌的正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专家介绍，以往对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纹含义，没有识别其真面目，直至2002年在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确认了绿松石龙形器之后，才恍然大悟，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使用方式与其基本相同，都是与铜铃配套使用，佩戴在墓主人身上。

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玉龙和大量面具来看，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原始萨满文化或傩文化面具的微缩品。即使在今天信奉萨满教的地区，牌饰和铃铛也还是萨满教巫师在进行萨满活动时所使用的法器。

第五节　商周文化

我们通过对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C形玉龙（图6－20）[①]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与西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C形玉龙（图6－22）的造型、形神都极其相似。

这些跨越了几千年不同的时代还依然共同具有龙文化造型的玉器，明确说明了从红山文化时期一直到殷商时期，人们通过形象思维的方式，用C形的玉龙形象逼真地表现出了宇宙大自然中的太空苍穹、所有生物和万事万物的生命运动和变化。同时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自始至终地都在积极地崇拜和遵循着龙的文化，都在积极地崇拜和遵循着大自然中循环、旋转、轮回、和谐（图6－21）的自然法则和规律。

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一座商代墓中，也发现一件玉璇玑（组图6－23，为青玉，有褐色沁，体为圆环，片状，中部有一大圆孔，通牙外径11.7厘米，内径6.5厘米，厚0.7厘米，清宫旧藏。内缘渐薄，有三个向同一方向旋转的凸脊，每脊间各有四个小齿牙），出土时它位于主人骨架的胸部右侧。

---

① 杨善清、杜久明编著《中国殷墟》，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第256页插图。



图 6-20　安阳出土的殷商时期妇好墓的 C 形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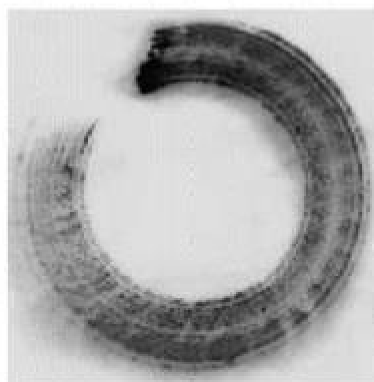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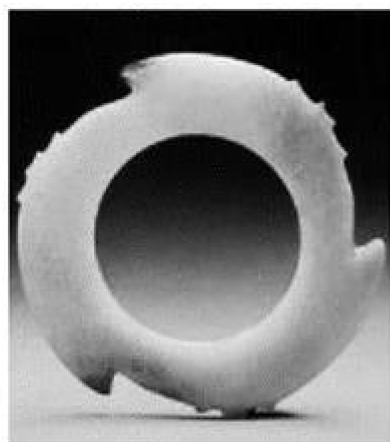


图 6-21　太空苍穹或生物运动变化的符号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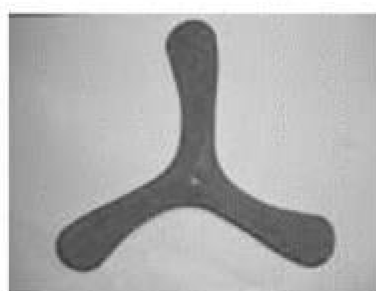
图 6-22　西辽河流域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形玉龙

现代的人们在玩健身玩具飞去来器（组图 6-24）的时候，将它抛甩出去，它不仅自身在旋转，而且还能够再旋回到抛甩时的位置，极其类似地完成了一个轮回的公转。从飞去来器的形状与运动方式来看，安阳小屯村商代墓葬中出土的玉璇玑与山东胶县三里河畔出土的玉璇玑一样，也是古人利用了圆、环、龙的外在形式，表述了宇宙天体、激流漩涡、龙卷旋风等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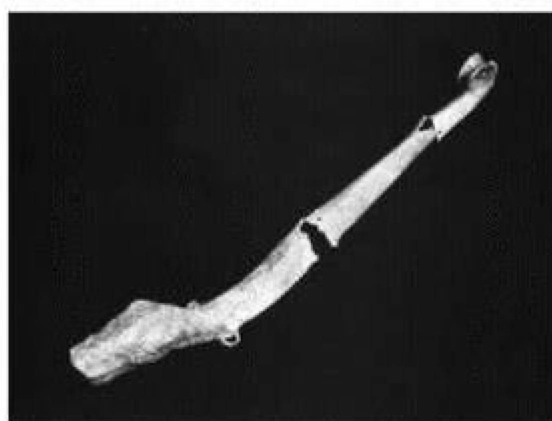
组图 6-23　小屯村商墓出土的玉璇玑与天体星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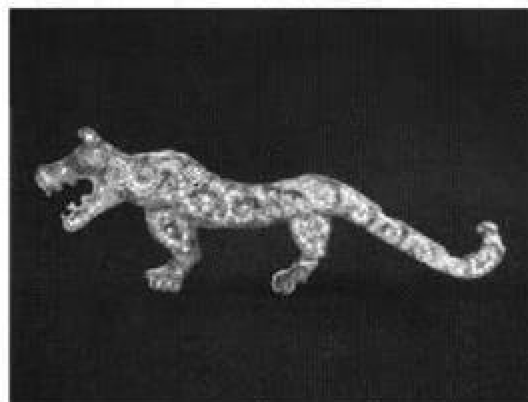


组图 6-24　飞去来器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文物中，就出现了龙虎青铜器物，用于表现诸如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青龙和白虎（组图 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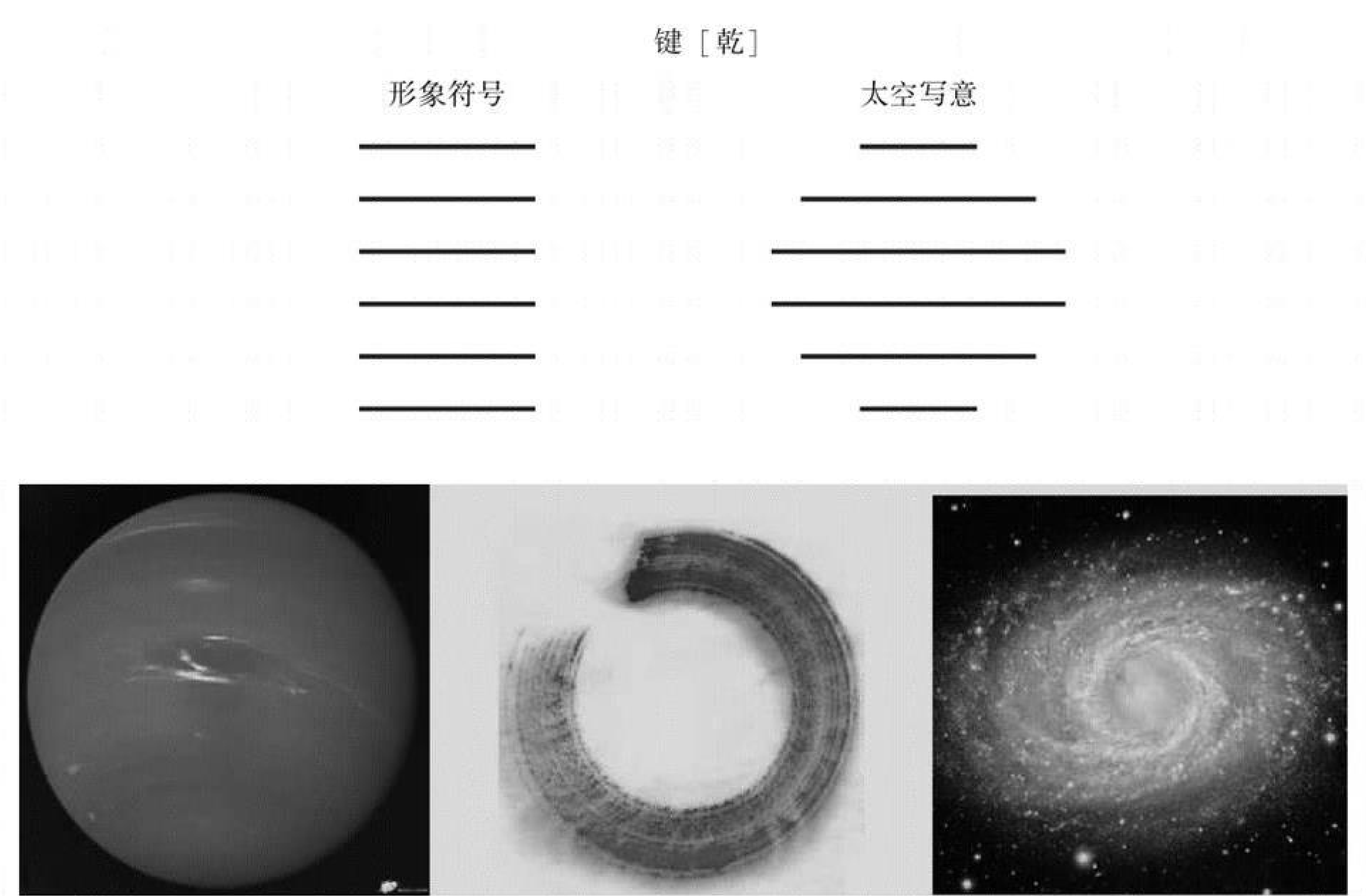






组图 6-25　三星堆出土的龙虎青铜器物

殷商末年周文王所著的《周易》这部书，是古人根据大自然中平衡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通过左脑控制逻辑思维、右脑控制形象思维，通过阴阳、左右平衡，把八卦两两互相组合而成的六十四个卦。《周易》可用于占卜，六十四个卦中只有第一卦［乾］和最后一卦［坤］的爻辞中提到了“龙”字，而且键［乾］、川［坤］两卦都可以通过形象符号的变形（圆形，组图6－26、组图6－27）来写意描述宇宙、地球以及大自然中的所有生物的生命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



组图6－26　变形的符号写意——太空苍穹

键［乾］卦卦辞：

键［乾］，元，亨，利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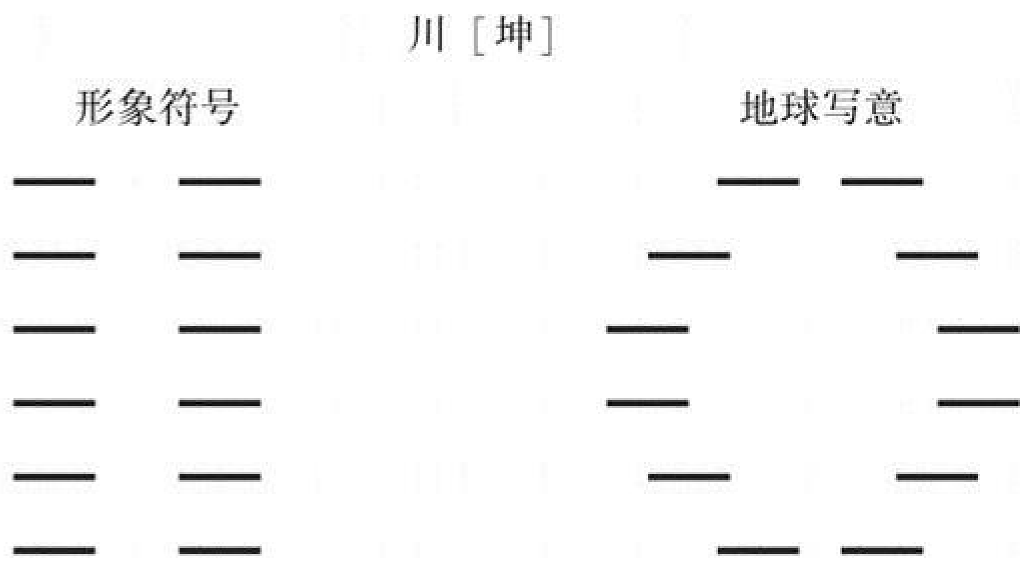
晴暗变化而浩瀚无垠的太空，就像是一个始终在运动着的大外壳，象征着在富饶的宇宙大自然中，到处都充满飘浮运动着的勃勃生机，积聚着自强不息的健康生命，就像所有的生物、动物和人们开始就在凝聚着健康的心理生命势能一样，一开始就好，是自然、亨通、有利的征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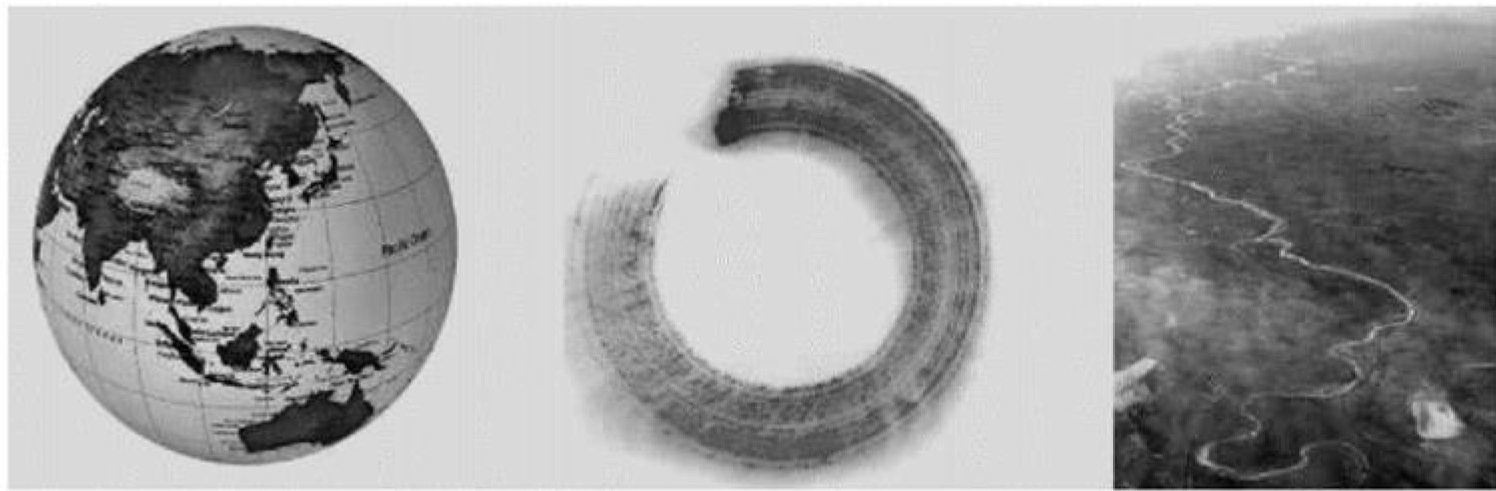
键［乾］（主体现象）

———— 父母壬戌土　世
———— 兄弟壬申金
———— 官鬼壬午火
———— 父母甲辰土　应
———— 妻财甲寅木
———— 子孙甲子水

键［乾］卦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共同写意了一个自然现象——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以及所有生物、动物的心理生命，都充满着自强不息的勃勃生机。卦辞的准确理解就要应用中国古人左脑的逻辑思维和右脑的形象思维方式来解读。核心之意就是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的生命，都遵循着像龙一样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在积极循环、旋转、轮回、和谐地变化。这也是商周时代的人们对宇宙和自然的崇拜，对自强不息的象征和追求。

川［坤］





组图 6－27　变形的写意符号——地球大地

川［坤］卦卦辞：

川［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亡朋，安贞吉。

壮观的地球啊，就像是宇宙中的一匹牝马，在自己的运行轨道上匀速地驰骋。广袤富饶的大平原和黄土地啊，一马平川，这个自然景象真是太好了，一开

始就亨通，就像牝马的生理生命能够自由驰骋和茁壮成长的有利征兆一样，又像君子的生理生命在茂密的植被中寻找出路的时候，一开始迷茫，后来就找到了出路，是有利的征兆。见到这样的景象或占到此卦，往西南方去做事能得到朋友的相助，并能实现像满月一样圆满而明亮的光明目标，往东北方则会失去朋友的相助，实现不了光明的目标，但这是安全的征兆，吉利。

川［坤］（主体现象）

⚋ 子孙癸酉金　世
⚋ 妻财癸亥水
⚋ 兄弟癸丑土
⚋ 官鬼乙卯木　应
⚋ 父母乙巳火
⚋ 兄弟乙未土

川［坤］卦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共同写意了一个自然现象——宇宙大自然中所有生物、动物的生理生命都像地球和大地一样，都充满着能够负载万物的厚德。卦辞的准确理解就要应用中国古人左脑的逻辑思维和右脑的形象思维方式来解读。核心之意就是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的生命，都遵循着像龙一样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在积极循环、旋转、轮回地变化。这也是商周时代的人们对自然和大地的崇拜，对厚德载物的象征和追求。

不仅乾坤两卦可以变为圆的形状，易学中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个卦都能变成循环、旋转、轮回的龙（圆形）。

如果我们对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形纹（图6－28）[①] 和西周时期的玉龙（图6－29）[②]、东周时期的青铜鳄鱼龙（图6－30）[③] 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商周时期的人们用象形的甲骨文字（图6－31）[④] 和卵生变化的动物——鳄鱼，对中国循环、旋转、轮回、和谐的龙文化体系加以了形象拟动物化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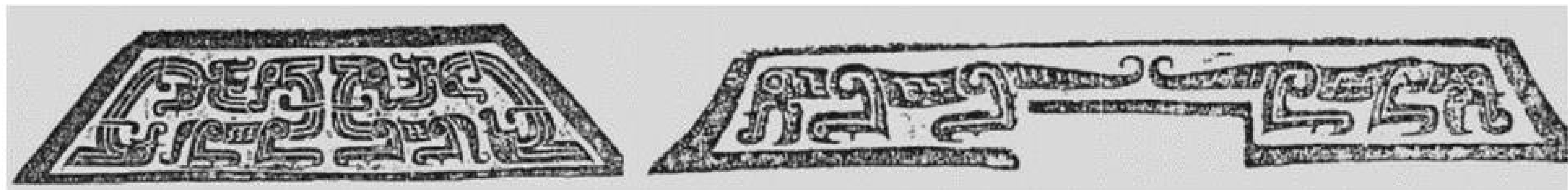


图6－28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形纹

①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插图页。
②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彩页。
③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彩页。
④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插图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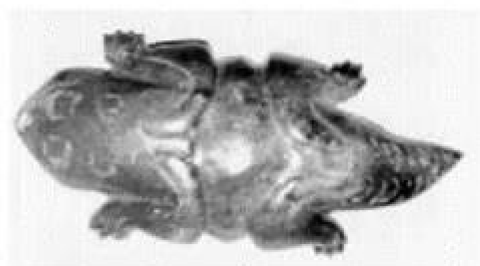


图 6－29　西周时期的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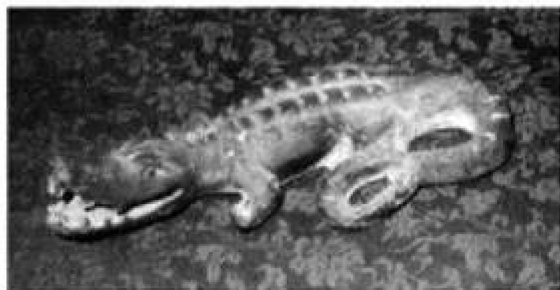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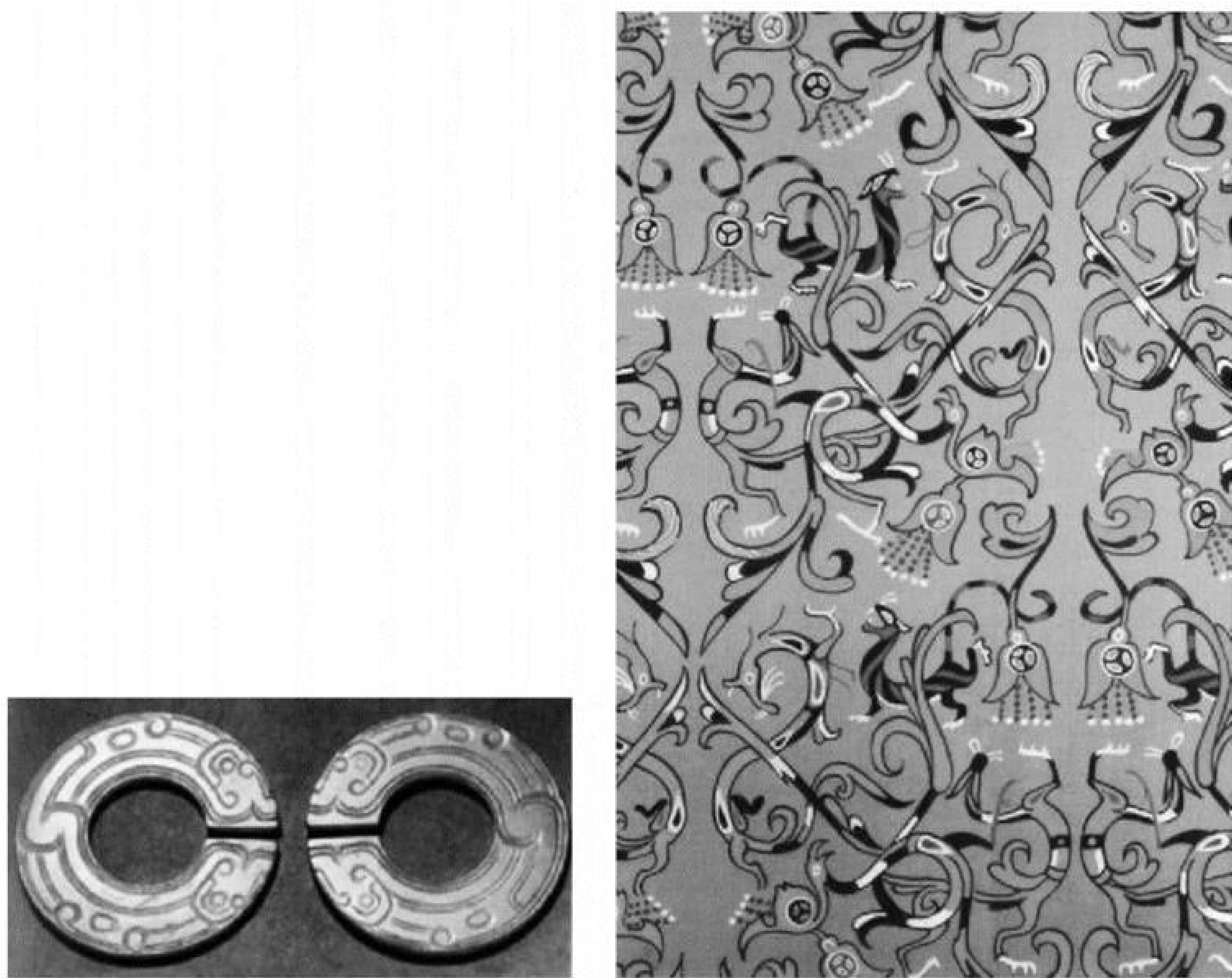


图 6－30　东周时期的青铜鳄鱼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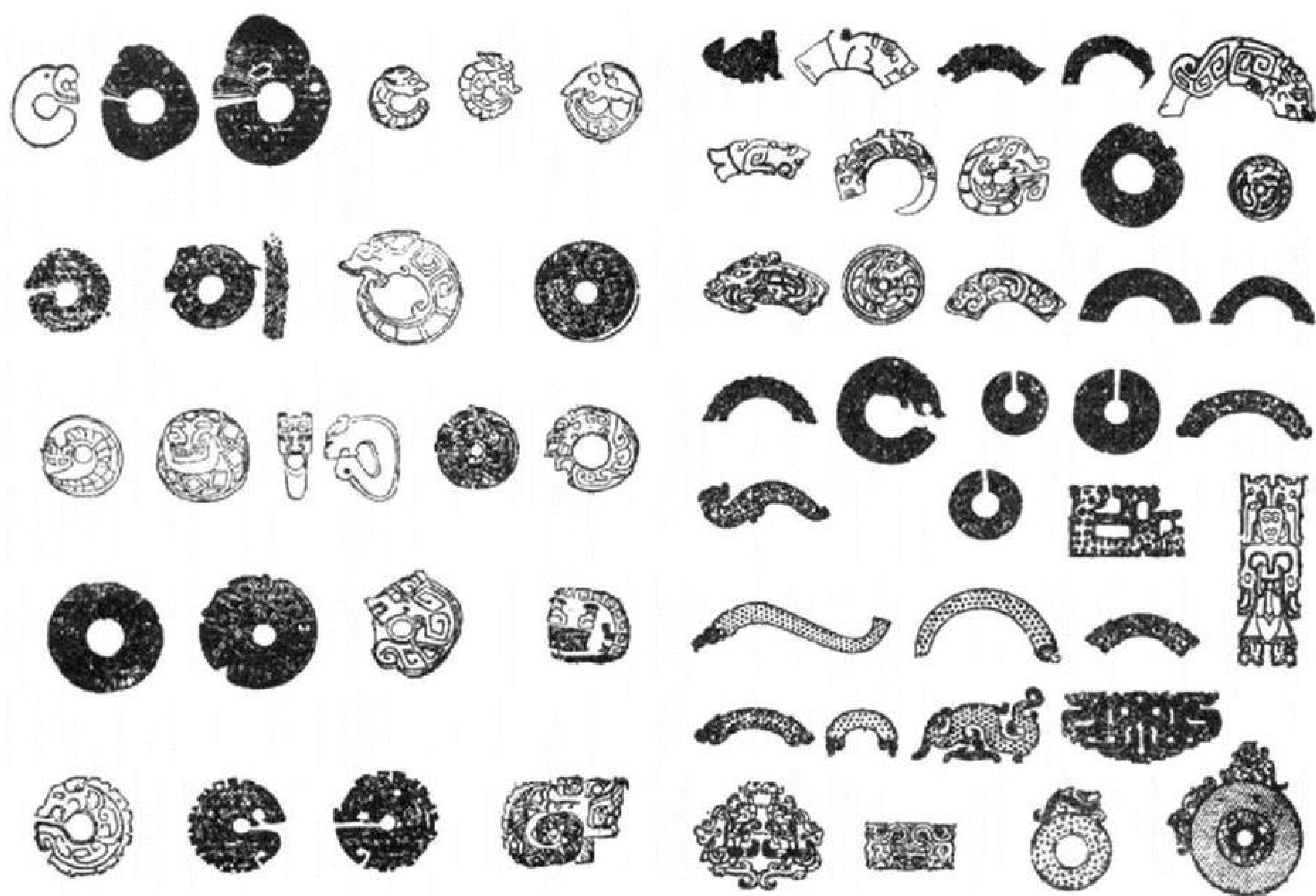
图 6－31　从甲骨文龙字到繁体龙字的演变

从商周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龙形玉器和从湖北江陵马山砖厂 1 号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虎纹刺绣（组图 6－32、组图 6－33）来看，中国的龙文化体系已经在商周时期非常成熟了，而且在以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为代表的巨著《周易》中，只有第一卦键［乾］和第六十四卦川［坤］的爻辞中提到了“龙”字。



组图 6－32　春秋时期的玉玦和从湖北江陵马山砖厂 1 号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虎纹刺绣

从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制作的“龙”之形象和中国古人所造的“龙”字演变，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远古智慧的人们对“龙”的理解和定义，并不仅仅是在针对某一种动物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动物，而是对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能够轮回（组图 6－34）运动变化的一个法则和规律的概括、归类和总结。



组图 6－33



组图 6－34　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的阴阳、循环、旋转、轮回变化龙形图

“龙”针对事物，可以描述它的轮回运动。它既像宇宙、星系、太阳、地球所做的运动，不论是自转还是公转，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轮回的圆周运动；又像每年都有暖、炎、凉、寒的轮回互换，太阳升与落的轮回，白昼与黑夜的轮回，水会积聚与蒸发的轮回，冰与水和汽的轮回等，始终都是在和谐地重复着一个圆的轮回运动。

“龙”针对动物，可以描述它的轮回变化。它既像所有的卵生动物（恐龙类、鳄鱼类、龟虾鱼蟹类、蜥蜴类、蛇类、鸟类等）及蝴蝶蝗虫等昆虫类，经历的混沌、孵化、破壳、成长、排卵、死亡过程，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圆周变

化；又像是所有的胎生动物（人类、兽类、猪羊牛等家畜），经历的孕育、混沌、出生、成长、死亡过程，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圆的阴阳、循环、旋转、轮回变化。

揆诸古文献，《史记·封禅书》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黄龙、地螾均指躯体盘旋弯曲之虫。

"龙"针对植物，也可以描述它的轮回变化。它既像是所有的种子植物，经历的混沌、破壳、成长、开花、结果、死亡过程，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圆周变化；又像是所有的根生植物，经历的混沌、破土、成长、死亡过程，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圆的阴阳、循环、旋转、轮回变化。

"龙"针对人类的心理思想，也可以描述它的轮回变化。在生命的整个过程，无非就是喜、怒、哀、乐、思，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圆的阴阳、循环、旋转、轮回变化。

"龙"针对人类的行为，也可以描述它的轮回变化。在生命的整个过程，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圆的阴阳、循环、旋转、轮回变化。

古人从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中，总结出了它们所共有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形成了客观的龙文化体系，这个龙的文化体系具有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意义，其中包括：

1. 太极阴阳的系统观念（天与地、白与黑、亮与暗、上与下、高与低、热与冷、饱与饥、父与母、男与女、生与死、声与音、动与静、锐与钝、智慧与愚蠢、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等）。

2. 五行的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津、金生水、水生木）与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系统观念。

3. 河图与洛书的系统文化文明。

4. 先天八卦（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与后天八卦（乾［6］、兑［7］、离［9］、震［3］、巽［4］、坎［1］、艮［8］、坤［2］）的系统观念。

5.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及六十甲子的系统观念。

6. 阴年（丑、卯、巳、未、酉、亥）与阳年（子、寅、辰、午、申、戌）的观念。

7. 四季（春、夏、秋、冬）、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隅（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方（上、下、左、右）、八方（东、南、西、北、

东南、西南、西北、东北）的系统观念。

8. 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的系统观念。

以上这些系统观念，既可以归类进许多意思，它们之间还有着逻辑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又诞生、存在于宇宙大自然中，诞生、存在于日月循环、轮回、运动变化中。

这样，用“日月”之组合形成的“易”字，也就无所不包、无所不括地代表了中国的“龙”文化，包含囊括了宇宙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易”也就无比准确地传达这样的信息：只有在东方中国哲学意境才具有系统的自然科学和文明。

小结

一

如果我们把大量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商周文化的考古资料串起来，就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就早已有对龙的崇拜。这个龙的崇拜实际就是龙的传人对宇宙大自然的崇拜，对龙的文化体系的崇拜。即使到了现代，这样的崇拜还在延续着。

二

如果再细究起来，对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轮回变化的运动法则的崇拜与追求，就是对龙文化的崇拜与追求，那么，我们还可以追溯到贾湖文化（距今9000～8000年）时期和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7500年）。

其一，在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圆形石圈、圆形石环、圆形骨环（图6－35、图6－36、图6－37、图6－38、图6－39）[①]，其中非常特别的就是还有C形骨饰和石璜；在红山文化兴隆洼遗址出土的C形玉玦（组图4－8），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将其与表达积极、旋转、循环、轮回、进取、自然和谐的圆形龙文化体系联系起来。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二三、三六、二二、一七、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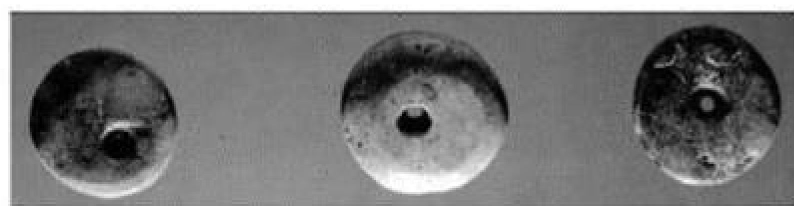


图 6－35　贾湖遗址出土的石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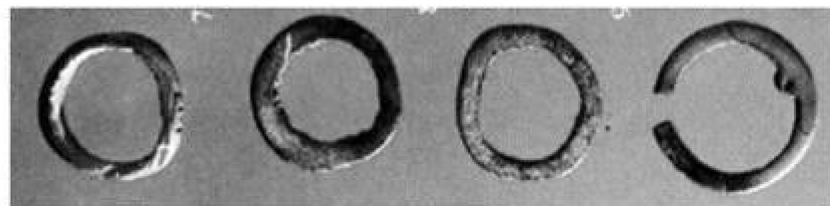


图 6－36　贾湖遗址出土的骨圈和 C 形骨饰



图 6－37　贾湖遗址出土的石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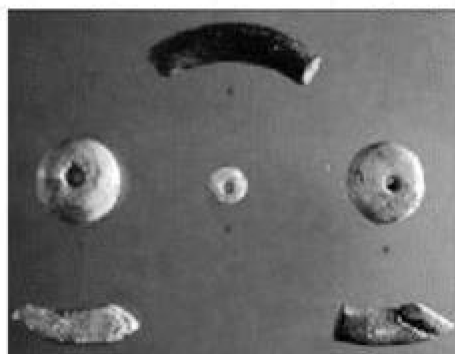


图 6－38　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璜和石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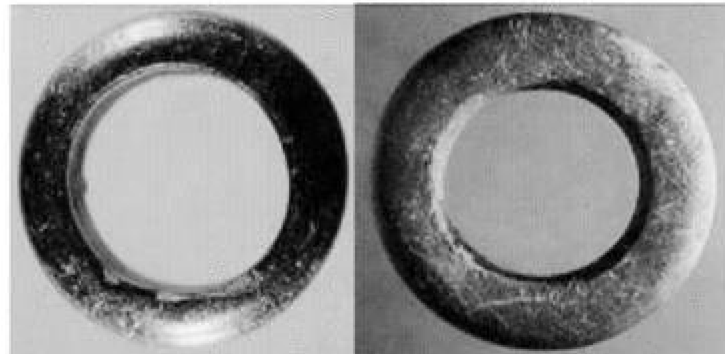


图 6－39　贾湖遗址出土的圆形石环

中国的玉石文化是建立在石器文化基础之上的，只不过玉石的质地比普通的石头更加精美而已。从目前已经发掘掌握的考古学资料来看，中国古人用于表达中国龙文化的精美玉石出现在兴隆洼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时代，从中亦可见兴隆洼文化和凌家滩文化时代的古人对物质材料上的认识与选材比贾湖文化时代的古人更加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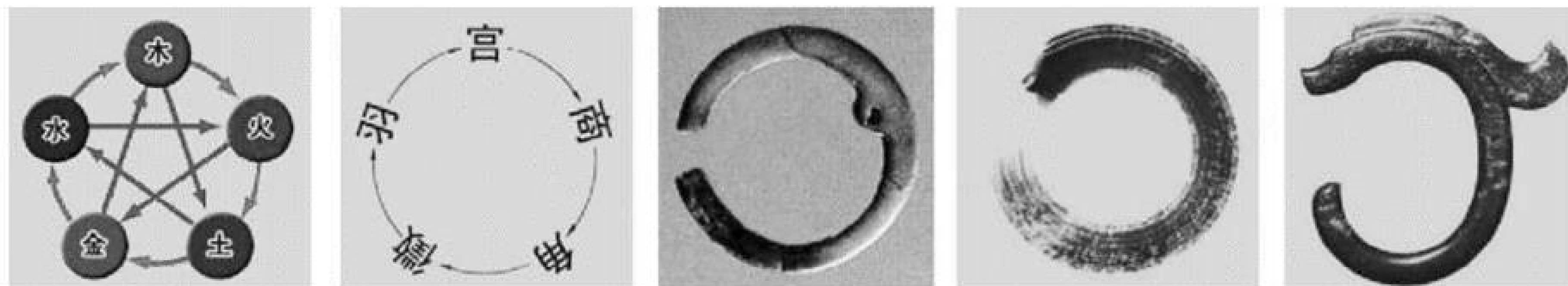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中国古人用于表达中国龙文化体系的骨器和石器实物，到红山文化的兴隆洼遗址出土的 C 形玉玦和玉耳玦，说明距今约 9000～8000 年前的贾湖古人和红山地区的古人已经具有了龙的文化体系的观念。

其二，在贾湖 341 号墓 2 号骨笛（六孔），发音的自然音序为：

$1 = {}^{\#}A$　　1　2　3　5　6　$\dot{1}$　$\dot{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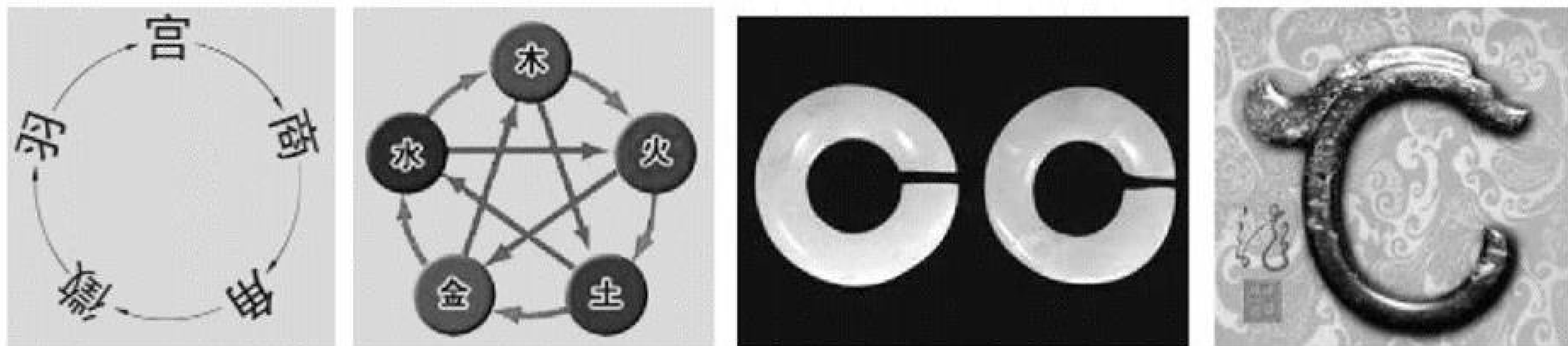
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　（主音：${}^{\#}D6$）

从 341 号墓 2 号骨笛的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 我们可以看出，从 1 到 $\dot{1}$，实际就是相当于完成了一个“宫—商—角—徵—羽—宫”的圆形、旋转、轮回、升级的完整循环过程。这使我们很自然地将其与表达积极、旋转、循环、轮回、进取、自然和谐的圆形龙文化体系联系起来（组图 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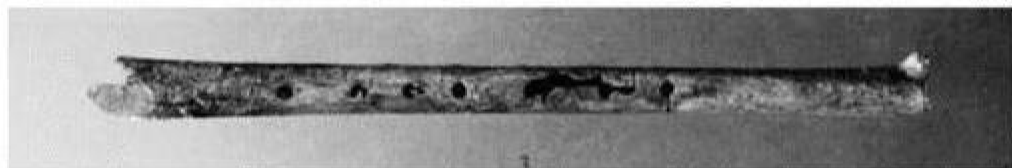
组图 6－40

从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骨笛，可以进行一个八度音阶的排列，即1 2 3 4 5 6 7再到 $\dot{1}$ 的一个循环，这实际也是完成了一个“宫—商—角—徵—羽—宫”的完整循环、旋转、轮回、升级（组图6－41）。这使我们很自然地将其与表达积极、旋转、循环、轮回、进取、自然和谐的圆形龙文化体系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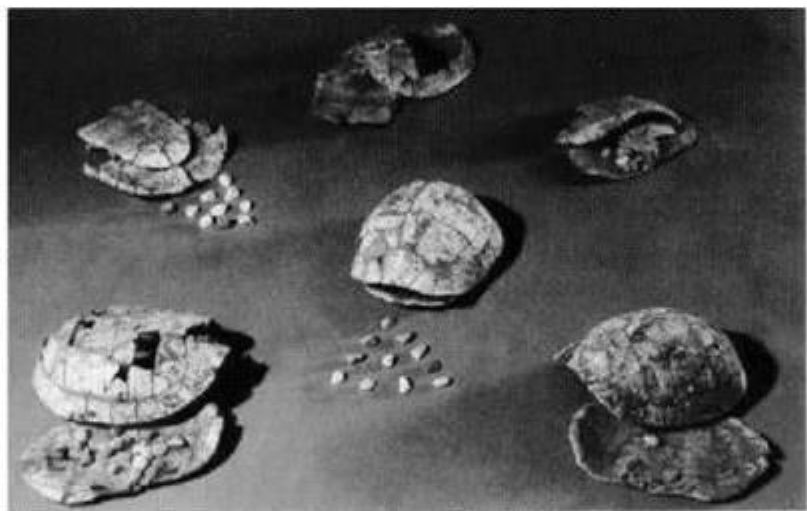


组图6－41 循环、旋转的龙形示意

其三，在贾湖文化遗址233号墓中，除了有骨管出土，在墓主人头部两侧也都有随葬品，左边的一组龟甲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六只龟甲内装满了大小不一的圆形石子，呈黑白两种颜色，在龟甲的腹部有多处用利器刻划出的标志，仿佛是什么特殊的符号（组图6－42）。



233号墓内出土的骨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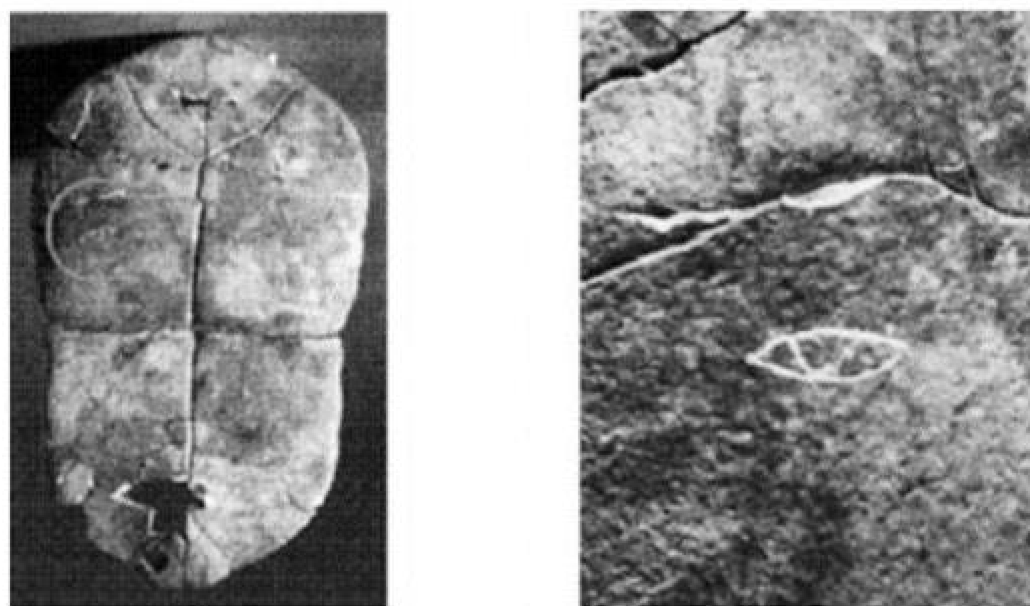
233号墓内出土的龟甲及石子

组图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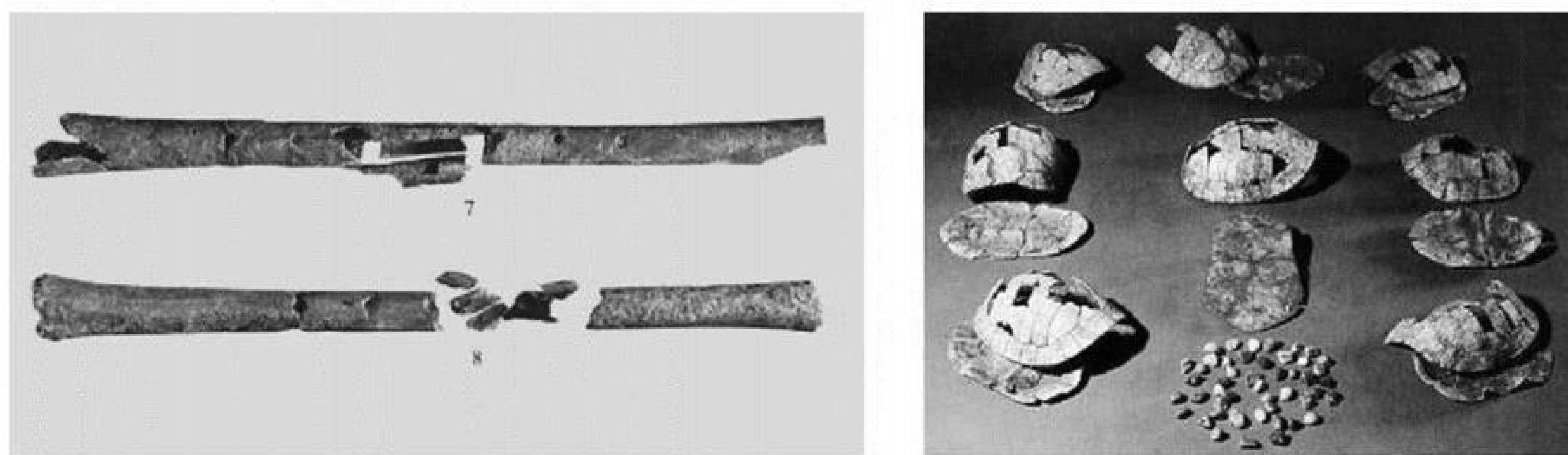
而344号墓的这位墓主人在下葬时，头部就已经不知去向，肩部以上是用八片龟甲堆砌的象征性头骨（组图6－43）。这几片龟甲上也有刻符，与之前的不同，它形象非常鲜明，就像是一只眼睛（或“目”字刻符）。而这片刻着眼睛符号（或“目”字刻符）的龟甲（组图6－44）既像一个人的面具，又像几千年后萨满文化和傩文化所使用的面具。另外，344号墓还土了骨管和用于占卜的龟壳、石子（组图6－45）。



组图 6－43　344 号墓全貌及墓主人头部图片



组图 6－44　344 号墓用龟甲堆砌的象征墓主人头部的头骨
及其中一片龟甲上像眼睛（“目”字）的刻符



344 号墓内出土的骨管　　　344 号墓内出土的龟甲及石子

组图 6－45

为什么墓主人带孔骨管的随葬品中通常会有龟甲，而且有些龟甲表面还刻着神秘的符号？这些龟甲很像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器，而带孔的骨管也很像是在其中某项活动中使用的东西。那么，这些龟甲和骨管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呢？

贾湖遗址周围有大片的湖沼，是龟壳动物理想的栖息地。在中国古人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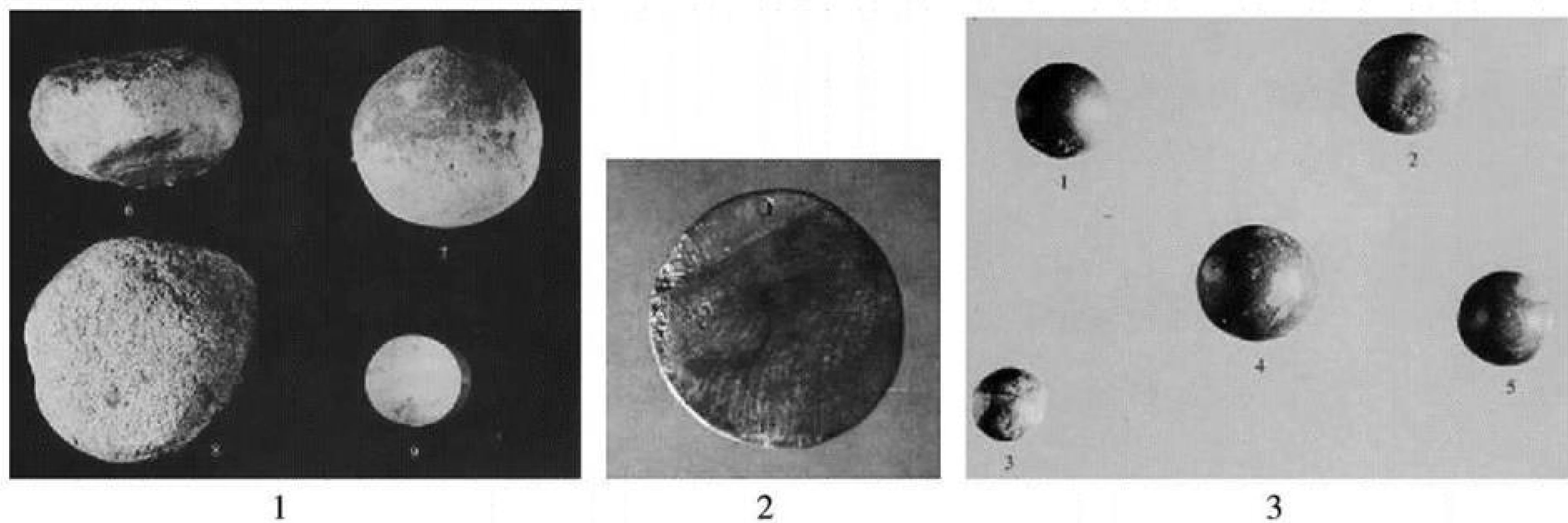
龟是所有动物中最健康长寿的物种，既能够入水（寒、阴），又能够上陆（暖、阳）可以成为通神的灵媒，因此在进行祭祀或占卜时，巫师们常以龟甲作为占卜的用具，也可以说古人用龟甲代表了占卜，代表了那时的文明形态。

这样，我们就可认定233号和344号的墓主人就是部落的首领或巫师，他们拥有生产生活的丰富知识，可以带领族民们打猎耕种，在重要的日子里，他们主持祭祀，为部族的命运卜卦问天，祈求神灵保佑，这其中，他们一定使用过这种骨管。

如果带孔骨管真的是一种祭祀用的法器，那么它们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鸟类研究专家对这一批骨管进行了鉴定，结果发现它们是由丹顶鹤的翅骨所制。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鸟类都被形象地比喻、归类到罗［离］卦里，与太阳、文明有关，是能够在天空飞翔和与天神沟通的物种。

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龟和鹤又都是延年益寿的象征，看来带孔的骨管真的和祭祀仪式与祭祀活动有关，而且这种祭祀活动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龙文化体系有关。

另外，从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圆形骨器、圆球（组图6-46）也能看出，贾湖人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就已经具有了将“乾→圆形→运动→变化→龙”联系在一起的认识。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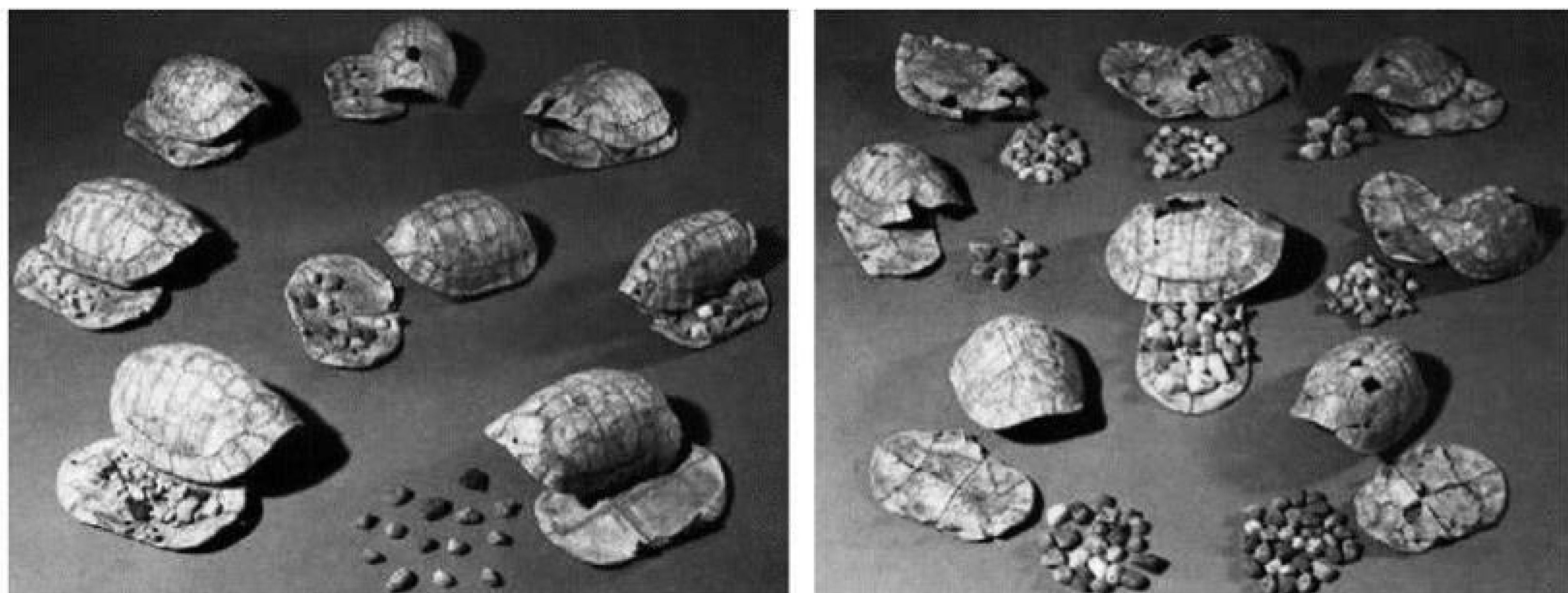
组图6-46

1. 贾湖遗址出土的圆球　2. 圆形骨器　3. 圆球

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用于占卜的龟甲（组图6-47）①，龟甲内还放置着大小均等、颜色明暗不一的石子，立刻就让我们联想到贾湖的古人是在用今天民间还在流传的《周易》分蓍方法，起六爻卦进行占卜的。同时也说明了龟甲是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四二。

占卜的代表。



组图 6－47 贾湖遗址出土的占卜器物

一般情况下，用龟甲和石子起六爻卦，有龟甲上壳代表自然中的天［阳］、下壳代表自然中的地［阴］之意，龟甲内装有 50 枚（太极大衍之数，大衍之数来自股弦各自之积的总和［参第十四章第三节之七］）颜色明［阳］暗［阴］不一的石子，代表天地自然之间的人或事。这样起卦时首先取出 1 枚［体］不用，再从 49 粒石子一分为二开始，依次进行第一变、第二变，一直到第六变，前三变出现一个下卦，后三变出现一个上卦，上下卦组合起来后，再将天干、地支、六亲、世应装入卦中，就形成了一个六爻卦。最后依据天干、地支、六亲、世应之间的刑、合、冲、害、生、克等系统逻辑关系和形象思维就能准确地判断事物的变化发展关系了。

这样的《周易》六爻占卜方法，即使在今天的民间，依然还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六爻占卜，在贾湖文化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了。

新石器时代的贾湖古人，就已经从日月轮回运动变化当中总结出来了易学文化，它无所不包、无所不括地代表了中国的龙文化。

虽然我们还没有在仰韶文化的贾湖时代和红山文化的兴隆洼时代发现系统的中国文字，但通过出土的石璜、石环、骨环、C 形骨环和 C 形玉玦，特别是贾湖时代的七声骨笛和龟甲占卜工具，以及能准确地应用节气规律培育的稻种以及兴隆洼时代的骨笛，我们却发现了贾湖时代和兴隆洼时代的人们已经拥有了和谐成熟的易学文化系统。

和谐的易学文化系统关于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生命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已经被新石器时代的贾湖古人和兴隆洼古人囊括在了循环、旋转、轮回的运动，首尾相接着在积极进取的圆形龙文化当中，并用中国龙文化体系当中特有的

石璜、石环、骨环、C 形骨饰和 C 形玉玦，将距今 9000 ~ 8000 年的龙文化信息传递给了我们。

三

另外，据考古发掘资料，最早的龙形象是在 1994 年发掘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中发现的，这一遗址中有一条距今约 8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图 6 –48），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岩摆塑，全长 19.7 米，龙头部最宽处约 2 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这样，从考古发现中就可以推测，中国龙的起源至少在 8000 年以上。龙文化在中国历久不衰，历朝历代延续不断，可以说是延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文化现象。①



图 6 –48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中发现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

如果再深入研究，对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轮回变化的运动法则的崇拜与追求，就是对龙文化体系的崇拜与追求，我们还可以追溯到贾湖文化（距今 9000 ~ 8000 年）就有的“数”时期。

---

① http：//www. chinadaily. com. cn/dfpd/2012 –02/23/content_ 14672159. htm.

|上 篇|

总结

一

从本篇大量的考古实料可以看出，早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过程中，中国智慧的人们衣、食、住、行的进步与变化，已展现出他们的智慧，他们已具有了对大自然的科学认识，开始具有文化、向往文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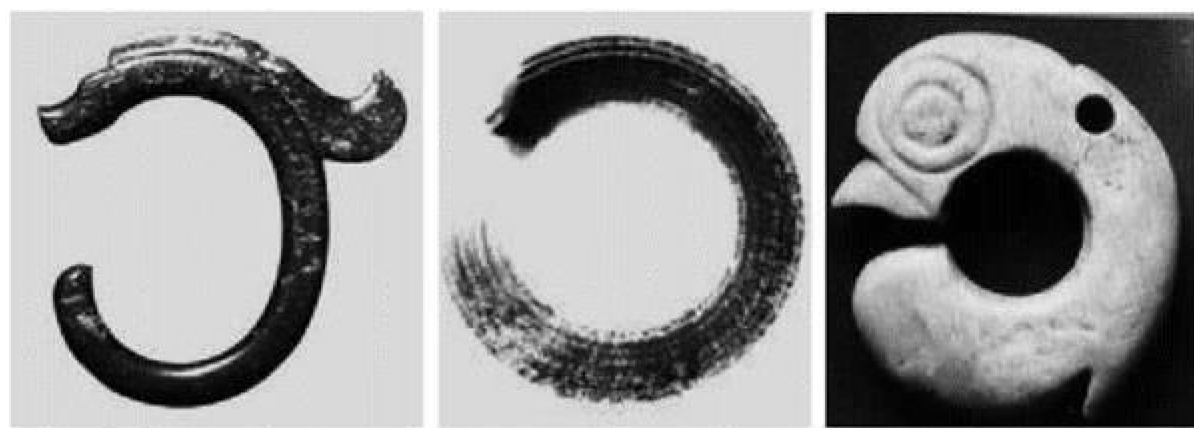
虽然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整个漫长的古人过渡进化过程中，还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但从大量出土的考古实料中仍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智慧的古人就已经具有了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体系的雏形——易学体系，具有了太极、阴阳、天地、经纬、四象、四季、八卦、天干、地支、二十四山、二十四节气等龙文化的观念和知识。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古人就已经具有了易学文化体系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的中国哲学的系统逻辑了。

二

龙与凤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的图腾代表符号（图上总－1），只不过龙的写意所涵盖的内容更广、更大，反映出的是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运动都在进行着一种循环、旋转、轮回的圆形变化，都在自强不息地积极进取以至变化无穷的文化意境。而凤更倾向于写意离卦的理［离］，反映出的是太阳、炎上［向上］、亮丽、付出、充满、网罗、掌握、控制着光明与希望的文明文化意境。

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早就明白，正是因为太阳像火焰一样不断地燃烧自己、向周围释放出自己的热能与光芒，用自己无形的光芒之手去推动和作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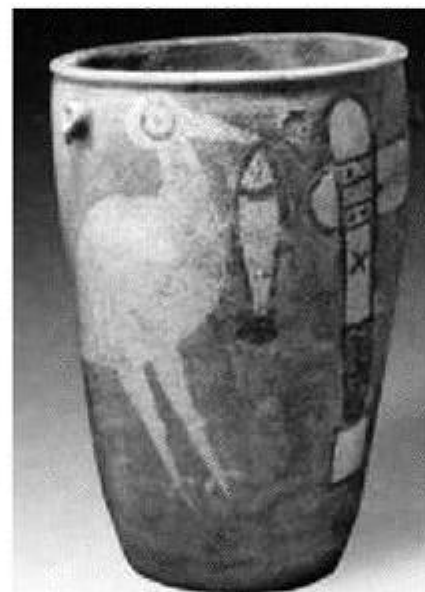


图上总－1　龙凤的写意符号

大家，才形成了自己无比强大的凝聚力，使五行（金、木、水、火、土）始终在紧紧地围绕着自己才能首尾相接着旋转运动，使万物只能在沐浴了阳光之后才能茁壮地成长，使人类只有了解掌握了太阳一样的核心文明才能不断地进步。所以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只用了龙与凤的图腾，就明确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念：只要你明白了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像龙一样的积极运动法则并掌握了客观变化规律，那么你就可以尽量地去用像凤凰、太阳一样的核心文化去网罗、掌握、控制这个法则和规律，去网罗、掌握、控制这个光明与希望，去促使自己进步，这就是人类所需要的文明。

这就如同在哲学的逻辑中，男人［乾、键］征服了世界［震、辰］，而女人［离、罗］却征服了男人［乾、键］是一样的道理。

从仰韶文化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彩陶缸（图上总－2）[①] 上的这幅图画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鹳鸟［阳］与鱼［阴］形成了一幅表现阴阳之意的画意，鹳鸟［太阳鸟、凤、阳、文明］控制了鱼［阴、黑暗、混乱］，即表达了古人依靠属阳的文明控制住了属阴的黑暗与混乱之意。石斧代表权力、控制之意，这样也就表达出了古人控制住了阴阳、左右、平衡之意，表达出古人明白了阴阳就能够运用这个文化尽量地达到控制自我、控制事物之意。



图上总－2　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彩陶缸

古人知道左脑控制逻辑思维，右脑控制形象思维。左右大脑只有同时开发，大脑的思维和认识才能均衡地同时发展。易讲究阴阳平衡、自然和谐，人类的左右脑只有同时开发了，才能谈得上平衡和谐，就像六十四个卦是八卦两两互相组合而成的一样，这样才符合大自然中平衡和谐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

---

① 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彩页。

所以在古时候还没有诞生系统文字的时候，人们在艺术品中表现出来的全是形象思维的东西。其实，逻辑的思维早就在他们那时的脑子里成熟了，只不过是那时还没有诞生出来系统的文字，自然没法写出来了，也没法遗留下来让我们看到了。可是图画不也是一种直观的表达方式吗？只不过有的图画抽象一些而已。可是话说回来，哲学中的逻辑同样不也同样吗？

所以，我们只要通过中国古人遗留给我们的易学文化以及易学基础下的理论中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就能轻易地解读出来古人遗留给我们的一幅幅画意，就像只要通过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就能轻易地解读出来毕加索的一幅幅表现男女、上下、动静、内外、远近、阴阳、平衡、和谐的画意一样。

不管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怎样的千变万化，它们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却最终是阴阳平衡的，阴阳的平衡才是人们所要追求的文明核心。

不断平衡就像一个不断旋转的陀螺能够进行自我控制一样，就像大自然的龙与凤在不断地变化一样，能够形成一个个不断积极旋转、循环、轮回、前进的圆，这就是首尾相接的、与自然和谐的中国龙文化系统与凤文化系统。

三

从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乐理学里的七音阶的形成经过了曲折复杂的历程。那么，世界其他民族是否就没有类似的过程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研究员指出：“世界上无论东、西方的各种民族，只要是远古和古代音乐史料的遗存足以判明其音乐发展情况的，几乎无不采用过五声音阶作为其本民族的调式基础。”[①] 黄先生以希腊为例加以说明。古希腊的音阶发展，经历了三声音阶（相当于中国的徵、宫、商）、四声音阶（相当于中国的徵、羽、宫、商）、五声音阶（相当于中国的徵、羽、宫、商、角）的过程。可见古希腊的音阶，是以徵、宫、商结构的四度、五度音程为骨干的。古希腊人重视四、五度的谐和关系，而古代中国重视小三度谐和关系。正是这种音阶骨干音上的差别，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曲调型的差异，从而造成了民族音乐的多样性。

为什么不同民族的音阶骨干音会有所不同呢？

黄先生指出，这与不同民族的语言有着密切关系。例如，五行思想诞生后，

① http：//www. wuyang. gov. cn/jhwh/zho2/zho2 oog. htm.

受到人们的喜爱，因而将万事万物都归纳到五行的系统框架之中。将五声与五行相配，显然要比用七音配五行合适。另外，儒家文化偏爱和谐，表现在音乐中，认为宫、商、角、徵、羽五音比较和谐，“二变”出现在乐声中会产生不和谐，因而不太喜欢用变宫、变羽之声。这是民族的审美意识习惯使然。因此，尽管早已有了七声音阶，但古人还是坚持以五声音阶为主。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子大叔在回答赵简子关于揖让、周旋之礼的问题时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意思是说，各种各样的歌曲，各个地区的民歌，不论用七音，还是用六音，都是以“五声”为主。古代音乐术语以“变”表示低半音，“变宫”表示比宫音低半音，“变徵”表示比徵音低半音。两个变声的出现，表明七声音阶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当时以七声音阶为主，而是将它们作为五声音阶的辅助，其骨干音仍然是“宫、商、角、徵、羽”系统。

所以，尽管我们非常清楚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具有了七声音阶，但那时还是在尽量普遍使用着“宫［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的五声音阶系统。黄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音阶的确立，可能是人们从多于七声或五声的乐音序列中选择的结果，其中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又从繁杂复归于单纯的过程，即“由简单的、不甚稳定的‘少’发展到精选的、稳定状态的‘少’”。

从这就可以看出，尽管我们没有发现中国系统的文字在贾湖文化的那个时代诞生出来，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五行的思想系统已经表现在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当中。

341号墓2号骨笛的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我们可以看出，从1到 $\dot{1}$，实际相当于完成了一个“宫—商—角—徵—羽—宫”的积极循环、旋转、轮回、升级、进取、完整、圆形的系统。这使我们很容易地将其与表达旋转、循环、轮回、首尾相接、和谐与积极进取的圆形龙文化体系联系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相当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再生木的五行相生的哲学逻辑关系已经存在于旋转、循环、往复、轮回、首尾相接的积极进取的圆形的中国龙文化体系中了。从中还可以看出，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文化就是在强调一个“变”字，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大自然的日月、阴阳、变化——“易”。“易”既是阴阳平衡、客观存在、自然和谐的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也是积极、循环、旋转、往复、轮回的中国龙文化体系，易学的文化核心就是取自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而且在最能够代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作品——《周易》的六十四卦中，只有在乾、坤

的两卦爻辞里提到了“龙”字。

四

我们知道，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宁和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湖南和湖北地区的石家河和屈家岭文化显示出了在公元前3500多年的时期，这些地区都有了明显的城与国的等级差别。按照国家是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有组织、有区域的政权的理论，这个时期已经是天下万国或天下万邦了。从这些地区贵族墓出土的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玉器文化上看，笔者认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易学理论，并将易学文化应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祭祀中。

五

龙与凤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的图腾代表，但凤文化又更多的像是在崇拜太阳神、太阳鸟，像是表达我们祖先向往光明、追求希望与文明的心声。仔细看来，光明也好，文明也好，希望也好，说来说去对应的都是一种阳气，而中医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的核心理论——圆运动的一气周流，说的也恰恰是大自然和人体对应的阳气［中气］。一气周流也是天地万物生命的共同运动规律，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体，中气［阳气］只要能够保证像太阳［阳气］一样的东升西降，像龙、凤一样的轮回旋转，那么生命就不会停止，总是会充满阳光、充满朝气的，这就是易的自然运动法则与医的核心目的（组图上总-3），也是易道、医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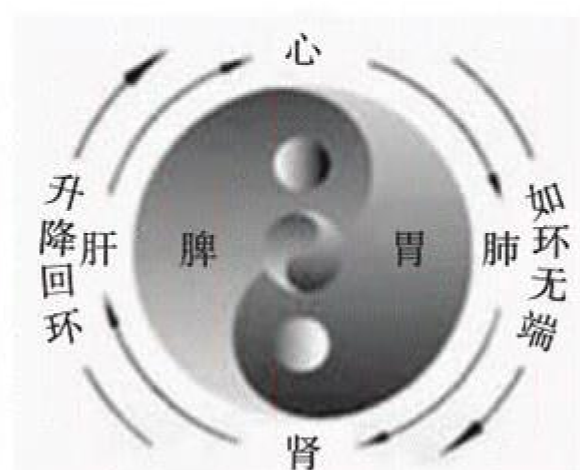
为何宫、商、角、徵、羽能够与现代音阶1、2、3、5、6依次排序对应起来？这就涉及了中国传统中医当中五运六气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的关系。

在传统的易学当中有一个类比、归类的“同象理论”，就是将人体五脏六腑之五行的运行与一年当中各个季节五行的岁气［运气］完全能够对应结合起来，在中医的五运六气当中叫做主运，即五运之气分主于一年各个季节的自然岁气［运气］。

而这个运气［岁气］的建立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的对应却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五运之气与五音都与易学文化中的十天干的化合有关系。宫为土音，








组图上总－3　自然与人体的一气周流图




组图上总－4　五运六气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的关系图

对应土运，因甲己合化土；商为金音，对应金运，因乙庚合化金；羽为水音，对应水运，因丙辛合化水；角为木音，对应木音，因丁壬合化木；徵为火音，对应火运，因戊癸合化火。

（二）宫音最浊、最长、最下；商音次浊、次长、次下；角音界于清浊、长

短、高下之间；徵音次清、次短、次高；羽音最清、最短、最高。依次排列、循环。[1] 而五音的三个属性是与五行之物对应之后的结论。比如：羽最清，是指物体水最清；羽最短，是指从天上飘落的雪花形状像最短小的羽毛；羽最高，是指雨水可从最高的天空降落。依此类推。

综合以上两个原因，就是为何远古时代与五行对应的五个常用古音阶宫、商、角、徵、羽需要如此排列、循环，并且能够与现代音阶的1、2、3、5、6依次排列、对应，而不乱序的原因（组图上总 -4）。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中，唯独鸟儿的鸣叫才具有婉转歌唱的能力，也只有它们鸣叫出的旋律才能与五音的音阶配合起来，才能使旋律像龙、凤一样的回旋、轮回起来，这难道是巧合吗？这就是自然，这就是易，这就是为何从贾湖和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骨笛为何要用禽鸟的翅骨来制作的原因了。

---

① 《任应秋运气学说六讲》，任廷革整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第52页。

中　篇

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

| 第七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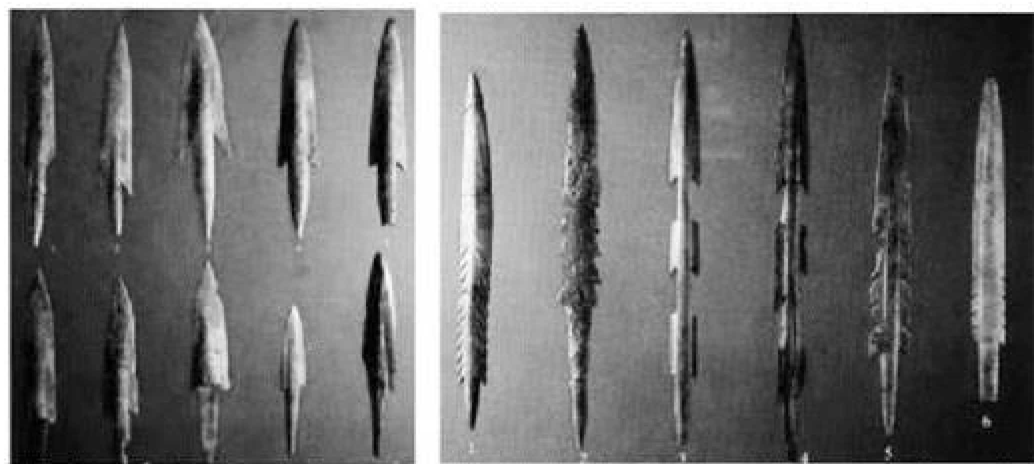
贾湖文化时期的易学

第一节　贾湖古人的智慧

在上篇衣、食、住、行的章节中，笔者通过大量考古发掘的文物图片，阐述了贾湖古人在距今约 9000～8000 年的时候，就已具有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系统理论中阴阳、天地、经纬、宫商角徵羽、五行、文明、龙等系统的知识观念。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些在贾湖遗址发掘出的文物图片，阐述贾湖古人在那时也已经具有的其他一些易学系统中的知识观念。

一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镞与骨镖（组图 7－1）[①] 形制上，我们可以看出，贾湖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具有了顺利与阻逆的阴阳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充分地应用到狩猎的工具中。



组图 7－1　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镞与骨镖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二五、二八。

二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石镰（图7-2）[①] 的形制上，我们可以看出，贾湖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具有了锋利与钝化的系统阴阳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充分地应用到谷物等农作物的收割工具中。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图7-3）[②] 形制上，我们可以看出，贾湖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具有了对农作物进行加工的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充分地应用在了农作物加工的工具中。

三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盆形鼎（图7-4、图7-5）[③] 三足的形制上，我们可以看出，贾湖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具有了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和三足鼎立的平衡的知识，并将这种知识到充分地应用到日常生活用品当中。

从M22：3侈口罐（图7-4）腹上部附加8个对称等距的圆锥状乳钉纹，我们可以看出，贾湖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具有了八数、八方、八卦等系统的观念，并将这种观念充分地应用到日常生活用品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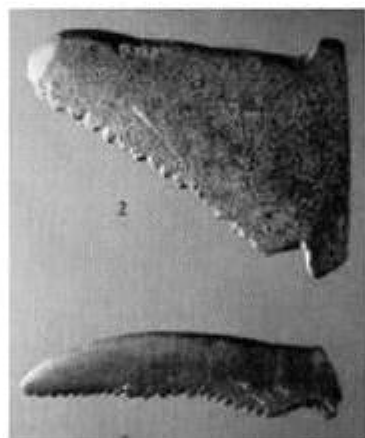


图7-2 贾湖遗赴出土的石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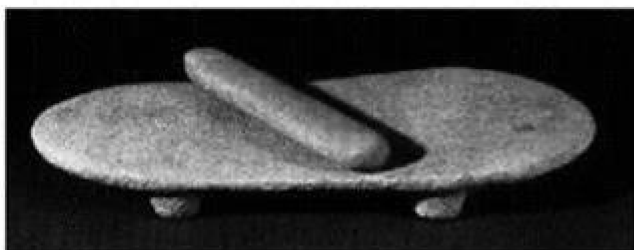


图7-3 贾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



图7-4 盆形鼎和侈口罐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八。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八。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第254页，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一一三。



图 7－5　盆形鼎



图 7－6　折肩壶和侈口罐

四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折肩壶的双耳和侈口罐（图 7－6）① 肩部带有 4 个对称横鋬的形制上，我们可以看出，贾湖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具有了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四方、四季系统概念，以及对称、平衡的观念，并将这种系统的观念充分地应用在了日常生活用品当中。

五

特别是 B 型釜（H105：7，图 7－7）② 的形制，在一周 4 个横鋬之间附加了 25 个扁椎状钉纹。从图上来看，本应该一周每 2 个横鋬之间附加 6 个扁椎状钉纹，而其中有 1 个横鋬之间却附加了 7 个。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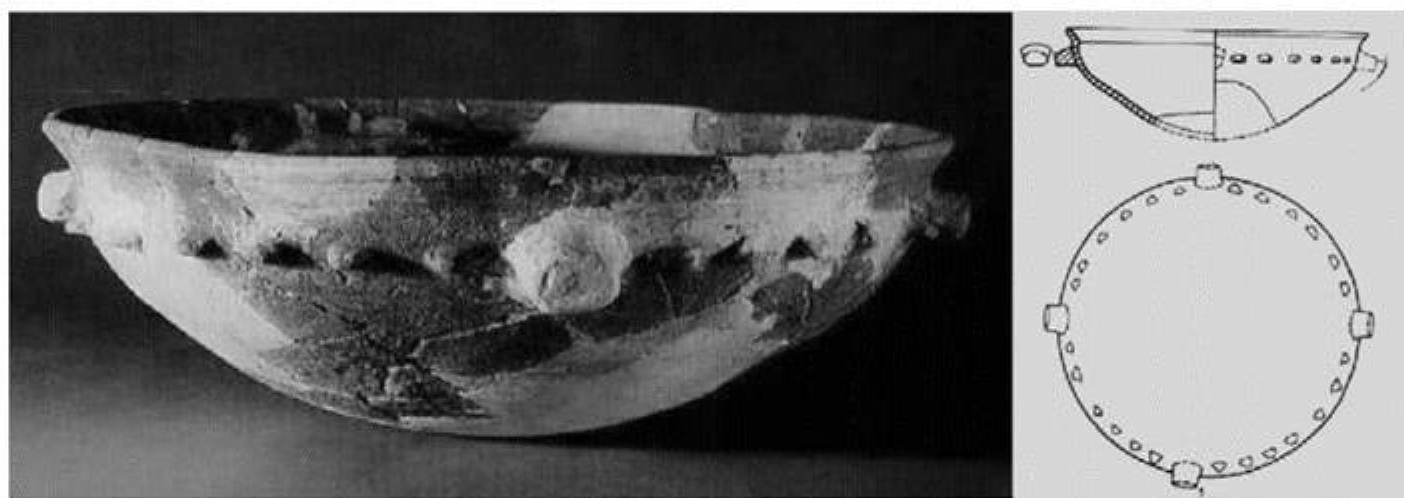


图 7－7　B 型釜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第 254 页，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一。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第 254 页，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二。

③ 在考古文献《舞阳贾湖》一书第 254 页中却是“上腹饰一周 28 个扁乳钉，分四组［每组 7 个］，每组之间各装一个共 4 个短方柱状横置器把，造型较为独特”这样的记载描述。考古文献的文字记载和描图有一点差别。

既然能把其中3个横鋬之间都准确地附加上6个扁椎状钉纹，说明制陶者本人是具有对称、平衡的知识和观念的。另外1个横鋬之间的7个扁椎状钉纹只能有三种解释：或者是制陶者由于自己的粗心给搞错了；或者是考古工作者在描图时给描错了；或者是考古工作者在修复过程中搞错了。

如果不算这搞错的7个扁椎状钉纹，也按其他3组6个扁椎状钉纹来计算，就会出现对称、平衡的4、6、7、24和28这几组数字观念。此B型釜直径约40厘米，这样大的一个釜，很可能是那时贾湖人用于祭祀大自然时的礼器，或在祭祀大自然时用于盛祭品——食物的礼器。

六

从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尖底带耳陶罐瓶（图7－8）[①]，这种形制的陶罐瓶是贾湖古人专门用来从井里或河里、湖里提水的。正是由于把陶罐瓶设计成了尖底，瓶子才更容易在水面上倾倒汲水。从尖底带耳陶罐瓶的设计来看，贾湖古人在物理学的知识上具有很高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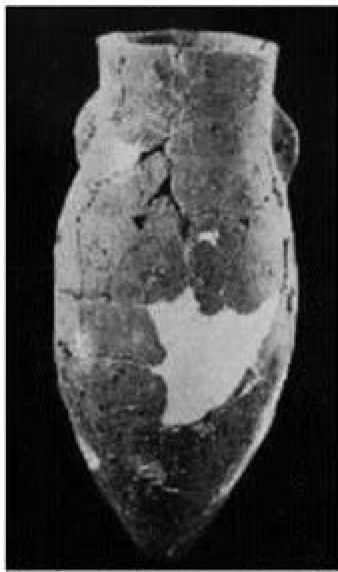


图7－8　尖底带耳陶罐瓶

七

从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骨板（组图7－9）[②]，形象非常像骨柄，有的是单个的。但是有的在大小、孔眼、刻痕形制上却是一模一样，而且是以阴阳的形式成双、成对出土的，有的还与骨笛在同一墓葬中同时出土（组图7－9中5块骨板就出土于282号墓）。



组图7－9　贾湖遗址出土的骨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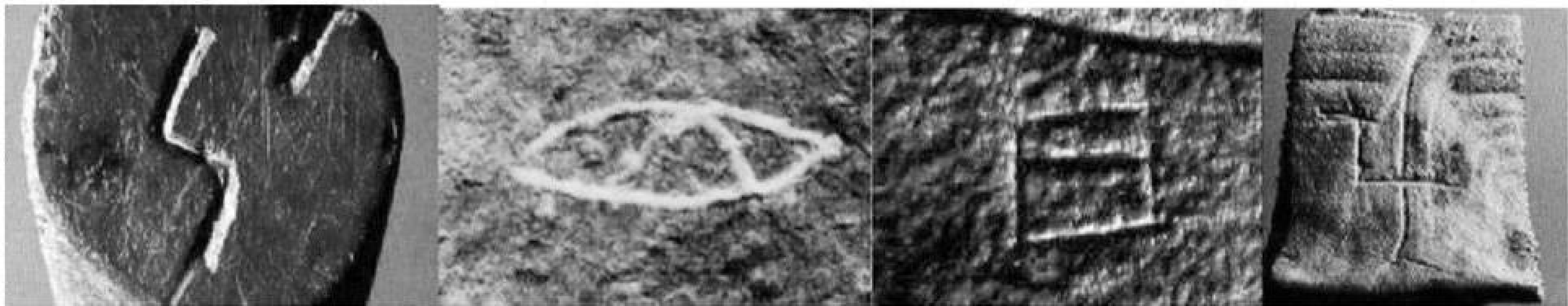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图版五九。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三〇、三一。

这说明了什么?

笔者认为，这种形制一样的骨板，能够与骨笛同时出土，只能说明它是一种配合骨笛旋律进行节奏打击的骨板，或者说又是一种类似于快板、竹板等说唱艺术的娱乐工具。因为从贾湖遗址282号墓（距今约8550～8150年）出土的骨笛已具有了七声音节来看，说明处在贾湖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丰衣足食了，音乐与娱乐生活也已经是丰富多彩的了。如果我们就此推论出这种形制一样的骨板，是一种类似于快板、竹板等说唱艺术的娱乐工具，那么就说明在贾湖地区，贾湖时代的先民就已经具有了用于快板说唱艺术的系统共同语言，这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我们把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石刻符和龟甲刻符（组图7－10）[①] 对应到中国最古老的易学系统文化理论知识中，这样来看，这几个刻符就真的成为中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了。这说明那个时候的贾湖先民已经有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后的象形文字了，只不过文字被极少数地位比较高的人掌握。不管文字是被极少数的人掌握还是被多数人掌握，只要人们有了文字，就说明人们已经具有了系统的共同语言，那么用语言进行快板说唱的艺术娱乐也就很自然了。



组图7－10　贾湖石刻符号与龟甲符号

我们再回过头看，即使在今天，不识字的人们还有许多，虽然他们都不识字，但依然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彼此对话的基本交流。对他们来说，文字的缺憾也并不十分影响他们正常的基本生活。

八

特别是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用于占卜的龟甲[②]（图7－11），龟甲内还放置着大小均等、颜色不一、数量不一的石子（随意放一些石子即可起到用此进行占卜之意，没必要放50粒），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贾湖的古人是在用今天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四七、四八。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四二。

民间还在流传的《周易》分蓍方法，起六爻卦进行占卜的。同时也说明，贾湖的古人完全具有“数”、数字甚至数学概念，而且“数”的感觉与数学逻辑还很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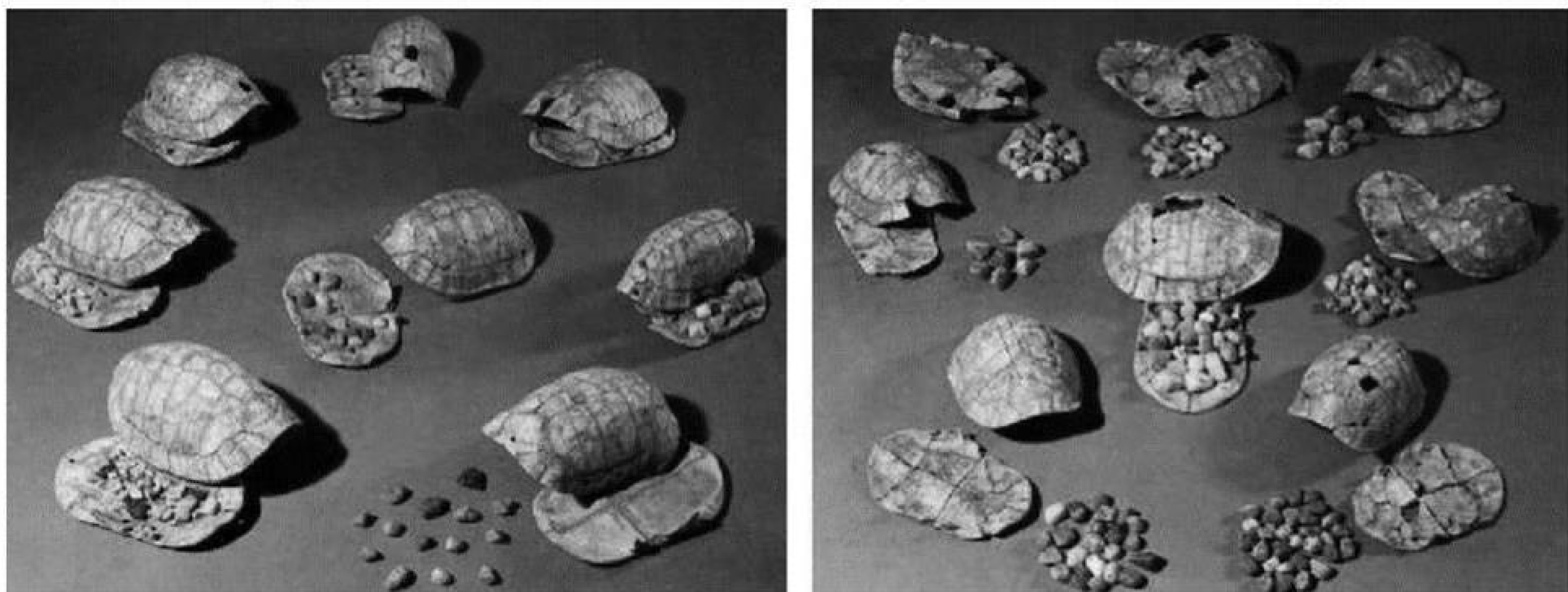


图 7－11　贾湖遗址出土的占卜器物

这样的《周易》六爻占卜方法，即使在今天的民间依然在流传。所以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六爻占卜在贾湖文化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了。

第二节　贾湖文化时期的音学、天学、历法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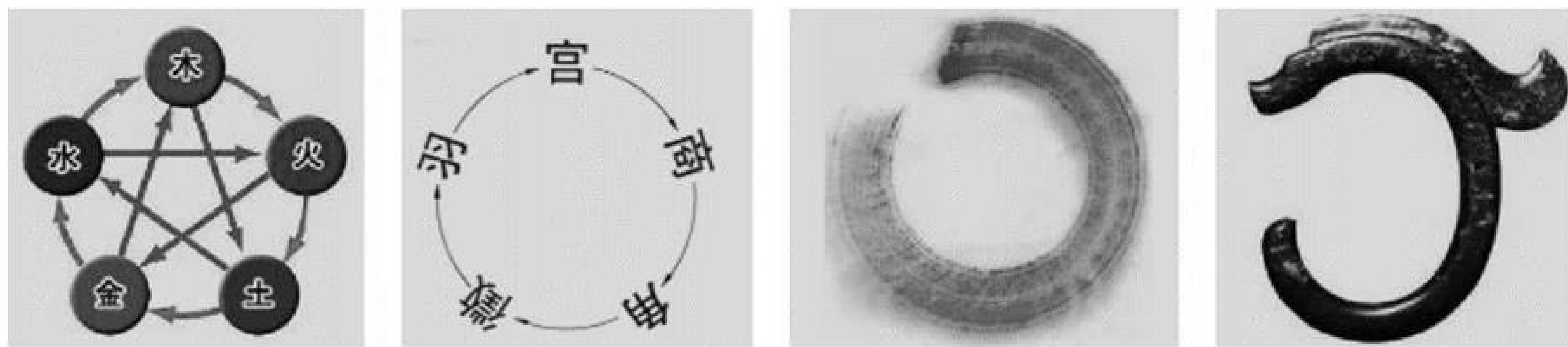
从 341 号墓出土的 2 号骨笛的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我们可以看出，从 1 到 $\dot{1}$ 相当于完成了从“宫→商→角→徵→羽→宫”的循环，这是一个完整的旋转、轮回、升级的系统。

1 ＝$^{\#}$A　　1 2 3 5 6 $\dot{1}$ $\dot{3}$

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dot{1}$　（主音：$^{\#}$D6）

这就说明，在贾湖文化时期，智慧的贾湖古人就已经具有了与“宫、商、角、徵、羽”与之相应的“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系统观念。“宫→商→角→徵→羽→再宫”的系统循环，就相当于“木→火→土→金→水→木”的循

环，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旋转、轮回、升级的龙文化系统（组图7－12）。



组图7－12　循环、旋转的龙形示意图

二

孔子及其弟子们在《系辞上传》中提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孔子及其弟子们在《系辞下传》中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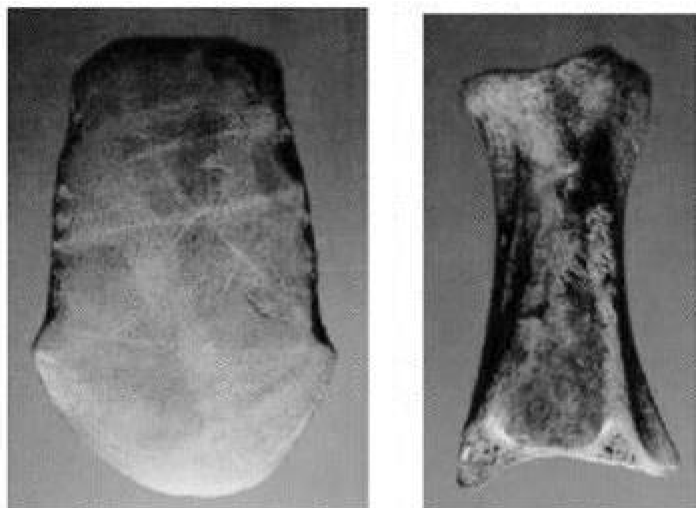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孔子及其弟子们在《系辞下传》中告诉我们：“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说明耜、耒、耒耨等农耕生产用具的发明与使用，是在包牺氏之后，神农氏执政的时代。而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石铲和骨耜（组图7－13）[①] 是中国考古学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农业生产工具，说明距今约9000～8000年的贾湖时代应当是神农氏执政的时代。



组图7－13　贾湖遗址出土的石铲和骨耜

孔子及其弟子们在十翼《系辞下传》中还告诉我们，易学八卦诞生在包牺氏（伏羲氏）执政的时代，正好与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占卜器物和对骨笛音质的实测，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阴阳、八卦、五行原理的应用不牒。这也有力地证明了人们在神农氏执政的时代，已经能够熟练地实际应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八卦六爻易术进行占卜实践了。

这也说明，传说中的包牺氏执政的时候——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六爻八卦易术筮法诞生的时代，应当比距今约9000～8000年的贾湖时代还要早。

三

孔子及其弟子们在十翼《系辞下传》中还告诉我们：“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明在包牺氏执政的时代，智慧的古人就仰观天象，俯则观法于地，将宇宙星象的运动规律与大地四季万物的生长变化法则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找出了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创作了易学八卦，将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归类到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的八个卦中，以通神明之德。就是说，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文明体系，在包牺氏执政的时代里，就由智慧的古人从天学中总结出来了。

从贾湖古笛中的“宫、商、角、徵、羽”系统到相应的“木、火、土、金、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彩版一八。

水”系统，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是通过“仰则观象于天”的天学，把五行的系统概念与星象中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五星系统对应了起来。

古人是通过“俯则观法于地”把五行的系统概念与大地上四季万物生命运动的生长变化法则对应起来。

四

通过上一节我们知道，贾湖的古人是完全具有数字、数学甚至“数”的概念，而且数字的感觉与数学逻辑还非常不错。那么，在贾湖时代之前伏羲氏时代的古人呢？

孔子及其弟子们在《系辞上传》中告诉我们：“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就是说，古人明白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的变化规律，能够像五行一样循环、旋转、轮回地相生，形成一个圆的龙形系统，就像人们每天看到的太阳都是从大地的东方在冉冉升起一样，这是一个圆的龙形系统。

《内经》说：“面南而命其位”，“面北而命其位”，这是在地面观测天象的方法，“昼参日影，夜考极星”。就是说，白天面对南方用日杆测影子方法，可以测定出太阳运动的方位与时辰；夜晚用抬头看着天空北斗七星的方法，可以测定出北斗七星勺柄运动的指向方位与时辰。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对应起来，正好可以将一天（一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与周天、地面的12个方位对应结合起来。

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思维是建立在易学文化体系中阴阳统一对立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像五行一样能够循环、旋转、轮回地相生，形成一个系统圆形的龙文化基础上的；建立在“一物一太极”形象思维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有了“一物一太极”的认识，智慧的人们就可以把宇宙天体中地球绕日运行的黄道，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在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圆形系统的动态运行模型。

在中国北方的中原大地上，一年四季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这样，智慧的人们就可以把地球绕日运行的黄道之圆等分成四份——（四季），将这四份［四季］继续等分下去，还可以继续分到12份，再继续分还可以分到360份，这是理论的计算。古人还发现，一年日月所会之次为12次，就是说太阳与月亮沿黄道运行，全年共实际会合12次，即会有约12个满望月（圆月光），约12个晦朔月（无月光），这是实际的记录。这样人们就会将黄道之圆可分成12份的理论数

值，与实际记录的约 12 个满望月（圆月光）和 12 个晦朔月（无月光）对应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地球绕日运行旋转的一年是 12 个月。智慧的古人还用最笨的刻画横道的方法统计一年日月交替变化的天数，日复一日地等到刻画出的横道对照地面上的植物所发生的自然变化，轮完一个明显的四季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所刻画出的横道大致也是 360 个左右，这是实际的记录。这样人们就会将黄道之圆可分成 360 份的理论数值，与实际记录的大致 360 个横道对应结合起来，就知道像龙一样的地球一年绕日运行旋转一圈，大致需要 360 天。

如此，智慧的古人就会将一年分成春夏秋冬 4 个季节、12 个月、360 天。

《尚书·尧典》注云："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寿星，巳曰鹑尾，午曰鹑火，未曰鹑首，申曰实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娄，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纪。"古代曾以岁星（木星）纪年，木星约 12 年（11.86 年）运行一周天，每年旅居一次，于是就用木星所在的星次来纪年，所以称木星为岁星。由此可见，"次"的概念与岁星纪年有关。就是说，古人通过"仰则观象于天"的天学，发现只有五星中的木星在天体上绕日运行转完一圈（一周天）大致需要 12 年，这与地球绕日运行需要 12 个月基本对应了起来。木星所在的星次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十二地支系统。

四季	春			夏			秋			冬		
五行	木		土	火		土	金		土	水		土
地支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这 12 个地支系统是如何确定的呢？

古人要想把一个圆环上的 12 个时辰、12 个月、12 个年、12 个方位这些不同的概念都归纳在一个系统，打包归类到一个易学文化词汇里，就智慧地选择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十二种动物，作为了十二生肖的信息概念词汇包，这样就可以形象地将 12 个时辰、12 个月、12 个年、12 个地支、12 个方位用 12 种动物作形象代言者。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猪、狗等动物尸骨来判断，贾湖时代的人们已经能够基本了解动物，完全具有了驯化动物的能力，所以选择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十二动物，最能够代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与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自然运动

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互吻合的。

子

子在易学知识中有出头、开头、第一之意，有黑暗到头了、曙光来临之意，周代曾把每年子月冬至的这一天的气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意谓指一年的阴气开始减少，白天从这一天开始变长了，阳气从这一天也逐渐旺盛起来；每天黑夜的正子时，就是零时（0：00 时）整也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这是指每天的阴气开始减少，白天从这一时刻就要来临了，阳气从这一时刻也逐渐旺盛起来了。

在中国易学文化体系的六爻形象思维中，所有动物的足趾只能与初爻的位置来对应，初爻又是表示大自然空间中地面的位置，而动物身体上的所有部位，又只有足趾与地面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所以智慧的古人认为，用动物足趾数目的偶奇来对应地支的阴阳是最准确和最恰当的。

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中的子用十二生肖中的老鼠代表，这是因为老鼠的前爪是四个趾头，而后爪是五个趾头，子时是从每天的黑夜的 23：00 时到次日凌晨的 1：00 里，有一个小时是属于前一天的，五行属阴，为阴极，为结尾，又有一个小时是属于第二天了，五行属阳，为凌晨，为开头，而正子时的 0：00 恰恰是临界点，这样老鼠的前爪每天都准时地踏入 23：00～0：00 这个阴极的半个时辰，后爪又准时地从 0：00 时～1：00 这个阳始的半个时辰中走出来了，阴阳兼备对应的恰如其分。而每天的 23：00 到次日凌晨的 1：00，又是兼有阴阳爪的老鼠活动最频繁和最猖獗的一个时辰，所以智慧的中国古人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中找到了这个阴阳兼备的老鼠（图 7－14），来作为十二生肖的领军动物，拟人化地作为地支“子”的形象代言者。

丑

丑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中的代表动物是牛，排在十二生肖第二位。因为在农业社会的时代，牛被视为壮劳力，非常爱惜，在丑时要给牛加草添料，而且在这个时候也只有牛因为有反刍的功能在不停地咀嚼胃中的食物。还有，牛的蹄子是两瓣的，是偶数，属阴性，就刚好排在了第二位的丑位了，于是智慧的古人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中选定了牛（图 7－15），拟人化地将其作为地支“丑”的形象代言者。



图7-14　子鼠



图7-15　丑牛

寅

寅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中的代表动物是虎。寅在艮宫，也有山脉、树根、森林、利齿动物之意。上古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老虎，山脉、灌木、森林是老虎栖息的地方，《周易》中就经常提到黑夜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上老虎的尾巴。而每天的寅时就是老虎有了精神而感到饿了想要活动和捕食的时间。寅时排在第三位，为阳时，而老虎的爪子又具有五个趾头，是奇数，也属阳数，所以智慧的古人们就选定了老虎（图7-16），阳数排阳位，将其排为十二生肖的第三位，拟人化地作为地支“寅”的形象代言者。

卯

卯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中的代表动物是兔。一天中的卯时，太阳出来了，公鸡开始打鸣了，兔子也开始出洞找草吃了。兔子的每个爪子都是四个趾头，是偶数，属阴性，所以智慧的古人们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中选定了兔子（图7-17），以阴数排阴位，排为十二生肖的第四位，拟人化地作为地支“卯”的形象代言者。



图7-16　寅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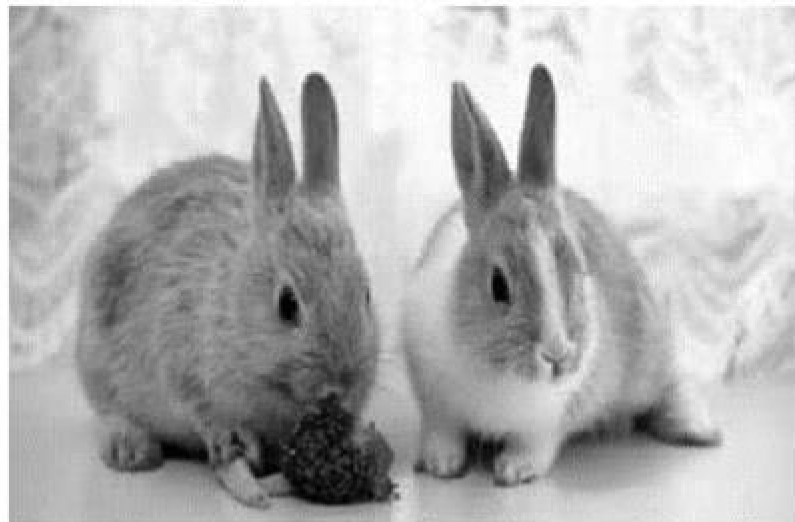


图7-17　卯兔

辰

辰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里代表所有卵生动物（恐龙、鳄鱼、龟虾鱼蟹、蜥蜴、蛇、鸟类、蝴蝶蝗虫等昆虫），象征它们经历的混沌、孵化、破壳、成长、排卵、死亡过程，始终都是在重复着一个圆周变化。在不同的时期状态下，可以飞上天，可以钻入地下，所以古人把这一类可以变化的昆虫归类，统一想象成龙，将其想象为具备腾云驾雾、上天入地、呼风唤雨本领的龙。

从殷商时期妇好墓出土的玉蟠龙的形状上我们发现，玉蟠龙完全是古人根据自己的想象模仿大虫子的形态雕刻的。其实辰就像一条盘着的虫子，龙不过是古人看到了这一类昆虫丰富多彩的变化而产生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形象的形象思维而已。

阴历的辰月，在农村的田野土地里，这样的虫子很多，一翻地就可以翻出来，如果不去动它，慢慢地就会变成蛹，最后在阴历的四月从土里钻出来爬上树而变成飞虫。这就像每天的辰时，太阳在慢慢地向上升起一样，这就是中国智慧的古人把龙叫做乾，把太阳的运动也称作乾，把天体、大自然的运动变化也称作乾的真正原因。

把这个大虫子展开就可以想象成为“一”字，古人又拟人化地把龙想象成了具有牛头、鹿角、蛇身、鱼鳞、鹰爪这样的宝贝，可是鹰的爪子只有四个指头，古人却给龙人为地安上了五个指头的鹰爪。不管是一还是五，都是奇数，都属阳，所以智慧的古人就选定了一个大虫子，阳数排阳位，就排为了十二生肖的第五位，拟人化地美其名曰龙（图 7－18），作为了地支“辰”的形象代言者。

巳

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里，蛇属火；蛇又没有脚，相当于 0，但却能迅速移动，就像太阳是圆的，也没有脚，却能运动一样，0 其实就是○（圆），0 是圆形的，不管是排在 1 之前，还是排在 9 之后，都只能算做偶数，属阴性，偶数对偶数，阴性排阴位，所以智慧的古人就选定了蛇（图 7－19）排为十二生肖的第六位，将其拟人化地作为地支“巳”的形象代言者。



图 7－18　辰龙



图 7－19　巳蛇

午

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里，乾也代表太阳，也代表骏马，也代表中心，在《周易》中经常将太阳比喻成骏马，红色的骏马奔跑起来的样子就像是跳动的火焰。马的蹄子就是独立的一个整体，是奇数，属阳性，所以智慧的古人们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中选定了马（图7－20），以阳数排阳位，就排为十二生肖的第七位，将其拟人化作为地支“午”的形象代言者。

未

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中，未是甲木的墓，就是说树木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就慢慢地停止生长了，到了阴历的六月就完全不生长而停止了，如同进入了坟墓一样。在一天当中的未时，所有的植物经过了太阳光的毒射之后，都表现出了最蔫的样子，也如同进入了坟墓一样，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在每天的未时，把羊放牧出去，此时羊的食草能力特别强。羊的蹄子与牛的蹄子是一样的，是偶数，属阴性，于是偶数对偶数，阴性对阴性，就刚好排在了第八位的未位上。这样，中国智慧的古人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中选定了羊（图7－21），将其拟人化地作为地支“未”的形象代言者。



图7－20　午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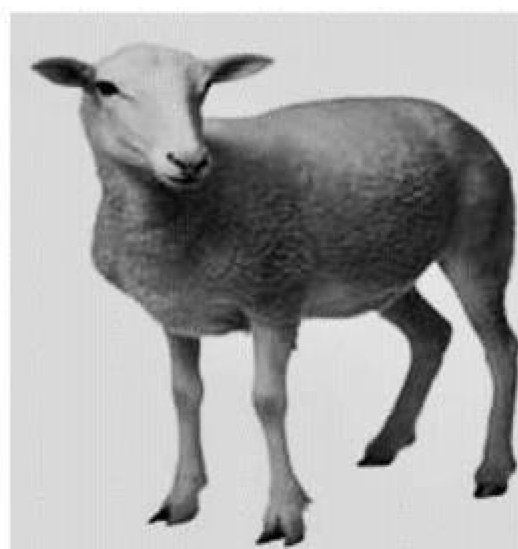


图7－21　未羊

由于每天下午的未时，温度还没有完全降下来，余热还比较高，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概念里“未”字的五行虽属土，却有余火，这就是羊肉是热性的原因。

申

上古的时候，在中原大地，动物是非常多的，有大象、猴子等，而猴子能蹿高，能下地，蹿高下地的本领和速度在动物中又是最明显的，可以很形象地将其比喻成雷电。而且，猴子的思维能力在动物中又比较高级，猴子是杂食动物，在

秋天植物的野果子就要成熟的时候，也是它们最愉快的时候，每天下午的申时也是猴子们吃饱了嬉戏之时和啼叫之时。今天的河南还有许多人在耍猴，有着非凡的训猴本领，也说明在上古的时候中原大地就有很多的猴子。而猴子的爪子又具有五个指头，像人一样，是奇数，也属阳数，所以智慧的古人就选定了猴子（图7－22），以阳数排阳位，就排为十二生肖的第九位，将其拟人化地作为地支“申”的形象代言者。

酉

到了一天中的酉时，太阳要落了，也是鸡吃饱了要回窝休息的时候了，这与卯时是相对的。鸡的爪子是四个趾头，是偶数，属阴性，于是偶数对偶数，阴性对阴性，就刚好排在了第十位的酉位上了。这样，中国智慧的古人们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中选定了鸡（图7－23），将其拟人化地作为地支“酉”的形象代言者。



图7－22 申猴



图7－23 酉鸡

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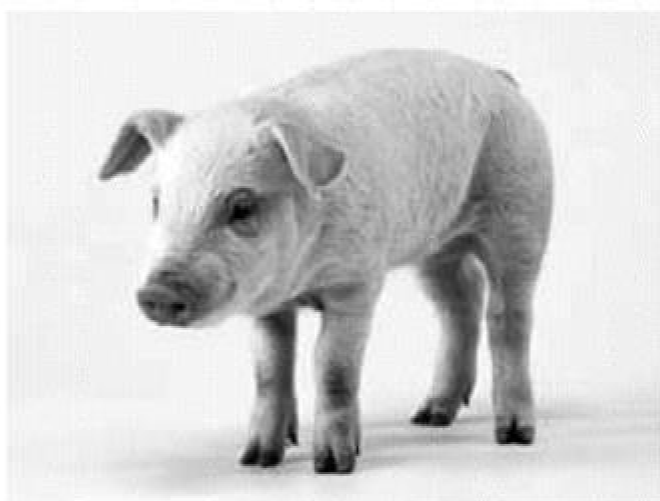
戌在易学文化系统知识观念里代表动物狗，每天的戌时，天一般都黑了下来，这时人们养的狗就要工作了，为主人肩负起保卫领土和财物的职责，所以狗与人一样都具有保卫家园的能力。狗的爪子有五个趾头，是奇数，也属阳数，所以智慧的古人们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中选定了狗（图7－24），以阳数排阳位，就排为十二生肖的第十一位，将其拟人化地作为地支“戌”的形象代言者。

亥

猪的蹄子是四个瓣的，是偶数，属阴性，于是偶数对偶数，阴性对阴性，就刚好排在了第十二位的亥位上了。这样，中国智慧的古人就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

关的动物中选定了猪（图 7－25），将其拟人化地作为地支“亥”的形象代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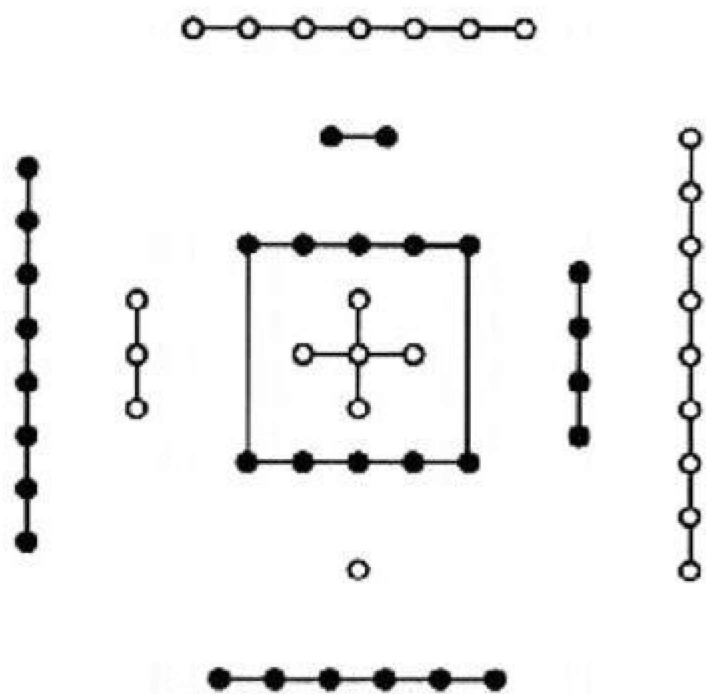

图 7－24　戌狗


图 7－25　亥猪

六

古人知道流年似水，每一年过完之后，表明逝去的时光就不会再回来了，就像由一个个圆环所组成的螺旋线圈一样，走过了前面一个圆的 10 等份，就会升进、绕入下一个圆的 10 等份，年年如此，犹如龙的变化。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的系统理论概念中，用于表示宇宙大自然中表面现象的词汇就是天干，天干有 10 个，与河图（图 7－26）中的 10 个“数”相对应。


图 7－26　河图

河图中心的 5 与 10，既代表了人的认知能力，又代表五行、五官、五指、五体、五脏等系统，又代表有始有终，有生有死，可以互相转化。既可以代表地球上的自然界系统当中的万事万物，也可以代表地球与宇宙中的所有星球（十朋、十方之地，很像一个西瓜按“井”字被砍四刀从而产生十块西瓜皮）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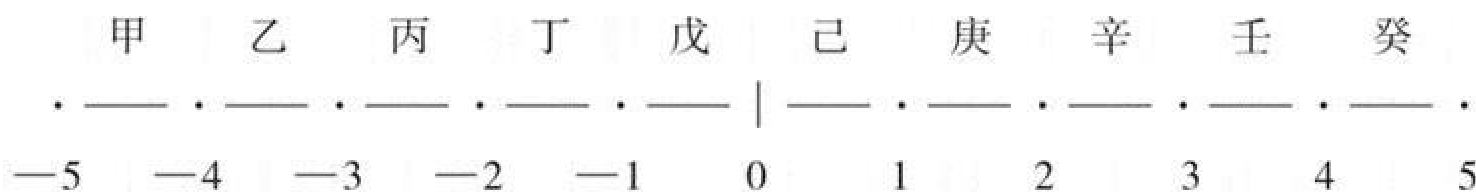
以及它们的生命运动轨迹都是圆形的。

河图是中国智慧的祖先早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向全人类做出的关于宇宙自然中万事万物客观变化的规律和自然运动法则的描述和最完美的诠释——在人类具有了系统的认知能力之后，万事万物自身以及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系统都有生有死，有始有终，是一个运行起来非常有规律、有法则且生生不息的不断循环而变化的相似于永恒（或恒长）的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但在这个不停地变化过程中，时空这个动态运行的平衡系统才是永恒而不停地变化的真正的主人，所以说时空又是永恒的，但绝不是静止的永恒，是永远处于运动中的永恒。

智慧的古人认为“十”是一个满数、弃数，表示盈则损，满则溢，又要从头开始，也当零用，代表着终结与死亡，就像中国古代在处决死刑犯的时候，会在犯人名字上打一个倾倒的十字“×”一样。

但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一结合起来，天干循环6遍，地支循环5遍，就形成了一个圆形60等份的甲子系统。

十天干与十位数字和十二地支一样，都代表了许多不同的意思，如果将这些许多不同的意思也归纳在一起，打包归类到一个易学文化词汇的包里，智慧的古人就选择了从0~9的10位天干，作为10位数字、10个位置、10段距离、10位天干的概念词汇包，拟人化地分别作为宇宙自然、万事万物表面现象的形象代言者。



虽然考古学者们在贾湖遗址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但他们在蚌埠双墩村遗址（距今约7000~6000年）出土的刻画符号（图7－27）① 和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图7－28）② 中，却找到了与甲骨文“癸”字一模一样的刻画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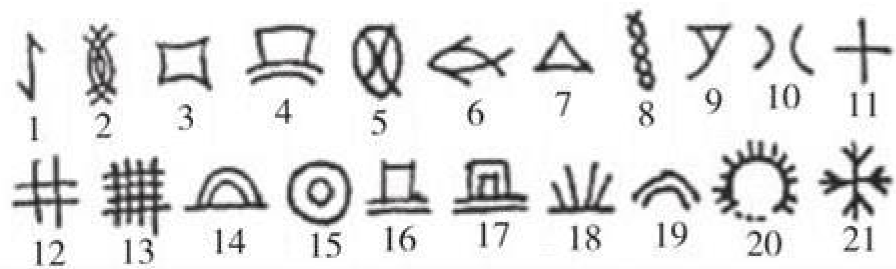


图7－27　蚌埠双墩村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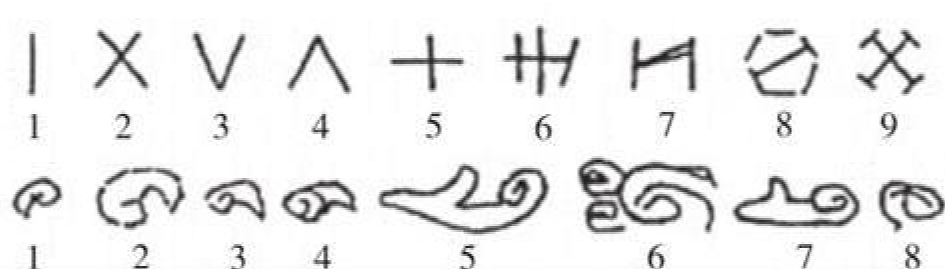


图7－28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①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68页。

②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第86页。

考古研究者认为，这些符号包括了“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制、饲养家畜、纪事于记数”等内容，“尽管仍是符号，却具备了文字的某些特征”。

笔者认为，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的系统知识观念里，癸为雨水、雨滴，阴天下雨、下雪，从甲骨文“癸”字的结构形象中也可以看出，“ ”就是雪花形象的图案形状，由于雨滴的形状没有雪花那么清晰，雨与雪的成分都是水，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和温度下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而已，古人都叫天癸。由于是属阴性，所以古人用冬天的雪花来表示“癸”字，就会让人们更加清晰、明白。

通过考古发现的“ ”形，笔者认为，很可能在距今约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里，就已经系统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等文字。

如果我们把本章第一节提到的出土于贾湖遗址的石刻符和龟甲刻符，对应到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的理论知识中，可以说，这几个刻符就真的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了，而且这几个文字中的每一个“字”在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里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信息系统。

如果我们把本章第一节提到的出土于贾湖遗址的骨板看做一种类似于快板、竹板等说唱艺术的娱乐工具，那么就说明在贾湖地区，贾湖时代的先民已经具有了用于快板说唱艺术的系统共同语言。

综合来看，可以说那个时候的贾湖先民已经有文字了，只不过文字被地位比较高的极少数人掌握。不管文字是被极少数的人掌握还是被多数人掌握，只要人们有了文字，就说明人们已经具有了系统的共同语言，那么用语言进行快板说唱的艺术娱乐也就很自然了。

所以笔者通过以上的证据，运用逻辑推断，就可以看出，中国智慧的古人在贾湖时代就已经具有了能够表达易学文化体系中系统观念的相关文字了，其中首先就包括能够表示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等易学文化系统观念的文字。否则他们如何能应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六爻纳甲筮法易术理论来进行占卜、推演、传授以及将占卜的结果向别人描述表达呢？

七

春分、秋分

春分与秋分这两天是地球绕日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点，只不过春分是寅卯辰春季三个月90天左右中的中心点，也是仲春卯月30天中的中心点；秋分是申

酉戌秋季三个月90天左右中的中心点，也是仲秋酉月30天中的中心点。

春分与秋分这两天昼夜的时间长度是平衡分开的，即是一年当中阴阳、寒暑分界的两个平衡、平分点。

要想在一年当中粗略地找出春分与秋分这几天的时间段非常容易。首先在春夏秋冬的任何一天，在地上立一日杆，当太阳在天空中升到最高点时，日杆在地面上的投影自然就形成了南北、子午方向上的一条直线，与影子成“十”字形的直线自然就成了东西、卯酉方向上的一条直线。只要通过太阳初升在正东方卯位的正中间，降落在正西方酉位的正中间这几天，就可以基本确定出春分与秋分的这几天时间段。

在《考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最早的立表定向的方法（图7－29）。首先，把一小块地整平，把木制或竹制的表插于其上，用一个挂有重物的准绳来把表校准，使之与地面垂直；其次，用圆规以表为圆心画圆，在日出和日落时分分别观察表影，标记出表影和圆相交的两点，通过这两个交点的线所指示的方向就是正东、正西。然后，古人通过白天观察中午表影的方向，夜晚观察北极星的方向对其进行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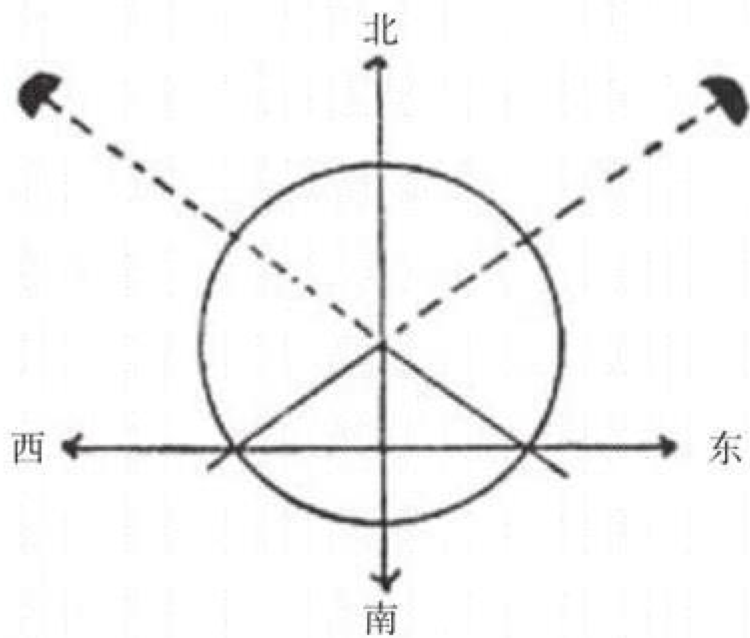


图7－29　以正朝夕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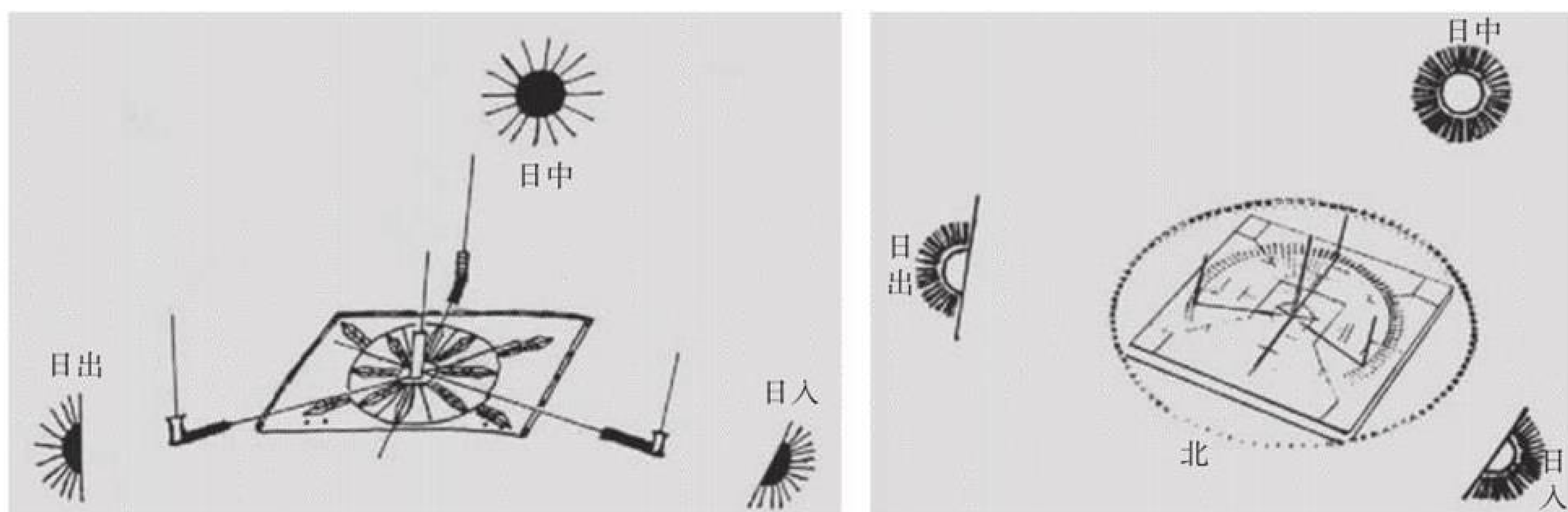
夏至、冬至

夏至与冬至这两天也是地球绕日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点，夏至这一天的昼（白天）是一年中最长的一个白天，夏至这一天的夜（黑天）是一年中最短的一个黑夜；冬至这一天的昼（白天）是一年中最短的一个白天，冬至这一天的夜（黑天）是一年中最长的一个黑夜。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系统理论中，分别有寅午戌三合火局、申子辰三合水局的逻辑概念：

寅——夏至时太阳的初升之位；
午——太阳在白天天空中的最高之位；
戌——夏至时太阳的降落之位。

这样，寅午戌三合火局，就形成了夏至这一天太阳在白天的运动过程规律（组图7－30）：日初升→日中天→日降落。



组图 7－30　夏至白天的太阳运动过程

申——冬至时太阳的降落之位；
子——太阳在黑夜天空中的最低之位；
辰——冬至时太阳的初升之位。

这样，申子辰三合水局，就形成了冬至这一天太阳在黑夜的运动过程规律：日降落→日中夜→日初升。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易学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分别找出夏至与冬至的日出点和日落点。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点找出之后，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中的四个正点就都清楚了，东南西北的方向也就都清楚了，一天十二个时辰中的四个正点就都清楚了。

八

远古最初确定二十四节气时，并不像春秋战国时代之后那么精确，需要去看太阳（太阳的视运动）所在赤道宿度或昏旦中星赤道宿度等各种测量和计算方法，来找出十二个节的转折点。但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只要找出十二节和十二气它们所在的那个时间段就行了。即使是在今天，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东西南北方转入二十四节气时的点，还是有着时间差异的。

古人有了将一年划分为 12 个月的易学系统知识后，发现月光的变化规律基本上是 7 天一个变化，基本上在进入每个月的第 15 天，月光都会处在最圆的满望状态。而月光处在最圆的满望状态时，就像古人将猪的膀胱充上气后，膀胱就像今天的气球一样处在了气最足的时刻，这是中国智慧的古人通过易学文化形象

思维获得的结果。

古人通过形象的思维，将每一年这种月光的变化规律与大地上树木、草木等植被相互对照，与植被生命的自然生长发生着最明显的变化规律结合起来，发现每一年的12个月中都有一个节，都有一个气。古人再通过形象的思维将节气与植物明显的生命生长规律结合起来，发现植被在每一年生命生长的变化规律，与每个月的节、气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植被生、发、收、藏的生命生长也都在受着节气的影响。例如，其中的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是十二节，表示这一日的天气就像人体的关节一样，可以发生转折了，进入节这一天后，就真正地转入此节所对应的一月了。例如，其中的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是十二气，表示这一日是此月中气最浓、最足的一天。所有节气的名称，又都与天气状况和农作物的生长状态有关。

本章提到贾湖人的B型釜中有对称、平衡的4、6、7、24和28这几组数字，结合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就可以很容易将其与易学文化中的四季、四方、六爻、七宿、二十四山、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的观念对应起来，同时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十进位加减乘除的运算。

四季：春、夏、秋、冬。

四方：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

六爻：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要经历六个步骤，才能完成一个龙的变化，就像春季的东方青龙需要三个月历经三个节与三个气的转换，才能变化进入夏季的南方朱雀一样。

七宿：东方青龙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所组成；南方朱雀由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所组成；西方白虎由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所组成；北方玄武由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所组成。

二十四山：实际就是一个分度圆上的24个方向。

二十四节气：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是十二节；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是十二气。

二十八宿：就是周天黄道上由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代表的二十八组星宿。

如果将二十八宿表现在图7－7的B型釜上，4个横鋬就分别是东方青龙、

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的简单代表，每1个横鋬分别率领的6个扁锥状钉纹就形成了七宿，二十八宿就这样形成了。

其中，二十四山（图4－23）由甲、乙、丙、丁、庚、辛、壬、癸这八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地支，以及乾、坤、艮、巽这四个卦所组成。

九　二十四节气

古人通过易学文化中的形象思维，将节气与植物明显自然的生长规律结合起来，发现植被在每一年生命生长的变化规律，与每个月的节、气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植物生命变化的生、发、收、藏状态也都在受着节气的影响。并且，只有把二十四节气放到黄道坐标系中，才能使中原大地上春夏秋冬的自然变化与二十四个节气点结合起来后显得非常明显。所以中国智慧的古人就把春夏秋冬四季的二十四个节气点，分布在了周天黄道的平面带上。

即使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节气歌和二十四节气物候，还都与天气状况和农作物的生长状态有关。

二十四节气

孟春寅：立春——立［历、离］春，历又转入春季了。
雨水——降雨量开始逐渐增加。

仲春卯：惊蛰——蛰有伏藏之意。春雷乍动，劈入大地，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
春分——分有平分开之意。即春季的昼夜天气平分之时。

季春辰：清明——天气晴朗，草木繁茂。
谷雨——雨生百谷。充足的雨量天气使五谷类农作物苗壮成长。

孟夏巳：立夏——立［历、离］夏，历又转入夏季了。
小满——天气使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成熟。

仲夏午：芒种——麦类等有芒农作物的种子开始成熟了。

夏至——炎热的天气来临，白昼开始变短了。

季夏未：小暑——暑有炎热之意。小暑即气候开始炎热了。
大暑——一年最热的时候到了。

孟秋申：立秋——立［历、离］秋，历又转入秋季了。
处暑——处有终止、收起之意。表示炎热的天气收起结束了。

仲秋酉：白露——天气转凉，白天都会有凝结的露水。
秋分——分有平分开之意。即秋季的昼夜天气平分之时。

季秋戌：寒露——露水已经开始寒冷了。
霜降——天气渐冷，开始有霜了。

孟冬亥：立冬——立［历、离］冬，历又转入冬季了。
小雪——天气开始要下雪了。

仲冬子：大雪——降雪量增多，地面也会有积雪。
冬至——寒冬的天气来临，黑夜开始变短了。

季冬丑：小寒——气候开始寒冷。
大寒——一年最冷的时候到了。

节气歌

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
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
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
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
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
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
立秋忙打垫，处暑动刀镰。

白露快割地，秋分无生田。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
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
大雪交冬月，冬至数九天。
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

二十四节气物候

春

孟春：立春时节，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
雨水时气，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

仲春：惊蛰时节，桃李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春分时气，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

季春：清明时节，萍始生，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
谷雨时气，桐始生，田鼠化为鴽，虹始见。

夏

孟夏：立夏时节，蝼蛔鸣，蚯蚓出，王瓜生。
小满时气，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

仲夏：芒种时节，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
夏至时气，鹿角解，蜩始鸣，半夏生，木堇荣。

季夏：小暑时节，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
大暑时气，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

秋

孟秋：立秋时节，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
处暑时气，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

仲秋：白露时节，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秋分时气，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水始涸。

季秋：寒露时节，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
霜降时气，豺乃祭兽戮禽，草木黄落，蛰虫咸俯。

冬

孟冬：立冬时节，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木为蜃。
小雪时气，虹藏不见，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

仲冬：大雪时节，鹖旦不鸣，虎始交，荔挺生。
冬至时气，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

季冬：小寒时节，雁北向，鹊始巢，雉始雊。
大寒时气，鸡始乳，征鸟厉疾，水泽腹坚。

由于音产生于律，律产生于历［离］，历产生于天学，天学产生于人们渴望对自然了解的需求并且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农业产生于人对食物的需求。渴望对自然了解的需求再加上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就产生了历法的体与用，产生了二十四节气。

律［音、阴］与吕［声、升、阳］是阴阳相随、相伴的。吕就是日月在规律性变化的象形字（吕字上下两个不一样大的圆口，形象思维地表示了太阳与月亮之间的变化就形成了历［离］）。因此吕是天学中的一部分，历［离］就由它而生。

“律”是中国音乐里的标准音高，相当于欧洲乐理中的音名（C、D、E、F、G、A、B）。各个“律”的音高叫做“律高”，十二律之首“黄钟”是“标准音高”，也可以说是“基础音”或“基准音”，其他各律的音高根据它都能推算出来，其意义与欧洲乐理中的标准音高 A1 相当，但只是“意义”上相当（就是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像”），实际意义并不相同。

十二吕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六吕		○		○		○		○		○		○
六律	●		●		●		●		●		●	

我国历代的黄钟律高，浮动于 # C1 ~ A1 之间，所以我们通常说的“黄钟律

高相当于 C1”只是一种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十二律吕可与欧洲音乐音名相对应。

对应	1（$\dot{1}$）		2		3	4		5		6		7
吕律名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欧洲音名	C	# C ^{b}D	D	# D ^{b}E	E	F	# F ^{b}G	G	# G ^{b}A	A	^{b}B # A	B

基于“黄钟律高相当于 C1”的假设，欧洲乐理中的 7 个字母音名（基本音阶的音名）相当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音乐理论里的南吕、应钟、黄钟、太簇、姑洗、中吕、林钟等 7 个音名，如下表所示。

极似	6	7	1（$\dot{1}$）	$\dot{2}$	$\dot{3}$	$\dot{4}$	$\dot{5}$
欧洲基本音名	A	B	C	D	E	F	G
吕律名	南吕	应钟	黄钟	太簇	姑洗	中吕	林钟

全音　半音　全音　全音　半音　全音

欧洲音名体系的依据是根据物理学中的振动频率，其意义是纯数据概念的，而中国音乐的律名是建立在形象思维的哲学、美学基础上的，并与历法、数学、度量衡等许多方面有紧密的联系，它们在一个自然的系统中，是非常像的。

古人把十二律吕与四季的十二个月、昼夜的十二个时辰周而复始地联系在一起，又基本上是间隔均匀的。

吕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季节	仲冬	季冬	孟春	仲春	季春	孟夏	仲夏	季夏	孟秋	仲秋	季秋	孟冬
月份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来看，贾湖先民在那时已经掌握了乐理的规律。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贾湖的先民们就已经将音乐学与历法、数学、度量衡等知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系统掌握了节气的规律（图 7－31）。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镞、骨镖、动物尸骨、炭化稻、石铲、石镰、石磨盘、盛酒罐等器物综合来看，贾湖人的稻作农业已初具规模，狩猎、捕捞也相当发达。这些都是季节性很强的活动，要想使自己的劳动换来较好的收成，就需要了解气候的寒暑交替、候鸟的冬去春来，需要了解天文、气象、历法知识，需要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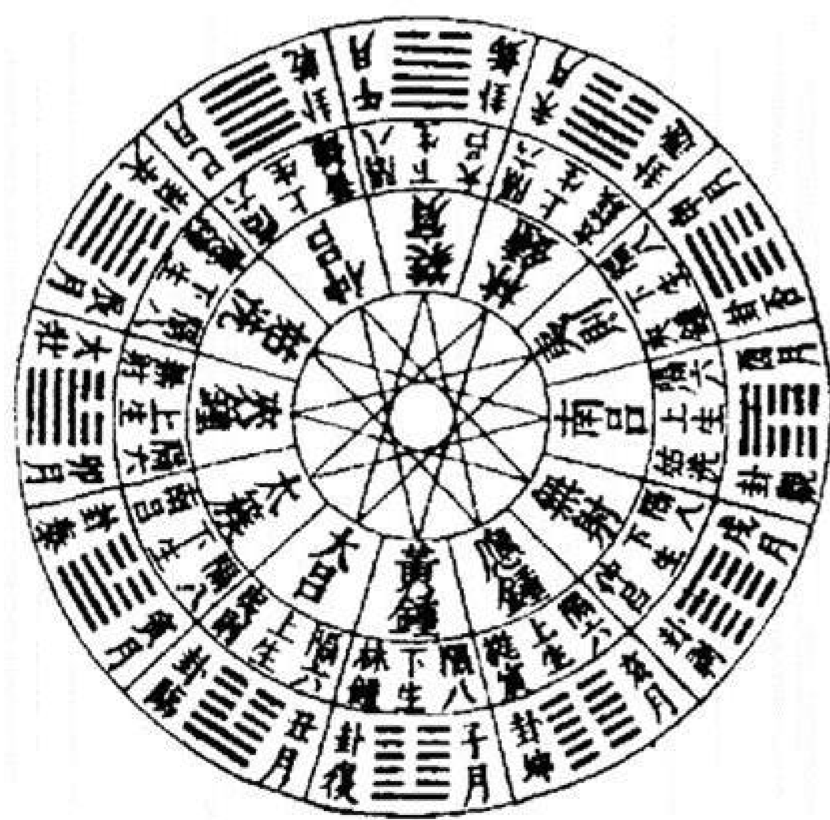


图 7－31　音韵与年月节气的对应图

季节变化，适时安排播种和收获，什么季节猎什么兽，捕哪种鱼，也需要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工具。这些出土器物也说明当时的贾湖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太阳历［离］的自然知识法则。

贾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说明，贾湖人在距今约 9000～8000 年的时间里就已进行人工栽培稻的育种和培育试验了。而人工栽培稻的育种和培育试验，即使是在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也还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在适宜水稻生长气温的不同地区，反反复复地跨地区试验，要经历年甚至是几十年才能成功。而适宜水稻生长的气温又受天气所控制，更确切地说是受节气控制。贾湖地区位于中国北方，不管是在当时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还是在今天，即使要种水稻也只能一年生长一季。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勤劳智慧的贾湖古人能在人工栽培稻的育种和培育试验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需要熟悉和严格遵照执行自然的历法，不知在多少年里还有多少代人为此付出了辛劳的心血。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古人对自然历法的发现与创造是早于贾湖时代的，智慧的贾湖人在那时就已经在使用自然的历法了。

用中国易学文化理论中的观念说，二十四节气为体，农作物生产中的播种、生长、成熟、收割实践为用，体是为了用。这样，阴与阳、体与用、理论与实践，就既对立又统一地结合起来了。

另外，在熊锦春先生所著的《道医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人体的二十四块椎骨（颈椎 7 块，胸椎 12 块，腰椎 5 块），对应着二十四节气，庶人（常人）脊柱内的气机，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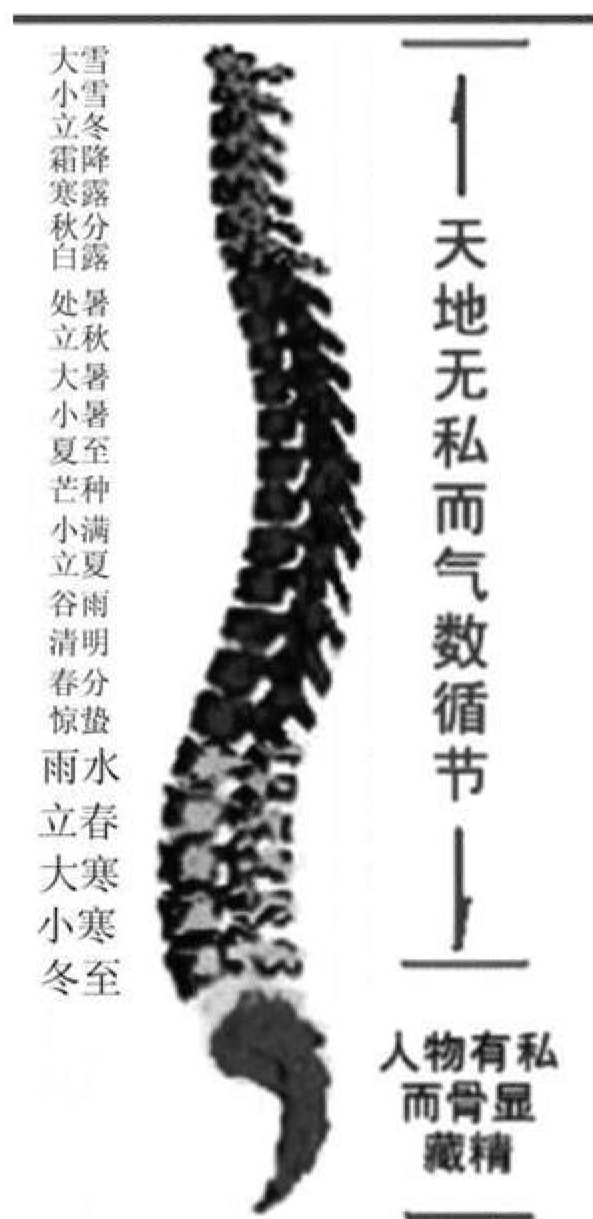


图7－32　人体的二十四块椎骨对应着二十四节气

从第五腰椎开始，每个节气上移一个椎体，一年内完成一次脊柱整体气机变化，这也符合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圈轨迹的气机变化之理（图7－32）”。（参团结出版社2011年8月版的《道医学》第99页）

古人在象数易学的形象思维中，人体这个太极与地球这个太极是对应的，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圈也刚好就像是阳气在地球［或人体］进行了一个大的循环，这也符合中国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一气周流；符合“天”与“生物”的“宇宙生物观”；符合易医［中医］同源的思想观点；符合天地人和［合］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也是中国古人为何要设立二十四节气的原因之一。

十　二十节气

1.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二十节气系统

通过对陶寺文化遗址的最新田野考古和实地观测，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在中国远古时代，除使用农历外，还曾经使用过阴阳历配五行的历法，也即天干十日历。这种历法将一岁分为五季，五季分为阴阳二半为十个月，所谓天干十日，就是这种立法的十个月名。每个阴历月又分为二个节气，这便是尧都古观象台遗址二十节气系统的来历。

有人可能以中国自古行用的就是农历而未见过五行十日历为由，怀疑尧时行用五行历的可能性。其实这是对古代文献不熟悉及缺少研究所致。

下面介绍尧时使用五行十日历的文献依据。

说到帝尧，人们便立即会想到记载尧时史事最详尽的文献《尚书·尧典》。《尧典》中还详细记载了帝尧命羲和观测四中星定四时制历法的方法。但是，经前人研究，《尧典》是伪古文《尚书》的一篇，大约是秦汉时人的伪托。经过天文史学家的计算，《尧典》四中星除昴星外，其余均非尧时的实际天象，而是春秋时代的天象。故《尧典》天象纪事，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人据自己的想象的结果。今尧都观象遗址不依四中星而依日出方向定季节，再次证实了《尧典》四中星记载的不可信。

否定了《尧典》四中星天象记录，并不意味着尧时无天文历法纪事可言。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上古文献中多处提到的尧使羿上射十日的神话故事。那么，尧时所谓十日并出，在科学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羲和生十日”的记载，又有“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记载，可见远古人说十日并出，并非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不当班的太阳是在扶木枝下息着的。

那么，十日并出的十日在科学上是什么概念呢？《左传·昭公七年》载“天有十日”。《周礼·春官》曰：“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淮南子·天文训》曰：“日之数十。”“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由此人们才恍然大悟，所谓十日并出的十日，原来是指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记载阳历月的月名，在天文学上就是以天干纪时的周期。

《史记·历书》有月雄、月雌之说。《尔雅·释天》将月雄称为月阳，即阳历的异名；将月雌称为月阴，即阴历月的异名：

> 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西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月阳。
>
> 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月名。

只知道中国古代有阴历而不懂得也有十月太阳历的人，读到以上文献时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相信中国上古也有十月历的人，就会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问题是，即使尧时十日并出可以用阴阳五行历来解释，它与二十节

气的关系尚不明确，古代文献中也未见有一年为二十节气的记载。最近我们注意到，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彝文经典译著“历法篇”《吐鲁窦吉》一书中，就载有一岁十个月，一月分两节的陈述。其前言中说：“一年分为五和，两个月为一季，一年分为二十个节气，十八日为一个节气。”其“原言语训”也说：“定年三百六十日，定月有三十六日。一年十个月，十生五成。”“一月人两节。一年二十节。”“阴阳定年节，阴年节五日，阳年节六日。”此书译者王子国先生之父王兴友，是贵州赫章地区彝族世传毕摩，保存了许多彝文古籍。王子国先生先后参加了《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彝族源流》等彝文经典的翻译，是翻译功底深厚、成就卓著的学者。《吐鲁窦吉》共分三卷三十四章。全书专门记载介绍彝族古代使用的十月太阳历和农历。它不但保存了彝古代的珍贵文献，同时也为华夏文化的探源研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线索。由此书的记载可以确定，中国古代确实使用过一岁分为二十个节气的历法。

而不论是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天干记载历月的月名，还是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地支记载历月的月名，它们最初都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太极文化体系中的专用“数”和专用词汇。

2. 古观象台的发现①

古观象台遗址于2001年寻找陶寺城墙的钻探中就被发现。2003年，考古人员在这个神秘的“城池”里发现了一座占地达1700余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由于其地表建筑都已遭到破坏，其原貌、功能都无从得知。

考古人员根据遗址上的夯土痕迹推测，曾有13根高大的石柱立在这个半圆形的台基上，相邻石柱之间的距离为15～20厘米，而这些石柱间的狭缝整体呈正对圆心的放射状。

2003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何驽和队员们对陶寺遗址里确定的一座建筑基址进行复探，发现该建筑不仅土质杂乱，而且形状极不规则。后来环绕夯土台基的半圆形环道被发掘出来，它显示该夯土建筑遗迹呈弧线状。弧线可能是圆的一部分，古籍曾描述“天圆地方”，难道该遗址与祭天有关？

发掘一步步推进，考古人员又发现夯土弧线上有几道缝，而且这些缝的朝向冲着东面约10公里外的塔儿山。难道这座大型建筑基址与天文有关？所留

① 关于陶寺古观象台的考古发现，详见 http：//www. xiangfen. gov. cn/news/mtxf/mtkxf/2010/125/10125184250F5CE5GK4GH2212KCCH。

的缝是用来观测天象的观测缝？在天文史学家的建议下，何驽决定进行实地观测。

可是日月星辰，观测哪个好呢？这些缝自东北到东南，似乎是一年当中日出的大致位置。考古队队员冯九生提出，陶寺早期大墓中很多罐、盆的肩腹部画着几个圆圆的红太阳，这些很可能意味着陶寺文化对太阳的崇拜。

陶寺文化具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使用太阳历的可能性最大。据此，何驽决定首选实地模拟观测日出，并在天文学家计算出的观测点进行尝试。

考古人员将古观象台13根柱子自北向南编为1～13号，每相邻两根柱子形成的观察缝由南到北依次编为1～12号。然而，冯九生在2003年冬至的模拟观测（第一次）中，发现从最南的1号缝望出去，看不到日出。日出一半时，太阳偏在2号缝以北。太阳下沿与山脊相切时勉强可以从2号缝看到，但偏在北侧。太阳升离山头，失去天文意义了，此时却位于2号缝正中。

难道这座建筑不是用来观天象的？其实这只是太阳神与考古人员开的一个玩笑。后来天文学者指出，他们关于冬至的实地模拟观测结果是正确的，因为古今黄赤交角的变化，当年冬至日出点较古代偏北，这样从2号缝内就看不到。

由于那时还未发现此建筑的观测点遗迹，对于其是否是观象台，当时的考古界是一片质疑声。何驽就和队员们不断地进行模拟观测，冯九生参加了该建筑基址发现6年来进行的76次实地模拟观测。

为进行观测，考古人员一步步清理基址周围的覆盖土，在清理过程中，他们特意在台基上留下一个4平方米见方的土台，以便进行模拟观测。为了将新的模拟观测点从土台上引到台基残留界面上，考古人员由土台垂直向下打了一个探孔，直至生土。探孔内灌入白涂料，然后插入一根笔直的桐树棍。这样日后将土台打掉后，模拟观测点的位置在台基平面上也可以很容易找到。

随后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惊奇又狂喜：2004年10月29日，他们将模拟观测点的土台打掉，发现土台下面居然藏着陶寺文化时期的观测点标志。只见不同颜色的夯土形成四个同心圆，中心圆直径为25厘米，最外圈圆的直径为145厘米。何驽试了一下，中心圆仅能容下人赤脚并立其上。再看考古队的模拟观测点，其位置正好落在中心圆内，位于圆心以东4厘米。

2004年11月中旬，该建筑基址的主体部分展露出来（图7－33、图7－34）。这是一个大半圆形的夯土建筑，由外环道和三层台基组成。外环道直径约为60米，台基直径约40米，整个建筑为1700余平方米，台基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台基上残存13根观测柱形成的12道缝，还有用夯土和生土堆出来的类似“双鱼”的太极图案，冯九生说：“估计与祭祀拜天有关。”

“陶寺古观象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是2008年启动的，2009年春，他们依据地基深度和塔儿山主峰高度，在陶寺观象台遗址用砖复原了观象台建筑观测柱（图7－34、组图7－35）。这13根柱子统一高4.5米，最小的是6号柱，平面长1.4米、宽0.6米；最大的13号柱子长4.9米、宽1.2米。项目组在春分、夏至曾组织过观测。



图7－33　陶寺古观象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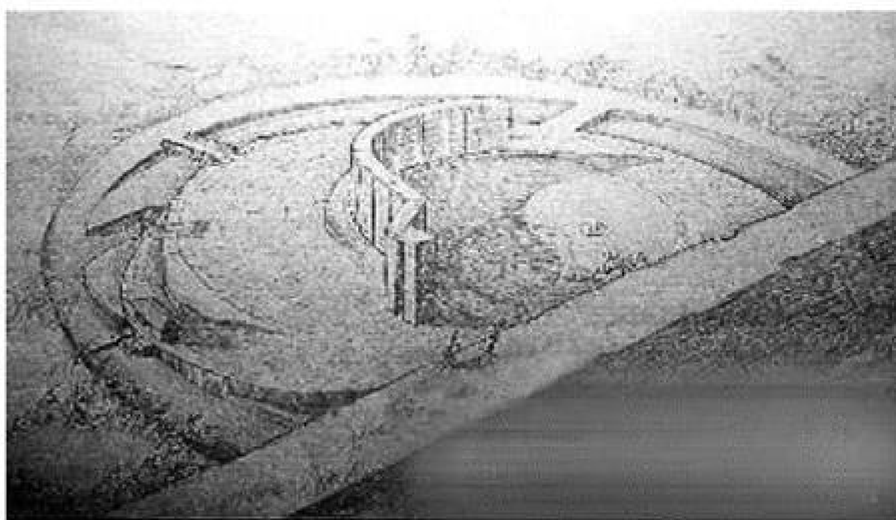


图7－34　复原后的古观象台效果图





组图7－35　陶寺古观象台模拟图和复原后的古观象台建筑

12月22日，“陶寺古观象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成员徐凤先、黎耕以及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何驽博士一行三人到陶寺观测冬至日出。此次观测是观象台复原后的第一次冬至观测。

时间已到早晨8点，趁太阳还没升起，随队的天文学家赶紧在观测点架好了摄像机。此时天气晴朗，东面的塔儿山半空中还笼罩着一丝薄雾，特别适宜观测和拍摄。“古观象台”上13根砖混结构的观测柱，台基中央观测点位置则是用水泥抹出一个直径145厘米的圆，圆内另有3个同心圆，圆心处放了个小物件以做专门标志。

8点18分，太阳从塔儿山上探出头，缓缓升起。大家屏息凝视从观测点看，太阳在2号缝的北侧。太阳逐渐离开山头，8点20分太阳正悬在2号缝中间的时候（图7－36），已经升离山脊线有一段高度了。计算表明，在4000～4100年前

陶寺遗址繁荣的时代，冬至日太阳一半升起在山脊线上、一半处于山脊线下时，正位于2号缝的中间，这应该是当时陶寺冬至的标志。



图7－36　2009年冬至日陶寺观象台日出的影像资料

何驽表示："这次观测是成功的。4100多年前陶寺的冬至，日出一半时正在2号缝中间，因为古今黄赤交角的变化，如今冬至的日出点比古代偏北一点。根据这次模拟观测的结果，以及古人观测点标志的发现，这座建筑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古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现的全国最早的古观象台。"

据他介绍，一些专家学者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其台基是半圆形，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圆形？对此他解释：半圆形的台基象征形如伞盖的天向北倾斜，有一部分天是看不到的。《周易·系辞上》也说过："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所以古观象台的台基是将天穹形象地放在地上。

通过分析实地模拟观测结果，何驽推算出一套有二十个节令的陶寺文化时期历法，其与如今我们使用的二十四节气有41%的相似性。他介绍说："此次模拟观测的重大意义在于，证明了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世界领先的缜密的历法系统，二十几个节气的历法，是目前所知绝无仅有的，它既展现了我们祖先为农时服务、社会生产生活服务，还体现出当时王权对于天文历法的控制。"农业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命脉，确定节令是天文官的事，但颁布历法是统治者的事，不俯首帖耳臣服于他，他就不告诉你农时，你就没有收成。

古代文献有关于尧都的记载，《帝王世纪》就说"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汉书·地理志》等也有类似的记载。平阳即今临汾。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尧都，可能就是在临汾一带。只是城址早已夷为平地，后人无法判定具体地界。今据考古发掘的城址^{14}C测年和古代文献关于尧都的记载综合分析，将陶寺遗址定为尧都是大致合适的。帝尧号"陶唐氏"，这是帝尧初居"陶"后徙"唐"所得的号。寺即宫廷、官府之意，故陶寺一名，也与帝尧故都有关。

笔者认为，在史前的远古时代，由于没有文字史籍的记载流传，致使使用过

的历法曾经反复变化过多次，即在尧执政之前和之后就都曾经使用过十二月历(从贾湖文明、濮阳西水坡文明、凌家滩文明和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出)，但从山西襄汾陶寺镇发掘出的古观象台可知，尧执政时就曾使用过十月历，十月历的特点是简单，但不够准确，只具备计时的功能和作用，不具备天文的意义，对中国那时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可以说完全没有指导作用，太粗了（参刘尧汉所著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描述的彝族十月历即知)，所以后来尧才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人分驻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四地，观测星象，定四仲星，判季节，制历法①，也就是《尚书·尧典》记载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到新历修成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十月历系统确实不够准确，后又改成了十二月历系统。

这样，就使得十月历和这个古观象台，以及整个皇宫故都就废弃不用了（如同今天城市的新区和老区一样)，历律都变了，就没有必要在这儿待了，后来就迁徙到了“唐”。

另外，从中国古汉字“易”由日月构成，就可知道“易”既是象形文字也有指意的理在内，如同大自然中“日月”的实际交替变化也的确是形成了真实的“历”，那么“易”就一定与“历”有关系，或者说“易”中就一定有“历”的一部分。

第三节　贾湖文化时期的数学、度量衡

一　数量概念

我国古代数学概念究竟开始于何时呢？恩格斯曾经说：“数学是数量的科学，它从数量这个概念开始。”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简单的数量的概念及其表现方式的出现，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例如，山顶洞人制作的鹿胶棒上所刻的弯曲或平行的浅纹道及峙裕人在许多菇片上的划划痕迹，有的学者就认为是当时的人们进行生产和分配时的计量标记。当然，即使如此，当时的数量概念也只能是初步的。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古代把数的发明就看得很神圣，如《汉书·律历

① （清）汪绂著《戊笈谈兵》上册，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第31页。

志》言："数者……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①

关于数学起源的问题，历代学者都曾试图解释，如《后汉书·律历志》是这样写的："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算数之事生矣。"② 此说法恰与古人用先天八卦图（图4－31）和先天之数顺序的排列所建立的宇宙星系物理运动模型图和天地初形成时的运动状态（图4－30）刚好一致。

我们从先天八卦图中先天之数顺序的排列和《说卦传》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就可以看出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数的对角之和都是九，这样就将宇宙大自然的运动变化用先天八卦和数字描绘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生命系统。

史料普遍认为，先天八卦是伏羲氏发明的，所以也称伏羲八卦。本章第一节就曾说明贾湖时代应当在伏羲氏时代之后的神农氏时代，而传说中的包牺氏（伏羲氏）执政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八卦诞生的时代了。

这就是说从"一"到"八"这八个数字的运动变化所形成的一个大"S"形，原本就在宇宙大自然之中，与天地万物的生命系统始终在一起运动、变化、存在着。只不过是在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伏羲氏时代（贾湖时代之前），就被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中国智慧的古人发现并且应用了。

历代文献如《汉书·律历志》《世本》《史记索隐》《路史》等都有"黄帝使隶首作数"的记载，但现在看来，这一传说与"仓颉造字"、"奚仲作车"、"伶伦作律"、"伯益作井"、"湖曹作衣"等，如同古希腊把文字、数学、音乐、体育的发明统统归功于众神的使者赫尔墨斯一样，是没有多少事实依据的。

事实上，即使真有隶首其人其事，也只不过是集前人之大成而又做了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而已。

到了8000年前的贾湖文化时期，数量概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贾湖骨笛，据音乐学家鉴定，认为是管乐器的祖制。这些笛子大多有规整的7个音孔，很有规律，经测试，7个音孔各发一音，加上7个音孔全闭发出的筒音，正好8个音，组成一完整的音阶结构。《淮南子》在探讨律之起源时曾指出："律之初生，写凤［风］之音，故音以八生。"③ 此说法恰与贾湖骨笛八音相吻合。

此外，在该遗址的墓葬中，还往往有成组的完整龟甲随葬，其中一部分为八

---

① 班固：《汉书》卷21，中华书局，1962，第956页。

②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2999页。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第950页。

个一组，为当时已有“八”的“数”之概念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我国历史上，律以八生和易有八卦，以及八方、八荒、八风（图 7－37）等观念，都说明“八”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前，有关学者从仰韶文化彩陶和锥刺纹饰中用对称的线条和圆点组成的图案证明，仰韶文化先民已有了从“一”到“八”的数量概念。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八音骨笛的实测和一组八龟的摆放现象来看，“八”的数量系统概念，至少在贾湖文化时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①



图 7－37　八卦八音八风图

二　计算水平

有了“数”的系统概念，如果不配以实物的量词或度量衡（关于度量衡的概念与产生，后面笔者会讲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只有数词而没有量词，那么数字就是非常抽象的。只有将数词［阴］与量词［阳］结合在一起，才能让人们有感性的认识，才有利于人们进行计算。比如，在贾湖遗址的随葬龟甲内，往往有颜色和数量不等的石子，就是将个数与石子结合了起来。如 M363：8 号龟甲内装石子 12 个，其中深色石子 5 个，浅色石子 7 个。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下卷，科学出版社，1999，第 950 页。

单从龟甲内所装的石子数量来看，虽然我们还不敢肯定这些石子就是计算用的算筹，但至少它是可以用于计算的。但如果我们把龟甲内所装的石子数量与中国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利用加减乘除占卜起卦的方法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当时的人们完全已经掌握了数学十进位加减乘除的运算方法。

所以笔者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人们完全已经掌握了数学加减乘除的运算，并产生了十进位数的思想。因为至迟在商代，人们的数量概念已逾万，十进位和以干支为代表的十二和六十进位的计数的思想就已经完善，在这之前也应有一漫长的发展历程。再结合甲骨契刻符号与商代甲骨文字的联系分析，上述“数”与数学思想肇始于贾湖文化时期之前不是没有可能的。

关于当时的计算水平，我们还可以从骨笛的设计制作中看出。

在贾湖遗址出土的7孔骨笛中，M78：1号骨笛的设计构思过程相当清楚。此骨笛出土于贾湖遗址M78墓主人左股骨一侧，笛长20.3厘米，在骨管一侧一字排列钻7个圆形音孔，孔距1.3～1.5厘米，孔径0.3厘米。从音孔旁可看到初次的设计和两次修改设计的刻记。从刻记看，显系首先经过精确计算，将计算结果刻在笛身上。然后在第七孔的位置上钻基准孔，经试吹，以此孔音高为标准，再修改原来设计，重新刻记，第四、五、六孔为修改设计后所钻。之后似又一次调整余下三孔的位置，再次刻记，一、二、三孔为第二次修改设计后所钻。

这支骨笛的设计制作过程，至少可以反映出三个问题。首先，当时的人们对音律已有相当的了解。黄帝十二律之说，显系后儒之伪托，自不足凭，但此时已发明并掌握了六声至七声音阶，用计算管长的独特方法，在一个八度内得到八个不同音高的乐音，故已具备了八律系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音律本身也是数学行为的反映。因为设计构思过程，也是计算的过程。经过设计计算—制作测试—反复修改设计几个阶段，最后制作出具有符合人们要求的音阶结构的乐器，如果没有较复杂的数理思维和较精确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从笛子制作反映出的数学与计算水平可以看出，贾湖文化的原始数学水平与周围地区同时代文化相比，至少从目前材料来看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它决非数学的肇始阶段，在它之前应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历程。

“数”与数学的起源与发展和人类的发展进化史是同步进行的。贾湖文化已是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贾湖遗址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水平分析，其原始“数”与数学水平达到上述程度是完全有可能的。

此外，贾湖时代的B型釜（图7－7）也说明，那时的人们已有了“数”的观念和十进位运算法则。

《周髀算经》中提到：“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

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图 7－38、图 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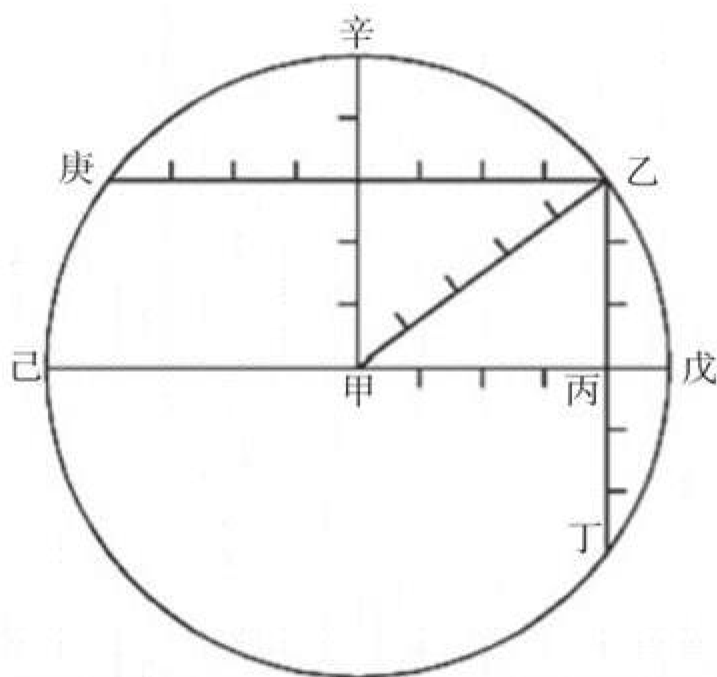


图 7－38　勾股圆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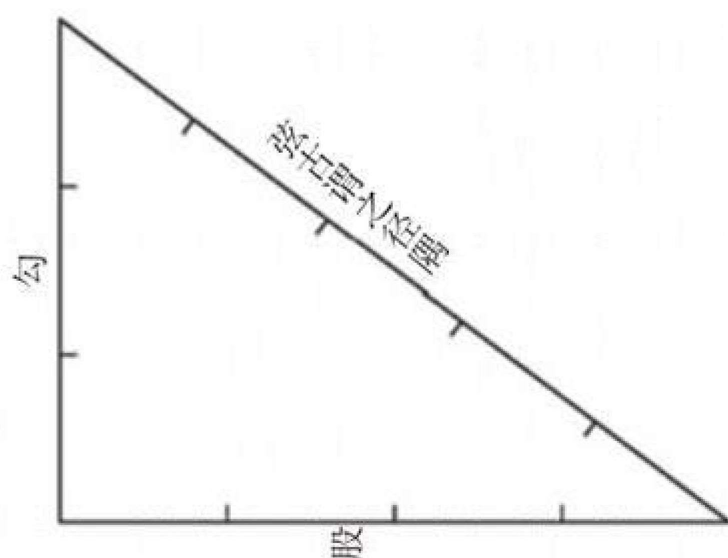


图 7－39　勾股弦图

“周公曰：‘大哉言数。请问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周公曰：‘善哉。’”①（组图 7－40）

西汉时期孔安国云：“《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② 这将《周髀算经》中提到的勾股定理和矩的实际应用方法，与《洛书》（图 7－41）和大禹治水（“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联系到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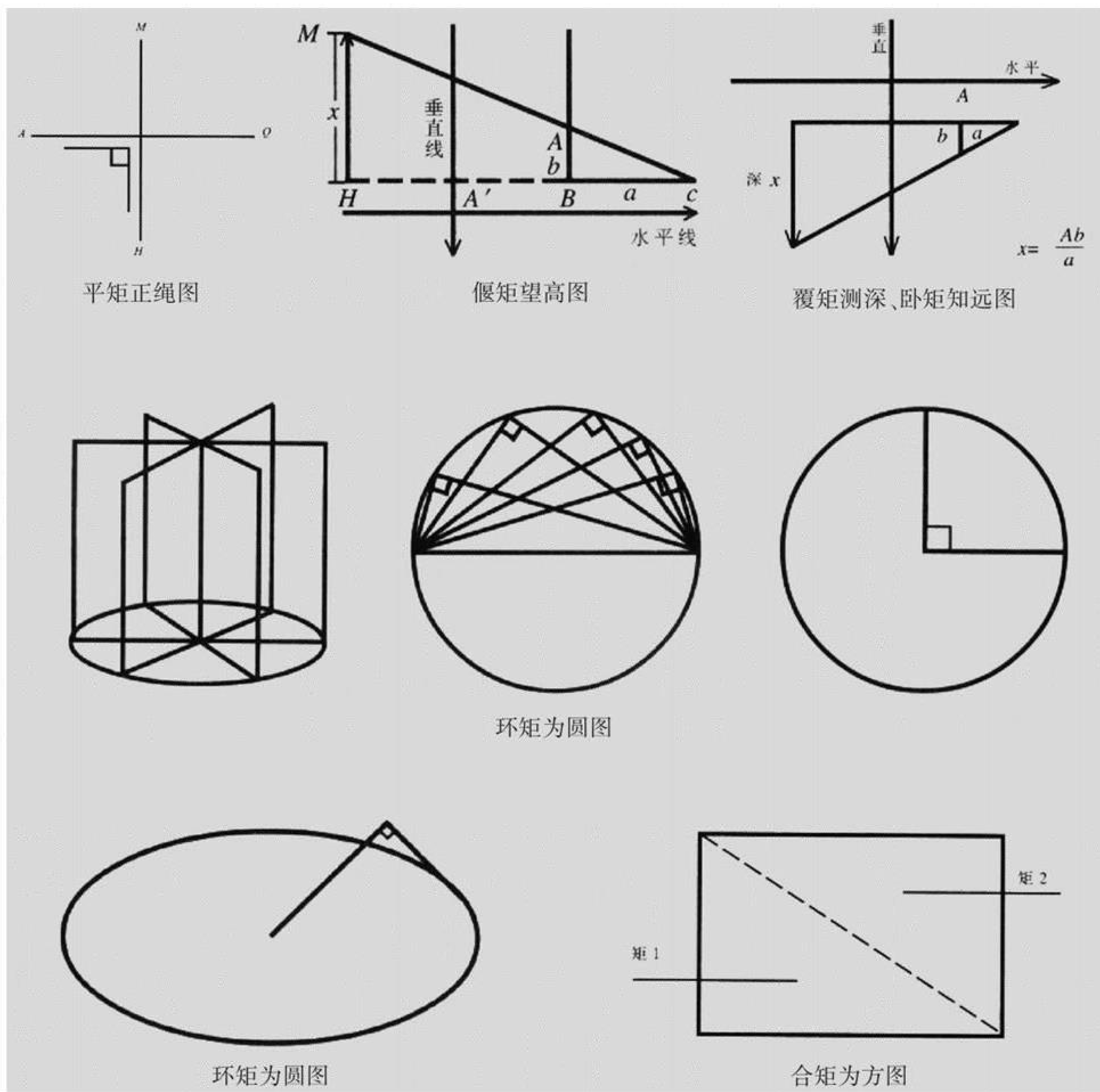
《周髀算经》与孔安国提到的“数”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笔者在后面会专门讲到“数”的系统概念与“数”的系统含义，在此先留下一个伏笔。

如果我们单看《周髀算经》这一段话与孔安国所云，真让人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大禹究竟将勾股定理的方法用在了什么地方而治理了水患呢？

---

① 张仓等辑撰，曾海龙译解《九章算术》附录《周髀算经》译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第 276 页。

② 江慎修著，孙国中点校《河洛精蕴》，学苑出版社，1989，第 5 页。



组图 7－40

我们再来看清朝江永所著的《河洛精蕴》，其中提到："《河图》具五勾股，弦数藏于勾股二幂之间，至《洛书》则以中五为弦。幂二十五，而东之三，东南之四，二幂适得二十五，并而开方，得弦五，是勾股弦得整数者。自勾三股四弦五始，三者木也，四者金也，五者土也，是五行有形质之三物，合而成勾股弦也。图之三四对于东西，书则连之，勾股之机括出于此矣。先儒论图书，未有及此者，度数之学，未究心也。"[1]（图 7－42）

① （清）江慎修著，孙国中点校《河洛精蕴》，学苑出版社，1989，第 27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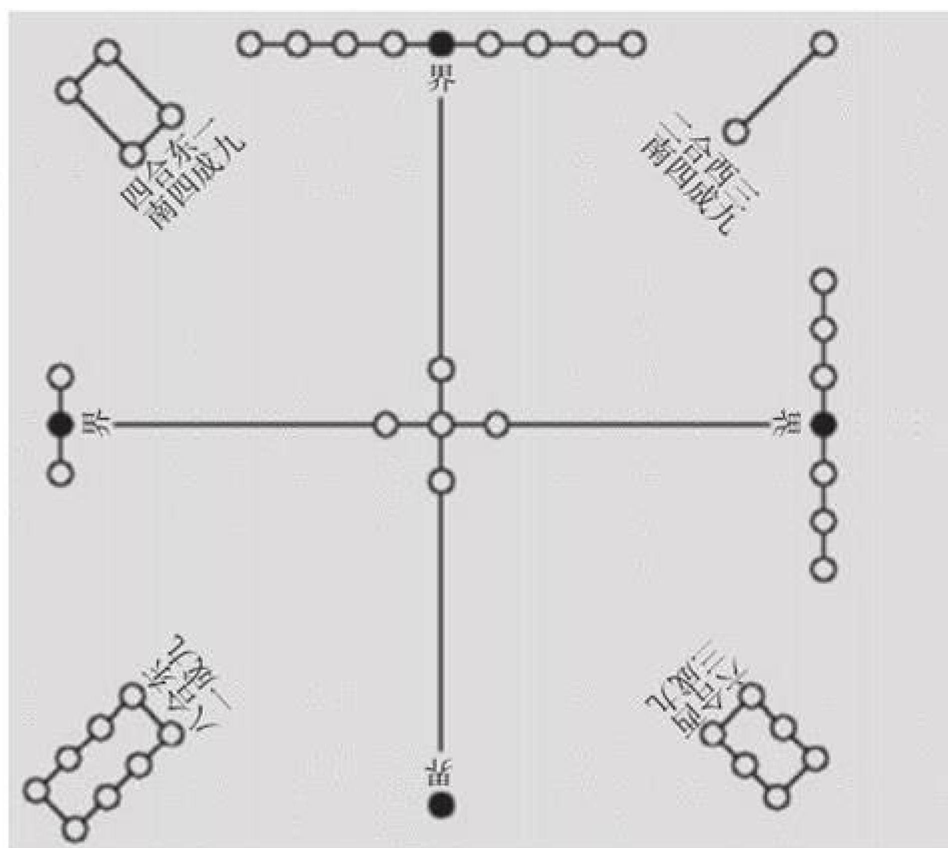


图 7－41　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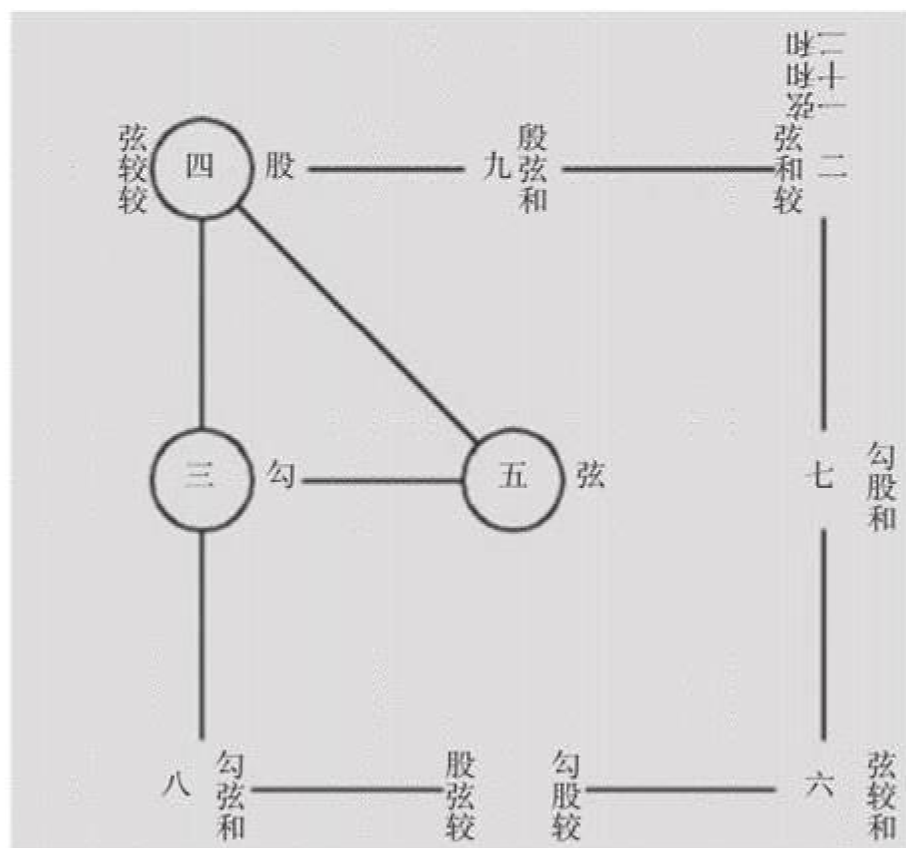


图 7－42　勾股图

这样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出大禹治水的关键与秘密所在。一般来讲，五行系统中唯有木、金、土是有形的东西，而水、火却是无形的东西。治水的关键就是要将无形的心智（属火、理论知识、设计方案）转换成有形的土木施工，再把无形乱流的水服服帖帖地治理住，让它按照人们的意愿规规矩矩地流淌，这样的话，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所以，治水方案的规划与设计，需要的是理论知识。规划时采用的就是“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的方法进行设计与计算的。方案的实施——施工过程，就实际需要有形质的物质材料了。不论是对五行属木的木料进行加工，还是用五行属木的木方进行施工；不论是对五行属金的石料进行加工，还是用五行属金的石方进行施工；不论是对五行属土的土地进行挖掘，还是用五行属土的土方进行施工，采用的无非也是“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的计算方法。当施工的质量满足于设计规划的方案，那么治水的效果自然就见到了成效。大禹正是利用了勾股定理的计算方法及矩的各种展开应用，将设计规划河道与施工紧密结合在一起，才在治理水患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前面我们说过，在贾湖遗址发现在贾湖时代就已经有了干阑［栏］式建筑，这也是有此类建筑遗址的最早发现。从贾湖遗址的考古过程中发掘出大量的石斧、石锛、石凿等木匠工具来看，人们是完全能够建筑带榫卯木结构的干阑［栏］式建筑的，那么他们是如何计算的呢？针对加工带榫卯的木结构和建筑干阑［栏］式的房屋，不管是计算与设计还是加工与施工，必须要有数学的计算与度量衡单位的计量配合。这就说明，在贾湖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度量衡。

三　度量衡

前面笔者说过，“数”如果不配以实物和量词或度量衡，就非常抽象。只有将“数”与实物和量词或度量衡结合在一起，才会让人们有感性的认识。

度量衡的最初概念，正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际中逐步形成的。从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形制来看，造型规整、对称、匀称、美观，堪称艺术品，想必在制坯之前已有成器在胸，经设计计算后才制坯成形的。干阑［栏］式建筑的设计与施工、贾湖骨笛的制作也只有在经设计计算为前提和背景，才能成其为可能。因之其制作工艺应是当时数学计算水平的集中反映。

恩格斯曾经指出：“和其他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开始的。”考古发掘的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据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等几个主要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中原地区前仰韶时代文化的先民早已过着定居的生活，原始聚落早已形成并已有一定的规模，大多在2万平方米以上，贾湖遗址达5.5万平方米。聚落中已有一定的布局，居住区、墓葬区已分开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房屋多椭圆形，窖穴多圆形。墓葬多长方形。看来在修筑前，人们都曾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先行进行过“度”的测量和计算，设计好其形状和容积。

所谓度量衡，就是计量的标准。我国汉代以来的文献“黄钟秬黍”之说，认为音律是度量衡的最初定量标准。例如《汉书·律历志》载称：

> 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是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
> 量者，龠、合、升、水、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龠者，黄钟律之实也。
>
>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①

① 《汉书》，中华书局，第966～969页。

此一宏论，应有所本。那么非得要用“黍”来作为度量衡的基准，其根源究竟出自哪里，出于何时呢？

远古的测量手段，可能有迈步、拉绳子、立树干等方法。同样在制作工具和用具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器物的用途来设计、计算器物的形状和大小。在氏族内分配物品时，同样要进行计算和衡量，才能形成人人均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要从事这些活动，度量衡的计量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所有的这些问题，最后都会集中到一个关键点，就是选用什么东西来作为度量衡的基准。

曾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的苏秉琦先生曾说中国有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两个农业体系而言的，而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在那时主要以黍和粟为主，显然它与黄河流域人们的生活是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

笔者认为，这也与中国易学文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国易学文化中，五谷的分类划分如同五行，它们是对应的：菽属水、黍属火、麦属木、麻属金、稷属土。其中，黍属火，黍与“数”谐音，这与易学与汉语言有关（请参笔者所著《易学与汉语关系论稿》）。“数”是由人的心神而产生的，心属火，神也属火，它们都很抽象。黍又是中国北方中原地区的农作产物，所以只有用人们习以为常的“黍”（图7-43）来表达度、量、衡，才最具有“数”的代表性。这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首届主任、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万国鼎先生在其《秦汉度量衡亩考》论文中所说的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祖先并不是先懂得律，然后依照律定尺。尺大概是随着计量长度的需要，用某种习见的实物之长，作为计量长度的单位而产生的，在试制律管之前，尺必早已存在。但是一旦依照当时的标准尺试制成律管，这一套律管的尺寸，就和当时的标准尺的长度具有形影相随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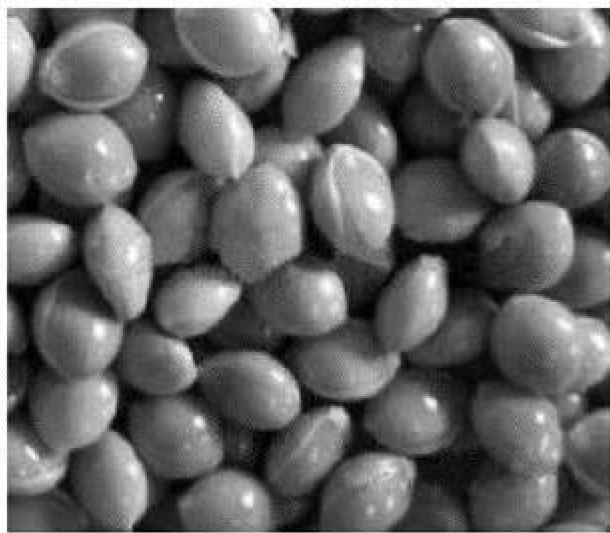


图7-43　黍子

经过笔者所测，没有剥壳的黍子长约3毫米、宽约2.7毫米，10粒黍子的宽度之和与9粒黍子的长度之和刚好相等，都为27毫米。而10正好符合《河图》之数，9正好符合《洛书》之数。清代的江永在其所著《河洛精蕴》里“律吕声音本于河图洛书说”中提到：

制律吕，正声音，王者重大之事，亦造化最微妙之理。昔者言律吕者多

矣，未有言其根源在《河图》、《洛书》者。唯明宗室郑世子朱载堉，始言黄钟律度，取法《河图》、《洛书》。神宗时，进《律吕精义》，其说曰："臣尝闻朱子曰：《史记》说律数，盖自然之理，与《先天图》一般。初闻此语，不晓其意，及闻何瑭之说（都御史何瑭，世子之祖舅，其说曰：度量权衡，取法于黄钟者，贵其与天地之气相应也。至于九其寸而为律，十其寸而为尺，则人之所为也。《汉·志》不知约十为九，非即十而取九，乃欲加黄钟一寸为尺，谬矣）方悟《汉·志》度本起于黄钟之长，则黄钟之长，即是一尺，古云长九寸、长八寸十分一之类，尺一而律同也。朱子所谓与《先天图》一般者，《先天图》出于《河图》、《洛书》者也。《洛书》之数九，故黄钟之律长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与纵黍之长相合；《河图》之数十，故黄钟之度长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与横黍之广相合。盖《河图》之偶，《洛书》之奇，参伍错综，而律度二数方备，此乃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排者也。"……又曰："一切算术，皆取法于《河图》、《洛书》。《河图》十位，天地之体数也。《洛书》九位，天地之用数也。是故算律之术，或有约十而为九者，著其用也。或有约九而为十者，存其体也。"①

笔者所测与江永在其所著《河洛精蕴》里"律吕声音本于河图洛书说"也刚好对应上了。另外，从贾湖骨笛的制作工艺上，就已经充分展示了8000多年前贾湖人的原始之"数"与数学水平。而原始数学行为与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数学行为，而原始数学行为原来就是为经济计量记录服务的。可以说，骨笛制作工艺被发现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为研究当时的会计计量水平提供了间接证据。

可以认为，原始计量行为促进了原始音乐水平的发展，而乐器的制作又促进了人们数理思维的发展，进而产生了度量衡的概念和标准，反过来又促使原始计量行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音乐和计量的关系，正好是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即度量衡之起源与音乐的起源有密切的联系，这从贾湖骨笛的发现再次得到证明。

---

① （清）江慎修著，孙国中点校《河洛精蕴》，学苑出版社，1989，第297～298页。

| 第八章 |

贾湖人的“数”之哲学

既然本章涉及哲学这个词汇，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哲学这个抽象的概念。“哲学”（philosoph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philo - sophia），是从古希腊文转变而来，原本是“爱智慧”和“智慧之友”之意，“哲学”这两个字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从事启蒙宣传的哲学家西周时懋（1829 ~ 1897）根据汉字中“哲”为智慧的意思，将“哲”字与“学”字组合拼成了“哲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哲学的兴起，“哲学”一词便在中国的杂志上开始使用，很快就取代了“玄学”和“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成为通用术语。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人们却是普遍将哲学与智学或理学相对应的。

由于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四维动态”的“形象”与“逻辑”变化，人们所有的“智慧”都来自对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和“变化法则”的“认识”、“归纳”与“总结”。中国文化的“易”字中就包含着“哲理”与“智慧”的意思，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有着“自然”在“变化”的“哲理”与“智慧”，都有着事物“四维动态变化”的“形象”与“逻辑”。

再者，笔者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源本身就来自于中国的文化（笔者在后面将会讲到），西方的智慧也全部都来自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从易学文化体系中就可以看出“世界莫大于易”，所以将来源于希腊文（philo - sophia）的（philosophy）来对应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分支——“哲学”，应该也可以吧！

现在我们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使用的“科学”一词，与原本的“分科之学”的意思已大不相同了：如今的“科学”更多地具有“理性”、“智慧”和“技术”等含义，从“科学发展观”、“科学技术”、“这个产品很科学”这几个短语中，就可以品味出来。

当人们在未知的领域，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科学也是

这样，所有的科学领域都无不开始于哲学的探索。当人们在寻求答案的时候，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会陷入沉思的境界，这种沉思的活动就是一种运动的探索，而哲学恰恰给了这些善于探索的人们去探求和解决这些问题以极大的兴趣和任务。

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化里，哲学与别的学科一样，其目的首先是要获得智慧的知识，哲学里追求的是可以提供一套统一的科学体系的知识，和由于批评我们的成见、偏见和信仰的基础而得来的知识。

但是在西方，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能确定，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了。比如，关于天体的全部研究现在属于天文学，但是在西方古代的过去，它却包含在哲学之内。牛顿曾经写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与数学原理》，说明了数学也曾经包含在哲学之内。同样，研究人类心理的学问，曾经也是哲学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已经脱离哲学而变成为心理学了。在如今的西方，到现在还不可能确定答案的问题，仍然放在哲学这门学科里，这就是哲学的不确定性。

马王堆帛书《要》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也曾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要》篇还记载：“子赣曰：‘夫子也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巨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其德。《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

这段对话用白话文译过来，就是说：“子贡问：‘老师当年教诲我们说：“只有丧失德行的人，才会指望迷信神灵。只有远离智谋的人，才会相信卜筮。”我一直相信您的话。根据您的教诲，相信《易》就是昏迷糊涂的行为，为什么老师到老年反而会爱好它呢？’孔子说：‘君子讲话要有准则。前面的现象发生，未来的现象也有规律可以遵循了。知道事物的规律就不会违背它的本质。《尚书》多篇已亡佚了，《周易》却未失掉，而且它是古代遗留的言论啊。我并不是只以它作为卜筮工具在用啊！’”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也记载：“（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就是说孔子为读《易》而多次翻断了连接竹简的牛皮带子。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就会发现，学术界最早的记载就是称之为“易”，既没有称为“易学”，也没有称为“易经”，更没有称为“哲学”。笔者认为，“易”绝

不能叫“易学”，一叫“易学”就像科学一样给专业“分科”了。在中国古人的眼里，“易”是大自然中所有知识学科的集大成，“易”的概念更广义，无所不包，这里面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知识，但同时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的知识，所以“易”也具有不确定性。但与“易”字相比，“哲学”之词意就狭义得多了。

但是今天的“哲学”一词已经普行于天下，在所有有知识的人们心中，已经具有了生命，普行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了，也成了既定事实的中西文化混血儿。如果笔者不用这个词汇，而是换一个词来代替“哲学”，那多半行不通。

“易”与“易学”也，今天世界许多研易的学者们，受“科学”一词的影响，都比较认同“易学”这样的表述，所以笔者在此只是说明一下，好让读者明白，在本书中还要继续使用“哲学”与“易学”之词，并不是想要纠正。

第一节　先天八卦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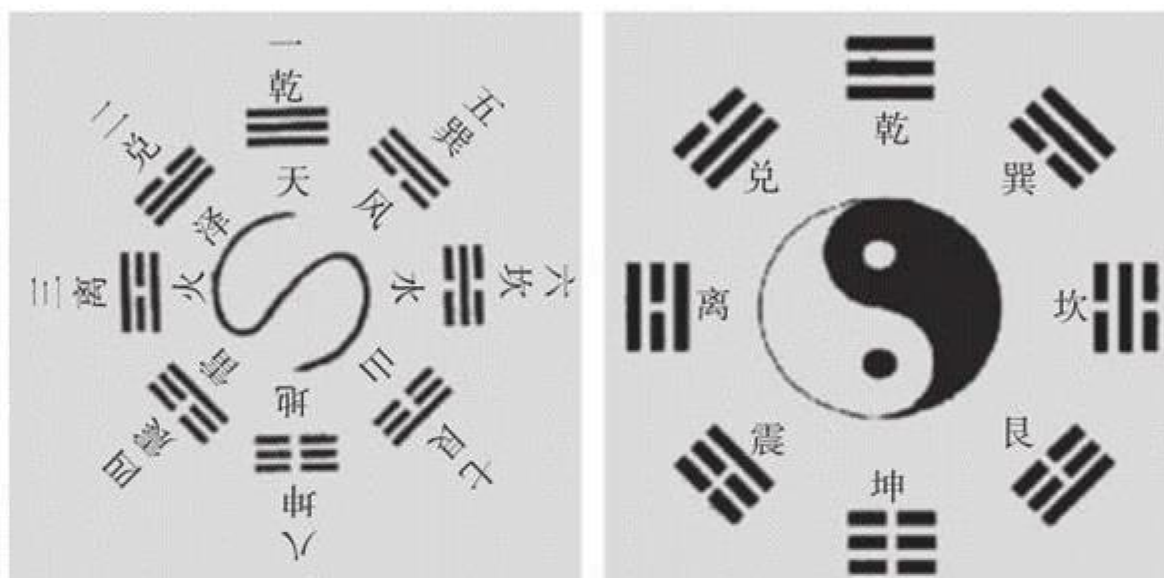
前面笔者曾说过，从“一”到“八”这八个数字的运动变化所形成的一个大“S”形，原本先天就在宇宙大自然之中，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始终在一起运动、变化、存在着，只不过是在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伏羲氏时代（贾湖时代之前），就被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中国智慧的古人发现了。

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八音骨笛的实测和一组八龟的摆放现象来看，“八”的数量概念，至少在贾湖文化时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并被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中国智慧的古人按照星球是左旋运动的形象思维方法，排列成了先天八卦（组图 8－1）的顺序，所以先天八卦也叫伏羲八卦。

如果我们把先天八卦中从“一”到“八”的排列，对应宇宙中星系运动变化的形状（图 8－2），整体就浮现出了一个形象思维的龙［圆形］的运动变化形态。

今天凡是懂得利用中国古老的易学知识理论进行占卜的都会知道，起六爻卦的时候是绝对离不开“数”的，这充分说明人类的智者们最早对世界万物的认识都是从“数”开始的，智者们利用“数”的时代，也恰恰是“结绳记事”的时代。

这样，“一”到“八”这八位“数”在远古还没有诞生文字的时代，就充满



组图 8－1　先天八卦图



图 8－2　宇宙中的星系图

了玄秘的奥妙与天机，被赋予了能够分类和包容万事万物的概念，以及神圣的哲学之意。中国远古的智慧古人只用这八个“数”就能够系统地包罗万象、万事、万物了，使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数”在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里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包或信息系统库。

到了贾湖文化时代，人们能用龟甲和石子进行易学占卜，说明贾湖人已经完全掌握了“数”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具有了将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能够归类在易学之“数”中的能力，以至于今天依然流传在民间的易学占卜[挂、褂、卦]，人们还将其称之为“算卦”。

西方哲学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出的“万物皆数”，其实说的也是这种观点。而西方的那些早期哲学家们同时也都是数学家，他们非常清楚哲理都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数”。

二

先天的万事万物都为体，就是说在人类具有系统的认识能力之前，所有事物的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的规律就已经存在于宇宙大自然中了。先天八卦之“数”为体、为根、为始、为生，反映的是直观的认识。对先天八卦之“数”的感觉认识，形象思维要多于逻辑思维。这是中国远古的智慧古人在一个四维的立体时空体系中，对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的描述，即：

一、宇宙太空、天空是运动变化的；　二、月亮的运动造成月光的变化；
三、太阳始终是从东方升起来的；　四、植被是根生的；
五、风、云、草是行走在地上的；　六、水在低温下会冷聚的；
七、山脉是高耸入云的；　八、大陆是漂流移动的。
……

这只是先天八卦中的“数”中描述大自然的部分理论。

因此，中国智慧的古人对大自然的整个系统进行形象思维的认知、发现、总结，最后归纳形成了先天八卦之“数”。先天八卦之“数”并不具有方向性、社会性和人事性的概念和逻辑，但却具有“数”与自然万物相互对应的概念和逻辑等自然属性。当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哲学家们说“万物皆数”的时候，他们同样暗示了这种观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天　　月　　日　　雷　　风　　水　　山　　地　　运动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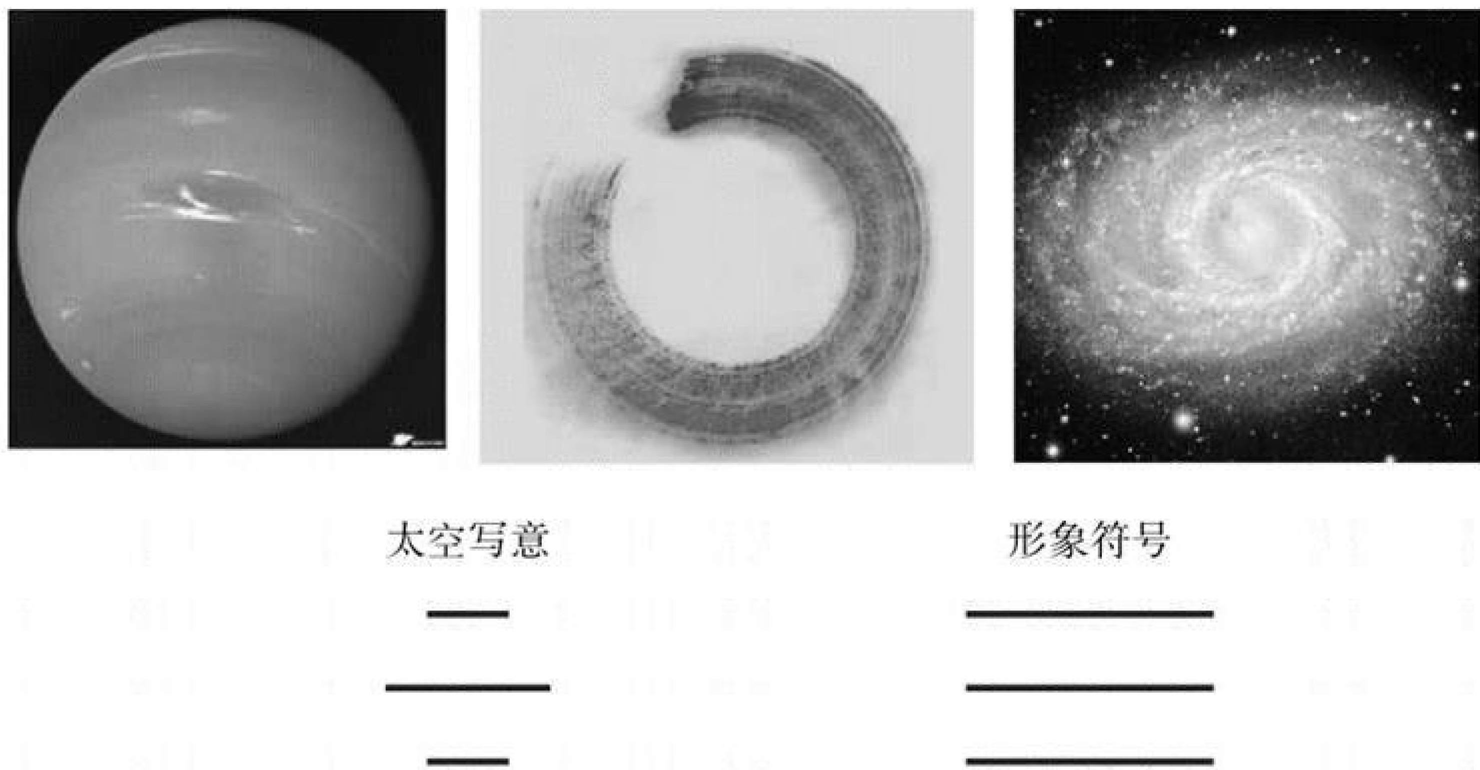
键[乾]　夺[兑]　罗[离]　辰[震]　筭[巽]　习赣[坎]　根[艮]　川[坤]　恒久(长久)

下面我们看一下先天八卦之“数”所系统归纳的事物含义。

“一”数

键［乾］、上、天、高、神、龙、顶、首、易、道、大、运动、不息、元、旋、古、久、昼、旧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太空宇宙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圆形、运动、古老、“道”等特征的认识，他们将这些特征与“一”数对应起来（组图8－3）。



组图8－3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圆形、运动、古老、“道”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乾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乾三连”的特征。

“二”数

夺［兑］、泽、月、口、舌、言、说、美、悦、少女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月光、沼泽湿地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凹陷、清爽、喜悦等特征的认识，并将这些特征与“二”数对应起来（组图8－4）。



组图8－4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凹陷、清爽、喜悦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兑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兑上缺”的特征。

“三”数

罗［离］、太阳、火、电、焚、光、明、网罟、飞翔、红、羽、鹤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太阳、火焰、网罟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炎上、网罗等特征的认识，并将这些特征与“三”数对应起来（组图8－5）。



组图8－5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炎上、网罗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离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离中虚”的特征。

“四”数

辰［震］、雷、震动、行、出、作、兴、讲、响、音、生、笑、鹿、蕃、初、起、振、威、惊惧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地震、雷击、震动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晃动、发散等特征的认识，并将这些特征与“四”数对应起来(组图8-6)。



组图8-6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晃动、发散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震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震仰盂”的特征。

“五”数

筭［巽］、风、霜、云、白茅、鸡、鱼、绳、蛇、手、舞、歌、高、入、伏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大风、白云、蛇［舌］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移动迅速等特征的认识，并将这些特征与“五”数对应起来（组图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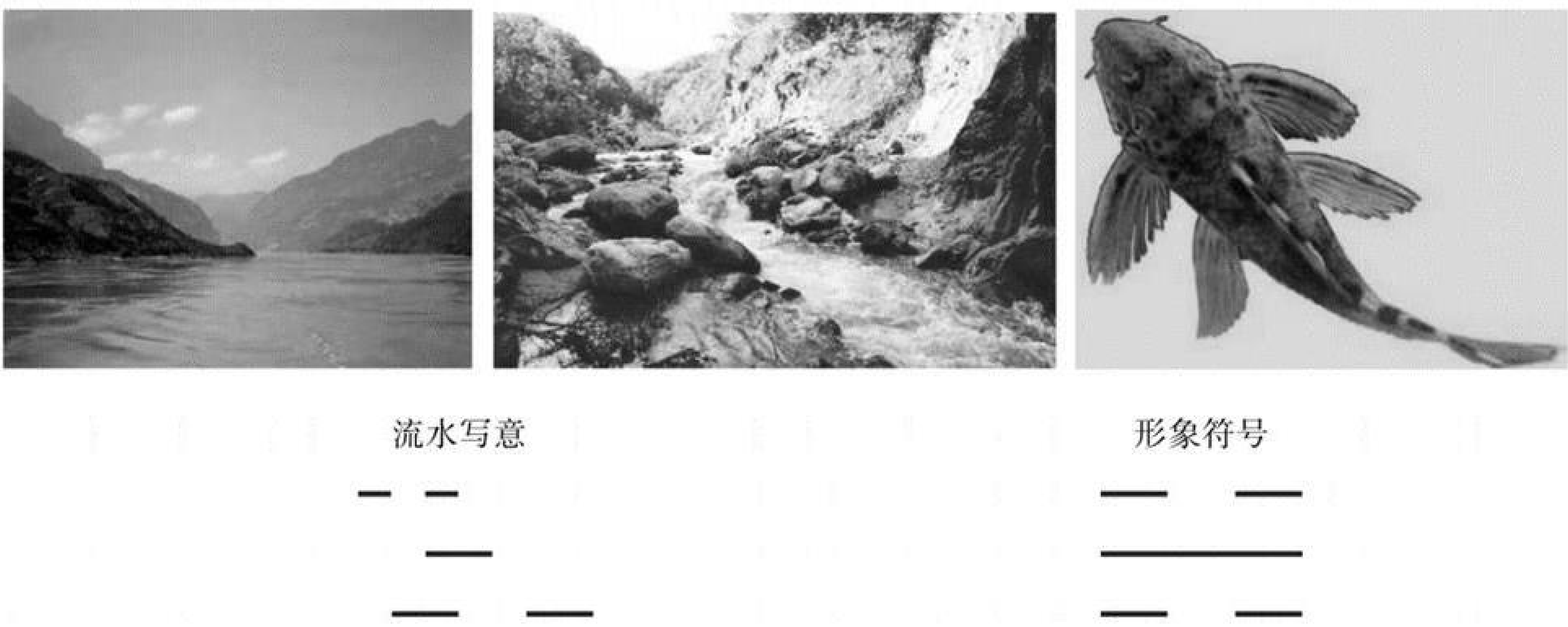
组图 8－7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移动迅速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巽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巽下断”的特征。

“六”数

习赣［坎］、水、月、乌云、沟、咸、大川、江河、渊、寒、泉、雨、鱼、耳、顺、尸、死、险、陷、毒、习、聚、归、阴液、灾、涕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江河、流水、鱼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流淌、游动、寒凉的等特征的认识，并将这些特征与“六”数对应起来（组图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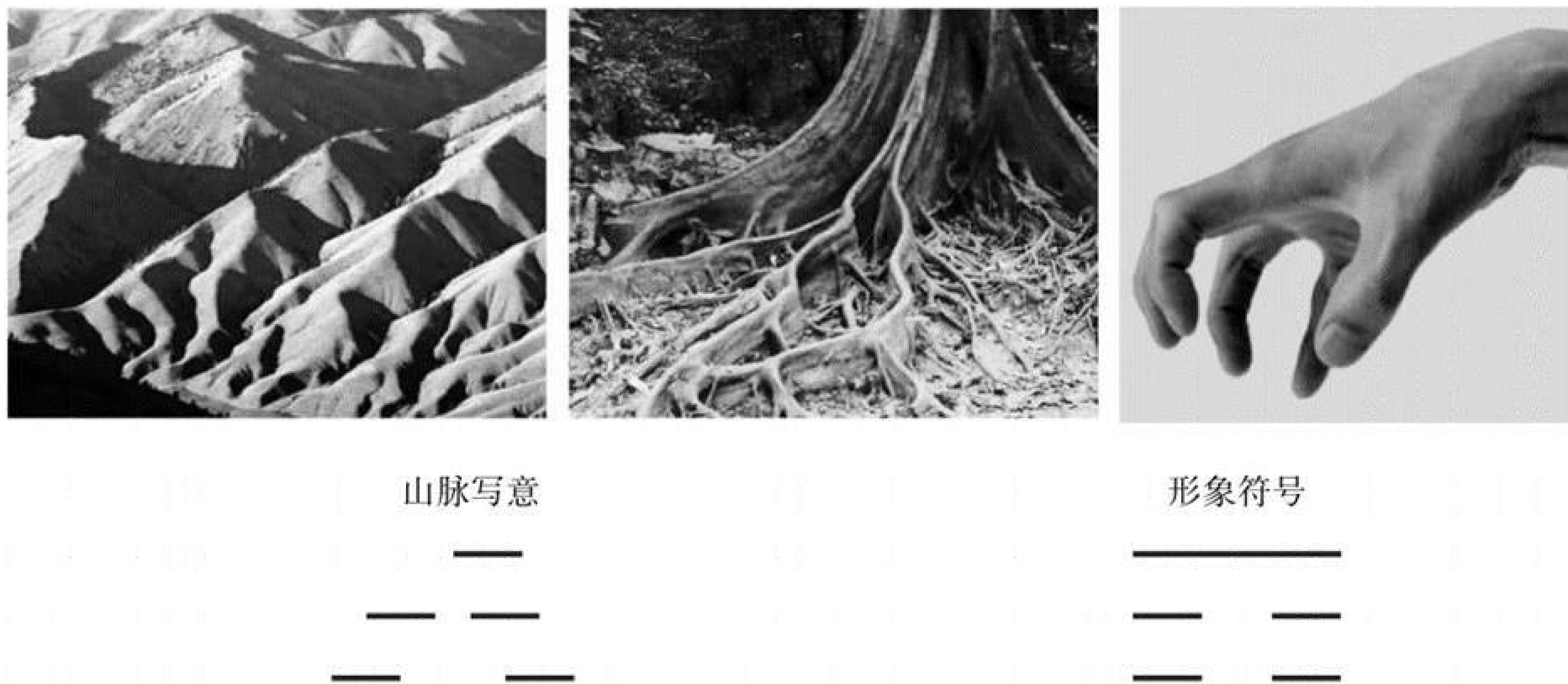
组图 8－8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流淌、游动、寒凉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坎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坎中满”的特征。

“七”数

根［艮］、山、石、树根、背、鼻、手、脚、指、爪、沙、丘、穴居、星、尾、虎、豹、鼠、硕果、栗、止、闲、居、罢、友、道、小狐、狼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山脉、树根、手爪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延伸、坚持、锋利的等特征的认识，并将这些特征与“七”数对应起来（组图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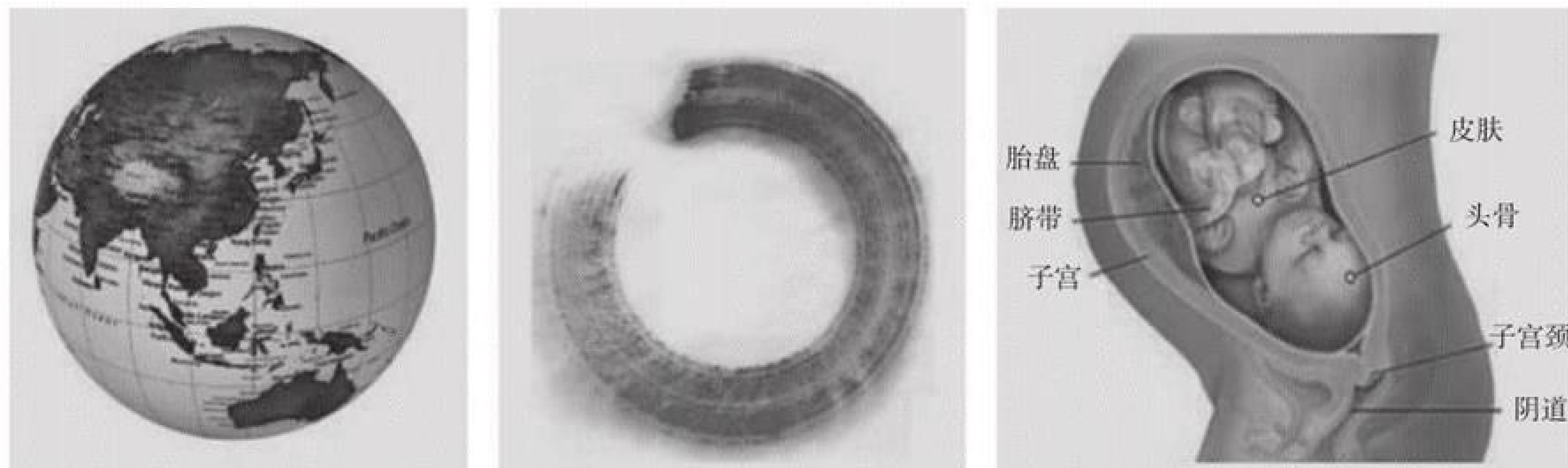
组图8－9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延伸、坚持、锋利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艮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艮覆碗”的特征。

“八”数

川［坤］、下、大地、土、陆、身、形、晦、夕、暮夜、尸、丧等

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的地球、大地、身体等事物原本先天具有的能够生养负载万物等特征的认识，并将这些特征与“八”数对应起来（组图8－10）。





组图 8－10

后人又将这些具有能够生养负载万物等共同特征的事物进行符号化的归类，总结发明出了坤卦符号。根据形象思维，此符号具有“坤六断”的特征。

从以上八个数对应的八个卦的符号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八卦的符号实际就是一个形象的视觉图案，而在八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六十四卦实际上也是一个个被人们识别出来并被归类了的系统模块。当古人进行算卦占卜时，看到某种现象（外应）或起了一个卦（符号）以后，马上就能调出储藏在大脑中的模块进行识别和判断了，就这么简单。

在中国古老的易学知识理论中，“零”和“十”一般不用，零为无，十为弃数，在哲学和理学方面一般不太用于代表众多的事物和意义，“十”和“零”一般只代表结束和开始，“九”是最大的、动态运行的阳数，既为时间，也为空间，即时空。先天八卦中每组对宫的“数”相加之和都为“九”，即为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同时这也涉及了数学中的加法运算。

所以能包容万事万物的宇宙大自然是一个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而且这个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是充满生机、自强不息和不断变化的，几乎是永恒的。但是在这个不断地变化过程当中，时空这个永恒而不停地动态运行的平衡系统，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所以，时空是永恒的，但不是静止的永恒。

即使是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家已经预测计算出的宇宙中不断运动的星球和星系的寿命是几十亿万年。如果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大自然的寿命与人类短暂的进化繁衍史进行对比，那么宇宙大自然的生命就可以说是永恒的了。

所以说“先天八卦”既是一部书又是一个图形，只用了八个“数”就代表了万事万物，就能向全人类描述和诠释如下信息：在人类具备对宇宙大自然系统的认知能力之前，万事万物自身以及整个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的时空就已经是一个相对永恒的并且永恒变化的、充满生机的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

三

在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远古过渡时代，没有今天那种人为规定的东西，人造的东西只有石器。所以，原始古人在看待事物时，是从看此事物像彼事物的比较开

始的，即形象思维的方式，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初期认识方式。今天则不同，人造的和人为规定的东西非常多，人们看待事物时，就有了这是什么与那是什么的观念了。

古人在形象思维时，将人体与大自然进行了整体模糊的类比，发现微观的人体与宏观的大自然有着极其近似的对应关系，于是将自然拟人化，例如：

1. 大自然类似头顶蓝天、脚踩大地的巨大人体；
2. 无边际的天空极类似人的思维；
3. 日月极类似人体的双眼，日月光与闪电极类似人体的目光；
4. 金、木、水、火、土星极类似人体的五官与五脏。
5. 微风极类似人体的呼吸，狂风极类似人体的喘粗气；
6. 雷声极类似人体的发脾气，下雨极类似人体的流泪；
7. 阴天极类似人体的忧愁，晴天极类似人体的爽朗；
8. 黑夜极类似人体的睡眠，白昼极类似人体的活动；
9. 山脉极类似人体的骨骼，山谷极类似人体的经络；
10. 土壤极类似人体的肌肉，大地极类似人体的皮肤；
11. 植被极类似人体的毛发，露水珠极类似人体的汗珠；
12. 河流极类似人体的血脉，地气的涌动极类似人体的气血流动；
13. 湖泊、沼泽、湿地极类似人体的泌尿、生殖、排泄系统。

……

这只是用先天八卦将大自然和人体进行对应后所描述的部分哲学理论，而且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古人根据“一物一太极”的形象思维，将先天八卦之“数”与人的头部对应起来：

一——键［乾］，脑、思想、思维空间、反应、认识等脑部的功能等；
二——夺［兑］，右眼、舌等；
三——罗［离］，左眼，左右眼与舌头在头部范围内具有的表现示意功能等；
四——辰［震］，声带，确切地指发出声音的功能、头发等；
五——箅［巽］，指喘气、呼吸、耳朵、眉毛等；
六——刁赣［坎］，指眼泪、鼻涕、口水、嘴等；
七——根［艮］，指鼻子、牙等；
八——川［坤］，指面部肌肉等。

古人根据“一物一太极”的形象思维，将先天八卦之“数”与人体的胸腹

部对应如下：

一——键［乾］，胸腔、腹腔等；
二——夺［兑］，肺部、大肠等；
三——罗［离］，心脏、小肠等；
四——辰［震］，肝、胆等；
五——箅［巽］，经络、丹田、神经系统等；
六——刁赣［坎］，肾脏、膀胱等泌尿系统等；
七——根［艮］，胃、背等；
八——川［坤］，脾脏、胃等。

古人根据"一物一太极"的形象思维，将先天八卦之"数"与整个人体对应如下：

一——键［乾］，头；
二——夺［兑］，右眼、舌等；
三——罗［离］，左眼；
四——辰［震］，左手、声音、毛发等；
五——箅［巽］，右手、呼吸、汗毛、眉毛等；
六——刁赣［坎］，肛门、生殖、泌尿器官等；
七——根［艮］，腿、全身筋骨等；
八——川［坤］，足、全身肌肉、皮肤等。

这只是先天八卦之"数"与人体进行类比对应的例子。

四

以古人类的活动范围——地球上的大自然为中心，从先天八卦中可以看出：从一到四，键［乾］（天）、夺［兑］（月）、罗［离］（日）、辰［震］（雷）是天空和宇宙的自然现象和事物。从五到八，箅［巽］（风）、刁赣［坎］（水）、根［艮］（山）、川［坤］（地）是地球上的自然现象和事物。①

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在生产、生活活动中，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对宇宙大自

① 括号内的名称与八卦的名称只是其中的一种对应关系。

然的万事万物不断的观察、发现，拟人化总结归纳出了“天地定位、雷风相搏、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这样一个大自然先天原本具有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

将本节中的提及的两个内容，即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与宇宙大自然中原本就具有“天地定位、雷风相搏、山泽通气、水火不相射”的先天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明白先天八卦之“数”为何非得按图 8 - 1 这样进行排列了。

第二节　后天八卦

一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图 8 - 11、图 8 - 12）之“数”为用、为变化、为运动、为过程，既可在平面，也可在立面，还可在一个四维的立体时空中，这是中国智慧的古人对大自然中万事万物自然运动的法则与客观变化规律进行形象思维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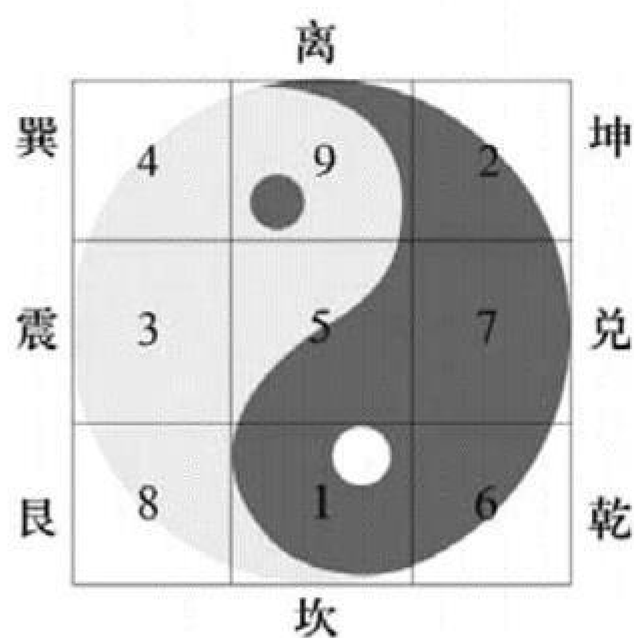


图 8 - 11　后天八卦数



图 8 - 12　后天八卦图

平面对应：

三、九、七、一、八、六、四、二、五九个数字。
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中九个方位。
……

立面、四维立体时空对应：

1. ［九］日在天上行、鸟在天上飞、火焰向上炎、热量向上走；

2.［一］水在地上流、鱼在水中游、水向低处流、冷气向下走；
3.［三］春来木生长、夏来木停生、秋来木凋零、东来木休眠；
4.［七］月夺太阳光、满望最亮泽、上下弦变化、晦朔光不见；
……

这只是后天八卦对大自然所描述的部分理论。

古人运用形象思维对大自然中万事万物自然运动的法则与客观变化规律进行逻辑归纳，不但将人体与大自然进行了整体模糊的类比，还将人类社会与大自然进行了整体模糊的类比，发现微观的人体与宏观的大自然以及人类社会，都有着极其类似的对应关系。

因此，中国智慧的古人对大自然整个系统的万事万物有了一个系统的认知能力，并总结、归纳、创造了后天八卦。

这样，后天八卦之“数”就具有了方向性、方位性、社会性、人事性、数字的概念性和逻辑性等，对自然界所有事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定位、定量等概念，把自然拟人化，与“数”进行对应，例如：

六	七	九	三	四	一	八	二	五
键[乾]	夺[兑]	罗[离]	辰[震]	筭[巽]	习赣[坎]	根[艮]	川[坤]	中
天	月	日	雷	风	水	山	地	人类活动的任一点
西北	西	南	东	东南	北	东北	西南	中央
戌亥	酉	午	卯	辰巳	子	丑寅	未申	辰戌丑未（月）
秋冬	秋	夏	春	春夏	冬	冬春	夏秋	季（春夏秋冬）
黄偏白	白	红	青绿	黄偏青	黑	黄偏黑	黄偏红	黄
宇宙	金系星	火系星	木系星	木系星	水系星	土系星	土系星	地球
凉爽	凉	热	温	温暖	寒	寒温	热燥	适中温度
父亲	小女儿	二女儿	大儿子	大女儿	二儿子	小儿子	母亲	家庭
爷爷	小姑婶	母亲	大伯	大姑婶	父亲	小叔	奶奶	兄弟姐妹
老男人	少女	中年妇女	壮年男人	女人	中年男人	少男	老女人	社会
帝	妹	妇女	武将	宫女	文臣	弟	后	宫廷
生机	金属	火	树木	草木	水	石头	田地	土壤
智慧	欢乐	美丽	健壮	端庄	成熟	成长	稳重	形态
马	羊	禽鸟	鹿	鸡	鱼	鼠	牛	动物
龙	虎	牝牛	良马	孔雀	大鱼	龟	牝马	
脑	舌	眼	声	气	泪水	鼻	面	面部
胸腹	肺	心	肝	经络	肾膀胱	胃	脾	五脏六腑

……

这只是后天八卦之“数”与大自然、社会、人体、方位等进行对应后所呈现的图式，而且也都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中。

由于天体中的星辰是左旋的，所以后天八卦书图中就明示了：

1. 太阳在夏至那一天在寅时从东方寅位升起，在戌时降落在西北方戌位。

太阳在冬至那一天在辰时从东方乙位升起，在申时降落在西方庚位。

2. 一年从立春那一天开始进入春天的寅月，标志着冬天的丑月结束。

一年从立冬那一天开始进入冬天的亥月，标志着秋天的戌月结束。

3. 寅丑在根［艮、八］宫，根［艮］宫之寅为木，后天之数既为“三”，也为“八”。

戌亥在键［乾、六］宫，键［乾］宫之亥为水，后天之数既为“一”，也为“六”。

……

这只是后天八卦之“数”对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的描述，而且也都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中。

有了后天八卦之“数”后，中国智慧的古人就对宇宙大自然的整个体系中的自然科学以这种“数”的方式进行阐述，结果极为清晰明了，简洁而自然。

这种表达方式，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数”的自然认识，同时赋予“数”以神圣的哲学之意，使之能够包罗万象、万事、万物。

这是典型的中国思想文化，其中独特、综合而全面的哲学中，既包括了人类的形象思维，也包括了人类的逻辑思维，是多学科配套研究的综合学术。它在向世人表明，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动态运行的，是一个即将发生或即将结束的过程趋势，是处在整个动态系统中运行的状态趋势，是与时偕行的。

比如，后天八卦之“数”，既有概念性，又有逻辑性，还有系统性；既有运动的状态性，又有方向性，还有明确的方位性：

1. “三”为先天火，代表太阳光，也代表太阳处在旭日状态，表示生、旺，“九”为后天火，代表篝火光，也代表太阳处在落日状态，表示死、衰，罗［离］为阴，“三”为小、为生，“九”为大、为死，代表先天强、硬而后天软。

2. “四”为先天木，代表草本植物，也代表植物处在落叶状态，表示死、衰，“八”为后天木，代表木本植物的树木，也代表植物处在发芽状态，表示生、旺，辰［震］为阳，“四”为小、为死，“八”为大、为生，代表先天软而后天强、硬。

3. “一”为后天水，代表河水，也代表河水处在奔腾状态，表示死、衰，“六”为先天水，代表雨水，也代表雨水处在落雨状态，表示生、旺，习赣

[坎] 为阳，“一”为小、为死，“六”为大、为生，先天软，后天强、硬。

4. “二”为先天金，代表月光泽，也代表月光处在满月状态，表示生、旺，“七”为后天金，代表金属光泽，也代表金属光泽处在月光的初晦状态，表示死衰，夻 [兑] 为阴，“二”为小、为生，“七”为大、为死，先天强、硬，后天软。

5. “五”为先天土，代表石、岩类，也代表土 [沉积岩、石灰岩等] 处在坚硬的状态，表示生旺，“十”为后天土，代表粉尘类，也代表土 [沉积岩、石灰岩等风化后或其他原因所形成的粉尘类] 处在松软的状态，表示死衰，川 [坤] 为阴，“五”为小、为生，“十”为大、为死，先天强、硬，后天软。

……

再比如，后天八卦之“数”的变化，还能够准确地描述出万事万物在大自然体系中所具有的运动变化法则与客观规律，既有概念性，又有逻辑性，还有系统性；既有运动的状态性，又有方向性，还有明确的方位性：

1. 树木 [先天“四”] 在春天 [后天“三”] 发芽，在夏天 [后天“九”] 停止生长，在秋天 [后天“七”] 凋零落叶，在冬天 [后天“一”] 休息、冬眠。

2. 太阳 [先天“三”] 从东方 [后天“八”] 升起，到南方 [后天“九”] 停止升起，在西方 [后天“七”] 降落，在北方 [后天“一”] 休息（其实在继续运动，只是我们没看到，拟人化的表述就是休息）等待明天升起。

3. 月亮 [先天“二”] 在朔过后两天，开始生辉，出现峨眉月，到了周天四分之一，出现上弦月，继续变化，逐渐到满望月，整个这一半的过程始终是月亮从东方 [后天“三”] 在逐渐得变圆、变亮，走到周天的一半 [后天“九”] 时，变成了满月 [先天“二”]；月亮在既生魄时开始缺损，再走到离太阳四分之一周天时，就会出现下弦月，一直继续到晦，就看不见月亮了，整个这一半过程始终是月亮从西方 [后天“七”] 在逐渐得变缺、变暗，晦到朔这几天 [后天“一”] 月亮好像是黑的，其实是没有反射出光泽。

4. 水 [先天“六”] 在天上形成雨 [后天“六”]，下到地上从高处 [后天“一”] 向低处流，就汇合形成了河流 [后天“一”]，流的过程灌溉了树木、雨林 [后天“三”、后天“四”、后天“八”]，温度、热气 [先天“三”、后天“九”] 也会使水又蒸发到天空 [后天“九”] 形成云，众多的云积聚到一起，就会形成积雨云，遇到冷气 [后天“七”]，就会形成雨滴 [后天“六”]。

5. 金属 [先天“一”] 在高温烈火 [后天“九”] 中得到冶炼和锤炼，被制作工具在砍伐树木 [后天“三”、后天“四”] 中慢慢磨损，在雨水、河水 [后

天“一”］的浸泡中被氧化、锈蚀，在金矿中［先天“七”］被重新挖掘、采集，五行中只有金是克生的。

……

以上这些，只是后天八卦的理论将大自然动态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进行的详细描述，而这只是后天八卦理论应用的一部分。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出的“万物皆数”的观点，其实也是表达类似的哲理。

所以说，后天八卦之“数”，是中国智慧的古人最早利用中国哲学中古老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方式，向全人类诠释和描述了以下信息：在人类具有对宇宙大自然系统的认知能力之后，万事万物自身以及整个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有生有死，有始有终，是一个循环变化的、生生不息的、永远充满生机的永恒的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

后天八卦之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零）
坎	坤	震	巽	中	乾	兑	艮	离		
习	赣	川	辰	筭	中	键	夺	根	罗	弃

“五”为人的认知能力，指以人类的活动范围，即地球上的大自然为中心，包括：五官、五脏、五指、五体、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行等。

“零”和“十”为开始也为弃数，只为体，不为用。后天八卦中每组对宫的“数”相加都为“十”，如果考虑中间的“五”，则为“十五”，这就是说不管是否考虑进“人”这个因素，宇宙大自然也都是一个平衡的系统，同时这也涉及了数学中的加法运算。

1. 后天八卦中每组对宫的“数”都为“十”，“十”为弃数，表示盈则损，满则溢，又要从头开始，也当“零”用（自然界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运动法则，“十”这个数的理，也可以当“零”用，也代表开始，即九九还归一和太极的“一”之前的那个开始）。

中国古人不用阿拉伯数字，即使是在数学当中被我们一直应用到今天的产生于古印度的阿拉伯数字之10，也是1和0的组合数。

2. 后天八卦书图当中装了与大自然的事物及其能对应上的九个数（中间代表人的这个“五”，对大自然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对于代表地球的两极来说，却是有用的，也是必须要有的）、八个数字、九个宫位、二十四（山）个方位，这些东西代表着太多太多的含义。

3. 当九宫中间代表人和地球两极的这个“五”周围的八个宫的任何一个宫所代表的含义和数字被破坏，动态运行的平衡系统就将被打破，中间的人类将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残酷而严厉的报复。

4. 后天八卦是中国远古的智人在向全人类诠释和描述以下信息：在人类具有对宇宙大自然系统的认知能力之后，万事万物自身以及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有生有死，有始有终，是一个循环的、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大自然也一样，是一个永恒的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并且是一个在永恒变化着、永远充满生机的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

二 后天八卦之“数”所系统归纳的事物含义

“一”数

习赣［坎］、水、月、乌云、玄、沟、咸、大川、江河、渊、井、寒、泉、雨、中男、客、匪、盗、寇、弓弹、桎梏、弧、豕、弓轮、法、律、罚、耳、顺、尸、死、血、劳、志、惕、恤、愁、悔、疑、忧、心病、险、陷、隐伏、欲、毒、习、聚、归、入、膏、阴液、灾、涕、罪、北方等

“二”数

川［坤］、大地、王后、土、佳妻、百姓、群众、女人、母、妇、妣、姓、城邑、隍城、田、畴、邦、国、家、宅、陆、闭、关、黄牛、牝马、大舆、腹器、厚德、甘、肥、身、安、负、利、富裕、虚、谷、经营、吝啬、迷、欲、形、过、恶、害、乱、冥、晦、夕、暮夜、朋、方正、光大、顺从、终、无疆、事业、庶政、尸、康、辽、寡、营、下、书、永、逊、近、思、默、密、耻、怨、丧、年、户、齿、辐、西南方等

“三”数

辰［震］、雷、震动、帝、主、诸侯、行人、士、兄、夫、行、征、出、逐、作、兴、奔走、言、讲、议、问、告、响、音、应、交、惩、友、从、守、左、生、缓、宽仁、乐、笑、陵、祭、草莽、麋鹿、筐、趾、蕃、短木、缶、足、腓、拇、履、击、鼓、初、起、振、长子、祖、宗、公、百官、虞人、臣、百谷、坦道、圭、棺、椁、躬、身、戎、敕、威、仁、惊惧、东方等

“四”数

筭［巽］、风、霜、云、长女、处女、妇、妻、宫人、商旅、长木、白芽、药、鸡、鱼、束帛、床、褥、绳、维、股、肱、手、舞、歌、解、高、入、伏、进退、号喻、命、规律、行事、号令、风谷、仁、资、利市、墉、归、桑、龟、蛇、处、交、东南方等

“五”数

中央、中心等

“六”数

键［乾］、天、君、父、天子、王、大人、圣人、善人、君子、武人、行人、高、宗、考、神、人、族、爱、信、龙、马、万物、金、玉、寒、冰、斗、郊、野、顶、首、直、健、易、敬、畏、威、严、坚、刚、道、德、良、善、生、好、祥、庆、嘉、誉、福、禄、始、大、得、盈、治、老、远、谋、不息、元、旋、荒、包、肥、古、久、大明、昼、百、圭、著、旧、西北方等

“七”数

夺［兑］、泽、少女、月、娣、妹、妻、妾、友、巫、口、舌、言、说、祝、谢、教、刑人、酌、享、虎、羊、牲、右、西、美、容、金、角、见、悦、花瓶、西方等

“八”数

根［艮］、山、石、树根、背、鼻、手、脚、指、爪、沙、丘、干、磐、门庭、宫殿、域、庐、舍、穴居、社稷、星、斗、经络、少男、君子、贤人、弟子、小人、孤、童、仆、晦、尾、皮、虎、豹、鼠、小屋、硕果、栗、华、止、慎、节、执、引、取、求、牵、纳、握、炙、厚、笃实、积德、多识、信、思、差、休、闲、居、罢、防、颠、弟、官、友、道、时、小狐、狼、肱、教堂、宗、观、寺、庙、东北方等

“九”数

罗［离］、太阳、火、电、礼、中女、母、妇、妹、主人、恶人、大腹、户、自、女兵、牢狱、网罟、瓶、甕、矢、飞翔、禽鸟、黄牛、牝牛、文采、红、见、辉光、智、大吉、羽、樽、燔、焚、光、明、戎、鹤、南方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位数字运动变化的法则、规律，表达了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永远都处在一个动态运动变化状态，真实而自然。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所提出的“万物皆数”，其实是这种观点。

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数”的宫位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中国智慧的先祖在观物取象时经过仔细的类比，发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的运动法则与变化规律，在人类认识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大自然中，可以通过形象思维简单而直观地将其与八卦之“数”进行对应，因此中国古人将其称之为“体”和“先天”。由于人类在不断进化，中国人智慧的祖先通过实践与劳动，逐渐掌握了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的动态运动变化的法则和规律，并将这些先天自然运动的法则与规律进行总结、类比、归纳、延伸，包括进了许许多多的事物甚至所有的事与物（即《系辞上传》中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且通过利用“数”的变化，能够完整地对大自然的所有事物进行整体而模糊的静态和动态描述，从而逐渐产生了文化与文明，并将这些文化与文明应用到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国古人将其称之为“用”和“后天”。

三　“数”也可代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事物含义

天干

“一”代表“甲”、阳木、高大强硬的树木、大风、东方等；

“二”代表“乙”、阴木、柔弱的小草、灌木、微风、东方等；

“三”代表“丙”、阳火、旺盛的太阳之火、高温的炉火、强烈刺目的光线、南方等；

“四”代表“丁”、阴火、柔弱的篝火、烛火、亮光、南方等；

“五”代表“戊”、阳土、干硬的山石、岩石、卵石、中部、中央、核心等；

“六”代表“己”、阴土、软的粉尘、沙土、黏土、中部、中央、核心等；

“七”代表“庚”、阳金、硬的工具、刀斧等金属以及西方、寒气等；

“八”代表“辛”、阴金、柔软的黄金、白银等可用于装饰的金属以及西方、凉爽等；

“九”代表“壬”、阳水、江、河、海、大雨等强势的水资源以及寒冷、

黑暗、北方等；

“十”代表“癸”、阴水、细雨、露珠、小溪、流淌、清凉、液体、阴暗、北方等。

地支

“一”代表“子”、阳水、江、河、海、大雨等强势的水以及寒冷、黑暗、北方等。

“二”代表“丑”、阴土、植被与水分充足的山脉、稀泥、沼泽、湿地、东北方等。

“三”代表“寅”、阳木、树根、树干、大树、东方等；寅也为驿马星，在最古老的古汉语言文学中，也代表动词中的生长、打雷、竞争等。

“四”代表“卯”、阴木、草根、草木、树叶、东方等。

“五”代表“辰”、阳土、海岸、河堤、水库堤坝等湿土以及东南方等。

“六”代表“巳”、阴火、篝火、炉火、窑火、阳光、温暖、温热、东南方等；巳也为驿马星，在最古老的古汉语言文学中，也代表动词中的照射、刮风、捆绑等。

“七”代表“午”、阳火、太阳之火、火种、阳光、炎热、南方等。

“八”代表“未”、阴土、沙漠、干旱的土地、炎热、蒸发、西南方等。

“九”代表“申”、阳金、上升、劈下、硬的工具、刀斧等金属以及西方、凉爽等；申也为驿马星，在最古老的古汉语言文学中，也代表动词中的闪电、劈、窜等。

“十”代表“酉”阴金、雕刻刀、柔软的黄金、白银等可用于装饰的金属以及西方、凉爽等。

“十一”代表“戌”阳土、燃烧过的灰烬、燥土、凉爽、西北方等。

“十二”代表“亥”阴水、雨水、小溪、流淌、液体、清凉、液体、阴暗、北方等；亥也为驿马星，在最古老的古汉语言文学中，也代表动词中的流淌、流泪、睡觉等。

将本节中的三点内容结合起来，我们就会明白后天八卦之“数”为何非得按图 8 – 12 这样进行排列了。

第三节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事物具有自然关系的逻辑体系

在没有诞生系统文字的时代，中国古人在后天八卦的“数”中还中隐藏着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被类比归类后，所能代表事物的意义实在是太多了。下表是十天干对应于十二地支的不同时期的生旺死绝表，表现的是中国智慧的古人利用拟人化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生动描述了事物在运动变化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运动变化状态。

在本小节中，为了使读者对“数”有直观的认识，笔者不用“数”来表示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而直接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文字来代表“数”，目的是使读者容易理解。

一　十天干生旺死绝表（用形象与逻辑关系，拟人化编制的表格）

十天干生旺死绝表

物质运动变化的状态	五阳干				五阴干			
	甲	丙戊	庚	壬	乙	丁己	辛	癸
长生	亥	寅	巳	申	午	酉	子	卯
沐浴	子	卯	午	酉	巳	申	亥	寅
冠带	丑	辰	未	戌	辰	未	戌	丑
临官	寅	巳	申	亥	卯	午	酉	子
帝旺	卯	午	酉	子	寅	巳	申	亥
衰	辰	未	戌	丑	丑	辰	未	戌
病	巳	申	亥	寅	子	卯	午	酉
死	午	酉	子	卯	亥	寅	巳	申
墓	未	戌	丑	辰	戌	丑	辰	未
绝	申	亥	寅	巳	酉	子	卯	午
胎	酉	子	卯	午	申	亥	寅	巳
养	戌	丑	辰	未	未	戌	丑	辰

胎——孕育　　养——出生　　长生——成长
沐浴——洗浴、启蒙、教育、清除眼前的障碍　　冠带——成人、加冕　　临官——壮大
帝旺——顶峰　　衰——衰老　　病——生病
死——死亡　　墓——坟墓　　绝——消散

1. 甲

（1）雨林、大树生长在［亥］雨水比较充足的地方，大树的生长状态及环

境比较好，就像小孩在不断地发育成长一样。

(2) 雨林、大树生长在［子］河水边上，大树的生长环境及状态比较好，就像小孩在河边洗澡一样。

(3) 雨林、大树生长在［丑］水分较足的山包上，树长得茂盛，像鸡冠，山包就像一个人在成人仪式上，头上戴了顶象征已成人的帽子一样。

(4) 雨林、大树生长在［寅］自己的树根之上，非常茂盛，而树根在地上趴伏着，就像上级长官光临此地，树根在拜见长官一样。

(5) 雨林、大树生长在［卯］草滩上，显得茂盛极了，小草在周围弯着腰，树叶在地上趴伏着，就像拜见大树这个帝王一样。

(6) 雨林、大树生长在［辰］河堤上，树根把持着堤土，不让水土流失，就像显得很累的样子（树根也像钢筋，土也像混凝土）。

(7) 雨林、大树旁有［巳］篝火在烤着，就像大树很难受，也像人生病了的过程、情景一样。

(8) 雨林、大树在［午］烈日下暴晒着，大树就像人快要被晒死了的过程、情景一样。

(9) 雨林、大树如果长期在［未］热土中无水滋润，就像人进入了坟墓的情景一样。

(10) 雨林、大树被［申］刀削斧砍，就像人们也在被刀削斧砍一样，一会儿就气绝了。

(11) 雨林、大树如果被［酉］用于去雕刻，就像大树是很好的雕刻坯胎。

(12) 雨林、大树在受用周围的由草叶被烧过而变成的草木灰、肥料［戌］，大树就像胎儿出生时得到了奶水的营养成分一样。

2. 乙

(1) 草原上的草木在［午］阳光的照耀下茁壮成长，就像小孩在享受适宜的阳光照耀。

(2) 草木就像小孩一样沐浴着阳光，就像在享受着［巳］篝火般的温暖。

(3) 河堤［辰］上的草木就像人长出的毛发，就像有些鸟长着的羽毛的冠，又像头上戴了顶在成人仪式上戴的帽子。

(4) 草木生长在自己的［卯］根系上，非常茂盛，草根在地皮上趴伏着，就像长官亲临此地，拜见长官一样。

(5) 草木生长的周围有大树的根系［寅］，趴伏在地皮上，就像帝王接受臣民拜伏一样。

(6) 草木在［丑］湿度较大的山坡上，根系把持着泥土，保持着水土，就像显出了很累的样子。

(7) 草木在［亥］阴冷天或在水中泡着，就像小孩生病了一样。

(8) 草木在［子］寒冷天或一直被雨淋着，就像涝死了一样。

(9) 草木在［戌］被烧过的土地上变成了草木灰、肥料，就像入了坟墓一样。

(10) 草木在［酉］月也就像被小刀割除一样，就像一下就没了、绝了。

(11) 草木在［申］月都结种子了，就像在等待时机，在生长了。

(12) 草木在［未］温暖的土壤中，就像出生、冒芽了。

3. 丙

(1) 太阳在［寅］位［寅］时一点一点地露头，就像小孩子出生后，在长个子一样。

(2) 太阳在［卯］位［卯］时跳出海平面，就像小孩子刚洗完澡一样。

(3) 太阳在［辰］位［辰］时，就像小孩子发育成小伙子了，游泳后从大海里出来，站在海岸上穿衣戴帽一样。

(4) 太阳在［巳］位［巳］时，此时的太阳要与篝火相比，太阳就像是篝火的长官。

(5) 太阳在［午］位［午］时，就像帝王在自己的帝位上正在行使权力，犹如发出炽热的光。

(6) 太阳在［未］时［未］位，就像帝王为百姓为国家操劳、做事，已经很疲惫了。

(7) 太阳在［申］时［申］位，就像丙火在锻造申金工具等，劳累过度生病了一样。

(8) 太阳在［酉］位［酉］时，太阳之火太弱了，就像连首饰之金属都熔化不了一样。

(9) 太阳在［戌］位［戌］时，太阳就像橙色的骏马要去休息了一样。

(10) 太阳在［亥］位［亥］时，就像太阳之火被滂沱大雨给浇得躲起来而睡着了一样。

(11) 太阳在［子］位［子］时，就像太阳之火被奔腾的河水给惊醒了，快睡醒了一样。

(12) 太阳在［丑］位［丑］时，太阳醒了，就像养好了精神，调整了一下能量，准备出来了一样。

4. 丁

(1)［酉］月的时候，草都死了，就像柔软的干草可以引发星星之火，点燃篝火。

(2)［申］割下满山遍野的草供给篝火，那篝火就像沐浴在草的海洋中一样。

(3)干草燃起的篝火在小山包［未］上，就像头一样的小山包戴了顶篝火形状般的尖帽子。

(4)篝火是干草借助［午］太阳之火点燃的，就像篝火得到［午］火上级长官的点拨、栽培和提拔使用一样。

(5)篝火在草多、草干且有风［巳］的地方燃烧［巳］，就像帝王操劳百姓和国家的事业，正蒸蒸日上一样。

(6)篝火用湿［辰］地上的湿草去点就不会燃，即使点燃了也烧不旺，就像火焰很疲劳的样子。

(7)篝火用还正湿着的［卯］草、叶去点就会冒烟，火焰就像生病了一样。

(8)篝火用湿的树根［寅］去燃烧，篝火一会儿就熄灭了，就像人死去了一样。

(9)篝火熄灭之后的草木灰和在湿的山包［丑］和稀泥［丑］中，草木灰就像进了坟墓一样。

(10)就像在［子］河面上无法点燃篝火一样。

(11)雨水［亥］的来临能使小草得到滋润而发芽、生长，就像［丁］篝火也就有生的希望。

(12)草木在被烧过的［戌］土地上有了草木灰肥料，新生的草得到营养，就像草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样。

5. 戊

(1)火山运动的岩浆［戊土］在蠕动，就像太阳像小孩子一样在［寅］位露头生长。

(2)火山运动的岩浆在流动，而地气又在咕嘟、咕嘟地吐泡泡，就像岩浆在洗澡一样，也像太阳在［卯］位［卯］时一样。

(3)火山岩浆喷出来，喷在火山口边沿［辰］上，就像火山戴上了在成人仪式上戴的帽子一样。

(4)火山岩浆喷起来，像篝火［巳］一般高，就像长官、领导正在跃起，

发号施令、高人一等的样子。

(5) 火山岩浆喷到半空中［午］，就像帝王高高在上、叱咤风云的样子。

(6) 火山岩浆喷发，有了衰退之象，就像帝王为百姓［未］、国家忙累了一样。

(7) 火山岩浆喷发，无精打采了，慢慢地停下来不喷了，就像人受了凉［申］而生了病一样。

(8) 火山岩浆逐渐凝固了，就像人死了之后遇到冷气［酉］而逐渐变僵硬了一样。

(9) 火山岩浆完全凝固了，就像人死了装入棺材、埋入坟墓一样，如同烧过的土［戌］。

(10) 正在高温的岩石，遇到雨水［亥］浇下来，会受凉收缩而迅速崩裂，就像到了绝地一样。

(11) 岩浆流入大海［子］，岩浆就会迅速冷却而形成大块、大块的岩石，就像胎儿在发育成形一样。

(12) 火山喷发逐渐熄灭、停止了，就像岩石突然在湿土［丑］上、在山脉［丑］上出生了一样。

6. 己

(1) 淘金［酉］时，就像会被水冲出很多的沙土。

(2) 冶炼金属［申］矿石时，矿石渣就像在火焰中沐浴。

(3) 土形的山包［未］在大地上就像一顶方形的、在成人仪式上戴的帽子。

(4) 土地在太阳［午］的暴晒下，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就像能够经得住上级长官的考验一样。

(5) 土壤制成的陶坯，在窑火［巳］中被烧结而形成大器，与原来普通的土壤相比，就像变成了大器的帝王一样。

(6) 土壤堆成的河堤［辰］，若遇洪水袭来时，就像人上了年纪而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

(7) 土壤在草原上被草根［卯］盘住、抓住、捆住，就像是人被病魔捆住了身体和手脚而不能自由活动、生病了一样。

(8) 土壤在森林中被树根［寅］扎进去、捆绑住，就像人被扎透和绑住而死了一样。

(9) 土壤在山脉、山包［丑］中，就像是进入了它自己的坟墓中一样。

(10) 土壤在洪水［子］的冲击、冲刷下，就像顷刻就绝迹、消失了。

(11) 土壤在雨水［亥］的浸泡下，沉积、凝固在地表，就像土壤在怀胎成形一样。

(12) 土壤上的植被刚被烧过，会露出烧过的土地［戌］，就像土壤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样。

7. 庚

(1) 能用于制作工具的金属材料，在炉火［巳］中加热，并得到千锤百炼，就像成长起来一样。

(2) 制工具之金属在太阳［午］之火的极高温度下熔化，就像制工具之金属在自己被火焰所熔化的熔液中沐浴要被重新浇铸成型一样。

(3) 被烘干的沙型模具［未］，就像一顶圆形的在成人仪式上要戴的帽子一样。

(4) 矿石中的金属［申］成分一旦被提炼出来，制造成劳动和生产的工具，就像人被领导提拔重用一样。

(5) 金属能被制造成工具，其发挥的作用与装饰金属［酉］制成的工具相比，更为锋利，更为坚硬耐用，［庚］就像帝王一样。

(6) 金属材料被火烧过后，会呈现出退火的样子，就像被烧过的土［戌］所呈现出的颜色一样，又像人老了机能衰退了一样。

(7) 金属材料在潮湿空气或［亥］雨水中会被氧化而表面生锈，就像是人生了大病时的情景一样，会面色难看。

(8) 金属材料在［子］河水中泡着，就会被锈蚀，就像人逐渐变老，走向死亡一样。

(9) 锈蚀之后的氧化铁被弃在湿土［丑］烂泥中，就像人入了坟墓一样。

(10) 金属材料被制作成刀斧，用来不断地砍伐大树［寅］、树根，就像很快就会受到磨损、消失殆尽一样。

(11) 长满含金属元素的小草［卯］的山脉里，蕴藏着含金属的矿石，就像金属的坯胎。

(12) 矿山、矿坑［辰］中的金属新矿被不断挖掘，就像开采出来一样。

8. 辛

(1) 用河水［子］淘金，逐渐增多，就像成长中的小孩子会越长越大一样。

(2) 在雨水［亥］中冲刷做装饰用的金子，就像给金子洗澡后渐渐地露出了光泽一样。

(3) 在被烧过野草的土地上［戌］金子暴露出了头，就像狗头金露出来的小帽子一样。

(4) 这种狗头金与从沙土中淘出的沙金［酉］相比，它就像当官的模样。

(5) 金子的光泽与能制作成劳动工具用的金属［申］的光泽相比，金子的光泽就像是帝王一样夺目了。

(6) 金子的本性本来是很凉爽的，如果在热土［未］中，会失去凉润的感觉并改变颜色，就像人在衰老一样。

(7) 金子在阳光［午］下暴晒会受热，在高温下被加热则会熔化，就像人生了病在发着高烧一样。

(8) 金子在［巳］火中被高温加热，逐渐熔化了，就像人逐渐变老，走向死亡一样。

(9) 金子在湿土［辰］中，就像人被埋入了坟墓一样，身上是凉的。

(10) 如果用金子去制作劳动生产工具，就好像草［卯］一样柔软的东西能使工具很快磨损而消耗殆尽的。

(11) 金子是在像树根［寅］一样的矿山、矿脉中被发现，并得到采掘，就像诞生了一样。

(12) 金子储藏在矿脉［丑］中，是最好的养护。

9. 壬

(1) 水蒸气在持续不断地向上升［申］腾，就像向着积雨云积聚。

(2) 水蒸气的密度加大，并遇到冷空气［酉］，形成了积雨云中上下翻滚的小水珠，就像水珠自己在洗澡一样。

(3) 在天空［戌］积雨云中所形成的雨滴开始向下落，就像皇帝所戴的帽子前后垂着一串串的小珠子一样。

(4) 雨水［亥］下落到地面所溅起的水花，就像是长官、领导迈步行走踩出的水花，在亲临视察。

(5) 雨水汇流成大河之水［子］，奔腾而巨浪滔天的模样，就像是帝王在指点江山。

(6) 奔腾的河水在山脉［丑］中，被阻挡着，缓慢地蜿蜒流淌着，就像人在稀泥中艰难跋涉，显出很累的样子。

(7) 河水流到雨林［寅］中之后，就会不断地被雨林所吸收，就好像河水显不出任何的威力，跟人生了病无精打采一样。

(8) 河水流入湿地、草滩［卯］中，则几乎找不到任何河道、河水的痕迹，

就像是河水突然消失、死亡了一样。

(9) 河水流到水坑、水库［辰］之中，则被圈了起来，就像是河水进了墓地，再也见不到奔腾、流淌的模样，显得非常平静的样子。

(10) 用篝火［巳］烧鼎中的水，也能把水烧干、蒸发完。

(11) 太阳［午］之火的炽热温度，能使大河之水蒸发，形成水蒸气，就像是水的原始胚胎。

(12) 水蒸气在燥热的午后［未］时大量的形成了，就像准备向天空运动，积聚成云。

10. 癸

(1) 雨水淋到坡地草木植被［卯］上，草与草之间的小缝隙之水汇成了小溪，小溪汇成了小河，就像水得到生长。

(2) 雨水淋到雨林［寅］中，雨水在雨林的绿色苍茫中，就像在沐浴一样。

(3) 雨水淋到山脉［丑］上，就像是山脉戴了顶前后都垂着小雨珠的帽子一样。

(4) 雨水淋入大河［子］之中，就像是大河得到了美酒和美食，增加了新鲜的血液和能量，欢快地奔腾一样。

(5) 雨水［亥］前赴后继不停地飘落下来，就像是水龙王来到了地面上在视察雨情。

(6) 雨水淋到干燥的［戌］土上，没有对燥土起到任何滋润作用，随后又蒸发了，就像雨水还很累的样子。

(7) 雨水淋到手饰之金［酉］上，起不了任何作用，还能使之氧化而表面难看，就像雨水将传染病传给了金首饰一样。

(8) 雨水淋到［申］金属工具上，使金属工具氧化生锈，就像雨水有恶性传染病而使金属工具受到侵蚀，工具就要死去一样。

(9) 雨水淋到干燥的沙漠热土［未］上，毫无作用，很快就被蒸发，就好像雨水进了坟墓，被埋在了土里一样。

(10) 雨水淋到炽热的像［午］太阳之火的高温火焰的环境中，就像会一下子就被高温蒸发了，没了、绝了。

(11) 雨水淋到像［巳］篝火一般温度的热环境中，就像雨水会被蒸发、积聚成为积雨云的胚胎。

(12) 雨水淋下来积聚在［辰］水库、湖泊、海洋里而产生大量浓密的水蒸气，就像真正的雨水处在婴儿时期一样。

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十天干生旺死绝表描述了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更好地将大自然当中的万事万物进行了归类，并对在不同的自然客观的环境条件下物质所发生变化的因果关系加以描述。

二　五行事物相生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水生木：植被需要水来滋润。

木生火：植被能使火焰燃烧。

火生土：火焰燃烧后的灰烬回归成土壤。

土生金：金属矿产都藏在土壤和山脉中。

金生水：1. 金为寒，寒冷能将水汽凝结成水滴；2. 金属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液体。

三　五行事物相克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水克火：水流能浇灭火苗。

火克金：火焰的高温能熔化金属。

金克木：金属的硬度和密度都大于植物的硬度和密度时，金属工具能损伤植物。

木克土：植被的根系能够牢固地深入到土壤之中，把持土壤，固住水土。

土克水：土壤能够吸收水分，堤坝能够围住水流。

四　五行事物相泄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木泄水、火泄水：植被能消耗、挥发水分，高温能蒸发水分。

火泄木、土泄木：火焰能消耗、燃烧植被，土壤能消耗植被的生命力。

土泄火、金泄火：灰烬的产生消耗了火焰的能量，金属的熔化也消耗了火焰的能量。

金泄土、水泄土：金属矿石的氧化，水土的流失，都能将此矿石及土壤的性质改变。

水泄金、木泄金：金属每一次被熔化，都会产生一些氧化皮的损失，用金属制作的刀、锯在砍伐树木的时候，也会磨损。

五　五行事物相冲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子午水火冲、丑未两土冲、寅申木金冲、卯酉木金冲、辰戌两土冲、巳亥火水冲。

相冲，顾名思义就是在一条直线上互相碰撞谓之冲，如同在同一条铁轨上相对方向相驶的两列火车正好对着迎头相撞，参照后天八卦书图就很好理解。

六　天干事物相合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一）甲己合化土：草木和树木最终都会变化成土壤。

（二）乙庚合化金：秋天一到，小草与树叶都会凋零，呈现出收敛的特性。

（三）丙辛合化水：1. 金属在炉火的烈焰冶炼下会熔化成流动的液体；2. 金属在火焰的烧烤下会从表面析出水分；3. 热空气和冷空气的交汇会形成雨水。

（四）丁壬合化木：1. 丁火（亮光）和壬水（黑暗）合化成木（目之谐音），如同在黑暗的夜晚，只要有一点光亮，眼睛就能够看得见；2. 阳光与水分能使植物发生光合作用。

（五）戊癸合化火：火山喷发的岩浆在流动的液态下呈现出的是火的高温特性。

七　地支事物六合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一）子丑合化土

子代表：水、寒冷、北方、冬天、阴黑暗、鼠等，属水。

丑代表：湿土、稀泥、冻土、东北方、黑暗、牛等，属湿土。

1. 稀泥是水与土的混合物。

2. 湿土在严寒下会形成冻土。

3. 每年农历的十一月和腊月是最冷的时间，每天的子时和丑时是最黑暗、最冷的时间。

4. 老鼠居住在地下潮湿的洞穴中，所以是合化土。

（二）寅亥合化木

寅代表：大树、树根、立春、凌晨、东北方、虎等，属木。

亥代表：雨水、天空、立冬、晚上、西北方、猪等，属水。

1. 雨水浇灌雨林、植被，雨林、植被中也存储着大量的水分。

2. 虽立春时天气开始暖和，却还有寒意，虽立冬开始有寒意，却还有暖意；每天的寅、亥时也是如此。

3. 野猪被老虎吃了，猪肉到了虎的胃里就随虎了，所以是合化木。

（三）卯戌合化火

卯代表：草木、早春、东方、早晨、兔子等，属木。

戌代表：山丘、深秋、西北、傍晚、狗等，属燥土。

1. 太阳从东方升起，到西方降落；草能引火，燃烧后变成灰烬；

2. 每年这两个月气候宜人，每天这两个时辰的温度也宜人；

3. 兔子是跳着走的，就像火焰的跳动，狗是热性的，是伸着舌头散热的，都有火的性质，所以是合化火。

（四）辰酉合化金

辰代表：河岸、湖泊岸、海岸、夹着河流的山脉、晚春、东南方、虫子（从卵到成虫，到蛹，再到飞蛾的那种会变化的虫子）等，属湿土。

酉代表：金属、中秋、西方、凉意、鸡等，属金。

1. 金子、金属矿石是产自河岸以及山脉的矿脉中的。

2. 山林、灌木丛里是野鸡的家园。

3. 鸡吃虫，虫子到鸡的胃里就随了鸡，所以是合化金。

（五）巳申合化水

巳代表：热空气、风、草、篝火、炉火、火焰、初夏、东南方、蛇等，属火。

申代表：冷空气，刀、斧、剑、戟、锯、锄等工具，金属，西方，猴子等，属金。

1. 热空气与冷空气互相交汇，能形成雨水。

2. 金属被火焰的高温熔化成金属液体（滚烫的液体火金）；刀、斧、剑、戟、锯、锄等工具在火焰中被烧软捶打；下大雨时闪电打雷的光亮。

3. 蛇像蜿蜒的绳子，蛇在树林中蜿蜒窜动；申像伸直的绳子，猴子在树林中上蹿下跳。

4. 蛇与猴的行动都像是火焰的蔓延和火焰的跳动，而且猴子被蟒蛇抓住吃掉，属金的猴子到了蛇的胃里就随蛇了，蛇既是冷血动物，又是巳火，所以是合化水，或者是滚烫的液体火金。

（六）午未合化土

午代表：太阳、火、中午、炎热、南方、夏天、亮丽、暴躁、马、鸟等，属火。

未代表：燥土、热土、午后、西南方、季夏、温顺、羊等，属燥土。

1. 被阳光暴晒而灼热的干土地。

2. 每年农历的五、六月正是炎热的时候，每天的午、未时也正是炎热的时候。

3. 鸟、禽类属火的动物是用干燥的沙土来清洁自己的身体，暴躁的骏马被驯服后就如同绵羊一样的温顺，所以是合化土。

不过在古历法中，太阳在天球所处的位置与北斗的勺所指的星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月，太阳在亥位，斗勺指寅位；二月，太阳在戌位，斗勺指卯位；三月，太阳在酉位，斗勺指辰位；四月，太阳在申位，斗勺指巳位；五月，太阳在未位，斗勺指午位；六月，太阳在午位，斗勺指未位；七月，太阳在巳位，斗勺指申位；八月，太阳在辰位，斗勺指酉位；九月，太阳在卯位，斗勺指戌位；十月，太阳在寅位，斗勺指亥位；十一月，太阳在丑位，斗勺指子位；十二月，太阳在子位，斗勺指丑位。所以子位与丑位对应，寅位与亥位对应，戌位与卯位对应，辰位与酉位对应，午位与未位对应，这就是合气。由于太阳的位置标志天区的划分，斗勺所示星区指明大地的方位，所以这样对应的就是天、地的合气。[①]

① 汪绂：《戊笈谈兵》，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第42页。

八 地支事物暗合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暗合的发生，是自然界的事物在相互平衡的状态下，悄悄地、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变化。

1. 卯申暗合成金局

金局：如同自然界的草木到了秋天会自然地干枯、凋零、被自然所肃杀。

2. 午亥暗合成土局和木局

土局：两个地支中的甲木和己土合化成土，如同草木和树木都会变化成土壤一样。

木局：(1) 两个地支中的丁火（亮光）和壬水（黑暗）合化成木（目之谐音)，如同在黑暗的夜晚，只要有一点光亮，眼睛就能够看得见。

(2) 阳光与水分能使植物发生光合作用。

3. 寅丑同类暗合，分别能成火局和土局及水局

寅（根）丑（艮）形象一致，同在根［艮］八宫，且藏支分别相合，所以也是暗合。

九 地支事物六害［穿］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一) 子未相害［穿]：河水流到干燥的沙漠中，水在损失，未的干土性质就变了。

(二) 丑午相害［穿]：火焰的温度使稀泥的性质变干了，稀泥性质的土也晦火了。

(三) 寅巳相害［穿]：巨大的树木和树根生不着小火苗，反能压灭小火苗，高温却能烘烤大树。

(四) 卯辰相害［穿]：草木能固住［克］河岸的水土，虫子［辰］也能毁害草木。

(五) 申亥相害［穿]：凉爽的天空能将水汽凝聚成雨水，雨水也能锈蚀氧化金属。

(六) 酉戌相害［穿]：燥土不生金，金的凉爽性质却能改变燥土的热燥性质。

十 地支事物三合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三合局里所有的驿马星在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中，都是活跃的动词要素，表示事物是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这是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三合局是在归类的特指和泛指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动态变化的。

（一）申子辰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自然形成雨水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申：马星、上升、凝结、汇聚、打雷、闪电、下雨、流淌等。

子：水、雨水等。

辰：河岸、湖泊岸、海岸、夹着河道的山脉等。

申子辰三合形成了一个“地面的水汽上升、凝结、汇聚—雨水掉下来—流淌汇聚在河流、湖泊、海洋中—水汽再上升、凝结、汇聚从天上到半空中再到地面”这样一个大自然中水循环的局面。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二）寅午戌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太阳运动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寅：马星、初升、露头、运动、降下、入地、散热、温暖、夏至时太阳的升起之位等。

午：太阳、中午、火焰等。

戌：天空、夏至时太阳的降落之位等。

寅午戌三合形成了一个“太阳初升、上升—日中天—日降、日落—太阳再初升、上升，从东升到西落再升起”这样一个循环的大自然中的太阳大火运行局面。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三）巳酉丑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形成金属物质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巳：马星、火焰、燃烧、升温、熔化、流淌、降温、冷却、凝结等。

酉：金属物质等。

丑：矿石、矿脉、湿土地等。

巳酉丑三合形成了一个“矿石被火焰的高温熔化—流淌—冷却、凝结—再被高温熔化”这样一个循环的大自然中的金属冶炼过程的局面，在社会上也可指金融行业融资的过程。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四）亥卯未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形成湿地植被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亥：马星、水流、流淌、滋润、生长、干涸、枯竭等。

卯：植物、植被等。

未：干旱、干涸的土地等。

亥卯未三合形成了一个“有水滋润—大地的植被茂盛—无水滋润—大地的植被干枯—再有水滋润”这样一个循环的大自然中形成湿地植被过程的局面。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另外，还有申子、子辰、申辰的半合局，寅午、午戌、戌寅的半合局，巳酉、酉丑、丑巳的半合局，亥卯、卯未、未亥的半合局，这些都是一种合的趋势。在合的过程中，也要看是哪个主动和哪个旺，这样合成的情景结果就会有所不同，具体请参看本书正文或笔者所著的《周易卦爻辞真解》《解读〈地母经〉》和《解读〈推背图〉》，读者可以进一步去感悟。

三合局还可泛指许多其他的意义，读者自已也可以进一步地去感悟。

十一 地支事物三会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三会局里所有的驿马星在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中，也都是活跃的动词要素，表示事物是发展的、是运动的、是变化的，也特指形成大自然的某一综合段的时空，或某一个综合角度的方位，或某一个综合的局面，或某一种综合的环境，或某一个综合的条件等要素，这也是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三会局是以归类的方式特指和泛指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形成过程，这里的“三会局”也可理解成“三汇局”，有会聚、汇集之意。

亥子丑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汇集形成的雨水、河水、泥泞的这样一种大洪水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冬天亥子丑三个月最冷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等。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寅卯辰其中就有在大自然中汇集形成的大树、小草、湿地的这样一种植被繁茂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春天寅卯辰三个月树木茂盛生长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等。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申酉戌其中就有在大自然中汇集形成的各类金属（工具金、装饰金）和矿脉的这样一种矿藏资源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秋天申酉戌三个月凉爽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等。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

种表达方式。

巳午未其中就有在大自然中汇集形成的火苗、火焰、烘烤的这样一种大火灾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夏天三个月炎热、每天中午三个时辰气温高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等。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

另外，还有亥子、子丑、丑亥的半会局，寅卯、卯辰、辰寅的半会局，申酉、酉戌、戌申的半会局，巳午、午未、未巳的半会局，这是一种会的趋势。在会的过程中，也要看是哪个主动和哪个旺，这样会成的情景结果就会有所不同，具体请参看本书正文，读者自己可以进一步地去感悟。

三会局还可泛指许多其他的意义，读者自己也可以进一步地去感悟。

十二　地支事物三刑的形象与逻辑关系

（一）子刑卯，卯刑子

水能滋润草木也能涝死草木，水滋润草木，草木却浪费、挥发水分，这就是无礼之刑。

（二）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巳

大树木和树根生不着小火苗，反能压灭小火苗，高温却能烘烤大树；火焰的高温能熔化金属，金属熔化的过程也在损耗热能。这些就是无恩之刑。

（三）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

丑刑戌就是稀泥把燃烧过的灰烬给中和了，戌失去了燥土的性质，土混在一起变多了。戌刑未就是燃烧过的灰烬比干旱的土质温度要高，未失去了干土的性质，混在一起变多了，温度也更高了。未刑丑就是稀泥把干旱的土质给中和了，未失去了干土的性质，丑未不但相刑，而且还相冲，这样湿土和干土混在一起不是就变多了吗？这就是土越刑越旺的道理，也是持势之刑的道理，其实这里面都有矛盾的两面性的道理。

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为自刑。

（四）申子辰三合，对位寅卯辰三会，则申刑寅，子刑卯，辰刑辰自刑。

（五）寅午戌三合，对位巳午未三会，则寅刑巳，午刑午自刑，戌刑未。

（六）巳酉丑三合，对位申酉戌三会，则巳刑申，酉刑酉自刑，丑刑戌。

（七）亥卯未三合，对位亥子丑三会，则亥刑亥自刑，卯刑子，未刑丑。

不论是三会还是三合都有绊住的意思。申与巳都有比喻用绳子缠住和捆住的意思，申与巳也有将打雷、闪电形象地比喻成教训的意思，寅有用树根把持缠住

和用手抓住的意思，亥有河水环绕和缠绕的意思，申、寅、巳、亥又都是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中活跃的动词要素。所以申、寅、巳、亥在三合局和三会局里以及在半合局和半会局里，只要对位的对应起来与任何的人与事一联系起来使用，就具有了使某人被捆绑、被绊住、失去自由的意思，使某事绊住、停止、不能进行下去的意思，这就是三刑的真实意思，它既来自于人类对大自然形象的认识思维，也来自于人类对大自然逻辑的认识思维。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天干的生、克、冲、合，还是地支的生、克、合、会、刑、冲、害，它们都是在用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对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的描述，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具有哲学逻辑思维认识的一种另类初始的汉语言文学形式。

中国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明显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特征。易学文化是中国智慧的古人从远古自然界的天文、地理以及万事万物的自然发展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运动的法则。

在中国古文化中，即使在诞生了系统的文字之后，数字、符号、汉字与其所代表的众多的含义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往往是一个符号、文字、数字对应着多个含义、多重关系，是很多含义的归类汇总，所以读者一定要认真领会，细心回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所有文物材料中，没有发现贾湖人有冶炼金属的迹象，但在本小节中，笔者用了许多与金属有关的词汇描述了五行、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关系，这是因为在中国古老的易学文化理论知识中，“金”所对应的事物不一定是金属，“金”也可以与筋骨、金石等对应。这里用与金属有关的词汇描述五行、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有更加直接、感性的认识，更容易理解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

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犹如一对孪生兄妹，二者的“数”又有着体和用的关系：先天八卦之“数”能够用于起卦，而后天八卦之“数”却能够用于解卦、断卦的逻辑分析，因为后天八卦的“数”中被智人们赋予了更多的方向性、方位性、社会性、人事性的系统概念和逻辑等。

| 第九章 |

远古时期易学中的天学

易学的范畴在远古的时候就涉及日月、天文、星象、历法、气象等天学知识。如果说中国在贾湖时代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一些天学的知识，那是笔者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与大量从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的结论。比如，针对骨笛、古环、石环、龟甲石子、刻符、石铲、骨耜、石磨盘、稻壳等文物，笔者就获得了中国易学文化中天学、音律、五行、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等许多有关龙的文化信息。

那么，这种龙的文化是否孤立地存在于贾湖时代呢？是否孤立地存在于中原大地上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是否又继续向前延伸了呢？

如果我们把大量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商周文化的考古资料串起来，就会发现，随着历史的发展，自新石器时代就诞生的易学文化一直在向前延伸。

第一节 天学

一

首先，我们从今天还存在的道观、寺庙、亭台楼阁等中国古建筑那种斗拱飞檐的造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仰韶文化时期有关易学中将太阳比喻成三足鸟的形象（组图 5 – 61）。

古时候的道观、寺庙、亭台楼阁，很多是古人用于放置对人类文化文明有着突出贡献的圣人的塑像和牌位并在此祭祀的场所，以及从事宣传文化教育的

场所。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系统观念中，所有建筑物的顶部都象征天，基础都象征地，中间都象征人，就是中国古代天地人和的思想在建筑文化中的表现。这样，中国建筑物（特别是具有非凡文化意义的建筑物）顶部为天的结构形状就必须与天学对应起来，必须与天学中的三足太阳鸟对应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建筑文化中的天行健的那种自强不息的意境和精神。

太阳鸟的图案也反映了距今约 7000 ~ 5000 年前古人在天学中的太阳崇拜，那时的中国古人就知道万物只有沐浴了阳光才能生长、人类的生命只有在思想上沐浴了精神的文明才能长久的道理。

飞檐是我国传统建筑檐部形式之一，屋檐上翘，若飞举之势，常用于亭、台、楼、阁、庙宇、宫殿等建筑上。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专业术语名称中，斗拱飞檐屋顶的角也被称为“翼角”，顾名思义它与雀鸟的翅膀是有关的，这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符号、菘泽文化三足太阳鸟图案中太阳鸟两头翘起的翼角一下就对应上了（组图 5 – 52）。

所以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时候的雀、鹊、阙同音，因此“阙”既有宫阙之意，也有雀、鹊、飞鸟、飞翔之意，并且还都与太阳鸟、文明、顶、上、天、皇等概念有关。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官帽、服装、座椅、书桌、祭祀用的俎案、翘头案、条案（香案）的造型上以及今天中国大地上依然还存在的那种古建筑飞檐斗拱、两头翘起的飞翔艺术造型（组图 5 – 54、组图 5 – 59），将距今约 7000 ~ 5000 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远古的古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对生命的礼赞，对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的追求在形象思维的中国建筑文化的写意当中完整、完满地保留了下来。

服装是人类文明的外在表现，特别是从春秋与秦汉时用于加冕、祭祀、成人礼等重大文明礼仪活动的宽大长袖服装上，我们还能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法看出它具有鸟雀正在展翅飞翔的形象与意境。因为只有宽大的长袖才能无比形象地表现出雀鸟那种展翅飞翔的形态，这也将距今约 7000 ~ 5000 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远古的古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对生命的礼赞，对三足太阳鸟、日月、阴阳、光明、希望、文明等文化的追求在形象思维的服装文化的写意中完整、完美地保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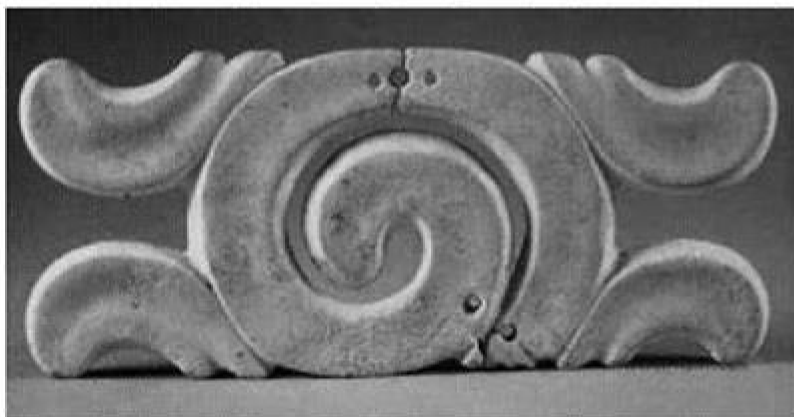
二

无独有偶，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尊，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上面刻划的

陶符（组图2－24），竟与仰韶文化时期表现太阳三足鸟的形状如出一辙。这就直接反映出了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就诞生的易学文化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在向前延伸的。

三

在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前）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时代早期（年代约公元前3300年～前2600年）的随葬品中，分别有一件勾云形器和象牙梳［长16.2厘米］（组图9－1），就采用了透雕法，在勾云形器的中心部位和象牙梳的柄部，就雕刻出了新石器时代最原始精美的、具有非常明显的阴阳部分暗示的大S形太极图案。



红山文化时期的勾云形玉器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

组图9－1

这件象牙梳直接反映出了大汶口的先民所具有的天学思维，他们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将11个乾卦（代表阳、宇宙、苍天、运动、变化）符号形成了一个大的S形图案，包围着两个坤卦（阴、地球、大地、运动、变化）符号，中间还有两个表达阴阳相合、天地相交的T形符号。这个大的S形状，又形成了一个就像宇宙中的星系图（图8－2）和先天八卦图（图8－1）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的排列顺序。

四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出了距今6460±135年属仰韶文化时期的45号墓，里面的一具尸骨旁有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组图3－7）。由于蚌塑龙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象最逼真、龙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龙形象，被考古专家称为“中华第一龙”。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给死人居住的墓却是遵循了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运动法则与客观规律。墓主人头南脚北，东方放置着龙，西方放置着虎，正符合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青龙属东方［生、升］、白虎属西方［杀、死］的系统观念。

在位居45号墓最南端也发掘出了第三组蚌塑遗址，蚌塑出了龙与虎的形象图案（组图9－2），这组龙虎相背，做大S形运动左旋的形态，也表现出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宇宙、天体、星系、东西、春秋在旋转、轮回、运动、变化的大S形太极运动变化状态与系统观念。



组图9－2　蚌塑龙虎与太极图的对比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本身就包括天学（或天象学）和历法知识。青龙对应“四象”中的春天，也对应了春天仲春之气（春分）的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出现的“龙星”。所谓“龙星”就是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的东方青龙，这是古人用形象思维将几组星宿进行了拟人化的组合的结果，表示万物在春天皆开始了生命的希望。白虎对应“四象”中的秋天，也对应了秋天仲秋之气（秋分）的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出现的“虎星”。所谓“虎星”，就是由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组成的西方白虎，这是古人用形象思维将几组星宿进行了拟人化的组合的结果，表示万物在秋天皆开始了萧条与死亡（组图3－12）。

如果我们站在45号墓的北边，面对墓主人时，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左前方（墓主人的东方）摆着青龙，而且死者左边的殉葬者面朝上（代表出生）。在我们的右前方（墓主人的西方）摆着白虎，而且死者右边的殉葬者面朝下（代表死亡）。在我们的前方（墓主人的北方）也摆着一具殉葬者的尸骨，面部朝上，头部朝向东南方（代表投胎、孕育）。最关键的是，在墓坑的中心，用蚌壳摆出了一个极形似于符合勾股定理的三角形“矩”，还有由两根小腿胫骨组成的极类似于圆规的“规”。这样，整个墓坑中的形制，就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个圆的生生死死的轮回图。这一切都是后人为死者所制作的，是活着的人对墓主人再次投生

所寄予的希望。这既符合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周而复始地运动变化之意，也符合中国殡葬风俗中活着的人对死者所寄予的希望，还符合大自然运动变化的核心“规矩”。

另外，在176号坑的组塑中，除龙、虎之外，还有凤、鹿、龟、蜘蛛、石斧等。笔者认为这正好又与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五行系统对应了起来。

所以，从西水坡墓葬形式来看，那时的人们已经了解掌握了天象与一年十二个月的历法。他们已经掌握的易学文化的系统知识，是从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并且已经成功地实践应用到民俗殡葬的文化中了。这直接反映出了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就诞生的易学文化，在不同的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都在向前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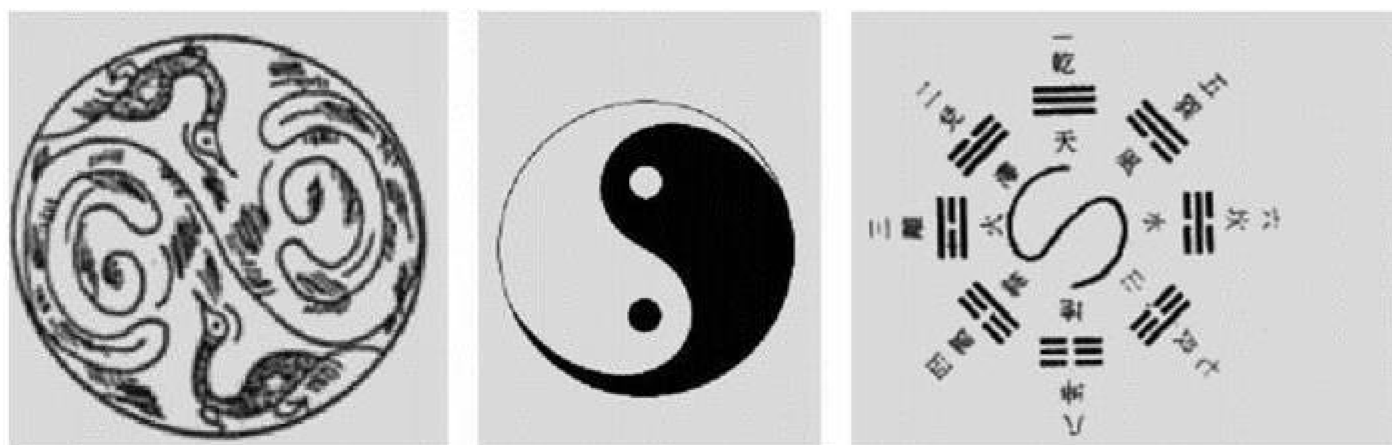
五

在河姆渡出土的第四期文化陶豆盘中，有一个豆盘内带有抽象的四鸟日纹漩涡图案（图2－9）。这说明河姆渡地区的先民，已经有了易学文化体系中地球绕着太阳运动旋转的系统知识，并且把太阳形象地比喻成太阳鸟的文化概念，将太阳所做的圆周运动成功地表现在生活必需品和艺术中。这直接反映出了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就诞生的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都在向前延伸。

第二节　与天学和万事万物具有自然联系的太极图

我们将红山文化时期的勾云形玉器中心的具有非常明显的阴阳部分暗示的大S形太极图案、从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虎大S形太极图案、从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上具有的一个大S形图案以及西汉时期绘有太极图的木胎漆盘图案与先天八卦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它们与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太极运动模式和后来的太极图图案的变化状态都是一致的（组图9－3）。

其实这种S形或反S形的漩涡图案（图9－4）在我们的人体和生活的周围当中比比皆是，只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观察中没有进行太多的对比和分析、没有运用中国智慧的古人“一物一太极”的思维方式进行联想［联系］和对比而已，而古人却恰恰运用了这种发散形的形象思维方式，以小见大，以外见里，以小太极［小宇宙］与大太极［大宇宙］进行了对比分析。



组图 9－13 绘有太极图的西汉漆盘中心图案、太极图、先天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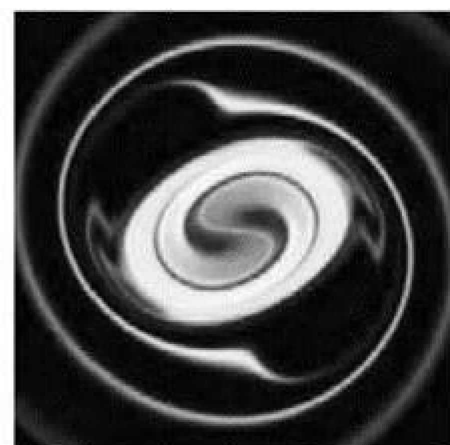


图 9－14 S 或反 S 形的漩涡图案

如果我们以人体为例来看人类在母体中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指纹漩涡、头发漩涡和汗毛漩涡，就会发现它们是一个个独立的太极。当一个人的手指纹漩涡可看做一个太极，那么一个人头顶的头发漩涡就是另一个太极，而一个人身体的汗毛漩涡又是另外一个太极。这些漩涡的形状非常直观，不是 S 形就是反 S 形，但一般以左旋的较多（组图 9－5）。



组图 9－5 指纹漩涡、头发漩涡、汗毛漩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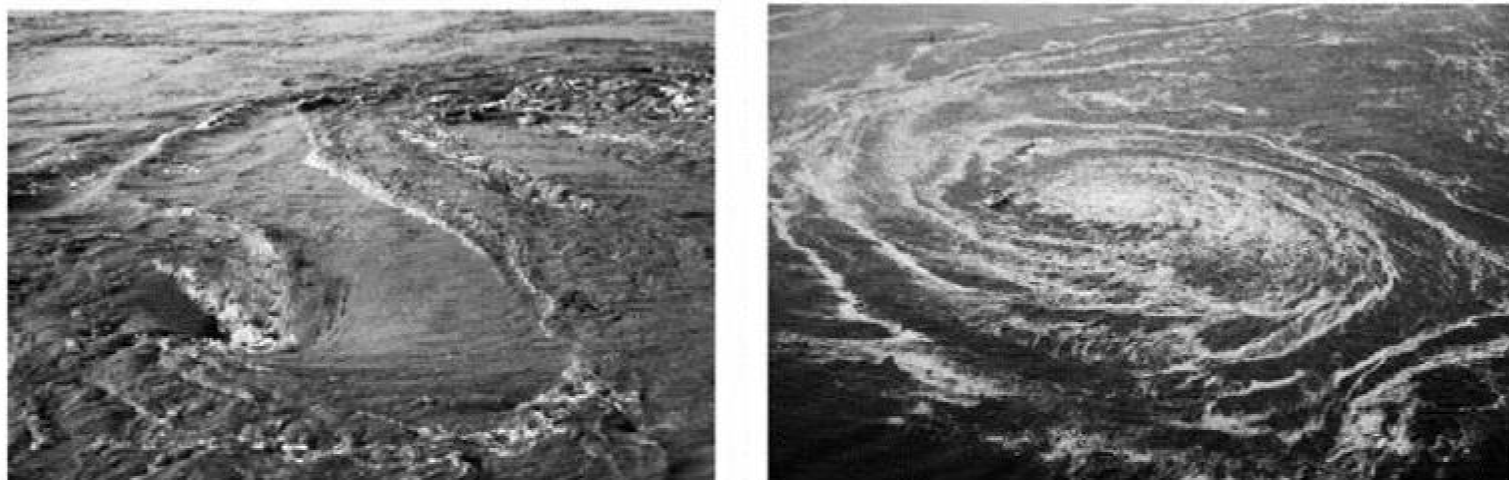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以动物为例，就会发现在牛、马等动物在母体中生长发育过程中头部眉心处（或其他部位）也会形成有体毛漩涡，这些漩涡的形状也非常直观，不是 S 形就是反 S 形，但一般是左旋的比较多，艺术工作者们在表现它们的时候就非常直观形象（组图 9－6）。



组图 9－6 牛马头部眉心处的体毛漩涡 图 9－7 植物叶生长展开过程的漩涡形状

如果我们以植物为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植物的叶子在生长展开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漩涡，而且它们也都是以左旋的形状向外展开（图 9－7）。

如果我们以水流为例，就会发现有时在湍流的河水中和受到震动的海水中，也会形成类似 S 形的漩涡（组图 9－8）。



组图 9－18　河水与海水漩涡

如果我们以大气为例，就会发现在平原地带的龙卷风的运动轨迹也是漩涡状的。今天的人类利用气象卫星在太空遥感观测，对这种 S 形的大气漩涡看得更加清晰（组图 9－9）。而中国古人在《周易》登［升］卦的卦爻辞中，早就有了详细的描述（详参笔者拙著《周易卦爻辞真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组图 9－9　大气漩涡

今天的天文工作者利用哈勃望远镜才捕捉到的宇宙天体［星系］景观图像（组图 9－10），充分证明了宇宙中天体［星系］的运动方式也是这种 S 形或反 S 形的。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古人用肉眼是观察不到这样的宇宙天体［星系］的，而（组图 9－3）中这种 S 形或反 S 形的描述图案的出现以及最终太极图的出现，却恰恰说明了中国智慧的古人利用了以小见大，以小太极［小宇宙］与大太极［大宇宙］进行推理后，以“一物一太极”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联想、对比和归类，用这种发散的形象思维方式得到的结论，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



组图 9－10　天体星系漩涡

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头顶上都长着单个的漩涡，长两个或两个以上漩涡的毕竟是少数，这是因为他们在母体中发育时形成的双旋，没有最终合并成一个单旋。而最终能够发育合并成一个单旋，就如同是湍急的河水中两个相对比较靠近的漩涡在流动过程中和在引力作用下，最终会合并成一个漩涡是一样的道理。同理，指纹的形成也是这样的（组图 9－11、组图 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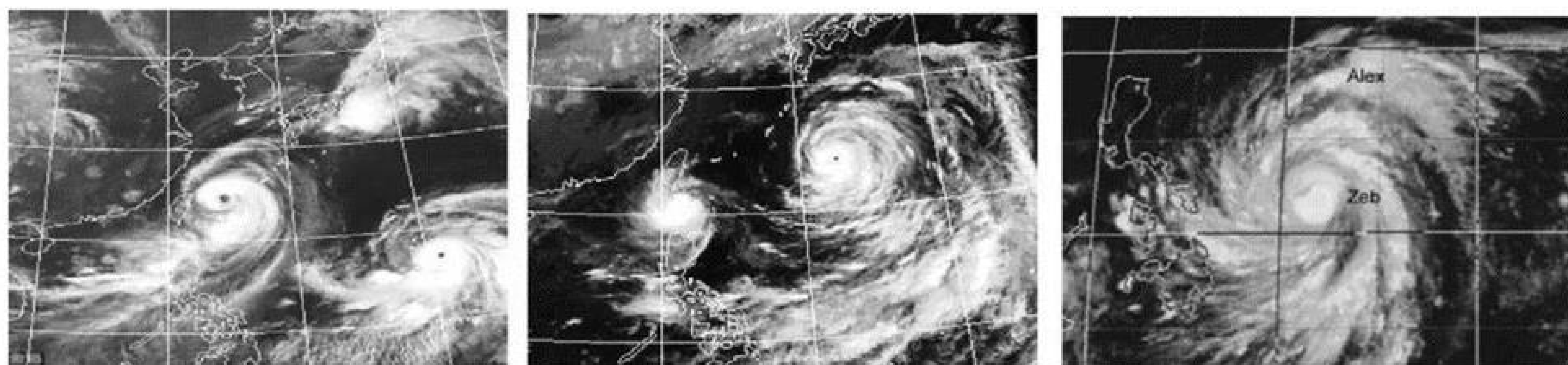


组图 9－11　两涡指纹及双旋的头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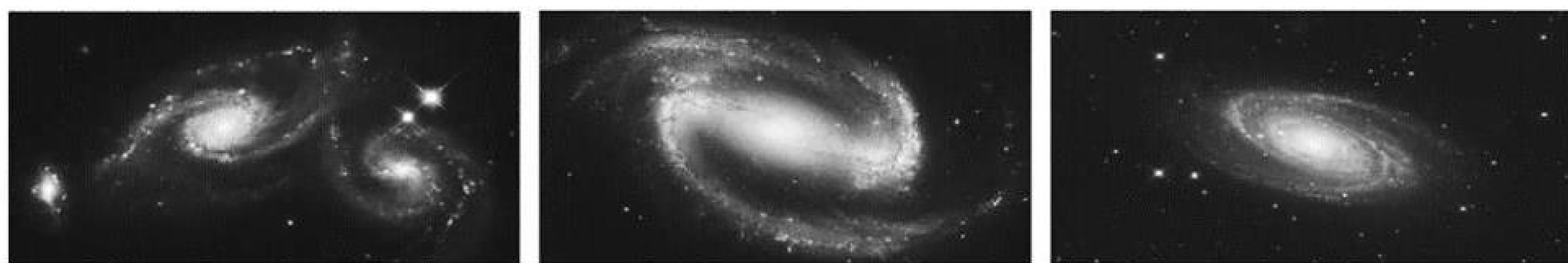
组图 9－12　两漩涡在引力作用下碰撞合并成新的漩涡水流

这种现象还表现在大气的运动当中。今天的气象工作者通过气象卫星在太空遥感观测，两个（或三个）台风大气漩涡经过引力的作用碰撞后也会合并成一个新的台风大气漩涡（组图 9－13），只不过在现代气象学中，此现象被称为“藤原效益”。当然在平原地带，人们也能够用肉眼发现这种现象，观察到两个靠近的龙卷风最终也会形成一个大的 S 形漩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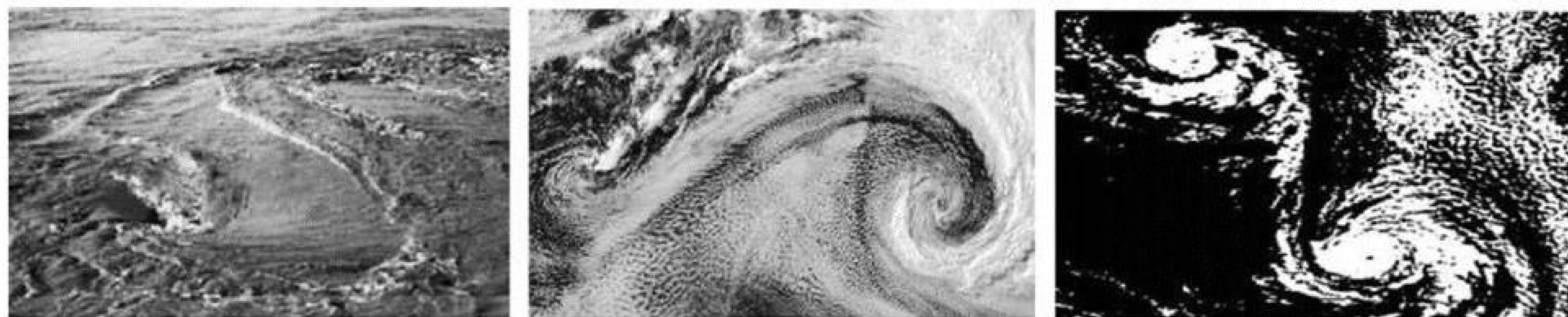
组图 9－13　两［三］个台风大气漩涡经过引力的作用碰撞后合并成一个新的大气漩涡

这种现象还表现在宇宙天体［星系］的运动当中。今天的天文工作者通过哈勃望远镜的观测，推论出宇宙中的两个天体［星系］漩涡经过引力的作用碰撞多次后，最终也会合并成一个新的宇宙天体［星系］漩涡（组图 9－14），只不过这种现象在宇宙中相对地面水流漩涡和半空中大气漩涡的形成，时间会更长一些。



组图 9－14　两漩涡天体［星系］经过引力的作用碰撞后合并成新的天体［星系］漩涡

所以，不论是从对动物的观察还是从对植物的观察，不论是从对河流漩涡的观察还是从对大气龙卷风的漩涡观察中（组图 9－15），中国智慧的古人最终利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理论，推论出了宇宙中天体［星系］的运动法则和规律，并最终找出了他们［它们］的共同 S 形或反 S 形特征，熟知并发明创造了与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生命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相符合的太极运动模式以及太极图的图案。



组图 9－15　河流或大气中形成的 S 或反 S 形漩涡纹

中国智慧的古人，以“一物一太极”的思维方式进行联想和对比，从人的指纹漩涡、动物的毛发漩涡、植物的叶片漩涡联系到水流的漩涡，最后再联系到

大气中的龙卷风漩涡，这一下就联系到了半天空中，最终还可以一直联系到宇宙中的天体［星系］，推理出了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在遵循着这样一个太极运动模式的生长、运动、变化的自然法则和规律。

在动物中，这些漩涡又大都集中在头部或眉心之处，人、马、牛等动物头部毛发的漩涡就像河流中的漩涡和大气中的漩涡是一样的。毛发对应八卦中的巽［风、云、大气］，而头部又对应八卦中的乾［天、运动］。

如果我们把象数易学中“一物一太极”和“太一生水”的概念结合起来，考虑到象数易学中“一物［一太极、小宇宙］”与“另一物［另一太极、另一大宇宙］”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以小见大，以里见外，就会立刻意识到：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小到微生物的生命运动变化，中到人与动植物的生命运动变化，大到大气气流与宇宙中天体［星系］的生命运动变化，甚至时空的生命运动变化，它们都拥有极其相似于太极运动模式和太极图图案中S形变化运动状态的共同特征。

这种“以小见大”、“以内见外（或以外见内）”的思维模式还表现在中国人的管理理念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比喻，表现在中医理论的五官、五脏与五星、五行的系统对应中。

太极这一概念首载于《周易》的《系辞传》：“易有太极。”相传太极图是北宋周敦颐画的，一直私传，并没有公诸于世。朱熹的学生蔡元定在途经西南时，首次见到了太极图。然后才由朱熹公诸于世。朱熹是儒学三大圣人之一。他也没有搞清太极图是怎样作出来的。1000多年来，关于太极图的画法，始终是个谜。近年来也有几个人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答案，但笔者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当属名医李阳波先生的认识，他使我们相信这种神秘的标识完全是建立在中国智慧的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和客观认识基础之上的。

由于农牧业生产的需要，首先产生了天文学。我国就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确定了二十四节气，《周髀算经》又在正午利用高八尺的表杆所产生的晷影的长短来确定节令的记载，原文如下：

凡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又六分之一，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问次节损益寸数长短各几何。

冬至晷长丈三尺五寸。小寒丈二尺五寸，小分五。

大寒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立春丈五寸二分，小分三。

雨水九尺五寸二分，小分二。启蛰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

春分七尺五寸五分。清明六尺五寸五分，小分五。

谷雨五尺五寸六分，小分四。立夏四尺五寸七分，小分三。

小满三尺五寸八分，小分二。芒种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

夏至一尺六寸。小暑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

大暑三尺五寸八分，小分二。立秋四尺五寸七分，小分三。

处暑五尺五寸六分，小分四。白露六尺五寸五分，小分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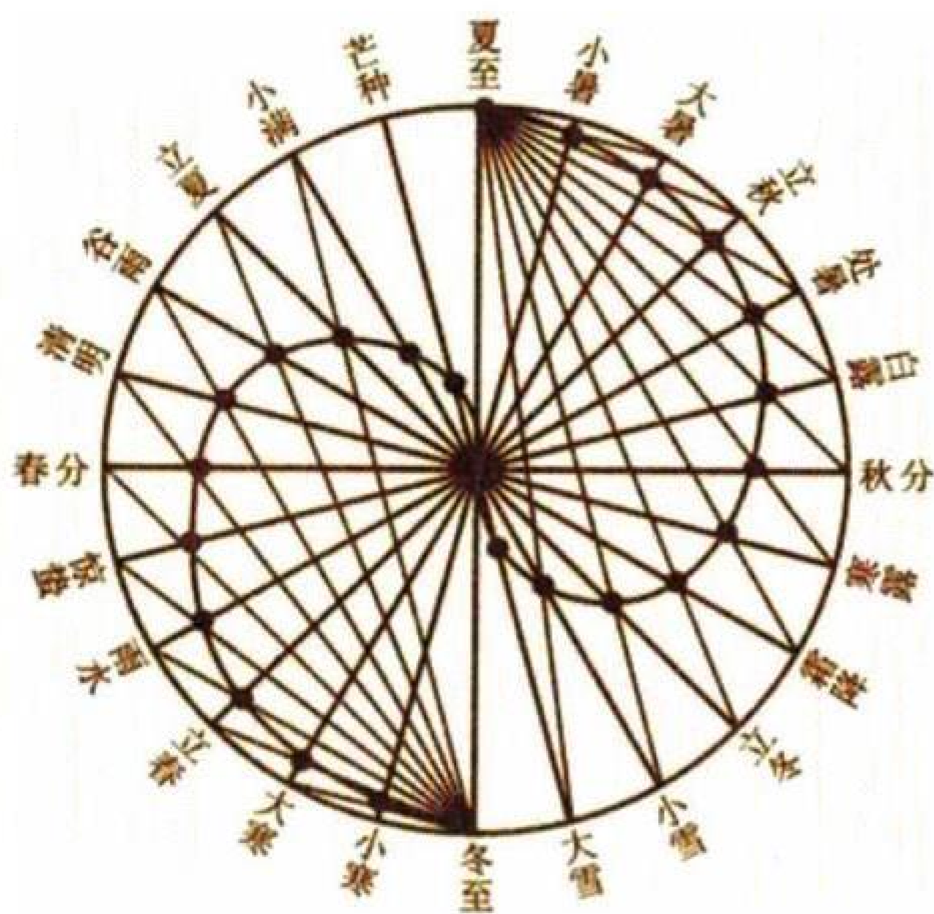
秋分七尺五寸五分。寒露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

霜降九尺五寸三分，小分二。立冬丈五寸二分，小分三。

小雪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大雪丈二尺五寸，小分五。

凡为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之一。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

术曰：置冬至晷，以夏至晷减之，余为实；以十二为法，实如法得一寸。不满法者，十之，以法除之，得一分。不满法者，以法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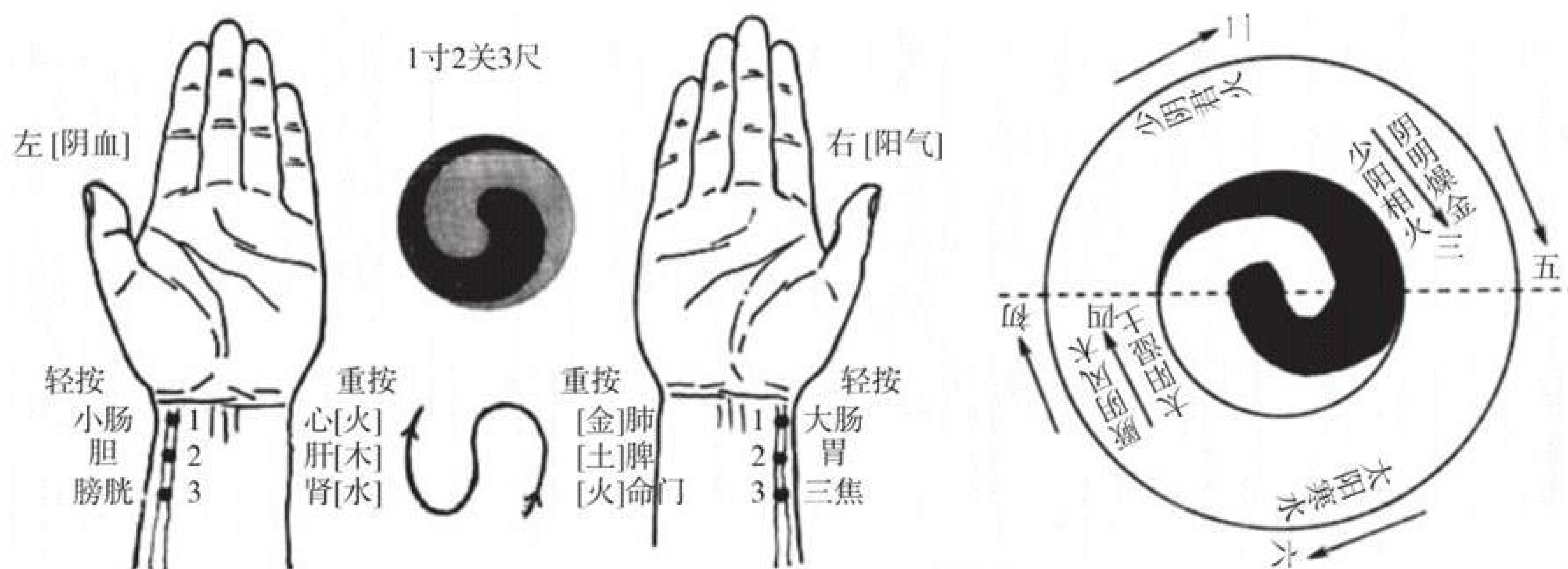


组图 9－16　二十四个节气与太极图

庄一民博士所著的《中医运气与健康预测》叙述了《周髀算经》中晷影每变化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即为下一个节气，从而计算出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又因为一年之中夏至日白天最长，而冬至日白天最短，再以这两天为基础除以 24，即把全年 24 等分，便得出了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这实在是一个善巧的办法。因为只要地球自转和公转的规律不变，每一年的节气都会是一样的。即使每一年的长度稍有变化，但二十四节气依然不会受到影响。

中医学是中华文明古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中医诊断学当中左右手腕部位的寸关尺脉分别对应着人体的五脏六腑，从它们的五行属性相生的排序上，从自然和人体

一气周流的六气（太阳寒水、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阴湿土）运行上，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一个S形的阴阳太极图（组图9-17）。



组图9-17　左右手寸关尺脉和六气的一气周流

我们知道，按照古人一物［一事］一太极的基本概念，一年是可以作为一个圆的太极来考虑的，人体也可以作为一个圆的太极来考虑。大自然的二十四个节与气就可以正好等分地分布在一个太极圆上，年年在循环轮回，亘古不变，而人体的一气周流也随着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地在生与活。

如果我们再把二十四个节与气的日晷影长度也加入到这个太极圆当中，按照夏至阴生和冬至阳生的阴阳相对逻辑，把它们反方向进行排列，那么大家就能真实、清晰地看到一个阴阳在相互转换和动态变化的太极图标识（组图9-16）。把人体的一气周流按大自然的春、夏、秋、冬进行排列，也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阴阳在转化和动态变化的太极图标识（组图9-17）。由此可见，太极图的产生与大自然万事万物的变化和中国远古时代的天文和历法以及中医学是紧密不可分的。

另外，我们从八卦的乾纳“甲、壬”可知，“甲”是古人为月亮最圆满的那一日的历法干支所纳的天干，表示圆满的○、开始、开头，而“壬”则有水、黑夜、月亮之意，也为夜晚的圆月在水中的倒影之意，所以此时的“甲”就表示了一个外圆，而里面则装了一个有转换、变化之意的“乙”，甲、乙可为一、二，一可为○、太极，二可为二元、阴阳，这样，一个阴阳转化的太极图案就形成了（组图9-16）。我们知道太极是配有《河图》、《洛书》、八卦的，如果我们把《河图》中的“三八东方木”［春天、东方、生机］和“数”八［八卦、万物］以及“三”同“八”综合在一起，重新理解“太极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五行］，四象生八卦［八卦、万物］”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会将其中的“三生万物”理解到一个极为清晰的境界。

第三节　传说中的伏羲氏与女娲

在西水坡45号墓坑的中心（核心），用蚌壳摆出的一个极形似于符合勾股定理的三角形“矩”，和由两根腿骨组成的极类似于圆规的“规”，不由得使笔者联想到了在《周易》中描述了一个在原始社会的真实故事——女娲补天和一幅有关伏羲氏与女娲的唐代敦煌壁画（组图9－18）。



组图9－18　伏羲氏与女娲

“女娲补天”这个神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易经》就暗含了一个被历史长期尘封的原始社会的真实故事——“归妹”卦中的“女娲补天”。

《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羲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载。……当于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

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读完上面的这段文字，就会发现这段文字的神话色彩实在是太浓了，让人感觉到实在是太玄妙了，太神乎其神了。其实古人在《周易》中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历史长期尘封的原始社会的真实故事——“归妹”卦中的“女娲补天”。

《周易》中的归妹卦，实际就在述说女娲坚持与一个男人（键［乾］、天、丈夫）伏羲氏婚媾交合，建立了婚姻制度，其行为形成了榜样，使得在社会部落中争相效仿的人们所生的孩子也都有了父亲（天为父，神话女娲造人也是此意）。通过废除旧的陋俗，建立新的社会契约［规矩］，从此终止了由于落后的乱伦陋习所导致的小孩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口素质低下、青壮男人为争女人而相互争斗所导致的像滔滔洪水一样的流血事件和无谓的伤亡的局面，社会开始太平了（图9－19、图9－20）。

“帝乙归妹”所讲述的女娲与伏羲氏共同建立了一个婚姻制度，原因还是由社会人口进化这个问题而引起的，这就是哲学中道德和伦理学的问题。



图9－19　女娲补天



图9－20　女娲造人

这段论述就是对“女娲补天”这个远古的故事非常好的概括性总结。

故事描述的是在没有人类文明的远古时期，男人们为了争夺女人，不断地发生争斗并导致了惨不忍睹的后果，因此而损失了很多优秀的青年男子。故事中共工撞倒不周山（在《周易》中，山为根［艮］，代表青年男子），从天上流进来许多洪水（在《周易》中，天为键［乾］、为强壮，代表男人们为了比试强壮而相互进行角斗，导致受伤和死亡，结果流了很多的血，血为习赣［坎］、为水，受伤和死亡所流的鲜血就像是洪水一样流得到处都是）。

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那时候的人口本来就少，愚昧乱伦的结果是造成本应该是父子关系的却成了兄弟关系，本应该是兄妹或母子关系的却成了短暂的肉体夫妻关系（描述当时这种关系的称谓也可能不妥，姑且先这样称吧），这样乱伦后

出生的后代由于血缘太近而成痴呆、智障儿的太多，从而导致了人口的素质低下。

那时的伏羲氏是一个很大部落的首领，与同一个母亲而根本不知道各自的父亲是谁的妹妹女娲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俯查大地，观察动物们为什么智障的就很少或没有，并找到了这个原因。兄妹俩为了改变这一极端愚昧和落后的现状，从而结成了夫妻（图9－18中像蛇一样的交蚺），目的就是给当时周围的人们做出一个表率，身体力行地号召部落的人们都来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在当时可是极大地震动了周边的人们，也是后来的人们把这样榜样的行为相互争着传颂和效仿的原因，这也是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契约的典范。

故事中传颂的女娲用“五彩石”补天上的大窟窿，实际就是用“五行”来特指女人的“五种性情”（即木为朝气、火为热烈、土为厚道、金为喜悦、水为聪明），女娲号召女人们充分地利用各自的“性情”来留住自己男人的心（键[乾]、天）。这样一来，每一个男人就会规规矩矩地爱他们的家庭，干他们的事业，每一个女人也会规规矩矩地干自己的家务，一起繁衍后代。这样的后代既可以找到自己的母亲，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父亲（键［乾］、天）了。

从组图9－18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是一夫一妻制。伏羲氏手中拿的是矩（拐尺、角尺）和墨线盒（准绳［准则］），挑着59个小圆圈、1个大圆圈（月亮、女人），59＋1＝60（一个太极、六十个甲子）。女娲手中拿的是规（圆规［规则］），挑着49个小圆圈、1个大圆圈（太阳、男人），49＋1＝50（一个太极、大衍之数）。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小圆圈，表示在一起共同繁衍后代，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智慧的举措！

所谓“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也是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废除了旧的陋俗后，建立了新的社会契约，制止了男人们为了争夺女人而相互进行角斗所导致的血像滔滔洪水一样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从此，社会太平了。

归妹卦实际也在述说女娲坚持与一个男人（代表键［乾］、天、丈夫、伏羲氏）交合而产生了榜样的行为，使得在部落社会中争相效仿的人们生出来的孩子都有了父亲（在《周易》中天也代表父亲，神话中女娲造人也是这个意思），从而杜绝了由于陋习导致的孩子找不到父亲、人口素质低下、青壮年男人为争夺女人而无谓的伤亡和社会混乱这样一个旷日持久的局面。这就是在哲学当中的道德和伦理学的问题，原因还是由社会人口进化的问题这个根子而引起的。

这样的认识，在清代著名学者汪绂所著的《戊笈谈兵》“九州分野论”中就

曾论述：从前伏羲氏居住在宛邱，具有木德，开始建立婚媾制度，定于春季举行婚礼事宜……[1]很可惜，汪绂没有再进一步的详述。

西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肯定也同样经历过类似这样的故事，西方哲学社会契约论假定：人们突然发觉自己是完全具有理性的并且是能够为自己打算的，因此他们通过一些合理的决断，采取了一次行动，于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便一下子诞生了。西方哲学的这段论述却是对中国的“女娲补天”这个远古的故事非常好的概括性总结。

组图9－18中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许多理论和知识的系统观念，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富有智慧、制定规矩的举措以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哲理。

---

① （清）汪绂：《戊笈谈兵》，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第3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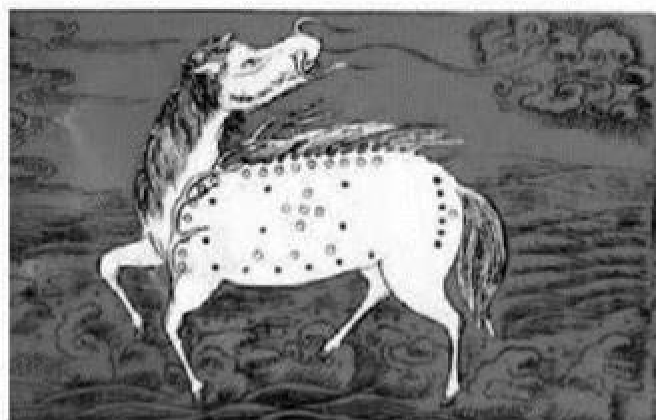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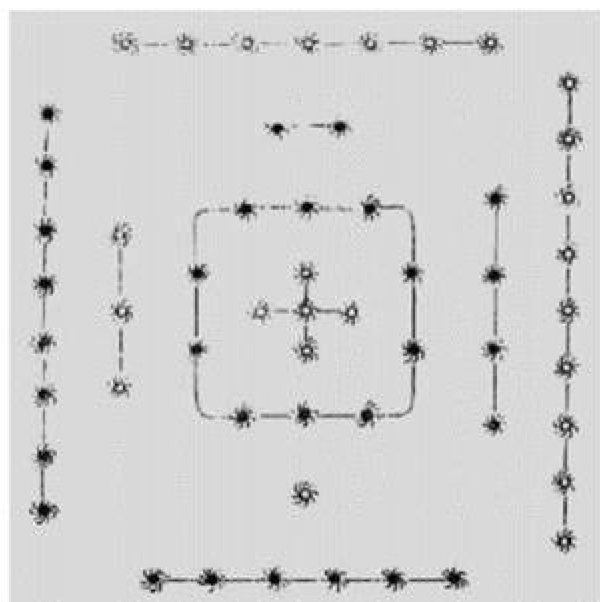
|第十章|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时期的易学

笔者在上一章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易学这种龙的文化是否孤独地只存在于贾湖时代以及是否孤独的只存在于中原大地上？在本章，笔者将通过把红山文化（距今约6000~5000年）与背负《河图》的龙马联系起来，将神龟与《洛书》联系起来，再把从凌家滩文化遗址（距今约5500年左右）出土的八卦玉版的考古资料串起来进行解读，以此证实中华民族自新石器时代就诞生的易学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华夏的大地上，一直在向前延伸，四散扩展。

第一节　龙马与《河图》

自古以来所有的史料与传说都认为《河图》（组图10－1）是在伏羲氏时代由神龙马背负而出的，而且说得神乎其神。那么，古人为何认为非得要用马来负《河图》，而不用其他的动物呢？

组图10－1　河图

西汉时的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从孔安国所说的"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可以看出，核心的关键还是在于那个"文"字。古代"文"与"纹"是互相可以借用的，这就提醒了我们要在

马的花纹图案上去寻找答案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青花马身上的花纹（图 10－2），就会找到答案。由于中国古人最早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的，形象思维非常直观，就是看此物与彼物的像是否非常相似而已。看到青花马身上的花纹，就会极其形象地将“纹”与“文”因谐音而相互借用。



图 10－2　青花马

但从孔安国所说的“《河图》者，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可以看出，《河图》不但与青花马纹有关，还与龙和八卦有关。由于先天八卦又称为伏羲八卦，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形象思维的方式看出《河图》与先天八卦以及龙、马之间的关系了。

《河图》（图 10－3）之“数”为一至十，形成了一个可循环的完整圆龙之形，而先天八卦从“一”到“八”反复变化的大“S”形（图 10－4），也形成了一个始终在循环、运动的圆龙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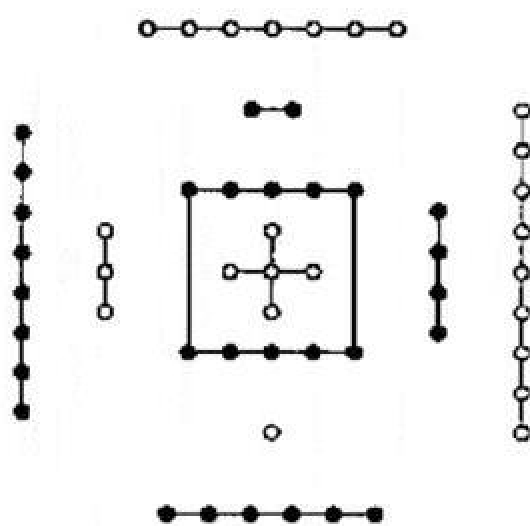


图 10－3　河图



图 10－4　先天八卦

我们再把从内蒙古赤峰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形玉龙造型和青花马奔驰的形态以及飘逸的马鬃进行对比（组图 10－5），结合古人形象思维的方式，就会立刻感悟到古人为何要把《河图》与先天八卦以及龙、马联系起来了。



青花马奔图　　红山龙　　青花马奔图局部　　红山龙局部

组图 10－5

马在动物中属于健而壮的那种，既善于奔跑，又比较温顺；人骑上去既能驾驭，马奔腾起来又比较稳定；它既能在陆地奔跑，又能涉水过河；既能负重，又能平稳行走，而且马的睡姿也是站着的。所以中国古代智慧的先人认为，马是动物界最能代表相似于永恒的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的。

如此，龙马也就自然成为了最合适、最完美的《河图》形象代言者，这就是古人为何要形象思维地用龙马来负《河图》的原因了。

这样，我们从《河图》中，就可以看出“数”的变化具有如下自然规律。

（一）

1. 三为先天火，代表太阳光，也代表太阳处在旭日状态，表示生、旺，九为后天火，代表篝火光，也代表太阳处在落日状态，表示死、衰，罗（阴），三（小）为生，九（大）为死，代表先天强、硬而后天软。

2. 四为先天木，代表草本植物，也代表植物处在落叶状态，表示死、衰，八为后天木，代表木本植物的树木，也代表植物处在发芽状态，表示生、旺，辰（阳），四（小）为死，八（大）为生，代表先天软而后天强、硬。

3. 一为后天水，代表河水，也代表河水处在奔腾状态，表示死、衰，六为先天水，代表雨水，也代表雨水处在落雨状态，表示生、旺，习赣（阳），一（小）为死，六（大）为生，先天软，后天强、硬。

4. 二为先天金，代表月光泽，也代表月光处在满月状态，表示生、旺，七为后天金，代表金属光泽，也代表金属光泽处在月光的初晦状态，表示死衰，夺（阴），二（小）为生，七（大）为死，先天强、硬，后天软。

5. 五为先天土，代表石、岩类，也代表土（沉积岩、石灰岩等）处在坚硬的状态，表示生旺，十为后天土，代表粉尘类，也代表土（沉积岩、石灰岩等风化后或其他原因所形成的粉尘类）处在松软状态，表示死衰，川（阴），五（小）为生，十（大）为死，先天强、硬，后天软。

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独特的哲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动态运行

的，是一个即将发生或即将要结束的过程，是偕行进的。

（二）

1. 树木（八）在春天（三）发芽，在夏天（九）停止生长，在秋天（七）凋零落叶，在冬天（一）休冬眠。

2. 太阳（三）从东方（八）升起，到南方（九）停止升起，在西方（七）降落，在北方（一）休息（其实在继续运动，只是我们没看到）等待明天。

3. 月亮在朔过后两天，开始生辉，出现峨眉月，到了周天四分之一，出现上弦月，继续到望，逐渐在满月，整个这一半过程始终是从月亮的东方（三）在逐渐变圆、变亮，走到周天的一半（九）变成满月（二），即生魄时月亮开始缺损，再走到离太阳四分之一周天时，出现下弦月，继续到晦，开始看不见月亮，整个这一半过程始终是从月亮的西方（七）在逐渐变缺、变暗，晦到朔这几天（一）月亮是黑的，没有光泽。

4. 水在天上形成雨（六），下到地上从高处（一）向低处流形成了河流（一），流的过程灌溉了树木、雨林（三、四、八），温度、热气（三、九）使水蒸发到天空形成云，积雨云遇到冷气（七）形成雨滴（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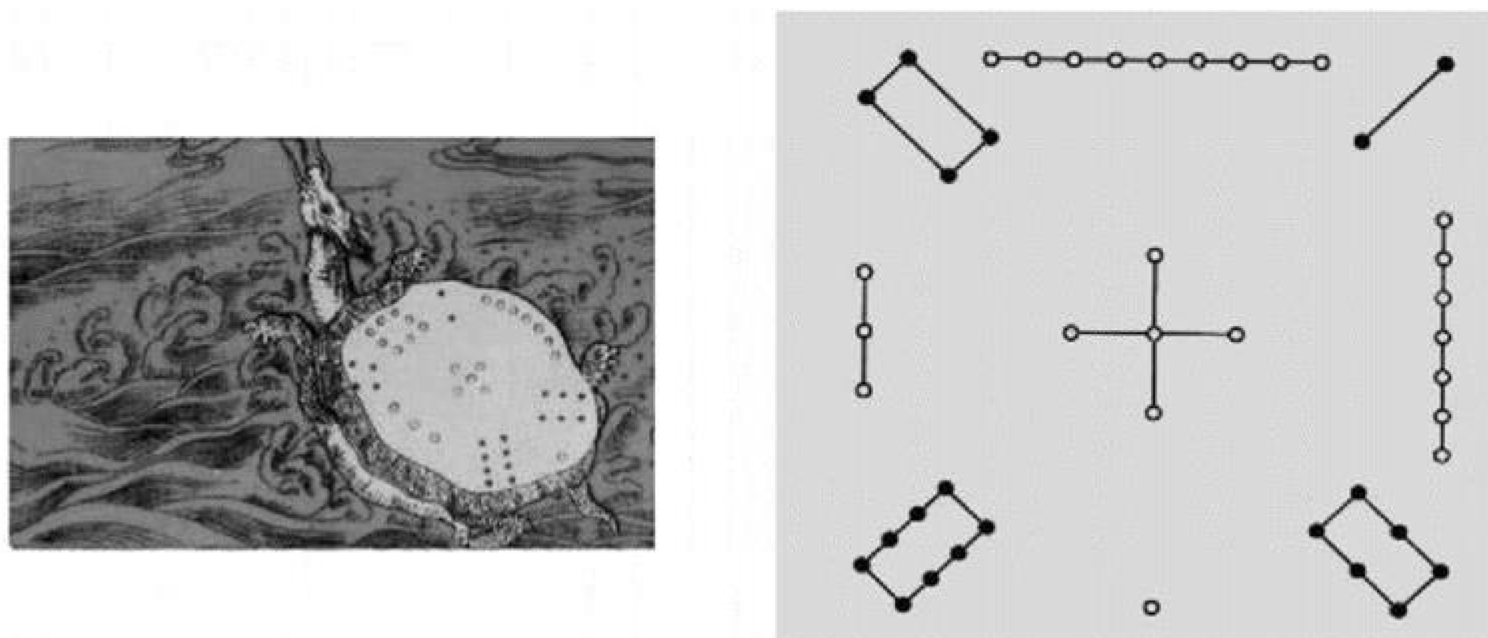
5. 金属（七）在高温烈火（九）中得到冶炼和锤炼，被制作工具在砍伐树木（三、八）中慢慢磨损，在雨水、河水（一六）的浸泡中被氧化、锈蚀，在金矿中（七）被重新挖掘、采集。五行中只有金是克生的。

第二节　龟甲与《洛书》

古代的许多史料与传说都认为《洛书》（组图 10－6）是在大禹时代由神龟背负而出的，而且也被说得神乎其神。那么，古人为何认为非得要用龟来负《洛书》，而不用其他的动物呢？

西汉时期孔安国云：“《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从孔安国所说的“神龟负文而列于背”可以看出，关键也还是那个“文”字。古代“文”与“纹”是互相可以借用的，也可直接理解为文化是古人们从象形的“纹”上转化过来的，这就提醒了我们要在龟背的图案纹路上去寻找答案。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龟背上的图案花纹（图 10－7），就会找到答案。由于中国古人最早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的，形象思维非常直观，就是看此物与彼



组图 10 -6　洛书

物的像是否非常相似而已。看到龟背上的花纹，就会极其形象地将“纹”与“文”谐音而相互借用。

但从孔安国所说的“《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可以看出，《洛书》不但与龟背之纹有关，还与“数”有关。而《洛书》之“数”又恰恰与后天八卦之“数”是相互吻合的，不仅“数”都为九，而且“数”的方位也相同。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形象思维的方式看出《洛书》与后天八卦和龟之间的关系了。

龟背顶部的花纹图案粗看上去就像一个具有四边四隅的四边形，但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龟背顶部上的图案花纹却又更像是一个八角八边形。这样，龟形与龟纹之形状的《洛书》（图 10 -8）也就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与后天八卦图（图 10 -10）无比准确地对应了起来。



图 10 -7　乌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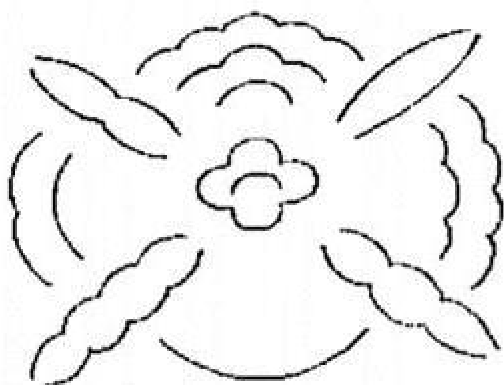


图 10 -8　龟形的洛书

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龟背上的图案花纹还更像是一个九宫八卦的图形（图 10 -9）。这样，龟纹之形状的九宫八卦图也就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九宫八卦图中“数”的宫位与《后天八卦》图中“数”的宫位和《洛书》中“数”的宫位就以形象思维的方式无比准确地对应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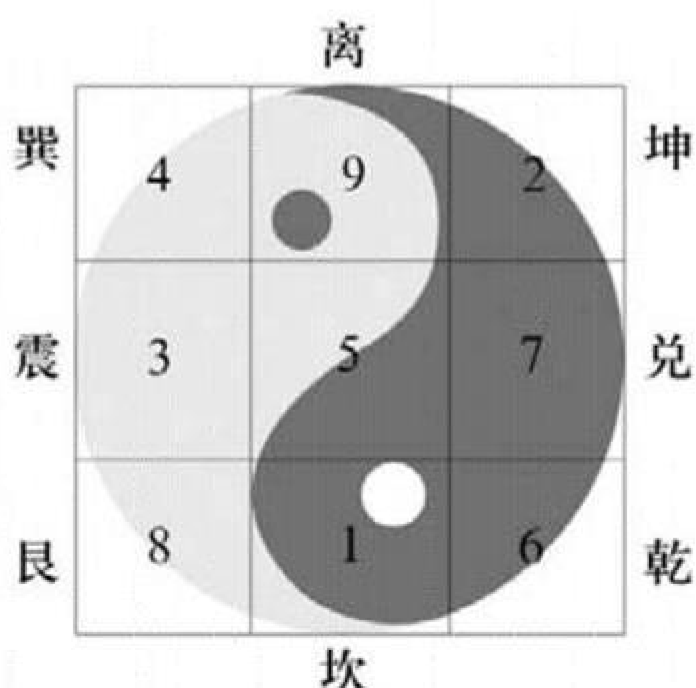


图 10－9　九宫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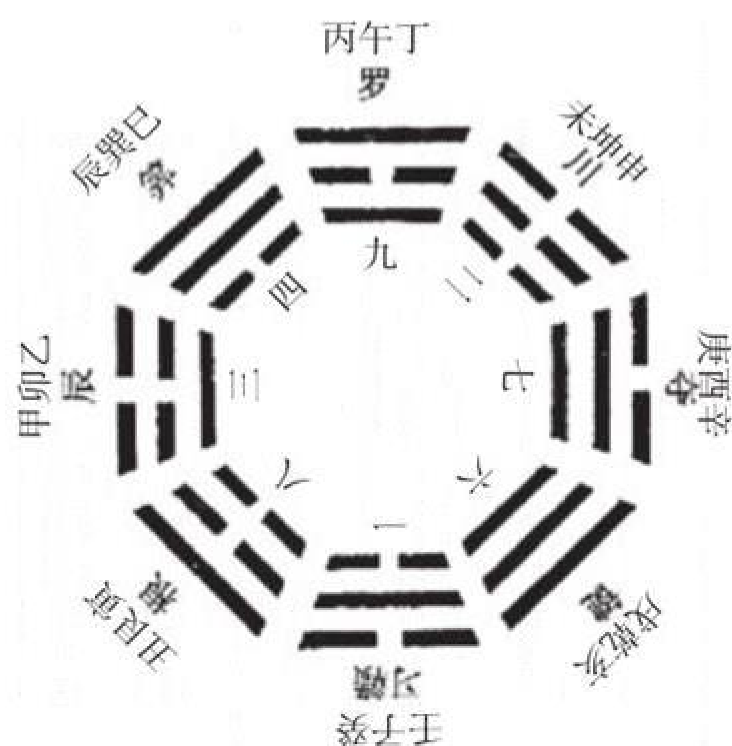


图 10－10　后天八卦图

《洛书》与《河图》不同之处，就在于《河图》的形象就像是一个循环运动的圆，而《洛书》的形象则更像是一个有转折点的八边形。这样，龟形《洛书》的四只脚就成为了转折点，如果龟的头部对应着南方在向前爬行，那么龟的四只脚就会分别分布在东南（巽）、西南（坤）、西北（乾）、东北（艮）这四个方向上，中国易学文化理论中的转折点驿马星（寅、巳、申、亥）也就形象思维地分布在了这四个角（四只脚）上。而驿马星又能够恰恰代表腿脚在行动，这使我们也立刻就会感悟到古人为何要把《洛书》与后天八卦和龟联系在一起了。

龟在动物界看上去行走很平稳，古时候的龟也都是很长寿的，体积大，背阔而平，就像一张桌面，而且龟的寿命也很长，龟的上下壳就像是天和地、像会运动的鸡蛋壳（古人将在宇宙之内比喻成在鸡蛋壳之内），不管在水中，还是在陆地，行动都很平稳，表现出最具有能负重，能涉水，且最具有平衡能力的动物，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动态运行的时空平衡系统所表现出的最智慧、最恰当的、形象的表达方式。

如此，龟自然就成了最合适、最完美的《洛书》形象代言者，这就是古人为何要形象思维地用龟来背《洛书》的原因了。

这样，我们从《洛书》中，也同样可以看出本章第一节（一）、（二）“数”的变化与《河图》自然规律。

第三节　玉版与八卦

从凌家滩发掘出土的玉版（图 4－22）上显示出，中部刻一小圆，小圆外又刻一大圆，小圆内刻一方心八角星纹，两圆之间平分八等份，每等份内又刻一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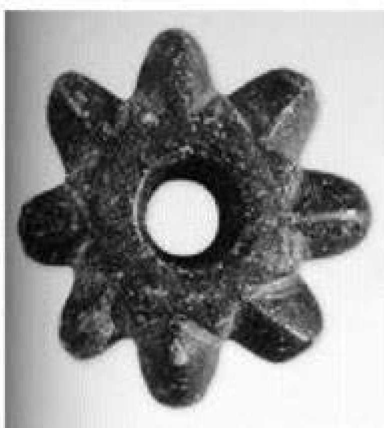
形纹饰，在大圆圈外与长方形玉版四角对应之处，又各刻一圭形纹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玉版是夹放在龟甲里面一起同时出土的，这也反映出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典型的占卜工具。这两者是凌家滩出土玉器中与中国文明有关的最珍贵的文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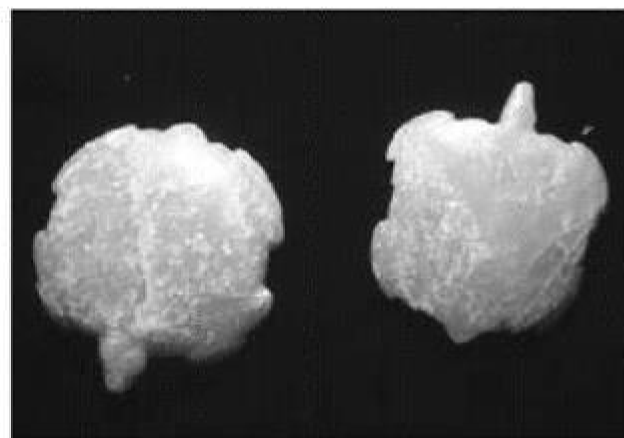
玉龟（图 4－24）出土时，龟中的空腹中夹放着玉版，背甲龟纹琢磨出了十分逼真的效果，玉背甲和玉腹甲两部分由孔和暗槽相连。

按照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形象思维，背甲为天，腹甲为地，中间玉版所刻易学八卦的哲学思想为人，这不是非常明确地反映出凌家滩人在那时就已经成熟地具有了天地人和的自然哲学观吗？

另外，在赤峰敖汉旗萨力巴乡七道湾子遗址也出土了一件表现八卦的碧玉多头器（组图 10－11），红山文化地区也出土了许多玉龟。如果我们把红山文化地区的中国古代先民与凌家滩的原始先民结合在一起考虑，就会发现，南北两地的中国先民已经完全继承了贾湖人应用中国易学文化中卜筮算卦的行为能力，并且将卜算作为文化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红山文化时期的碧玉多头器



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龟

组图 10－11

从图 4－22、图 4－23、图 4－24 相关内容中可以看出，虽然在凌家滩文化遗址没有发现有系统文字的资料，但笔者在本篇第八章第一节中提到，在远古还没有诞生系统文字的时代，“数”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哲学之意，包罗了万象、万事、万物。中国智慧的凌家滩古人就是用了二十四条圭形纹饰，表达了玉版上的二十四“数”，在二十四山中表示出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八卦、四方四隅、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等诸多系统的概念，并使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数”在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里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包或信息系统库。

| 第十一章 |

易学与汉语言

我们都知道，考古发现的中国具有系统文字的时代是在殷商时代，而可用于表达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五个文字是否也诞生在殷商时代，就很难说了。目前，还没有考古发现证明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五个文字比殷商时代更早。

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文化中语言与文字的创造与使用，应当比殷商甲骨文的时代还要早。中国文化中语言与文字的创造与使用，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易学与“金、木、水、火、土”这五个具有五行意义的五个文字、读法之间的关系，看一看易学与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易学与汉语言相关联的类比归类

一

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从诞生到使用的这段时间里，哲学实际上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将万事万物都归纳到“数”里了。《河图》与《洛书》中的“数”的哲理被智者们在生活当中的典型应用，就是后来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哲学家们所说的“万物皆数”。当时这样深奥的方法只被极少数的智者知道和应用，并没有普及开来，也非常不容易普及。

传说中到了五帝之首的轩辕氏黄帝时，《河图》与《洛书》的哲理已经被智者们应用到生产和生活的科学技术中了，效果非常不错。智者们可以采首山之铜

以铸鼎，作舟车以济不通，制指南车以示方向，用坚石制作弓矢和兵器，将衣服染成五色来渲染美丽，等等。而且有了元妃嫘祖首创养蚕制丝、仓颉造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乐器和律历、工人垂制钟、隶首作算术，等等。

这些被人们以口头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故事，在有了系统的文字后，又被人们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下来。这充分说明了轩辕氏黄帝非常重视和普及我们中华民族的先进思想，并在他执政的时代将先祖的先进思想演变成了科学文化，将哲学的思想文化体系转化演变成为了农业、手工业、音乐、语言文字、数学等科学文化的雏形。

我们知道，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可以将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自然属性都进行五行的归类，被归类进"金、木、水、火、土"这五种非常普遍的五行代名称，还可以再进一步对应上五音"宫、商、角、徵、羽"系统。而"金、木、水、火、土"是自然界的地球上普遍到处都有的物质系统，紧紧地围绕着人类的生命运动，在生产和生活以及其他的各个方面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也非常容易地被人们接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智慧的古人还在我们现在认为的原始社会就已经严格区分开了文与字、语与言、说与话、声与音，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文：指竖版的一行一行的字体所组成的行文；
字：指作行文时所用的字体。
所以是"作文，写字"的词语，而没有"作字，写文"的词语。

语：指比较随便，并不是用心说出的声音。
言：指表达出心理活动的声音；
所以有"食不言，寝不语"之说。

说：指不经意发出的声；
话：指发自内心的声音表达。
所以有"说话的时候要用心，听话的时候要听音"之说。

声：指发出的响声，属阳性，同升；
音：指响声之后，产生的回音或余音，先有声，后有音，音属阴性，同阴。

在老子的《道德经》第二章所描述的"音声相和"中就明确地指出声和音是两回事。比如，在惊蛰节的这一天，惊雷在天空中炸开，余音在天空

的大气层中回荡，响声和回音在被大地不停地吸收的同时，给予了大地巨大的能量和丰富的肥料，并将沉睡了一冬的冬眠之物也唤醒了，所以在大自然中的声和音本身就是两回事。

在《河图》之数为物理的根源中的五声“呻、笑、呼、哭、歌”是转变不成五音“羽、徵、角、商、宫”的，因为这其中的五声是由于人的五志而发出的，而五音是大自然中本身就有的。

那么人如何也能理性地发出那些模仿大自然的五声，与模仿大自然的五音结合起来，再与形象思维的汉字象形结构结合起来，形成声与音的独特读法，从而与大自然美轮美奂地和谐起来？

以仓颉为代表的智慧古人，对造好的汉字都配有上半个声和下半个声，进行组合读法，利用发声能在口腔和喉部这个小音箱里产生出共鸣放大后的音响效果的规律，表达出了一个通过心理活动而能发出发自内心的声音的语言规律。这近似于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汉语拼音里的声母和韵母的组合拼法（但绝对不是汉语拼音的组合拼法，只是极其近似和极其相似而已）在口腔中的放大与共鸣。

制定这个符合自然的规律就是为了将人们说话时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用于行文记录的方式规范统一起来，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除了“啊、哦、俄”这一类单声字的创造是纯粹的象声外，其他所有的汉字的结构和声音读法都是构成文章和语言的最基本的单子（或单元），即每一个汉字的声音读法都成为了由声和音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了。

大自然中的“羽、徵、角、商、宫”这五音，其实就对应着自然界的“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或用这些物质制作出来的器物在自然中发出最独特、最常见、最自然的响声和回音的对应。人们通过反复模仿它们，归类成汉字来表达它们。

由于在中国的古时候就从来没有发明过系统的字母，就更谈不上使用字母了。从东汉时期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这本大字典之后，从汉魏之间开始出现的《韵集》之书、北宋时期出现的《广韵》之书，到南宋时期郑樵所著的《通志》之书中的《六书略》里的那部分对汉字读法的描述记录以后，才系统地采用两个汉字来表达某个汉字读音的读法，就是用前一个汉字读法的上半个声部和后一个汉字读法的下半个声部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比如“皇”字的读法标注是：“皇‘胡光切’。”就是用“胡”字的上半个声部（好比汉语拼音的声母 h）与“光”字的下半个声部（好比汉语拼音的韵母 uang）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

这种用两个汉字的上半个声部与下半个声部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的方法叫反切。这种方法无法使人明白汉字的上半个声部与下半个声部是如何诞生的、又是怎样人为被规定的以及为什么非得这样。

虽然这几个问题几千年来一直有人提出，但始终找不到原始的根源性的答案。这说明，描述汉字读法的这种表达方式欠科学，容易使人们误入歧途，一直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人们也是只认识了汉字，而不知道在汉字声音的读法里面还存在着大量的大自然万事万物奇特奥妙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只要在本书中出现了类似于《新华字典》中汉语拼音的标注方法，目的只是为了借用这种方法进行直观的比较，想要说明每一个汉字的读法都是由前上半个声部和后下半个声部的两个部分所组成的，而这两个部分的发声在嘴形上是有区别的，读者可以去体会，并不是说某字在古代的读音就是今天《新华字典》中的读音。而且《新华字典》中汉语拼音里的声母和韵母的读法，也同样是利用了汉字进行标注，其实就是在用汉字的声音读法来表示出字母的极近似的声音读法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意义。

二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智慧的古人通过观察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所总结归纳出来的《河图》五音本数图（图 11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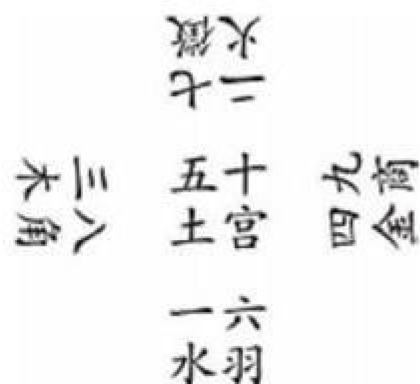


图 11 - 1　河图五音本数图

图 11 - 1 中的二七火——徵（zhi）是处在图的上（南）方位置，一六水——羽（yu）是处在图的下（北）方位置，而五十土——宫（gong）、四九金——商（shang）、三八木——角（jiao）是处在图的中部一条线（东、中、西）上的位置。这表现出大自然本身就具有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它们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与它们本身就具有的特性所对应的位置是如此的吻合。

由于在中国古人天地人合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有一物一太极的理论，那么在这个太极中的五行“水、火、木、金、土”就应该是全的，可它们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智慧的古人又是如何总结和归纳出来的？为什么非得要用“羽（yu）、徵（zhi）、角（jiao）商（shang）、宫（gong）”这五个汉字确定为对声音的特指，又专门用来对应“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呢？它们对应出来的彼此特性又是否具有一致性呢？

前面说道，在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了轩辕氏黄帝的时代之后，黄帝非常重视和普及我们先祖从大自然中提炼出来的先进思想，并将这个智慧的天地人和的思想文化体系付诸实施。他在将这个思想文化的体系转化成农业、手工业、音乐、语言文字、数学等各种科学文化雏形的过程中，那些智者们利用了超强的形象思维的能力和方法，在大自然的生产和生活中也同时发现了以下特有的现象。

（一）羽

1. 古代的智者们发现，溪水、河水在轻轻地流淌时所发出的声音，是非常相似于 xu—xu、ju—ju、yu—yu 的混合声音，就试着模仿了起来并在生活中加以利用。比如，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给婴儿把尿的方法，就是大人们在给半夜熟睡的婴儿把尿时，端着婴儿并给他发出一个模仿水流 xu—xu、ju—ju、yu—yu 的类似声音信号，昏睡的婴儿马上就能明白，并发出尿水的声音。还有夜晚（水）时分，蛐蛐发出的就是 ju—ju—ju 的声音，对应这种声和音的五行属水。

2. 古代的智者们又发现了每个人上下嘴唇的形状曲线，就好像正在流淌着的水的波纹，而且从声带发出的气流也只有通过嘴唇才能比较逼真地模仿出水流声音。读者不妨试试。

3. 由此结合大自然而人为地规定：凡是人们利用嘴唇的部位所发出的声音也都规定为五行属水。因此造字的古人们就把舌头、门齿和嘴唇的部位相互配合，将发出 y 的上半个声与 u 的下半个声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在口腔的唇部共鸣出音，对应上自己造出来的形象的“羽”字，于是与“水”对应的“羽”字的声音读法也就诞生了。

4. “羽”的上半个声部是 y，下半个声部是 u，拼读时，声带发出的气流从舌齿之间到唇，又收回到口腔内，在口腔的唇部位置以及口腔音箱内共同混合共鸣后，就又产生出了“羽”字的音，由于水具有润下的特性，所以在拼读的时候侧重的是下半个声部。

（二）徵

1. 古代的智者们发现，火焰在燃烧动物和植物的油脂时会特别旺，并且同时还会跳动着发出 zhi—zhi、chi—chi 的声音；雨点和水激落在烧热的石头物体

上同时也会发出 zhi—zhi、chi—chi 的声音，由于这个声音是从燃烧的火焰里面发出来的，因此五行属火。另外，还有在炎夏最热（火）的中午时分，树上的知了发出的声音也是 zhi—zhi—zhi 的声音。

2. 古代的智者们又发现人的舌头在口腔里能够活动自如，并且能像火焰的跳动一样，由于火焰具有这样的特征，而且也只有口腔中的舌头才能比较形象逼真地模仿出火焰的跳动。读者不妨试试。

3. 由此结合大自然而人为地规定：凡是人们从声带发出的气流通过舌头和门齿的部位相互配合所发出的 zh、z、ch、c、d、t、n、l 声和 i 的声都规定为五行属火。因此，造字的古人们就将从舌头和门齿的部位相互配合模仿所发出 zh 的上半个声与 i 的下半个声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在口腔内的齿部共鸣出音，对应上自己造出来的“徵”字，于是与“火”对应的“徵”字声音读法也就诞生了。

4. “徵”的上半个声部是 zh，下半个声部是 i，拼读时，声带发出的气流从舌头触击门齿的缝隙中穿过，又回到口腔内，在口腔音箱内的齿部这个位置混合共鸣后，就又产生出了“徵”字的音，由于火具有炎上的特性，所以拼读的时候注重的是上半个声部。

（三）角

1. 古代的智者们发现，每天清早的卯时（五行属木），就在太阳就要冒（五行属木）出地面升起来的时候，报晓的公鸡（巽，属木）打鸣时发出的声音与 ao—ao—ao 非常的相似；鹅和鹤（巽，属木）等五行属巽木的禽鸟发出的声音也与 ao—ao 非常的相似；风或气流从空的竹管吹过时所发出的声音也与 ao—ao 极为相似。

比如，中国乐器中的葫芦丝、箫、巴乌等，吹奏时发出的声音最近似 ao—ao；吹奏用牛角制作的号角时发出的声音也最近似 ao—ao；牛、羊、鹿等五行属土的动物头上冒出的犄角（jiao），形状非常类似于大地上长出的树木和草本植物，也非常类似于太阳从地平面上冒出来；还有树木在折断时、木头在干燥的环境下裂开的时候所发出 ka—ka、ga—ga 的声音；麦地里的小麦在抽穗和拔节时所发出的声音。我们还可以再联想一下“早、晓、叫、毛、冒、茂、角”这几个与木类有着直接和极类似关系的字，就明白它为何要五行属木的原因了。

2. 古代的智者们又发现每个人的牙（除了四颗门齿以外的牙）在口腔里就像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具有神经和营养供应的坚硬的树木（绝不可类比成石头）之性质，而且从声带到口腔发出声音气流的同时，口腔内牙的部位也同时受

到了轻微的震动。读者不妨试试。

3. 由此结合大自然而人为地规定：凡是人们从声带发出的声音气流在口腔内使牙的部位受到了震动而发出 ji（鸡，为巽，属木）的上半个声和 a、ao 的下半个声也都规定为五行属木。因此造字的古人们就将从口腔内使牙的部位受到轻微震动时发出的上半个声 ji 与 ao 的下半个声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在口腔内的牙部共鸣出音，对应上自己造出来的形象的“角”字，于是与“木”对应的“角”字的声音读法也就诞生了。

注：角为多音字，在此不能读 jue。

4. “角”的上半个声部是 ji，下半个声部是 ao，拼读时，声带发出的气流从舌头触击门齿的缝隙中通过，又回到口腔内的牙部，与从喉部声带发出 ao 的下半个声在口腔音箱内的牙部这个位置共同混合共鸣后，就又产生出了“角”字的音。

（四）商

1. 古代的智者们发现用金属铜制作出来的钟，不论是什么东西碰上它，都会发出非常类似于“铛（dang）、铛（dang）”的清脆声音；用金属铜制作出来的其他器物，不论是什么东西碰上它，也都会发出非常类似于“镗（tang）”、“铫（guang）”、“锵（qiang）”等声音，由于是用金属铜制作的器物所发出的声音，因此五行属金。

2. 古代的智者们发现金是克生的（即金属是用火提炼出来的），又发现每一个人的口腔里齿（前面的四颗门齿）既坚硬又锋利，可以咬断东西，就好像是用金属制作的利器刀具一样。而且从口腔发出的气流也只有通过口腔门齿处的部位才能逼真地模仿发出 sh、s 的声，也只有从喉部才能逼真地模仿发出 ang 的音。读者可以试试。

3. 由此规定了从喉部声带发出的音属土，而金属又是用火从土类的矿石中提炼出来的，所以结合大自然而人为规定：凡是从门齿的部位发出的声和从喉部声带模仿发出 ang 的声都规定为五行属金。因此造字的古人们就将从门齿部位发出来 sh 的上半个声与从喉部模仿发出来 ang 的下半个声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在口腔里的喉部共鸣出音，对应上自己造出来的“商”字，于是与“金”对应的“商”字的声音读法也就诞生了。

4. “商”的上半个声部是 sh，下半个声部是 ang，拼读时，声带发出的气流从门齿的缝隙中穿过，到达唇部，又回到口腔内与从喉部发出的 ang 在口腔里的喉部这个音箱中混合共鸣后，就又产生出了“商”字的音。

（五）宫

1. 古代的智者们发现用泥土制作出来的陶罐、坛子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当人们把耳朵贴在陶罐和坛子的口上时，会听到陶罐、坛子里面有“嗡—嗡”作响的声音，对着坛子口歌唱或喊叫也会出现很大的来回环绕而发出的“嗡、嗡”声音。由于坛子是用泥土制作的，因此五行属土，于是便给坛子取了个非常形象又与声音非常贴切的名字，叫做瓮，所以现在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老百姓们还将腌咸菜的陶罐和坛子称为瓮。

还有人们在吹响埙以后，也会发出“呜—呜”、“嗡—嗡”的音响。“瓮”字的读法在《康熙字典》中是“乌公切”，如果要用现代汉语拼音标注的方法来读的话，则应当读作 wong。就是说在 1953 年以前，一直都是这么读的，而在 1953 年出版发行了《新华字典》以后，新规定的标准读法就标注成了 weng。那为什么没有标注成 wong 呢？原因可能是读起来太绕口，太难读了吧。

2. 古代的智者们又发现每一个人的喉部声带里面，中间空空的那部分非常类似于一个形象的陶罐和坛子，而从喉部模仿发出的声音也非常类似于能听到的陶罐和坛子中 ong 的那个声音，而且也只有利用喉部才能逼真地模仿发出 ong 的这种声音，所以结合大自然而人为地规定：凡是人们从喉部模仿发出的声音都规定为五行属土。读者可以试试。但从喉部模仿发出的 h 声音，五行规定属水，这是因为瓮能盛水，山谷能蓄水、流水的缘故。

3. 因此造字的古人们就将从喉部声带发出 g 的上半个声，与从喉部模仿发出来 ong 的下半个声为切入点组合在一起进行拼读，在口腔和喉部共鸣出音，对应上自己造出来的形象的“宫”字，于是与“土”对应的“宫”字的声音读法就诞生了。

4. “宫”的上半个声部是 g，下半个声部是 ong，拼读时，喉部声带所发出的 g 的气流声在口腔内通过舌头卷回去（环绕）与从喉部所发出的 ong 的声响，在口腔和喉部的这个音箱里共同共鸣后，就又产生出了“宫”字的音。

这就涉及了易学中的自然哲学的理论和仿生态学的知识，表现出了“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在大自然中本身就具有的特性。

比如：羽（yu）、徵（zhi）、角（jiao）、商（shang）、宫（gong）这五音中的徵（zhi）就是注重于前半个声部的发声，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的火焰本身就具有炎上（向上升腾）的特性。羽（yu）就是侧重于后半个声部的发声，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的水流本身就具有润下（向下流淌）的特性。宫（gong）、商（shang）、角（jiao）则注重的是前半个声部和后半个声部的整体组合所发出的声

音，这是因为在自然界中的砂、土、石和金属矿藏以及草木，相对于跳动的火焰和流淌的水流来讲，则要平静许多。

徵（zhi）是一个形声的读法；
羽（yu）是一个形音又形象的读法；
宫（gong）和商（shang）是一个既形声又形音的组合读法；
角（jiao）是一个既形声还形音又形象的组合读法。

南宋的朱元升在其《三易备遗》中就认为，洛书五行相生，而河图五行不相生，是因为河图为纳音用。“水本无音，因土激之则有音，故水居五土之数。火本无音，因水凑之则有音，故火居一六之数。土本无音，因火陶之则有音，故土居二七火之数。惟木金自能有音，故不易其数，是以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位序相联，生生而不息矣。”

朱元升的这段论述，就在说明古人为什么非得要用“羽（yu）、徵（zhi）、角（jiao）、商（shang）、宫（gong）”这五个汉字的声音读法，专门地来对应“水、火、木、金、土”这五种自然界中被归类的物质，它们所对应出来彼此的特性是具有一致性的。

第二节　声音与口腔中各部位之间的易学逻辑关系

一

从一个人的口腔声带里发出的声音气流，只有当舌头和门齿之间所发出声音时是需要紧密配合的，绝不可能从一个人的口腔里单独发出舌或门齿的声音，只不过配合的程度有大小而已，所以还各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半舌和半齿的声和音。

掉了门齿的人说话的时候，从门齿（属金）之处是要漏气（气流为风，为巽，属木）的，根本说不清楚话，这是因为口腔中没有了门齿以后，就没有办法能控制住从口腔中向外挤出的气流（金没有克住木，以及火与金没有交成的原因）。

读者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在大自然中，安静的金属与燃烧的火焰能单独自己发出声音，这些人为的规定与大自然本身的客观规律是多么的融洽与和谐。

这一点从《河图》的五音顺序相生图中就可以看出来，其易学思想理论是：

1. 二、七到了离宫南方的火位时，金属在火焰温度的作用下，还没有受热熔化的时候，金属仍然是具有本来就属于金的性质，等到金属慢慢地完全熔化了之后，燃烧的高温金属也就具有了属于火的性质了，因为南方具有火热般的炎热性质。

2. 四、九到了兑宫西方的金位时，金属在火焰高温的作用之下，完全受热熔化了的时候，火仍然是具有本来就属于火的性质，等到火焰慢慢地完全熄灭了的时候，金属冷却了之后，火也就跟随着金属去属于金的性质了，因为西方具有金属发凉的性质。

这在易学领域里被称为是火金交理论，也就是说在五行之中只有金是能被克生的，因为庚金长生在巳位。

让我们对照着《河图》的五音顺序相生图来看一下“宫、徵、商、羽、角”的声音读法是如何连续相生和循环的。



图 11－2

1. 唇位　2. 齿位　3. 上齿腭位　4. 下齿腭位　5. 舌位　6. 牙位　7. 喉位



图 11－3　河图五音顺序相生图

从图 11－2 和图 11－3 中可以看出：

声音从喉的声带部位［7］发出，到口腔中牙的部位［6］；从口腔中牙的部位［6］到舌的部位［5］，从舌的部位［5］到齿的部位［2］；从齿的部位［2］到唇的部位［1］，从唇的部位［1］又回转到了齿舌的部位［2、5］；从齿舌的部位［2、5］回到口腔中牙的部位［6］；从牙的部位［6］最终又到了喉的声带部位［7］。

羽（yu）、徵（zhi）、角（jiao）、商（shang）、宫（gong）这五音的排列，也基本符合人体口腔中的生理结构排序，唇在最外，喉在最里面，牙、舌、齿又基本都在口腔的中间（中宫），不易分得太清，这种在口腔的内部基本非常有次

序的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依次循环相生的顺序，与《河洛精蕴》中《河图》、《洛书》为声音源头的顺序论述是基本一致的。

二

下面让我们对照着图 11－4、图 11－5 的顺序来看一下自然界的“水、木、火、土、金”与汉字声音读法的“水、木、火、土、金”是如何连续相生和循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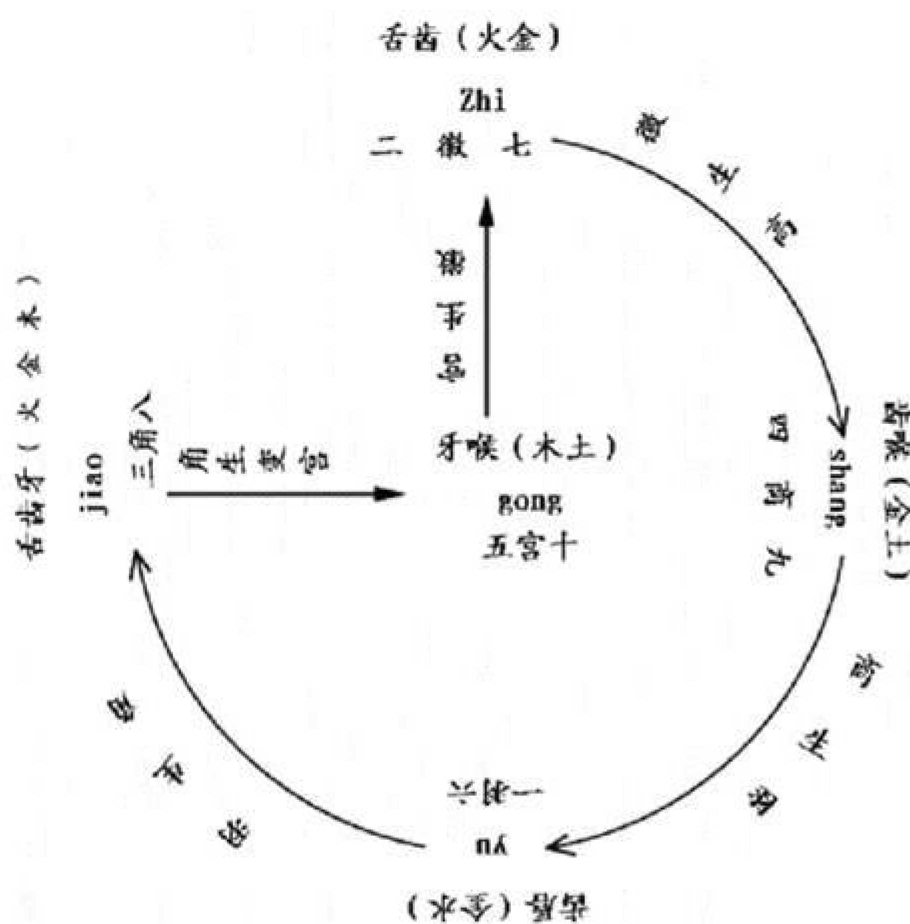


图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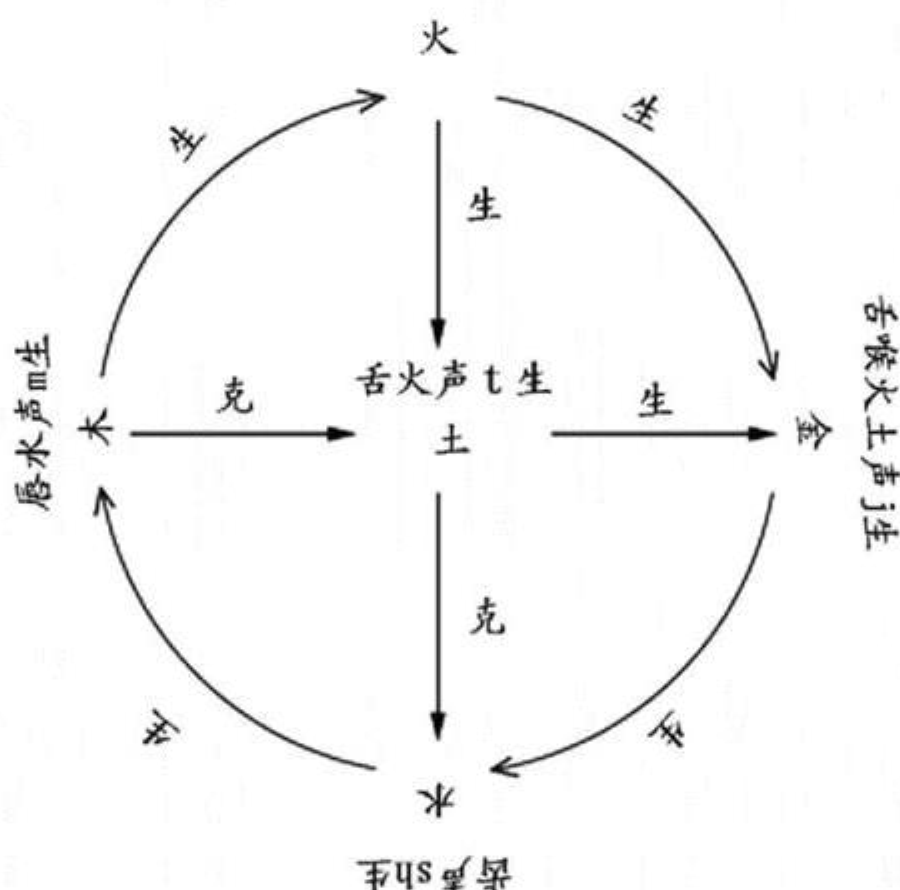


图 11－5

图中表现出了以下的特征：

1. “水”字的上半个声部 sh（齿声属金）既能生本位的“水”，同时又可以生下一位“木”字的上半个声部 m（唇声属水）。

“水”字的下半个声部 ui 中有 i 的发声，i 有齿（齿声属金）的发声，这样属“金”的齿声又在生本位的“水”了，所以“水”字的声音读法就这样被属“金”的齿声给生了出来。

2. “木”字的上半个声部 m（唇声属水）既能生本位的“木”，同时又可以生下一位“火”字的上半个声部 h（牙声属木）。“木”字的下半个声部中有 u 的发声，u 有唇（唇声属水）的发声，这样属“水”唇声又在生本位的“木”了，所以“木”字的声音读法就这样被属“水”的唇声在滋润生长着。

3. “火”字的上半个声部 h（牙声属木）既能生本位的“火”，同时又可以生下一位“土”字的上半个声部 t（舌声属火）。“火”字的上半个声部 h（也有

喉声属土的性质）同时又可以生下一位“金”字的上半个声部j（齿声也有属金的性质）。

“火”字的下半个声部uo中有o的发声，o有牙（牙声属木）的发声，这样属“木”的牙声又在生本位的“火”了，所以“火”字的声音读法就这样被属“木”的牙声给生旺了起来。

4.“土”字的上半个声部t（舌声属火）既能生本位的“土”，同时又可以生下一位“金”字的上半个声部j（舌声属火，因为五行中只有金是克生的）。“土”字的下半个声部中有u的发声，在“火”字的下半个声部中也有u的发声，这样属“火”的舌声又在生本位的“土”了，所以“土”字的声音读法就这样被属“火”的舌声给生了出来。

5.“金”字的上半个声部j（有舌声属火）既能克生（因为五行中只有金是克生的）本位的“金”，同时又可以克生下一位“水”字的上半个声部sh（齿声属金）。“金”字的下半个声部in中有i的发声，还有n的发声，i有舌（舌声属火）的发声，火可以克生本位“金”，n有喉鼻（喉鼻声属土）的发声，土可以生本位“金”。

因为在大自然中“金”首先是从矿石和沙石中被采集了出来，而后又用火焰的高温把矿石中的“金”冶炼熔化后才提炼出来了纯金。这样属“火”的舌声就又在克生本位的“金”了，所以“金”字的声音读法就这样被属“火”的舌声给克生了出来。

从以上五个汉字的声音读法中可以看出，它们在五行的属性上也是遵循着依次循环着相生的特征，其中第3、4、5点就说明金属在大自然中本身就是存在于矿石中的，就得用火焰的高温来提炼，与其他几点一样，都是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的。

1.“水”字的上半个声部sh（齿声属金）克“火”字的上半个声部h（牙声属木）。“水”字的下半个声部ui中有i的发声，i有齿（齿声属金）的发声，“火”字的下半个声部uo中有o的发声，o有牙（牙声属木）的发声，金克木就是直克的关系，也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

2.“木”字的上半个声部m（唇声属水）克“土”字的上半个声部t（舌声属火）。“木”字的下半个声部中有u的发声，u有喉（喉声属土）的发声，“土”字的下半个声部中有u的发声，这个u又有唇（唇声属水）的发声，所以“木”字的下半个声部u（有土声）克“土”字的下半个声部u（有水声），是直克的关系，也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

3.“火”字的上半个声部h（牙声属木）生“金”字的上半个声部ji（舌声

属火），由于只有金是克生的，所以在此既为克，也为生。“火”字的下半个声部uo中有o的发声，o有牙（牙声属木）的发声，“金”字的下半个声部in中有n的发声，n有喉鼻（喉鼻声属土）的发声，所以“火”字的下半个声部中的o（有木声）克“金”字的下半个声部中的n（有土声），是直克的关系，也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

4．“金”字的上半个声部ji（舌声属火）反克“木”字的上半个声部m（唇声属水）。由于水具有火旺干涸的性质，所以只有在此也为克。“金”字的下半个声部in中有n的发声，n有喉鼻（喉鼻声属土）的发声，“木”字的下半个声部中有u的发声，u有唇（唇声属水）的发声，所以“金”字的下半个声部中的n（有土声）克“木”字的下半个声部中的u（有水声），是直克的关系，也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

5．“土”字的上半个声部t（舌声属火）克“水”字的上半个声部sh（齿声属金）。“土”字的下半个声部中有u的发声（有土），在“水”字的下半个声部中也有u的发声（有水），所以“土”字的下半个声部中的u（有土声）克“水”字的下半个声部中的u（有水声），是直克的关系，也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

从以上五个汉字的声音读法中可以看出，它们在五行的属性上也是遵循着依次循环着相克的特征，只是在下半个声部中表现得没有像上半个声部那么的明显和纯粹罢了，但这却更符合大自然中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从水、木、火、金、土这五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汉字声音读法中就可以看出，这五个汉字的下半个声部中都有代表u和n的土声，说明不论从口腔中发出何种声音，都离不开喉部的声带，喉部是口腔能发出声音的中央，属土，口腔其他部位所发出的声音都要服从于中央的声音。

三

下面读者也可以用嘴来试着感觉一下，大自然中的这五种物质在下面几种自然状态下所发出的声音：

从“水水水水水水”的连续读法中，能否感觉到水在淅沥淅沥的自然流动，以及水滴从高处滴入水中所发出的自然声音；

从“火火火火火火”的连续读法中，能否感觉到随着农村那种推拉的风箱，炉膛内旺盛燃烧着的火焰在向上发出呼呼的气流流动的声音；

从“木木木木木木”的连续读法中，能否感觉到刮风的时候从空竹管中发

出呜呜的自然声音，或刮大风时从树林中产生的自然声音；

从“金金金金金金”的连续读法中，能否感觉到在测听力的时候从金属音叉上发出来的吟吟的金属振动声音；

从“土土土土土土”的连续读法中，能否感觉到气流从瓮口上吹过，从瓮口里发出呜呜嗡嗡的自然声音，以及土或土块掉在地上发出的自然声音。

通过这样的模仿，我们还可以从“水、火、木、金、土”这五个汉字的声音读法中，依然能感觉到大自然中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声音。

古人还以地球（人、太极单元）为基准，按地球、月亮［兑、金］与金星、水星、太阳［离、火］与火星、木星、土星自然地排成一条直线，那么在地球（人、太极单元）之外就会依次出现金、水、火、木、土由近渐远的自然排列顺序，出现了距离的远近（图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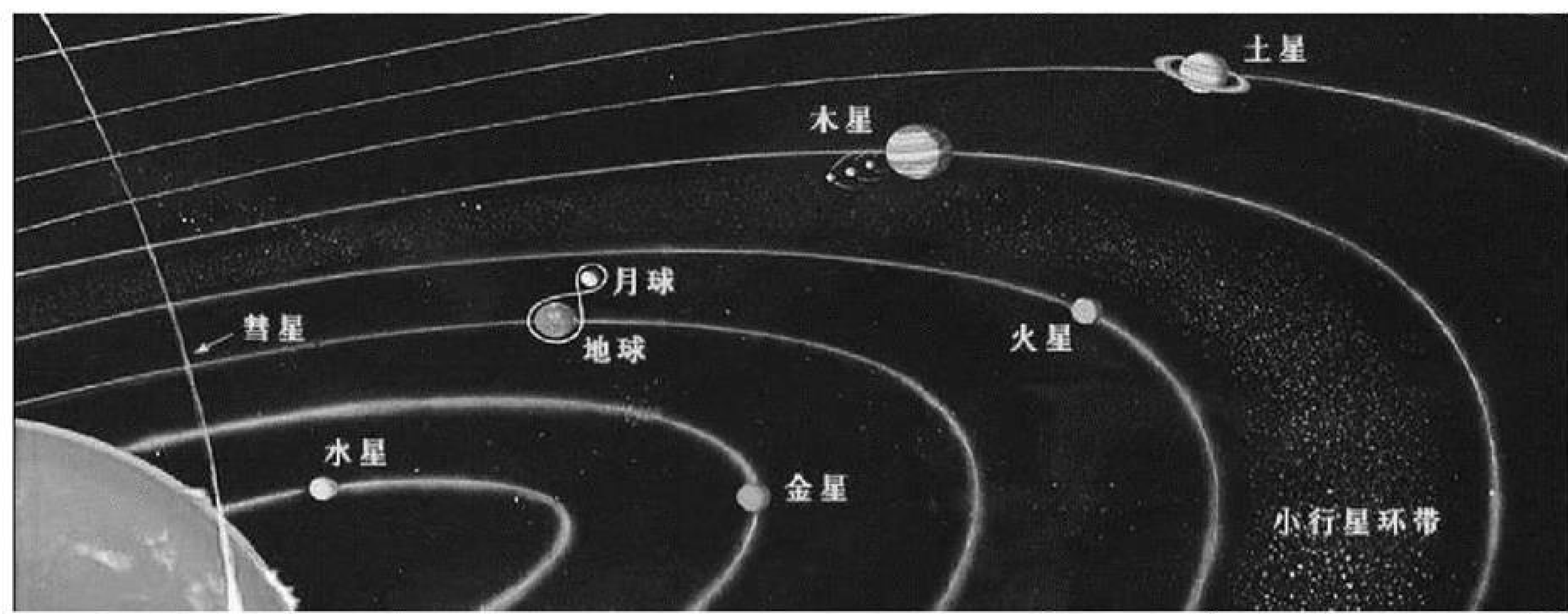


图 11－6　太阳系日、月、地球及五大行星的排列

人与地球	→	月亮与金星	水星	太阳与火星	木星	土星
读	→	金	水	火	木	土
听	→	最清	次清	清与浊之间	次浊	最浊
距离	→	最近	次近	近与远之间	次远	最远

根据人们在大自然中距离事物和声源越近，看到和听到的就会越清楚和越清爽；距离事物和声源越远，看到和听到的就会越模糊和越浑浊这个自然的法则和客观的规律，将金、水、火、木、土这五个字声音读法的清浊也就进行了人为的规定。“月与金星”离我们最近，使得“金”字的声音读法最清，“水”字的声音读法次清，“火”字的声音读法在清与浊之间，“木”字的声音读法次浊，“土”字的声音读法最浊。这是因为在大自然中，人们在金属镜面和平静的水面能清楚地照见自己的影像；在火焰中能恍惚看到自己的影像，在日光、火光的映照下会产生自己的阴影图像；而在木板和土地上根本就看不到自

己的影像。所以它们的声音读法就这样由清到浊地符合着大自然的变化法则和客观规律。

即使读者现在试着读出“金、水、火、木、土”的声音，不管是从读法上，还是从听力上，你就会非常自然、容易、明显感觉出清与浊的读法和声音是在按上面的顺序排列的。

第三节　汉语言中天地人合的易学哲学思想

以仓颉为代表的智慧古人还将人说话时的口腔形象地思维成了一个独立的太极单元，这个独立的太极单元在说话的时候与肺部其实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在这个独立的太极单元中：

1. 将口腔上齿腭部位的上膛想象定位成天，就是大气层之内。
2. 将口腔下齿腭部位的下膛想象定位成地。
3. 将口腔中受人体枢纽中心指挥的那个舌头则想象定位成人。

这样以仓颉为代表的智慧古人们便形象地思维成了：

1. 将舌头在口腔当中婉转自如地跟上齿腭的上膛部位发生关系时，或基本没有牵动下腭发生明显的打开动作时，所发出的汉字读法的声音就想象成天人合一。

2. 将舌头在口腔当中婉转自如地跟下齿腭的下膛部位发生关系时，或下腭发生了打开的动作时，所发出的汉字读法的声音就想象成为了地人合一。

3. 由心这个人体的指挥枢纽中心发出了指令而受到指挥的那个婉转自如的舌头，则成为了天地之间的人，所以舌属火，与人心相同。

比如，在最典型的读法中有：

天、键、乾：舌头在口腔当中自如地跟上齿腭的上膛部位发生了关系，发出声音时比较注重字的上半个声部，牵动下腭发生打开的动作很轻微，这种读法也可以叫做天人合一。

地、川、坤：舌头在口腔当中自上而下自如地跟下齿腭的下膛部位发生了关系，发出声音时比较注重字的下半个声部，下腭并发生了明显的打开动作，这种读法也可以叫做地人合一。

人：舌头在口腔正中自如地跟门齿的部位跳动着发生了关系。

这就是中国智慧的古人在原始社会时就已经从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古老的天地人合的科学思想文化体系，并将这种自然科学思想体系所演变出来的思想文化紧密地结合应用到了创建汉字声音读法的规律当中来了。

以仓颉为代表的古人将所造出的汉字，在声音读法上还规定了：

1. 有清，有浊。清代表天，浊代表地。
2. 有轻，有重。轻代表天，重代表地。
3. 有声，有音。声代表天，音代表地。
4. 有阳，有阴。阳代表天，阴代表地。
5. 有静，有动。静代表天，动代表地。
6. 有辟，有翕。辟代表天，翕代表地。
7. 有唱，有和。唱代表天，和代表地。
8. 有上，有下。上代表天，下代表地。
9. 有吕，有律。吕代表天，律代表地。

比如，用下面这六十（还有很多）上下相互对应的字来例证它们在读法上的区别：

天、乾、键、清、轻、声、阳、动、雅、唱、上、左、日、头、善、爹、父、中、男、哥、
地、坤、川、浊、重、音、阴、静、俗、和、下、右、月、脚、恶、娘、母、外、女、姐、

弟、夫、精、明、智、笑、大、开、白、生、真、易、主、吕、高、歌、风、读、诗、知、
妹、妻、粗、暗、愚、哭、小、闭、黑、死、假、难、仆、律、低、舞、雨、写、词、识、

子、手、辟、正、近、好、站、强、顶、进、去、是、对、平、虚、美、圆、辉、形、春
女、脚、翕、歪、远、坏、蹲、弱、底、出、来、非、错、斜、实、丑、方、晦、性、秋

代表天的这六十个汉字的读法，是舌头跟上齿腭的上膛部位发生了关系后从口腔里发出了声音，发出声音时比较注重字的上半个声部，读起来的感觉就显得非常的轻松、爽朗、干脆、简单、明了，很精神。而代表地的这六十个汉字的读法，是舌头跟下齿腭的下膛部位发生了关系后从口腔里发出的声音，发出声音时比较注重字的下半个声部，读起来就有一种混浊和拖泥带水的感觉，比较而言就没有代表天的这六十个汉字读起来那么清爽、容易。

从中还可以看出，我们古人的天地人合的自然科学思想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以及中国古人二元二分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天在上，地在下。难怪连古书文字的顺序都是以这样竖版的形式进行排列的。

以仓颉为代表的中国智慧的古人还将所造出的汉字在读法上做了规定：

1. 有与天体中日、月、星、辰相对应的平、上、去、入；
2. 有与地球上水、火、土、石相对应的开、发、收、闭。

这两句话如何理解呢？其实就是在强调汉字读法的四个声调。

如果我们把天体看作一个太极单元的话，那么天体中的日（太阳）、月（月亮）、星（星系）、辰（地球）的运动法则就是不变的，是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前提必须是以原始古人在那时的认识和感觉为中心，这个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相对于人的生命时间来说，就可以说是永恒的了。比如：

太阳每天露出地平面的时间过程对应着平（调）；
太阳每天在上升的时间过程对应着上（调）；
太阳每天在下降的时间过程对应着去（调）；
太阳每天落入地平面在等待第二天的升起的这个时间过程对应着—入（调）。

其余的月、星、辰也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如果我们把人在地球上生活的范围看作成一个太极单元的话，那么地球上的水、火、土、石的运动法则就是不变的，就是有客观规律的，前提必须以原始古人那时的感觉或认识为中心，这个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相对于人的生命来说，也可以说是永恒不变的了。比如：

水在平地上漫延散发开的时间过程对应着开（调）；
水受热变成水蒸气在蒸发的时间过程对应着发（调）；
水在空中受冷凝聚成雨滴落下来的时间过程对应着收（调）；
水从江河流到湖泊积聚在一起等待再一次漫延散发开的时间过程对应着闭（调）。

花朵从花蕾慢慢打开的时间过程对应着开（调）；
花朵从慢慢绽放到完全打开的时间过程对应着发（调）；
花朵从枯萎到完全凋谢的时间过程对应着收（调）；
花朵最后形成种子等待再一次发芽绽放的时间过程对应着闭（调）。

以此类推，地球上水、火、土、石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就表现在：

水是可以漫延开和蒸发起来的——开（调）；
火焰的升腾是向上绽发的——发（调）；

土是能收成一堆并是可压缩的——收（调）；
石头的表面和内部是完全而坚实地封闭在一起的——闭（调）。

以仓颉为代表的古人为汉字的读法、声音的声调规定了平、上、去、入和开、发、收、闭这样的一种声调规律，这两种声调是完全对应的，只是叫法不同；与我们今天普遍使用的《新华字典》中的“声调”符号也是类似的，也只是在叫法和排序上略有不同而已。

古今声调的对应关系：

古：	平（声调）	上（声调）	去（声调）	入（声调）
	开（声调）	发（声调）	收（声调）	闭（声调）
今：	阴平	阳平	去声	上声
	—	/	\	V
	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第四声

声调是古人在造字时为了严格区分开分别属于阳和阴以及天和地的汉字而制定的。归类到天的汉字都属阳，对应的是平、上和开、发的声调；归类到地的字都属阴，对应的是去、入和收、闭的声调。

这样，以仓颉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人们把所造出的汉字结合附加了上面这些诸多规定的读法，形成了符合大自然客观规律的声音组合。文字读法也便具备了从太昊伏羲氏时代就形成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读音，反映了中国古代天地人合的科学思想文化的自然世界观，是符合大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的声音，并最终形成了现今13亿中国人都在使用的，与宇宙、天地、大自然以及万事万物关系最密切、最和谐、最优美动听的汉语。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陆续挖掘出土了一批殷商时期的龟甲，上面刻有中国最古老的系统汉字——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古人最早在殷商时期就系统采用文字用于记录国家大事的铁证，而古汉字中的天干和地支则是在记录国家大事的时间日期时所必不可少的文字（图5－32），上面的文字也可以说是以仓颉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人所造出的汉字。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它们在读法、声音上的区别。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让我们再按五行的性质将天干和地支分类地上下对应起来：

木	火	土	土	金	水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寅　卯	午　巳	辰　戌	丑　未	申　酉	子　亥

读者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上下对应比较着读了，也可以上、下干、支对应着组合起来读，还可以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天干循环六次和地支循环五次组合起来读，就是带着声音的感觉来品味六十甲子的读法。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不论你怎样读，怎样感受，都会同样的发现代表天的这十个天干汉字与代表地的这十二个地支汉字比较一下，读起来就非常的轻松、清爽、简单、明了，有很干脆的感觉。而代表地的这十二个地支汉字与代表天的这十个天干汉字读起来比较一下，就也有一种混浊和拖泥带水的感觉，比较而言就没有代表天的这十个汉字读起来那么干脆。

这也就是以仓颉为代表的中国古人为造出来的汉字赋予了具有声音的读法，把人心所指挥的舌头当作了一个人后，将天干和地支在口腔之内的上下膛之间，应用了天地人合的思想文化体系，拼读组合起来了六十个具有了宇宙大自然和万事万物灵魂的天地人合的六十甲子。这也是宇宙大自然中具有灵魂的万事万物在年复一年的时间轮回中，始终都在重复进行着一种永远都没有停止过的、充满着生命力的运动。

让我们再来看殷商时期用于记录国家大事的时间日期时所必不可少的数字，并按代表天地、阴阳、单双、奇偶的区别上下对应起来。

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天、阳、单、奇：　一　三　五　七　九
地、阴、双、偶：　二　四　六　八　十

读者在这个时候可以上下对应比较着读，也可以上下对应组合连接起来读，

代表天的这五个数字汉字读起来就非常的轻松、清爽、简单、明了，很干脆。而代表地的这五个数字汉字读起来就也有一种混浊和拖泥带水的感觉，比较而言就没有代表天的这五个数字汉字读起来那么容易，那么干脆。而且代表天的这五个数字汉字读起来都是平、上和开、发的声调，而代表地的这五个数字汉字读起来都是去、入和收、闭的声调。从这也可以看出，我们古人在更早的时候所具有的二元二分论的思维方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哲学事物，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由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诡辩家篇》中完成的。事实上，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之一正是逻各斯，我们首次遇到这一术语是在论及毕达哥拉斯与赫拉克利特的时候。它包括语词、量度、准则、论证、原因等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想抓住希腊哲学的精神，就必须牢记这一系列含义的重要性。“逻辑”这个术语显然就是由它派生出来的。逻辑学就是有关逻各斯的科学。[1]

本章所阐述的内容，正好符合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语言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哲学事物。

---

①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174页。

| 第十二章 |

殷商时期的易学文化

第一节　殷商时期的天学与六十甲子表

一

关于殷商时代与天学有关的大量信息，我们可以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获得。这些大量的信息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干支和历法；天象记录；与天象有关的用语。

1. 干支和历法

甲骨文是中国古人早在殷商时期就系统采用文字用于记录国家大事的铁证，而古汉字中的天干和地支则是在记录国家大事的时间日期时所必不可少的文字。其中的六十甲子表就是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天干循环六次和地支循环五次组合起来的产物。

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让我们再按五行的性质将天干和地支分类地上下对应起来：

木	火	土	土	金	水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寅　卯	午　巳	辰　戌	丑　未	申　酉	子　亥

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天干循环六次和地支循环五次组合起来，就形成了六十甲子：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殷商时代的历法已经可以用六十甲子的天干地支来记年、记月、记日、记时了，这可以从大量的甲骨卜辞中看得出来。

2. 天象记录

目前根据国内专家的研究，卜辞中可以肯定或基本可以肯定的天象记录至少有四类：

第一类：日食。[①] 例如：

贞，日有食。

甲寅卜又食，告。

癸酉贞，日夕又食，唯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

第二类：恒星。例如：

丙申卜㱿贞……乙巳酒……㪍卯鸟星。

其侑火。

贞，佳火，五月。

有新大星并火。

第三类：新星。例如：

七日己巳夕㞢有新大星并火。（图 12－1 上所刻文字为公元前 1300 年卜辞。）



图 12－1

① 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 3 页。

辛未有毁新星。

第四类：月食[1]。例如：
旬壬申夕月有食。
癸未……之夕月有食。
七日己未豈庚申有食。

3. 与天象有关的用语[2]
卜辞中与天学有关的用语甚多，这里略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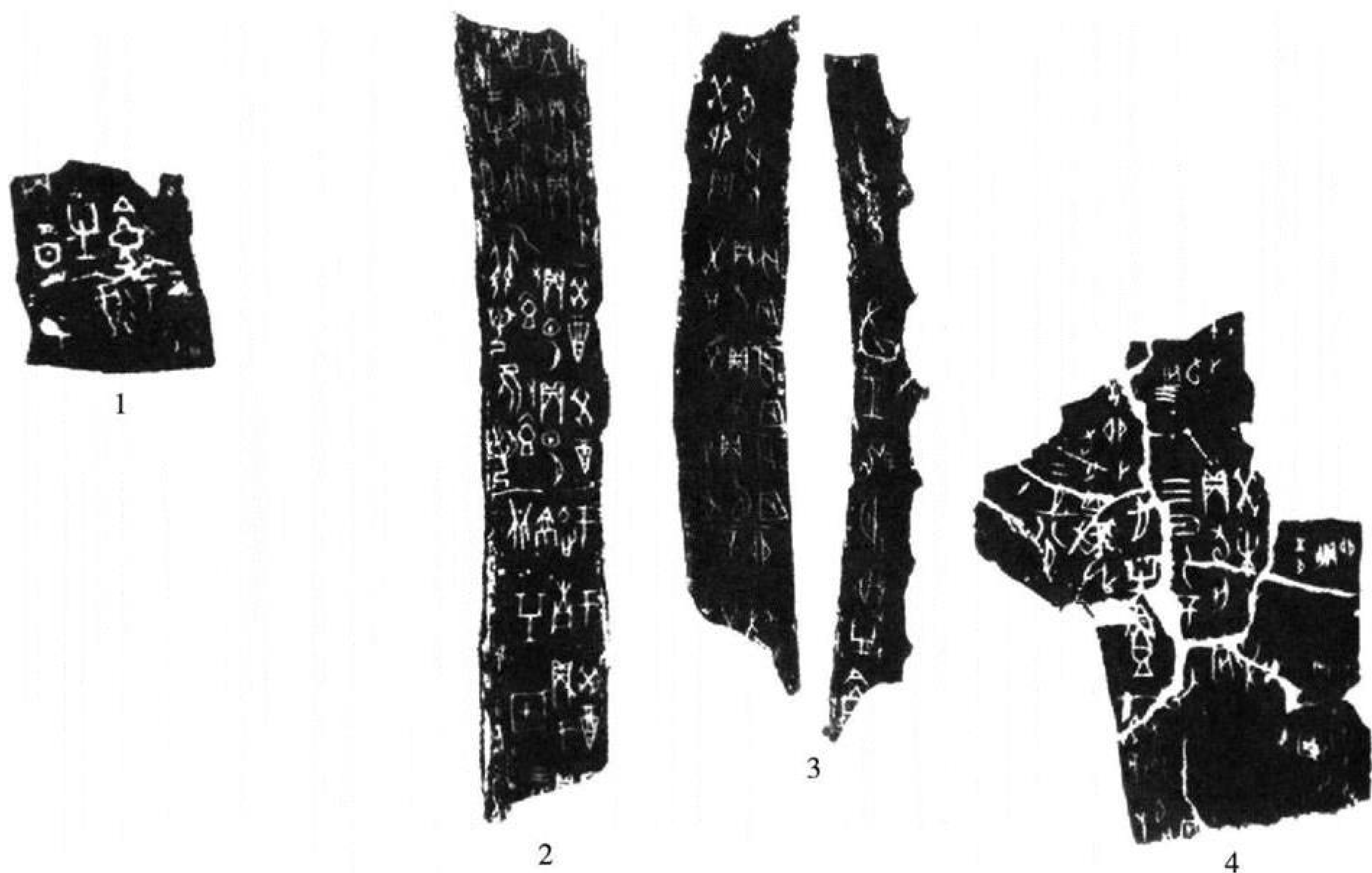
天——可以指人的头顶、大脑等；
日——可以指太阳、日神、时间等；
月——可常与“夕”字接近；
晶——可以指“星”之本字；
鸟——也可指星名等；
火——也可指星名等；
食——可以引申为日食、月食等；
斗——可以形象地认为星宿中的南斗、北斗等；
岁——既可以指年，也可以指岁星（木星）等。

从远古时代在中国古人的眼里，天文、气象就都归于天学，都归属于中国易学文化的范畴。大量与大气现象有关的用语，如云、雨、雹、雷、雪、雾、虹等字义就与天学有关，还有一些现如今已与天学没有多大直接关系的字在卜辞中却是在指天象，这里也略举如下。

勿——可以指云气之色；
申——可以形象地认为是闪电，“电”之本字；
启——可指天气晴朗、万里长空；
覓——可指云层中有日光散射而下；
㝠——可指天空浓云密布；
每——可指天气昏暗阴沉，即后来之“晦”。

---

① 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页。
② 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页。



组图 12－2　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天象记录①

1. "日有食"拓本　2. "癸酉贞日夕又食"拓本　3. "旬壬申月有食"拓本　4. "乙酉月有食"拓本

组图 12－2 中的这些文字资料都可以说明在殷商时代，中国古人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天学知识储备，对天象变化的观测已经可以用一些准确的词汇来表达记录了。

第二节　周易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

如果笔者说《周易》是一部涉及中国最古老的有关语言文字的作品，可能大家会认为很不恰当。但《周易》中 386 个卦爻辞语句的描述，又无可争辩地涉及中国的古汉语和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里面的古汉语又与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六爻筮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许多人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科学与学科都无不开始于哲学的探索，哲学又具有逻辑性。

因此，笔者认为，《周易》可谓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一部最古老的著作，也可以反过来说，中国最古老的语言文字就诞生于易。

---

① 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 49、50 页。

现在的许多人都只知道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在国学中是一部能进行信息预测的卦书（筮书）。这种认识也并不全错，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分析判断的功能。但如果把《周易》仅仅看作筮书的话，这种认识就未免太狭隘、太肤浅了。

既然说到《周易》的筮法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笔者就在此简单说一说六爻筮法。

一 中国最古老的教育方式和语言文字都来自于易学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爻”这个汉字。从形式上可以看出，它是一个阴阳反复相交的结构。而在“教”和“学”的甲骨文字结构中，也都有“爻”字和“子”字，“教”和“学”是两个相对的字，“学”是阴性的，“教”是阳性的，就像“认识”是阴性的而“实践”是阳性的一样。



所以“爻”字表现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从认识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反复过程，而事物又总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从“教”和“学”字的“子”字中还可以看出，在当时“爻”与反复学习是有着很紧密的关系的，就是要不断地从头（子代表头）学起，反复地实践，“子”字在此并非仅指小孩子。

不过在此我们却看出了华夏大地上的人们，在上古的时代，不管是学习的一方，还是施教的一方，只要人们相互交流，都必须使用古汉语文字这个工具。即使是今天人们施教和学习的过程中也同样离不开汉语言文字这个工具，而古汉语言文学中的汉字“教”与“学”又与“爻”字密不可分，说明中国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与易学的六爻易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在中国最古老的教育方式中，先生的教与小孩子的学都与易学有关，都是先从易学学起。

中国最古老的语言文字也是来自易学，但这种最古老的语言文字的形式和使用方法到了殷商时，也只能被当时社会上层的极少数人所熟悉而据为己有，成为上层建筑，并只能为统治者服务。

二 在六爻易术逻辑分析的基础理论中，到处充满了另一类中国最古老的语言文字与中国哲学的气息

1. 三合局里所有的驿马星（寅、申、巳、亥）在用六爻易术这种最古老的另类汉语言文字形式中，都是活跃的动词要素，表示事物是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这是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三合局是在归类地特指和泛指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例如：其中的申子辰三合就是在用这种最古老的另类语言文字形式描述大自然中自然形成雨水、河水等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还有申子、子辰、申辰的半合局，寅午、午戌、戌寅的半合局，巳酉、酉丑、丑巳的半合局，亥卯、卯未、未亥的半合局，这些都是一种合的趋势，在合的过程中，也要看是哪个主动和哪个旺，这样合成的情景结果就会有所不同。三合局还有归类地泛指许多其他的意义，读者可以自己去感悟。

2. 三会局里所有的驿马星（寅、申、巳、亥）在用六爻易术这种最古老的另类语言文字形式中，也都是活跃的动词要素，表示事物是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也特指形成大自然的某一综合段的时空，或某一个综合角度的方位，或某一个综合的局面，或某一种综合的环境，或某一个综合的条件等要素，这也是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三会［汇］局是在归类地特指和泛指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形成过程。例如：其中的亥子丑三会［汇］就是在用这种最古老的另类语言文字形式描述大自然中形成的雨水、河水、泥泞的这样一种大洪水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以及冬天亥子丑三个月最冷的环境局面和客观时空条件等。

3. 在六爻易术的逻辑分析中，一个名词只要与另一个名词之间具备了生、克、泄、冲、害、刑、会、合的条件，那么此时的这个名词立即也具备了动词要素的功能，而会与另一个名词相互发生作用。例如，子生卯、子也刑卯中，子既表示名词“水”，也具备了动词“生”和“刑”的意义。

4. 子孙、妻财、官鬼、父母、兄弟、世、应这些词汇所代表的意义：

子孙：生机、生命、机能、生物、动物、小孩子、苗头、财源、福气、规律、秩序、工艺、秩序、健康、医药、医生、卫生等；

妻财：妻子、小妾、能量、富饶、富裕、资源、财富、食物、钱财、物品等；

官鬼：官员、官位、表率、约束、管理、壮观、壮丽、匪盗、灾难、疾病、糊涂、困惑、艰难、困苦、战斗等；

父母：大自然、事业、安全、保护、庇佑、文件、文章、组织、纪律、法律、制度、父母、家庭、房屋、车船、教育、成功、名气、环境、权力、国家、江山、社稷、百姓、人民、军队等；

兄弟：大规模、势众、势力、帮助、团结、朋友、兄弟、姐妹、破财、劫财、亏损、损失、损伤等；

世爻：在另类古代语言文字中准确地表示自己、本人、我方、己方的人称代词，身在主体现象和变化现象事物发展过程之中，并在观察、思考、认识和执行的局中人；

应爻：在另类古代语言文字中准确地表示此事、对方的指示代词，事物变化的起源与事物变化的结果，对方的开始与对方的结果。

在六爻易术的逻辑分析中，它们分别都被当做名词和被归类以后的代词在使用，有时也分别都被当做动词和形容词在使用，从而构成汉语言结构的主语、谓语、宾语和定语、状语、补语。

5. 子孙、妻财、官鬼、父母、兄弟、世、应，经过归类后所代表的事物含义：

子孙：能源、生机、生命、机能、机会、生物、动物、小孩子、后代、苗头、财源、果实、种子、福气、规律、规矩、秩序、工艺、工序、健康、医药、医生、卫生、子弟兵等；

妻财：妻子、小妾、能量、富饶、富裕、能源、资源、财富、食物、钱财、货币、丰收、收成、物品、病源、祸源、灾源等；

官鬼：官员、官位、表率、约束、管理、控制、壮观、壮丽、妖娆、匪盗、骗子、灾难、疾病、糊涂、高价、困惑、艰难、险阻、困苦、军队、战斗等；

父母：大自然、事业、安全、保护、庇佑、文件、文章、组织、纪律、法律、制度、父母、身体、家庭、房屋、村庄、车船、教育、成功、名气、环境、权力、国家、江山、社稷、百姓、人民、军队等；

兄弟：大规模、势能、势力、势众、众多、联合、帮助、借助、团结、朋友、兄弟、姐妹、破财、劫财、亏损、损失、损伤等；

世爻：自己、本人、我方、己方，身在主体现象和变化现象事物发展过程之中，并在观察、思考、认识和执行的局中人；

应爻：此事、对方，事物变化的起源与事物变化的结果，对方的开始与对方

的结果。

6. 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经过归类后所代表的事物含义：

初爻：开始位、基本位、基层位、基础位、地表位、脚部位、百姓位、农民位等社会底层的位置；

二爻：地面位、运行位、行动位、转换位、心理位、嘴位、手位、腿位、臀部位、生殖位、门口位、房屋位、床高度位、篱笆高度位、车轮位、工人位、小商贩等社会阶层的位置；

三爻：半太空位、半天空位、过程位、轨道位、道路位、旷野位、田野位、庭院位、半山腰位、身体位、腰腹部位、手臂位、社会位、城市位、白领等社会中产阶层的位置；

四爻：半太空位、半天空位、过程位、轨道位、道路位、旷野位、田野位、庭院位、半山腰位、身体位、胸部、背部位、臂膀位、社会位、城市位、金领等社会中高产阶层的位置；

五爻：太空位、天空位、核心位、运行位、转换位、国家位、政府位、心脏位、心理位、眼位、头部位、脑部位、院墙高度位、君王等社会高层、实力、实权的位置；

六爻：太空位、天空位、结束位、结果位、头顶位、脑子位、山顶位、尾巴位、老人位、退休位、安逸等社会阶层的位置。

在六爻易术的逻辑分析中，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它们分别被当做自然空间高度或人体位置高度的指示代词，被当做社会阶层高度的指示代词或被当做事物发展过程的指示代词在使用，有时也分别被当做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在使用，来构成另类汉语言文字语句结构的主语、谓语、宾语和定语、状语、补语。

7. 所有的天干、地支都是代表着很多意义的指示代词。

例如，甲、乙、寅、卯既代表着方位的意义，也代表着开始的意义；既代表着植被、植物的意义，也代表着动物的意义；既代表着时间的意义，也代表着空间的意义；既代表着 1、2、3、4 的意义，寅也代表着马星、动作的意义；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8.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仅有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内容，其中的六爻易术中还有许多涉及数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内容。由于易的思想文化来自自然，那么占卜这个易术的根也同样在自然当中，当今社会的所有科学学科都

同样来自哲学，包括“数”与数学，而哲学又来自自然，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就一定存在数学与哲学的关系。

我们用数学公式 $1+2+3=6$ 来表示六爻术，其解释为：一个主体现象，事物的两面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过程，每个阶段的过程及结果都有其矛盾的两面性（即六爻）。

我们用数学公式 $2^3=8$ 来表示六爻术，其解释为：通过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出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现象（八卦）。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任意两个代表“三”生万物意义的这个三的八卦符号摞在一起就成了“六”（六爻）。上卦也为天，下卦也为地，世爻为当事者，应爻为所面临之事，并按一定的客观规律相互作用、运动和发生关系，即表示被归纳了的万事万物在六爻术中以阴阳五行生、克、泄、冲、合、会、刑、害（穿）等的逻辑关系在大自然中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发生着非常自然的演绎关系，人们由此便推演变化出了一个最终完全平衡而全新的自然现象。

在中国的古文明文化中，易和医（中医）是同源的。在古中医学当中，根据“天”与“生物”的“宇宙生物观”，发现了大自然的“五运六气”；根据“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一样，也是有“五运六气”的。“五运”说穿了就是与天的“五行”是对应的，“五行”就是五行，它们都是气［古人称之为炁］，都是在指天［或天气］的运动状态，如春夏秋冬和四季（此四季的季是伯仲季的季［辰戌丑未］），在易学文化基础概念中可以是天干“甲己合化土”、“乙庚合化金”、“丙辛合化水”、“丁壬合化木”、“戊癸合化火”的状态，只不过在天的“五行”与在地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是对应的。“六气”在易学文化基础概念中可以是地支“子午冲”、“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巳亥冲”的状态，就是三阴三阳的太阴湿土、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和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少阳相火。三阴三阳一气周流转一圈，既可以是地球大自然生命运动的一天，也可以是地球大自然生命运动的一年，还可以是人体生命运动的正常运行。所以三阴三阳这六气的运行变化归根结底也就是一气在周流，就像“六气”与“六爻”一样的运行变化，圆满地形成了一个太极的事与物的运行变化。《系辞上传》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就说得非常清楚，其中的“三极”既可以是天地人三才，也可以是三阴三阳的六气，这套理论在黄帝、岐伯、扁鹊、张仲景那个时代就已经很完备了，古圣皆知，唯后人不解。

《内经》中说：“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天”就是天干，“地”就是地支，意思是说天干和地支相互搭配组合，天干循环六次，地支循环五次，就形

成了一个六十甲子的圆周，六个六十甲子为三百六十，正好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了三百六十天所形成的一年，这也恰好是在地球上的动植物经过了春天的苏醒与发芽、夏天的发育与生长、秋天的长成与收获、冬天的冬眠与收藏这么一个“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完美过程，所以中国智慧的古人就用“六爻术”来代表大自然中所有“事物”的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过程。西方的毕达哥拉斯派也认为，6是一个完全数，这是因为6既能被1、2、3整除，同时又是这三个数的之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完整的卦象的变化要用这个六爻易术的理论来概括表示和分析说明的缘故。

通过前面可以看出为什么从上古时期流传至西周的中国另一种最古老的语言文字的体裁形式，以及各种语句和词汇的另类记叙方式的独特魅力。可惜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来自易学的另一种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字中断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看明白，更别说能熟练地使用了。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又可以从此看出中国易学博大精深的文化渊源了，但这还有待于所有的研易者们去做进一步的挖掘和保护工作。

通过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周易》的六爻筮法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现代所有学科的诞生都没有离开过逻辑与“数”，没有离开过哲学与大自然。

第三节　易学与逻辑学、占卜学

在公元前的1100年左右，中国的殷商王朝进入了末期。那时，在今天陕西省的岐山一带，有一个被殷王朝所封的诸侯边国，这个边侯国到了姬昌继承西伯侯之位的时候，姬昌就被称作了周文王。那么为什么要叫做周文王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皇帝不同的称呼与时代等多种因素有关。唐代之前的皇帝多用谥号称谓，先秦的君主也多称谥号。谥号是古代君主、帝王死后，后继者根据其生前品行所给予的一种特殊称号。周文王这个谥号，说明姬昌在一生当中，他的品行在老百姓当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具有非凡的文化才气。


图12－3　周文王像

周文王（图12－3）不但精通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筮法理论，在他执政西岐之国的这段时期里，还能将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哲理在治国安邦、教化百姓、发展经济等各个领域加以实践和应用，使西岐的综合国力迅速的提高，在殷商末期的

王朝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同时也使得在朝歌的殷纣王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便把他诱进朝歌，囚禁在了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就在他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的那段时间里，他还能历经艰难险阻，冒着随时被杀头的危险，不忘刻苦钻研易学，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反复推演八卦，最终著成了中国最伟大的一部经典之作——《周易》。

《周易》这部书，后人也称《易经》，但是把它称为《周易》会更准确一些，意思就是大自然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法则，它被中华民族研究传承了几千年而经久不衰。

现在的很多人都只知道《周易》是一部能进行信息预测的卦书，却不知道《周易》曾是我国智慧的先祖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根据天文、地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在时空当中的生长、运行规律而归纳、总结、演绎出来的自然运动法则，是我国智慧的先祖从原始社会和夏、商、周时代通过对《河图》《洛书》与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和《连山易》《归藏易》不断完善而形成的这个独特的与宇宙自然的时空运行系统完全符合的华夏思想文化体系百科全书，是一部中华先人最早向世界人类的文明奉献的揭示宇宙大自然奥秘的巨著。

为什么能够利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进行占卜和预测呢？

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进行了系统的归类。这是因为自然界中所有的事物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万事万物都在相互依存、共同衍生，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变化规律和属性，而且它们所具有的变化规律都遵循着宇宙大自然共同的自然运动法则，和谐地共同繁衍。如果以物拟物、以事拟事，则它们彼此之间的形象就具有某种相似性——形象相似的关系，能够将事物的范围进行界定，进行形象推理；它们之间的属性也都具有自然五行和十二地支之间的相生相克、相冲相合、相会相害、相刑相化等逻辑关系，能够进行系统地逻辑推理，就像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样。所以利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能够进行占卜预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易学文化体系中的预测、占卜方法中，既利用了自然界的事物之间具有形象相似的关系和人们具有形象思维的方法，也利用了自然界的事物之间具有逻辑的关系和人们具有逻辑思维的方法。如同科学技术中的发明创造，既有着直观的创造性形象思维的信息，也具有严谨缜密、能够推导论证的逻辑思维的信息。比如，今天飞机、轮船、汽车的发明，造型和模样就是形象思维的结果，结构尺寸、动力系统、智能系统等数据的合理与否则都是通过反复演算和求证而获得的结果，它们都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共

同产物。同时在整个发明创造的过程中，这两种思维的关系自始至终都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正是这两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完整互补的系统思维方式，才形成了今天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创新的思维方式。

即使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只注重逻辑，就会陷在逻辑当中上当受骗，有的时候在一个跨多个领域、充满多学科的项目研究中，它会把人们偏离一个方向，甚至是偏到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去。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领域的发明创造中既有着直观的创造性形象思维的信息，也具有严谨缜密、能够推导论证的逻辑思维的信息，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

就像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中国智慧的古人的哲学观中，对事物的认识强调的是关系实在论，而不是物质实在论。他们强调自然万事万物的依存与衍生既不是阳也不是阴，而是阴阳相冲相合所产生的中间的那个气——中气，是阴阳发生了关系所致。就像人的生命是这个中气，动植物的生命也是这个中气，国家与社会的生命还是这个中气，万事万物的生命都是这个中气。所以从这个理论来讲，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依存与衍生都是相通的，它们的形象和属性都是可以系统归类，都具有自然的逻辑关系。

著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和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将中国与欧洲的哲学和自然的科学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之后，在其所著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下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欧洲的哲学倾向于在物质中发现实在，而中国的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发现实在。”这一点只要通过对 1972 年马王堆考古的工作中挖掘出土的珍贵文物——帛书《周易》进行系统地考证即可知道，只不过《周易》是用了在当时中国古代智者中的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带有中国哲学意味的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的一种另类体裁形式在描述而已。《周易》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特征的百科全书，完整而系统地描述了公元前 1100 年前的文明，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与科学的系统认识。

笔者可以十分地肯定，《周易》这部书确实是周文王写的，《周易》这部书也将我们最系统的华夏思想文化和科学文明一下向前延伸了 600 多年。

但《周易》这部书中用于逻辑分析的五行系统理论和被系统归纳了的基本概念以及从初爻到六爻有规律的系统变化过程，又是怎么来的呢？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周文王是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之上而著的《周易》，说明易学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知识，早在商朝之前就已经非常成熟且成体系了。

殷墟是商朝盘庚至纣的王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从 1928 年起，考古工作者经过近 60 年的挖掘，从 10 多万片大量带文字的甲骨文片中，

整理出了约4500个单字。这些单字基本具备了汉字的结构，被用于卜辞记录刻写。在商朝，除了甲骨文以外，所发现的文字记录还有金文（铭文、钟鼎文）、陶文、简册等，所以周人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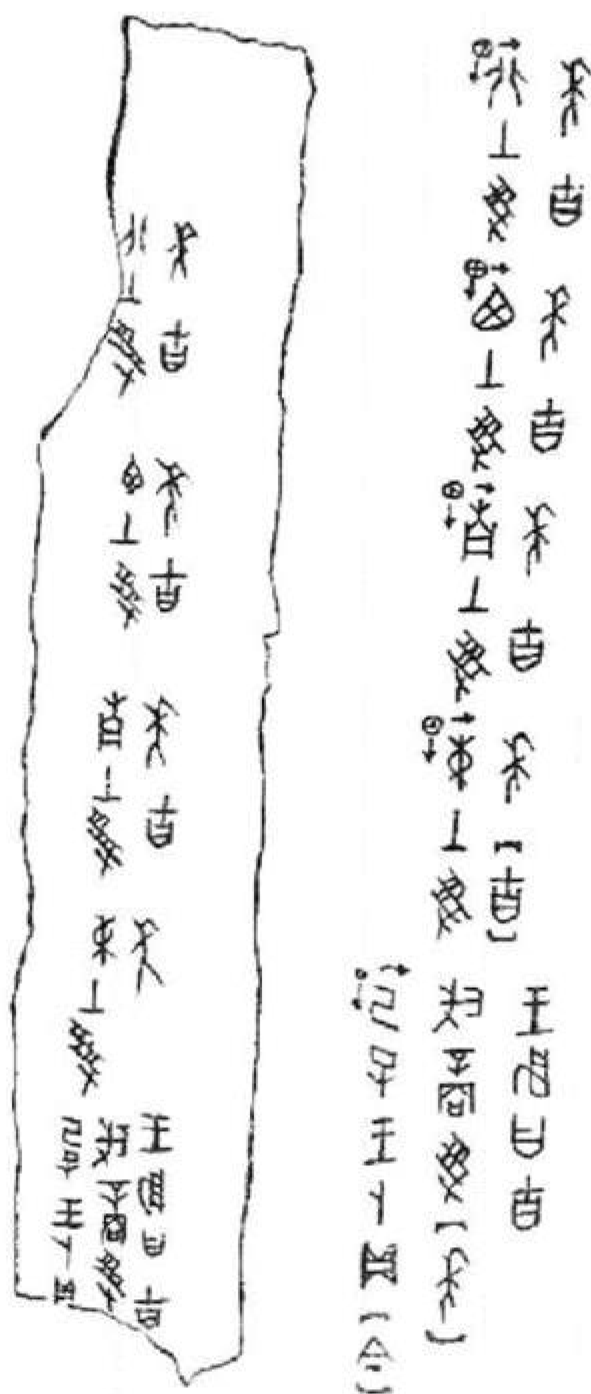


图12－4

图12－4为选自汉语言文字专业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甲骨文《受业》、由郭锡良和李玲璞主编的《古代汉语》（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的名为《受年》的甲骨文中的图片。

这篇甲骨文契刻在牛胛骨上，骨已残。出土后最早著录在郭沫若先生《殷契粹编》第907版，现收入《甲骨文百集》第36975版。题目是教材的编者所加。这是一篇商代人祈求农作物丰收的预测占卜记录。正文中用［ ］表示根据甲骨文辞例所补的文字。

释文：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

就是说己巳这一年东西南北方地区的农作物收成形势总体会非常好。那么他们是怎么预测的呢？根据又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用易学文化中的六爻筮法理论来分析一下《地母经》中对己巳年的农业预测情况。

己巳年

1. 太岁姓郭名灿

2. 诗曰：

太岁己巳年，鱼游在路衢。
乘船登陇陌，龟鳖入沟渠。
春忧多潦浸，杨楚及胡苏。
早禾宜阔种，一颗倍千株。
蚕娘哭蚕少，桑叶贵如珠。

3. 地母经曰：

岁里逢蛇出，人民贺太平。
桑麻吴地熟，豆麦越淮青。
多种天仙草，秋冬仓廪盈。
虽然多雨水，黎庶尽忻欢。

剥［剥］（情景现象）



（1）对“姓名”之说的逻辑分析。

“己巳”在“天干”和“地支”排列组合成的“六十甲子”中，排在第六位，纳音为“大林木”，五行属木，“戊辰”为此“大林木”中的阴木。

剥［剥］卦是键［乾］宫八卦的第六卦，五行却属金。剥［剥］卦在“后天六十四卦”次序图中排在第六位，虽然“己巳”的纳音与键［乾］宫的五行属性不同，但古人还是将“己巳”与剥［剥］卦对应起来，目的是使得“六十

甲子”与“后天六十四卦”的次序分别都为第六位的关系给对应起来。

用十二律中与仲吕羽调（五行属水）相对应的尺寸或重量为基准，制作出来的音响器物（乐器），在吹、敲、击、弹、拨或其他多种演奏的形式下，会发出声音，由于水能生木，从这个十二律六十调（五行属水）的音响器物（乐器）里所发出的声音——仲吕羽调就与木的属性相配合了。若以黄钟宫调为调首，仲吕羽调在十二律中的位置则排在第六位，这样“己巳”自然就与这个十二律中的仲吕羽调对应上了，并且给“己巳”人为地归纳了一个名字叫做“大林木”的木音。而且在读“己巳”这两个字时，所发出的声音五行中却含有着属火的特征，原因是此火被“大林木”生起来的缘故。

“郭”姓汉字的前半个声部读 g，是用口腔中牙的部位发出的，五行属木，“郭”字的后半个声部读 uo，也是从口腔唇与牙的部位发出的声音，五行有水木的特征，所以在读“郭”字时，发出的声音中主要具有五行木的属性；“灿”字的前半个声部读 c，是用口腔中的气流通过舌齿的部位发出的，五行属火，“灿”字的后半个声部读 an，却是用口腔中牙的部位发出的声音，五行属木，所以在读“灿”字时，发出的声音中也同样具有五行木的属性。

因此，这个姓名为“郭灿”的声音读法的五行属性与“己巳”“大林木”的纳音五行的属性就基本准确地对应起来了，五行都属木。

（2）对“诗曰”之说的逻辑分析。

剥［剥］卦的上卦为根［艮］，五行属土，下卦为川［坤］，五行属土。流年太岁己巳，地支巳火之上透出年干丁火，纳音为“大林木”，五行属木，剥［剥］卦中的应爻（年事）官鬼（灾害、疾病）巳火虽临太岁旺，但子孙（生机、果实、种子、健康、规律）子水持世（我们），官鬼（灾害、疾病）奈何不了，太岁年干己土（湿土）覆盖在地支巳火（炎热、干旱）之上悔火，官鬼（灾难）巳火（旱情）就凶不起来，湿土重，说明雨水充足。

卦中五爻（核心位、天空位、转换位）子孙（生机、动物）子水（雨水、鱼儿、龟鳖）得伏神兄弟（帮助、众多）申（驿马星、游动）金长生，虽然伏生飞反伤身，但太岁年支巳火为申金的长生之位，并且巳（热空气）与申（冷空气）相互汇合，化而为水（雨水），循环生助五爻（核心位、天空位、转换位）子孙（生机、动物）子水（雨水、鱼儿、龟鳖）害初爻（地表位）父母（自然）未土（燥土）；根［艮］也为龟鳖，二爻（地面位、腿位、转换位）与五爻（天路位、转换位）相对，衢为四通八达的道路，也为沟渠。即“太岁己巳年，鱼游在路衢”之意。

太岁巳火临二爻（地面位、腿位、转换位）官鬼巳（驿马星、划船）火与

初爻（地表位、水面位）父母（自然、船、安全、人们）未土半会，再结合上一自然段的分析描述。即是“乘船登陇陌，龟鳖入沟渠”的意思。（注：陌为田间的小路。）

寅卯辰月的春季，寅卯辰分别助汇起三爻（田野位、旷野位、过程位）妻财卯木刑动五爻（核心位、心理位、转换位）子孙（生机、规律）子水（雨水）与伏神兄弟（帮助、众多）申金合成水局，克应（年事）二爻（地面位、转换位）官鬼（灾害）巳火，巳的分野为楚国。即“春忧多潦浸，杨楚及胡苏”之意。[注：杨国、胡国、苏国都曾为春秋时的小诸侯国。胡国曾在今河南的郾城、舞阳一带，杨国与苏国的具体分野不详，很可能在宋国（分野为卯）一带。]

寅卯辰月的春季，寅卯辰分别助汇起三爻（田野位、旷野位、过程位）妻财（丰富、收成）卯木（农作物、早禾）和六爻（结果位）妻财（丰富、收成）寅木（农作物、早禾）。即“早禾宜阔种，一颗倍千株”之意。

太岁巳火临二爻（地面位、心理位、转换位）官鬼（灾难、疾病、高价）巳（驿马星、患病）火刑六爻（结果位）妻财（收成、货币）寅木（桑树），耗三爻（田野位、市场位、社会位、过程位）妻财（收成、货币）卯木（桑树叶），太岁巳火助二爻（地面位、嘴位、心理位、转换位）官鬼（灾难、疾病）巳（驿马星、哭泣）火会动初爻（地表位、基层位、百姓位）父母（自然）未土害五爻（核心位、眼位、心理位、转换位）子孙（生机、蚕虫、健康、规律）子水（泪水）。即“蚕娘哭蚕少，桑叶贵如珠”之意。

(3) 对“地母经曰”之说的逻辑分析。

太岁己巳（蛇）临应（年事）二爻（地面位、心理位、转换位）官鬼（壮丽、妖娆）巳（蛇、驿马星、祝贺）火生四爻（田野位、社会位、过程位）父母（自然、百姓、人民、安全、佑护）戌土，会初爻（地表位、基层位、百姓位）父母（百姓、人民）未土成火局（跳动、高兴）。即“岁里逢蛇出，人民贺太平”之意。

吴（包括吴地之内的淮河流域）越之国的分野为丑，五爻（核心位、收成位、心理位、转换位）子孙（生机、果实、种子、规律）子水（豆属水）生三爻（田野位、过程位）妻财（收成）卯木（农作物、麦属木），虽然丑土没有上卦，但丑土为金（麻属金）之墓地，子与丑合，太岁巳火与丑土也半合金局，妻财（收获）寅、卯木（桑树叶、麦子）克丑地，财来克为收获好。即“桑麻吴地熟，豆麦越淮青”之意。此年雨水多，就要多种植一些像水仙一样的耐水农作物，即“多种天仙草”之意。被雨水滋润生长旺盛的妻财（收获）寅、卯木（农作物、水稻）都与父母（自然、粮仓、佑护、百姓）戌（卯木之墓、深秋）

土相合。即“多种天仙草，秋冬仓廪盈”之意。

五爻（核心位、心理位、收成位、转换位）子孙（福气、财源、生机、百姓、果实、种子、规律）子水（雨水）持世（我们）生妻财（收获）寅（驿马星、高兴）、卯木（农作物），说明今年的雨水充足，财源丰富，福气好，心里高兴。即“虽然多雨水，黎庶尽忻欢”之意。

可见，商代人祈求农作物丰收的占卜预测记录，与《地母经》中预测己巳年的农作物收成情况是一致的。这两个每过六十年才能相遇一次的己巳年的结果，它们预测农作物收成的结论竟能如此一致，如此巧合，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易学中的《周易》六爻易术哲学筮法系统逻辑理论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了农业生产经济的实践当中去了，同时也说明《地母经》出现的年代可能会更早，否则也不会有另一个名称《黄帝地母经》了，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而已。

也可以说，商代人祈求己巳年农作物丰收的占卜预测，所用的就是中国哲学中的易学《周易》六爻八卦筮法易术中的系统逻辑理论的预测方法进行分析的。

据说《地母经》诞生于黄帝时代，所以《地母经》也称《黄帝地母经》。虽然现在无法考证，但通过利用《周易》六爻八卦的纳甲易术筮法系统理论对《地母经》中的“诗曰”和“地母经曰”进行系统地逻辑分析和推演，结果证明，演绎诠释的准确性却高度符合其文字描述含义。

通过“己巳”年的准确对应，可以看出，商的历法已经是很成熟的了，商朝的人不管是记日还是记年，已经采用了干支相配的方法，不但在出土的甲骨文献中就有用干支记录某日的卜辞，而且还保存着完整的干支表。

自古以来，由于绝大多数的易学研究者通过史料都普遍认为汉代的京房才是六爻八卦纳甲的发明者，京房之后的干宝又按照京房的理论从纳甲的综合归类、类比含义对《周易》的卦爻辞进行了解释，虞翻也用卦变学说对《周易》依经立注，以象解经，其实这都是古代著名的易学家对《周易》研究所做出的积极而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可是《周易》卦爻辞中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和“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明明就是在说历法干支的纳甲。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也描述到了这个问题，但从未有史料证明曾有人利用易术中六爻八卦的纳甲筮法理论来对《周易》卦爻辞的文字进行过逻辑分析。笔者在此用此方法对《地母经》做了全新大胆的尝试，发现利用《周易》易术中六爻八卦的纳甲筮法系统理论对《地母经》中的“诗曰”和“地母经曰”进行系统的逻辑分析和推演时，演绎诠释的准确性高度符合其文字所描述的含义。

所以笔者认为，六爻八卦的纳甲易术筮法的完整理论在殷商之前就早已具有了，只不过按照中国文化的习俗和传承方法，阴的这一部分是属于极为重要的心法，只能口传心授，秘密传承，就像藏传佛教的密宗和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清代胡煦在《周易函书约存》中就认为纳甲其源古远，乃“上古圣人”所作[1]

这样一来，京房也好，干宝也好，虞翻也好，魏伯阳也好，他们很可能就是把在民间神秘传承的那一部分阴的内容给挖掘出来并整理成卷，但他们却始终没能将《周易》中的这两部分进行完美地阴阳合璧。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占卜深究到“数”上，就可以追溯到凌家滩文明的时代，甚至可追溯到贾湖文明的时代。

那么利用《周易》来占卜是怎么回事呢？

卜或卜，这是“卜”字，看这个甲骨文的象形字，是龟骨板受热产生裂纹的象形三岔口形，表示事情发展到了这个三岔路口，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如何走呢？占或占，是“占”字，再看这个甲骨文的象形字，是卜人围了一圈，占人在中间用嘴向卜人解释，卜是询问者，是正在迷茫地寻找人生规律和轨迹的人。占是回答者，是帮助别人寻找人生规律和轨迹的明白人，占者看到受热后骨板上的裂纹向八卦的哪个方向裂，就指示人生向哪儿走或事情向哪方面进行。看甲骨文“卜”这个字形上的那个叉有的向左，有的向右，就清楚了。

到商末有了《周易》这本书时，占签和卜筮术进步了许多。应用六爻易术再参考周文王填的卦辞、爻辞就可大致分析和策划出事情的下一步动向，概率为60%～70%甚至更多。所以，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也只说对了一半，但卜筮这个词汇真正的意义却与今天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预测和策划相似，没有多少区别，它是从大自然的规律当中总结出来的自然运动法则，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易》六爻易术的卦最早是中国古代的智者们为了追求信息，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变化过程，把一切类似于这个自然现象的事物分别归类和归纳到这个自然的变化过程中去，把主体的自然现象信息转化为自然现象信息，即从一个客观的现象信息变为另一个客观的现象信息。从归类、归纳后内在的五行和六亲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逻辑分析和逻辑推演，会在大脑中对应地产生出一个主观现象信息到另一个主观现象信息。而通过因果关系进行系统的逻辑推演分析发现，这样得出的主观信息结论与客观的自然现象变化出的信息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不是对应的全等）。

万事万物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都会自然的运动变化和相互影响，这种辩证的

① 参常秉义著《周易与历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第216页。

演绎则变成了非常客观的事实，六爻术就是根据自然的三个阶段、六个步骤和文字来描述和逻辑分析，类似于数学的平面几何中相似三角形的证明（只是相似，而绝不是全等），即根据一定的环境条件来给事物的变化下定性和定量的结论。

那么这种预测究竟有多高的（相似）准确概率呢？

从《河图》、《洛书》中的自然哲学原理中演绎出来的中国古代算学理论，被发明应用到中国的算盘和相应的加、减、乘、除法则，利用此法治进行计算能够达到100%的准确率，这是事实，但这是另一回事。而预测不同于中国古代算学理论的应用。如果将六爻预测术应用到自然界的实际事物中去进行预测活动的话，那么所获得的定性和定量的综合信息量，最多、最大、最高的（相似）准确率也只能达到90%，这是极点了，也就是太极图两仪中比较大的那部分占90%，中间那部分10%是相反的因素，并不存在100%的准确率。

目前没有一个易学大家敢说他预测的（相似）准确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敢说信息量达到了90%以上。孔子堪称大家了，也只能达到70%的（相似）准确率。我认为60%～70%左右的（相似）准确概率是自然界一般的客观规律，还有20%～30%是古人在易学的标识——太极图上没有标注出来的具有灰色的那一部分，可以用灰学理论中正、反、合辩证法的系统逻辑来解释。这一点可以看自然界中夏至这一天太阳的出入方位图，白天的时间与全天的时间之比是60/96=0.625及其近似于黄金律的0.618这个黄金分割点即可证明了。

所有的科学与哲学一样，都是辩证的，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即大自然本身也是有缺陷的，不是100%完美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要辩证地看。

第四节　《周易》中提到的鬼神、祭祀与心理学的描述

一　无神论的《周易》

在《周易》的64卦的卦辞和386个爻辞的所有文字中，没有一处提到“神”这个字，只有在乖［睽］卦的上九爻和未济卦的九四爻以及既济卦的九三爻中有三处提到了“鬼”字。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卦爻中“鬼”字的真实意义吧。

1. 第一处的“鬼”字是在乖［睽］卦的上九爻辞中，下面就让我们把此爻辞解读一下。

乖（帛书原文）		睽（通行本原文）	
乖		睽	
小事吉		小事吉	
尚九	乖苽 见豕负涂 载鬼一车 先张之觚 后说之壶 非寇 闽厚 往愚雨既吉	上九	睽孤 见豕负涂 载鬼一车 先张之弧 后说之弧 匪寇 婚媾 往遇雨则吉

上九（现象描述）：日全食结束时，太阳与月亮刚刚分开的情景，月亮就像是一个灰暗的瓜一样；又像是猪涂了一身的泥，拉了一车的鬼，都在月亮的前后弧圈里昏噩地狂饮一样；又像是一个不是因为强盗就是因为肮脏疾病而死亡的场景一样。如果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正好遇到阴雨天就好了。

【寓意之一】

这种好像是真的鬼昧［鬼魅］之象，为何阴雨天就没有了呢？因为阴雨天看不见太阳，也就看不见日全食了，其实还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已。

从以上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乖［睽］卦中的“鬼”字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比喻和拟人化的写作手法而已。此卦不但与神鬼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却充满着我们智慧的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对大自然的变化有了科学正确的认识。

2. 第二处的“鬼”字是在未济［未济］卦的九四爻辞中，下面就让我们来正确地解读一下。

未济［未济］

九四爻辞：贞吉，悔亡，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商（赏）于大国。

九四（现象描述）：水面上正在燃烧着大火的情景，是个表里不一的征兆，如果看不透的话，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会因害怕后悔而丧失机会。就像殷之先王大辰，就是高宗武丁出兵震慑讨伐寒冷的北方匈奴之国时，就没有被匈奴表面强大的现象所迷惑，所以历经了三年艰苦的战争，终于征服并迫使这个魔鬼强盗之国成为了商的一个进贡属国。

【寓意之一】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3. 第三处的“鬼”字是在既济［既济］卦的九三爻辞中，下面就让我们来正确地解读一下。

既济［既济］

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现象描述）：人的心理意志同样也需要抵御寒冷和保暖，就像殷商时的高宗武丁带着军队讨伐寒冷的北方匈奴之国时，就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仗打了三年才战胜了鬼（北）方的匈奴之国。意志薄弱的人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这样的人就不能担当重任。

【寓意之一】

寒冬就像柴禾被淋湿了，从里到外都是湿的、软的而无法点火取暖一样。战胜困难就像御寒一样要有坚强的意志。

从以上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既济和未济卦中这两爻中的“鬼”字说的都是“鬼方之国”的同一个意思，与神鬼根本没有一点关系。

二　《周易》中有关心理学与祭祀的描述

在以下几个卦的卦辞和爻辞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古代心理学以及“祭祀”与心理学有关的问题。那么这些“祭祀”是不是与神鬼有关系呢？下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无孟［无妄］卦和另外几个卦涉及“祭祀”的爻辞的原生态本意。

（一）无孟［无妄］卦中涉及的心理疾病问题

无孟（帛书原文）		无妄（通行本原文）	
无孟	无亨	无妄	元亨
	利贞		利贞
	非正		其匪正
	有省		有眚
	不利有攸往		不利有攸往
初九	无孟	初九	无妄
	往		往
	吉		吉
六二	不耕获	六二	不耕获
	不菑余		不菑畲
	利有攸往		则利有攸往
六三	无孟之兹	六三	无妄之灾

续表

无孟	无亨 利贞 非正 有省 不利有攸往	无妄	元亨 利贞 其匪正 有眚 不利有攸往
九四	或击之牛 行人之得 邑人之兹 可贞 无咎	九四	或系之牛 行人之得 邑人之灾 可贞 无咎
九五	无孟之疾 勿乐 有喜	九五	无妄之疾 勿药 有喜
尚九	无孟之行 有省 无攸利	上九	无妄行 有眚 无攸利

1. 卦辞

现象描述：晴朗的天空不会有响雷声。这样的情景，就像人不要痴心妄想，不要白日做梦一样。只要脚踏实地，就没有什么不利的，这是亨通有利的征兆。如果有了不正确和非分的想法，就要好好反省，否则，不利于任何事的实施和作为。

【寓意之一】

要实事求是。

2. 爻辞

（1）初九（现象描述）：只要不痴心妄想，脚踏实地地去做事，就会有所作为，好。

【寓意之一】

就像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野菜也能填饱肚子一样。

（2）六二（现象描述）：不要白日做梦就是不要去想那些不耕耘就有收获，没有去垦荒而庄稼反倒成熟了这样的美事。只有脚踏实地、不怕辛苦的平衡心态才有利，才能有所作为。

【寓意之一】

凡事小心翼翼固然没有错，按自然法则、规律去行事更没错。

(3) 六三（现象描述）：人虽然没有痴心妄想，也没有贪心地去偷别人的东西，但如果把别人都想成和他一样的人，也会遭受损失和灾难的。就像有人粗心地把牛拴在了过往行人比较多的地方，结果却被行人牵走了一样，有了损失，有灾了吗？而且这也是同一村镇之人的损失和灾难。

【寓意之一】

不是所有的人都与你一样具有高尚的品德，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亦不可无。

(4) 九四（现象描述）：不痴心妄想的平衡心态，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征兆，没什么问题。

【寓意之一】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按规则、程序去行事是不会错的。

(5) 九五（现象描述）：除了不要有白日做梦的这个毛病之外，也不要有了好事而乐极生悲。白日做梦和乐极生悲的毛病一样，都是不用药就可以治好的心理疾病。

【寓意之一】

乐极生悲，同样会遭受损失。

(6) 上九（现象描述）：白日做梦这种心理，确实需要好好反省，这种心理对人的心理健康，确实是没有什么有利的。

【寓意之一】

所有的科学都来自于自然，遵循从自然当中总结出来的科学规律，没错。

(二)《周易》卦爻辞中所涉及的祭祀问题

1. 狗［姤］九五爻中涉及的祭祀问题

九五：以忌［杞］枹［包］瓜，含章，或［有］损［陨］自天。

九五（现象描述）：人们祭祀天体和北斗星是为了合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很正常的行为。猛烈的西北风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和迷惑，其实这是冷空气的变化运行，就像陨石雨从宇宙的天空中掉落下来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天体中的自然现象，绝不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现象而需要去为天体祭祀。

【寓意之一】

不管风有多大而北斗七星却会永远屹立在天体的中央，自然法则是永远不会变的。

2. 既济卦九五爻中涉及的祭祀问题

九五：东邻杀牛［以祭］，不若［如］西邻之濯［禴］祭，［祭］实受其

福。(帛书、通行本原文)

九五（现象描述）：在心理上坚定自己的意志，就像注意保暖抵御冬天的严寒一样。坚定自己的意志也可以采用祭祀的方法，东边的邻居用杀牛的方法来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就不如西边的邻居用转圈洒一点酒水的简单方法来祭祀。祭祀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心理平衡得到福的回报、祈求平安和成功的能量吗？根本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寓意之一】

祭祀就是心理上需要明天的福报，其实为了生命的延续，就要适应大自然的变化。

3. 困卦九五爻中涉及的祭祀问题

九五：贰椽［劓刖］，困于赤发［绂］，乃徐有说，利用芳［祭］祀。(帛书、通行本原文)

九五（现象描述）：这么大面积沼泽湿地里的水泡子，被杂乱发红的荆棘灌木丛给困在了里面，就像人被割了鼻子之后，面部又被血水染红的头发给遮住了，需要徐徐小心地拨开才能看清一样，这样的景象只有利于祭祀。

【寓意之一】

慢慢地解脱开，这是告诉人们解决困难的方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心理上不要被困难击倒，要有勇于去解决问题的心理准备和勇气。

从以上的解读可以看出，在《周易》中的许多内容都有对中国最早的心理学的描述，在《周易》中提到的“祭祀”也与神鬼没有任何关系，都只不过是我国古代最早描述的心理学问题，同时反映出我们中国智慧的古人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类的心理学有了如此科学正确的认识，并对人类的心理疾病找到了良好的诱导治疗方法。

三　易学《周易》中提到的“庙”字

在涣卦和卒［萃］卦的卦辞中，都提到了“王假有庙”这四个字，那么这个“庙”是不是与神鬼有关系呢？下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两个卦的原生态的本义。

1. 涣［涣］卦卦辞中涉及的祭祀问题

卦辞：涣，亨，王假于［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帛书、通行本原文)

卦辞（现象描述）：大风天气时，黄河之水波浪滔天地在奔腾，这个能量如此积聚的壮观景象，亨通啊，就像君王假如有像圣人一样的名声和能力，就有利

于去干大的事业一样，是有利的征兆。

【寓意之一】

如果能量条件具备，就要大刀阔斧地去干，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2. 卒［萃］卦卦辞中涉及的祭祀问题

卦辞：卒［萃］，亨，王假于［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生［牲］，吉，利有攸往。（帛书、通行本原文）

卦辞（现象描述）：沼泽湿地中翠绿的植被，焕发出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这是亨通的景象啊！就像小王假如有圣人一样的名声和能力，则有利于到君王那里毛遂自荐，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这是亨通有利的征兆。又像用大牲畜作为祭品是吉利的一样，这是有利于去有所作为干事业的景象。

【寓意之一】

美好的大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通过对这两个卦辞的原生态本义的解读，就会发现《周易》中的“庙”字也与神鬼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中国的古人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影响深远的人尊称为“圣人”，实际上是一种博大而宝贵的文化思想和积极而崇高的精神，是作为学习的榜样和精神的支柱供放在了庙中，来让后人去缅怀敬仰，让后人效仿他们的行为。

3. 看“神”这个汉字的起源

“神”是由“示”和“申”两个字组合而成的。“示”就是指一个东西在那里放着、在那里挂着，比如一个图腾在那里摆放着，一幅画在那儿挂着，太阳悬挂在天空上，挂在墙上的告示，砍下的首级在旗杆上悬挂着示众等。“申”指一个人跪在那儿正在拜这个示。神这个由“示”和“申”组合成的字就是指人在对自然规律的崇拜和祭祀时，正在跪拜的这种动作行为现象的描述。这个“神”也可以引申为大自然的一切生命都具有客观发展的自然运动规律和法则。往小处说有点类似于人体内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以及整个身体的系统等。这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系统的代名词，绝非特指某个神乎其神的东西或怪物。

不过，在中国古文化中，对“神”这个概念性的字眼，我们还是要一分为二地去看。《通典》中对“礼”的特点、性质和功能曾作过如下概括性描述：“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人曰义。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其中就强调了“礼”与“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的关系。

在中国古老的中医学中就有“气立”和“神机”这一对概念对应着自然与人体的脏腑和经络，当然这种对应也是建立在易学文化的“同象原理”和“宇宙生物观”的基础之上的，而《黄帝内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看其中“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和“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藏为肝”的内容描述，就会知道在中国古文化中“神”的联系是如此的广泛而并不邪乎，就会知道医其实就是易和道在人体上的学问，这就是人体与自然的相似、和谐，就是易象，就是医道。

另外，在中医学当中有这样的理论，就是神来源于先天之精，又靠后天之精滋养，精能生神，神能御精，精足则神健，形健则神旺；反之，精衰则体弱，体弱则神疲。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内五脏六腑气血的盛衰都能反映在脸面上，面部的色泽、形态可反映出内脏及全身的生理状况，如同《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有诸内必形诸外”。就是说“神”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是形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通过望某一个人的神情或生态，就可以大致了解此人体内精气的盈亏。如同《系辞上传》中“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描述。当然中国这个中医学的系统科学理论也是建立在“一物一太极”的易学文化思想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象数易学“象［形象思维］”和“炁［气］”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中医诊断学当中的最高境界——望而知之谓之神的“望”。



4.“鬼”这个字的起源

“鬼”这个字是描述远在上古时代的“巫人”进行祭祀活动时，头上戴着猛兽头的假面具，屁股上系着假兽尾巴在怪模怪样作舞的一种景象，就像今天的萨满教与傩文化中戴着假面具在舞蹈（或做法事）一样，是一种模仿动物舞蹈的表现形式，并非特指某个神乎其神的东西或怪物。

所以翻开《周易》，里面通篇没有讲过鬼、讲过神，只是在用拟人的写作手法描述大自然中自然现象发生的过程。即使讲祭祀也是在讲祭祀自然，崇拜自然。既然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就是从自然当中总结出来的，为什么不能祭祀自然，崇拜自然呢？而祭祀最关键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遵循从大自然当中提取出来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运动法则，来使社会的运行秩序更合理、更合乎自然、更加和谐与人性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周易》是一部中国最古老的无神论的经典之作。

第五节　《周易》中有关中医与疾病的描述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和《周易》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代的人已具备了一定的医学知识。甲骨卜辞中有按身体部位记录疾病，如疾目、疾首、疾耳等16种疾病，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鸭、泌尿、妇产、小儿、传染等科目，并已用医药治病。从台西遗址出土的砭镰来看（图12－5），商代已经使用了医疗器具，可以用砭镰切割脓血，这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医疗用具。



图12－5　河北藁城台西村出土的商代砭镰

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多处阐述了疾病以及预防疾病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涉及这几个问题的有关卦爻辞的真实意思吧。

1. 第一处涉及疾病的问题，是在鼎［鼎］卦的九二爻辞中。

九二：鼎有实，我戟［仇］有疾，不我能节［即］，吉。（帛书、通行本原文）

九二（现象描述）：鼎之形象及其形象符号的中间部位都是实的、鼓的，我问病占到了此卦，就像在我的生殖器部位有疝气的毛病，这个病不是我自己能治好的，不过也没多大的问题，是吉利的。

2. 第二处涉及疾病的问题，是在馀［豫］卦的六二和六五爻辞中。

六二：疾［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帛书、通行本原文）

六二（现象描述）：雷电挟着大雨及时到来，滋润了干旱燥热的土地。这个壮观的景象，就像因火气太大导致屁股上长了个硬石头似的疥子，没几天就好了一样，这个雷电加及时雨的情景，征兆吉利。

六五：贞疾，恒不死。（帛书、通行本原文）

六五（现象描述）：这两个激动无比的老女人在吵架时所发出的吼声，就像是打雷一样。占到了此卦爻或看到这样的情景，表示会有人因为非常激动而导致心脏病发作的征兆，并且病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但不至于死掉。

3. 第一处涉及预防疾病的问题，是在辰［震］卦的上六爻辞中。

上六（帛书）：辰昔昔，视懼懼，正凶，辰不于其射，于其邻，往无咎，闽诟有言。

上六（通行本）：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现象描述）：地震的发生是一拨一拨的，看地面上的东西也是一晃一晃的，非常害怕，征兆凶啊。地震的时候，不要躬着身体躲在房屋、宫殿等建筑物里面和旁边，要躲到旁边的道路和空旷地上。为防止地震后引发的流行疾病，要及时掩埋掉能引发疾病的尸体等。

4. 第二处涉及预防疾病的问题，是在夺［兑］卦的九四爻辞中。

九四：章［商］夺，未宁，介疾有喜。（帛书、通行本原文）

九四（现象描述）：在半空发出金属般光泽的月亮，从未违背它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运动变化规律。在晦到朔这几天内，就不会出现月光，就像人的抗体会变得虚弱，也容易得疾病，如果这几天有喜事（指结婚），要对房事有所节制。

5. 有一处涉及中医配药的问题，是在习赣［坎］卦的六四爻辞中。

六四（帛书）：奠酒巧迹，用缶，入药自牖，终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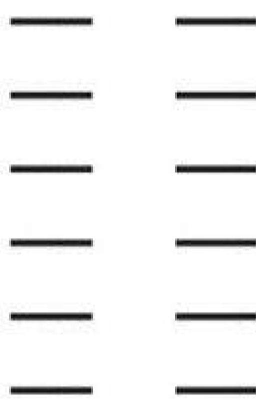
六四（通行本）：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六四（现象描述）：水在奔流的过程中不好控制，容易四处散开，所以在一开始对水资源进行充分保护和充分使用的过程中，就需要小心谨慎地进行控制管理，就像在祭奠、配药与盛酒时集中精力，遵循提酒的规律，从酒缸上像屋顶窗户似的小口中，把空提子小心地伸进去，再提出酒来，这样才不会出现洒酒和互相碰坏陶器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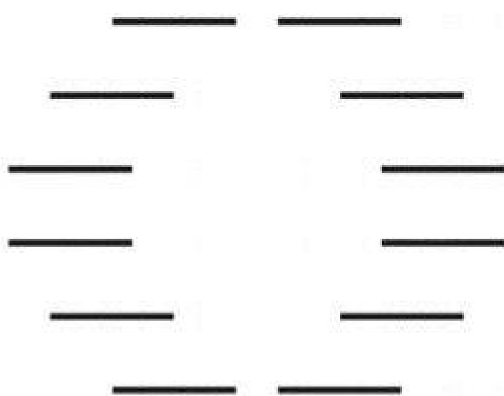
第六节　易学中“太一生水”的准确之意

自古以来，研易的学者们都反复地提出过“太一生水”这个概念，可“太一生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下面笔者通过对川［坤］卦的符号演变和对川［坤］卦初六爻的逻辑分析来结合初六爻辞的文字描述，解读“太一生水”这个观念的真实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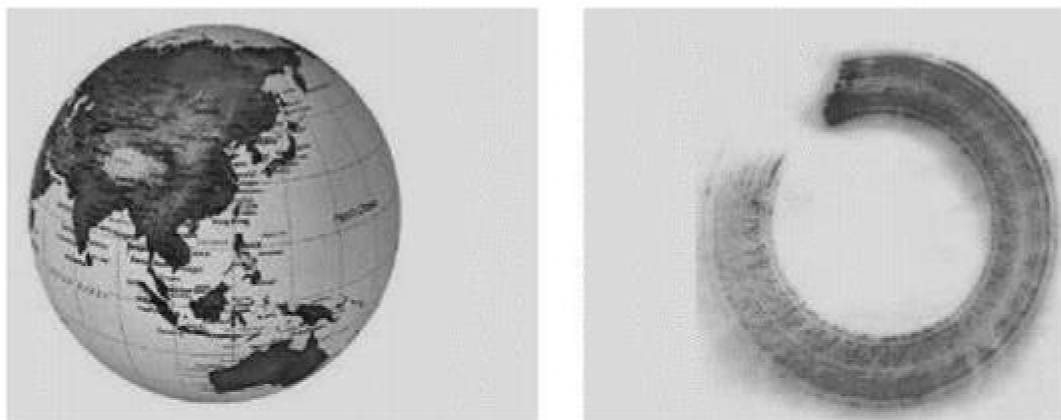
1. 形象符号



2. 动态写意



变形后的写意符号——川［坤］



组图 12－6

【写意自然现象】

壮观的地球，广袤富饶的大平原和黄土地。

初六：礼［履］霜，坚冰至。(帛书、通行本原文)

初六（现象描述）：地球在宇宙中刚开始形成运行的时候，是一个混沌、寒冷的冰川时期，地表都是霜冻和坚冰的景象，就像婴儿刚刚学步时蹒跚行走在霜冻似的坚冰上一样；又像人们在茂密的植被中开始寻找出路的时候，会有些迷茫和能量的损失；又像事业刚起步的时候，会有些艰难一样；还像刚进入新年时，还有些霜冻，还要继续在坚冰似的路面上行走一段时间一样，会感觉到有些艰难。

川［坤］（主体现象）	復［复］（变化现象）
— — 子孙癸酉金　世	— — 子孙癸酉金
— — 妻财癸亥水	— — 妻财癸亥水
— — 兄弟癸丑土	— — 兄弟癸丑土　应
— — 官鬼乙卯木　应	— — 兄弟庚辰土
— — 父母乙巳火	— — 官鬼庚寅木　　父母乙巳火
▭ ▭ 兄弟乙未土	—— 妻财庚子水　世

我们通过对川［坤］卦初六爻变动的逻辑分析，再把变卦浮在大自然当中“癸”、“庚”、“乙”天干之间的表象进行一下排序，就会出现“‘庚’金—生→‘癸’水—生→‘乙’木”的逻辑关系，而“癸”、“庚”、“乙”中只有“庚”金是阳的属性，“庚”又有坚硬的冰之意。这样，“庚”与初六爻辞“礼［履］霜，坚冰至”的文字之意也就对应起来了。“乙”字形象思维的结构又有“太极”的形象符号之意（图 12－7）。如此，“‘庚’金—生→‘癸’水—生→‘乙’木”的逻辑关系，就形成了“太极”——生命的符号（详参笔者拙作《周易卦爻辞真解》中川［坤］卦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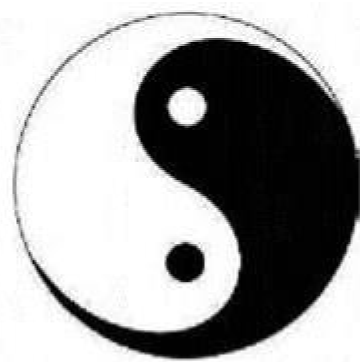


图 12－7　太极与生命符号

我们通过以上的逻辑分析，将变卦浮在大自然当中“癸”、“庚”、“乙”天干之间的表象进行一下排序，将“‘庚’金—生→‘癸’水—生→‘乙’木”的逻辑关系与爻辞“礼［履］霜，坚冰至”的文字之意结合起来，就明白了“太一生水”这个概念其实是在说地球生命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是太空中的一个大圆冰坨子。地球生命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万事万物都伏在坚冰之下，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从水中生出的。

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学派米利都的泰勒士认为，“万物皆由水构成”或“世界是由水构成的”，他的这一论述与我们中国《周易》川［坤］卦初六爻辞中的文字描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笔者认为，泰勒士与周文王还真有英雄（哲学家）所见略同的感觉。

小结

在本章第一节中笔者提到了《连山易》与《归藏易》。《连山易》古多只称《连山》，其名最初见于《周礼·春官》中的《宗伯·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筮人》又云：“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可惜，《周礼》这部书早已为学界所证实乃汉代刘歆的伪造，是他杂取古书

并参以己意作成的，里面虽用的确实是一些原始的古材料，但其虚造的成分也占了很大的比例，许多内容靠不住。其中《连山》《归藏》这两个名目便是他虚造出来的，他伪造的依据便是《山海经》。有《玉海》引《山海经》证之："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关于《连山易》《归藏易》是否曾经存在过的问题，笔者不想多说，这里要说的是，《连山易》《归藏易》与《周易》应当还是存在着一些联系的。

如果我们看《周易》中所有的64个卦，就会发现64个卦里的每一个卦都不缺土爻，而且在每一个卦中都有五行是属木、或属火、或属金、或属水的驿马星在参与卦中的变化，表示事物和事物的主体现象和变化现象都是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只有五行之土没有驿马星，土爻永远都是在充当木、火、金、水的墓地。

中国文化中的墓地的意思就是土包，一目了然，引申过来就是山包，就是说地球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最后都是要归藏在土地中和山脉中的。

伏羲氏创八卦的时候，是根据大自然的变化规律发现并归纳了一个先天的八卦，先天八卦中的根［艮］和川［坤］就排在八卦的第七和第八个卦的末尾，64个卦里都具有的土爻就是最古老的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学中所代表的山，就是最古老的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学中所代表的地。

所以笔者认为，64个卦，卦卦不缺山，就是《连山》。卦卦不缺地，就是《归藏》，"归藏"的谐音就是"龟藏"：在最常见的动物中，只有龟能把头部和四肢完美地隐藏在安全的甲壳当中，龟在易学中被归类到根［艮］卦里，五行属土，有山脉之意。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最后也都是要归藏入山脉和土地中的。

我们从《周礼·春官》中"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句话中，就可以知道《连山》《归藏》与《周易》都是一样的，都是由八个主卦分别进行组合形成了六十四卦，就是说《周易》的形成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八卦、二十四山。如果说有区别，也只能是卦序和卦爻辞会有所不同罢了。所以周文王在《周易》比卦的卦辞里就用了"原筮"这两个字，说明了在《周易》之前，确实曾经存在着另外一种易学专著，那么它会不会就是《归藏易》呢？所以笔者认为，《连山易》《归藏易》与《周易》确实还是存在着一些联系的。

《连山易》与《归藏易》只不过是在周文王演绎《周易》之前更早期的称呼而已。《周易》的形成过程离不开《连山易》与《归藏易》，《周易》的最后成书是在《连山易》与《归藏易》的基础之上演绎、发展和编纂出来的，它既是人类对大自然形象的认识思维的结果，也是人类对大自然系统逻辑的认识思维的结果，是所有中国文化中最智慧的部分。

| 第十三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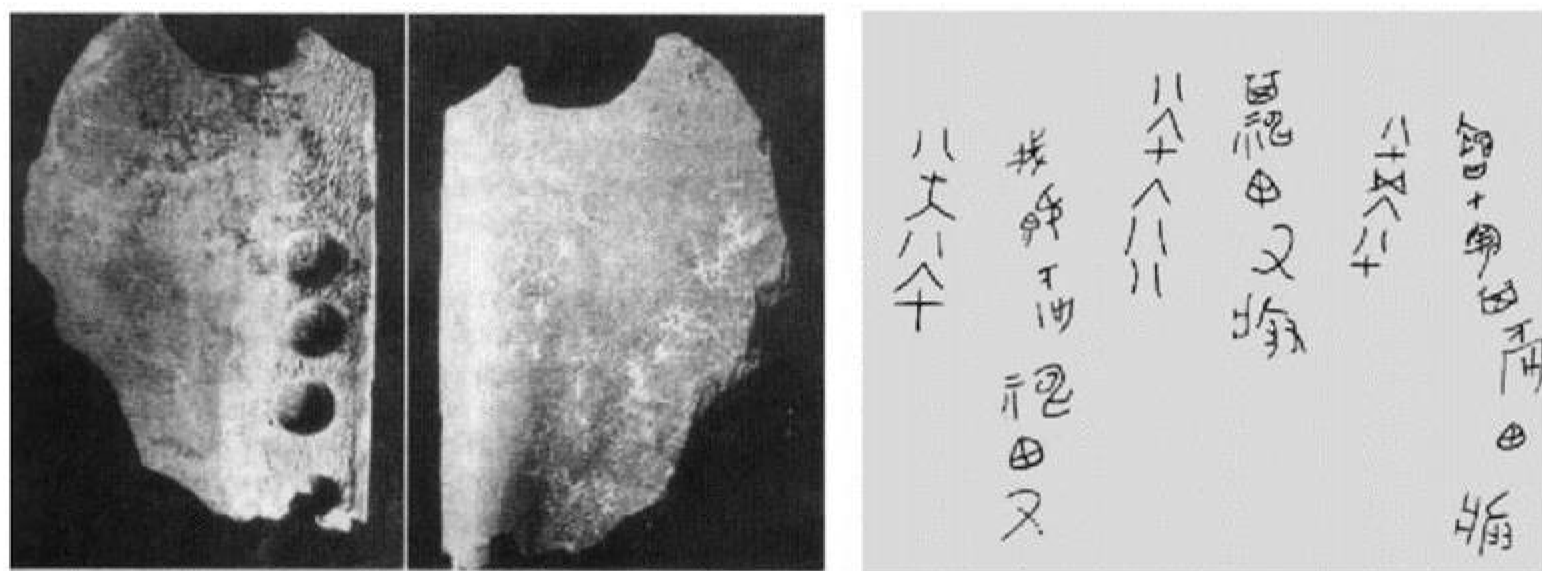
周以后的易学文化

第一节　商周时起卦的阴阳符号

近代兴起的考古学，使我们有幸目睹许多我国考古事业的成就，其中就有通过考古发掘而出土的许多商周时期的易学卦象符号（组图 13－1、组图 13－2）①。



组图 13－1　商周时的数字卦符号



组图 13－2　周原卜骨数字卦命筮辞例

① 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插图。

另外，《尚书》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便来告卜”。就是说周朝初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曾命周公相过地。一方面说明周朝人是信奉占卜和风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公确实是一名易学专家和相地高手。

第二节　易学中“太极、无极［戊己］”的准确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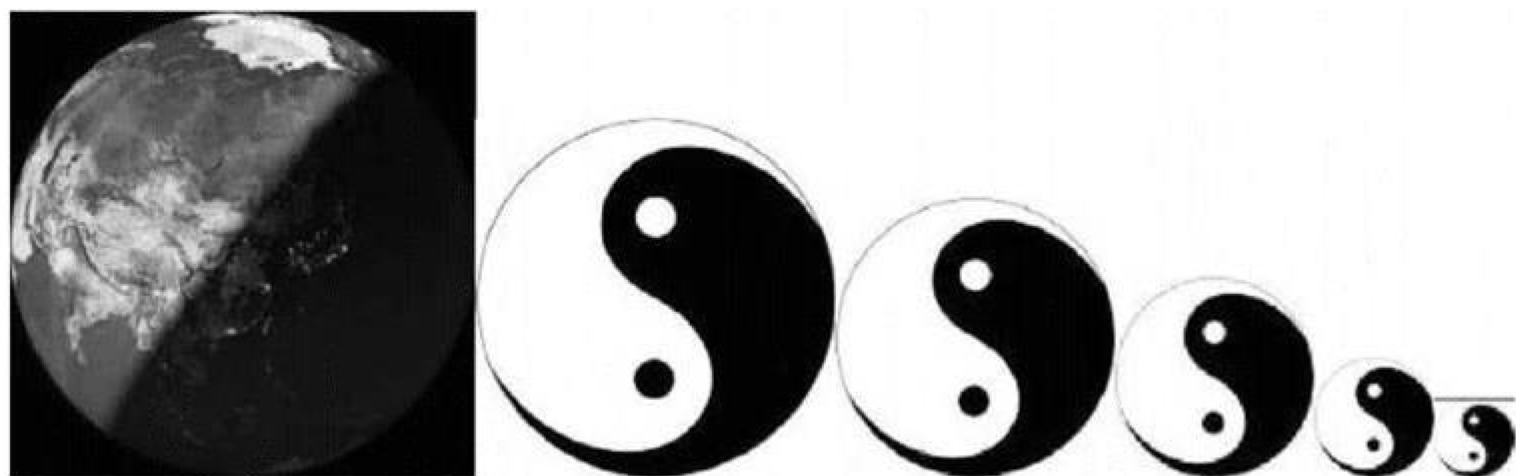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研易的学者们都反复地提到“太极、无极”这个概念，可“太极、无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下面笔者通过“太一生水”这个概念，再来解读“太极、无极”这个概念的真实之意。

一

“太极”一词最早出现在《系辞》上传的第十一章，原文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在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中，笔者通过对川［坤］卦初六爻变动的逻辑分析，把变卦浮在大自然表面“‘庚’金—生→‘癸’水—生→‘乙’木”的逻辑关系，与初六爻辞“礼［履］霜，坚冰至”的文字之意结合起来，再把“乙”字结构与“太极”——生命的符号结合起来，就明白了“太一生水”这个概念其实是在说地球生命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是太空中的一个大圆冰坨子。“乙”字形象思维的结构又有“太极”的形象符号之意。如此，“‘庚’金—生→‘癸’水—生→‘乙’木”的逻辑关系，就形成了“太极”——生命的符号。同时，我们也明白了地球生命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伏在坚冰之下，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从水中生出来的，都来源于水。

如果我们把在太空中对地球进行拍照的图片与太极生命图进行对比，就能够发现地球处在宇宙中的状态与太极生命图的表现形式是极其相似的。以此类推，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之生命的运动变化状态都可以用太极生命图来表达：大到宇宙太空的生命运动变化状态，小到地球上的细菌生命的运动变化状态（组图13－3）。



组图 13－3　太极与生命

这样，我们再来理解“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极容易明白了。

太极又是无极的，道既是太极又是无极，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二

“无极”一词最早出现在《老子》（也称《道德经》）中，本来是老子用以指称道的终极性的概念。《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大致意思是说：知白守黑的阴阳模式，是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之生命运动变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永恒不忒的太极，可这种太极运动的反复变化，又是无极的。所以无极的一个意思就是指道，指道是不可穷尽、没有边缘的。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无极之外，复无极也。”意思就是说宇宙大自然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无穷之外，还是无穷。无极便是无穷。

如果我们把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字排在一个圆的横坐标直径上，相对而言，“戊、己”土就为中心区域了，但“戊、己”准确表达的是一个中心的区域范围，而并不是一个中心点。



如果我们把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排在一个九宫八卦中（图 13－4），同样相对而言，“戊、己”土也为中心区域了，但“戊、己”准确表达的还是一个以吾［以己］为中心的区域范围，而并不是一个中心点。

如果我们把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排在一个后天八卦中，相对而言，就没有“戊、己”了（图 13－5）。



图 13－4　九宫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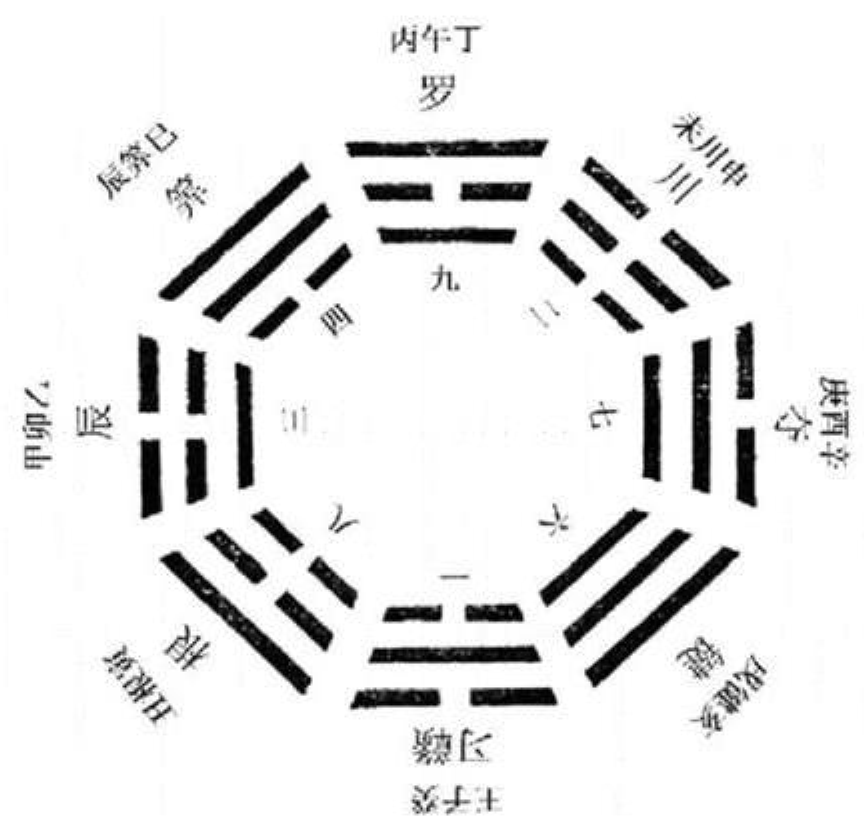


图 13－5　后天八卦图

所以无极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指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极点［中心］，只有相对的极点［中心］，即无极＝戊己。

而这个相对的极点［中心］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就在“戊、己”之间，非左即右，既精准、又模糊。它既像天体的北极（图 13－6）没有绝对的中心极点一样；又像是地球的南北极（图 13－7）没有绝对的中心极点一样；还像人体［灵长类动物］的心脏不同于其他动物，是绝对不会在身体的中心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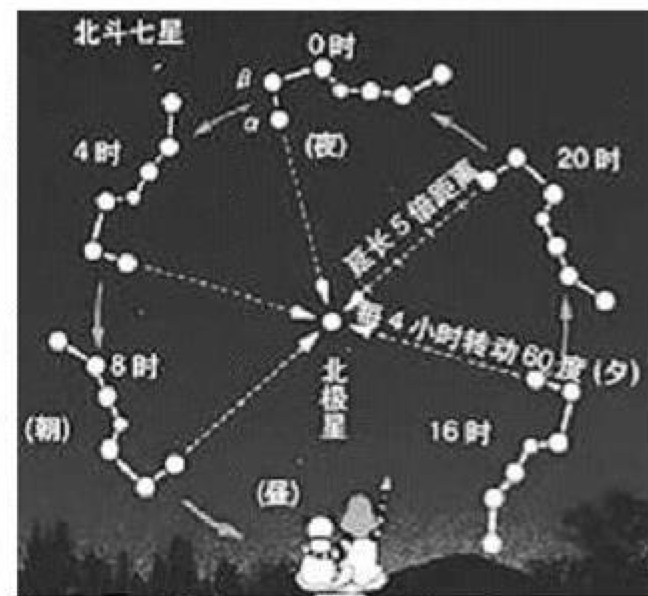


图 13－6　北极区域图



图 13－7　地球

同样，天干是这样的，地支也是这样的，宇宙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中心就是极点，就是绝点。这就像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哲理——凡事都不能做绝一样。就像修炼之人就讲“空”，而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太自以为是，即戊己＝无己。既不要“左”，也不要“右”，要“中庸”，当然这也没有绝对的“标准”。这就是“道”，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国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中国名称的由来

一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中，中国的“中”字有易学文化中“戊［吾谐音］己”之意，而“戊己”的五行又属土，这样就可把“戊己”直接读成“我［或我们］的土地”。

图 13－8 是西周成王时期宗族中一位姓何的所做的青铜器，既是西周初期的一件珍贵艺术品，也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的青铜器。此器造型纹饰都很独特，圆口方体，有四道大扉棱装饰，庄严大方，厚重美观，主体感极强，器内有铭文 122 字，残损 3 字，现存 119 字。



图 13－8　何尊（图片来源于陕西宝鸡市博物馆）

铭曰：“唯王初壅，定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天！’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即天下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室赐何贝 30 朋，何用此作尊，以作纪念。这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对研究西周初年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何尊的最高价值在于，尊内铸有 122 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造被称为“成国”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中国”这两个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记住的大事。青铜铭文就是用青铜铸造出的宝贵历史，除了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外，更重要的是它还代表着取自大自然的中国文化，

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久远与不朽。

所以从尊内铭文的内容来看，“中国”之词汇在开始时，应该是一个核心区域的概念之意，与易学文化中“戊己”的意思应该是对应的。有了系统的文字之后，我们中国人就不需要说自己赖以生存的疆土是“戊［吾谐音］己”了，而可以说是“中国”了，即天下的中心（天下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

二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不断发现，陶寺遗址被学术界认为对研究我国早期国家的出现以及“中国”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陶寺，位于襄汾县东南隅，陶寺遗址原是一个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的古城，距今 4000～4100 年前这座古城扩张成为一个占地 280 万平方米的中国史前最大的城池。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义。

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等。另外，在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唯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从这些城址遗迹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城邑的建筑规模和宏伟气象，特别是各种标志性建筑，如宫殿、祭坛、天象台，以及仓储区、墓葬区、街市区和道路等遗迹的出土，更说明陶寺城址在当时不仅是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王都”。

城邑的出现，一方面固然说明是人们为了聚居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为了适应国家机器能够得以集中而正常运作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对于一个初具国家形态的酋邦之城邑来说，其必备的要素是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所有这些，在对陶寺城址的发掘中不仅都找到了，而且其规模之大和典型性也都是超乎寻常的。

从陶寺城址中发现的“观象台”遗迹，能够证明观天象和祭天神的文化行

为在陶寺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也说明了尧的时代对天文历法的贡献也是空前巨大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亲自下命令派遣羲和、羲仲去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

在史前时期，王者往往是将“政”与“巫”结合为一体的，而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巫”又与易学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沟通天地、预测未来的作用。只有这样，在那个时代才更加具有威望和号召力。所以在古代酋邦社会中，“酋长”与“巫师”几乎就是一个等同的概念，“民神杂糅”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当时观天象的行为并不像现代那样被归为科学范畴，“巫”既可以也能够准确地观察天象，而“巫”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综合整体的文化形象与神职人员、易、医、学者、教师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巫”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意涵与精神现象。

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没有“巫”文化的配合，也就不会有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因此，观象与崇“巫”，在史前社会中都应当归属于礼的范畴，也都会产生礼的效应。而“礼”在史前社会中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之意（参《周易》礼［履］卦的卦爻辞可知）。所以，“礼”也是形成制度与民俗的重要原因。

《通典·礼一》中对“礼”的特点、性质和功能曾作过如下概括性描述：“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人曰义。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其中就强调了“礼”与“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的关系。

从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①，它已初步具备了文字、城市、礼仪和青铜器等作为国家文明标志的四大要素。由此可见，陶寺城址所出土的各种与礼仪相关的遗迹和器物的意义之重大、之非凡。

从科学的意义上看，文明既是直接建立在对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进行总结的结果，也是直接建立在这种社会民俗文化之上而形成的结晶。从古代遗留到今天的典籍和在今天社会依然遗留的民俗中，我们是能够找到历史的寒暑表

① http：//bbs. linfen365. com/forum. php？ mod = viewthread&tid = 185167；http：//www. tianya. cn/tech-forum/content/666/9704. shtml；http：//www. cas. cn/ky/kyiz/200905/t20090525 _ 2315362. shtml；http：//www. weather. com. cn/jiangsu/qxkp/ygyqzxhycc/09/1042444. shtml.

与足迹的。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这座大墓深 8 米，长 3.7 米，宽 5 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考古队领队、陶寺古观象台遗址发现者何驽博士介绍：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色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这些器物在帝尧时期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2005 ~ 2009 年，随着何驽博士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的作用逐渐明朗起来。

根据考古学者何驽的研究，陶寺遗址时期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 25 厘米，而这根木杆上红漆的标记与 25 厘米恰好形成某种比例关系。就在此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陶寺遗址先期的考古者在早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根圆形的木杆，杆长 2 米左右，约为陶寺遗址时期的八尺。这两根木杆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关于我国古代利用“圭表”测日影定历法的联想。

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在不同季节，太阳的出没方位和正午高度不同，并有周期变化的规律。于露天将圭平置于表北面，根据圭上表影，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周年变化，可以定方向、测时间、求出周年常数、划分季节和制定历法。

这两根杆会不会就是帝尧时期观测日月星辰的“圭”和“表”呢，而带有小孔的玉器——“戚”，是否就是后世天文学家用于精确测量日影的“景符”呢？

经过与天文学家的沟通，“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决定于 2009 年 6 月 21 日的夏至日，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 1∶1 的复制品，在陶寺古观象台对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进行验证。

在陶寺古观象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天文研究中心主任、“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孙小淳等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将复制的圭、表仪器安装好，抓住时机，认真进行测量、研讨、求证。八尺之“表”的投影，照射在陶寺遗址时期的“圭”上，日影的边缘并不清晰，阴影越靠近边缘越淡，专家们利用仿制的“戚”使照在圭上的日光通过小孔，再射到圭面，阴影的边缘变得清晰起来。

现代天文学测定，2009 年 6 月 21 日的 12 时 36 分是夏至时刻，现场专家的

目光也都聚集在了这一刻。12 时 36 分，通过“戚”的小孔，人们看到“表”的投影落在“圭”上两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影长 41 厘米左右。

据专家介绍，由于 4000 多年来地球黄赤交角发生了变化，实际测量的日影要比文献记载长 1 厘米左右，由此可见，专家们的推测得到成功验证。亲自发现这一天文观测系统的何驽博士把摄像机对准“圭表”记录下了这一重要的时刻。

陶寺遗址“圭表”测正午日影发现与验证的初步成功表明，早在 4100 多年前的帝尧时期，我国就已经拥有了“测日出方位”和“测正午日影”两套天文测量系统，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

《周髀算经》有“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记载。何驽经过计算确认，陶寺遗址时期的夏至日影一尺六寸为 40 厘米，正好对应所谓“圭”的木杆上涂有红漆的某一刻度，这一发现证明了陶寺就是《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地中”，并与天文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推算的纬度不谋而合。

在陶寺夏至时立八尺杆量出日影为一尺六寸，按照“影差一寸，地差千里”的说法，陶寺立杆测影处距地的四边都是 1.6 万千米，为地的中心，结合《尧典》中的记载由此可以推算出当时的“中国”南可达今日广西、越南一带，北可达今日辽宁一带。

陶寺遗址“圭表”测日发现与验证的初步成功再次表明，陶寺遗址是帝尧古都之所在，是 4100～4300 年前之“中国”。

早在 1978 年，考古学家就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镇发掘出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又发掘出大型城址，宫殿，宗庙、王陵等，具备了王都必备的要素。经 ^{14}C 测年测得这个遗址距今约 4300～4000 年，与五帝时的帝尧时代相对应，不属于夏文化的范围。

随着“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利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复制品测量日影的成功，进一步印证了《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的记载，也进一步奠定了陶寺作为“帝尧古都”、作为“中国”的地位。

所以从以上考古发现可以看出，陶寺遗址被学术界认为对研究我国早期国家的出现以及“中国”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节　将易发扬光大的老庄与孔子

一

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差不多相同的时代里，中国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老子，或者叫李聃、老聃，也有叫李耳的，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曾做过周王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周王室日渐衰微的时期，孔子曾向他问过礼，后隐遁。学术界都称他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实不然），后来他曾写了一部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伟大哲学著作——《道德经》（即《老子》）。

老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用通俗的写作手法，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自然世界和人类事务并加以论证的哲人。

《道德经》的整篇内容根本就没有提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反而开篇就一针见血地就指出了在宇宙大自然的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的规律，老子把它称为“道”。

“道可道，非常［恒］道”。就是说在宇宙大自然中，这个自然而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的规律，虽然可以大致说出来，并且是可以恒久运行的，但却不能保证这个自然而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的规律永恒不变。如果谁要是把这个自然而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的规律，能够一丝一毫、明明白白、细致地向人们完全描述清楚，那么它就不是那个“道”了。

在《道德经》的第四十二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样一段话，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理解这句话呢？

“道”是老子哲学的逻辑起点，“道”是统领其思想的核心。“道”在老子思想中既可以指自然，也可以指事物的运动的法则和变化的规律，既可以指真理，还可以指道路，他是吸收了《周易》中“无极”的思想精髓，并结合自己的感悟将其抽象化，抽象出一种不能用语言来表述但可从天地万物的运行中领悟的“道”的概念。

“一”在中国易学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几乎能涵盖一切。“一”

是数学中最小的正整数，但在易学文化中它又可代表最大，作整体、统一、始点讲。中国有句老话叫“九九归一”，其哲学内涵非常丰富。

如果我们把“道生一”与“太一生水”联系起来，就容易理解多了。在易学文化的基础理论中，九宫八卦（图 13－9）与它的飞星图（图 13－10）都属于后天八卦，其中：

“九”为最大的阳数，代表道、运动、法则、规律等意义；
“一”为最小的阳数，代表水、冰、源头等意义；
“二”代表地球、阴阳等意义；
“三”、“四”代表生、发等意义；
“五”代表五行、中气等意义；
“六”、“七”代表圆满、和谐等意义；
“八”代表八卦、万物、根部等意义。

我们顺着“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顺序，就能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图 13－11），冲［中］气以为和”这段话理解到易道中的“数”八［三八、八卦、万物、根部］，理解到最高的一个境界。

老子的这段话一下就说到了“易”的本质，说到了后天八卦、“数”、阴阳、万物之间的关系，这就充分说明人类的智者们最早对于世界万物的认识是从易“数”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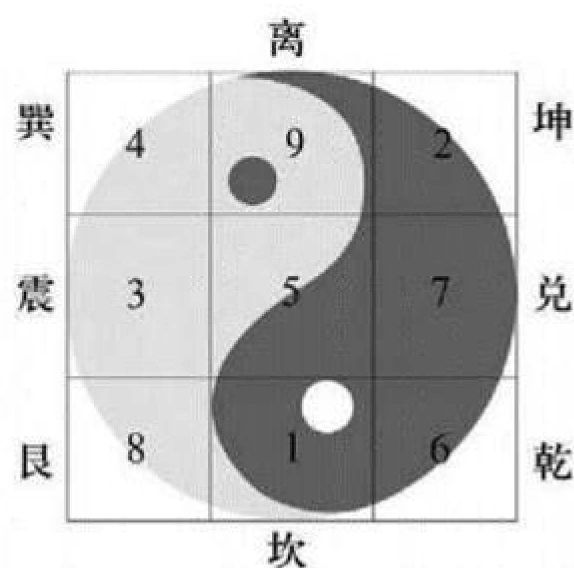


图 13－9　九宫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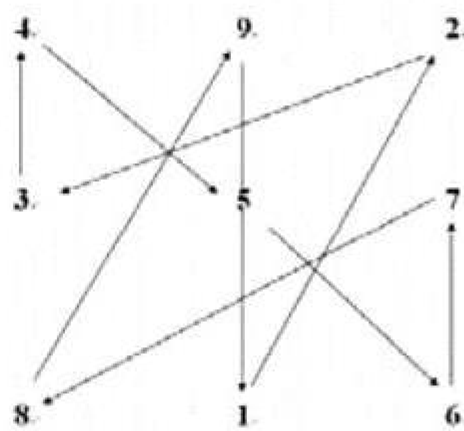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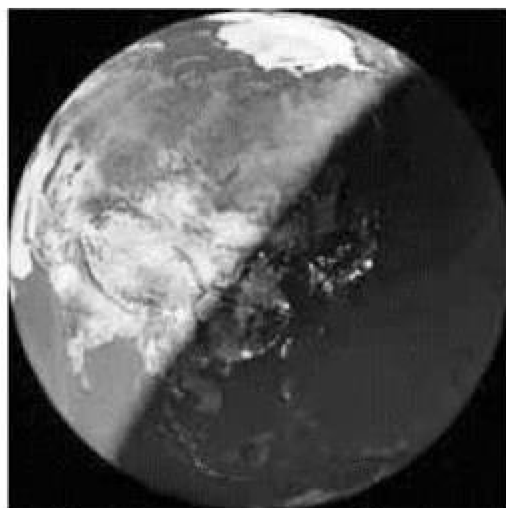


图 13－10　九宫八卦飞星图


图 13－11　地球阴阳图

即使到了春秋时代，老子在使用文字进行描述“道”的同时，还强调了易“数”具有神圣的哲学之意，能够包罗万象、万事、万物，说明人类的智者们最早对于世界万物的认识，就是“易道之广大，无所不包”的。就是说，在宇宙大自然中，原本就存在着一个一直在自然而然地运动和变化着的基本法则和客观

规律，这个始终在运动和变化着的基本法则和客观规律，却都具有一个两面的自然属性，这个两面的自然属性可以归类为阴与阳，所有被归类的阴与阳在经过交汇的运动变化之后都会衍生出三，所有的三都代表新生的事物，同样也都具有阴与阳的自然属性，它们同样在经过交汇的运动变化之后，就产生了宇宙大自然的万事万物。而所有的万事万物也同样都具有阴与阳的自然属性，它们同样也在始终进行着相互交汇的运动和变化，但运动和变化的法则和规律却始终是和谐与平衡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读《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就可以理解到更高的一个境界。

所以，只要我们理解了老子所说的“道”——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就不再矛盾了。

但是，即使在今天也还有许多人并不懂得中国易学文化中的这些法则与规律，在这些一般人看来，它们确实是矛盾的，非常可笑的，所以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据史料记载，在老子之前，从没有人提出过“道”这个概念，但这并不代表在老子之前，中国就没有人对宇宙大自然的生命运动进行过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探索。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老子能够提出“道”这个全新的概念，说明老子已经全新地理解了易学文化的精髓。

《道德经》中的“顺其自然”的思想，指的就是做事要符合万事万物的自然运行规律，而不是说人什么也不要干，只能任其发展。“无为而治”也并不是说什么也不干，而是说干大事业的人要虚怀若谷，境界要高，没有为个人的目的去做事情。遵循自然的法则就是指遵循从自然当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的客观规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的“道”也同样是指客观规律。

从《道德经》中就可以看出，一方面，他的思想理论吸收了“太一”、“无极”、“阴阳”、“数”等中国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精髓中的基础理论和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弘扬易学文化的人。

老子所在的那个春秋时期也是中国最乱的时期之一。当时的他是周国的官员（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拿着国家的俸禄，多好的职业呀，既舒服，又轻松，还能学到知识，那他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官员不去做，还非得要走呢？无非就是天

下无道了嘛，因为那时的诸侯都在较劲，都在争强争霸，谁都不服谁，天下混乱，所以他说："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意思就是天下大乱，即使是怀孕的母马都被拉去充当了战马，而累得在战场上流产了小马。）

环境形势都这样了，为什么不走呢？再加上周王室已和诸侯国差不多，弱小得不行，根本就不能与其他的诸侯国抗衡，殃及自身怎么办？他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能很清楚地预见到，周王室肯定会被灭掉的，说不定哪一天真的打起来了，周王室被卷入到战火中，他本人也被别人给灭了，他能不担心吗？他也是凡人呀，所以还是走吧！骑着青牛就走出了函谷关，过隐居的生活去了。结果周王室就像他预见的那样也被灭亡了。

因为中国的易学思想文化与所有的宗教思想文化都在强调作为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趟多么不容易，所以要明白是非，积善行德，积极进取，不断进步。当时他已经看到了混乱的这种局面，天下大乱哪来的道呢？自己又不能力挽狂澜，还留下来干什么呢？

不过他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道德经》。如果那时的局面要像现在的和谐社会这么好的话，他才不会走呢？可惜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果和假如，否则就不叫历史了。

二

庄子名周，宋国人，处在列国纷争时期，著有《庄子》一书。庄子承传了老子的思想精髓——"道"，而且所有的思想理论也都是围绕着"道"而展开的。所以老子、庄子的道学被后人们称之为老庄之道。

老庄之道含有深邃的哲学思想，熔哲理、诗情、玄言于一炉，文约而义丰，虑大而思精，蕴藏着大智慧，包含着辩证思想。其中既有从《道德经》中提炼出来的精髓，也有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提炼出来的精髓。

庄子不仅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由"和"逍遥"，在《庄子》一书中也有许多利用自然法则与规律之"道"来治国安邦的阐述。但庄子处于战国时列国纷争的时代，对他所在的那个大动荡时代的人的痛苦境遇体验深切，他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公平现象。对他来说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认为"有用"还不如"无用"好。

这样，他就同老子一样，也始终关注着自然之"道"——宇宙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的自然而然的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以智者和哲人的慧识关怀着个体的解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追求人性的彻底解放、精神的绝对

自由、理想境界的绝对纯化，并通过悟“道”来达到。

他在《庄子·齐物论》中发问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这是庄子在关注了自然之“道”后的深思：芸芸众生终日忙忙碌碌，疯狂地追逐名利，无情地侵害争夺，获得了什么成功？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很蒙昧吗？庄子这样的发问已直接趋向于对生存的意义的具体感受——苦乐——的思考。

老庄之“道”都是在从先天的自然之“道”中寻求后天“德”的修为，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如何才能够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寻求一种重生轻死、天人合一的境界。

老庄之“道”的理论有三层含义：一是世界之根本，二是最高的真理认识，三是最高的人生境界。这三层含义在易学文化的概念中又都称为“体”，有“体”就有“用”，可在当时“用”向外（社会）用不出去呀，那就只好向内（自身）用了，这种用向自身的“用”也可以看作老庄思想中的内修术。

三

在《庄子·天道》① 和《庄子·天运》② 中记载了两篇有关孔子与老子论道对话的内容。

>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緐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

① 庄周：《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136页。
② 庄周：《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146页。

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

孔子欲去西边把经书储藏在周王室。子路出主意说：“我听说周王室掌管典籍的史官老聃，引退在家，先生想藏书，可以请他帮忙。”孔子说：“好极了。”孔子前去看了老聃，老聃对孔子的要求却不答应，于是孔子翻检很多的经书反复加以解释。老聃中途打断孔子的解释，说：“太冗繁，希望只听这些书的要点。”孔子说：“要点在于仁义。”老聃说：“仁义是人的本性吗？”孔子说：“是的。君子不仁就不能成就名声，不义就不能立身于社会。仁义，确实是人的本性，还有什么指教？”老聃说：“请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中正并且和乐外物，兼爱而没有偏私，这是仁义的实情。”老聃说：“噫，危险啊！后面这些话，谈兼爱天下，岂不是见解陈旧而不合时宜吗？说无私，其实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人对自己的爱。先生想让天下的人都不失去养育自己的条件吗？那么，天地本来是常在的，日月本来是光明的，星辰本来是罗列的，禽兽本来是各有群体的，树本来是直立于地面成长的。先生依照自然状态而行事，顺着规律去进行，就是最好的了，又何必奋力标榜仁义！这岂不是就像击鼓寻找逃跑的人吗？鼓声越大，跑得越远。噫！先生扰乱了人的本性啊！”

从上面这篇两者的论道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之道的核心开始是“仁义”。那么在老子那里讨教了之后，孔子之道的核心是否受到影响了呢？下面庄子又写了一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术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

"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

"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慄，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归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

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这一大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

孔子活到五十一岁时还没有得“道”，于是往南去沛地拜见老聃。老聃说：“你来了吗？我听说你是北方的贤人，你也领悟了大道吗？”孔子说：“还没有得道。”老子说：“你是怎么寻求的呢？”孔子说：“我从度数方面去寻求，下了五年的工夫而未得道。”老子说：“你又怎样去寻求的呢？”孔子说：“我又开始从易学阴阳方面去寻求，十二年了，还是没有得道。”

老子说：“这就对了。如果道可以拿来奉献，那么国人没有不向国君奉献的；如果道可以用来奉送，那么人子没有不奉送给父母的；如果道可以告诉别人，那么人们没有不告诉自己的兄弟的；如果道可以给予人，那么人们没有不给与子孙的。然而这事是不可能的，没有别的原因，心中不自悟则道不能停留，向外不能印证则不能推行。发自内心的领悟，不能被外方所接受，圣人主不会告示；由外部进入内心的东西，而心中不能领悟时，圣人也就不会留存。名声，是公众使用的器皿，不可以多取。仁义，是先王的旅舍，只可停留一宿而不可久居，相处的时间长了必然会生出多种责难。

“古代的至人，对仁义来说只是借路，对义来说只是暂住，来游乐于逍遥的境域，生活在简略的境地，立身于不施与的园圃，这样就可逍遥无为。简略就容易满足；不施与就无耗费。古代的人称这种情形为探求内心真实的遨游。

“拿财富为追求对象的人，就不可能让人利禄；拿显赫为追求对象的人，就不可能让人名声；迷恋权势的人，就不可能给人权柄。操纵它就战栗，放纵它就悲苦，这种人心中没有明见，眼睛只是盯住自己所不停地追求的，好像是受着刑戮的人。怨恨、恩惠、获取、施与、谏诤、教化、生存、杀戮，这八种做法全是纠正他人的工具，只有遵循自然的变化而不被物欲所阻塞滞留的人，才能够运用它。古人说，自正的人，才能正人。如果内心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心灵的门就不会打开了。”

孔子见到老聃就谈论仁义。老聃说：“簸糠进入眼睛，天地四方看来就

像颠倒了；蚊虻叮咬皮肤，他会通宵不得入睡。仁义毒害人心，其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你如果让天下不至于丧失本来的质朴，你就可以依风而行，执德而阙，又何必用力急急宣扬仁义，好像打大鼓去寻找逃跑的孩子呢？白天鹅不是天天洗才白，乌鸦不是天天染才黑。黑色和白色的本质，不值得分辨；名声和荣誉都属于外在的东西，更不值得张扬。泉水干了，鱼都相互依偎在陆地上，相互张着口出气来取得湿润，靠唾沫相互得到一点沾湿，倒不如在江湖彼此相忘。”

孔子见了老聃回来，三天不说话。弟子问说：“先生见到老聃，对他有什么教育吗？”孔子说：“我如今竟然见到了龙！龙合起来便成为整体，分散开来则成文采，乘驾云气而翱翔在阴阳之间。我大张着口不能合拢，我又哪能对老聃有什么教育呢！”子贡说：“那么，人难道有像尸体般的安定而又像龙一样的神情飞扬，像疾雷震响，如深渊沉寂，发动如天地运动变化的情景吗？我也可以去见到他并能体察吗？”于是凭借孔子的名义去见老聃。

老聃正坐在堂上，轻声应答说：“我年岁老迈了，你将凭什么来告诫我呢？”子贡回答说：“上古时代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各不相同，但同样地都有好名声，唯独先生不认为他们是圣人，为什么呢？”

老聃说：“年轻人稍微往前一点！你凭什么说他们各自有所不同呢？”子贡回答说：“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禹用力治水而汤用力征伐，文王顺从商纣王不敢违逆，武王违逆商纣王不肯顺从，所以说各不相同。”

老聃说：“年轻人再稍微往前一点！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事。黄帝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地淳朴，百姓有人死了其亲属不哭泣也没有谁非议。唐尧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心相印，有人为了亲近亲人根据等差关系做到亲疏有别也没有谁非议。虞舜治理天下，使百姓立志竞争，孕妇十个月生孩子，孩子五个月就可以讲话，不等长到两三岁就开始识别人我，于是开始出现短命的现象。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的心多变，人人各怀私心，以用兵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杀死盗贼不算是杀人，人们各自结成团伙而奴役天下的人，所以天下大为震惊，儒家、墨家都纷纷兴起。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有伦理的等次，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可言的呢！我告诉你，三皇五帝的治理天下，名义上说是治理，而实际上弊乱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三皇的心智，对上而言掩蔽了日月的光明，对下而言违背了山川的精华，就中而言破坏了四时的运转。他们的心智比蝎子尾端的剧毒还毒，就连小兽也得不到安定性命的情分，却还以为是圣人，不是可耻吗？”子贡站立着惶惧不安。

孔子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

书，自己认为是很久了，熟悉旧时的典章制度；拿来进见七十二个国君，讲解先生的道理，彰明周公、召公的业绩，然而没有一个国君取用我的主张，极难啊！是这些人难以说服呢，还是道理难以彰明呢？”

老子说：“幸运啊，你没有遇上治理天下的国君！六经只不过是先王留下的陈旧遗迹，哪里是先王遗迹的本原？如今你所说的，如同足迹；足迹是鞋踩出来的痕迹，然而足迹怎么是鞋呢？白鶂雌雄相看，眼珠一动也不动便相诱而生子；虫子，雄的在上方鸣叫，雌的在下方应和而生育；名叫‘类’的动物，自身具备雌雄两性，所以自身可生育。本性不可改变，命运不可变更，时光不可停留，大道不可闭塞。如果得到道，无论怎样都可行；失去道的人，无论怎样都不可行。”

孔子不出门已有三个月了，然后再去见老聃说：“我得道了。乌鹊孵化而生，鱼儿借助濡沫而生，蜜蜂是知化生，弟弟出生，哥哥失爱而常常啼哭。时间很久了，我没有和造化交朋友，不和造化交朋友，怎么可以去造化人？”老子说：“可以。孔丘得道了。”

从孔子与老子这篇论道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开始的“仁义”核心就发生了动摇。孔子下了五年的工夫，从“度、数”方面去寻求而没有得“道”；孔子又下了十二年的工夫，单从易学“阴阳”［或《易》的文字］方面去寻求也没有得到“道”；他自认为研究《易》很久了，也还是没有得到“道”。

孔子自开始见了老子之后（图 13－12），才深感自己没有得道，回去开始结合自然（从上面孔子与老子的最后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反复读易、研易、悟易，最后终于得到了老子的评价——孔丘得道了。《十翼》大概就是他在结合自然反复读易、研易、悟易期间同弟子们一起述著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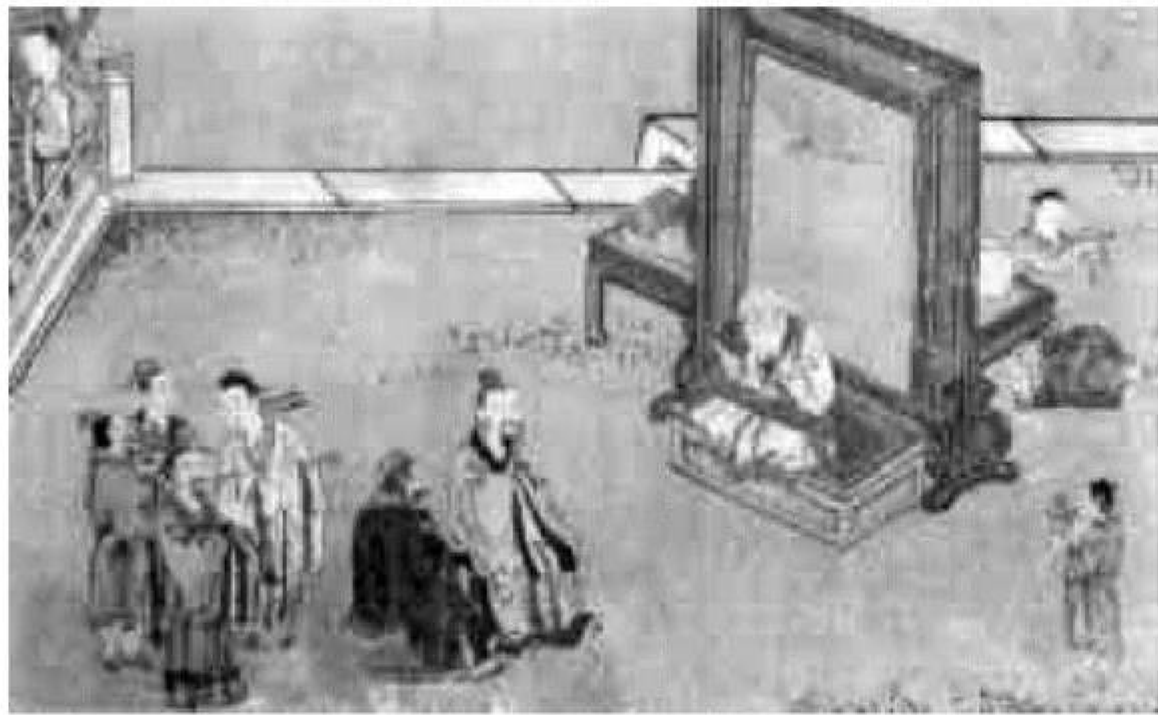


图 13－12　孔子问道图

《论语》中就记载着孔子的这样一句感叹："朝闻道，夕可死矣。"可见孔子自认为没有完全得到真正的"道"，他又是多么渴望得到真正的"道"啊！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即孔子为读《易》而多次翻断了连接竹简的牛皮带子。尤其是被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论语》也记载着孔子的这样一句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四

当代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在《大易新解》"《易经》要义——孔夫子论易"中，研究阐述了孔子对《易》的认识与态度，下面是三篇原文和译文的摘录。[①]

（一）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

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智）谋远者，卜筮之蔡（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易》，昏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曰："君子言以巨方也。前羊（祥）而至者，弗祥而巧（考）也。察其要者，不趋其德。《尚书》多淹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

（白话译文）孔夫子老年而爱好《易》学。在家则将其置于座席，出行则将其带于行囊。

子贡说："老师当年教诲我们弟子们说，只有丧失德行的人，才会指望迷信神灵。只有远离智谋的人，才会采信于卜筮。子贡我一直相信您的话。然而若根据您的教诲，相信《易》就也是昏迷糊涂的行为，为什么老师到老年反而会爱好它呢？"

孔夫子说："君子讲话要有准则（矩方）。在前的现象发生，未发生的现象也有迹可考了。知道事物的规律（要）就不会违背它的本质（德）。

① 何新：《大易新解》，时事出版社，2002，第3~6页。

《尚书》太古老而且很多篇已亡佚了。《周易》则未丧失掉，而且它是古代遗留的言论呵。我并不是以它作为卜筮工具用呵！”

(二)

“赐！吾告女……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奸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后（候）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

幽（由）赞而达数，明数而达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也。

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也。

赞而不达乎数，则其为之巫。

赞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候）乎？”

(白话译文)“子贡呵，让我告诉你吧，研习《易》，对于强者可以使他懂得恐惧；对于弱者可以使他成为坚强。对于愚人，可以使他变成不糊涂；对于奸人，则可以使他变成不敢怀诈。文王之所以成其仁义，正是由于他先处在不得志的地位而难以实现他的宏伟抱负。当时纣王不遵守天道，文王韬光养晦而努力避免犯错误，于是形势转变而得到振兴。”

子贡说：“那么老师你也相信占卜策卦吗？”

孔子说：“我占卜一百次，大约有七十次是应验的。只有周梁山那次占卜是例外，但我总应该相信那些多数吧。”

孔子说：对于《易》我难道是靠它卜筮吗？我注重的是它的本质和意义呵！

由《易》的赞辞达到理解其数理，再由明了数理而达到理解其内涵的

本质（德），坚守于仁爱的原则而行事遵守礼仪（义）。

虽然念诵其赞辞却不明其数理，那不过是巫士而已。虽然了解数理却不能理解其内涵的本质，那也不过是史官而已。史官巫士的占筮，有目标却追求不到，虽然爱好“易”却似是而非呵！

我想后代那些怀疑孔丘的人，一定是由于我的《易》学吧？我但求认知其本质而已。我与那些史官和巫士们虽然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但目标旨趣却不同呵！

君子靠道德的行为而追求福祉，连祭祀都很少。靠仁爱之心和坚持礼仪去寻求吉祥，所以也很少进行卜筮。怎能依靠（候）祷告、巫士和占卜算卦呢？”

（三）

孔子治《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参（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

《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万勿（物）之所以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损。道穷焉而产道衰焉。

《益》之始也吉，其冬（终）也凶。《损》之始凶，其冬（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

是以察于《损》《益》之总者，不可动以忧喜。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白话译文）孔子研治《易》学，每次读到损、益二卦，没有一次不放下书而叹息。他告诫其门下的弟子说：各位年轻人！关于损、益得失的道理，你们不可以不认真思量呵！因为这是吉事与凶事的大门呵。

“益”这一卦呵，发生在春转为夏之交。这时万物方生长，而阳光也在变盛，是滋育生产的季节呵，所以名叫“益”。而“损”这一卦呵，发生在秋转为冬之交。万物都在走向衰老，而阴气也在变强。所以名叫“损”。

益卦的开始是吉事，而其结果是凶事。损的开始是凶事，而其结果却是吉事。从一损一益的循环之道，可以观察天地的演变，而这正是君长的正事呵。

所以明察于损与益的规律，就不会为得失而忧喜。有才能的人会统一地

来运用这两个规律（损之与益之），所以说掌握规律就能主宰万物，就是指这一点。从损与益的规律，可以理解人世间的一切成败得失呵！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真正是须臾不离，废寝忘食。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孔子还谦虚地说：“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其实孔子学《易》之前只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并且他不主张占筮，而到晚年才日益热衷于研究《周易》。

从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出他的占筮准确率为70%。他的学生子贡不赞同他的这种变化，批评他怎么老了老了却迷上了占筮呢？

正是由于孔子频繁地占筮实践，很自然地使他对《周易》卦爻辞的文字加以了细致的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喜爱上了卦爻文辞，甚至连其占筮的功能都忽略了。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他对《周易》的全新认识，发现了《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于是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对《周易》的理解、解读、翻译和评价言论，这些言论后来被他的弟子们收集整理后，著成了《易传》，其中包括《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也称“十翼”，这对后来中国易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孔子曾说：“《尚书》多淹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大意是：“《尚书》真实的文字和内容大多已经被淹没失去了，而《周易》这本书虽然未丢失，被留传了下来，但却又是被遗失了古人本意的文言啊！”在《论语》中孔子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从这些史料还可以看出，作为一名优秀而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的孔子及弟子们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对《周易》的热爱与崇拜。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老庄之道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比较，虽然他们都非常重视人生的意义问题，但老庄他们的思想中大多在充满了智慧的同时，也充满了自由，是要解决个体安身立命的问题。他们看问题的境界实在是太独特、太高了，可这样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被统治者所利用，也不会为统治者服务，如果在那个时代加以提倡和推广的话，百姓们就都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那可怎么了得啊？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则相反，所以他们的世界观不同，志向、行为也不同，更多的是赋予了自己以“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想靠个体的人生来影

响、整治礼崩乐坏、政道废弛的社会环境，来调节、拯救“仁义不施”的人伦危机世风。儒家思想被君王用来教化天下的事，也是以后的事了。

前人对老庄之道与儒家思想研究已经非常多了，笔者不再赘述，目的只是在此略述一下老庄之道、孔子之儒家思想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孔子及他的弟子提到的卜筮、占筮，其实就是算卦，算卦是个中国的概念词汇，“算”在《周易》中的写法是“筭”，“算命”（筭命）这个词汇以及中国现代常提的“革命”这个词都是出自《周易》革［勒］卦九四爻的爻辞（参见拙著《周易卦爻辞真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命”在革［勒］卦九四爻的爻辞中是“规律”的意思，原意是说改变制造牛皮绳的规律，按现代说法就是改变制造牛皮绳的工艺、标准和规范。否［妇］卦的九四爻也提到过，之后延伸出来的其他生命的自然运动规律和人生的发展轨迹也被纳入到这个概念中了，都是在指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运动法则。

唯物主义地、科学地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哲学永恒的主题。在《周易》中命运是《周易》所探讨的永恒的主题。小到一个人的命运（人的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客观规律），中到一个企业的命运（企业与品牌生命力的科学客观规律），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国家政党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是否与时俱进的科学客观规律），无非就是针对那些家事、国事、天下事，寻找一个既要向前进又能求解放的生存规律和法则罢了，也就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分析和结果的证明。在西方哲学概念中，证明本身就是一个演绎逻辑的问题。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人与事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那就只有灭亡。

我们古人最早有了“易”这个清晰的系统思想文化和知识之后，做任何事特别是重大的事，都要预先对它进行信息处理分析，就像我们现在要上一个项目所做的可行性研究分析报告一样，其中包括国家的宏观调控、价格、市场前景、投资的概算、收益等，这就是主卦，也就是主体现象的内容。还有一个变卦即变化现象的内容，就是主体现象变化后的结果，有时又是对主体现象的验证。二者要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这个项目建成投产之后，要对建设这个项目的预算、决算进行审计，看与投资的概算相差多大，产品投入市场后的回报有多大，收益是多少，最大的误差尽量不要超过 10%，即准确率要尽量达到 90%。这是定量的分析与验证。还有定性分析，包括国家的宏观调控对此项目建设前后的变化是否一致，市场的需求是否发生变化，原料及产品的价格是否波动，等等。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变化来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如果分析、预测出可能潜在的突发事件，再制定相应的对策，也就是应急预案。等变化结束、有了结果以后，回过头来再进行验证，将实际结果与计划进行对照，分析其中的差异，找出原因，总结提高。

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原则：世界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被单独的理解，除非把它放在宇宙的背景中加以领会，其结果是，只有整体才是唯一的实在。当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哲学家们说“万物皆数”的时候，他们同样暗示了这个观念。而中国古人在《河图》和《洛书》中早就是通过这样“万物皆数”的方式，阐述了宇宙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早就在易文化中说过“一物一太极”（就是西方哲学认为的每一个单子都能反映整个世界）。但易文化中的哲学观点却始终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卦不能单独看，要放到对应的事物中去进行整体的逻辑分析和证明。在《河图》和《洛书》中，在中国汉语言的表现形式上，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里的“奇门遁甲”和“大六壬”中的天盘、人盘、地盘的组合形式上，在中国算盘的形式及运用上，就都反映了中国古代智者们对天地人合的独特的太极思维模式。

从前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堪称中国易学界前辈里的大家了，可为什么许多后人读了孔子及弟子们撰写的《彖传》《象传》《文言》《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的《十翼》后，还始终不能破译《周易》、读懂《周易》呢？原因是孔子及弟子们以及后来太多太多的学者、易学家都曾研究过《周易》，注释过《周易》，但由于中国的古代汉语非常深奥、难懂，而他们自己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是在摸索前进，所以很多处没有读通、没读明白也是很正常的。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解读注释也不是很准确。

但孔子及弟子们却非常谦虚，并且在《象传》中也多次提出了质疑，这实际是给后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做承上启下的工作，这也正符合孔子他自己所倡导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体现出了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在做学术研究时一丝不苟的难能可贵的精神。

“卦”实际就是“挂”这个字，是通假字，其实就是中国智慧的古人在用形象的手法比喻人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挂在宇宙大自然中天地之间的一种自然现象，比如睽［乖］——日全食、大有［大有］——天空的太阳、离［罗］——灿烂的太阳等。卦辞，就是中国智慧的古人将“卦”的这个自然现象进行形象思维，来对应某个事物、事情及人事的比喻和描述。“爻”，实际就是“系”这个字义的反义词，也是一个象形字，就是起卦的时候，动手把互相交合在一起的蓍草反复变化地分开，分拨成两部分的意思，以及把像绳子或辫子一样的拧搓的、复杂的疑难问题要反复解开的意思，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用钥匙能打开锁的意思。爻辞，也是中国智慧的古人将“爻”这个正在变化着的自然现象的过程用形象思维对应到某个事物、事情及人事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用比喻描述向人们提供的答案。“彖”，实际是指猪的鼻子，那个猪拱，因为嗅觉灵敏，又有翻土找食的

能力，是猪所具有的像爪子一样的本领的工具。如同“啄”与“喙”的这两个汉字都与鸟嘴有关一样，而“喙”却明确的是在指鸟嘴上非常锋利突出的部分。“象”，实际是指大象的那个长鼻子，也是因为嗅觉灵敏，鼻子又具有像手爪一样的功能，具有翻、找、拨、摘食的能力，绝不是单纯地在指大象。“文言”，实际就是“闻言”，也就是用鼻子所闻到和嗅到的意思，即把它用文字表述、描述、书写出来，“文言”与“语言”的概念是两回事，绝不是文饰的意思。

“彖”、“象”、“文言”，这三个词的意思实际都是在指翻译，都非常明确的是在指用鼻子，指通过鼻子的嗅觉能强烈地感觉到是如此如此这样的信息，是如此如此这样的意思。

结果是经过了《彖传》对卦辞、卦名的一次翻译，他们还没有搞清楚，还在努力，再用《象传》对爻辞翻译一次，并给后来的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些他们也没有搞明白的问题，希望后人继续来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对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挖掘的使命，继续研究和推动易学思想文化的发展。

用“彖”、“象”、“文言”这些字和词实际就跟把《河图》和《洛书》分别用马和龟来代表是一个意思、一个目的。在古代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没有翻译这个词汇，那怎么办？那就只好到自然界的动物当中去找一个非常相似的形象代言者了。

尽管如此，但自孔子之后中国易学界的学者们都充分地肯定了孔子及弟子们为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笔者坚信，“易”或《易》为中华文明之源，中国的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等所有的诸子百家之学和思想都是来自于《易》，与易学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没有跳出易学文化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国学只有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与诸子百家的学说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学，也才能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发扬光大。这就是易道之大，无所不包的天地人合的易学最高境界。

第五节　古诗词、建筑、歌舞、作战中的易学思想

一

在中国自西周至春秋中期所收集的最古老的诗词中，就包含着天地人合的易学文化思想，例如：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经》的第一篇，为反映男女爱慕之情的诗歌。在第一段的前两句和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的下半个声音读法（就是汉语拼音中的韵母）都是 ou (iu)。按诗歌体裁的说法叫押韵。这是因为古人把诗歌每一段的第一句或第二句看成是天，把诗歌每段的最后一句看成是地，把里面的内容和第三句看成是人，就是说天地本身就是自然地合在一起的，只不过内容是人为而添加的，从形式上就表现出了天地人合的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这其实就是一个格式化的东西，是古人从大自然中总结出来的天地人合的易学思想文化。

硕鼠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
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

伐檀

坎坎伐檀兮，
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

通过《硕鼠》和《伐檀》这两首古老的诗歌可以看出，诗描述的自然情景是天，写出来的文言是地，经过采风而组织编纂的内容是人。从这两首诗歌和谐的韵脚以及对仗和平仄的语法可以看出古人在诗歌的形式上也表现出了天地人合的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和天地人合的哲学和易理的思想。诗歌是这样，词也是一样的。

由于我们的古人具有很强的形象思维的能力，所以诗歌内容的表现就具备非常高的境界，需要读者去不断感悟。只要读者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形象的思维能力，就能体会出作者所要表达的那种境界。用这种形式去写作，去阅读，就会自然而然的天地人合了。

二

中国古老的建筑思想及用词里融入了易学思想。

古人的建筑思想也是很科学的。比如盖房子就是要讲究地基要牢，屋顶要轻。“轻”与“清”在声音读法上是一致的，古人天地人合的思想认为与屋顶相对应配合的就是天，天是清的，屋顶自然也是对应起来要是轻的（“清”的谐音）。

由于古人受到的是易学思想的熏陶，认为天是清的，屋顶也要轻，地是浊的，基础也要牢，所以在文字的语言声音读法中，“顶”字读起来就很清爽和干脆，“基”字读起来相对就很拖沓和浑浊。从“轻”和“清”以及“顶”和“基”的声音读法中就可以体会出中国智慧的古人所具有的天地人合的易学思想文化与建筑思想文化的结合。

三

中国古老的音乐歌舞思想及用词里融入了易学思想。

《论语》的“八佾”中提到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大夫季平子使用了只有周礼天子才能用的“八佾舞”，这“八佾舞于庭”中的“佾”就是古代舞蹈奏乐的行列，八个人为一行，这就叫一佾。八佾就是八行共六十四人，与易学《周易》

中的八八六十四卦正好吻合。可见在周时，天子所采用的舞蹈队列就已经汲取了易学体系中的思想文化。

在墨子说的“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于戚”中，动词、形容词、名词声音读法的对应就很规整，并采用了易学体系中五行的思想文化。

撞：动词，声音读法中有 zh 的齿金声。

巨：形容词，声音读法中有 j 的齿金声。

钟：名词，声音读法中有 zh 的齿金声。

击：动词，声音读法中有 j 和 i 的舌火声。

鸣：形容词，声音读法中有 i 的舌火声。

鼓：名词，声音读法中有火（huo）中的 u，借用过来属火，还有物极必反的水意。

弹：动词，声音读法中有 an 的牙木声。

琴瑟：名词，瑟字的声音读法中有 e 的牙木声。

吹：动词，声音读法中有 ui 的唇水声。

竽笙：名词，笙字的声音读法中有 en 的牙木声、ui 的唇水声生、en 的牙木声。

四

中国古老的作战思想及用词里也融入了易学思想。

中国古代作战中提到的所谓“奇门遁甲”，其实就是综合了从天气的预测到对方实力判断的各类策划、参谋和分析的方法，就是在完成兵法中强调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一个宗旨。在列兵布阵的各类阵法中，不论它如何的巧妙变化，都逃不出九宫八卦中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所对应的开门、惊门、景门、伤门、杜门、休门、生门、死门这八个门。

古人在作战中规定了各种命令的信号，对应着要执行各种行动的意义：

吹号角——出发

号角代表每年的春天和每天的早晨。在“号角”两个字的声音读法中都有 ao 的牙木声，对应着每年春天的草木发芽与每天早晨太阳的露头，所以用吹号角来代表出发的意义。

举旗——冲锋

举旗代表每年的春夏之交和每天的上午辰、巳时。在“举旗”两个字的声音读法中有 j、q、i 的舌火声，对应着每年春夏之交草木旺盛的生长，每天上午太阳逐渐地升起，要热起来了，所以用举旗来代表冲锋的意义。

擂鼓——助击战

擂鼓代表每年的夏天和每天的正午时。在“擂”字的声音读法中有 l 和 i 的舌火声，自然界的打雷闪电也为火。在“鼓”字的声音读法中有火（huo）中的 u，借用过来属火，每天的正午时还有就要物极必反的意思，所以用了属水［开水、沸腾］的唇声，就是要用火来表示战斗的拼杀和搏击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对应着夏天、开水、正午时分太阳的炽热，所以用擂鼓来代表酣战的意义，来助威击战。

鸣金——收兵

鸣金代表每年的秋天和每天下午的申、酉时。在“鸣金”两个字的声音读法中有 in、j、in 的齿金声，对应着每年秋天的丰收和每天下午太阳就要落山了，要凉下来了，金属在自然状态下是凉的，所以用鸣金来代表收兵的意义。

偃旗息鼓——埋伏

偃旗息鼓代表每年的冬天和每天的夜晚时分。在“埋伏”两个字的声音读法中有 m、f、u 的唇水声，对应着将冬天的收获藏起来和每天夜晚子时的太阳就要快生机勃发地出来了的意思，有就要物极必反的快亮了的意思。在“偃旗息”三个字的声音读法中有 y、q、x、i 的舌火声，在“鼓”字的声音读法中有火（huo）中的 u，借用过来属火，就是要表示快要袭击了，所以用偃旗息鼓来代表埋伏的意义。

这也非常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打埋伏就是要悄无声息，动物在猎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先悄无声息而后才突然袭击的吗？还有白天观旗、夜晚看火号等动作，在此就不一一解释了。所以说易学是国学或者说汉学以及中国所有古学科的根源。

第六节　战国时期的易学

一　楚帛书中记录的天象与神话

著名的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图 13－13）[1] 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一段图文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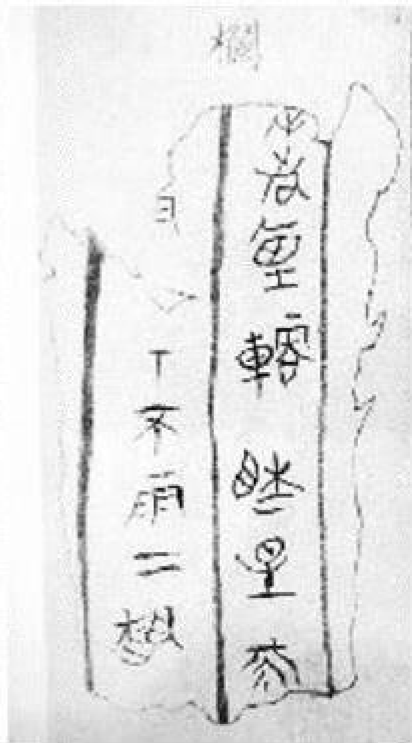
① 何新：《宇宙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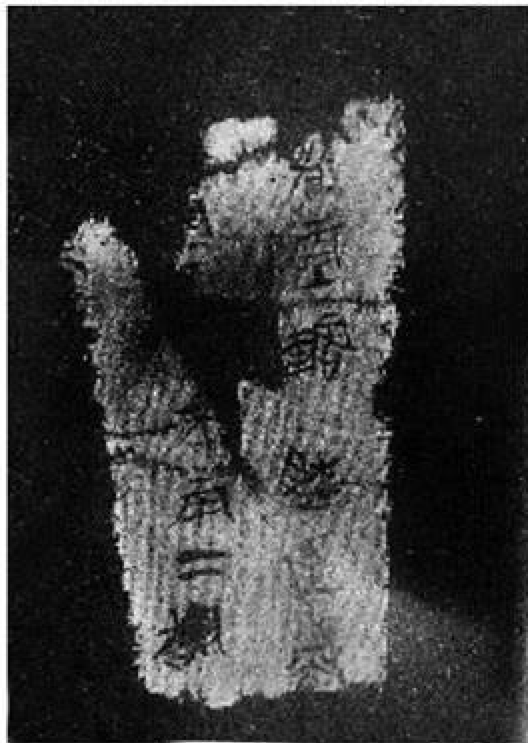
茂的画及文字，字体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楚文字，全书共900余字，分两大段，四周有12个图像，旁各附一段文字，四角还有植物枝叶图像。它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一件千古奇绝的书法作品，是楚文化充满想象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其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月忌、创世神话等，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它记载了创世神话，推翻了西方天文学界对于中国没有创世神话的偏见。



图13－13　现藏于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

今天，楚帛书主体部分及一块残片远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另一块残片（组图13－14）则被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楚帛书主体高38.5厘米，宽46.2厘米；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残片原为著名考古学家及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收藏，20世纪90年代，商家将其捐赠给了湖南省博物馆。残片最长处约4.6厘米，最宽处约1.7厘米，上有14个字。





组图13－14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楚帛书残片及临摹图



图13－15　楚帛书部分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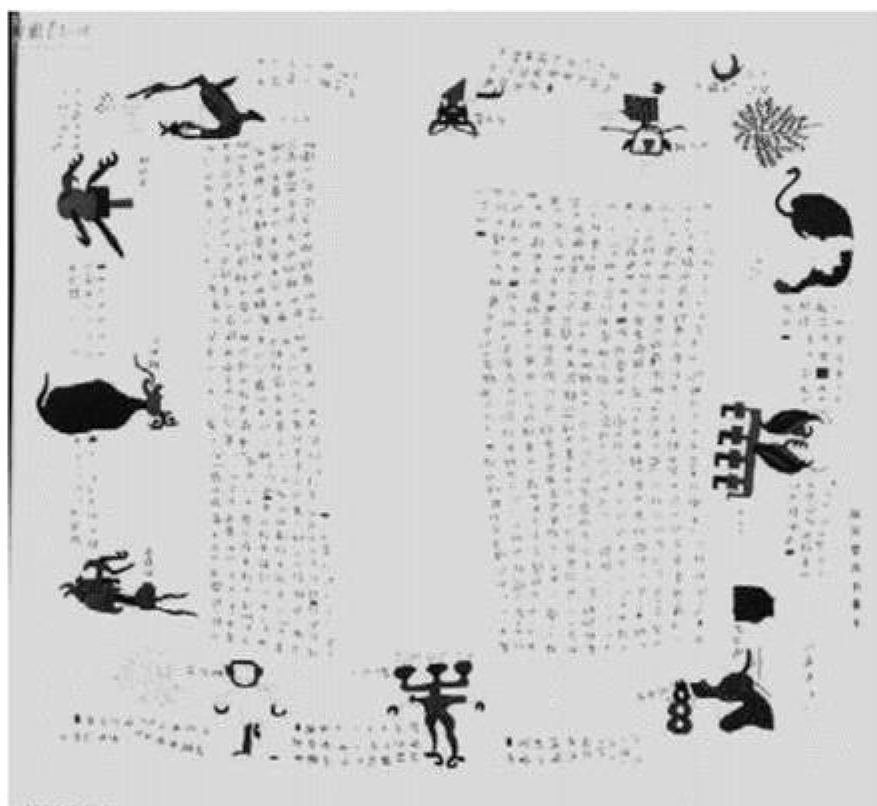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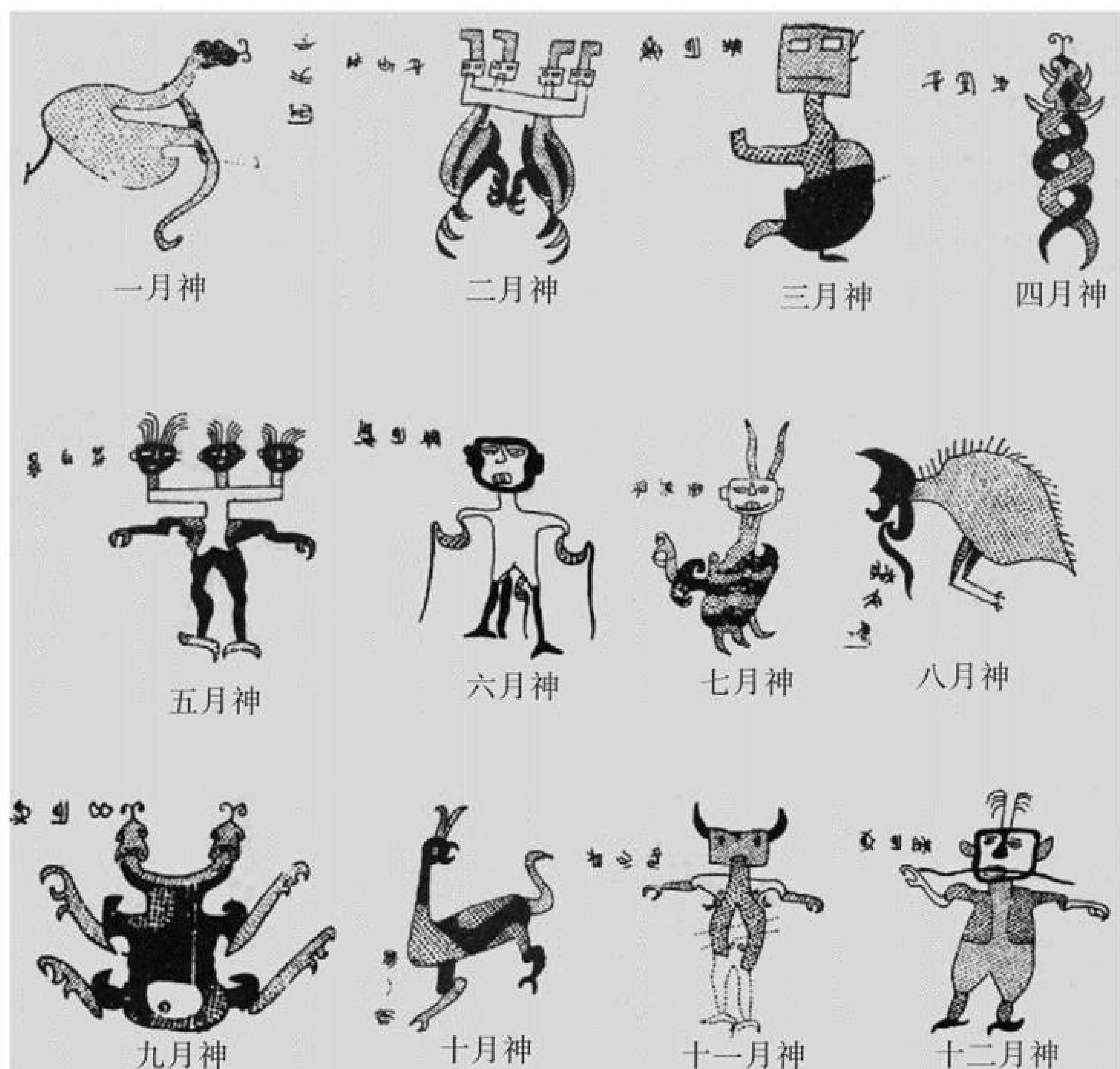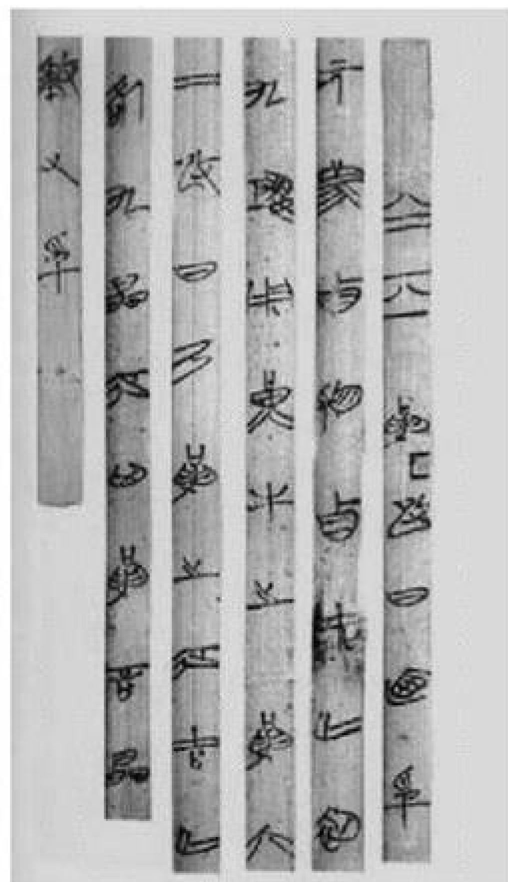


图 13－16 楚帛书图

中外许多学者都对楚帛书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只是笔者认为，楚帛书中记录的十二月神都是易学文化中十二地支的形象写照，是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中易学文化中十二地支与神话的结合。四角的植物枝叶图像，是用大自然中植物的明显变化在形容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转折点（图 13－16、图 1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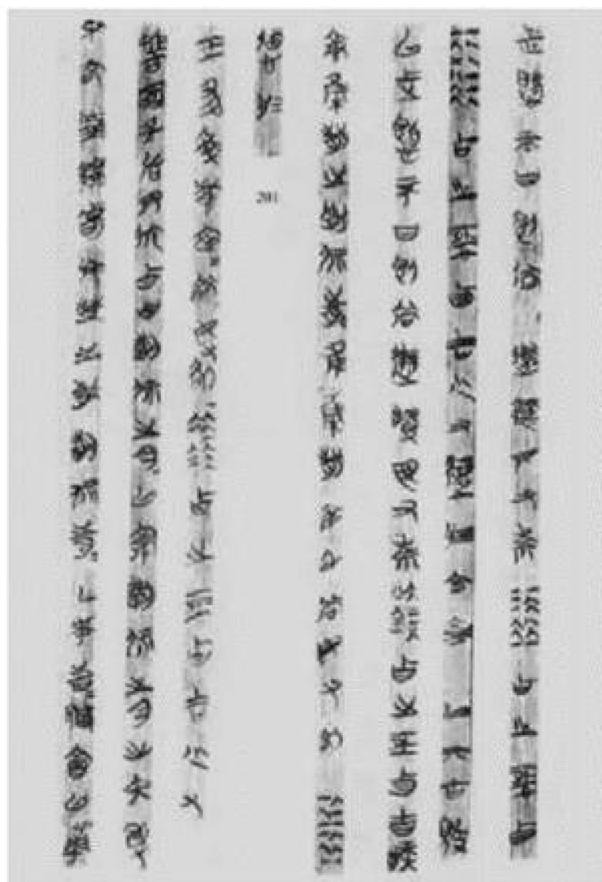


组图 13－17 楚帛书中记录的十二月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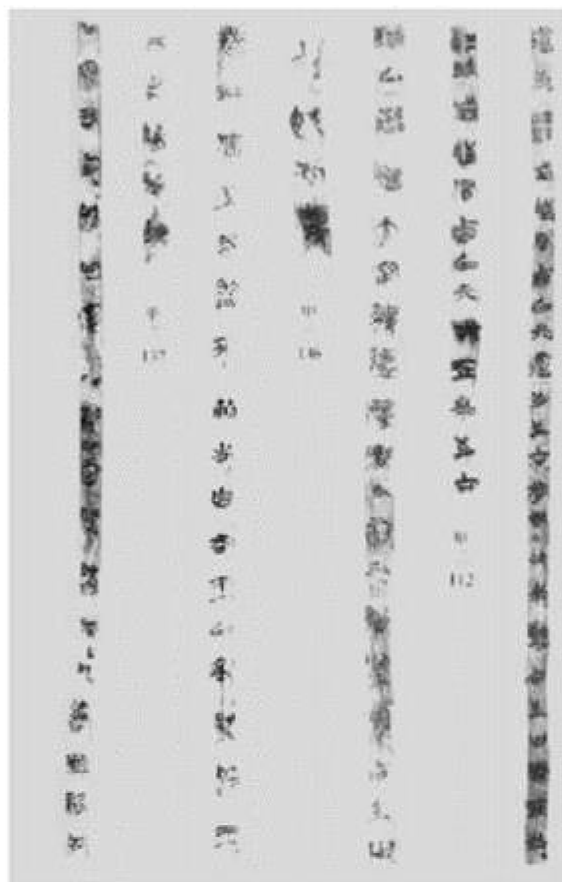
二　战国时期的楚竹书《周易》[1]



上海博物馆藏
战国楚竹书《周易》



包山楚简本卦
与之卦书写文例



新蔡楚简本卦
与之卦书写文例

组图 13－18

第七节　汉以后的易学与应用

一　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天星、天学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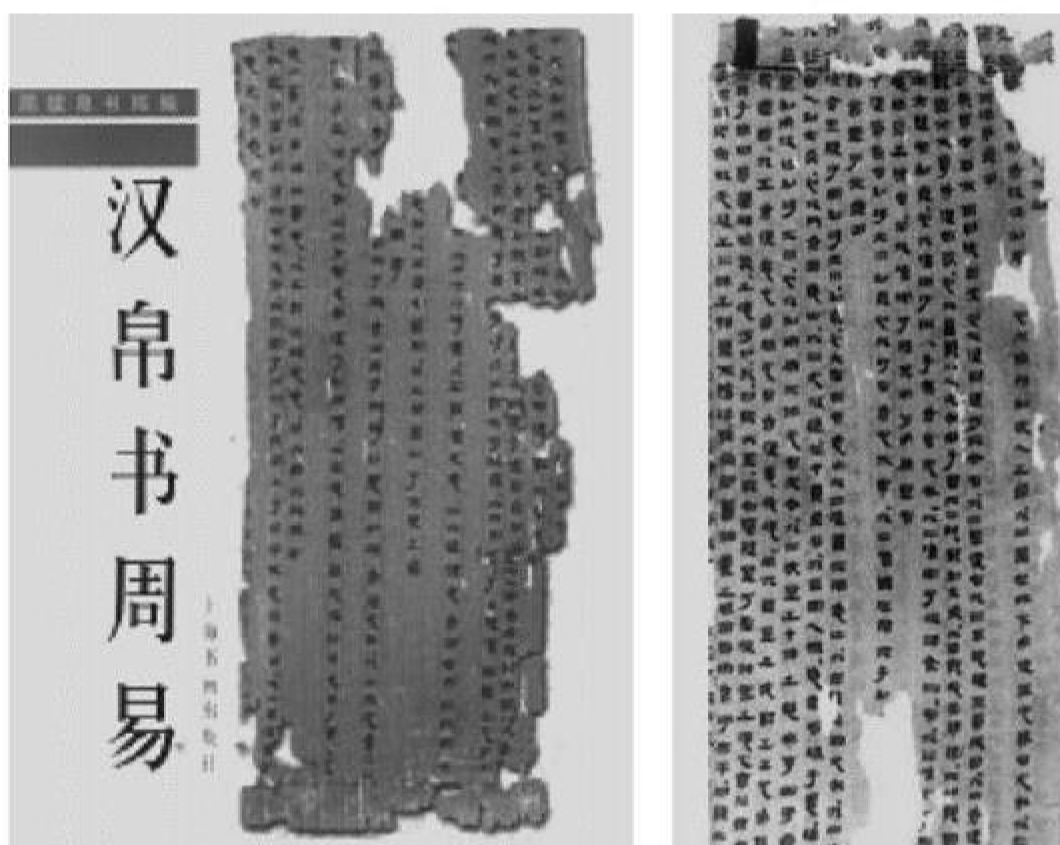
1972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马王堆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发现了大量的文字及图画文化实物，尤其是帛书《周易》（组图 13－19）[2] 的出土，对我国汉代早期《易》学文化的研究，又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真实材料。

从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T 形帛画（组图 13－20），我们可以看出右顶端的太阳鸟（太阳）和左顶端的蟾蜍（月亮）被表现在了至高无上的天的顶部位置。在太阳鸟（太阳）的旁边有三只鸟，表现出了三“数”［离］，在蟾蜍（月亮）的旁边有两只鸟，表现出了二“数”［兑］，正好符合易学文化先天八卦中离与兑的“数”。

---

① 朱兴国：《三易通以》，齐鲁书社，2006，插图。
② 何新：《大易新解》，时事出版社，2002，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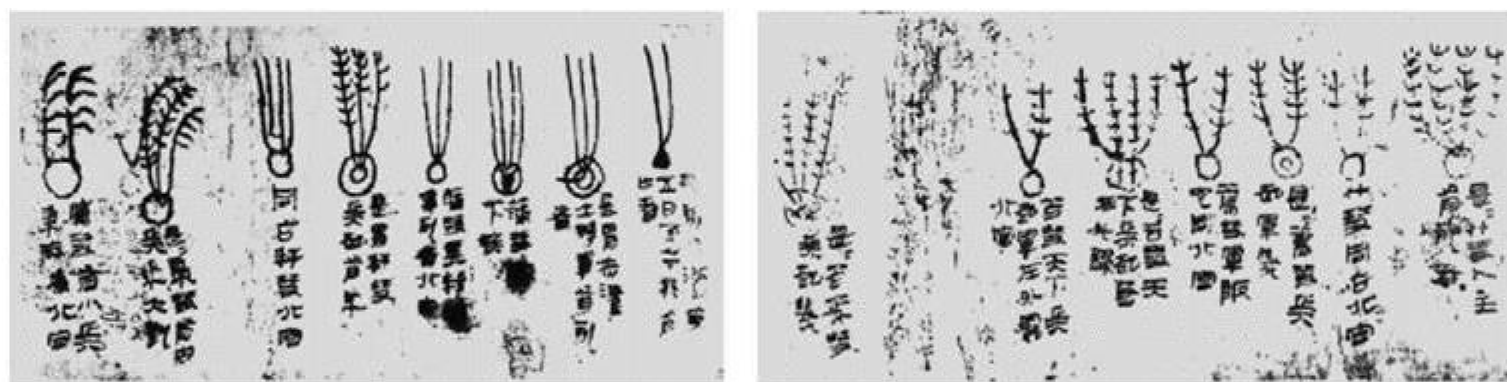
从马王堆中还出土了一份与天星、天象、天学有关的彗星图画实物（组图 13－21），它绘出了 29 种彗星的图像，其中每一种彗星的图像下都有对应的星占占辞。



组图 13－19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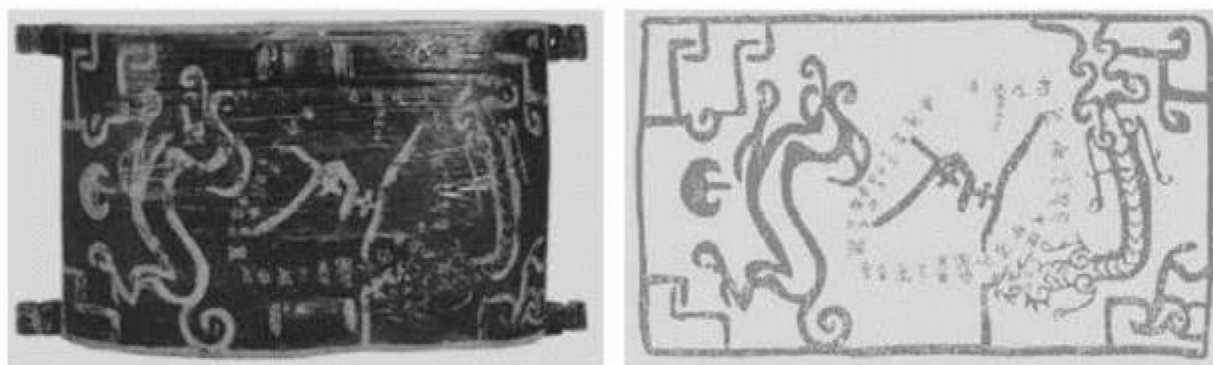


组图 13－20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T 形帛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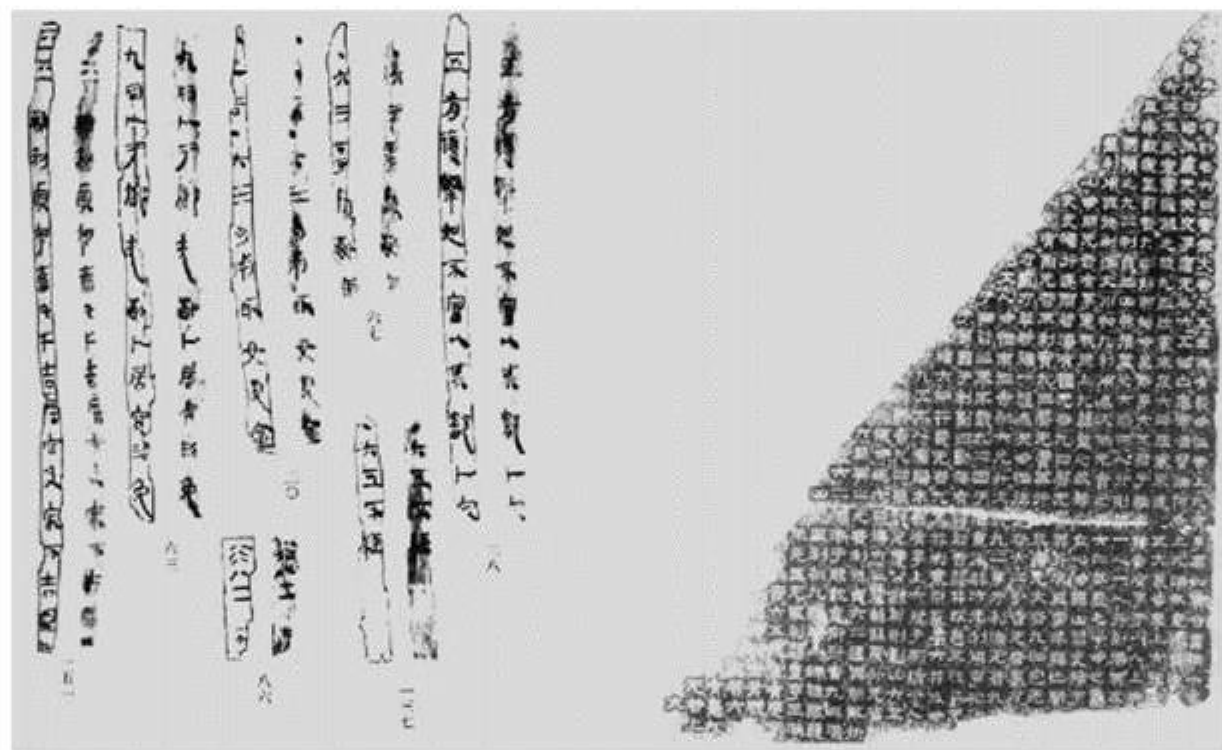


组图 13 – 21　马王堆帛书彗星图

从马王堆出土的棺椁盖表面的天星图中（图 13 – 22），我们可以看出与天星、天象、天学有关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北斗七星图。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在棺椁盖上只绘有青龙白虎的图案与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 6460 ± 135 年）中只用蚌壳摆设的青龙白虎是一致的，它们都没有摆设和绘制四兽中的另外两兽——朱雀和玄武，这与中国古人对大自然天时轮回运转的认识是“时具四季，简称春秋”和孔子修订鲁史《春秋》与后来的《吕氏春秋》的书名以及中国古人习惯对大自然的万古时空只称谓“春秋”的缘由是一致的。同时也充分说明汉朝初期在人们的头脑中，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中，丧葬文化是取自于易学文化的，甚至可以说与易学文化是和谐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基础知识和观念也是自 6000 多年前的远古时期一脉相承下来的。



组图 13 – 22　马王堆出土的棺椁盖表面的天星图



阜阳汉简《周易》　　汉熹平石经《周易》

组图 13 – 23

汉兴以后，尊崇道家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思想文化领域气氛活跃，与黄老之学有着紧密联系的易学思想文化[①]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也不乏有许多易学研究名家，都为易学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从古至今这方面流传下来的研究著作也是非常多的，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　式盘与式占

1957 年在甘肃武威县磨嘴子的 62 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木质髹漆式盘（图 13 - 24），它有详尽的文字，用以表达式盘图案区域内所代表的含义。古代式盘比较完整的还有朝鲜乐浪王盱墓中发现的一个汉代遗物（图 13 - 25），其形制大致与磨嘴子的西汉式盘相同，不过天盘中为十二月神名和天干地支，地盘刻有四个同心正方形，其中第一个方形的四边刻有十天干中的八个天干（没有“戊己”，表示“戊己”在中央区域），第二个方形的四边刻有十二地支，第四个方形的四边刻有二十八星宿名称，八方的界格中刻有八卦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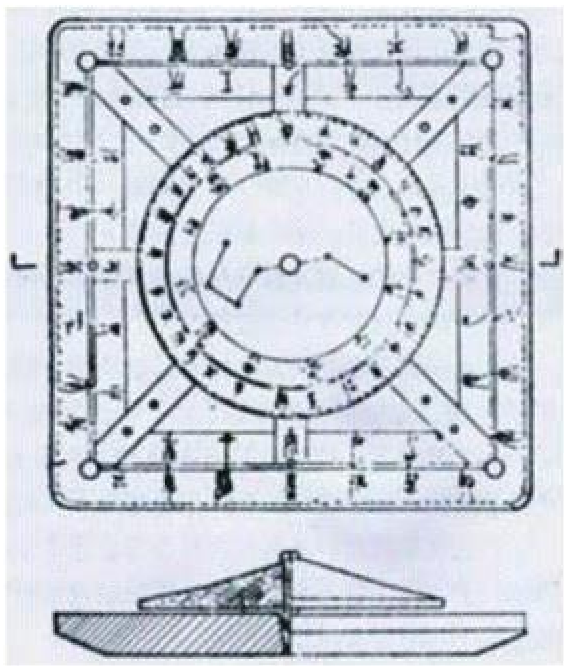


图 13 - 24　武威磨嘴子出土的西汉式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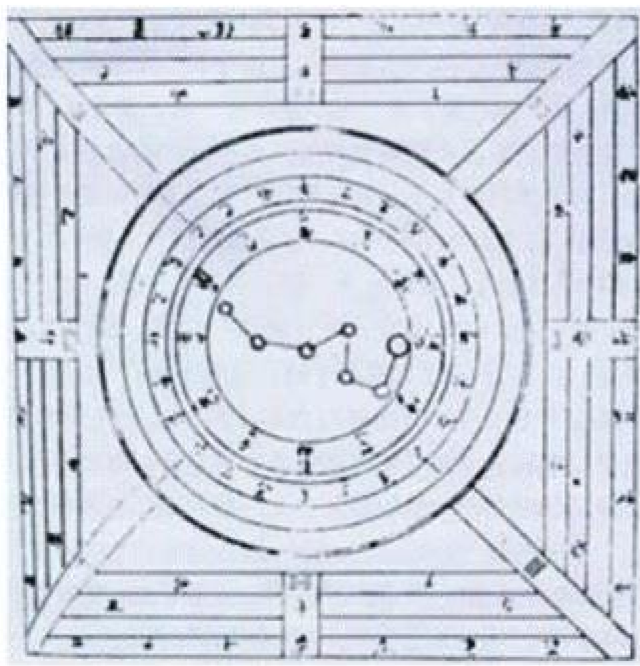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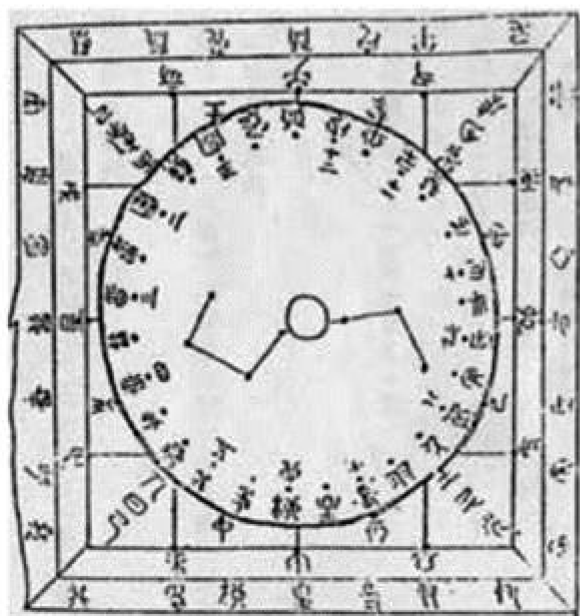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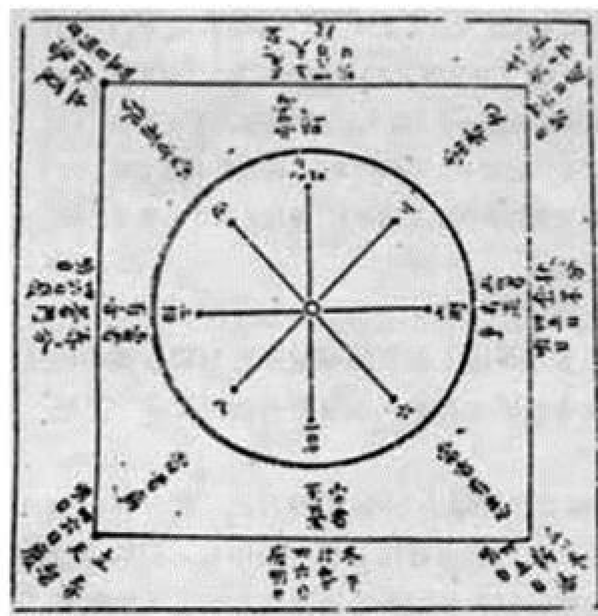


图 13 - 25　朝鲜乐浪王盱墓出土的式盘

20 世纪 70 年代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了一具六壬式盘（图 13 - 26）和一具太乙九宫式盘（图 13 - 27），同时还出土了一件刻有二十八宿的圆盘状天文仪器。这两件式盘与甘肃武威县磨嘴子的 62 号汉墓出土的式盘在形式上基本是一致的，既可以将天盘与地盘连为一体用作原始日晷的计时，也可以将天盘与地盘分开用作太乙九宫起课旋式的需要。

① 朱兴国著《三易通以》，齐鲁书社，2006，插图。


图 13－26　六壬式盘


图 13－27　太乙九宫式盘

凡是具有中国易学文化基础知识的学者一看就明白，汉代的式盘虽然比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玉制八卦式盘更为复杂和精细，但是，其基本内容和测算原理却是一样的。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式盘的第一个基本功用是占时日、定历法，是测天文、定历日的最古老、最简便的仪器；式盘的第二个基本功用是定位，式盘若以北极或司南定位，即可用于航海，可以测算船只的航向，后来用于航海的罗经盘，即是由式盘进化来的；式盘的第三个基本功用是"堪舆"，是地理家测地不可少的仪器，至于"堪舆家"利用式盘看风水、选葬地，则是中国易学文化中比较神秘的那部分了。

从文化上来讲，式盘并不是迷信的工具，而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的象征，式盘的产生和演进，是与天文、地理、算术、航海、哲学和宗教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这说明了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式占既与古代天文、历法有紧密的关系，也具有浓厚的神秘文化色彩。而式占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实践活动，六壬、太乙、奇门遁甲都是其中的式占。

三　《推背图》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一本能够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知识理论进行实际应用的《周易》以外，还有《地母经》和《推背图》（请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易卦爻辞真解》《解读〈地母经〉》和《解读〈推背图〉》）。

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时期，相传李世民曾邀请当时在他手下共同为官的著名的天象学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为其推算大唐的国运。袁天罡和李淳风用《周易》共同在现场作图画、谶曰及颂曰，为唐太宗演绎了著名的《推背图》，传说虽然

唐太宗对其中有很多的不理解之处，也问他俩是何意，但袁天罡和李淳风则表示天机不可泄露，予以婉言拒绝。

《推背图》最早见于南宋《桯史》《桯史·艺祖禁谶书》记载：唐袁天罡与李淳风共作图谶，预言历代变革之事，至六十图，袁推李背止之，故名其图谶为《推背图》。宋太祖继位后，曾下令禁止过此书，但因为此书已流传了数百年，在民间或有藏本，难以禁绝，便取起旧本，紊其次而杂书之。

这件事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曾提到过：

> 《推背图》，传李淳风作也，予尝于万都宪五溪处见之，杳难明验，因而告曰："记忆宋禁谶书，犯者日众，(宋太祖) 特以此书紊其次而杂书之，传数百本于人间，使传者懵其先后，不复可验，遂为弃之，此或是欤?"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类不观可也。"

另外，《推背图》见载于正史是《宋史·艺文志》。

这样，根据《桯史》记载，我们就知道《推背图》有了两个传本：一为原本，一为赵匡胤紊乱其秩序的本子。今天我们看到的《推背图》是明末清初年间的金圣叹评批的版本，原本仍保存于中国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我们看到的没有什么出入。

通过笔者多年的研究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推背图》，确实是曾经被人紊乱其秩序的本子，这与宋太祖赵匡胤所为的"特以此书紊其次而杂书之"的记载是一致的。

《推背图》中的六十象，就是根据中国历法中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相互组合成的六十甲子，对照中国龙文化中的易学理论，将后天八卦的排序与六十甲子进行了一一对应，里面的"谶曰"诗句与"颂曰"诗句和图画中的画意，也全部用的是《周易》中的卦爻辞及六爻易数中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的逻辑分析对封建帝王用于政治管理的一些建议。

虽然"谶曰"诗句与"颂曰"诗句里的意思非常的隐晦，让人非常不好理解，但从这就可以看出，《推背图》与《周易》的写作手法恰恰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由中国龙文化中阴与阳这两个最基本的、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哲学观念构成，其中阴的部分是由符号、卦象、纳甲和易术筮法理论组成的，阳的那部分是由"谶曰"诗句和"颂曰"诗句所描述的哲学思想理论组成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推背图》第五十六象中的"谶曰"与"颂曰"的本义。

第五十六象　　己未与比［比］



图 13－28

谶曰：

飞者非鸟，潜者非鱼。
战不在兵，造化游戏。

颂曰：

海疆万里尽云烟，上迄云霄下及泉。
金母木公工幻弄，干戈未接祸连年。

比［比］（主体现象）

▅▅　▅▅	妻财子水	应
▅▅▅▅▅	兄弟戌土	
▅▅　▅▅	子孙申金	
▅▅　▅▅	官鬼卯木	世
▅▅　▅▅	父母巳火	
▅▅　▅▅	兄弟未土	

卦象：

大水在地上漫延的情景。

卦辞：

（帛书、通行本）比，吉，原筮，元亨，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现象描述：发大水了，大水在地上到处漫延，比比皆是，好，原来（《归藏易》和《连山易》）的筮卦辞说的也是一开始就亨通，一直到永远都亨通的征兆，没错。如果大水一直在往地上流而都不会停下来的话，这个情景有个预兆，就像是女人的第二个丈夫会有凶兆。

1. 对谶曰的形象理解与逻辑分析。

（1）图像的形象理解。

图 13－28 中画着两个军人身披战袍相对而站，虽然他们没有利用手中的长枪，却以口中互相喷火的形式在战斗，在他们头顶的上空，有两只飞鸟在互相争斗，在他们后面的水中，有几只鱼儿也在互相争斗。画意非常符合谶曰“飞者非鸟，潜者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诗句里的意思。

（2）卦意的逻辑分析。

比［比］卦的上卦为习赣［坎］（为水），下卦为川［坤］（为大地）。

太岁未土助初爻（地表位、水面位）兄弟（势能、势力、众多、借助、竞争）未土会起二爻（地面位、边境位、关口位、嘴位、手位、翅膀位、心理位、转换位）父母（国家、目标、文化、科技、军队、佑护）巳（驿马星、喷火、飞行、爆炸）火成父母火局。

会成的父母火局冲应（事物）六爻（宇宙位、天空位、关外位、结果位）妻财（能量）水局。

太岁未土害动应（事物）六爻（宇宙位、天空位、关外位、结果位）妻财（能量）水局与四爻（半天空位、旷野位、田野位、战场位、社会位、身体位、过程位）子孙（动物、生机、技术、规则、军队）申（驿马星、潜伏、战斗）金（金属器物）合成妻财（能量）水局（鱼儿）。

太岁未土会起二爻（地面位、边境位、关口位、成长位、嘴位、手位、翅膀位、转换位）父母（国家、目标、文化、科技、军队、佑护）巳（驿马星、喷火、飞行、爆炸）火与四爻（半天空位、旷野位、田野位、战场位、社会位、身体位、过程位）子孙（动物、生机、技术、规则、军队）申（驿马星、潜伏、战斗）金合成火热的液体父母（国家、目标、文化、科技、佑护、军队）火局（飞翔、爆炸）和子孙（动物、生机、技术、规则、军队）金局（金属器物），以及妻财（能量）水局（鱼儿）。

以上即“飞者非鸟，潜者非鱼”之意。

太岁未土会起二爻（地面位、边境位、关口位、成长位、嘴位、手位、翅膀位、心理位、转换位）父母（国家、文化、技术、科学、知识、佑护、军队）巳（驿马星、喷火、飞行、爆炸、创造、戏耍）火与四爻（半天空位、旷野位、田野位、战场位、社会位、身体位、过程位）子孙（动物、生机、技术、规则、军队）申（驿马星、潜伏、游泳、戏耍、创造）金（金属器物）合成妻财（能量）水局生官鬼（战争、灾难）卯木。

以上即“战不在兵，造化游戏”之意。

袁、李两位智者，借图画加“谶曰”实际是在用比喻的方法非常谨慎地向李世民述说：“皇上啊，随着自然时空的运行，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的进步，人类将会拥有一些能量和杀伤力很大的武器。

人类借助那些像鸟一样的能量和杀伤力很大的武器，既能够飞入宇宙和天空，又能够喷火和爆炸，但它又不是鸟。人类借助那些像鱼一样的能量和杀伤力很大的武器，既能潜入水里，又能喷火和爆炸，但它又不是鱼。

而且未来的战争，并不完全是靠大规模的士兵在战斗。那种战争武器就好像是人们凭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器物在做游戏一样。（注：根据易学中归类的原理，估计原作者想要表述的这些个武器就是潜艇、舰艇、航母、飞机、导弹、火箭、卫星等能搭载热兵器或核武器的飞行器。）

皇上啊，就像是比［比］卦所描述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不管未来到了什么时候，只要在人类所发生的战争，就一定是为了资源和财富。”

2. 对颂曰的形象理解与逻辑分析。

（1）图像的形象理解。

画意非常符合颂曰“海疆万里尽云烟，上迄云霄下及泉。金母木公工幻弄，干戈未接祸连年”之意。

（2）卦意的逻辑分析。

被太岁未土合动的世（我们）三爻（半天空位、旷野位、田野位、战场位、社会位、过程位）官鬼（战争、灾难），既刑六爻（天空位、云霄位）妻财（能量）子水（泉水），也合五爻（核心位、国家位、天空位）兄弟（势能、损失、帮助）戌土，既暗合四爻（半天空位、旷野位、田野位、战场位、社会位、过程位）子孙（生机、军队、百姓、规律）申（驿马星、涉及）金，也合初爻（地表位、水面位）兄弟（势能、损失、借助）未土，还生二爻（地面位、边境位、关口位、转换位）父母（自然、国家、百姓）巳（驿马星、涉及）火。

以上即“海疆万里尽云烟，上迄云霄下及泉”之意。

太岁未土会起二爻（地面位、手位、翅膀位、心理位、转换位）父母（国家、文化、科学、知识、技术、佑护、军队）巳（驿马星、喷火、飞行、爆炸、创造、戏耍）火与四爻（半天空位、旷野位、田野位、战场位、社会位、过程位）子孙（动物、生机、军队、技术、工艺、规律）申（驿马星、潜伏、游泳、戏耍、创造）金（金属器物）合成妻财（能量）水局。

合成的妻财（能量）水局生官鬼（战争、灾难、祸乱）卯木。

父母巳火为子孙（匠人、木工、技术、工艺、规则）申（驿马星、创造、

制造）金的长生之地。

以上即“金母木公工幻弄，干戈未接祸连年”之意。

袁、李两位智者，借图画加颂曰，实际也是在用比喻的方法，而且是非常谨慎地向李世民述说：“皇上啊，随着自然时空的运行，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科学文化的进步，人类将会拥有一些能量和杀伤力很大的武器。

借助这些个能量和杀伤力很大的武器，既能飞入宇宙和天空云霄的万里疆域，又能潜入湖泊、江河和大海的万里疆域。

未来的战争完全是用文化科学和技术知识在支持的，战争完全是在使用那些利用了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器物，使得士兵们手中拿着的戟戈刀剑都没有交战，就能制造出连续和连年的灾害、祸乱及创伤。

皇上啊，就像是比［比］卦所描述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不管未来到了什么时候，只要是人类所发生的战争，原因一定是为了资源和财富。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重视技术，增强经济实力是国家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

在未来，我们的子孙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经济实力，才能应对未来复杂的战争形势。如果找不到这个原因的话就会完蛋的。”

金圣叹曰：“此象行军用火，即战不在兵之意。颂云海疆万里则战争之烈不仅在于中国也。”金圣叹的批注，仅作参考，读者可用易学文化的六爻易术理论自己也来分析一下。

今天，我们从《推背图》第五十六象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时的古人就已经能够熟练运用中国古老的易学文化理论，实际预测到未来战争的方法与武器装备，真让我们为易学文化的博大与深邃而感到自豪。

| 第十四章 |

易学与《周髀算经》

第一节 《周髀》

一

根据现代学者公认的比较可信的结论，《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 100 年前后。《周髀算经》原名《周髀》，自古至今，它一直毫无疑问地被视为最纯粹的中国国粹之一。

今天，如果我们把《周髀算经》看成是中国独立的、类似于西方式的公理化体系，必然会遭到许多研究学者们的反对，因为在《周髀算经》中隐藏着非常深刻的中外科学史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而中国文明的诞生又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是分不开的，如果谁要想撇开易学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恐怕就谬之千里了。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周髀算经》中有明显的域外天学成分，也是可以理解的，笔者在此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谈一谈《周髀算经》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把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系统的知识和观念与《周髀算经》结合起来，就能把“周髀”这两个字或者这个词汇搞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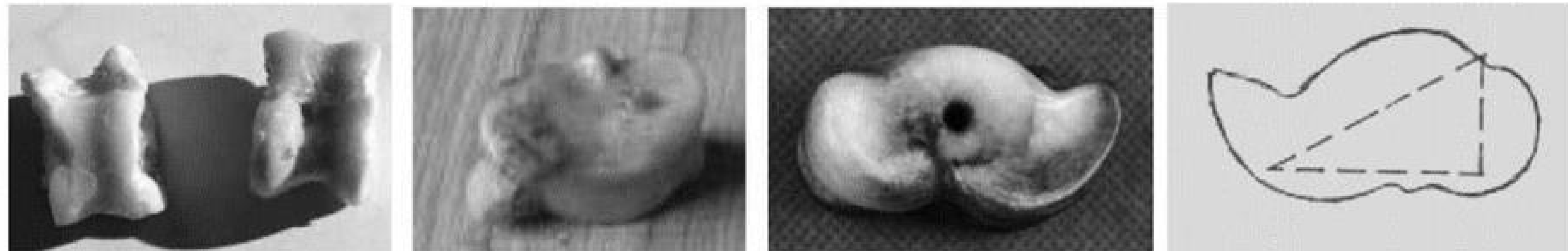
首先，我们把“周髀”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

在《周髀算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荣方曰：‘周髀者何?’陈子曰：‘古时天子治周，此数望之从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周髀”即“盖天”。“盖天”是我国古代一种天体学说，就是说天像一把无柄的伞，地像一个无盖的盘子。持有此观点之人认为在《周髀算经》中使用了勾股术测算天体，又相传成书于周公，故称周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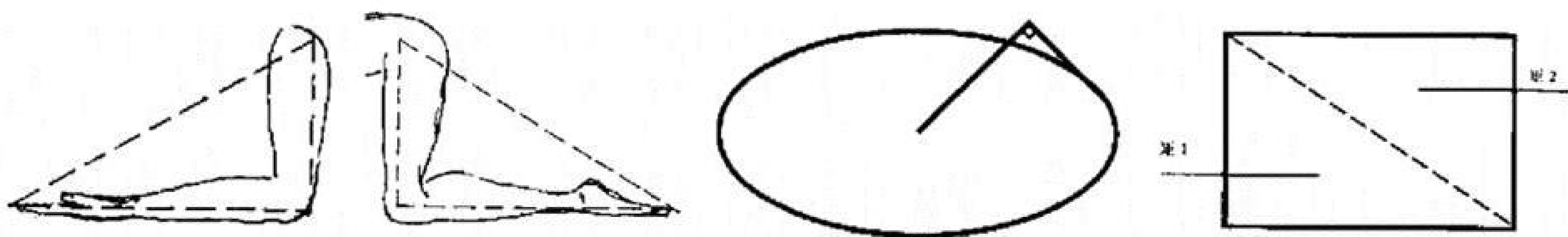
这两种说法各不相同，使我们没法明白“周髀”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说文解字》中，对“髀”是这样解释的：“髀并弭切股也。从骨，卑声。”即“髀”是大腿骨之意。看来单凭这两条资料，要想准确地搞清“周髀”的意思，是非常难的。

下面我们一起来打开思路，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来自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在羊的后腿上能够将大腿骨与小腿骨连接起来的那块骨头［关节、机关］，被称为“羊拐骨”（组图 14－1）。像牛、马、猪、狗等四肢动物的后腿上都有这块拐骨，它是大自然的造化，非常自然地起到了承上启下和屈曲折叠的作用。它既极其类似于圆规（规）两条腿的连接器，也极其类似于角尺（矩）勾与股之间的连接点（组图 14－2）。



组图 14－1



组图 14－2

笔者注意到，在新疆，只有汉族群众把“羊拐骨”叫“羊髀十”，把“牛拐骨”叫“牛髀十”，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群众却不这样叫。如果我们把“髀”与“臂”这两个谐音字联系起来，就会恍然大悟。

在《说文解字》中，对“臂”是这样解释的：“臂，手上也。从肉，辟声。”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人的肘关节以上部位为大臂，肘关节以下部位为小臂。

如果我们把“髀”与“臂”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在《说文解字》成书之后，古人用“臂”与“髀”这两个音同而字不同的文字，目的是为了将人的上肢与下肢区别开来。

《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之间，比《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 100 年左右晚了 200 年左右的时间，而汉武帝刘彻（公元前 156 年～前 87 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就开拓了

汉朝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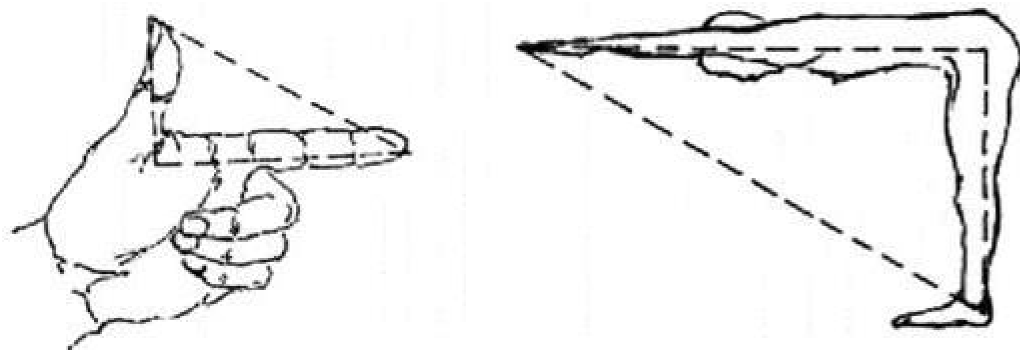
在自然界中，人的上下肢与四肢动物的前后肢是一一对应的，加上在《说文解字》成书前的200年期间，《周髀算经》就已经在西域的“丝绸之路”上通行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在新疆古丝绸之路上的汉族人就一直把人的上下肢与动物前后肢的上下两部分骨头都在相互借用混称为“髀”或“臂”。特别是在那时，对识字不多的老百姓来说，将“髀”或“臂”相互借用混称在一起，也是很正常的事。

至于把“髀”、“臂”、“胫”、“腓”严格分开的叫法，大概也只是在《说文解字》成书后才开始的。至于再把人的上下肢部分称为尺骨、桡骨、股骨、胫骨、腓骨，就更是以后的事了。

“十”字在中国古汉语言当中，既有代表数字的意思，也有代表十字交叉路口、转折点、关节点的意思。这样，“羊拐骨”与“髀十”就非常自然、巧妙、吻合地联系到了一起，从汉朝（也许时间更早）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上开始一直到现在，“髀十”就在新疆一直被新疆的汉族人沿袭传承着叫了下来。

另外，现代考古学界的冯时先生在对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骨架左右两侧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考察后，认为是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的最早形象图，而在墓主北侧有蚌壳塑的三角形图案，以及指向东方的两根人的胫骨，据称是北斗的图像，“斗杓不以蚌壳而用人骨，意在反映度晷和斗建综合含义。古代测晷之表名‘髀’……髀是人骨，而人类首先认识的影是自己的影，卜辞‘昃’字即因日斜夕照而俯映的人影”。①，这与笔者对古代“髀”字意思的看法就非常相似了。

有了这样的联系，我们就能够使用易学形象思维的方式，发现人体可以构成许多极近似于“勾股定理”的三角形（组图14－3）。



组图14－3

有了这样的联系，我们就会明白，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组图3－7）中那具尸骨旁为何要用蚌壳摆出一个极形似于符合“勾股定理”的三角形“矩”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刊之二：《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108页。

以及由两根小腿胫骨组成的极类似于圆规的“规”的理由了。

这样，我们将“周”字有周而复始的圆周（规）之意与“髀”字有几何三角形勾股（矩）之意和《周髀算经》中的内容联系起来，就会清楚“周髀”原来是指通过“规”、“矩”能够做到的计算方法。

二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会知道商高为何敢对周公说出“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的理由了（图7－38、图7－39）。

我们也会知道商高对周公说的“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方法了（组图7－40）。

第二节 《周髀算经》中涉及的易学之数、词汇、概念

在《周髀算经》中有多处描述，都使用了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数、词汇和系统概念。

一

《周髀算经》卷上中提到：“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夫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数。请问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

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周公曰：‘善哉。’”①

西汉时期孔安国云：“《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这将《周髀算经》中提到的勾股定理和矩的实际应用方法与《洛书》和大禹治水（“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联系到了一起。

《周髀算经》中提到的“数”与孔安国提到的“数”就是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系统观念。其中“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和“天青黑，地黄赤”以及“以象天地之位”中的“象”也是易学文化中的词汇与概念。其中的“九九八十一”中的“九”就是易学文化《洛书》中最大的阳数“九”，“八十一”就是用“洛书”八卦九宫能够形成的一个个轮回的圆和方。

在清朝江永所著的《河洛精蕴》中提到：“《河图》具五勾股，弦数藏于勾股二幂之间，至《洛书》则以中五为弦。幂二十五，而东之三，东南之四，二幂适得二十五，并而开方，得弦五，是勾股弦得整数者。自勾三股四弦五始，三者木也，四者金也，五者土也，是五行有形质之三物，合而成勾股弦也。图之三四对于东西，书则连之，勾股之机括出于此矣。先儒论图书，未有及此者，度数之学。未究心也。”②

可见，《周髀算经》中的“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就出自易学文化中的《洛书》（图 7－41、图 7－42），其中“五行”中唯有木［三］、金［四］、土［五］是有形的东西，而水、火却是无形的东西。

二

《周髀算经》卷上中提到“四极之穷，列星之穷”中的“四极、列星”；“未能通类……智类之明……是子之类单”中的“类”；“日道之发敛”中的“发、敛”；“阴阳之分地……阴阳之修，昼夜之象。昼者阳，夜者阴”中的“阴、阳、昼、夜、象”；“观律之数，听钟之音”中的“律、数、音”；“此方圆之法”中的“方、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此一者，天道之数”等观念，都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观念有关。

在《陈子模型》中提到的“八尺、八十寸、八万里”都是易学后天八卦中

① （汉）张苍辑撰，曾海龙译解《九章算术》附录《周髀算经》译解，重庆大学出版社，第 276、278 页。

② （清）江慎修著，孙国中点校《河洛精蕴》，学苑出版社，1989，第 227 页。

艮卦的概念之“数”；“六尺、六万里”都是易学后天八卦中乾卦的观念之“数”，在《周髀算经》中采用它们都是因为易学文化中的“象”，作者在这里用此“数”的目的只是用的方法类比描述一种计算方法而已，并不代表实际的距离。

三

《周髀算经》卷上中提到“故日夏至在东井，极内衡。日冬至在牵牛，极外衡也”中的“井、牵牛、极、衡”都是易学文化中天学中的星宿和七衡词汇和观念。

四

《周髀算经》卷下提到“天离地八万里……常出极下地上二万里”中的“八、二”都是易学后天八卦中艮卦与坤卦的概念之“数”，在《周髀算经》中采用它们都是因为易学文化中的“象”，作者在这里用此“数”的目的只是用类比的方法描述一种计算方法而已，并不代表实际的距离。

在卷下提到“三光之精微”中的“三光”是易学文化中天学中的“日、月、星”；“卯、酉”也是易学文化体系中天学里的词汇和概念。

五

《周髀算经》卷下提到的“二十八宿、经纬、牵牛、女、井、娄、角、中央、横”以及“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启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这二十四节气也是易学文化体系中天学里的词汇和概念。

六

《周髀算经》卷下提到的“辰、申、寅、戌、坎、子、巽、坤、离、午、艮、乾、历元”等，也是易学文化体系中天学、八卦、十二地支中的词汇和系统概念。

七

本书前面曾经提到过，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墓葬中发现并出土了大量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太极、龙文化有关的玉器，在敖汉旗还出土了与易学八卦有关的玉器，说明红山地区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了易学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理论和知识。

现代考古学界的冯时先生在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考古研究中发现并认为，牛河梁第 2 地点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二倍，也就是说外衡周同时也是内衡周的二倍，这说明冬至时太阳周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速度的二倍，这一现象与《周髀》七衡图（图 14－4）[1] 的记述颇为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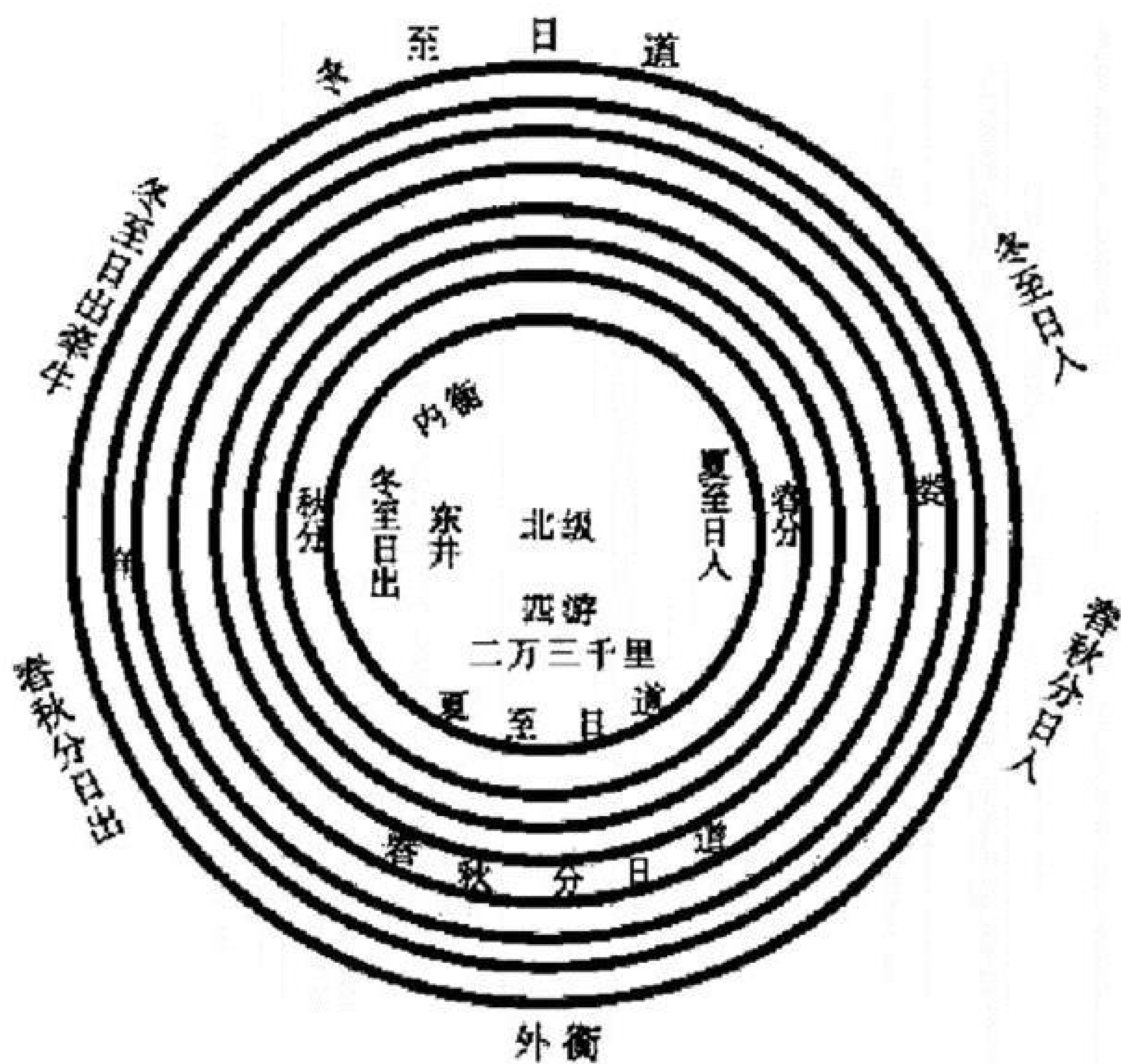


图 14－4　周髀七衡图

以往的研究中过多强调牛河梁遗址承载的祭祀功能，冯时先生对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成果，为从科学的角度深刻揭示牛河梁遗址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观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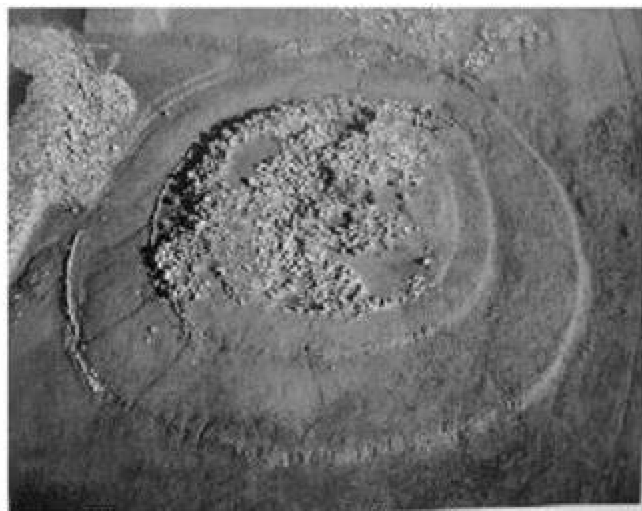
① （汉）张苍等辑撰，曾海龙译解《九章算术》附录《周髀算经》译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第 298 页。

证明中国古老的盖天理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无独有偶，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也出土了河姆渡人制作的太阳鸟盖头陶器和一些带有易学文化元素的文物。太阳鸟盖头陶器虽已残损，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河姆渡人在距今约5000年以前就已经具有了地球围绕太阳进行旋转时的四季天象节气概念：内衡第一圈为夏至圈，次二衡为立秋圈，中衡第三圈为春分秋分圈，次四衡为立春圈，外衡第五圈为冬至圈。这与《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图”也是相符合的。

作为早期的盖天图解，牛河梁人的盖天图和河姆渡人的盖天图（组图14－5）[①]完全具有实用性，它不仅描述了一整套宇宙理论，同时准确地表现了分至日的昼夜关系。天文学知识的日渐积累，对于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山地区和河姆渡地区的现实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河姆渡出土的太阳鸟盖头陶器


牛河梁第2地点三环石坛图

组图14－5

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和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是引人注目的，前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后者是显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先民文化智慧的重要标志。牛河梁和河姆渡的盖天图，表现了中国古代南方和北方的先人们在5000年前，对宇宙就有了足够的认识水平，并把与《周髀算经》相关的易学和科学理论，在那时就已经应用到实践中了，已足以令人惊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再把与“七衡图”有关的图称为“盖天图”也许不那么准确合适，但过去所有的学者们一直都这样称谓，所以在本书中也姑且如此称呼。

---

① （汉）张苍等辑撰，曾海龙译解《九章算术》附录《周髀算经》译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第2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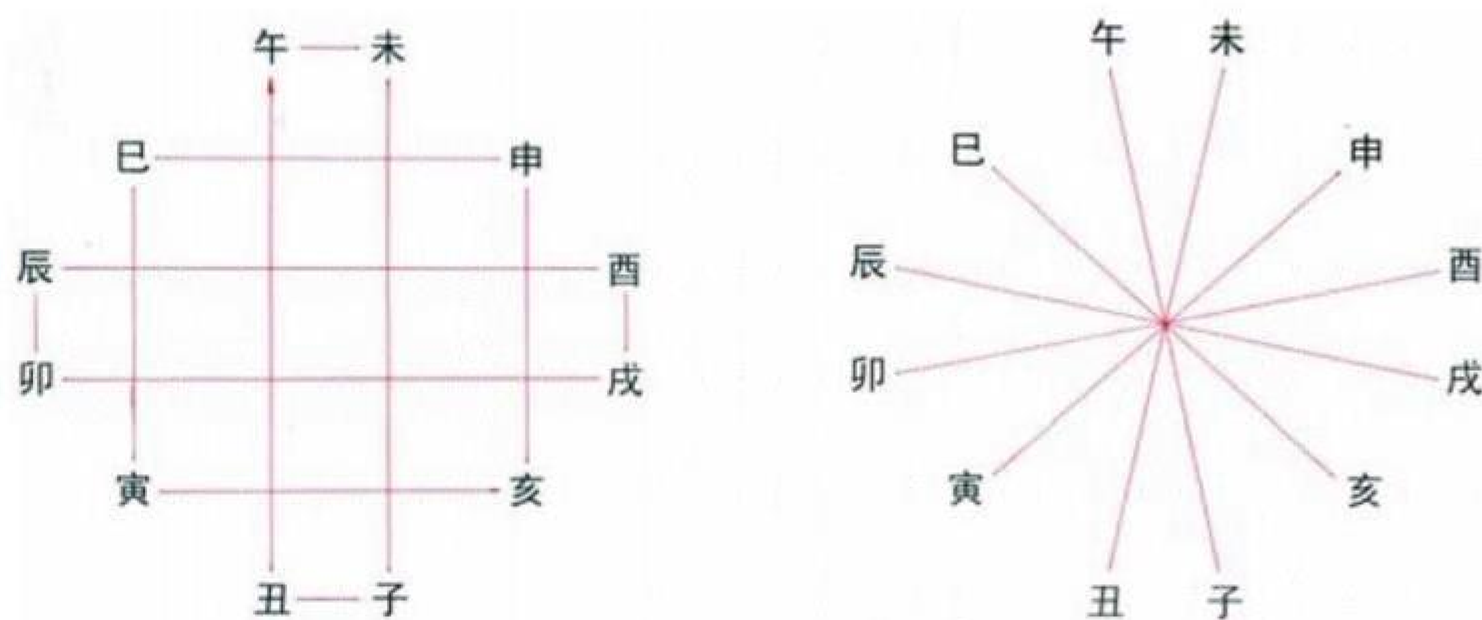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周髀算经》中几处有争议的描述

一　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明显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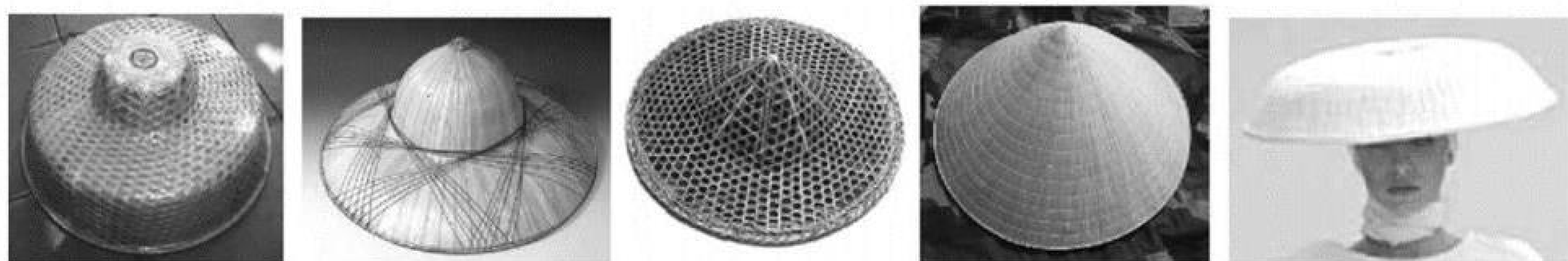
《周髀算经》卷下有“天象盖笠，地法覆盘”一语，有的学者认为这八个字是双重球冠说最主要的依据，还有的学者认为是“天地为平行平面”。

这里原作者强调的盖、盘只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的描述。这样一句文学性的比喻表示宇宙的大致形状。《周髀算经》的原作者并没有说“天地是双重球冠”和“天地为平行平面”的。

可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原作者所说的笠到底是什么形状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笠有多少种形状以及它们与十二支的六穿［害］、六合、六冲都有什么关系吧（组图 14－6、组图 14－7）。



组图 14－6　十二支六穿、六合、六冲图



组图 14－7　笠的多种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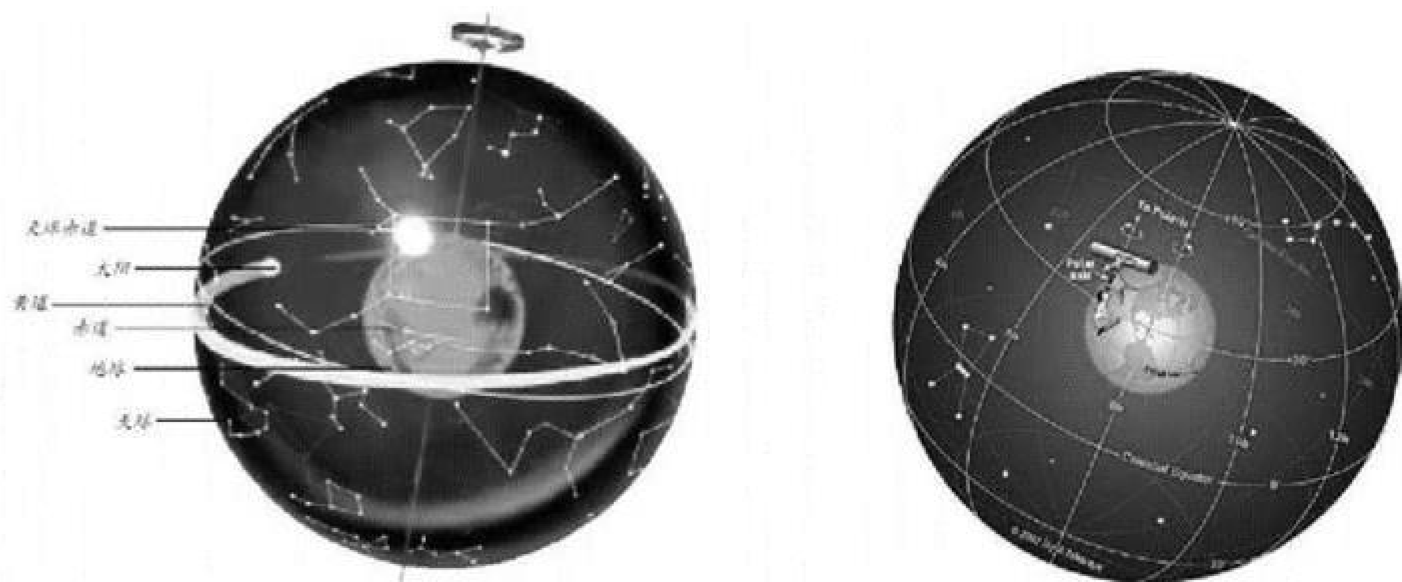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当中，十二支可分布在天体黄道上，从它们的六穿、六合、六冲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卯辰、寅巳、丑午、子未、亥申、戌酉这六穿之气分别形成了天体上的经线，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

这六合之气分别形成了天体上的纬线，这样整个天体就被中国智慧的古人们非常形象地比喻成了一张巨大的纬线之网（考古证明，中国古人早在贾湖时代就已具有了能够利用经纬线进行编制日用品材料的先进成熟知识）。而十二支的六冲之气则形成了天体的激荡与冲盈，使天体变得更加宽广与无限浩渺，这就是中国智慧的古人们对天体的认识，也正符合中国易道学说与儒家文化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和老子在《道德经》中“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这样的认识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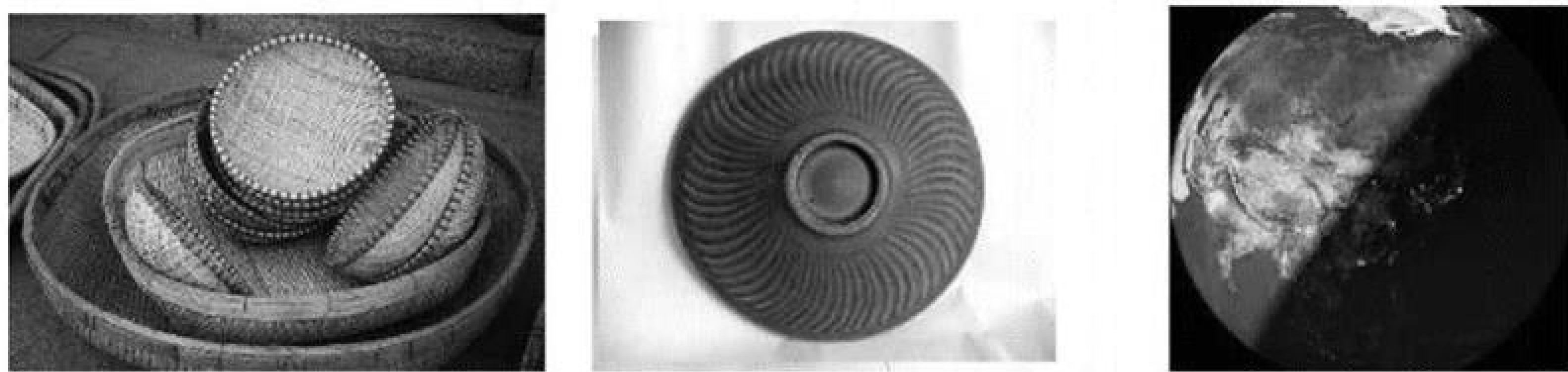
通过这些笠的形状，我们就可以发现不管笠的外形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的，就是所有笠的编织都是有阴阳经纬线的（就是说原作者也是想要力图表达宇宙天体既是可以用经纬来划分的，也是可以用八卦来划分的）。而且斗笠还可以表达出阴阳两面就像白天与黑天的意境（组图 14－8）。

我们谁也不知道原作者所说的盘到底是什么形状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盘有多少种形状吧（组图 14－9）。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从古至今留下来的、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在使用的笸箩。它就是一种盘，而且可以充分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盘的编织，也都是有阴阳经纬线的，把它近似于圆形的外形底部放到地上，整体也是可以摇晃的。就是说作者也是想要力图表达地球是可以用经纬来划分的，而且是像盘龙一样在盘旋着运动的。在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学中的“盘”字有两重意思：一是圆形的，二是旋转运动的。



组图 14－8



组图 14－9　盘的多种形状

这种形象的说法既可以将大地比喻成一个无比巨大的旋转运动的大覆盘，还可以在这种大覆盘上表示出北极圈［无极、戊己之地］，而且覆盘还表达出了地球具有阴阳两面的意境，这就是中国古汉语言文学的表述方式。

此外，在《周易》中有十朋［十崩、十方］之地，就是说大地就像一个圆球，就像一个圆西瓜，按“井”字砍开，平面会出现八卦九宫的形状和产生十块西瓜皮，这充分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了。而且“浑天说”也近似地把天比喻成鸡蛋里的清，把地比喻成鸡蛋黄。

从组图 14－10 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这种写作手法，也正好符合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天地人合的思想表达方式。



组图 14－10

如果我们从阴阳二元二分论的角度来考虑，单从阳的方面就可以将蓝天比喻成一个无比巨大的斗笠，将大地比喻成一个无比巨大的旋转运动的大覆盘，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正在大覆盘上行走的小蚂蚁，那么，这种带有文学色彩的“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意境就表达出来了。

如果我们把图 14－11 中两人乘坐的大筐箩覆过来盖在地面上，人在其上，这样“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意境不是就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了吗？



图 14－11

可见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观念里，“阴阳”含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意义，这就使我们对“天象盖笠，地法覆盘”的描述有了一个全面的重新认识。

二　“北极璇玑”究竟是何物

《周髀算经》中天地形状问题的另一争议就是“北极璇玑”的概念。可“北极璇玑”究竟是何物、究竟是什么意思？现有的各种论著中对此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北极璇玑也不是一颗实际的星”，而是“假想的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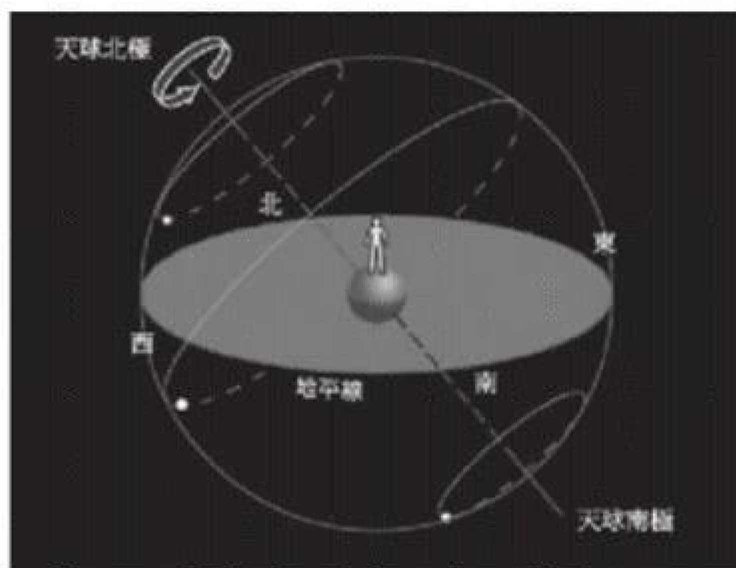
《周髀算经》中直接明确谈到“璇玑”的有以下几处。

> 欲知北极枢璇周四极，常以夏至夜半时北极南游所极，冬至夜半时北游所极，冬至日加酉之时西游所极，日加卯之时东游所极，此北极璇玑四游。正北极璇玑之中，正北天之中。①
>
> 璇玑径二万三千里，周六万九千里（《周髀算经》全书皆取圆周率3)。此阳绝阴彰，故不生万物。②

从第一条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北极”、“北极枢”和“璇玑”是三个有着明显区别的概念。

如果我们参照易学文化中的九宫八卦图（组图14－12)，就会知道“北极”、“北极枢”和“璇玑”描述的恰恰也是天球上的三个区域。

	丙丁	
甲乙	戊己	庚辛
	壬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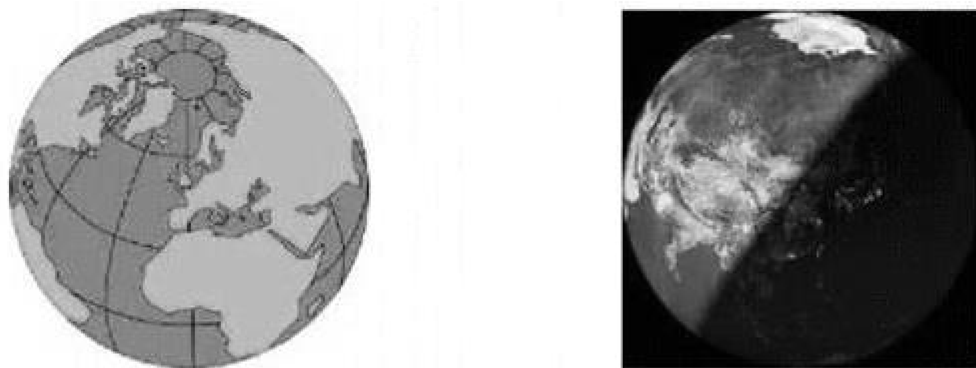


组图14－12

① （汉）张苍辑撰，曾海龙译解《九章算术》附录《周髀算经》译解，重庆大学出版社，第305页。

② 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2001，第89页。

结合天球上的这三个区域，我们还可以知道《周髀算经》中所描述的在北极之下大地上的这个直径为23000里的“极下”特殊区域，也与“璇玑”具有同义，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北极圈了（组图14－13）。如：



组图14－13

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沲四隤而下。

极下不生万物，何以知之？①

这个“极下”、“璇玑”就是在指一个实体，至于它高达60000里，却是易学文化后天八卦中的乾卦之“数”。这个“极下”、“璇玑”之地正符合“阳绝阴彰，故不生万物”之意。只要我们往地球仪的北极上浇一点水，“滂沲四隤而下”的景象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说明“极下”之地与整个大地是个合为一体的地球，没有任何实际的边界可以将两者区分。

我们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古时候的文化、语言、文字在使用中是充满了想象力的，表达的完全是一种意境，就像《周易》中的卦爻辞一样，又像诗歌中的修辞一样，大多用形象的语言，当然也不排除作者的故作神秘。

三　寒暑五带的知识来自何处

《周髀算经》中有相当于现代人熟知的关于地球上寒暑五带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异的现象，因为这类知识是以往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说中所没有而且不相信的。如：

极下不生万物，何以知之？……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

中衡去周七万五千五百里。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夏长之类。此阳彰阴微，故万物不死，五谷一岁再熟。

凡北极之左右，物有朝生暮获。

① 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2001，第19页。

上引第二则中，所谓“中衡左右”即赵爽注文中所认为的“内衡之外，外衡之内”；这一区域正好对应于地球寒暑五带中的热带（南纬23°30′至北纬23°30′之间），尽管《周髀算经》中并没有明确地球的概念名词。上引第三则中，说北极左右“物有朝生暮获”。

这就使我们联系到了《周髀算经》对于极昼、极夜、半年为昼、半年为夜之现象的演绎和描述能力。即在春分到秋分的半年时间里，“璇玑”范围将出现极昼——始终都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在从秋分到春分的半年期间，将出现极夜——阳光始终都照射不到“璇玑”范围之内。

《周髀算经》中关于寒暑五带的知识，其准确性是没有疑问的。当然这需要中国古代居传统地位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正确的地球概念作为支持。

而在《周易》中的坤卦符号的写意变化和益卦六二爻辞中的“十崩［朋］之地”，就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地球是圆的（图1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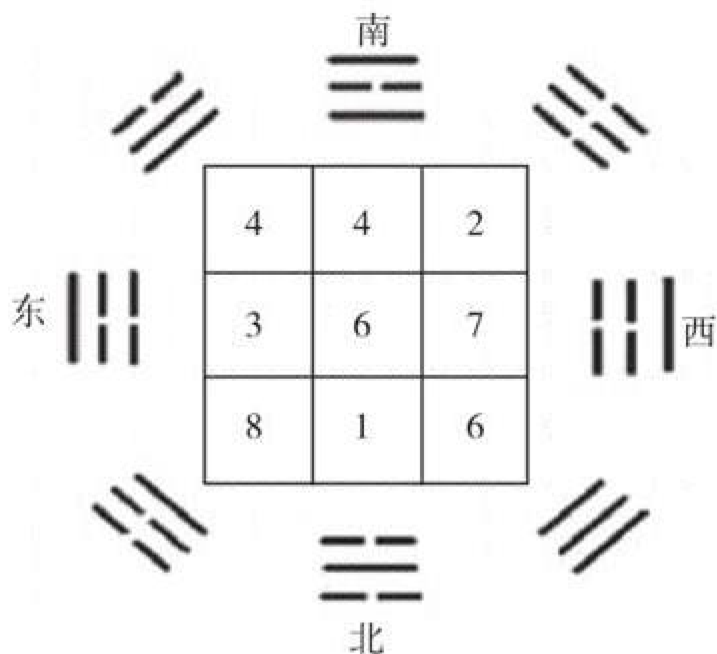


图14－14　八卦九宫十块皮

注：古人智慧地认识到地球就像一个西瓜，表面全部的面积可分为八卦九宫十块皮，即在一个西瓜上按“井”字形状砍开，会出现八卦九宫十块皮，也即十方（朋、崩）之地。

四　坐标系问题

在现代中外学者的研究中，传统中国天文学的赤道特征已是公认之事，就是说以“浑天说”为基础的传统中国天文学体系，完全属于赤道坐标系统。而《周髀算经》中明确认为二十八宿是沿黄道排列的描述，被认为是抄袭了从古代巴比伦到希腊西方天文学在两千余年间一直使用的黄道系统。

在《周髀算经》中，二十八宿被明确认为是沿着黄道排列的。这在《周髀

算经》原文以及赵爽注文中都说得非常明白。《周髀算经》云：

月之道常缘宿，日道亦与宿正。

此处赵爽注云：

内衡之南，外衡之北，圆而成规，以为黄道，二十八宿列焉。月之行也，一出一入，或表或里，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一道一交，谓之合朔交会及月蚀相去之数，故曰“缘宿”也。日行黄道，以宿为正，故曰“宿正”。①

根据上下文来分析，可知上述引文中的“黄道”，确实与现代天文学中的黄道完全相当——黄道本来就是根据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定义的。而且，赵爽在《周髀算经》“七衡图”下的注文中又一次明确地说：

黄图画者，黄道也，二十八宿列焉，日月星辰躔焉。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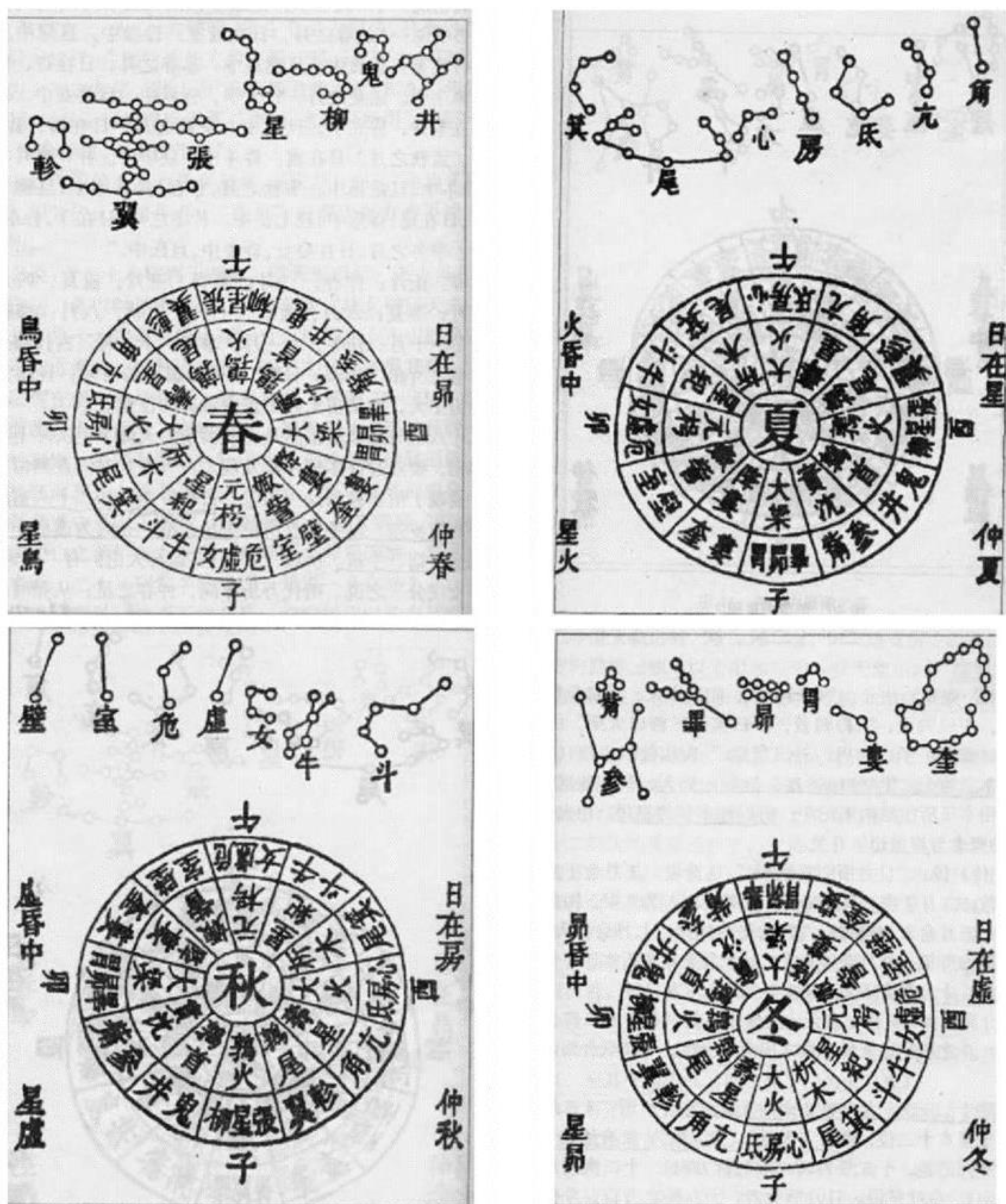
日月所躔，当然是黄道（严格地说，月球的轨道白道与黄道之间有5°左右的小倾角）。

传说中帝尧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海角，名叫明都的地方，分辨太阳向南移动的次序，恭敬地等候节令的到来。如果我们把这个传说与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形象（组图3－7、图3－8）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在南方海角（今海南省、越南、老挝、泰国、马来半岛区域内）每年春天的黄昏时，分布在天体黄道上的“龙星”（东方七宿）都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每年秋天的黄昏时，分布在天体黄道上的“虎星”（西方七宿）都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组图14－15）。

这样就可以断定二十八宿是在黄道上排列着，而不是在赤道上排列着的。至于尧帝派人往南天去观察星宿，那是因为观察二十八宿只能在南天实际考定才观察得最清楚。就是地球的公转运动，在中国境内只有广东、广西省区内的部分地区（甚至越南、老挝、泰国、马来半岛的区域）才会与黄道平面重叠。

根据从山西襄汾陶寺镇发掘出的古观象台基址，将它复原后实际对照中国历法的二十四个节气的日出方位，发现当时陶寺一带地区的古人，使用的历法是一年十月历。结合《帝王世纪》就说“尧，都平阳（临汾的古称）”和《周髀算经》中提到的“影差一寸，地差千里”，按照这些个说法，陶寺立杆测影处距地

① 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2001，第40页。
② 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2001，第40页。



组图 14－15

的四边都是 1.6 万千米，为地的“中心”。结合《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由此可推算出当时的“中国”南可达今日广西及越南、老挝一带，北可达今日辽宁一带。

笔者认为，远古时代使用过的历法曾经反复变化过多次，即在尧执政之前和之后就都曾经使用过十二月历（从贾湖文明、濮阳西水坡文明、凌家滩文明中都可以看出），但从山西襄汾陶寺镇发掘出的古观象台可知，尧执政时曾使用过十月历，十月历的特点是简单，但不够准确，只具备计时的功能和作用，不具备天文的意义，对中国那时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可以说完全没有指导作用，

太粗了（参刘尧汉所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描述的彝族十月历即知），所以后来尧才又命羲和重新修订历法，等到新历修成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十月历确实是不够准确的，后又改成了十二月历。

另外，从中国古汉字“易”由日月构成，就可知道“易”既是象形文字也有指意的理在内，如同大自然中“日月”的实际交替变化也的确是形成了真实的“历”，那么“易”就一定与“历”有关系，或者说“易”中就一定有“历”的一部分。

关于二十八宿的发祥问题，《任应秋运气学说六讲》中有这样的叙述：①

附带在这里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印度、阿拉伯都有二十八宿，特别是印度的二十八宿与我国尤为接近，竺可桢氏在《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一文曾说：

我国有二十八宿，印度也有二十八宿。我们若把中国二十八宿和印度二十八宿相比较，知道中国二十八宿距星和印度相同者，有角、氐、室、壁、娄、胃、昴、觜、轸九宿。距星虽不同，而同在一个星座者，有房、心、尾、箕、斗、危、毕、参、井、鬼、柳十一宿。其距星之不同属于一个星座者，只有亢、牛、女、虚、奎、星、张、翼八个宿。而其中印度却以“织女”代我们的女宿，“何鼓”即牛郎，代我们的牛宿。从此可以知道二者是同出于一原的。这二十八宿究竟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印度，从19世纪初叶起，西洋人热烈地辩论了一百多年，不得结论。但从中国二十八宿以角宿为带头，和牛、女两宿的变动看起来，二十八宿的发祥地，无疑是在中国（见《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3期）。

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1875年荷兰人薛莱格《星辰考源》略谓：

(1) 西方之星座，自希腊、埃及传授而来，除少数外，非西方所创造。

(2) 中国之星座乃全为中国所创造。

(3) 西洋之星座与中国同者甚多，均自中国传入西洋。

(4) 中国星座历史之悠久，可自天文地质各方面证明之（见薛莱格著《星辰考源》第706页）。

20世纪初叶法国德沙素著《中国天文学》，亦主张二十八宿起源于

① 以下引文见《任应秋运气学说六讲》，任廷革整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第44页。

中国之说。日本前京都帝大校长、天文学家新城新藏著《二十八宿之起源说》略称，二十八宿于中国在周初时代或其前所设定，而于春秋中叶以后自中国传出，经中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于波斯、阿拉伯地区（见德沙素著《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第四编，沈璇译，1983年中华学艺社出版）。

后人解释十干化五运的道理是从各年的第一个月建的寅位上产生的，如《素问入式运气论奥·论五音建运》云：

丙者火之阳，建于甲己岁之首，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故甲己为土运。戊者土之阳，建于乙庚岁之首，正月建戊寅，戊土生金，故乙庚为金运。庚者金之阳，建于丙辛岁之首，正月建庚寅，庚金生水，故丙辛为水运。甲者木之阳，建于戊癸岁之首，正月得甲寅，甲木生火，故戊癸为火运。壬者水之阳，建于丁壬岁之首，正月得壬寅，壬水生木，故丁壬为木运。

这样解释，虽未必是化运的所以然，但确便于推算和记忆，故亦足资参考。《运气彀》并为五言韵语，尤便于诵云：

甲己丙为寅，余年更斟酌。乙庚当起戊，丙辛庚上寻。戊癸先生甲，丁壬复见壬（《运气彀》，明万历间大梁人张昶著）。

十干所化的运，叫做中运，其意义则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

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常先也。

天气在上，地气在下，运气居于天地之中，气交之分。故天气欲降，则居中的运必先之而降；地气欲升，而居中的运亦必先之而升。这中运通主一年的岁气，所以一般又把中运叫做大运。《素问·天纪元大论》说：

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所谓“统”就是通纪一年的意思。例如：甲年则为阳土通纪全年的运；乙年则为阴土通纪全年的运。其余类推。正因其能通纪一年，所以一般才把它叫做“大运”。

由此可见，我们不光知道了二十八宿的起源，而且还知道了“易”与“医”和“历”之间也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五 古代印度宇宙模型与《周髀算经》中的盖天宇宙模型惊人的相似①

关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的记载，主要保存在《往世书》中。《往世书》是印度教的圣典，同时又是古代史籍，带有百科全书性质。它确切成书的年代难以判定，但其中关于宇宙模式的观念，学者们相信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因而是非常古老的。《往世书》中的宇宙模式可以概述如下：

> 大地象平底的圆盘，在大地中央耸立着巍峨的高山，名为迷卢（即汉译佛经中的“须弥山”）。迷卢山外围绕着环形陆地，此陆地又为环形大海所围绕……如此递相环绕向外延展，共有七圈大陆和七圈海洋。
>
> 印度在迷卢山的南方。
>
> 与大地平行的天上有着一系列天轮，这些天轮的共同轴心就是迷卢山；迷卢山的顶端就是北极星所在之处，诸天轮携带着各种天体绕之旋转；这些天体包括日、月、恒星以及五大行星——依次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

有学者认为《周髀算经》中的盖天宇宙模型，竟与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特征完全吻合！

六 中国把二十四节气放到黄道坐标系中是否有些不伦不类

有学者提出中国把二十四节气放到黄道坐标系中有些不伦不类。然而，地球绕日进行旋转运动，运行到春夏秋冬四季的二十四个节气点，恰恰在黄道平面带上进行划分，才是最清楚、最准确的。而且正是由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把二十四节气放到黄道坐标系中，才使得中原大地上春夏秋冬的自然变化与二十四个节气点结合起来后，显得非常明显。可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四季的变化在现实中就不明显，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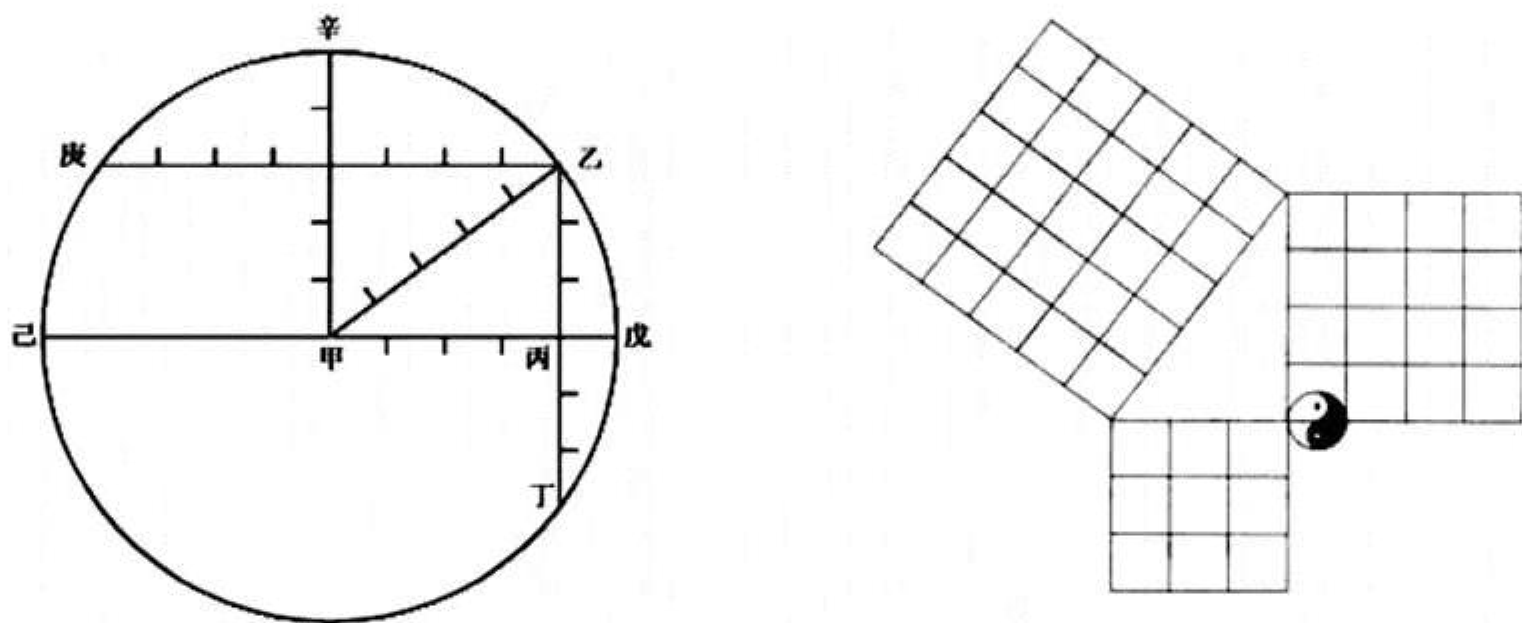
① 参见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2001，第35页。

七　有学者提出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几乎不使用任何几何方法和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心目中通常根本没有几何这种模型概念

事实上，欧洲人能够建立和使用几何模型的方法，也只能是在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年～前275年）的《几何原本》通行之后了，希腊人把结构严密的数学（除数论外）仅限于几何。即使是古希腊最擅长的几何中，也只限于研究直线与圆的几何。[①]

所以对中国古人来说，要把建立起的一个宇宙几何模型刻画在竹简上，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心目中通常根本没有几何这种模型概念的结论，就未免偏颇。

从商高对周公说的“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以生也”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段话所描述的就是组图14－16的几何模型。而且从此组图14－16的右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易学文化六爻术数的大衍之数也来自于此勾股弦［经偶］各自之积的总和。



组图14－16

真要追寻年代，恐怕这个几何模型就要追寻到周公所在的西周（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时代或更早了。

---

① 傅海伦编《中外数学史概论》，科学出版社，2007，第153页。

小结

一

《周髀算经》乃是算经的十书之一。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原名《周髀》，它既是中国流传至今的一部最早的数学著作，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学著作，主要阐明了四分历法。唐初规定它为国子监明算科的教材之一，故改名《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是介绍了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原书没有对勾股定理进行证明，其证明是三国时东吴人赵爽在《周髀注》一书的《勾股圆方图注》中给出的。

至今有许多的学者都认为《周髀算经》中“天象盖笠，地法覆盆”是“盖天说”宇宙模式的代表，笔者认为这未免偏颇。

据考证，现传本《周髀算经》大约成书于西汉时期（公元前1世纪）。南宋时的传刻本（嘉定六年，即1213年）是目前传世的最早刻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历代许多数学家都曾为此书作注，其中最著名的是唐李淳风等人所作的注。《周髀算经》还曾传入朝鲜和日本，在那里也有不少翻刻注释本行世。

从《周髀算经》所包含的数学内容来看，书中主要讲述了学习数学的方法、用勾股定理来计算高深远近和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等。

笔者不否认《周髀算经》在天地形状问题上的描述容易使人误解。唐代李淳风为《周髀算经》所作注文中就已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语术相违，是为大失”。[①]

笔者认为李淳风的这种批评也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周髀算经》是汉代早期的作品，那时的语言表达的方式大多采用了比喻等形象描述的手法，再加上使用了一些易学文化后天八卦里的“数”，对于严谨计算的科学文章来说，有些地方的描述是会造成“语术相违，是为大失”的。

二

《周髀算经》一开始就用“昔者”，指明书中一部分是在以讲故事的形式记录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书里的内容自然就失去了故事中原来对话的真实性。

---

① 转引自江晓原、钮卫星《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2001，第88页。

该书既涉及许许多多有关易学的“数”、词汇、概念，也涉及一些数学的计算方法，还涉及科学史和哲学的问题。不过，客观地说，《周髀算经》在当时也只能算作一部科学方法概论的著作，并没有把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的理论都详细地描述出来。

在中国过去的几千年里，人们受阴阳思想的影响，不论干什么都只是说一部分，藏一部分，就像《周易》的原作者周文王，只给出了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而没有给出逻辑分析的方法；又像今天的可口可乐公司只卖产品而绝不泄露配方是一样的道理。这就使得《周髀算经》中隐藏着极深的科学内涵，当然也不排除作者有故作神秘的成分。

《周髀算经》中，除具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之外，还有被现代许多学者认为是印度式的宇宙结构、希腊式的寒暑五带等异域的天文学知识成分。这也使笔者强烈地认为，在《周髀算经》的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个古代中西方文化曾经交流过的大谜，究竟是天文西学东渐来的，还是天文东学西渐去的？究竟是文明西学东渐来的，还是文明东学西渐去的？根源究竟在哪？

三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宣夜说”，它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则已明确提出，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卓见的宇宙无限论思想。“宣夜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充满着气体，所有天体都在气体中飘浮运动。星辰日月的运动规律是由它们各自的特性所决定的，决没有坚硬的天球或是什么本轮、均轮来束缚它们。宣夜说打破了固体天球的观念，这在古代众多的宇宙学说中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宇宙无限的思想出现于两千多年前，是非常可贵的。

据《晋书·天文志》记载：“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由此可见“宣夜说”认为，所谓“天”，并没有一个固体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因此，“宣夜说”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无限宇宙观念。

“宣夜说”并没有把行星与其他行星区别开来，也没有说明行星运动的复杂

性。但从科学规律上来讲，“宣夜说”却比“盖天说”和“浑天说”都进步得多。它在中国人类的认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惜，“宣夜说”的卓越思想，在中国古代没有受到重视，几至失传。

笔者认为，《周易》中乖［睽］卦所描述的日全食，狗［姤］卦中提到的流星的陨落，键［乾］卦中所描述的天体的运动变化，川［坤］卦中所描述的地球的运动变化，夺［兑］卦中所描述的月亮的运动变化，罗［离］卦中所描述的太阳的运动变化，等等，都与“宣夜说”的宇宙观比较一致。

这也使笔者非常强烈地想要搞明白：究竟天文学是不是西学东渐？

四

如果说天文学是西学东渐，那么印度佛教文化中所说的四大即地、水、火、风都归为空，这与我们华夏文化中的木、火、土、金、水是对应的，木对风、土对地、水对水、火对火、金对空。地、水、火、风、空为何又要与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木、火、土、金、水相对应呢？为何要金对空呢？

在易学中“金”的意思还代表月亮的光泽——夺［兑］，因为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是在夺太阳的光，或者说在借和反射太阳的光，所以是空。

空在佛教文化中也当动态时空的变化、客观变化的规律和自然运动的法则讲，也是能量转换的意思。佛教中的“空”并不是什么也没有的意思，而是在说一种趋势和过程，在宇宙大自然的时空系统当中动态的能量在相互转换的这样一种趋势和过程。

易的本质是宇宙大自然变化的法则。佛教也如此。佛教希望人们干任何事和任何工作千万不要围绕着某一个人去做（即不要刻意去为人），而要围绕着事和工作去做，要遵循大自然动态变化的客观规律——因为是空嘛，所以要注重过程的控制（空在此为动态变化的过程）。

| 第十五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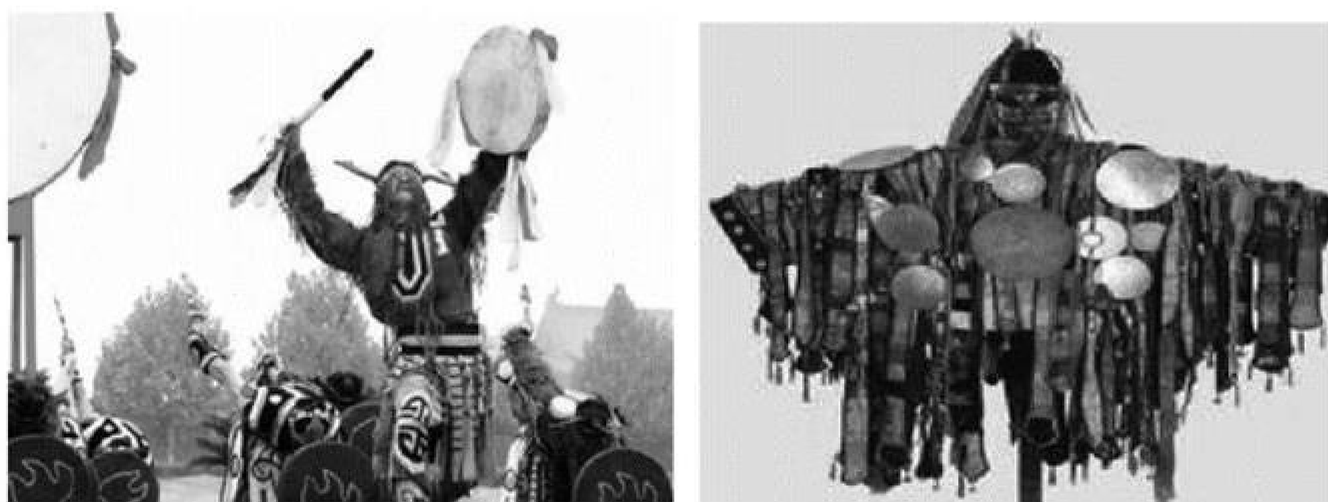
易学与萨满文化和傩文化

第一节　萨满教与萨满文化①

一　萨满教的文化定义

“萨满”一词源自西伯利亚满洲—通古斯族语的 saman，经由俄语而成英语之 shaman，shaman 指从事萨满技术的萨满师。在通古斯族语的 saman 一词中，sa 意指知道（to know），shaman 按文字表面意义来说就是“知者”（he who knows），所以称知者，意谓萨满教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方式。

“萨满”还有另一种说法，意思是指兴奋的人、激动的人或壮烈的人。“萨满”说穿了其实就是对能够进行通神活动之人和跳神巫师的专称，也可理解为是这些氏族中萨满之神的代理、中介、中间人和化身，他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在部族中具有很高的地位，相当于部族的大法师甚至部族首领（组图 15 - 1）。



组图 15 - 1　萨满教跳神的服饰及萨满在跳神

① 关于此节萨满教与萨满文化的叙述，大都来自互联网，详见 http：//baike. baidu. com/147525. htm。萨满教与萨满文化的材料出处，大都选自 http：//baike. baidu. com/view/147525. htm。

跳神一般在三种情况下进行：①为人治病；②教新萨满；③举行祭神仪式。

萨满一般分为职业萨满和家庭萨满，前者为整个部落、村或屯之萨满教的首领，负责全族跳神活动；后者则是家庭中的女成员，主持家庭跳神活动——萨满，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他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

萨满教具有较冥杂的灵魂观念，信仰的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他们崇拜自然万物、祖先、图腾、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萨满企图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获取这些秘密和神灵奇力是萨满的一种生命实践内容。

萨满教的文化定义基本上有两点特色：

（一）意识转换：从萨满教的脉络来看，意识转换即是出神（ecstasy）状态，Mircea Eliade 认为，出神同死亡一样，暗示着转变（mutation），在这种转变的状态中，平常实在（ordinary reality）和超常实在（non－ordinary reality）之间出现桥梁。在萨满教中，一般称这种意识转换状态的超常实在过程为萨满旅程（shamanic journey）。

（二）疗愈能力：不论萨满得到的是知识或是力量，作为信息的知识或力量都具有疗愈性，可与其他治疗方式搭配，疗愈的指导通常包括疗愈的方式和精灵助手的决定等。萨满所疗愈的对象不只包括自己或他人，也包括大地或世界；萨满疗愈的范围则包含了物质、身体、心理和灵性等各个层面。更精简地来说，萨满教的意义就在于其疗愈功能。

不论是治疗疾病或是意识转换，萨满教的目的都在于维持健康和增进健全。所谓健全不仅是指人类、自然以及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健全，也包括了人类潜能的发掘、自我的完成或大我的实现。

萨满教虽然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宗教组织和特定的始祖创始人，没有固定的寺庙教堂，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和教义。巫师的职位常在本部落氏族中靠口传身受世代传递，萨满教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萨满教者多为女性。

随着原始公社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萨满教日益衰落，社会上层人士陆续皈依藏传佛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等。该教的一些原始因素不同程度地为上述宗教所汲取和融合。但在民间，仍有其浓厚的影响，甚至以变异了的形态残存下来。就是说，在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了我国北方、东北方、西北方各民族的古老祭坛。

二　起源与流行分布区域

萨满教是比较原始的世界性宗教。一般认为，萨满教是自发产生的原生性宗教，而不是创生的，它出现时间非常早，起源于原始渔猎时代，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宗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础上逐渐丰富与发达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它的历史可能与现代人类出现的时间一样长久，甚至在文明诞生之前，即当人们还用石器打猎时这种宗教就已经存在。它曾经长期盛行于我国北方各民族。

由于萨满教曾根深蒂固地广泛流行于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当中，如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等；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克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蒙古语族的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等。所以各民族对萨满的称呼不同，每个民族对萨满的称呼也不一不致。蒙古族把男萨满称作“勃额”，把女萨满称作“奥德根”。雅库特人称萨满为“奥云”。达斡尔族称萨满为“雅德根”。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称萨满为“喀木”，也有称“奥云”或“巴克西”的。

在中国，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也信奉萨满教，但是相对地说，萨满教在科尔沁草原的东部蒙古，在三江流域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中以及在部分锡伯族当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继承。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们还保存着该教的信仰。萨满教在韩国保存得最为完整，日本的神道教也是萨满教的变体。这都是狭义上的萨满教。

广义上来说，萨满教是世界各地原始社会土著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流行区域集中在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拉普兰地区之间整个亚洲北部和中部，乃至欧洲北部、北美、南美和非洲的一些种族，特别是北美爱斯基摩、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都信仰该类宗教。

三　活动形式与观念特征

在中国东北诸民族萨满的跳神仪式中，尽管不同民族的萨满有不同的程式，甚至不同的氏族之间亦不尽相同，但基本程序是完全相同的：请神——向神灵献祭；降神——用鼓语呼唤神灵的到来；领神——神灵附体后萨满代神立言；送神——将神灵送走。这样，请神（献牲）、降神（脱魂）、领神（凭灵）、送神便构成了阿尔泰语系诸族萨满仪式的基本架构。此外，阿尔泰语系诸族中的一些民族还有许多相同内容的祭祀仪式，譬如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都有祭敖包

的萨满仪节；鄂温克族的“奥米那楞”，鄂伦春族的“奥米南”，达斡尔族的“斡米南”，都是同一性质的萨满集会活动。显然这是东北阿尔泰语系诸族长期互相影响与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东北地域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

传统萨满教认为，人类之所以会生病有两种原因：一是病人体内被不必要的力量所侵入；二是病人体内该有的力量流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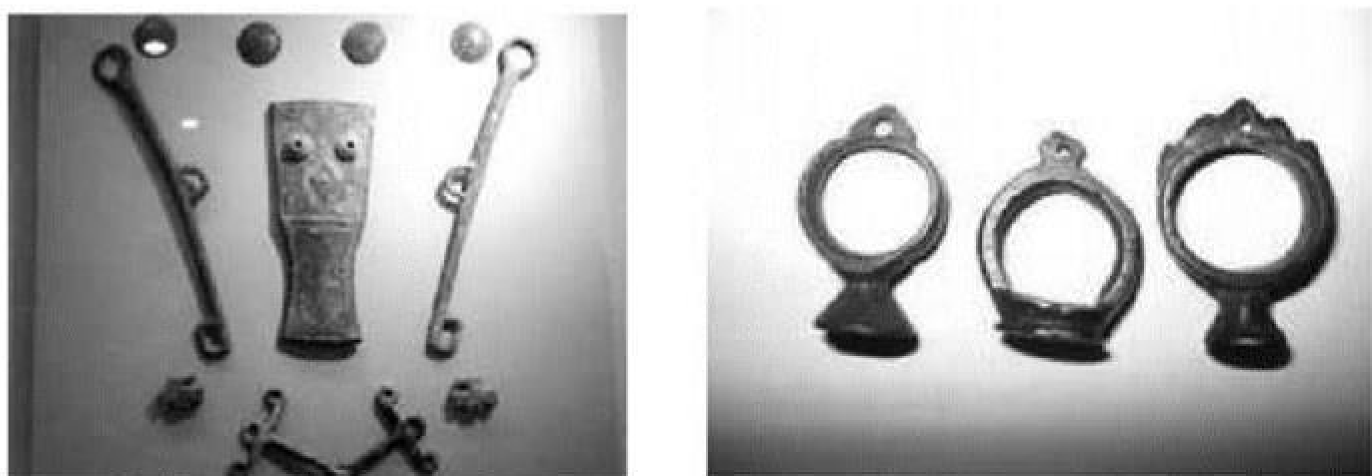
他们认为，分离（separation）是生病最主要的原因，分离用萨满教的术语来说就是力量遗失（power－loss），从另一方面来说，遗失了力量，不必要的力量就有了侵入的空间。对萨满教来说，健康就是与环境持有亲密良好的关系，个人的精灵助手、动力动物或超常导师也就能够随之在侧。萨满教的疗愈疾病原理是找回遗失的力量，萨满教称力量遗失为灵魂遗失（soul－loss），寻回失去的灵魂则称为灵魂修复（soul retrieval）。灵魂修复是萨满教的基本技术，在萨满教中，灵魂这个字等同于生命力（life－force），萨满教认为，人类由各种灵魂或生命力所合成——这也就解释了何以人类会有碎离感。以印第安 Coinibio 族为例，Coinibio 族认为，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灵魂，疗愈就是去找回失去的那个灵魂。

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即世界上各种物类都有灵魂，人只不过是这些万物中的一个环节，他（它）们在同一个自然界中是相互依赖、相互生存的，自然界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祸福，也都是各种精灵、鬼魂和神灵意志的表现。

萨满教认为人有数个灵魂。赫哲人相信人有三个灵魂：①生命之魂（斡仁）。系生命之神赋予，它同人的生命共始终，人死则永远离开躯体而消失。②思想之魂（哈尼）。为人在清醒时的思想和梦中见闻，它是暂时远离身体和其他灵魂交遇。人死后它不消失，需请萨满将它送入阴间，以免在世上作祟，伤害人畜。③转生之魂（法加库）。系转生之神所赐，人死后按其生前品行，或转世为人，或投生动植物，妇女不育、流产，认为是她们没有转生之魂或该魂被摄所致。上述各魂只闻其声，不见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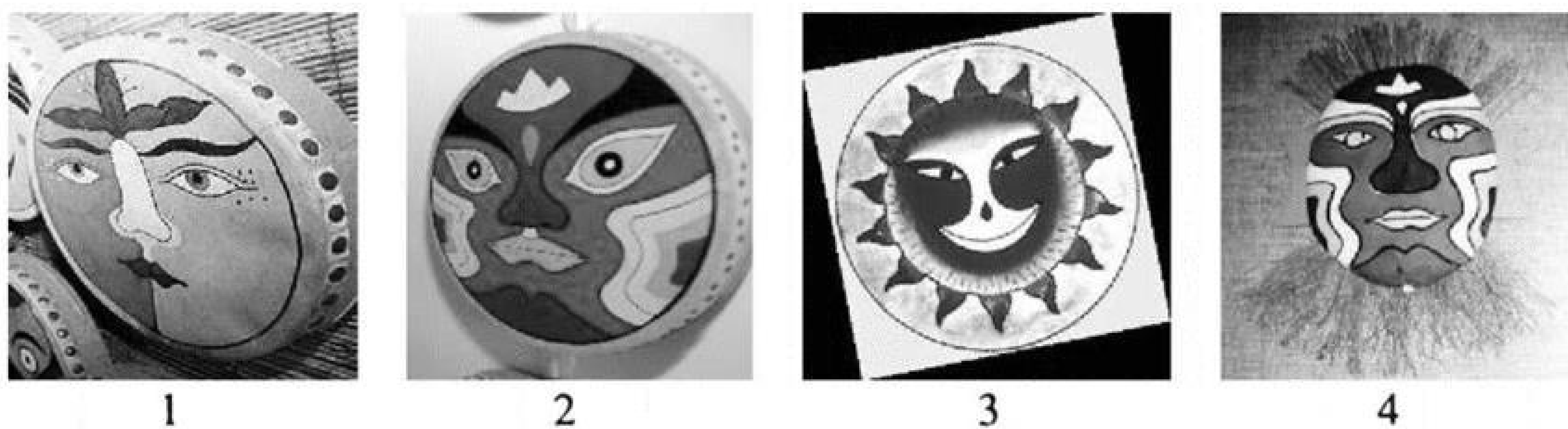
阿尔泰人和雅库特人称灵魂和生命为“腾”、“苏内”（或“苏尔”）和“库特”，认为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腾，它一旦离开人体，人就死亡。“苏内”为人特有，它使人类有思想、意志和感情，睡眠中它能离开身体四处游荡。无生命物体内均有库特，能给它们感情和意志，羊栏马厩里有了库特，牲畜就兴旺，主人会富有；它若附在牧人的鞭棍上，病魔和恶狼就不敢加害畜群。他们还认为人的灵魂，特别是亡灵，能同自然界各种灵魂或精灵交往沟通，甚至相互转移；亡灵喜附在活人身上或附在其他物件上，使其发生变化（组图 15－2）。

萨满教常赋予火、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雷电、云雾、冰雪、风雨、



组图 15－2　萨满教法器

彩虹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以及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组图 15－3），视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特别是由祖先亡灵所形成的鬼神观念以及人间的各种疾病与死亡造成的恐惧，是萨满教神灵观念的核心。认为各种神灵同人类一样有意志、愿望和情欲，更有善恶之分，不能违拗、触犯。各类神灵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各主其事，各行一方，地位大体平等，极少统属，绝大多数尚无等级差别，也没有绝对主宰一切的上帝。



1　　2　　3　　4

组图 15－3

1、2. 萨满教的鼓　3. 萨满教鼓面上的太阳神　4. 萨满教用芦苇扎成的长白山神

例如，他们主要进行以下祭祀活动。

（1）拜火。认为火来源于天界，最神圣、洁净，也最亲切，能消灭一切污秽、驱赶魔鬼、卜问休咎等，任何宗教仪礼都离不了火，各种祭品都要先献一点给火神。雅库特人认为只有用燧石取的火才是神圣纯洁的；阿尔泰人对火祈祷说“你是太阳和月亮的一部分”；鄂温克人的新娘嫁到夫家第一件事是叩拜夫家的火，把自己主动介绍给夫家的火神；鄂伦春人称火神为“斡透巴如坎”，传说是个老太婆，谁得罪了她就点不着火，故禁用铁器或尖棍捅火，禁止往火里吐痰、泼水和倒污物，进餐或饮酒时，先往火里扔点酒肉敬奉火神。

（2）拜山。山曾是氏族部落祖先的居所或起源地，并主宰各类禽兽。古代突厥可汗每年要会同各部落首领到祖先栖息过的山洞杀牲祭祀，称为祭圣山；鄂伦春、鄂温克猎人认为禽兽属山神（白那恰）豢养，日常能猎获何种野兽和猎

获多寡，全靠山神赐予。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八卦系统概念里，艮卦既代表山也代表牙，特别是野兽和啮齿类动物那种像刀子一样锋利的牙。

传说山神能变成老虎或老人，帮助猪人。它常游荡于山林，故入山行猎，禁绝喧哗，以免触犯山神；凡经老林、陡崖，要向山神祈求好运。山口大树常被削去树皮，绘成一幅形似人脸的山神像，以供过往猎人叩拜，敬烟献肉，并往其嘴上涂抹兽血和肉脂。

笔者认为那些岩画与此也有关系。

（3）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鄂温克人说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位白发老太婆，乳房硕大无比，所有小孩都是她赐给的；鄂伦春人每年春节向太阳神（德勒钦）叩拜，农历正月十五或二十五日向月神（别亚）磕头，祈求一年安吉，他们还认为北斗星能赐人长寿，亦应叩拜；鄂温克人说风是北边风神老太婆扇动大簸箕所致；鄂伦春人认为横越过刮旋风的地方会触犯风神，招致抽风和嘴歪眼斜；雨神常被称为龙王爷，身上有无数鳞甲，每鳞装有一百多担水，下雨就是龙王爷洒水；达斡尔人每年开网捕鱼，均要祭龙王，祈求丰收；赫哲人认为雷鸣电闪是“雷公”、“闪娘”所为，雷公捶砧击魔，闪娘一旁配合用镜照妖；鄂伦春人禁止接近雷击过的树木，以免触犯雷神而患病。每当夏季多雨影响出猎时，猎人们见虹就跪拜，祈求放晴。但在进入封建社会的蒙古、满和达斡尔等族的萨满教中，出现了天神（腾格里）的观念，渐次升至高于诸神的位置（组图 15－4）。



组图 15－4　蒙古族萨满面具

有些民族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外界阶级社会的影响，赋予一些古老神灵以新的内涵。鄂伦春族的“吉雅其”，原是保佑牧畜繁殖的神，后变成财神爷，每户都供奉；少数上层人们曾在清朝地方机构里当差，使信奉多种衙门神，其神像多是官吏的形象。

在一些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中，出现了身世贫苦的神。内蒙古辉索木地区鄂温克人曾供奉哈音神，据传是一对衣食不周的穷苦老夫妇，死后成神，多为穷人供奉；卓日神是个奴仆，终身替人养牛挤奶，年老摔死在牛粪上，死后被奉为

神，神像是画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的老人和带犊的乳牛。每当乳牛患病不出奶时，主人就向它献祭。

赫哲族人还有着三界的观念，他们认为宇宙分上、中、下三界，上界为天堂，众神所居，又分七层，最权威的神灵居最上层；中界是人和动植物所在；下界是阴间，也分若干层，分别为祖灵、一般亡灵和大小鬼魂所住。人类夹在中间，受着神灵福佑和鬼魂作祟的影响。只有巫师萨满能通达上下两界，疏通三界之事。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天地人合的世界观。

鄂温克、鄂伦春人对熊异常敬畏，他们认为熊是自己的先人，禁止猎捕。后来枪支传入，猎熊风气渐开，但每当猎到熊后，均要举行仪式，割下熊头，放在树架上，大家跪下对它敬烟叩头祝祷："爷爷！（雌熊则称奶奶）你睡着啦？不要责怪我们，不是有意伤害你，是误杀了你（佯称其他民族的人杀的）。不要生我们的气，以后多赐好运。保佑我们多打野物吧！"一再磕头，燃草熏熊头，认为这样，熊的灵魂才会远去。然后驮回熊肉。猎人们进入自己住地，发出"嘎嘎"喊声，人们遂围聚一起，架火烧煮熊肉，边吃边发出模仿乌鸦的"嘎嘎"、"咕咕"之声。食毕将熊骨用柳条包裹，由男人抬去风葬，后边跟随佯装哭泣的送葬者。

朝鲜族人有把喜鹊当祖先的古老传说；满族人以为乌鸦曾救过自己祖宗的性命，在以往萨满教祭天祭祖的仪式上，于传统的神杆（索罗）顶端，挂有让乌鸦啄食的猪肉和内脏；达斡尔人在大型宗教仪式上供祭 12 个杜瓦兰神，它们是盘栖在 12 种植物上的 12 种动物。

祖神崇拜是萨满教崇拜的主体，是近存各族萨满教的共同特征。鄂伦春人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祖神，多是氏族内亡故的曾祖父以上男祖先。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和蒙古等民族对祖神的称呼，都有着语音相近或同源的特点。氏族的萨满常称"斡娇如"萨满，意即祖先传下来的。他们是被祖神看中而当萨满的人，宗领氏族的主体祖神，举行宗教仪式时，要恭请祖神降临附体；同鬼神交战时，须凭借祖神的力量。

在祖神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对于人畜患病多加进祖神作祟的解释。同时，特别重视梦境和日常现象的征兆，认为这是祖神预兆吉凶，因此规定了许多祭祀、禁忌和禳解之法。

萨满教还进行偶像崇拜（组图 15－5），供奉的神灵偶像多用石、骨、木刻削或草扎、兽皮毛编结，也有的将偶像彩绘在兽皮或纸上，多类似人形，认为制作完成后的偶像须经过祭祀后才具有神圣的性质。

萨满教会在传统隆重的祭祖仪典时，在全体氏族或部落成员参与祈祷人畜平安、农牧丰收时，在氏族新萨满领神仪式时，举行奥来那楞祈祷仪式。



组图 15－5

1、2. 鄂温克族萨满面具 3. 满族九千岁萨满面具 4. 萨满教雕像

另外，萨满教在为婴儿寻找、抓回灵魂的仪式时，会举行求“乌麦”的祈祷仪式。他们还举行送魂、祈求猎物、求雨和止雨、咒术与法术、占卜、跳神的仪式（组图 15－6）。



组图 15－6 萨满教的鼓语和跳神

综前所述，大地之母的常青灵性与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的世界观可以归结于三点：（一）万物都是活的；（二）万物相联系；（三）万物皆神圣。

萨满教认为万物都是活的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万物都具有生命的概念，他们认为的万物相系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万物之间都具有五行的系统逻辑关系，他们认为的万物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太极八卦里被系统归类后的万物，太极或太极中的万物组合系统就是神圣的自然。

四 本质

严格地说，萨满教是一种现象的通称，没有教条或是特定的信仰体系，不同

传统的萨满教有不同的实行方式与特征，一般对萨满教的定义也是来自其经验与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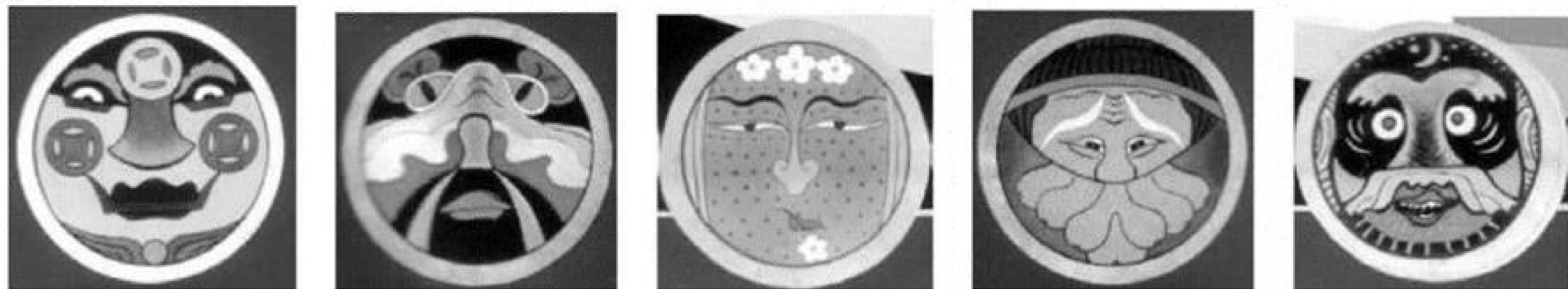
萨满师则表示，“萨满教不是关乎信仰，而是关乎经验”。霍尔维兹 Horwitz 定义萨满师是“有意地改变其意识状态，以接触和/或进入另一个实在之中，能由此获得力量和知识。任务完成之后，萨满师从萨满旅程回到原本的世界，以其所得的力量和知识帮助自己或他人”。

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理论也是经验之学，就是从大自然中总结出来的自然法则和变化规律。这样，易学与萨满教就对应上了。所以说，所谓萨满教并非指某种特定的宗教或信仰，而是凡具萨满经验和萨满行为的通称。

萨满教的本质像其他宗教一样，是关于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因此不应该把它排除在宗教之外。萨满教在宗教意识之中确立了各种具体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并建立了同这些对象之间或沟通、利用、祈求、崇拜，或防备、驱赶、争斗等宗教行为模式。萨满服务其中的社会组织约束并规范了其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各种宗教行为，决定了萨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并利用它们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体制。

因此萨满教应看作是以信仰观念和崇拜对象为核心，以萨满和一般信众的习俗性的宗教体验，以规范化的信仰和崇拜行为，以血缘或地域关系为活动形式三方面表现相统一的社会文化体系。

萨满教是崇尚自然万物的宗教（组图 15－7），而万物有灵只不过是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八卦所系统归纳代表的自然万物更加细化了之后形成的万物有灵论。其实概括起来，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自然崇拜。自古以来，从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奇门遁甲、占卜、风水、气功等经验一直都是在神秘传承的这个方式可以看出，只不过这种自然崇拜与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与宗教信仰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这就是萨满教的完整体系。



组图 15－7　萨满教的财神、蘑菇神、天花妈妈、七乳妈妈、七星神

五　相关记载和与萨满教有关的术语

萨满一词最早是在我国史籍中出现的。12 世纪中叶，中国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室奸滑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中己用"珊蛮"一词，记述了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

在中国北方民族中，匈奴是最早组成国家的民族。"匈奴"这一音写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可《史记》里该词的音写也并不一致。《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关于猃狁、荤粥，学界较普遍地认为，这是"匈奴"一词的不同音写。唐、虞之世荒远无可稽考，所以匈奴政权的历史上限是模糊的。

事实上，匈奴人所操语言是揭开匈奴人语言所属、族源、族属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由于复原、考释匈奴语词不仅仅是个语言学问题，它也涉及当时文化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学界在对匈奴语词中出现的一些萨满教术语进行复原、对比、考释、分析后，认为有关萨满教术语都是以匈奴官号的形式出现的，而且都与蒙古族萨满教术语完全一致。

这说明，匈奴人笃信萨满教，其宗教气氛十分浓厚，匈奴政权可能是政教合一的，至少具有政教合一的色彩。在萨满教研究中，学界已发现了阿尔泰语系各语族都有一些相同的名词术语，甚至有些术语与印第安人萨满教术语相同或相似，但各语族的萨满教术语系统并不完全一致。这里选择的是以匈奴官号出现的萨满教术语，这些都属于蒙古族萨满教中的关键名词。

另外，我们从红山文化牛河梁墓葬出土的文物与凌家滩墓葬出土的文物来看，它们也都与萨满文化是有关联的，而在新石器时代萨满文化与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又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休屠"

《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又载："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从两条引文可知，"休屠"这一音显然是匈奴的王号。这是在匈奴时代已发生了音变的蒙古族萨满教常用术语。音变后的词语不仅与

《蒙古秘史》里的相关词语基本一致，与现代蒙古语书面语的相关词也基本一致，语音上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有无古代语言的词首“h”音。

《汉书·匈奴传下》载：“单于咸立五岁，天凤五年死，弟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呼都而尸单于舆既立，贪利赏赐，遣大且渠奢与云女弟当于居次子醯椟王俱奉献至长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单于长立二十三年薨，单于汗之子宣立。伊屠于闾鞮单于宣，元和二年立。”汉文史籍中出现的“休屠”、“呼都”、“醯椟”等都是发生音变后的同一个词，《蒙古秘史》中，该词的词首“h”音脱落后音写为“亦都兀惕”、“额秃格捏”、“斡脱坚”等。“亦都兀惕”一词在《蒙古秘史》里是以人名出现的，该词与突厥官号“亦都护”是同一个词，该官号和人名无疑因袭了匈奴官号“休屠”。该词在现代蒙古语书面语中仍保存了古老的读音。

现代蒙古语书面语中，该词有三种读法：idugen、edugen、utugen，指大地女神或女萨满。在现代蒙古语口语中的 udugan，既指女萨满，又指接生婆。现代蒙古语中，作为人名出现时，其词根和原始词义显得十分清楚，现代蒙古人中经常有 Iduheshig、Eduheshig 等人名。“Idu”、“edu”是同一个词的不同音变，意为“大地女神”，“iduheshig”、“eduheshig”意为“大地女神的赐予”。因此，“休屠王”可以理解为大地之王或国土之王，“亦都兀惕”、“亦都护”可以理解为大地女神的人们或大地女神的子孙。

“Idugen”、“edugen”、“utugen”指大地、女萨满，“boo”指男萨满。把两者加以比较就可发现：词根“idu”、“edu”、“utu”指雌性，“boo”指雄性；“idu”、“edu”、“utu”指女性生殖器，“boo”指男性生殖器。这两个词是非常古老的蒙古语词，现代蒙古语里以这两个词为词根的派生词相当多，如 edur、udur、eduge、edugehu、utuhu、utug、udugehu、utugus 等。“Idu”、“edu”、“utu”的原意为最初、最早、原初、发生、发源、发源地，其引申意义为大地女神、女萨满、女性生殖器、接生婆。

从其语义可以看出，蒙古族萨满教在远古时期把女性生殖器看成是人类繁衍的源头，其性崇拜应源于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人们一般认为，蒙古族萨满教术语里，“boo”一词是专门指男萨满的。实际上，以“boo”为词根的派生词有 boor、boorongkhi、boordeng、boorog、boorchog 等。“Boo”一词的原意为圆、椭圆，其引申义为男性生殖器、雄性、男萨满。“Idu”和“boo”无疑是蒙古族萨满教产生之前就有的原蒙古语词，所以“idu”和“boo”是蒙古族萨满教最初的指男女生殖器以及阴阳和雌雄两性最基本的对立统一概念。

从蒙古族萨满教祝文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萨满教把一切有机和无机物都分为雌雄［阴阳］两类。蒙古族萨满教观念里，天为父，地为母，天为雄，地为雌，日为雄，月为雌，铁为雄，石为雌……如果仔细分辨下去，则会无所穷尽，就像易学文化中的阴阳概念一样。

“雌”、“雄”这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随着萨满教的发展逐渐抽象化、形象化、拟人化和象征化，并向一个神教［自然、太极］上转化。最终，被高度抽象化以后，天变成了雄性的最高神，地变成了雌性的最高神，完成了它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认为，雌［坤、阴］、雄［乾、阳］的易学太极文化也是蒙古族萨满教的起源和哲学基础。

蒙古族萨满教在远古时期把女性生殖器看成是人类繁衍的源头，其性崇拜应源于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太极八卦里的坤卦，它也有“太一生水”的意思。

“温禺鞮”

《汉书·匈奴传下》载：“单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怜父呼韩邪单于，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未晓其形状所生，请遣使问之。’”《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十六年，乃大发缘边兵，遣诸将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肜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又载：“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之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大将军窦宪上书，立於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后汉纪·明帝纪》载：“肜尝与南单于、左贤王信出朔方高阙塞击温禹犊王于涿邪山。出塞九百余里，见小山，为信所误，云是涿邪王山，无所得而还。”在有关匈奴的记载里，“温禺鞬”仅此一见。从行文看，“鞬”字显然是“鞮”字之讹。从语音上看，几种音写里的“禺”字与“偶”字音近，而“禺”字与“禹”字音殊形近，可认为“禹”字为“禺”字之讹。其他三种音写“温偶駼”、“温禺犊”、“温禺鞮”在读音上与《蒙古秘史》的音写“汪古惕”吻合。在《蒙古秘史》中，该词以部落名称出现。

所以，匈奴的“温禺鞮”一词有两种可能：一为匈奴官号；二为温禺鞮部落名称。“温禺鞮王”与屠耆王、谷蠡王等匈奴其他官号一样，是官职名称，或者是与乌揭王、乌孙王一样，是温禺鞮部落王。不管怎样，“温禺鞮”一词是蒙古族萨满教极其重要的概念之一。“温禺鞮”为复数，其单数为“温禺”或带有不固定辅音“n”的“翁衮”。道尔吉·班札罗夫在《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

一书中说："初期是单纯崇拜祖先，到后来逐渐变成了崇拜翁衮。所谓翁衮，是蒙古人祭拜他们所尊敬或恐怖的死者对象。"道尔吉·班札罗夫所说的就是偶像崇拜，这是学界关于翁衮或温禺鞮崇拜较为普遍的观点。

蒙古语的"翁衮"或"温禺鞮"一词在萨满教观念里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如翁衮树、翁衮坝、翁衮山、翁衮马等，一切崇拜的对象都可能冠之以"翁衮"。所以，"翁衮"或"温禺鞮"这一概念包含我们现在所说的偶像、天地、鬼神、自然、先祖、图腾等一切崇拜的对象。翁衮或温禺鞮有地位的高低、大小、具体和抽像、有形和无形等区别，比如，天为最高、最大、无形的翁衮［阳］，地为第二大、有形的翁衮［阴］；先祖的偶像既为有形［阳］的翁衮，又是先祖灵魂无形［阴］的翁衮载体等。所以，我们可以从哲学角度把蒙古族萨满教概括为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观念为基础的"泛温禺鞮主义"，但其哲学基础的根源还是来自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阴阳学说。

"骨都侯"

《史记·匈奴列传》载："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

从汉文史籍看，"骨都侯"和"尸逐骨都侯"无疑是匈奴官号，这个音写显然考虑了音译和意译，有意用了"侯"字，所以不能把"侯"字作字面上理解。从引文可知，四异姓骨都侯的主要职责是"主断狱听讼"，所以都是断事官。

关于骨都侯，《史记集解》曰："骨都，异姓大臣。"《史记索隐》按："《后汉书》云：'骨都侯，异姓大臣。'"《通鉴》胡注曰："韩氏骨都侯、当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粟籍骨都侯，凡五。"以"骨都"为词根，"骨都侯"为带有粘附成他的音写。"骨都"，《蒙古秘史》作"忽图"，"骨都侯"作"忽都忽"。在《蒙古秘史》中，以"忽图"作词根的人名相当多。而"骨都侯"显然是萨满教的固有名词，其意很抽象，可理解为福禄、受赐，与萨满教天［乾、阳］、地［坤、阴］两神崇拜紧密相连，也可理解为该词与中国

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太极八卦里的基本概念天［乾、阳］、地［坤、阴］崇拜紧密相连，可扩展理解为受天赐予者和受地赐予者。匈奴人用于官号的“骨都侯”一词在13世纪以后的可汗号、喇嘛教以及人名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在喇嘛教和人名中沿用至今。

“胡”

《汉书·匈奴传上》载：“单于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从单于所遗书信可知，“胡”是匈奴人自己的音写，而且，匈奴单于把“胡”明确地解释为“天之骄子”。这里出现的“胡”无疑是蒙古语“ku”的音写，意为子。

《汉书·匈奴传上》载：“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玄晏春秋》曰：“士安读《汉书》，不详此言，有胡奴在侧，言之曰：‘此胡所谓天子。’与古书所说符会也。”“胡者”既然是“天之骄子”，那么在这里为何又把“孤涂”解释为“子”呢？士安对这一点感到茫然。胡奴言的“此胡所谓天子”一语值得玩味，他显然懂得“胡”与“孤涂”都是“天子”之意，但对“胡”、“孤”为词根的音写、“涂”字为粘附成分的音写，当时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子”在任何语言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词，不可能弄错，《汉书》和胡奴的解释都是准确无误的。从其语音和解释可以断定，“涂”字只能是蒙古语名词复数粘附成分“d”、“t”的音写。“胡”、“孤”为词根“ku”的音写，意为子，“孤涂”为“子”之复数。从古至今，蒙古语族的“ku”和突厥语族的“ogul”在语音和语义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胡”为操蒙古语族诸部落的自称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自称为“胡”的问题，往往不被人们理解，这就需要从蒙古族萨满教的角度加以考察。以往，学界对“胡”考来考去，从未把聚光点对准天地［乾坤、阴阳］，没有从蒙古族萨满教的角度去考察。上面谈到过蒙古族萨满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天［乾、阳、父］变成了雄性的最高神、地［坤、阴、母］变成了雌性的最高神，这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八卦里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

道尔吉·班札罗夫在《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一书中有过较精辟的论述。他说：“实际上，他们是把天看作自然界的阳性根源，而把地看做是

阴性根源。前者赋予生命，后者赋予形体。他们把前者叫做父，把后者叫做母。”

把天称为“父”，把地称为“母”，这一古老的萨满文化概念在蒙古族中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在蒙古族萨满教观念里，人类是上苍和大地之子。以《蒙古秘史》为代表的中世纪蒙古语里，“ku”一词无性别之分；现代蒙古族牧民口语里，“ku”一词也无性别之分；匈奴时代的蒙古语中，“ku”一词更不可能有性别之分。该词既是蒙古语里的常用词，又是从萨满教角度泛指人——天子、天之骄子。古汉语中，“天子”指统治天下之帝王，匈奴人之“胡”显然无高下次第之分。后来，汉文史籍把当时操蒙古语的各族、从萨满教观念出发的自称“胡”逐渐变成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从他们是把天看作自然界的阳性根源，而把地看做阴性根源。前者赋予了精神的生命，后者赋予形体的生命以及他们把前者叫做父［乾、阳］，把后者叫做母［坤、阴］这些内容来看，萨满教的这些理论依据就是来自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八卦里的系统基础理论，非常明显。

第二节　萨满教的本质与易学文化

一　红山文化

北京玉学玉文化研究中心的古方在其《萨满教特地对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一些特点》论文中提出，红山文化玉器与萨满教是有关联的。

在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4号墓，墓主人头枕箍形玉器，胸部放置了两件玉龙，随着墓主人的尸骨一起出土（组图4－12）。

在牛河梁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墓主人头骨的两侧各置了一块圆盘形玉璧，胸部放置了一件勾云形器，手腕处戴着一个玉镯，双手处又各置了一个玉龟，随着墓主人的尸骨一起出土（组图4－13），说明此墓主人也曾是这个地区的中心领袖或第一位最高首领。

在牛河梁遗址第16地点4号墓，墓主人头顶放置了一件玉凤，身体和手臂处放着三个玉镯，随着墓主人的尸骨一起出土（组图5－13）。这件玉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玉凤，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在赤峰的红山文化地区，出土了一件表现八卦的碧玉多头器（组图4－15）和许多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勾云形器（组图4－14、组图4－16），如果我们再仔

细地观察这些勾云形器的中部，就会发现它们的中间都采用镂空的雕法，雕刻出了一个空［阴］实［阳］相衬、阴阳相间的太极漩涡的旋转图案。

如果我们把勾云形器中间部位阴阳相间的太极旋转图案的与宇宙星系的旋转状态图进行一下比对，再把玉龙表现循环、轮回、旋转的运动变化状态结合在一起，再把表现八卦的碧玉多头器结合起来，我们就敢十分地肯定，早在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中国智慧的古人就已经能够熟练地应用易学太极八卦文化来表现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运动和变化了，并且他们将易学或龙文化体系外在的图腾也更加形象化了。

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半砬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蚌饰和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人以及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石人造型上来看，都非常明显地显现出了祈求、祈祷时的虔诚神态，特别是他们手臂的造型与现代鄂伦春族萨满神偶手臂的造型几乎是一致的（组图4-17）。这就是萨满教进行偶像崇拜时的偶像物品。

萨满教常赋予火、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云雾、冰雪、彩虹、祖神、偶像和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视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各类神灵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各主其事，各行一方。而易学中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卦就分别代表着以上这些事与物和自然现象。这样，我们就能非常明确地认定，萨满教曾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占卜是有着极深厚的渊源。

二　凌家滩文化

凌家滩遗址的时代距今约55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在凌家滩遗址的第一区域，反映出了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和庭院区，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在第二区域反映出了3000平方米的红陶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是部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这座古城的中心，它反映出当时的高度文明和强势力量；在第三区域反映出了大型墓葬区，中央有一处约一米高的祭坛，陪葬品有玉器、石器和陶器等。

另外，在所有史前文化遗址中，凌家滩出土的玉器最多，而玉器是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贵族们用来象征权力文化的专用礼器。在凌家滩遗址就出土了精美的玉鹰、玉人、玉版、玉龟、玉璜、玉冠、玉勺等玉器。

玉鹰（组图4-21）呈展翅飞翔状，胸部核心部位，阴刻出了规整的内外两

个圆圈和八角星纹，表现出了中国易学文化中将太阳形象地比喻成太阳鸟的观念，内外两个圆圈和八角星纹则更明确地表示出了中国易学文化早期的文明核心——八卦。

玉版（图4－22）正面呈长方形，反面呈内凹形状，中部刻一小圆，小圆外又刻一大圆，小圆内刻一方心八角星纹，两圆之间平分八等份，每等份内又刻一圭形纹饰，在大圆圈外与长方形玉版四角对应之处，又各刻一圭形纹饰。

考古专家认为，玉版上雕刻的纹饰，反映了5000年前凌家滩人的原始哲学思想。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圭形纹饰表示东西南北四方和八方，应与季节有关。玉版毫无问题的显示出了度数、方隅、以八数为天地之维纲的形象思维。这无疑是一件崭新而能引人入胜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瑰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玉版是夹放在龟甲里面一起同时出土的，这也同时反映出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典型的占卜工具。

玉龙（图15－8）阴线刻出眼、鼻、口、吻部、龙须、头雕两角的龙，呈出了首尾相连的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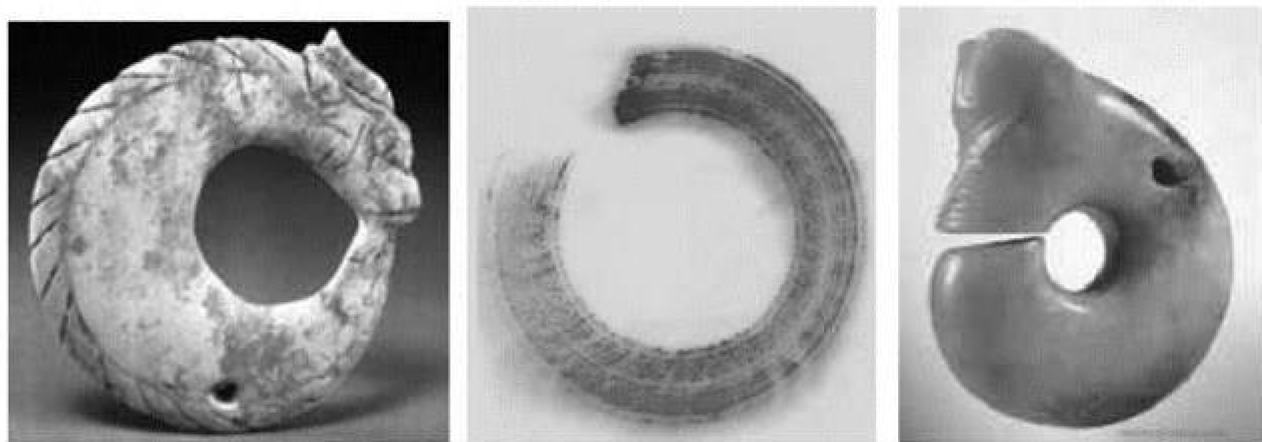


图15－8　凌家滩与牛河梁出土的玉龙

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龙文化源远流长，从红山文化的玉龙到凌家滩出土的圆雕玉龙，五千多年的漫长时空，在龙文化上就这样神奇地叠合了起来，这足以说明巢湖流域的龙文化和红山文化也都发生过交融和碰撞，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自然文明及宗教的崇拜与虔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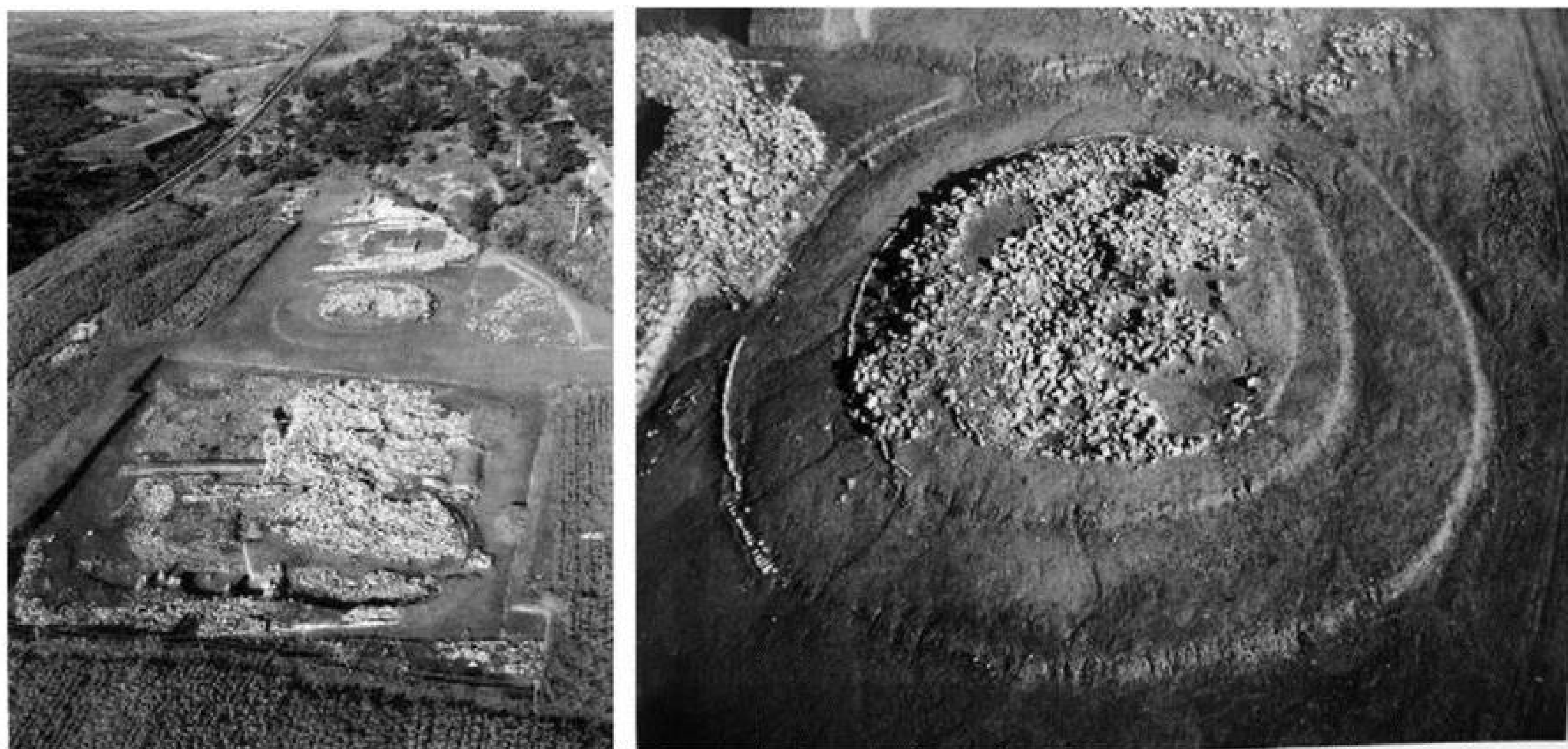
凌家滩共出土的玉人都是双臂弯曲紧贴胸前（组图4－26），呈现出作祈祷之状时虔诚的神态，反映了凌家滩先人已有强烈的原始宗教意识，早已告别了精神世界的蒙昧期。而且他们都呈长方形面孔，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嘴，身材比例匀称，面部表现出蒙古人种的明显特征，同现在的中国人一脉相承。这有力地证明了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南北方人种一直未变，文化传承也未变。

凌家滩出土的玉人造型与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半砬山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形蚌饰造型和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的玉人造型，以及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石人造型，与现代鄂伦春族萨满神偶的造型几乎是一致的，特别是他们手臂呈

现出了祷告时才有的姿态，与萨满教的偶像崇拜也刚好一致性地吻合在了一起。

从牛河梁大型祭坛和积石冢遗址、女神庙的女神（组图 3 －11）面部来看，那时的古人所信仰的神，既有萨满偶像崇拜的痕迹，也有萨满面具的痕迹。

牛河梁第 2 地点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二倍（组图 15 －9），也就是说外衡周同时也是内衡周的二倍，这说明冬至时太阳周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速度的二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算经》的记述颇为一致。



组图 15 －9　牛河梁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遗址

以往的研究中过多强调牛河梁遗址承载的祭祀功能，牛河梁大型祭坛为从科学的角度深刻揭示牛河梁遗址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观点，证明中国古老的盖天理论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如果我们把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明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他们都有太极、八卦、龙、鹰鸟、萨满偶像崇拜的共同文化特性，这就非常直观地说明了那时凌家滩的人们不但信奉萨满教，而且在萨满文化中也包含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太极八卦系统理论。被南北方的中国先人共同用于了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祭祀当中。

三　二里头文化

2002 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二里头队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调查夏商时期的宫殿时，于该宫殿区内发掘出二里头二期的贵族墓葬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副人骨架和绿松石龙形器饰物（组图 6 －19），这件龙形器长约 70 厘米、头宽约 15 厘米、身宽约 4 厘米，呈饕

餮纹面饰夔龙形态，而且在龙形器饰物的中部还有一带玉舌的铜铃，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前后。可见，这种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是与铜铃配套使用，佩戴在墓主人身上的。

另外，结合1981年在此遗址出土的几件绿松石铜牌饰与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玉龙和大量面具，笔者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原始萨满文化或傩文化面具的微缩品。因为即使在今天信奉萨满教的地区，牌饰和铃铛也还都是萨满教巫师在进行萨满活动时所使用的法器，而那个时候的巫师往往又是贵族或首领之类的人物。

第三节　傩文化①

一　傩文化的定义

要知道什么是傩文化，首先得了解什么叫“傩”。

“傩”这一名称，用的并不是汉族的语言，用的是侗台语族的语言。傩，音挪（nuó），在侗台语族中，这一个音符只要变化声调，就可以代表许多事物。侗台语族称稻、田、鸟、人、民族等都为“傩”，故“傩”有祭祀稻神、田神、水神、鸟神、祖神等多种含义。

另外，中国字是象形文字，由象形、会意、记音三要素组合而成。它的意义往往包含在它的象形之中。傩字的繁体字由“亻”、“堇”、“隹”三字合成，“亻”字表示它与人事有关，“堇”是记音，“隹”就是雀鸟。所以从汉文字的结构和读音上来看，“傩”就成了农耕民族为崇拜神雀、神鸟所举行的“神雀、神鸟祭”。

这样，“傩文化”就成了因祭祀神雀、神鸟而产生出的一系列“神雀”、“神鸟”文化。这种被中国人崇拜的神雀鸟，也就是鸾鸟，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罗［离］是对应的，也就是太阳鸟。所以笔者认为，傩文化在远古时期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罗［离］卦（代表的太阳鸟、太阳文明）的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傩”乃人避其难之谓，意为“惊驱疫疠之鬼”。远古先民在征服自然中为了生存的欲望，为了获得生息繁衍后代，需要一种宗教（自然宗

① 关于此节傩文化的叙述，大都引自互联网，详见 http：//baike. baidu. com/view/71711. htm。有关傩文化的材料出处，大都选自 http：//baike. baidu. com/view/71711. htm。

教）的观念来帮助自己和超越自我，龙的传人就创造了巫傩文化。这样长期以来，巫傩活动在生命意识上就满足了广大信仰者的心理要求，巫傩之风的传承与流行就渐渐融入了民风习俗之中，即使在现代，仍以传统文化的形态存留于民间。

因此，我们可以说傩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来自远古的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

二　傩文化的起源与流行分布区域

由于傩文化是农耕时代的一种观念形态，所以它只有依附农耕文化才能生存。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李家岗、曹家湾和下刘家湾，湖北宜都城背溪和枝城北（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年代，大约距今8500～7000年），陕西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都发掘出了现知最早的稻谷遗存。除了贾湖和八十垱，其余遗址的稻谷遗存差不多都是在"红烧土"或陶片中发现的稻壳碎片，贾湖遗址（始于距今约9000年）则是在房间和窖藏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稻米，偶尔也有一些稻谷。在长江下游偏南的杭州湾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大约距今7000～6500年）遗址，也发掘出了大量堆积着的稻谷。作为水稻文化的意识形态，傩文化很可能也产生在这些地区。

傩文化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大西南地区。中国的傩文化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各有特点。以服务对象、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划分，分为民间傩（组图15－10）、宫廷傩、军傩和寺院傩四种。土家、壮、侗、仡佬、苗等民族的傩戏属民间傩；地戏、关索戏属军傩；藏族聚居区大寺院的跳鬼，包括北京雍和宫的正月跳鬼属寺院傩。



组图15－10　民间傩

据有关专家调查表明，目前仍然保留着傩文化中傩戏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过去被人称为蛮荒之地的湖南西部的古黔中地。就是说贵州是我国傩戏最多。品种较齐全的省份，因而曾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兴趣，美国、日本、法

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多次专程前往考察。

三　活动形式与观念特征

至今，在中国的傩文化风俗中，还流传着许许多多的形式种类和活动仪式。比如，安徽芜湖市的“马灯”和《跳荷花》、祁门县的《游太阳》与歙县的《打罗汉》和《嬉钟馗》；广东潮汕的“英歌”与福建南平的“蛇王节”以及闽南的“宋江阵”；苗族祭祀盘瓠神的仪式盛典椎牛祭；广西仫佬族的“依饭节”；苗族的“磨过”与“芒蒿”；江西南丰的“搜傩”仪式；汉军旗人祭祀仪式——跳虎神；四川民间的傩傩送丝蚕；青海三川土族的“跳法拉”；山西曲沃的“扇鼓”傩礼；三川土族的“纳顿节”；北京雍和宫的“跳布札”；“三星堆”的青铜巫师人像与面具等，都与巫傩文化风俗有关。

在傩仪的神坛上，供奉最为普遍、并且来自神话传说的是始祖神，傩公和傩婆（或傩公、傩娘），他们是傩俗信仰中至高无上、最具威望的傩神。所以，后来人们奉傩公和傩婆为人类始祖，是人类救星，为人类带来平安、五谷丰登、儿孙满堂、凡事兴旺的福星，而信奉倍至。

依照当地习俗，凡婚久未育子女者，便向傩公、傩婆祈求，并许下愿信，以后身怀有孕或生了子女请端公做法事一堂，或演戏酬谢。如遇家有凶事或遇猪瘟、鸡瘟、家人多病，便祈求傩公、傩婆佑福，年终隆重祭祀。在农村，此种酬神方式，人们统称“还傩愿”，演出之戏叫“傩愿戏”。

笔者认为，这个故事与中国文化中伏羲氏和女娲结为夫妻的传说非常接近，也与《周易》“归妹”卦爻辞所描述的故事非常相似。

在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流行着一种“九曲黄河阵”又称“九曲黄河灯”的活动仪式，简称“跑黄河”。这是一种通过走阵形式进行的社火祈福活动，一般是以村社为单位，在每年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举行。

九曲黄河灯会并不是年年举办，一般是遇有大喜事需要庆祝，或遇到了天灾人祸需要消灾免祸时，方能举行。但每次都必须连续举办三年，头一年称“跑龙头”、第二年称“跑龙身”、第三年称“跑龙尾”。如果身子不全，龙就不会翻身布雨，后果是容易引来旱魃。这种具有战阵特色的传承仪式，也为上古巫傩文化的历史遗存。

另外，傩戏（组图 15－11）和傩舞也是傩文化中的一种活动形式。比如，青海寺院的傩舞“跳欠”与青海同仁土族的《跳於菟》；屯堡文化与军傩地戏；宗教舞剧《跳布扎》；四川羌族的释比戏与安顺地戏及面具以及四川梓潼的阳戏、芦山的庆坛、苍溪的庆坛和四川的秧苗戏；江西南丰的“跳竹马”与“和

合舞”和赣东地区的“跳八仙”以及江西萍乡的傩舞、乐安的“滚傩神”和南丰的“跳傩”；云南彝族的“跳虎节”与傩舞“余莫拉格舍”；澄江关索戏；江苏南通童子戏；安徽贵池的傩戏、傩舞；内蒙古蒙古族的“呼图克沁”；福建泉州的打城戏；湖南土家族的“毛古斯”；贵州德江的傩堂戏与福泉的阳戏和威宁彝族的“撮泰吉”（变人戏）；河北武安的《捉黄鬼》等。



组图 15－11　傩戏与傩舞

巫傩活动中的傩戏在赣鄱大地可上溯到殷商。经几千年的沿袭、发展，江西傩文化形成了历史积淀丰厚、原始形态古朴、文化遗存众多、文化体系完整等鲜明的特点；江西傩事活动分布广泛，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据 1995 年调查统计，全省有 25 个县（市）有傩事活动，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 247 个。江西傩被学术界誉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备受瞩目，多次应邀远赴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表演、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四川民间傩戏里，有一出《送丝蚕》的剧目。剧中主角傩傩面戴一个没有下巴的面具，在土地与春官陪同下，挨家挨户送丝蚕贺春，祈祝人们四季兴旺，家境富强。可是，傩傩为什么没有下巴？为什么要挨家挨户送丝蚕，说来故事颇为传奇、生动。

以后，人们为纪念傩傩送丝茧的恩惠，便编制了《送丝蚕》的节目。每年开春，只见一个戴着没有下巴面具的傩傩，在土地、春官的陪同下，挨家挨户贺春送茧，祈祝人们四季平安、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人们也把傩傩的到来，视为吉星高照而备受尊重和欢迎。久而久之，此戏便成为贺春的传统节目在乡间流传。

我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傩神，也有数不清的戏神。稍稍辨认就可以发现，在傩神和戏神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民间普遍称唐明皇为戏神，但早在明代，湖北蕲州的傩队，就抬着唐明皇的神像四方游走，可见唐明皇也是傩神。同样，二郎神、老郎神、太子神，都兼有傩神和戏神的双重身份。

其次，戏神的偶像，往往为童子相。旧时戏班中的婴孩道具就是戏神的偶像，演员上台前要对着木偶道具作揖，祈求上台演出平安顺利。这个婴孩道具被称为唐明皇或老郎神。内蒙古、河北、天津和东北三省普遍流行“供彩娃子”习俗，“彩娃子”为一男一女两个木雕的小童，身着彩色衣裤。演员上台前要对“彩娃子”燃香叩拜。陕西、河南的戏神“庄王爷”也是木刻的童子，清康熙时甘肃某戏班直称戏神为“童子爷”。

傩神的偶像也往往是木雕的童子相。江西有不少傩班供奉傩神太子，把一个童子偶像摆在祭桌上，演出前后都要对着“太子”祭拜；傩班演员的衣服上，写着“傩神太子”几个字。南丰县石邮村的“傩神庙”中供奉的傩神就是少年童子相。安徽贵池傩戏的神像，是一个高二尺有余的农村小孩儿形象。福建邵武有“太子菩萨”信仰，其偶像为一木雕小孩。傩戏品种之一的福建龙岩师公戏，把一婴孩砌末称作“太子爹”，演出前后有迎送“太子爹”仪式。贵州傩仪也有“送太子”仪式，偶像是一个约一尺长的木雕男童偶像，其生殖器被刻意雕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古代的礼从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规律中提炼而来。礼就是法，违礼就是违法，它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关系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礼又可上升为一种宗教，古代的礼也可以是由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宗教活动。所以，中国宗教史常称其为“国家宗法制宗教”。但傩礼（图 15－12）本身的宗教因素却很淡。



图 15－12　傩礼

中国古代的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称为五礼。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也是五礼的历史。汉族统治者用这个系统，掌管中央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用这个系统，甚至民国时期也将当时的礼仪制度纳入五礼之中。

古代的傩礼，有两大任务：一为定期驱傩；二为死去的帝王将相送葬。在五礼中是军礼的一个项目，它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行动，诚如唐代贾公彦所说，傩礼“亦是武事”。

周代宫廷特设专职驱疫赶鬼的军官方相氏，是宫廷傩礼的主角，由掌管军政军赋的大臣夏官大司马领导。方相氏本人没有爵位，不在士大夫阶级之列，却是掌管驱鬼逐疫的下层专职军官。他头上顶着熊皮，再从肩部披下。熊皮的头部装着四只金黄的眼睛，穿着褐色的上衣和红色的裙子，左右手分别挥舞着盾和戈，率120名“罪隶”，狂呼狂叫地在宫中一个一个房间地搜索鬼疫，把它们驱赶出宫去。

《周礼·夏官》是这样写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索室驱疫。”这就是西周宫廷傩礼的基本式样，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粗犷。因此，方相氏也被称为“狂夫”，就是因为他们是个子高、力气大、本领强的军中能人。由此可见，周代傩礼的礼意是“军人战胜鬼疫”。

所谓“黄金四目”，清代孙诒让认为方相氏的面具，不是装在熊皮的头部，而是将黄金铸成的四只眼睛用索串连起来，然后两端挂在耳朵上，四只金眼布置在鼻子的两边。

周代的礼制相当繁复，大多追求庄严隆重，配有乐舞，但也保存着像傩礼这样粗糙的礼典。这种宫廷傩礼后世称为“周之旧制”，当做傩礼的样板。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朝廷规定必须举行的礼典。宫廷每年定期在春、秋、冬各举行一次。冬季是在除夕进行，由于天气最为寒冷，要求全国上下全都要各自参加不同等级的傩礼，称为“大傩”，奴隶也得参加。

第二，它是原始傩仪意念的遗存。主角方相氏还是半人半兽的打扮。长期继承着驱赶“无形之鬼”的格式（傩传到日本则很快改用有形之鬼，中国和韩国有些地方后来也用有形之鬼）。整个傩礼不信神，更不求神。傩礼驱疫总是驱之必胜，凭的就是方相氏的凶丑和力量。

第三，它保留了浓厚的原始群舞成分。整个仪式简单、粗犷，没有迎神送神等多余的程序。只是在傩礼前，有个“舍萌”仪式，是为天子求来年吉梦的，也是为傩礼开路。

上古的傩，简单而又粗犷，保持着浓厚的原始群舞特点。就是周时的方相氏与百隶驱疫，也只表达一种疾恶如仇的情绪，没有其他情节。进入秦汉时期，由于信仰和艺术活动的新发展，要求傩礼也要有所提高。从秦和西汉的傩礼开始，逐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程序。先是在方相氏和百隶的基础上加进了童男童女，东汉前期又将童男童女改成只有童男担任的“侲子”。到了汉末，更增添了“十二兽吃鬼歌”及其表演过程。

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记载的这种汉末傩制，其他所有后汉史书

全都没有提及。其中，十二兽（又称“十二兽神”或“十二神”）的多数出典无从查考，被十二兽“吃”的十一疫大多也找不到来源。

这很可能是这种傩制经历的时间极短，又逢兵荒马乱，使典故失传，终成千古之谜。不过，司马彪记载的这种傩仪的整体结构是清楚的。它有一个“先倡→后儛→再驱疫”的简单情节，整个仪式就是一出雏形傩戏。即：

①开始，由太监中的艺人中黄门带领 120 名侲子倡（似唱非唱，似说非说）“十二兽吃鬼歌”，接着是“方相与十二兽儛”（请注意：这是带单人旁的舞字，强调的是其表演成分）。

中国戏剧史专家任半塘《唐戏弄》一书说：“汉制大傩，以方相斗十二兽，以斗始，而以舞终。”

②斗，是镇服十二兽的过程，令其改恶从善；舞，是方相率领十二兽和 120 名侲子，在宫中一间一间房子地赶鬼出宫。120 名侲子们各自手摇拨浪鼓（鼗鼓），鼓声和人的呼号声，惊天动地，声势十分浩大，以达到吓跑鬼疫的目的。

“傩起源于原始狩猎活动”的假说，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这种假说认为，它有一个从驱兽到驱傩的发展过程。

狩猎，是人类延续了几百万年的生产项目，再驱赶中猎取动物是一种基本的技能。经历了旧石器时代长期的狩猎实践，人们不断观察和模仿动物行为，在狩猎之余也会手舞足蹈，以表达狩猎成功的喜悦和对动物的喜爱，并力求模仿得逼真。这便是原始驱赶式群舞，一种最接近自然状态的艺术。

稍晚，发明了面具狩猎法，人们靠着面具伪装，接近和袭击野兽变得比较容易，狩猎成功率大为提高。人们便以为面具本身具有某种力量，因而产生了崇敬甚至敬畏面具的心理，早期的狩猎面具是假面形和假头套。在原始假面驱赶式群舞与原始巫术结合之后，逐渐演变成原始假面式巫舞。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巫舞驱赶逐渐转向以农耕为主题的风俗，成为农业社会的驱赶式巫舞。

中国远古时期驱疫逐邪的巫术祭祀活动是傩文化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中国各民族先民共生同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惯常称之以巫傩。在这种傩事活动中面具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神祇人员所凭依的神灵之物，也可以说是神灵的凭依之物，是将神祇进行了拟人（或拟物、拟动物）的具体形象化。

傩文化面具（图 15 - 13），以其无可比拟的原生态，展现了它的神韵和功能，其中有：

①跳神面具：神职人员在跳神活动中佩戴面具，并借助其他法器，舞之蹈之，驱邪纳吉，祈求人寿年丰，用于禳灾祈福为目的的宗教活动。



图 15－13　傩面具

另外，跳神面具包括新疆、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信仰萨满教民族的萨满面具；广西、广东的少数民族的师公面具和贵州、湖南、四川、湖北、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傩堂、端公面具等。

②傩戏面具：傩戏面具包括广西壮、瑶、毛南等民族的师公戏面具；湖南、贵州等地的土家、苗、布依、侗、仡佬等民族的傩堂戏面具；湖南、四川等地土家族阳戏面具；以及贵州布依族、苗族的地戏面具。

而贵州威宁彝族的“撮泰吉”保留有许多原始傩文化的特征和信息，为准戏剧形态。其面具也具有本原文化的质朴风格。

傩戏面具按其角色造型，可分为鬼神面具、动物面具和世俗人物面具。面具材质以木材为主，兼用竹、布、纸、毛皮等。此类面具沉积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国面具文化中的珍品。

另外，流行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藏族地区的藏戏也用一些面具，以白面具和蓝面具为代表，显现了雪域高原文化的特色。

概言之，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傩文化面具积淀了宗教、民族、民俗、艺术等多种内涵，展现了东方审美的意趣和理想，也是中国面具文化的瑰宝。

这种原始傩仪有这样一些特点：最初是随意、杂乱无章的，没有整齐的步伐，模仿的是追捕动物时的速度和效率。没有程式，无需继承，每次的舞姿可以不同。但是，少不了“驱逐状”这个基本形态语言；要披兽皮（准假形）或戴兽皮假形面具，跟真狩猎时一样做动物打扮，并且力求模仿得逼真。

第四节　傩文化的本质与易学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献的民族，有关巫风傩俗的记载泛见于经、史、子、集。经、史主要记载了宫廷“大傩”的仪式程序；子、集大都记载了民间“乡傩”的形态。记载固然丰富，却“述而不作”，缺乏条分缕析的研究。

傩文化是一种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就像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样，而儒家文化”的来源，却又是“易学”，是源自《周易》卦爻辞当中的哲理，源自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与客观变化规律。那么，“傩文化”则是古代中国原始社会农耕阶段的观念形态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极力推崇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说法，“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社会”，中华文明的“文明要素”也体现在古老的傩文化之中。

傩的根本目的是驱逐疫鬼（阴气），因为疫鬼使人生病、致人死亡（疫、病、死、鬼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都统归于阴气之中）。上古傩与原始傩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有了宗教理论——阴阳学说；第二，等级更加森严，历史上称其为“血缘宗法等级制”（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前，这可能就是中国统一的国教）。

西周的一年之中，什么时候举行傩礼，什么时候不举行？什么时候驱傩要磔禳，在几个宫门磔禳，什么时候不磔禳？全都依阴阳说安排：

一、季春（阴历三月），阴（寒）气尚存，但阳气正在东方上升。所以只磔南、西、北三面的九个门，让东三门的阳暖之气充满各方，使万物感气而生；

二、夏季阳（暑）气过剩，驱之反会有害，所以不傩也不磔；

三、仲秋（阴历八月），因阳（暑）气尚未衰退，但阴气将至。采取中和的对策，只傩不磔；

四、季冬（阴历十二月），阴（寒）气极盛，必须全民皆傩，四旁十二门都要磔禳。

磔禳，是分裂牲体以祭神的意思。在这里，是说在方相氏率百隶已将鬼疫赶出宫门，傩礼结束之后，紧接着，磔裂牲体以祭宫门之神，要让宫门之神守好大

门，不让鬼疫重新窜入宫内。

阴阳五行学说是易学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基本没有什么迷信色彩，人们用其相生相克理论来解释傩礼，再将其与星象、祸福、鬼神等思想联系起来后，才使许多对易学文化不了解的人对此产生了迷信和神秘的印象。

上古礼制始终贯彻着血缘宗法等级制的原则。上古的社会结构就像一座金字塔，以周代为例：一族内分为贵族和自由民。贵族又分大宗和小宗，大宗系王族，住京城，最高统治者便是天子——上帝之子；小宗（又称宗子）派到外地为诸侯；下面又有大夫，大夫之下又有士，大夫和士又分上、中、下三等；自由民则从事劳动生产，服兵役。二族外是被统治者，主要是农奴和奴隶。

傩礼也必须遵照血缘宗族等级制原则，在西周一年三次傩礼中：

一、秋傩是专为保证天子健康安排的，诸侯以下都“不得傩”，等级最高；

二、春傩其次，是为天子、诸侯这些“有国者”安排的；

三、冬末大傩地位最低，傩从天子到奴隶都参加。

傩礼始终以天子为中心，连季冬大傩也要先以占梦（一种官员的职责或职能）向天子献吉梦为先导，然后才能举行傩礼。同时，由于季冬大傩有天子参加，加上规模特别大，所以，它毕竟是腊月里重大的岁时活动。

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在民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道教巫术与方术的渊源以及道教对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使贵州道教沾染了浓烈的巫风傩俗（巫在古时有神职人员、学者和医生之意，在此并不为贬义）。为了生存与发展，道教向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民间道士，其职业活动除从事丧葬仪式、打醮外，“驱傩还愿”、“庆坛”是其重要内容，傩道一家，难分难解。

道教文化与傩文化各有自己的本体内核，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它们还不能够完全等同，但道坛与傩坛之间的相互渗透、密切关联和难分难舍却是显而易见的。

道与傩在发生学方面的渊源具有同一性——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易学文化中的八卦是能够归纳代表万物的，而万物有灵的观念又是人类早期的宗教文化心理，由此便促发产生了鬼神的信仰以及充满巫术意味的原始宗教文化行为。而人们对于吉凶与生死的迷惑和趋吉避凶的欲望，又从一个侧面沟通了人与鬼神之间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就能看出道教与傩坛都有类似的共同认识，是相互渗透的基础。

傩戏脱胎于古老的傩祭活动，其初始形式是傩祭仪式中请神驱鬼逐疫内容的戏剧化。傩戏是由傩祭、傩歌舞发展而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融入了巫、道、儒、释的文化内容和历史、生活事件，以及戏曲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傩戏有了今天丰富的内涵与形式。傩戏是一种戴着面具表现以多维宗教意识为内核的仪式戏剧，是一种艺术化的宗教仪式。

傩戏孕育于宗教文化的土壤之中，明显地受到巫、道、儒、释宗教思想的影响，就南方而言，特别是云、贵、川、渝等地受道教影响最深，主要表现在傩坛掌坛师的道士化，傩坛神系的道教化和傩坛科仪的斋醮化等方面。

傩坛掌坛师的道士化。傩坛掌坛师，他们大多自认为属于道门。他们说："我们就是老君教——即道教。我们老君教讲究一个法字，就是搞法术，这些法术也是老君所传的。"傩坛通神手段五花八门，而这些通神本领，诸如歌舞通鬼神、占卜符咒通鬼神、动物（牺牲）通鬼神等，与道教正一教派相同或相近。掌坛师的服饰和使用的法器也与道士相同、相近或变异，呈明显的道士化走向。正一道派最重视法印的灵力，傩坛也如此。

傩坛神系的道教化。傩坛神系是巫觋诸神、民间俗神、世俗祖先神、道教系统和诸神的杂糅，以后又有佛儒神的参加进来，但道教神灵一直是傩坛的主导神灵。

傩坛科仪的斋醮化。道教斋醮经历了由杂乱到规范、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傩坛应该早于道坛。道教是最具有浓厚巫觋色彩的宗教，保存在傩坛中的巫舞、占卜、禁忌、符咒、巫风傩俗均为道教所承袭。傩坛由于缺乏宗教组织和理论规范，其科仪已趋道教化。但与道坛不同的是，它规范不严，要求不高，有很大的随意性。傩坛科仪斋醮化、道教化的走向日趋明显。

所以，傩文化也是崇尚自然的民俗文化与宗教的合一，概括起来，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自然崇拜，与萨满教非常相似。自古以来，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奇门遁甲、占卜、风水、气功等经验方术一直都是在神秘传承的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崇拜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与宗教信仰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这也是傩文化的完整体系。

第五节　萨满文化和傩文化中的共同易学特征

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玉琮、既像冠状物又像玉鸟的玉器、三叉形玉器

（组图 15－14）的形制上，可以看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既有着傩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又有着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



组图 15－14　良渚文化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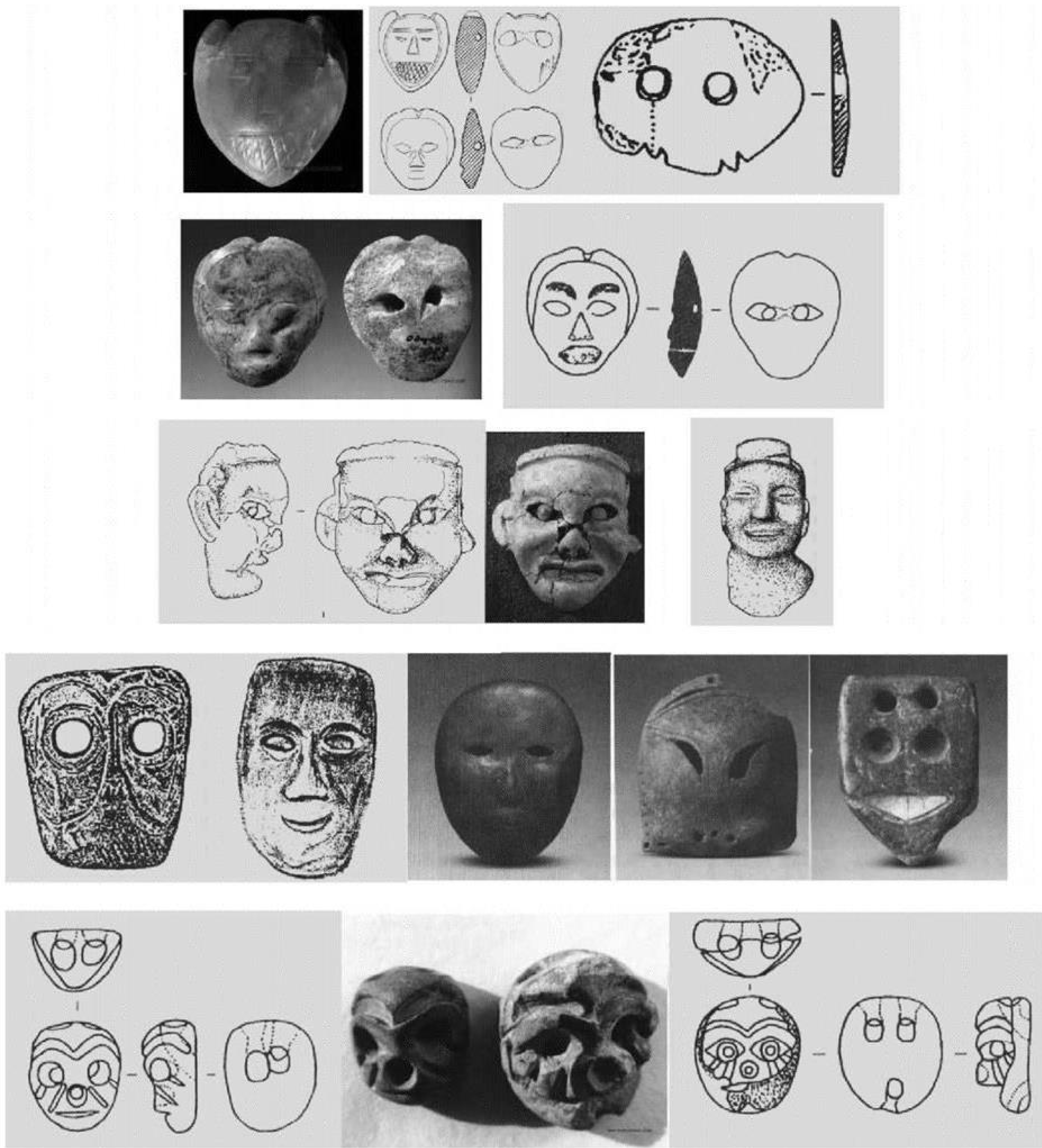
我们从红山文化的玉器、骨器和石器（组图 15－15）[①] 的形制上，可以看出它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既有着傩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又有着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

我们把 1981 年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组图 6－19）与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玉龙和大量面具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它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既有着傩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又有着古老的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只不过这样的绿松石铜牌饰非常有可能就是原始萨满文化或傩文化面具的微缩品，它既能够起到萨满教巫师在进行萨满活动时所使用的法器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挂在腰间进行装饰的作用。

我们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面部的展开图上（图 15－17）可以看出，它与萨满教面具（组图 15－18）和傩文化面具（组图 15－16）都共同具有獠牙的一个特征。在这个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面部的展开图上，我们既看到了傩文化中假面

---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38、324、326、327、323、100 页。



组图 15－15　红山文化面具与头像

具的影子，也看到了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的岩画上（组图 15－19），可以看出它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既有着傩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又有着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

我们从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的岩画上（组图 15－20），还可以看出它们与萨满鼓面图案都非常相似，它们中既有着傩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又有着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表达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古人崇尚太阳、文明的愿望。



组图 15－16　傩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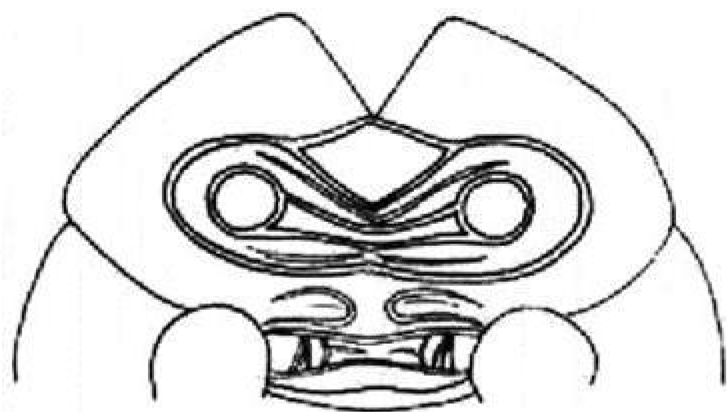


图 15－17　红山文化玉雕龙头部展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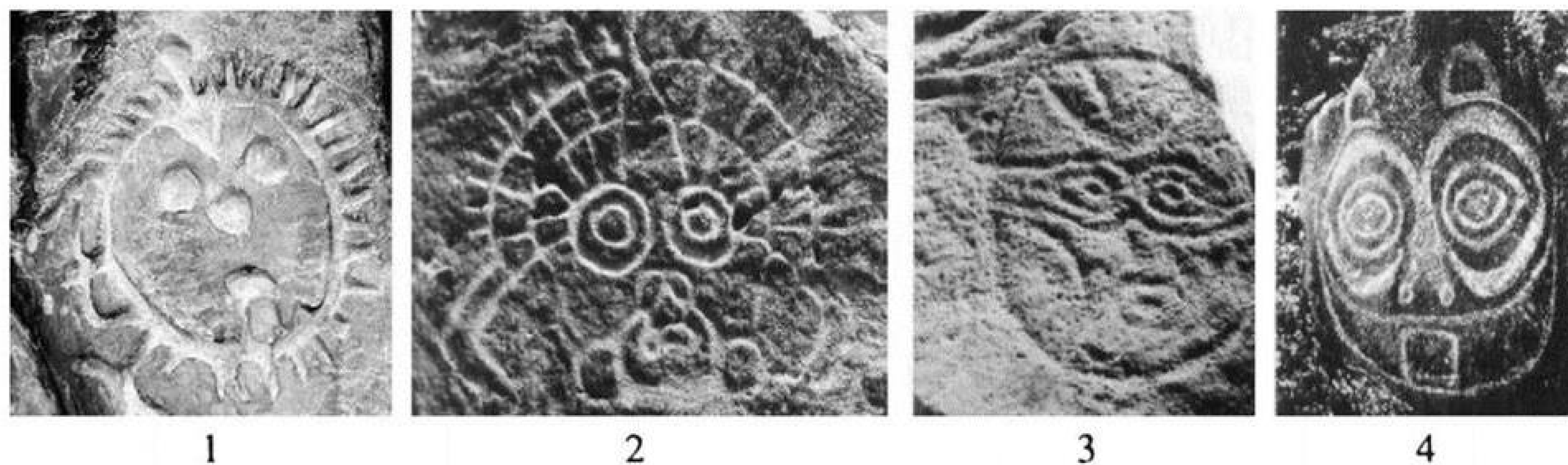
现代考古证明，新疆的草原游牧地区在春秋战国之前，是信仰萨满教的，因为新疆的草原游牧地区与大兴安岭一带都处在整个欧亚的草原之路上，从这就可以看出萨满教是很容易得到传播的，我们从新疆阿尔泰和赛里木湖草原新石器时代的石画、石人、石头像上（组图 15－21），还可以看出它们与萨满鼓面图案都非常相似，它们中既有着傩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又有着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

在安徽民间，傩文化也非常兴旺，我们从红山文化和安徽凌家滩文明偶像崇拜的玉器上，可以看出中国南北方的傩文化与萨满教文化都共同具有偶像崇拜的特征（组图 4－17、组图 4－26）。

在四川民间，也有兴旺的傩文化。我们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面具上（组图 15－22）可以看出，它与萨满教面具和傩文化面具也都有着共同的特征，而且从三星堆还出土了许多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太极八卦里的罗［离］



组图 15－18　萨满面具



1　　2　　3　　4

组图 15－19

1、2. 贺兰山口岩画中的人面像代表作—“太阳神”

3. 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黑龙江下游舍卡奇—阿连村的人面像　4. 美国印第安人崖壁人面像

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龙凤和太阳鸟、铜眼睛和铜太阳形器［或五行自然循环轮回形器］等铜器。

在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金面具”（图 15－23），该物品在出土时已揉成了饼状，不能辨识器型，经初步延展处理后得以确认，在考古学家精心修复后，呈现出华美的真容。方形，齐额，长刀眉凸起，大立眼，长方形耳，三角形鼻高挺，出土时重 46 克，宽 19.5 厘米，高 11 厘米，厚 0.4 毫米，其造型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再次证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紧密的承袭关系。



新石器时代
贺兰山太阳神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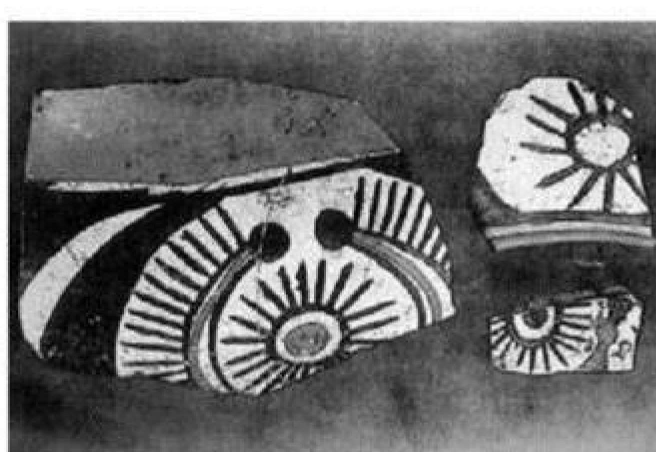
萨满鼓面图案



广西花山
太阳神巫祝图



江苏连云港太阳神岩画



仰韶文化太阳纹陶片



仰韶文化太阳山水纹彩陶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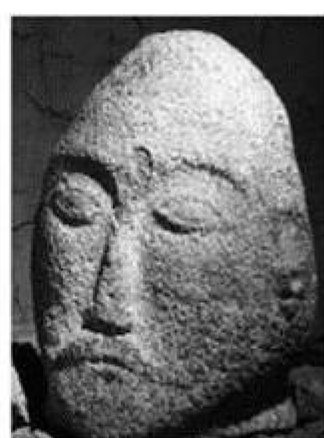
组图 15 -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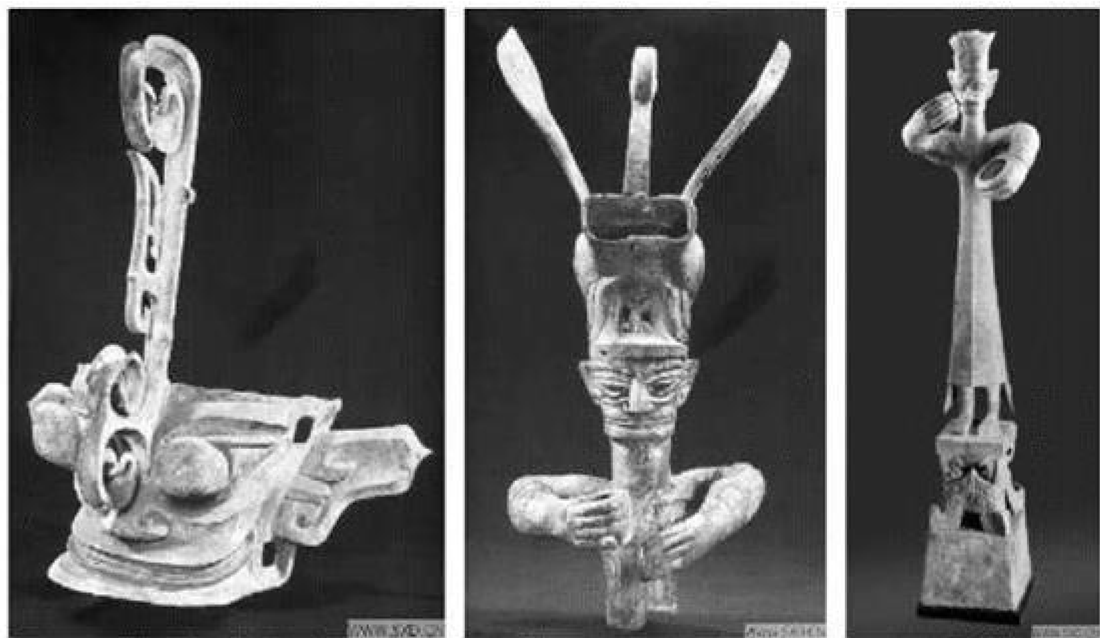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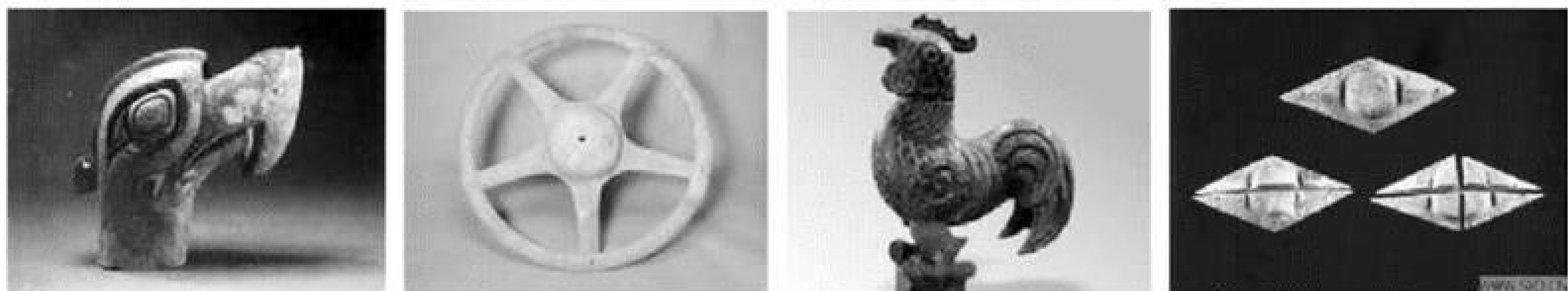
组图 15 - 21　新疆阿尔泰地区和伊犁地区的石画、石人、石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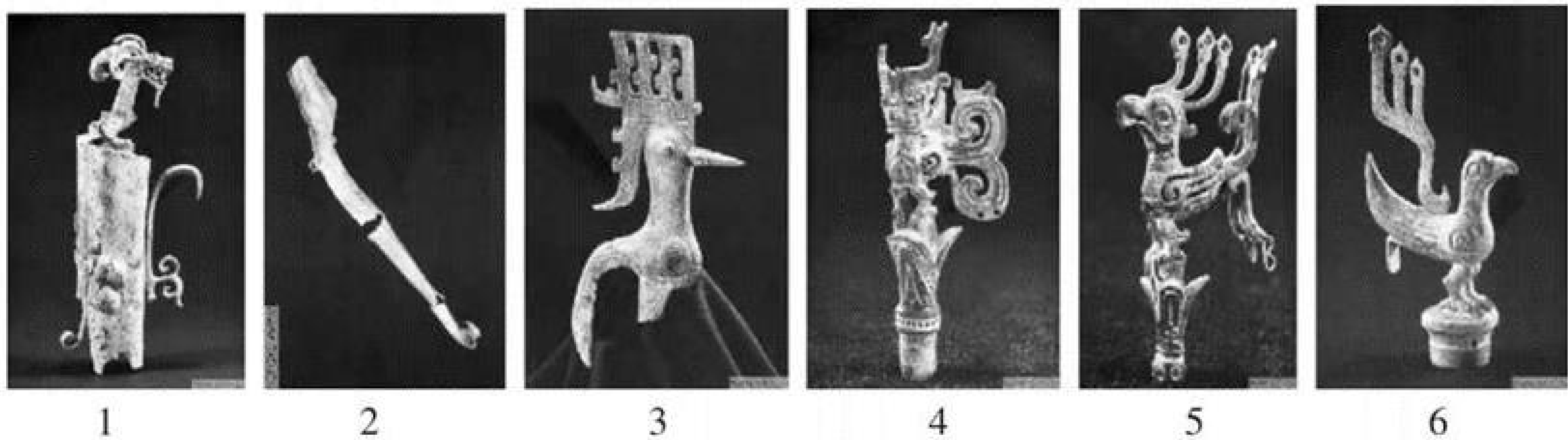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青铜面具与人像



铜鸟头　　铜太阳形器　　铜鸡　　三星堆青铜眼睛



1　　2　　3　　4　　5　　6

组图 15－22

1、2. 三星堆青铜龙、蛇　3～6. 三星堆青铜凤鸟

专家认为，该面具应是古蜀时期的神祇面具，距今约有三千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笔者认为，即使在今天的四川还有许多地区信奉着傩文化的民俗或宗教，所以这样的面具也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人们信奉傩文化的微缩面具。

从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西周时代的“金人面像”（图 15 - 24），高 3.74、宽 4.92、厚 0.01 ~ 0.04 厘米，重 5 克。



图 15 - 23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图 15 - 24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人面像”

从金沙遗址还出土了石跪人像（图 15 - 25，西周，高 3.74、宽 4.92、厚 0.01 ~ 0.04 厘米，重 5 克），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但笔者却认为它与古代的宗教、祭祀是有着紧密地联系，是正在祭祀的人偶像或祭祀时的祭品。

另外，从金沙遗址种类繁多的玉器，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通高 22.26 厘米，重 1358 克，颜色为翡翠绿的龙山时代的玉石节长琮（图 15 - 26），该玉琮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这样，玉琮的发现就能够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文化与蜀地古文化的联系和影响。



图 15 - 25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跪坐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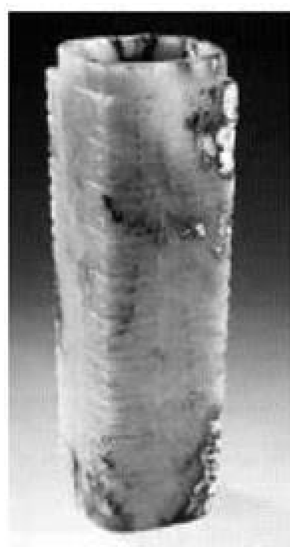


图 15 - 26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石节长琮

如果我们把中国各地出土的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的文物联系起来，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特有的形象思维的方式，结合至今还遗留在中国北方的萨满教文化和南方的傩文化来综合判断，就可得出它们都曾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有着紧密联系的结论。

小结

我国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在北方居住过的古代民族（大多在历史上已逐渐消失），如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突厥、高车、回鹘、黠戛斯等，都是古代原始形态萨满教的信仰者。这些古代北方民族实际上是现代北方民族的祖先，其中不少民族先后都曾大举南下，逐鹿中原，甚至征服华夏民族建立过地方政权和统一帝国。这些建立过国家政权的北方民族一方面接受华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同时仍继续保持其世代相传的萨满教信仰，甚至奉为国家正统信仰的组成部分。①

北方民族萨满教的这种历史发展情况，在我国个历史典籍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它说明了萨满教的跨时代性。这种情况在世界萨满教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可能是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最有特色之点。还有就是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的典型性。很多萨满教学者都把东北亚和中亚说成是萨满教的核心地区，把这些地区的萨满教视为萨满教的典型形态。纵观中国北方民族，无论是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还是蒙古语族，其原始祖先都与东北亚和中亚的原始民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承续关系，他们信仰的萨满教在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仪式和体制）上是相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信仰在世界萨满教信仰中的价值和地位。②

关于萨满教出现的时代和经济条件，学界一般都同意萨满教兴起于阶级社会产生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它曾流行于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民族之中；它曾以多少变化了的形势继续流传于以达到家畜饲养和园艺阶段的民族之中。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倾向于把萨满教放到各民族历史的发端时期，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总之，萨满教对于研究北方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有着十分

---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59 页。

②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59 页。

重要的参考价值。①

张光直先生最早将萨满教研究引入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中，他指出：“萨满式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他在另一篇论文中列举了有关仰韶文化巫觋的考古资料后指出，仰韶文化社会中巫觋人物的特质与作业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与近现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巫觋宗教或萨满教是相符合的。仰韶时代萨满教的证据是全世界萨满教历史上有强烈表现的最早期的形式之一。对世界原始宗教史的研究有无比的重要性。他还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祥纹乃是巫觋通天工具，萨满的主要工具便是通神，而在他们通神的过程中各种动物常常作为他们的助手或是使者。张光直的观点无疑对研究北方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别是世人瞩目的红山文化玉器，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②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早期人类，本来就有相对不同的生活状况。私有财产的出现，促成了社会的分化。在我国，既有定居的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半定居农业，还有草原游牧业、高原农牧业等，这些不同的地区环境也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同时并存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最迟到青铜时代，便逐渐分化形成了中原的史官文化、南方的巫官文化、北方的萨满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

在考古学表面上来看，好像它们之间有着质的区别，有着不同形态。从表面看，假面驱赶巫舞与原始傩仪和萨满的意识转换、疗愈能力有所不同，其实它们都是同宗同源的，它们都来自易学。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研究三代文明时多次将“巫”称为“萨满”，他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采用了亚瑟·瓦立的定义：“在古代中国，祭祀鬼神时充当中介的人称为巫，据古文献的描述，他们专门驱邪、预言、卜卦、造雨、占梦。有的巫师能歌善舞。有时，巫就被释为以舞降神之人。他们也以巫术行医，在作法之后，他们会像西伯利亚的萨满那样，把一种医术遣到阴间，以寻求慰藉死神的办法。可见，中国的巫与西伯利亚和通古斯地区的萨满有着极为相似的功能，因此，把‘巫’译为萨满是……合适的。”张先生以此阐明商代的“巫觋与政治”。一部分民族学、人类学者通过民族调查也同样认为，“在中国巫亦不仅限于汉民族，蒙古的黑教，回民的毛拉，苗人的鬼师，瑶人、畲民的巫师，都是萨满的遗迹。在佛教、回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巫为中国的唯一宗教，道教不过是由巫转变而来”。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张光直先生用萨满研究三代文明问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60 页。

②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60 页。

题的思路有失精当，但其对萨满与巫的论述应用于史前考古学研究还是有其合理性的。①

另一部分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如童恩正、宋兆麟、曲六乙、蔡家骐等，认为在中国自史前时期至近代社会，巫文化与萨满文化是分属于中国南北两大地区的两种原始宗教文化系列，宋兆麟在《巫觋——人与鬼神之间》谈道："在我国的巫教中，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北方的巫，即萨满，这种巫是以神灵附体为特点，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尚处于原始信仰阶段，没有发展到祭司阶段……一种是南方的巫，他不仅有类似萨满式的原始巫，但是同时也出现了祭司，并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巫。"但宋文并未对巫与萨满文化的特点作详尽的阐释。曲六乙先生认为，巫傩文化与萨满文化是分属于中国南北两大地区的两种原始宗教文化系列，并有上万年的历史积淀，并就各自的个性和特点以图表的形式加以解释：②

	社会经济形态	起源	主体	哲学	神话	神系	仪式	艺术形态	反映方式
巫傩文化	农耕社会	多元	混杂的：巫觋、方相氏、天子、官吏、艺人、农民等	阴、阳二气的调和	太阴神话与太阳神化的社会世俗化	从图腾神到道教、佛教、民间人物神、传说人物神、祖先神、行业神等	从装扮神灵到扮演神灵	歌舞戏剧	再现
萨满文化	渔猎社会	X	纯净的：萨满	内外之气的结合	母系制氏族社会的女神神话特征	动物神、祖先神	从装扮神灵到神灵附体	歌舞	表现

全新世以来，由于受气候环境的影响，各个文化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模式，必然会出现有地域特色的不同的原始宗教信仰来辅助其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但在巫教、萨满教初始阶段，万物有灵论和多神崇拜应是其信仰的共同基础，人神之间都要依靠巫师、萨满一类的中介者来达到天地沟通人神，使得巫傩文化与萨满教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相似性，这恰恰是学术界出现上述分歧的关键所在。从历史时期各个文化区域宗教传统的发展来看，进入阶级社会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84 页。

②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85 页。

以后，巫教随着最高政治集团核心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减少，其职能亦在逐渐减弱，中古时期已逐渐流入民间。而萨满教随着畜牧业的兴起、发展以及向农业生产方向的不同程度的转变，加之大北方系统诸民族间的文化冲击与碰撞，依然在中国北方巫王合一、巫王合作的政治体系下扮演重要的角色。[①]

通过牛河梁和凌家滩出土的文物来看，笔者认为，只要稍微懂一些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太极八卦系统知识观念和理论的人都能看出，这两个地区的古人不但懂得易学文化，而且他们还应用得非常好。其中，红山文化与凌家滩和良渚文化的萨满、巫王就分属在北方和南方，而且南北方的文化在距今5000年之前就曾经很好地碰撞、交融、汇集过了。

就目前来说，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主要都聚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甚至是中国北方以外的周围地区和丝绸之路的通道周围，而傩文化比较兴盛的民族也主要聚集在中国境内。综合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萨满教文化和傩文化都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①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2004 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 385 页。

| 第十六章 |

"丝绸之路"

伊朗位于东西交通的枢纽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和许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舞台。商队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发，经伊朗向东可以进入中国，向南可以进入印度。这条商路就是古今闻名的"丝绸之路"。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条古"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发端于两汉时期。

那么在此之前，这条商路是否也被东西方的商人们使用过呢？

一

1926 年，我国考古界前辈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获得了半个茧壳（图 1－15），年代距今约 6000～5500 年。1981 年至 l987 年由郑州文物考古所在青台遗址发掘出土的，用典型桑蚕丝平纹织制的"罗"（图 1－16），年代约距今 5600 年。

如果加上中国考古发掘出的距今 9000～8000 年贾湖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纺轮和陶器上的网纹印痕、不足 1 毫米的细绳纹，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的纺织手工业（参上篇第一章"小结"）。特别是再加上距今 7000～6500 年的河姆渡文化纺轮和织机部件与织机部件上雕刻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的象牙盖帽形器，以及考古发掘出的距今 5500～4500 年的良渚文化的一套完整的原始腰机部件玉饰品（参上篇第一章第二节）。

这样，我们就完全有证据说在距今约 6000～5500 年（或之前）的时

候，中国民间就已经具有了丝绸织造业。那么中国的丝绸商品，或者说古代中原传统的纺织技法是否在那个时候的民间就已经通过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走向了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走向了地中海各国、甚至更远呢？

二

位于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乡的洋海墓地自2003年发掘以来①，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关注。这批同时期发掘的墓葬经北京大学^{14}C年代测定，经相关单位和专家鉴定，墓葬距今有2000~4000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从出土的弓箭和装水的皮囊、钻木取火工具以及周围殉马现象来看，这批墓葬为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被推测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墓葬。

如此之大的墓葬群就像是古代洋海人留下来的地下博物馆，大量的干尸、穿孔的头骨及不同历史时期的骨器、石器、青铜器、铁器、彩绘陶器、木器、编织物等大量文物都出现于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很奇特，把洋海人吃的、穿的、用的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正是凭借这些，专家们才走进了已经消失了的洋海人的社会生活（图16－1）。

2006年12月20日，专家通过对其中一座古墓发现的一具距今约3000年左右的萨满教巫师干尸身上的衣物揭取后，发现这具男性干尸的服饰奇异，保存完好，高鼻深目，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他的长相不像是蒙古人种，而更像高加索白种人（图16－2）。



图16－1　经专家复原后的洋海人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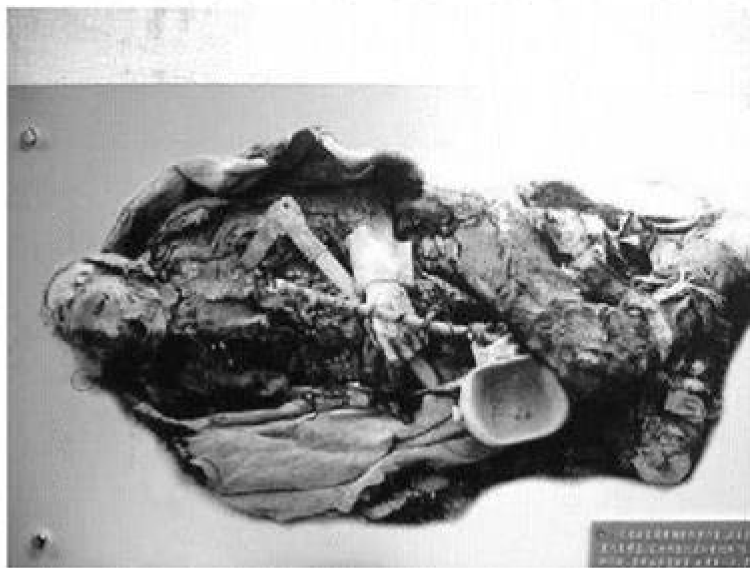


图16－2　揭开萨满巫师干尸衣物可见怀抱手杖

① 此考古材料来自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洋海古墓1~7集），视频网址 http://video.baidu.com/v?ct=301989888&rn=20&pn=0&db=0&s=8&word=%D1%F3%BA%A3%B9%C5%C4%B9&fr=ala0。

有关专家推测，他们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从西方、北方游牧过来在吐鲁番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历史学博士李肖说：“这种装束在新疆已知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非常珍贵，我们初步判定他是2800年前的萨满教巫师，从体貌上看应当是高加索白种人。”

此干尸头戴羊皮帽，额头系彩色毛绦带，绦带上缀有两三个一组的海贝；双耳戴硕大铜、金耳环；脖子上戴绿松石项链；外穿翻领深色毛皮大衣；脚穿皮靴；左手腕戴红色皮套袖，上缀一排铜扣；双手像埃及法老一样交叉于胸前，右手握缠了铜片的木杖，左手握木柄青铜战斧，带有明显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信仰神偶色彩，同时还出土了被认为是萨满巫师用做制幻药物的大麻植物籽，从而证实死者生前是在氏族中享有很高地位的萨满教巫师。

这就印证了新疆及中亚地区在史前时期不仅盛行萨满教，而且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区，这些发现在全国乃至世界考古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负责提取织物的新疆博物馆研究员贾应逸感叹说：“毛皮大衣里面是一件缂毛织物，棕色的基调配红色的图案，非常精美。”

贾应逸研究员通过研究还发现，这些毛纺织品捻线的捻向既有正手的、也有反手的（S捻向），而S捻向的方式却是中原地区的传统，中原人把它叫反手捻向，而这种反手的S捻向既是宇宙中天体（星系）太极模式的旋转运动方向，也恰恰是标准太极图案的旋转运动方向，这说明中国智慧的古人早就把这种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太极思维模式应用在了纺织技术当中，大大超出了专家和我们的想象。据史书记载，中原纺织品传入新疆是从汉代以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历史上称为“丝绸之路”的发端才开始的，但是从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毛纺织品却说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的600多年之前，鄯善洋海人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中原的这种纺织技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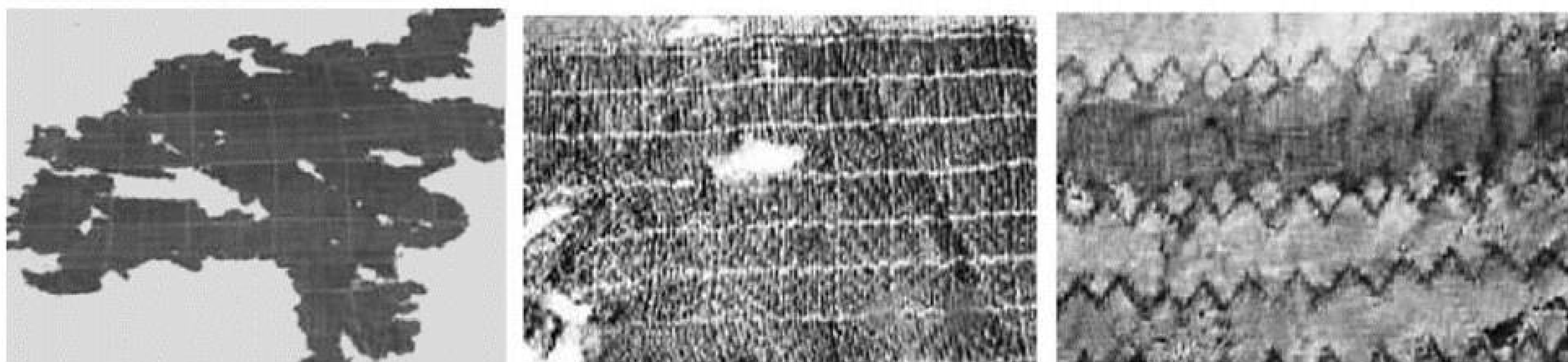
通过洋海古墓出土的毛纺织品可以看出，其中既有东边中原的东西，也有西边西方的东西。贾应逸研究员表示，在一座墓葬出土的毛纺织品的裤腰上就有一个青蛙图案，这就跟我们在中原马场文化里的图案是很像的，所以不论从纺织技法，还是从纺织图案来说，它都有中原文化的成分。

贾应逸研究员表示，洋海人的纺织技法还是比较高的，从洋海墓地出土的这些毛纺织品来看，说明洋海人当时既可以熟练地掌握斜纹纺织，也可以熟练地掌握平纹纺织，而且还出土了栽绒的地毯，这在新疆来说是发现最早的。

鄯善洋海古墓出土的这些毛纺织品，品种多样，花样翻新。专家们通过对这些毛纺织品的技术和花色品种的研究发现，这些毛纺织品不仅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还与远在欧洲的英伦三岛有着密切的联系。

贾应逸研究员表示，在洋海古墓出土的毛纺织品图案中，不仅有条纹的，还有格纹的，其中有两件毛纺织品披风，由红、黄、蓝三种颜色组成了大小方格图案，有人说它与18世纪、19世纪的英格兰呢一样，就像20世纪英格兰人穿的裙子布料一样，特别好。

像组图16－3这种方格呢，中国称之为英格兰呢，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还是中国女孩子们喜爱的流行花色，而在西方，至今也还在受到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的青睐。但是这些毛纺织品均出自鄯善洋海墓地，距今也已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了。



组图16－3　从洋海古墓出土的精美方格图案毛纺织品

洋海出土的毛纺织品不仅品种很丰富、很多，而且质量很高，它的丰富、绚丽，不仅彰显了古代洋海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且这些花样翻新的棉纺织品也揭示了古代吐鲁番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也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万花筒。这就说明早在3000年前，欧亚大陆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频繁地交往了，随之也将物资、技术与文化传播到了吐鲁番地区。

众所周知，商队的来往（或随商队旅行的智者们），在将双方所需要的商品物资进行运输往来的同时，也会给双方带来所需要的技术和文化。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文化会伴随着经济利益（或人们所需要的利益）的交往而传播，这就说明早在3000年前，甚至更早，欧亚大陆就已经有了类似于“丝绸之路”的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汇之路。

三

据《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新疆曾经生活过一个赛人族群，西方文献中称他们为斯基泰人，他们主要生活在伊犁河流域、天山西部、塔克拉玛干西南边缘和帕米尔高原一带。但是不管是汉文献，还是西方史书，都没有斯基泰人在吐鲁番盆地生活的记载，而鄯善洋海古墓的发现，证明了在距今3000年以前，他们就曾经到达了吐鲁番地区。

（1）德国考古研究院（DAI）欧亚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睦（Mayke Wagner）

博士，20 多年来一直从事东亚考古学研究，近几年来她把研究的领域，锁定在新疆的考古研究上，特别是对鄯善洋海古墓与中亚考古的比较性研究，为探讨斯基泰的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佐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王睦博士自从见到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这批文物，就被它们的丰富、绚丽和完整深深地吸引。几年来，她跑遍了中亚的各个国家，广泛收集近百年来各国重要的考古资料，然后把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这些文物与欧亚草原上一些国家重要的考古发现进行横向比较，她发现这一文化波及面之广，影响之久远，完全超出了史学家们的想象。

王睦博士经过比较性研究发现，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的文物不仅与新疆其他地区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与遥远的南西伯利亚阿尔赞斯基泰王陵出土的文物，更是如出一辙。阿尔赞斯基泰王陵，位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北镜，这里有大片的草原，分布着许多庞大的斯基泰王陵（组图 16－4），当地人称“国王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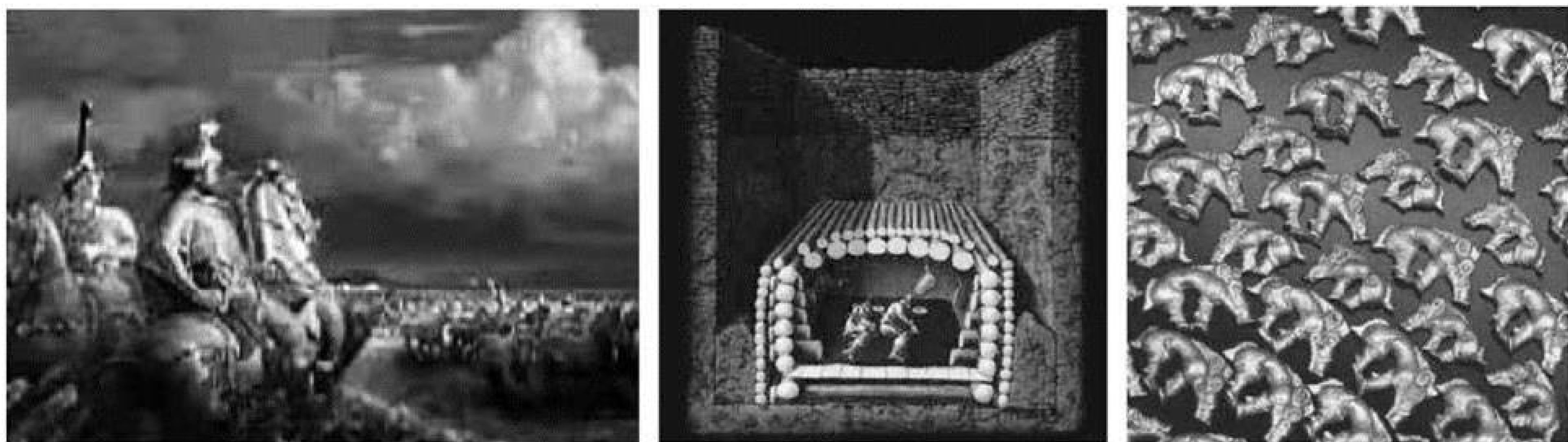


组图 16－4　南西伯利亚阿尔赞斯基泰王陵

公元 2000 年，俄罗斯联邦考古部门语法过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国王谷”的斯基泰王陵进行了挖掘，不曾想，这次挖掘震惊了世界。阿尔赞 2 号王陵直径约 80 米，坟丘高 2 米多，是竖穴土坑墓，墓穴内用圆木构筑棺椁。当考古队打开墓室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墓室内散落着一层用黄金制作的动物纹饰，几乎将墓中的男女尸骸覆盖，金光耀眼、令人眩目，男主人的身上全是金马、金鹿、金雪豹等动物纹饰，专家们判断这是此人生前披风上镶嵌的装饰，脖子上还戴着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的黄金项圈，项圈上同样镶嵌着各种动物纹饰。而女主人更是穿戴着珠光宝气，从头到脚都是黄金饰品和珍珠玛瑙佩饰，夫妇二人随葬的黄金饰品多达 20 公斤（组图 16－5）。

这是近 300 年以来欧亚草原考古的重大发现，这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它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金银财宝，而是他们真正发现了斯基泰人的王陵，它们的考古价值比金子还要珍贵。

王睦博士经过比较研究发现，阿尔赞 2 号墓室里出土的金制装饰品野猪、骆



组图 16－5　斯基泰王和王陵的竖穴土坑圆木棺椁以及墓室内用黄金制作的动物纹饰

驼、雪豹、狼、马和鹿与洋海古墓出土的几十个小木桶上雕刻的动物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其中细微的差别在于洋海人在小木桶上刻画的鹿角像火焰，盘羊的角像锯齿，蹄子是尖锥状的，这种表现的手法带有强烈的写意色彩（组图 16－7）。而阿尔赞王墓出土的动物纹饰更接近写实手法（组图 16－6），这种差别是因为他们生存的环境和历史的原因而导致的结果。



组图 16－6　写实手法的鹿和阿尔赞王墓出土的鹿纹饰



组图 16－7　洋海古墓出土的小木桶上的鹿和盘羊纹饰

王睦博士分析，吐鲁番盆地的自然条件，根本就不适合鹿的生存，今天没有鹿，古代也不可能有。但是鄯善洋海人却对鹿的纹饰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呢？王睦博士推测，虽然鄯善洋海人很有可能没有见过真正的鹿，但是鹿的纹饰作为一种文化却从他们的先祖那里世世代代传承了下来，这很有可能证明了这个族群的来源。

他们来自遥远的南西伯利亚阿尔赞，再来到新疆的阿尔泰清河县石碓墓前的鹿石，鹿纹饰一路南下到吐鲁番盆地鄯善县的洋海，这一文化的传播路线清晰地证明了这个族群的迁徙史，而鹿纹饰就是他们的图腾，成为这个族群不可磨灭的记忆，寄托着古代洋海人对远去故乡执着的怀念。

茹家庄遗址位于陕西宝鸡市，1975 年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西周时期的墓葬，墓葬里出土了一个马车上的青铜配件，这个青铜配件上铸造了一个人的背部造型，在这个人的背部造型左右肩膀上还有两个回头张望的小鹿，在人的腰部是一条菱形网格带（图 16 - 8），这些纹饰与洋海墓地出土的器物上的纹饰很相似。因此，王睦博士推断，早在公元前 1000 年前后，关中地区的人也很可能就已经到达了吐鲁番盆地。



图 16 - 8　宝鸡市茹家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配件

实际上，斯基泰文化的扩张并没有到陕西茹家庄为止，它们向东方前进的脚步一直延伸到内蒙古赤峰市的小黑石沟遗址，小黑石沟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不仅与南俄罗斯草原出土的斯基泰文化一样，也与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南北出土的青铜器完全一致。

这种文化近年来又在河北省的张家口、青海的都兰、新疆的扎洪鲁克、山普拉、流水等天山南北都有发现，这种文化向西甚至扩张到了欧洲。

王睦博士研究发现，这些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本地文化因素加以改造和演变，基本上形成了三个大的斯基泰文化圈，靠近东方的小黑石沟、张家口、茹家庄和都兰的汉族和羌族地区，吸收了斯基泰文化因素之后，使其更接近于汉文化；而靠近希腊、罗马的斯基泰文化则包含了许多希腊、罗马文化的因素；此外就是阿尔泰山、天山南北比较纯粹的斯基泰文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阿尔赞、巴泽雷克、阿尔泰和鄯善的洋海。

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早在公元前八九世纪，斯基泰文化就已经横跨欧亚大

陆，它们东起内蒙古赤峰市的小黑石沟，西至德国的东部边境，北部兴盛于南俄草原，南部到过吐鲁番盆地及帕米尔高原，他们是最早崛起于欧亚草原的族群之一，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兴起的“草原丝绸之路”，就是由他们开拓的。1983年，新疆伊犁地区新源县出土了一件铜铸造的斯基泰武士像，铜像高 40 厘米，呈半跪状，武士头戴高大的宽沿尖顶帽，高鼻窄面、目视前方、神态肃穆，是典型的欧罗巴男子形象（图 16－10），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武士头上向前弯曲的尖顶高帽和手里曾经握着的长矛这一形象，与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墓出土的武士形象如出一辙（组图 16－9）。专家们分析认为，他们与鄯善洋海人出于同一个族源，正是他们的后裔建立了车师国。





组图 16－9　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武士形象



图 16－10　新源县出土的斯基泰武士像

据史书记载，从战国开始，吐鲁番盆地兴起一个绿洲古国——车师国，车师国的故都就是现在吐鲁番西北的交河故城，故城就建在两条河流交叉冲刷形成的一个柳叶形小岛上，所以称之为交河城。当时的车师国虽然人口不多，都城人口6050 人，举国也不过 12000 人，但是它地跨天山南北，扼守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是东西方贸易、文化、使节、交流与交往的必经之地。

到了汉代，大汉王朝和匈奴帝国为了争夺西域的控制权，从公元前 99 年到公元前 60 年，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连续发生过五次大的战役，历史上称之为“五争车师”。最终，车师国在汉朝和匈奴的争夺中被瓦解，吐鲁番地区的地方政权最终归入汉朝管辖，车师人、匈奴人、汉族人开始在这块火热的土地上和平共处、重建家园，这是吐鲁番地区第一次进入民族大融合时期。

到了公元 450 年，车师国被草原崛起的柔然民族所灭，车师国作为一个邦国被灭之后，车师国的人民有一部分西迁了，但相当一部分人仍然留在了这块土地上，后来也就逐渐融入了汉族当中，直到今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中间。

从这就可以看出，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洋海县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

道，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兼容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大熔炉，也是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休戚之所。这也就说明了早在3000年前，甚至更早，欧亚大陆就已经有了类似于“丝绸之路”的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汇之路。

（2）1977年在新疆阿拉沟古墓群的30号古墓曾出土过许多的金银饰物，首先发现的一件长26.5厘米、宽3.5厘米的带状金箔，上面刻有一对虎口微张、前腿平伸、后腿翘起、尾巴卷曲的造型生动的老虎，随后在墓底又出土了8件圆形带有虎头兽纹的金牌饰物和7件银牌饰物，还有一件最大的金牌饰物上刻着一头狮子，尾部有些挤压损伤，但主体纹饰还是非常清晰完美，反映出当时精湛的制作水平（组图16－11）。总之，30号古墓这些精美的金银器文物与草原和游牧文化的联系在新疆都是第一次发现。



组图16－11　阿拉沟出土的部分金牌饰物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工作的王博是一位研究草原问题的专家，他在研究分析30号黄金大墓金器的来源上，语出惊人地表示，金狮子这个东西并不是阿拉沟本地居民制作的，而是从古罗马过来的物品。因为新疆虽然有土生的虎，但却并没有土生的狮子，狮子是非洲的一种动物，它是被人们传到西亚以后才被东方人接受的。另外，众所周知新疆的阿尔泰山是出产金子的，而且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整个欧亚草原上的黄金就是产自阿尔泰山，阿尔泰山又叫金山，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在西方文献里就曾记载着在东方有一个守护黄金的鹰叫格里芬（图16－12），它所待着的地方就是阿尔泰，这在世界历史学术方面基本上都是公认的。

公元前7世纪左右，黄金就已经源源不断地从阿尔泰山被挖掘出来，再通过草原之路从里海和黑海的北岸辗转到了古罗马，被城市的居民们用于表现富贵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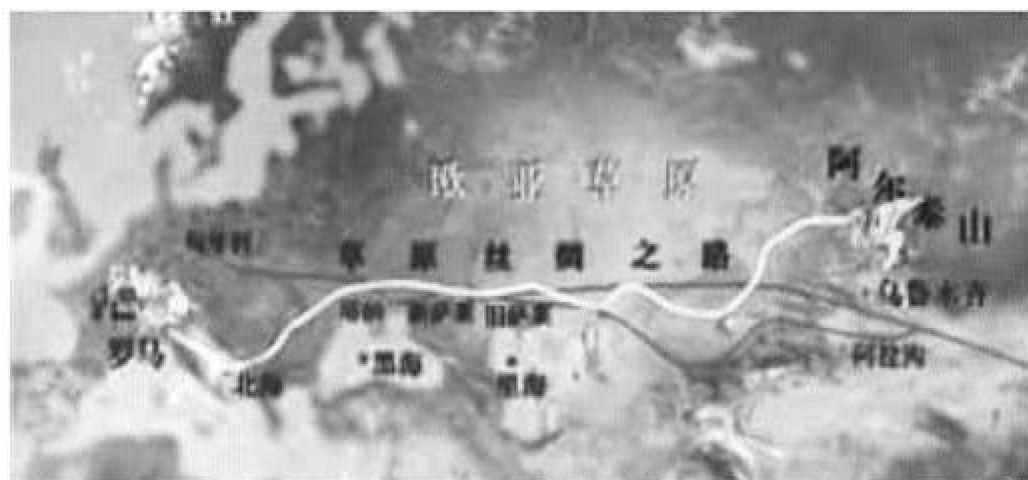


图 16-12　格里芬鹰及欧亚草原之路

美丽的首饰，后来又被回销到草原而被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所喜爱，所以这种文化的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王博认为阿拉沟出土的这些金饰物很有可能就是新疆的古代民族在与东西方进行交流时的早期结果。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将阿拉沟 30 号墓出土的木椁朽木送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做 ^{14}C 测定，确定其年代结果为距今 2345～2135 年。

自 2006 年至 2008 年，新疆考古队对乌鲁木齐市郊外乌鲁木齐河东岸的萨恩萨伊一处古墓群进行了挖掘，共挖掘古墓 180 余座，出土各类文物 300 余件，其中有 16 座带有十字横梁的古墓非常独特，在这 16 座墓葬之中惊人地出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权杖头（组图 1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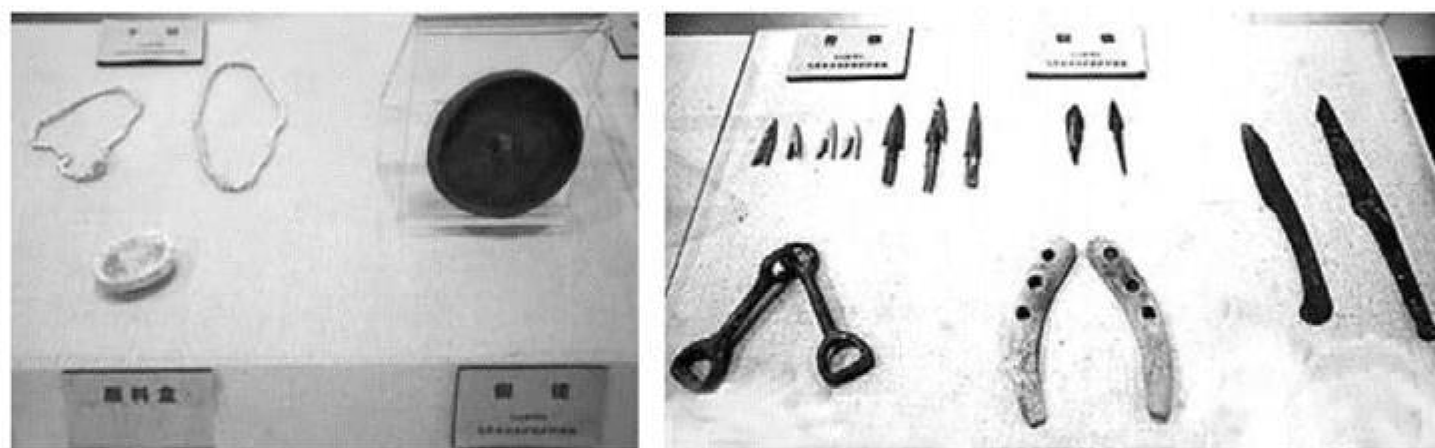
组图 16-13　萨恩萨伊古墓群遗址及从古墓出土的权杖头

从世界范围来说，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王国是发现权杖头最多的地区之一，除大量权杖头实物外，古埃及还发现有众多表现权杖头的艺术品，如壁画、石雕等，从中可以看出权杖头是当地一种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使用者绝非一般人物。

就目前资料来看，年代较早的权杖头可以上溯到距今 5500 年或更早，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古埃及、亚洲地中海沿岸的安纳托利亚、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而在中国境内，考古人员仅在甘肃、陕西南部、新疆等地发现过，由于在中国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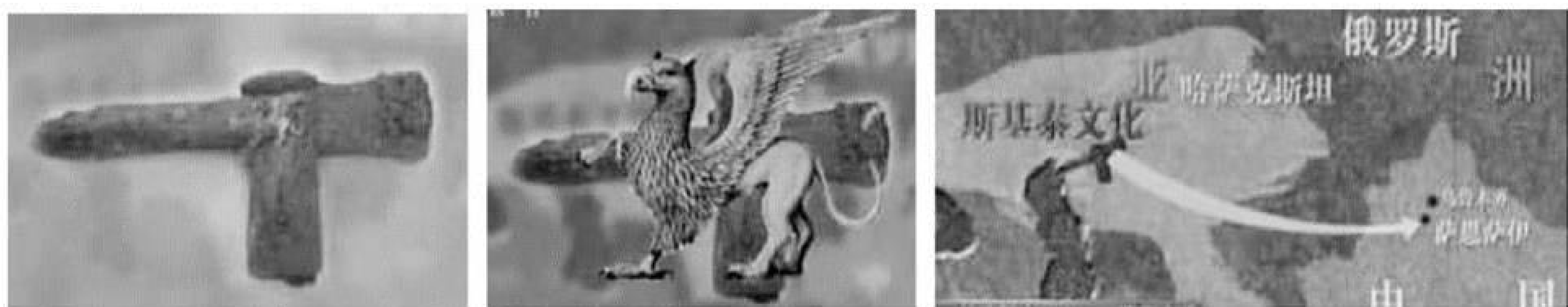
的权杖头数量比较少，其形态和中亚发现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所以有关专家就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权杖头这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具不是华夏文明固有的文化特质，而属于外来因素。如此说来在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出土的这件权杖头就意义非凡，那么它是何时从西方来到萨恩萨伊的呢？

在萨恩萨伊的多处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铜镜和马衔、铜刀、箭镞等器物（组图 16－14）。说到古代铜镜，许多人会认为这与之前的权杖头不一样，肯定是中原地区的产物，然而专家们却不这样认为。当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建新看到萨恩萨伊出土的部分文物后认为铜镜至少有两大系统，一种是带柄的铜镜，一种是带钮的铜镜，带钮的铜镜应该是东部（即欧亚大陆东部）的物品，而带柄的铜镜既在中亚地区有分布，也在新疆有分布，而中原铜镜出现的时代比西亚和北边的要晚。就萨恩萨伊出土的铜镜看上去应该不是中原产的（或从中原传进来的），倒像是游牧文化的东西，时间可上溯到青铜时代，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组图 16－14　萨恩萨伊古墓出土的铜镜、马衔、铜刀、箭镞等器物

从萨恩萨伊 14 号古墓出土的一件铜战斧，上面雕刻有格里芬那种虚实的动物图案以及那种超乎现实的夸张鹰嘴，又有着斯基泰文化里的一些元素（组图 16－15）。



组图 16－15　萨恩萨伊 14 号墓出土的刻有格里芬的铜战斧

在萨恩萨伊 27 号古墓还出土了丝绸的残片，从质地上来看虽然保存残破，但还是可以看出这是普通的绢或麻布之类的物品，而这又属于中原文化的因素。

从萨恩萨伊古墓群中 45 号墓出土的陶器也很有特点，它平底、直腹、溜肩

像个直桶，学术上称它们为桶形罐（图 16－16），这种形状的陶器接近中亚地区安德罗夫文化，时间久远，分布广泛，也是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

另外，从萨恩萨伊古墓群还出土了许多人体骨骸，经王博利用数据测量的方法对部分头骨进行比较分析后，鉴定认为这些头骨分别属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通俗地说欧罗巴人种就是白种人，蒙古人种就是黄种人（组图 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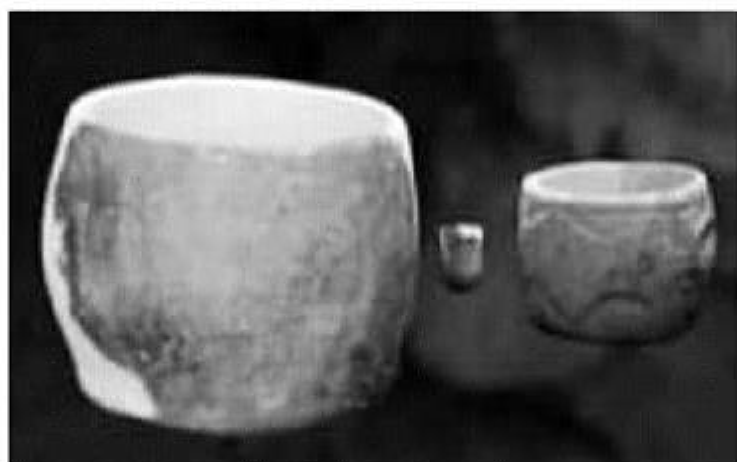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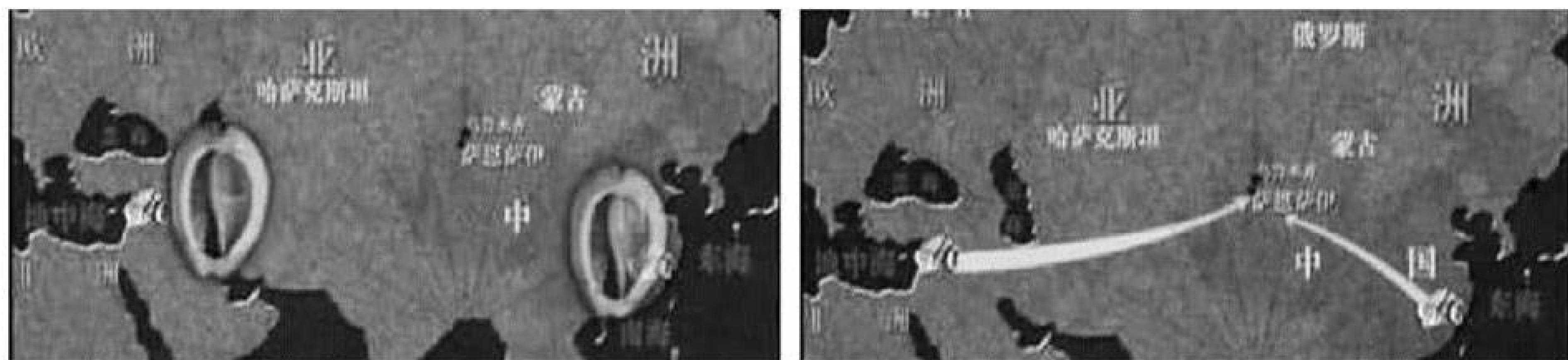


图 16－16　从萨恩萨伊 45 号墓出土的陶器



图 16－17　从萨恩萨伊古墓出土的部分头骨

从 82 号古墓出土了一些珊瑚、贝壳一类的物品（组图 16－18），又可以肯定是地中海或东南沿海一带特有的物品，显然它们是白种人或黄种人通过迁徙、推进、影响、渗透和相互交流而带过来的舶来品。



组图 16－18　从萨恩萨伊 82 号古墓出土的贝壳

由此看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代表文物都出现在了萨恩萨伊，那么这些文物究竟是属于什么年代的呢？出于严谨客观的工作态度，2008 年新疆的考古学家们针对有特点的墓葬进行了部分样品采集，送到北京大学进行^{14}C 测定，之后的测试报告记录了所送样品最近的年代距今也在 1785 年左右，最远的竟然可上溯到距今 3890 ± 35 年。

从萨恩萨伊出土的西方的铜权杖头以及欧罗巴人种头骨等这些例证，正好印证说明了在远古时期，由于存在着以骑马游牧为生的民族，才使亚欧草原带上的任何一个地区之间的迁徙和交流显得并不是很遥远。

乌鲁木齐所辖区域原本就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丝绸之路对东西方商贸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的乌鲁木齐又是新疆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乌鲁木齐的现代时尚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一座城市文化的高低，不能只看有多少座高楼大厦，而是要通过勘探发掘来看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到底有多么久远以及底蕴多么深厚。如今乌鲁木齐人饮水的主要源泉就是乌鲁木齐河，而萨恩萨伊墓葬群就在乌鲁木齐河东岸，这不由得让人们联想到了乌鲁木齐河就是乌鲁木齐的母亲河，而萨恩萨伊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乌鲁木齐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先民之一。

萨恩萨伊地处天山腹地，这里水草丰美，远古游牧民族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牧场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而从交通线上来说，萨恩萨伊虽地处深山，却又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游牧民族的迁徙。如果我们再拓宽一些对萨恩萨伊的关注视野，就会发现它正好处在地跨欧亚大陆的一条广阔草原带上（组图 16－19），它东起大兴安岭，经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然后翻越乌拉尔山，绕过黑海北岸，再经南俄草原，向西就可以一直到达匈牙利平原。萨恩萨伊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东西方的文化就曾经在这个叫做萨恩萨伊的地方交融汇流过。这也说明了早在 3000 多年以前，甚至更早在距今 3890 ± 35 年时，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之路上就已经有了类似于“丝绸之路”的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汇之路。



图 16－19　萨恩萨伊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线图及欧亚大陆草原带走向

四

分布在新疆南北疆的维吾尔族拥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有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西汉之前就曾经是横穿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曾经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东方汉人的医药学也曾经在中亚腹地的新疆刺激过当地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维吾尔族的祖先曾融合过移居到这里以农耕为主的汉族人，经历了草原游牧和塔里木盆地农业两种经济生活方式，其医学也深受这两种方式的影响。11 世纪后，由于维吾尔族信仰了伊斯兰教，

也受到了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医学的影响。维医学正是在积累和发展本民族医学的基础上，又汲取东西方不同地区和民族医药文化之精华，从而形成了具有维吾尔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体系。

维吾尔族医学以“土、水、火、空气”为代表的“四大物质学说”和“血津、痰津、胆津、黑胆津”的“四津体液学说”为基本理论，解释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创立了一整套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指导着临床的医疗实践，根据药物的四种属性——热、寒、干、湿理论调理药性，调整平衡。这从《福乐智慧》（1069~1070年）及元代以后维吾尔医家撰写的许多著作中可以得到证明。

四大物质学说又称四要素学说。它是古代维吾尔族的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也是维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维吾尔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通过对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观察、体验，认识到自然界的四大基本物质——火、气、水、土，影响和制约着万物的生、长、盛、衰。

火（太阳）位在高处，量为最轻，稀而无色，能发热。以升为特点，在一年的四季和一日的昼夜中，调节着天地的寒热，能给万物以热量，使万物分解、成熟，能熔解或改变坚硬物质，能调节水、土之寒，使万物成色。属性为干热。

气（空气、风）位于水火之间，量比火重、比水轻，因此在火之下、水之上。以动为特点，能调节太阳对水、土的强烈影响，填补空间、无孔不入，促进物质代谢，在万物生存中起重要作用。属性为湿热。

水位于土之上。量比土轻、比气重，以流动为特点，在所有生物的活动中，能输送和溶解所需要的营养，防止万物由于太阳（热）的影响而被分化、腐蚀，能通过各种渠道排泄万物所产生的废物。属性为湿寒。

土位于水之下。量为最重，以静（沉）为特点，能保持万物的形状，提供生存场面，保存营养物，调节水所引起的过湿和火所引起的过热，从而保持平衡，还能对有些物质起到分解加工的作用。属性为干寒。

他们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事物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既有相互滋生又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古代维医认为火、气、水、土四种物质对人体有重大影响，于是对这四种物质的属性进行研究，并作了广泛的联系。

例如，把各种体液、器官、组织、生理和病理现象，按事物的不同属性、作用、形态分别归属为四大物质，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关系以及人体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并且以此为基础对各种疾病进行辨证论治，以便达到除病延年的目的。

实际上维医的这种按四大物质归纳事物的方法并不注重物质本身，而是按其特点概括出不同事物的属性，如火的性质为干热，特点是炎上，因此凡有这种特性的事物便称之为火。

这四大物质之间又有着相生、相克及半生、半克的关系。例如，火克水、水克火，土克气、气克土是相克关系；火与气、气与火、气与水、水与气、土与火、火与土、土与水、水与土是半生、半克关系。

相生与相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正常的变化与发展。相乘和相侮是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反常现象。四大物质中任何一种太过或不及都可引起相乘或相侮。相乘是过度的相克，相侮是反向相克又叫“反克”。维医用相乘、相侮解释各种病理现象。

体内各种营养物质在肝中产生的各种液体总称为体液，分为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和黑胆质四种。它们贯穿于整个人生和人身，在体内自然形成，对健康和疾病起很大的作用。它们在体内不断地消耗，又不断地产生，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四体液之间的平衡是相对的，属性之间的对立（矛盾）是绝对的。四种体液分为正常体液和异常体液两大类，这是四种体液学说。

正常体液系指保持原有的自然状态，为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提供活力，并适合于该人气质的体液。它分为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四种。

胆液质是一种色黄、味极苦的烈性液体，性为干热。产于肝，流入胆囊变稠，通过胆道滴入肠道、分解脂肪、帮助消化，有刺激加速肠的蠕动、促进粪便的排出以及防毒、解毒的作用。胆液质与“火”相似，故被认为“火”在体内的象征。胆液质偏盛者气质为干热，精神状态灵活、易怒，体轻形瘦、眼、舌较黄，少寐、脉细带数、小便偏黄等。这种人也被称为胆液质气质者。

血液质为最好的一种体液，也是人生存的基本物质。色为红，味微甜，属湿性。源于骨髓，位于肝脏。血液质与“空气”相似，故被认为“空气”在体内的象征。血液质通过血管循环于全身，将营养物和从肺部吸取的清洁空气（氧气）送至身体各部，供人体生命的活动需要，并且将生命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和不清洁空气（二氧化碳）通过肺、肾、汗孔等排出体外。血液质偏盛者气质为湿热，其面色红润、心情开朗，有力、胖瘦适宜、睡眠较好，通常脉洪大、小便淡红、身体健康等。这种人也称之为血液质气质者。

黏液质是产生于人体的各种营养物及液体，也是储存于每一个组织的极小单位之间的蛋清体液。它属性为湿寒，与“水”相似，故被认为是“水”在体内的象征。古代维医学家称之为还没成熟的血液，在必要时可以变成血液。黏液质偏盛者气质为湿寒，其面目苍白、舌淡苔白、肌肉松软、形体肥

胖，性情沉静、嗜睡、易流口水、脉大迟、小便清长。这种人也被称为黏液质气质者。

黑胆质是色暗黑、味臭而酸的液体。位于脾脏，属性为干寒。它容易沉淀，故有保持各器官形状的作用。它能制约胆液质、黏液质的过盛，防止其他体液从各自的渠道中流出蔓延、储存各种营养物，为各干寒性器官（如骨骼、软骨、筋、韧带等）提供黑胆质。此外，还是心理过程的物质基础。黑胆质与“土”相似，故被认为是“土”在体内的象征。黑胆质偏盛者气质为干寒，这种人面容及舌质暗黑或近似青蓝，少寐、易怒、感情脆弱，容易激动、思维较快、脉迟、小便较黄或近似青蓝。这种人也被称为黑胆质气质者。

另外，维吾尔族医学理论中还有自然力学说和形神学说以及健康学说。

自然力系指为补充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通过生命力、精神力而从脑、心、肝等器官产生的力。它从胚胎时期开始营养人体全身，为人体的成长和成熟打下了基础。当自然力不足时，会引起精神力和生命力的异常，破坏支配器官或被支配器官的功能，甚至使四体液失去平衡，导致全身营养不足性疾病。自然力的中心在于肝脏。它分为先天（原发）力和后天（继发）力。先天力——系指男性的睾丸、女性的卵巢的自然力。后天力——产生胚胎后的力。

形神学说中的“形”系指人的体质和性别差异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例如，小儿多患麻疹、百日咳、天花、猩红热等传染性疾病，中年人和老年人中体形较胖者多见支气管炎、瘫痪、心脏病和动脉硬化、高血压、脑出血、关节炎等疾病；体形较瘦者多发生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以及胃病；妇女则多见癫痫、歇斯底里及神经性疾病。“神”系指体液中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神”存在于各支配器官和被支配器官中。维医学书籍中所谓的“神”，不是哲学中的“灵魂”，而是一种活跃的气体，有些类似中医当中的“气”，它维持各种器官的正常功能。

维医学特别重视与人体健康和疾病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条件的作用，如饮食、空气、卫生、衣着、起居、安宁、体力活动、适当的工作和休息等。这些在维医古籍中称为保健所必需的条件。

动与静：动（从事体育活动）与静（休息）是保持健康所必需的条件之一。

睡与醒：适当的睡眠对人的脑力和体力活动是有益的。

积与泄：人体一方面从外界吸收营养物质、空气、水和其他物质，另一方面也要排出，这对人的正常生活是十分重要的，维医书上称之为物质交换。

维医认为人的自然寿命不低于120岁，除因事故死亡外，活不到120岁者多因病夭亡，认为消灭了疾病之灾，人都可享寿百岁以上，所以维医认为人的健康保健非常重要。动与静、睡与醒、积与泄这些概念又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太极八卦里阴与阳的两仪二元二分概念是一致的，这些是维医里的健康学说。

五

分布在新疆北部境内阿尔泰和天山山脉的哈萨克族，有着他们自己的医药学基础理论，而阴阳学说却是哈萨克医药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有阴阳二重性的，都是在阴阳的作用下发生，发展和消亡。构成世界的六大元素，也有其阴阳属性。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和医疗实践中，运用阴阳学说，解释和说明人体和宇宙万物的关系，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解剖、病理变化、病因病机、药物性味，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阴阳是自然界中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它既可以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也可以代表同一事物内部存在的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一般来讲，热性的、无形的、明亮的、平坦的、干燥的、生长旺盛的等属阳性，寒凉的、晦暗的、潮湿的、衰弱死亡的等属于阴性。

阴阳学说贯穿哈医药理论的各个方面，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药物的属性，饮食的属性，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它用阴阳学说阐明人体时，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组成它的组织结构是有机联系的，又是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如哈医认为外在十二器官（毛孔、皮肤、耳、舌、眼、鼻、手、足、腹部、关节、颈部、外生殖器）为阳，而内在的十二脏器（肺、脑、心、腺体（淋巴）、骨、肝（脾）、胃（十二指肠）、口腔、肾、肉（筋、脂肪、网络）、肠（大、小肠等）、内生殖器）为阴，人体每个脏器器官都有其阴阳属性，阳性器官也有阳中之阴，阴性脏器也有阴中之阳。

在治疗中，据以上事物及人体组织器官的阴阳归类，药物的来源、属性也分阴阳，进行对症下药，如长于干旱地的药物为阳，长于潮湿地的药物属阴；黄花的属阳，蓝花的属阴；红花的属阳，暗花的为阴；四季常青的为阳，春长冬缩的为阴等。

六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祖先曾信仰过萨满教，虽后来被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所放弃，但它的影响还一直保留到今天。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民间为人们驱邪治病、占卜、解梦、相面的“巴克西”和“皮尔洪”，也就是古时候的萨满，他们为人祛病消灾时跳的“皮尔洪”舞，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萨满跳神舞，而他们为人们进行占卜的方法，却是采用的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太极八卦六爻纳甲易术，并且这种方法至今还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中被少数人所掌握和应用。

所以，我们从维吾尔族医药学和哈萨克族医药学和占卜的基础理论我们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他们所创建总结的这些医理和病理学说理论，既与易学文化太极八卦中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理论非常相似或一致，也与中医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非常相似或一致，说明他们的这些文化理论也曾深深地受到了中医和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影响。

七

前面说过，通过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一些墓葬文物（组图 5－13、组图4－13、组图4－12、组图4－15、组图4－14、组图4－16），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认定萨满教曾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那么我们结合新疆阿尔泰地区和伊犁地区古“丝绸之路”（或欧亚草原之路）上充满萨满教文化意义的石画、石人、石头像等偶像，以及从洋海古墓发现的萨满巫师又是距今四五千年前从中国北方游牧过来在吐鲁番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这一结论，就会更加肯定古代吐鲁番地区的文化是多样性的，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万花筒，在丝绸之路西方的中亚、西亚甚至是欧洲北部的许多民族所信仰的萨满教，也很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或欧亚草原之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

结合以上的考古发现，我们就基本可以肯定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丝绸之路”就已经被前人开辟了。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的文明中，也有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太极八卦相通的元素，这就更加说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甚至更早在距今3890±35年时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之路上就已经有了类似于今天“丝绸之路”的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汇之路。

|中 篇|

总 结

易一开始诞生时，就是综合性的大学科，包罗万象。随着历史的演进，她完成了天学（其中包括天文、历法、天象等）、音乐、度量衡、语言学、文字学、中医学、数学、哲学、建筑学、预测学、儒学、道学等诸多学科后，易学就基本上就完成了她的使命，而各个学科开始独立地向前发展了，在后人的眼里也显得各个学科都是独立诞生的，好像没有根源一样。

岂不知，所有的学科都来自哲学的探索。

这样，人们就逐渐忘记了这些学科的根源，而仅把占卜、预测、天象等这几项具有神秘色彩、玄之又玄的学科依然归在易学当中，并被贴上了迷信巫术的标签，归入了三教九流，使绝大多数的人们不但不敢研究了解，而且还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使得现代的很多人都看不清她的庐山真面目。

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巫”字所代表的意思在古代与神职人员、医生、学者、教师都有关系，一旦物极必反就与恶人也有了关系。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刚刚起步的远古时代，国家的政治形态与部落的政治形态几乎是一致的，绝大多数的部落的领袖都是“巫”，“巫”也是有学问的能人，代表着知识的权威。

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人们认为“巫”是迷信、装神弄鬼、没有知识的代名词，所以这种说法与传统的认知刚好就反了。

原荒时代，绝大多数的先民知识未开，看见大自然中的各种现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惑、恐怖。对于这些疑惑要想获得答案，只有去向“巫”就教。巫对于这种现象，经过观察、思考、分析等过程后做出的结论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电有电神，其他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神主宰论，在现代人看来太不科学、太迷信了，而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此神非彼神，当然这与中国

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另外，人类有两件事情无法自己处理，必须要求助于他人：一是生理的，人没有不生病的，人生了病必须要请医生诊治。二是心理的，人要做一件事情，事前总是患得患失，东想西想，犹豫不决，这时必须要请教一些个明白人提供意见作参考。

现在的人当然知道，生了病要去医院诊疗。心中有犹豫不决的事，要请教至亲好友，或者向专家咨询。而在原始时代，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就会去求助于同一人，那就是“巫”，也就是神职人员、医生、学者、教师，他们是对事物的自然变化认识比较清楚的明白人。我们从古“医”字写作“毉”以及卜筮的“筮”字亦可窥见一斑。

中医学最早与道医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道医学中又包括有精神学科、心理学科和祝由学科（即用画符、送符来治病，清朝时从中医学中去掉了这一门学科），所以“医”就不可避免地与“巫”联系在一起了。中医学乃人身与宇宙气质同构的运化学，气为大气，质为大气中的物质，运为运动，化为化合，其原理出于河图。河图的圆运动，大可以表示一个宇宙造化的个体，小可以表示一个人的个体，甚至是一个细胞的个体，一个人体，即是一个河图，所以说河图乃是中医学之系统。这既符合“天”与“生物”的“宇宙生物观”，也符合易学文化基础理论当中类比归类的“同象原理”。

中医的阴阳五行，乃宇宙造化的大气圆运动的物质。生物皆是秉受大气的圆运动而生的，大气中有阴阳五行，故人身也有阴阳五行。大气中阴阳五行，时刻在进行着圆的运动，而人身中的阴阳五行，也同样在时刻进行着圆的运动。自然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中药）各自得到了大气阴阳五行的圆运动之偏，而人身却独自得到了大气阴阳五行的圆运动之圆。人身之所以有病，乃是人身中气［阳气］的运动产生了偏差。而中医恰恰是以自然界中的物性（中药）之偏，在补救人身之偏。

运动圆为生理，运动不圆为病理，运动不圆用药以恢复其圆为医理。这是实在的，是自然的，是简易的，一个河图尽之矣。

一个生物所在之地，太阳射在此地面的光热就是阳。此地面的光热已过，与光热未来之间就是阴。纯阴则静而不动，静则直下。纯阳则动而不静，动则直上。纯阳纯阴，直上直下，不能生物也。静则沉，动则浮。由静而动则升，由动而静则降，动静交合，则生中气。动静交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者，生物之父母也。此大气的圆运动之所由来，亦即造化个体之所由成就。人秉造化阴阳圆运动之气以有生，人的个体，即造化个体的遗传。先认识造化的阴阳，自能认识人身的阴阳。五行六气者，阴阳二气圆运动的内容也。

春气由冬气而来，故曰水生木。夏气由春气而来，故曰木生火。长夏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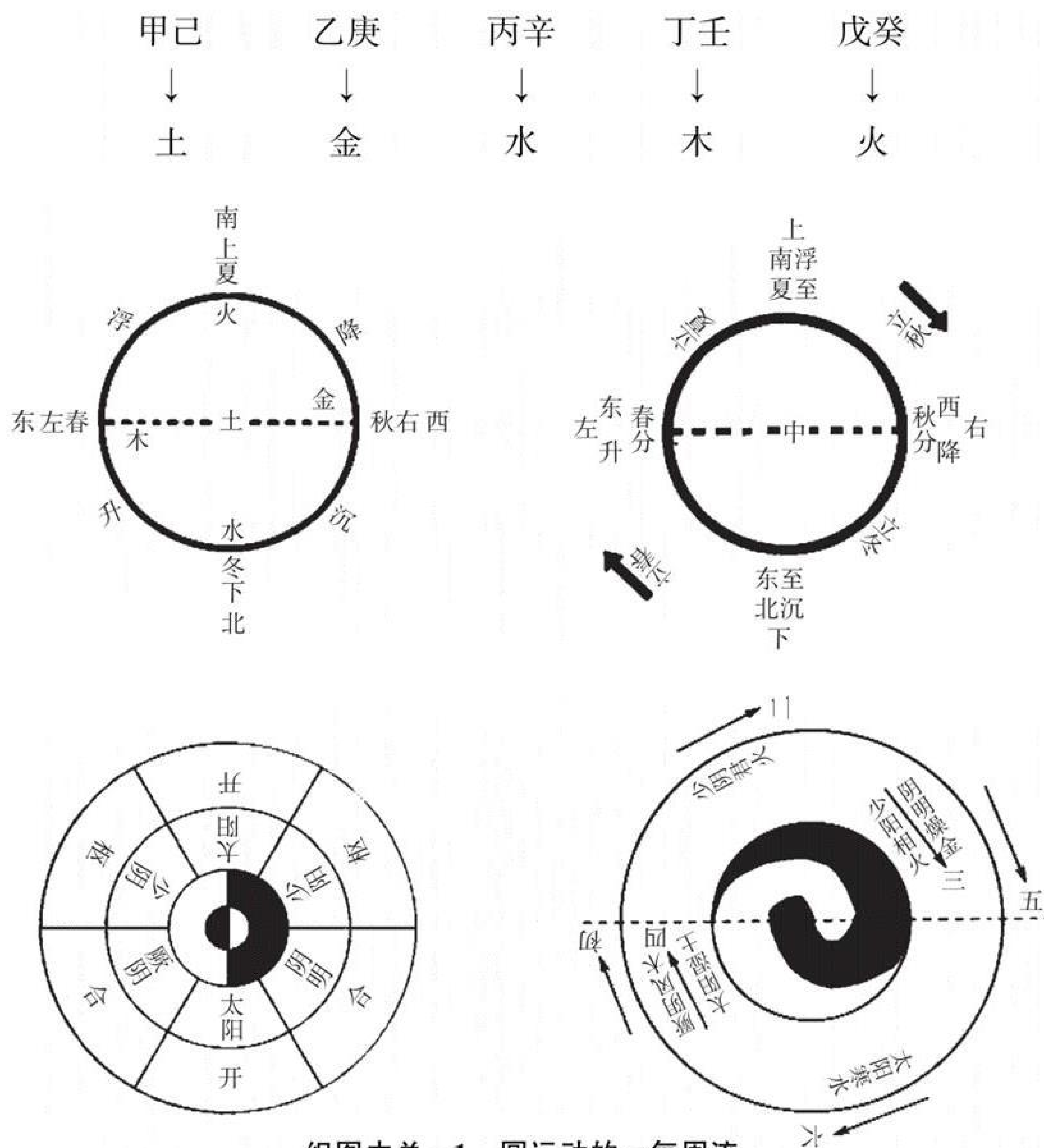
由夏气而来，故曰火生土。夏秋之交为长夏。秋气由长夏之气而来，故曰土生金。冬气由秋气而来，故曰金生水。

春气疏泄，秋气收敛，冬气封藏，夏气宣通，中气运化。收敛之气，制疏泄之气，故曰金克木。宣通之气，制收敛之气，故曰火克金。封藏之气，制宣通之气，故曰水克火。运化之气，制封藏之气，故曰土克水。疏泄之气，制运化之气，故曰木克土。

相生者，大气圆运动次序的先后；相克者，大气圆运动对待的平衡。相生者，补其不及；相克者，制其太过。相生相克，皆圆运动自身维持自身运动之圆而已。天人之气，和平则无病。运动圆则和平，亦和平则运动圆。相生则和，相克则平。相生相克者，中医学的生理、病理、医理之事也。土气燥则克水，土气湿则不克水（组图中总－1）。

总的来说，五行在中医里与五运相对应，天干配五运：

甲己	乙庚	丙辛	丁壬	戊癸
↓	↓	↓	↓	↓
土	金	水	木	火



组图中总－1　圆运动的一气周流

一年大气的圆运动，春木主生，夏火主长，秋金主收，冬水主藏，中土主化。木气有疏泄作用，火气有宣通作用，金气有收敛作用，水气有封藏作用，土气有运化作用。五行之作用，五行之气之性也。生长收藏化，五行运动性能也。六气者，风热暑湿燥寒，五行运动不圆，偏见之气也，五行各一，唯火有二，故为六气。二火者，君火运行，重在上升；相火运行，重在下降。名曰五行，其实六行。

初之气为厥阴风木，二之气为少阴君火，三之气为少阳相火，四之气为太阴湿土，五之气为阳明燥金，六之气为太阳寒水。

木气偏见，则病风。君火之气偏见，则病热。相火之气偏见，则病暑。金气偏见，则病燥。水气偏见，则病寒。土气偏见，则病湿。金气、水气与水中相火之气不足，则病风。金气、木气不足，则病热、病暑。火气、木气、水气不足，则病燥。金气、木气、相火之气不足，则病寒。金气、木气不足，则病湿。而皆由于中气之虚，运动能圆，乃不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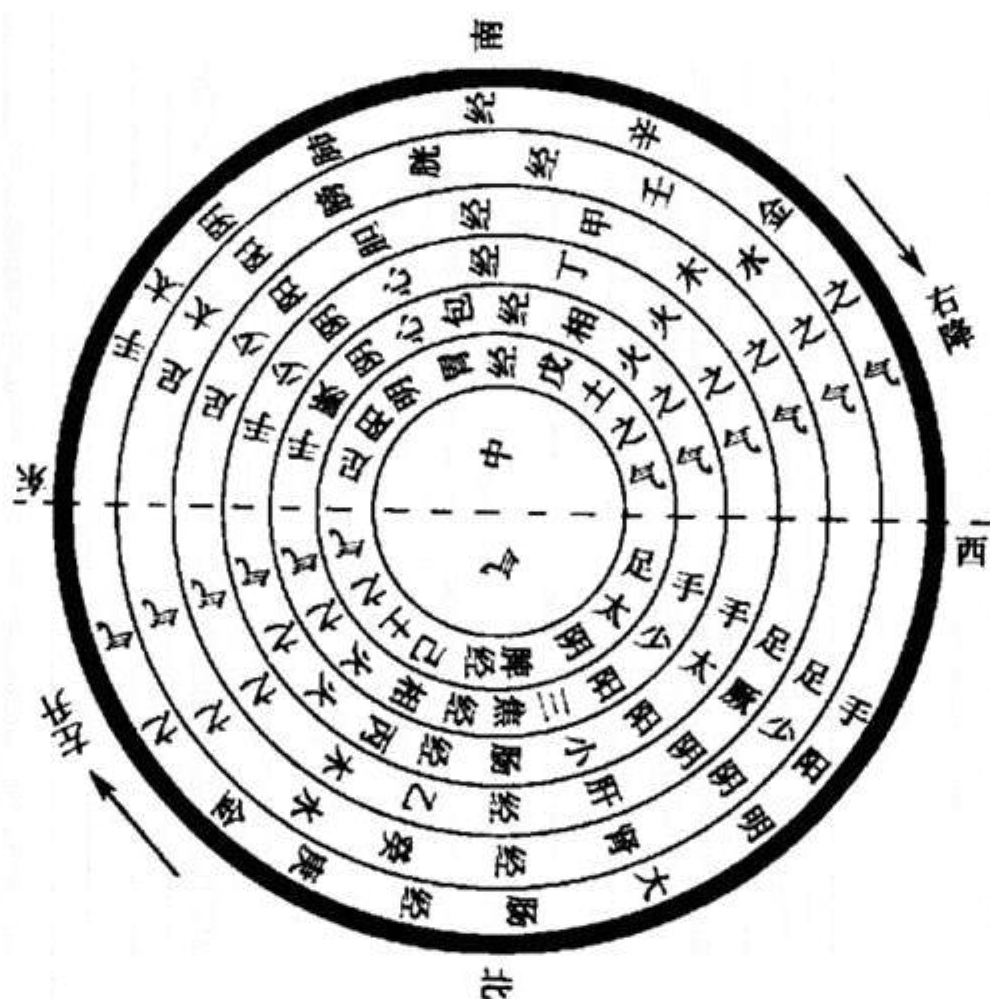
六行六气的圆运动，四节一气。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属初之气，春风、清明、谷雨、立夏属二之气，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属三之气，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属四之气，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属五之气，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属六之气，此时令发病之根源也。圆运动天人一气，时令病上最为显著。内伤杂病，亦属六气，特不似时令病之关系生死之速耳。因时令病乃整个六气散开，中气消灭极易，故死速也。①

总的来说，六气就是三阴三阳之气，又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厥阴、太阴、少阴之气，地支配六气（图中总－2）：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	↓	↓	↓	↓	↓
司天：	少阴君火	太阴湿土	少阳相火	阳明燥金	太阳寒水	厥阴风木
在泉：	阳明燥金	太阳寒水	厥阴风木	少阴君火	太阴湿土	少阳相火

但归根结蒂，六气乃一气，大自然之气在一气周流，人体之中气［阳气］也同样是在一气周流。中医在诊病的过程中通过望、闻、问、切，来判断出人体的中气究竟阻碍在什么腑脏，究竟是中气憋在了五行中的哪一行、六气中的哪一气导致中气的升降出了问题，再采取与腑脏五行相对应的方剂进行疏通，从而达到了治疗的目的。而中药方剂就是中医师所说的“方”，此“方”与易学文化中的河图与洛书里的“时辰”和“方位”是密不可分的，说穿了就是与大自然和

① 彭子益著，李可主校《圆运动的古中医学续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第5、6页。



图中总－2 人身左升右降的规则图

人体腑脏的“时辰”、“方位”、“气立”、“神机”是分不开的，“方”既是一种“方象”，也是一种“药象”，还是一种“时象”。比如，中医药中主人体左路升发的“大、小青龙汤”与主人体右路敛降的“白虎汤”就非常明显地带有易学文化左青龙、右白虎的概念和元素，而一个“方”所共同具有的这几种象又都是易学文化当中的“类象”、“类比”、“归类”，《系辞上传》中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就说得非常清楚。这也是中国易医同源的一个原因。

今天的中医药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科学社会）越来越受重视和欢迎，并加以引进、学习、研究、消化、利用，就是因为中药是自然、天然的有机材料，尽管很多的中药现在都已是人工栽培和驯养的，但它们依然保持了天然和自然的成分，而不是人工合成的药品。包括《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顺应大自然与人体一气周流的变化规律，这就是中国古文化追求的科学，强调的天地人和，与自然合一，可见在中国的古文化文明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核心，那就是易，就是日月，就是自然。

下　篇

外国文化和文明与易学文化



| 第十七章 |

两河流域文化与易学文化

第一节　苏美尔文明与易学文化

一

古希腊语“美索”，意思是“中间”或者“两者之间”，“不达米亚”意思为“河”。美索不达米亚在古希腊语中就是“两河之间的地方”。这两条河就是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它们发源于小亚细亚东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高原，缓慢的经过南部平原，在离入海口约 190 公里处汇合，注入波斯湾。两河带来的巨量泥沙在下游不断淤积，形成了辽阔的大平原，把干旱贫瘠的地区变成了西亚唯一的沃土肥田。古希腊人称这里为“美索不达米亚”，我们习惯上称“两河流域”。也有西方地理学家称之为“巴比伦尼亚”。在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笔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天堂，《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这里。

不过，在今天的两河流域，气候和自然条件显然已经和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描述大相径庭。这里气候干燥，土壤裸露，沙丘遍野，而且像所有的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比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全年降水量平均为 156 毫米左右，六月至九月为零；夏季气温高达 50 摄氏度以上，而冬季气温可下降到 0 摄氏度左右。

即使到传说中的“伊甸园”库尔拉去，你也一定会大失所望。如今这里是一个孤零零的地带，离河岸不到一公里，除了一种结节的灌木荆棘（据说是传说中的“善恶知识树”）还存在，映入眼帘的只是荒凉和沙砾。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这种比较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几千年前会成为人类高级文明的摇篮。

那么，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天堂”？这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究竟怎样？

地质学以及环境变迁的研究提出了创见性的论断：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时，两河流域存在着湿润而不是干旱的气候。地理学家拉姆认为，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是气候干旱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34度到35度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的发掘工作也证实了拉姆的结论。基什、尼尼微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在公元前四千至公元前两千年间，由于几次洪水的泛滥，造成了土层层理上的间断现象。而且从这些遗址出土的泥版文献中有关大洪水的记载以及苏美尔人如何建筑堤坝的描述，也是这一时期气候特别滋润的有力佐证。地质学家还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氨基酸差位异构分析以及花粉分析等一系列科学手段，确认了距今6000年至4000年前两河流域湿润气候的存在。

上述成果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两河流域曾经存在特别湿润的气候。那时，亚美尼亚山区丰沛的降水源源不断的注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又滋润着平原肥沃的土地。因此可以肯定，在公元前4000到前20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创立的关键时期，自然条件是适宜的，就是说，恰恰是在这个气候湿润的关键时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

我们确实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两河流域充沛的流量，美索不达米亚人如何提取足够的水去灌溉农田；如果没有季风雨的惠泽，在干旱荒芜的土地上又怎能开出绚丽的文明之花。历史学家们也通过大量的研究证实，那时的两河流域平原上曾经是一片林木繁茂、垄亩青青的绿野；也曾经是沟渠纵横、河网密布、人烟稠密。犹太人和希腊人把这里称为“天堂”并非虚言。

二

距今约6000多年前，就是公元前的4000多年前，在两河流域生活着苏美尔人，是他们最早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两河流域的文明，所以也叫苏美尔文明，是西亚最早的文明。

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但他们是最先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代民族，因为他们是来自远方的黑发种族，所以在他们带来的石碑上的铭文中，自称为“黑头”（图17－1、图17－2）。

也有研究者认为，可以在从阿富汗山区到印度河谷的居民之中，寻找到苏美尔人的踪迹，这一区域大约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东将近2500公里的半径以内。



图 17－1[①] 出土于乌鲁克遗址的"祭祀王"雕像



图 17－2 苏美尔人塑像

这个假设似乎很快就得到了考古学者的证明，因为在印度河河谷发掘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文化遗址，其出土文物之中，有几个长方形的印章，无论从制作外观上，还是从图案风格上，看起来都与苏美尔的乌尔古城遗址中被挖掘出来的十分相似（图 17－3、图 17－4、图 17－5、图 17－6、图 17－7、组图 17－8）[②③]。所以有研究者认为，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也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来自遥远的东方中国。



图 17－3 乌尔遗址出土的滚印印纹［早王朝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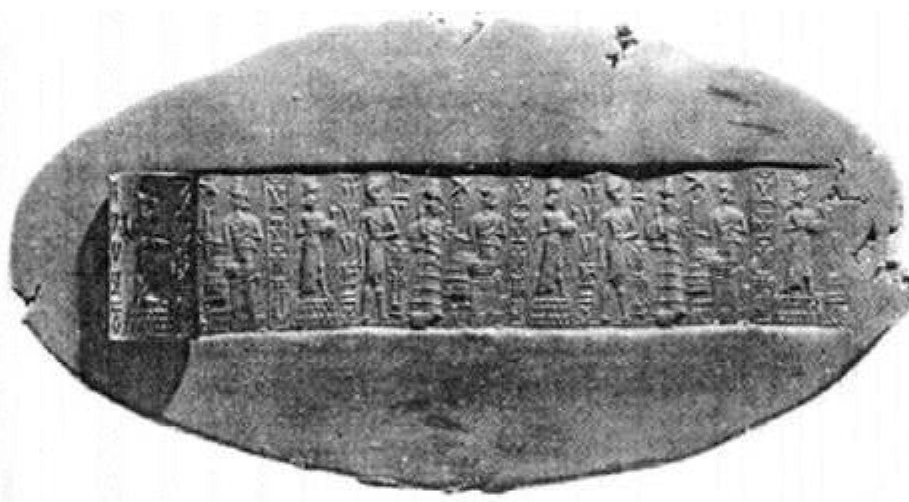


图 17－4 滚印及其现代印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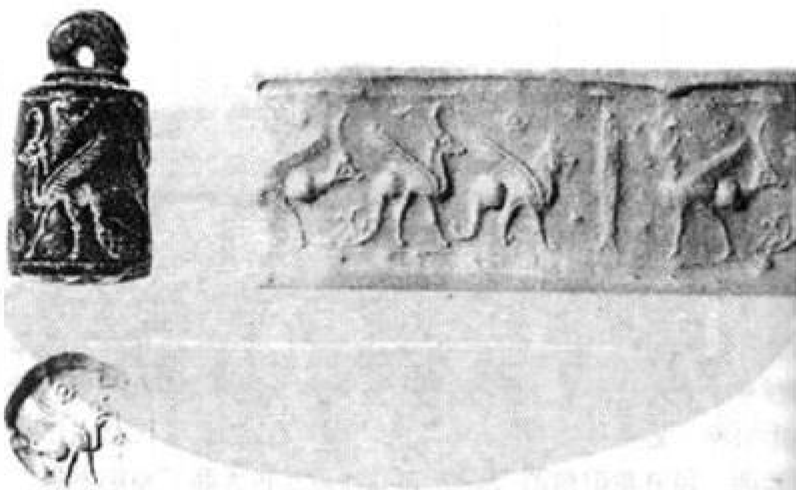


图 17－5 平印与滚印的复合印及其现代印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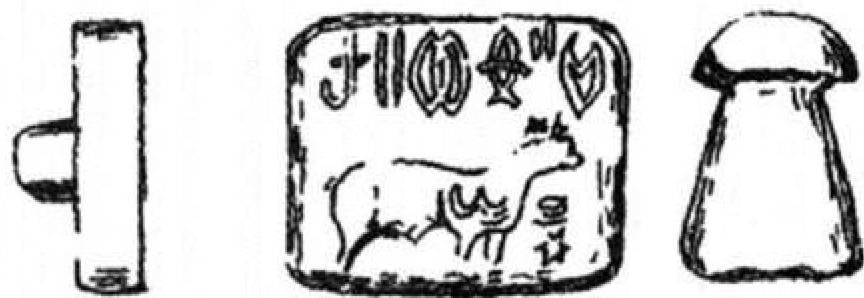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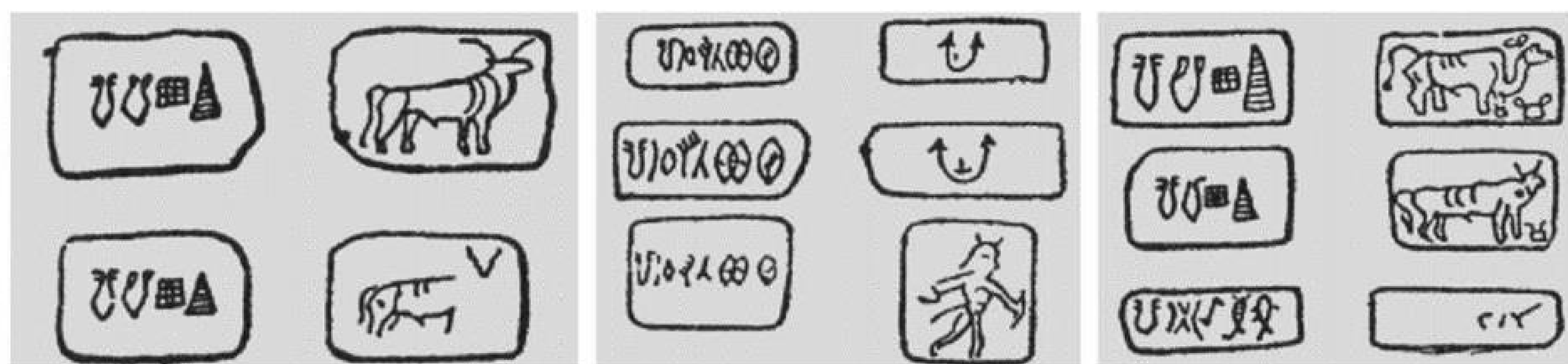


图 17－6 印度河流域哈拉巴印章图

①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87 页。
② 赵伯乐：《永恒涅槃——古印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 15、25 页。
③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197、198 页。



组图 17－7　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印章图

但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在远古时代，一个古老的民族或国家，有没有可能全部迁徙到一个远在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时既没有在民族神话中留下一丝线索，也没有在文化典籍里保留一点记载。所以苏美尔人从何处来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答案。

不管怎么说，在公元前 3500 年时，苏美尔人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依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成功地开掘了沟渠，建立了复杂的农业灌溉网，从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被西方人认为的第一个文明，所以说苏美尔文明与中国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一样，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早在公元前 4300～前 3500 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

公元前 3500～前 3100 年，两河流域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加快了，到公元前 3100～前 2800 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即城市国家，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帕尔等。所以说苏美尔文明实际是城市、城邦文明，苏美尔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城市文明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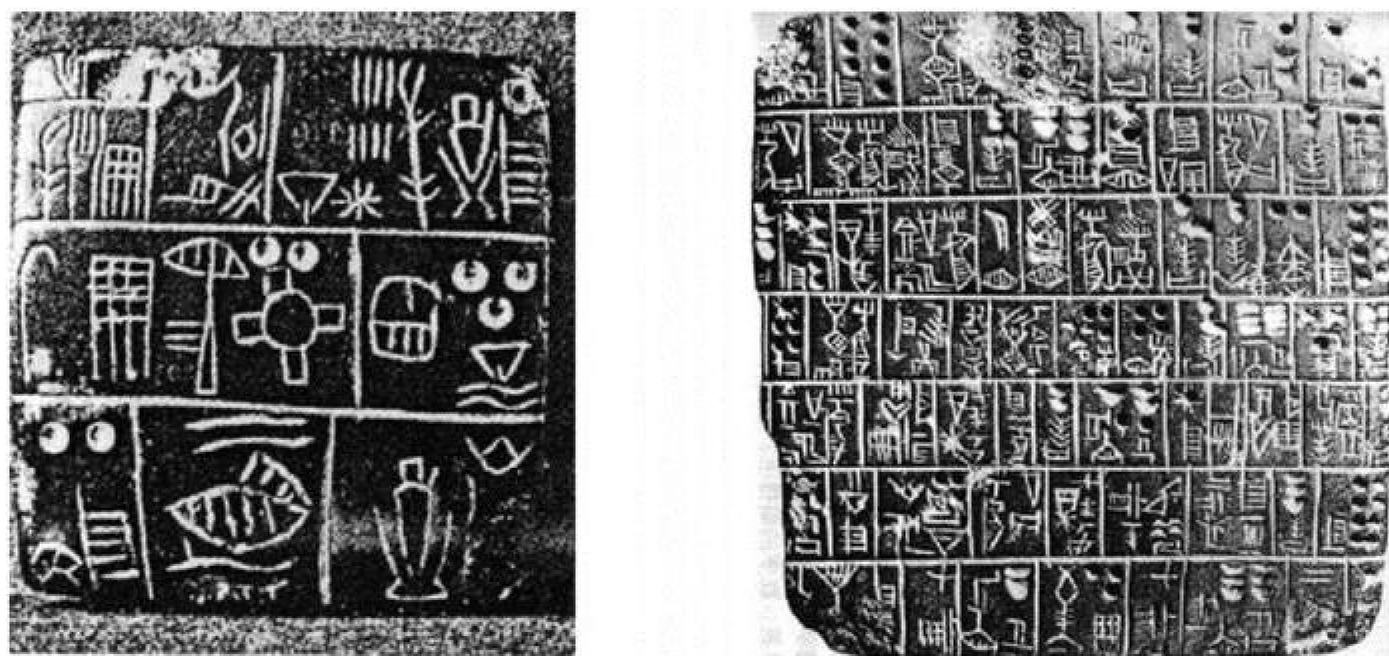
到公元前 3000 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 12 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乌鲁克等。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最后迫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也称塞姆人）。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意为真正的国王）一世。建立阿卡德帝国，苏美尔文明从城邦国家过渡到统一的王国时期。

但这个统一王国的寿命太短暂了，到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时，只短暂历时 280 年就被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再一次统一各城邦，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这一帝国从公元前 2113～前 2006 年，也

只短暂地维持了一个世纪。

三

苏美尔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他们发明的系统文字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书写系统之一（组图 17-8）[①]。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 3500 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两河流域书写的材料是用黏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笔是用芦苇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头，用它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写好后的泥板经过晾干可以长期保存，当作文书进行交流和保管。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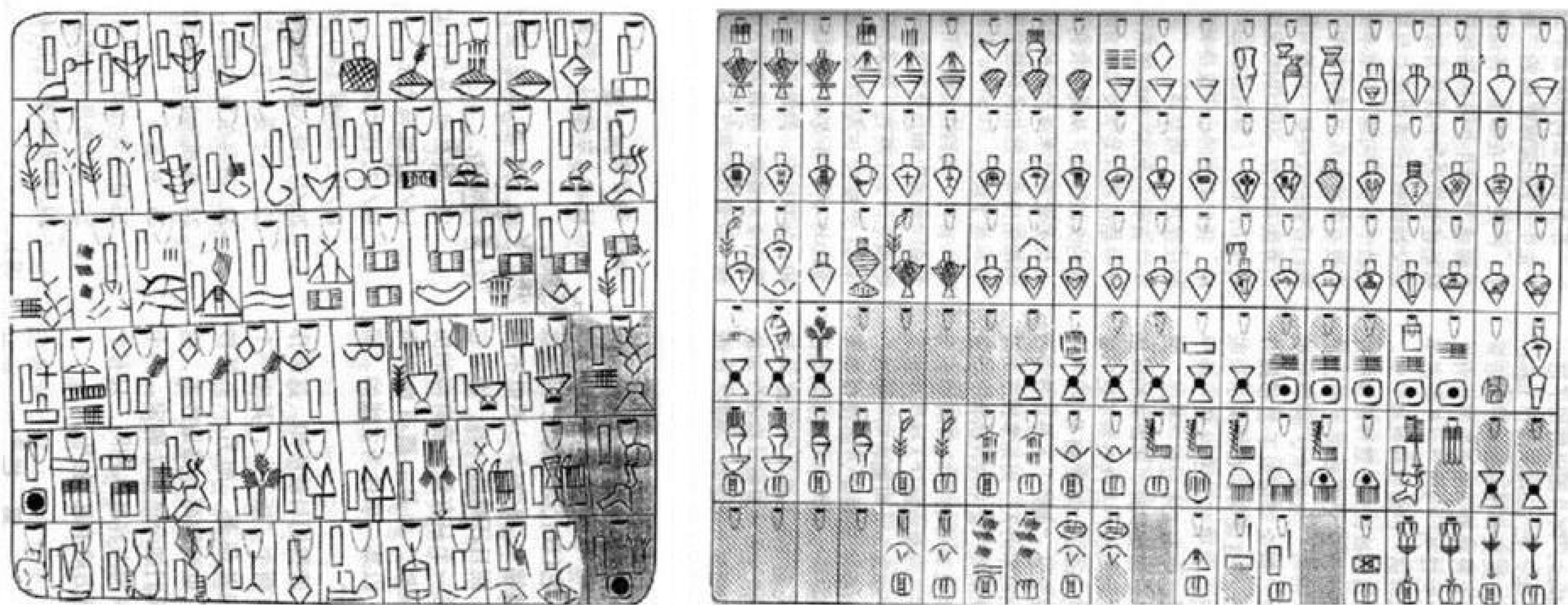
组图 17-8　刻在泥板上的苏美尔文明的图形文字

早在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学者就认识到了归纳的重要性，并按照归纳法的某些原则把同类概念收集在一起，编写出各种各样的“表”（组图 17-9）[②]。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共归纳出 15 个表，即“认表”、“官职表”、“牛表”、“鱼表”、“飞禽表”、“猪表”、“树木表”、“贡物表”、“植物表”、“容器表”、“金属表”、“食物表”、“城市表”、“地狱表”和“借此表”，实际可能还不止这 15 种表。

那么这种归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怎么会与中国智慧的古人把宇宙大自然中

①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160、161 页。

②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145、155 页。



组图 17－9　最早的教科书系列之一："树木表"和"容器表"

的万事万物都系统归类到先天八卦中的八个"数"中，系统归类到后天八卦中的九个"数"中，是一样的方法？而且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把形象思维后的相同形象或同类概念归集在一起，这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归类、归纳法是一致的。

随着楔形文字研究材料的累积，人们从对比中发现，年代越早，楔形文字就越形象。这就自然导致了楔形文字亦由图画①而来的推论（图 17－13、图 17－14）。



图 17－1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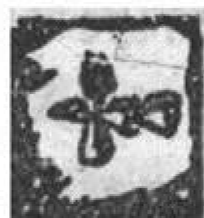


图 17－10b

例如，图 17－10a 是他们用楔形文字刻画在泥板上表达"星"的意思，然而这个符号太烦琐了，不久以后当"星"附加以"天"或"天空"之意时，就变成了图 17－10b。

同样，一头"牛"和一尾"鱼"的楔形文字是这样变化的，"日"原为平面圆，后来变成了 4 道楔形刻画痕（组图 17－11）。





牛字的变化





鱼字的变化





日字的变化

组图 17－11

如果我们今天还在继续使用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就可以将一幅图进行如下的变化（图 17－12a 和图 17－12b）。

① 〔美〕房龙：《人类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 32、33 页。

还有的研究学者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楔文、埃及的早期文字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字可能都是同一祖先的后裔，但这个祖先是谁，长得什么样，尚不可知。


图 17－12a


图 17－12b

我们看到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首先来源于实物，楔形文字创造的目的、演变和功能，首先也是以表意符号为主的，其次才是以音节符号为辅的。苏美尔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现了苏美尔语。

后来不管是在阿卡德人的阿卡德语符号中，还是在波斯人的古波斯语符号中也同样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独特的形象思维元素和方式有相通之外。而中国的形象思维元素和方式在中国哲学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却是一个自成的思维、思想体系。

从图 17－13 和图 17－14 中可以看出，有些本来比较象形的文字已简化抽象，有的原物形象尚依稀可见，有的则面目全非①。所以，字体“与其要表现的东西相去甚远”恰恰是文字发展的体现，实属自然，符合文字朝简化方向发展的规律，无可非难。

尽管在中国发掘出最早的系统书写甲骨文字比较晚，但从贾湖遗址出土文物的刻符上，我们也发现了可以进行五行归类的刻符（图 7－10）。

我们用形象思维的方式，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几个形象刻符与象形汉字“目”、“日”、“火”、“雷”、“电”极为形似，而且它们的五行属性也都属火，都可以归类、归纳在八卦的离卦中，而离卦其中又包含着雷电、火神、太阳、白昼、眼睛、光明、希望与文明等意思。

如果说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 3500 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被认为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贾湖出土文物上的刻符，是中国所知最早的文字。

然而，在中国大批量的出现最早的系统书写甲骨文字之前，中国古人主要是一直在沿用贾湖时代八卦之“数”的归纳方法在记事，也就是传说中的结绳记事。但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数”在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文化体系里都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包或信息系统库。后来苏美尔人教科书系列当中应用各种表的系统归纳法与中国贾湖古人这种用八卦之“数”系统归纳记事的方法可谓同出一辙。

①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174、8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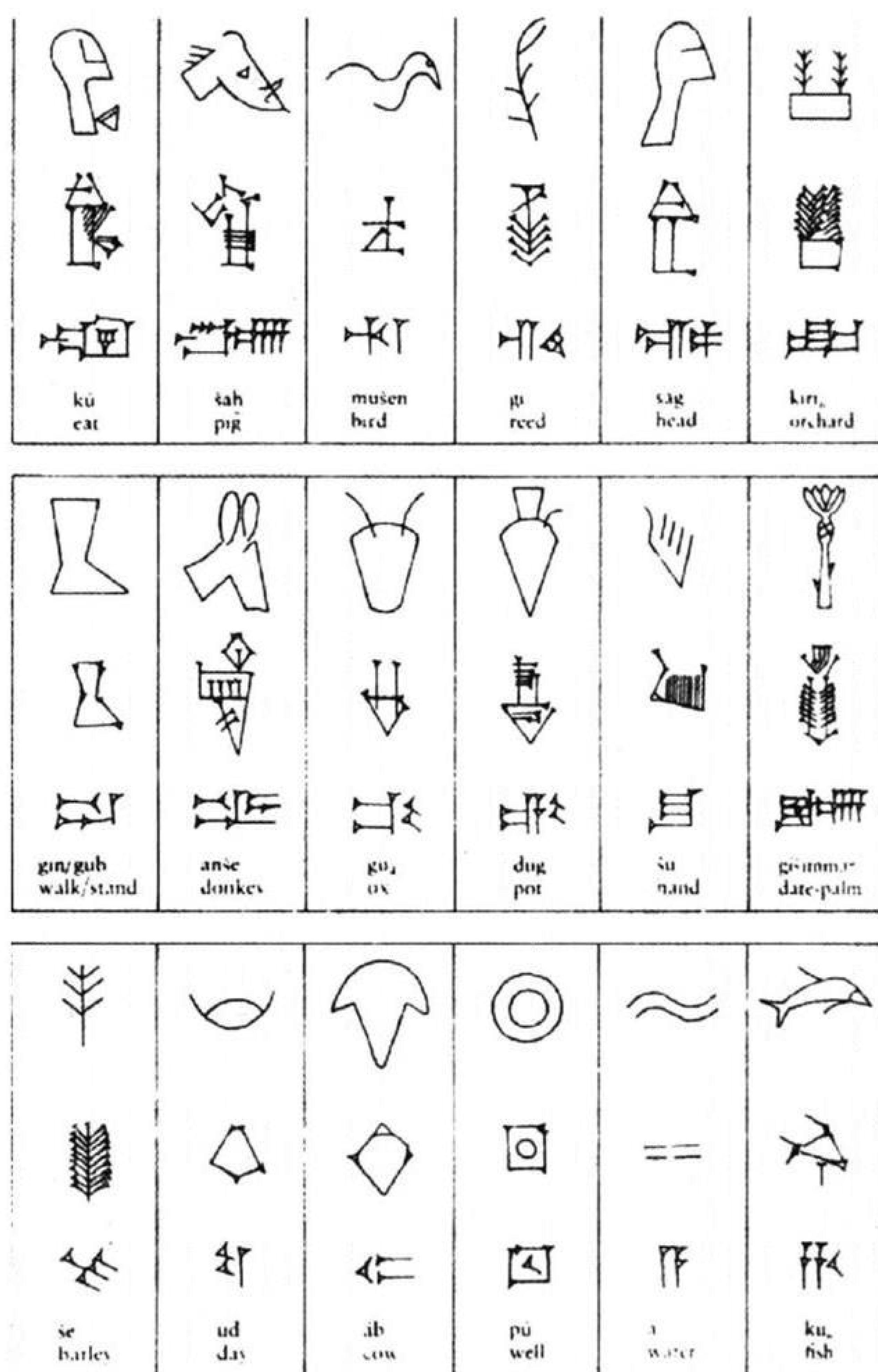


图 17－13　楔形文字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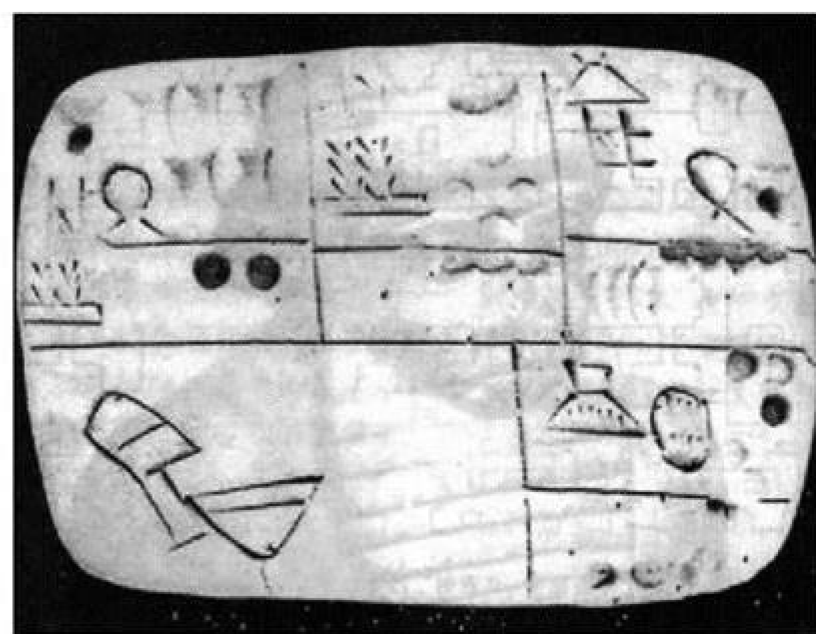


图 17－14　出土于乌鲁克遗址的古朴泥板

而凌家滩遗址的时代距今约5500年，苏美尔人用归纳法组成的各种表（容器表、树木表等）在公元前3000左右。这就说明在苏美尔文字诞生之前，苏美尔人的归类思想与中国古易学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和归纳法有相通之外。

四

在中国，智慧的古人早就总结出了“勾^2 + 股^2 = 弦^2”的规律，而且至少在中国古老的易学文化的《洛书》中就表现了出来（图7－41、图7－42）。

同样在古巴比伦时期，勾^2 + 股^2 = 弦^{2}的规律就被广泛地实际应用了。一块巴比伦时期的泥板（图17－15）①，年代约为公元前1700年，以及与此相应的表。抄写员用芦苇秆笔或铁笔在泥板上刃口向外侧刻画，表示1；而刃口平直刻画则表示10，数字不像我们现代用的10进位，而是采用的60进位。左侧左上角刻画（写）的是30，下面沿着水平对角线，写的是42、25、35，或者说是$42+25/60+35/60^2$。如果这个数字被30除，我们得到$1+24/60+51/60^2+10/60^3$。转换成我们今天采用的记数法，就是1.41213，这正是2的平方根（精确到0.00001）。我们看到，抄写员知道正方形的对角线长度是边长乘以2的平方根，这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一个特例；而早在公元前1700年，这位巴比伦抄写员已经拥有把2的平方根之值计算到极高精确度的算术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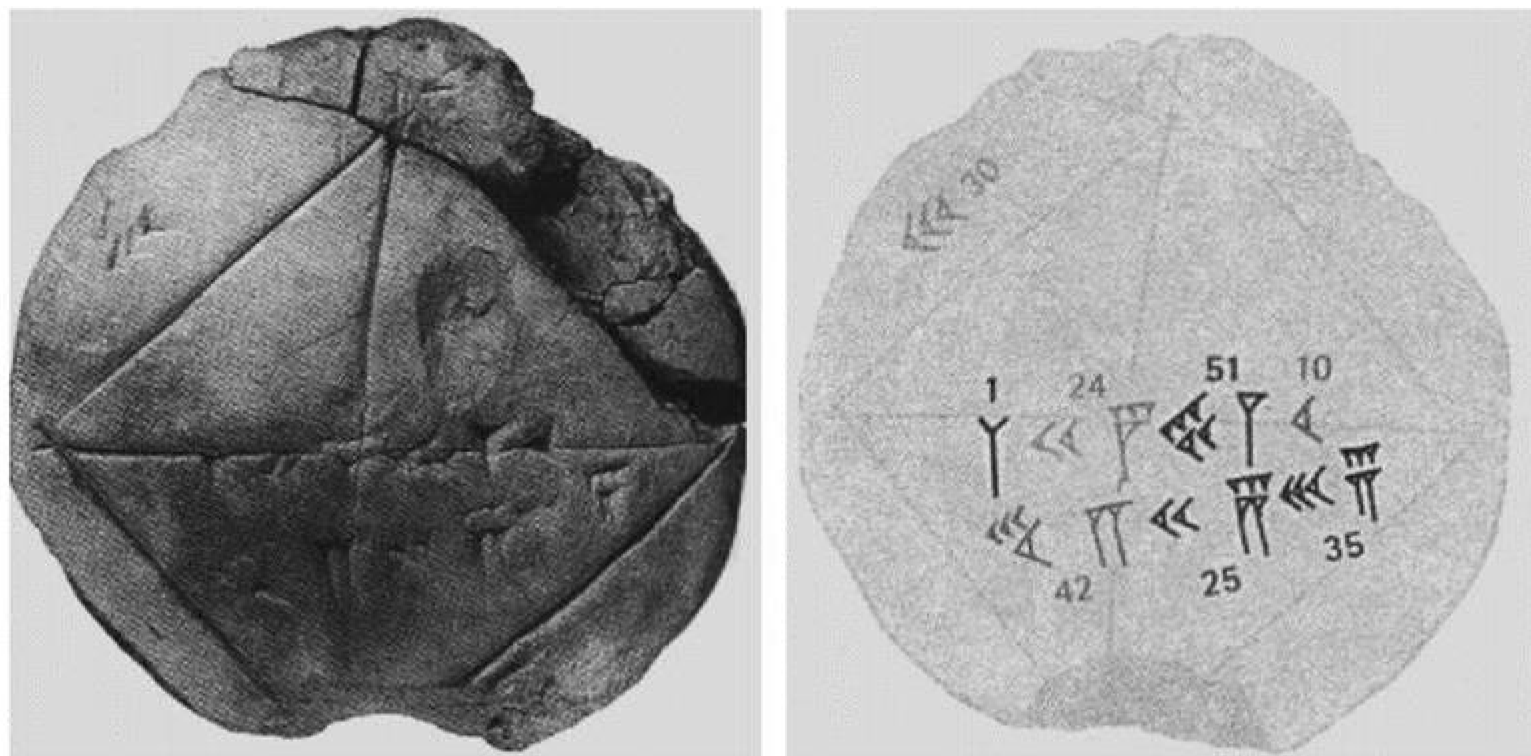


图17－15　古巴比伦泥板上2的平方根之值计算

① 〔英〕米歇尔·霍斯金主编，江晓原、关增建、钮卫星译《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第22页。

一些从旧巴比伦时代保存下来的泥板，它们对于数学史的重要性要超过天文学史。不过它们确实显示了一个对后来天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记述：有效的数值符号的使用。写数值1，巴比伦的抄写员将他的铁笔在泥板上刃口向外侧刻画；而表示10，则刃口平直刻画。这两种刻痕结合使用，一直到数值59，而到60时，1的符号再次使用，就像我们在表示10这个数值时使用1那样；类似地可以表示60×60，60×60×60，如此等等。0后来才出现，也没有相当于我们今天小数点的符号，这些次要的局限并未使巴比伦人的这一“位值”系统逊色多少，这一系统使得巴比伦人能够很容易完成精确的算术计算。我们今天将一个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分60秒的计时系统，类似还有对角线的划分，都反映了巴比伦人的记数法。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中，都没有0，0为弃数，就是说中国人在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是不用0的。而中国人的纪年方式却是用像龙一样在循环的60甲子，循环进行的。难道这都是巧合？

那么这种60进制的根源在哪里呢？

答案很可能是，苏美尔人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十天干与十二地支进行组合搭配，天干转6圈，地支转5圈，就形成了一个60甲子。

从贾湖遗址出土的B型釜（图7－7，如果不算搞错的7个扁椎状钉纹，也按其他3组6个扁椎状钉纹来计算的话，B型釜一圈就会出现对称、平衡的4、6、7、24和28这几组数字）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板图案（图4－22），结合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就可以轻松地把易学文化中四季、四方、六爻、七宿、二十四山、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的概念与之系统对应起来。

其中，二十四山（图4－23）由甲、乙、丙、丁、庚、辛、壬、癸这8个天干（戊己这两个天干隐藏在中心）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个地支，以及乾、坤、艮、巽这4个卦所组成，其中的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就可以组合成六十甲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版是夹放在玉龟里的，而从贾湖文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占卜龟甲，这就反映出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典型的中国易学文化占卜工具（图7－11、4－24）。

另外，在贾湖341号墓2号骨笛（六孔），发音的自然音序为：

1 =$^{\#}$A　　1　2　3　5　6　$\dot{1}$　$\dot{3}$

音阶变化为：　　1　2　3　5　6　i　（主音：$^{\#}$D6）

从341号墓2号骨笛的音阶变化为1、2、3、5、6、$\dot{1}$我们也可以看出从1到$\dot{1}$，实际就是完成了一个“宫—商—角—徵—羽—宫”的完整的循环、旋转、轮回、升级的圆形系统过程。这也让我们轻易地与表达积极、旋转、循环、轮回、进取的圆形龙文化联系了起来（组图4－2、图6－36、图6－37、图6－38、图6－39）。

中国的龙文化表现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像天学、音乐、占卜学、纪年等各个方面。通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龙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有相通之处。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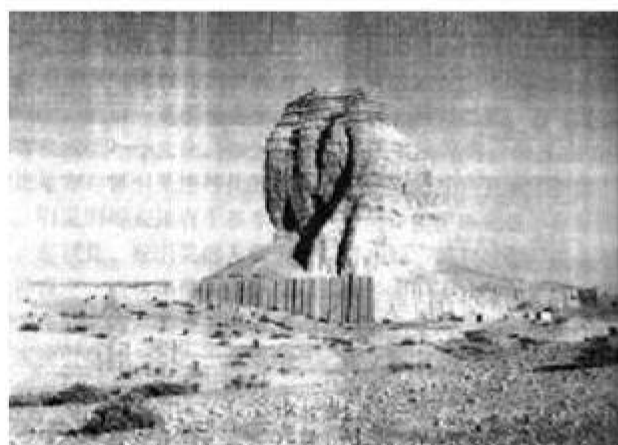
苏美尔人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建筑遗迹是塔庙。由于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苏美尔人用砖块建造塔庙。苏美尔人习惯于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庙，因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多层塔形的高台，顶端供奉着神龛。这种高台建筑，叫“吉古拉特”（组图1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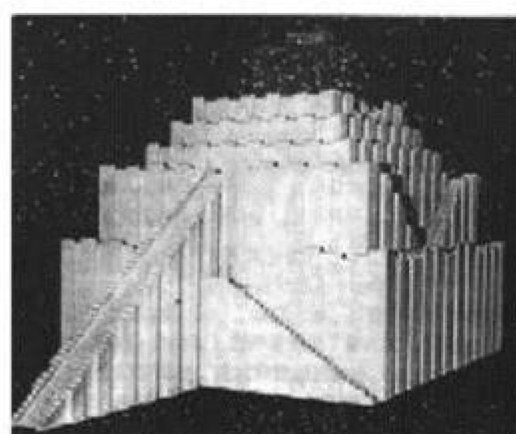

组图17－16　苏美尔文明建筑

根据泥版上的记载，它们全都是用来进行祭祀的，因为他们的神总是高高地居于神山之巅，所以需要在金字塔顶来祈祷，使人能够接近神的宫殿，使神便于接受人的礼拜。这种顶礼膜拜的祭祀方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影响迅速扩展开来，并且保持了数千年之久，从巴比伦王国到亚述王国，从巴比伦到尼尼微，随处可见这样的阶梯形金字塔（组图17－17）[①]，甚至连《圣经》里的巴别塔，它的外形也是阶梯形状的，如果能够建成，也将是一座小型的金字塔。

①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彩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214、216、彩页。


库里伽尔祖塔庙遗址


乌尔纳木塔庙遗址


巴比伦塔庙模型

组图 17－17

苏美尔人在造型艺术上早期以小型雕塑和镶嵌艺术为主。出土的面具、祭司组雕、公牛头（牛头竖琴）、“乌尔军旗”等，堪称当时的典范。后来，苏美尔人偏重于较大型的雕像和浮雕（纳拉姆辛石碑）。

宗教在苏美尔人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崇拜许多神，如天神（安努，图 17－18）[1]、地神（恩利尔，也有把恩利尔称为风神的）、水神（埃阿）、太阳神（沙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尔）等。人们对这些个神的崇拜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巴比伦王朝时期。

两河流域在远古时期流行这种对自然神力的崇拜，与中国易学文化的无神论十分相似。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时期代表自然力的神变成了各个城市的守护神。有几个大城市的神具有全区的意义，例如，尼普尔的主神是风神恩利尔，乌鲁克的主神是天神安努，埃利都的主神是水神埃雅，西巴尔的主神是太阳神沙玛什，乌尔的主神是月神辛，同样他们在各地也受到同等的崇拜(图 17－19)[2]。


图 17－18　乌鲁克的安努塔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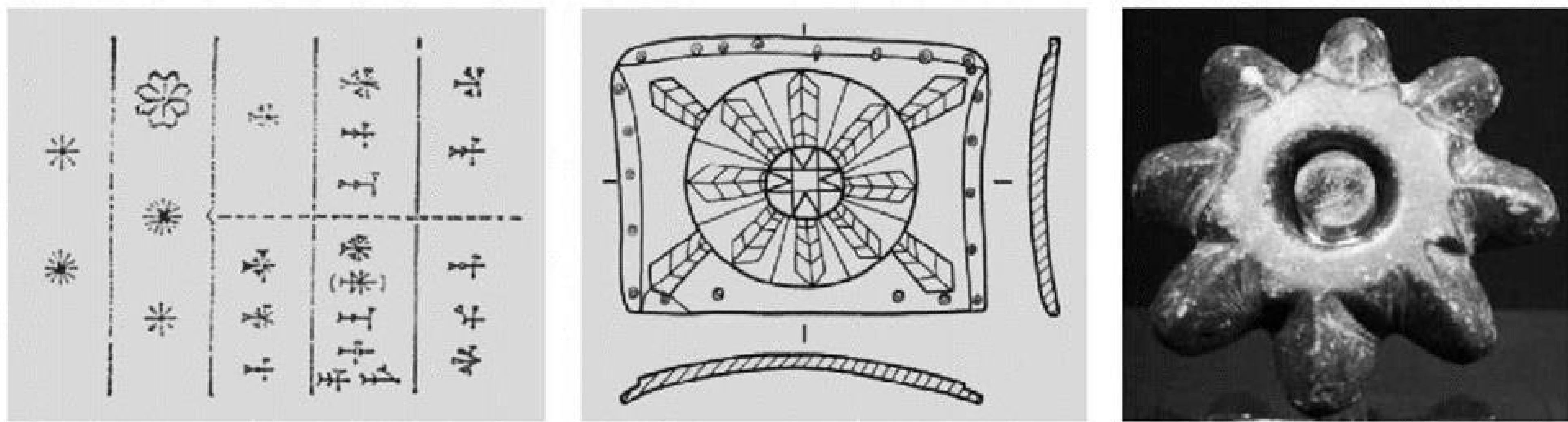

图 17－19　埃什努纳遗址出土的“祈祷者”塑像

①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彩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84 页。
②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彩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 105 页。

我们看苏美尔人的一些神，就会发现他们的神与中国易学文化先天八卦中的“数”几乎是可以相互对应的，比如：

天神（安努）就与先天八卦中的“一”（乾、天）对应；
地神（恩利尔）就与先天八卦中的“八”（坤、地）对应；
水神（埃阿）就与先天八卦中的“六”（坎、水）对应；
太阳神（沙马什）就与先天八卦中的“三”（离、太阳）对应；
月神（辛）就与先天八卦中的“二”（兑、月）对应；
女神（伊什塔尔）就与先天八卦中的“四”（巽、长女）对应。
……

我们再把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中的天［an］、神［Digin］与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具有归纳、归类意义的八卦玉版和从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七道湾子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太极八卦石器进行一下对比（组图 17－20）[①]，就可以看出这两个楔形文字都使用了形象思维的方式，这与中国最古老的八卦符号有相通之处。



组图 17－20　苏美尔与楔形文字的天与神以及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八卦玉版和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七道湾子遗址出土的八卦石器

拱玉书在《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中曾描述，在苏美尔神化《伊南娜与恩基》里，文字被视为智慧神恩基所持有的百种文明要素之一。这里所谓的“文明要素”就是苏美尔语的 me 的意译。me 十分抽象，难以捉摸，但又无处不在。西方学者一般用“神力”来翻译苏美尔语里的 me，他觉得它很像汉语里的“道”。

“道”是中国老子哲学的逻辑起点，是统领宇宙大自然的核心。“道”在

① 张敬国主编《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 19 页。

老子思想中既可以指运动的法则、变化的规律，也可以指真理，还可以指道路，他是吸收了《周易》中“太一”、“无极”的思想精髓，并结合自己的感悟将其抽象化，抽象出一种不能用语言来表述，但可从天地万物的运行中领悟的“道”的概念。

“一”在中国易学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几乎能涵盖一切。“一”是数学中最小的数，但在易学文化中它又可代表最大，作整体、统一、始点讲。中国有句名句叫“九九归一”，其哲学内涵非常丰富。

我们参图13－9、13－10及相关内容，顺着“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顺序，就能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图13－11），冲气以为和”这段话理解到易道中的“数”八［八卦、万物、根部］，理解到最高的一个境界。

那么“道”就像充满着一种“神力”的自然能量，具有难以捉摸但又无处不在的神秘特点与自然规律。这个苏美尔语的me与中国的“道”，就将苏美尔宗教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所拥有的一个令人关注的共同特点表现了出来，就是它们都不主张有什么极乐和永恒的后世，都是在共同关注、崇拜着那些自然的法则、规律与能量，而不仅仅只是人格化的神。

所以说苏美尔人的宗教与中国易学文化的无神论也就有了共通之处。

由于宗教在苏美尔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祭司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祭司和管理人员（这两个词往往意义相同）需要学习楔形文字（图17－21）[①]，因而神庙区内附设有学校，教授楔形文字和祭司等级需要掌握的其他知识，苏美尔的这些学校是现知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学校。



图17－21　古巴比伦时期的教学泥板，左边是老师写的范字，右边是学生临摹的字

①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162页。

六

苏美尔人的许多发明对后来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在苏美尔时代初始之际（公元前3200年左右）就发明了轮，这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突发此想的，因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伊朗轮子就已用于制陶业了，并在大约500年后由伊朗传入苏美尔。

苏美尔人将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分60秒的计时系统。他们也是最早纪录天文学现象的人，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时间，于是他们也设置了闰年的办法。明白了这样的自然法则与规律，他们就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引入了密集的农业。

苏美尔人将一年分为12个月的历法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龙一样的周而复始的十二平均律和十二地支有相通之处。从专家用测音频谱仪对贾湖文化遗址发掘出的中期（公元前6600～前6200年）的282号墓20号七孔骨笛（图17－22）的实际测音来看，音阶变化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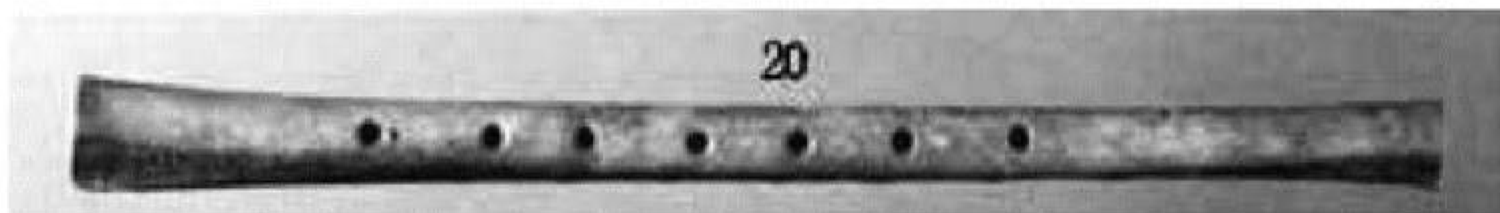


图17－22　282号墓20号骨笛

1　2　3　5　6　$^{b}7$　$\dot{1}$（主音：D6）。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黄钟
音分值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 宫　2 商　3 角　5 徵　6 羽　$^{b}7$ 变宫　$\dot{1}$ 宫

200　200　300　200　100　200

20号七孔骨笛从1到$\dot{1}$刚好是1200音分，如果我们把100音分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音韵学的这个太极单元中，十二平

均律的系统就产生了，相应的在一年的历法这个太极单元中，一年12个月的系统就产生了。

这是因为在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中国智慧的古人把所有的太极单元之间都看作具有着一个共同的关系，就是大太极与小太极都具有共同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所以他们把周而复始的十二律吕、十二个月、十二个时辰等系统，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吕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季节	仲冬	季冬	孟春	仲春	季春	孟夏	仲夏	季夏	孟秋	仲秋	季秋	孟冬
月份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在中国的贾湖时代有用于表达十二吕律、十二个月（12个月中二十四节气的每个节和气都与50［一个太极、大衍之数］音分值相对应）、十二个时辰的系统文字，但从贾湖骨笛的实际测音来看，这些概念、词汇却以“数”的形式，确实已经存在于那个时代了，所以笔者才敢用这些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观念、词汇来表达描述。

同时，这个十二平均律的系统概念非常重要，它既关系到星占学体系的建立，也关系到了天文学体系的建立（其中一项就是将一年的历法可分为12个月）。天文学与星占学在开始时又是密不可分的同一个体系，而任何一个民族文明的开始产生，最先都离不开天文学和历法。

七

1880年，法国人在铁罗的发掘过程中，首次大批出土了苏美尔语文献和苏美尔人的艺术品，使苏美尔人建立的、早已从历史舞台上和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王朝——拉格什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465年）、赫拉格什第二王朝（古地亚王朝）又活生生地再现在人们面前。

从铁罗出土的一件文物（图17－23）[①]，上面楔形文字铭文分布在一个圆周的24个等分之内，笔者怀疑到，这24个等分内的表意符号是否与黄道带上的星座或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二十四山、二十四节气系统有关呢？这有待于这

①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38页。

方面的文字专家解读之后，最后才能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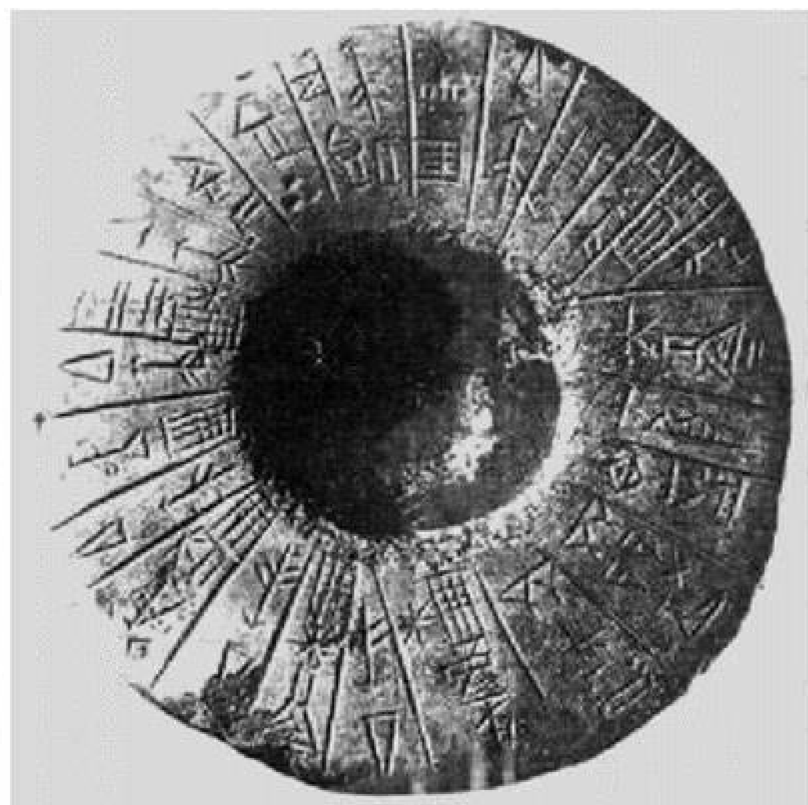


图 17－23　出土于铁罗的楔形文字铭文

第二节　古巴比伦文明与易学文化

一

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苏美尔文明从发端直到约公元前 2900 年，通常都被称为“史前史”。从公元前 2900 年开始，则称为“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2370 年，萨尔贡一世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阿卡德王朝，一直持续到约公元前 2230 年而亡。

文化相对落后的阿卡德人吸收了苏美尔人的宗教之神、楔形文学、苏美尔语中的许多词汇，以及泥版和芦苇等书写工具。他们用苏美尔文写记阿卡德语，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其中就包括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文献。

在阿卡德王朝灭亡之后，又经历了一段异族入侵的混乱时期，随后苏美尔人又有了一次短暂的复兴，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 2100 ~ 前 2000 年），乌尔城成为整个帝国的首都。

接下来“巴比伦”之名正式正式登场了，“巴比伦”在阿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原为一城邦，后来成为了“古巴比伦王朝”的王都，遗址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 90 公里处。

古巴比伦王朝的第六位帝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汉谟拉比（图 17－25，约公元前 1792 年 ~ 前 1750 年）大帝，统一了两河流域的中、南部地区，并实行

中央集权统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维护私有制度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颁布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典》，镌刻在一根高 2.25 米，上周长 1.65 米，底部周长 1.90 米的黑色玄武岩柱上（现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内）。《法典》使汉谟拉比名垂千古，汉谟拉比则使巴比伦的名声传遍四方。



图 17－24　汉谟拉比石柱上端



图 17－25　汉谟拉比像

汉谟拉比法典（图 17－24）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 282 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保护私产、租佃、债务、高利贷和婚姻家庭等内容共 3500 行，是汉谟拉比为了向神明显示自己的功绩而纂集的。

在汉谟拉比法典序言中镌刻着："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者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照临黔首，光耀大地。"

从汉谟拉比法典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谟拉比用政教合一的形式，借用安努（天神）、恩利尔（地神）、和沙马什（太阳神）的名义，或将自己比作安努（天神）、恩利尔（地神）、和沙马什（太阳神）在统治人们，这说明当时宗教中的诸神和星占学在当地几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中都占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

从安努之坐像（图 17－26）[①] 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图中上方的安努（天神）有 12 个分叉，这 12 个分叉中有 6 个是锐角的形状，有 6 个是平钝角的形状。这是因为古巴比伦人也同样将一年的天时分为 12 个月，这就如同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周天黄道上的十二宫或 12 个地支，其中的子、寅、辰、午、申、戌这 6 个地支属阳，具有锐的性质，而丑、卯、巳、未、酉、亥这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19 页。

6个地支属阴，具有平钝的性质。

我们再看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中的天［an］和神［Digin］（图17－27），其中最左边一行下方的天和神字就是12个分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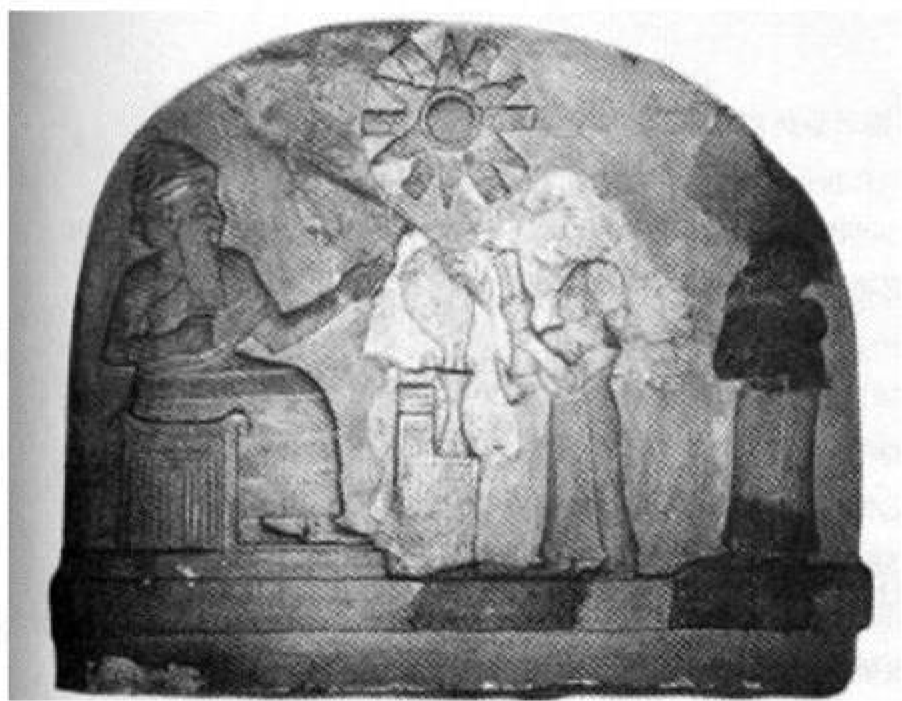


图17－26　安努之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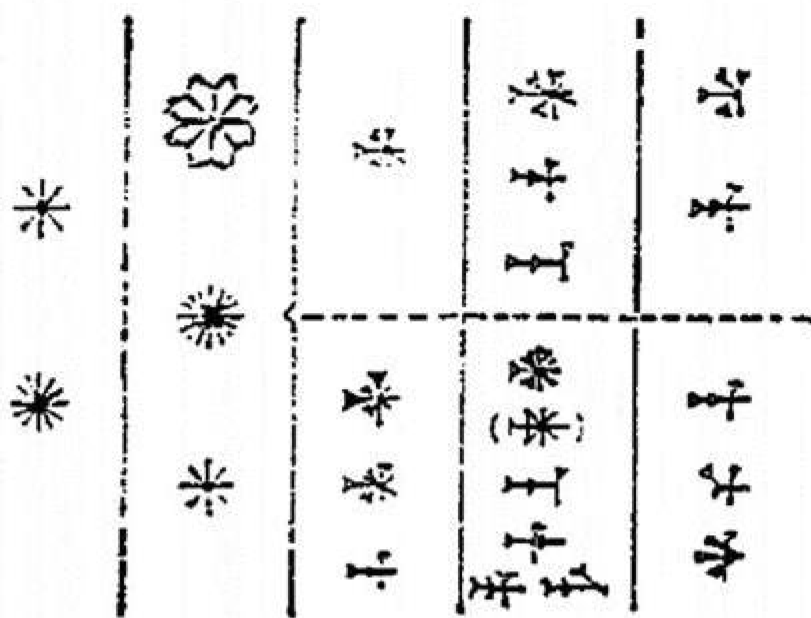


图17－27　苏美尔与楔形文字的天［an］与神［Digin］

这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是相通的。

巴比伦王国持续至公元前1531年，此后美索不达米亚一度处于卡西特人的统治之下。此时亚述人已经崛起，不久就成为了巴比伦新的主人，在两河流域地区开始了长达近千年的"亚述帝国时期"。

从图17－28的古老泥板上以及自巴比伦至卡西特时期①（图17－29、公元前1202～前1188年）的石灰石雕像中的顶部可以看出来，雕刻有月亮神辛、太阳神沙玛什和金星女神伊什塔尔，太阳神沙玛什也被雕刻成了类似八卦符号的形象。

这说明苏美尔人或卡西特人的文明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有相通之处。

亚述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名王亚述巴尼拔是星占学的热烈支持者，他在帝国首都尼尼微建立起王家图书馆，里面除了当时巴比伦、埃及等星占学家提供的各种星占学文献之外，还有医学、数学、地理、历史、巫术等方面的大量书籍。19世纪中叶，英国考古学家在这座图书馆遗址中发掘出泥版文书两万余块。

转眼到了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的末日来临，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公元前611～前539年）。由于这一王朝是由苏美尔—阿卡德故地的迦勒底人所建，故又得名"迦勒底王朝"。

---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18页。



图 17－28　现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刻有黄道带星座的泥板



图 17－29　巴比伦至卡西特时期的石灰石雕像

迦勒底人的星占学和天文学后世在欧洲非常有名，因为这个短短的王朝是星占学家大放异彩的时代，“迦勒底人”后来在西方人笔下成了“星占学家”的同义词。

强盛的迦勒底王朝也只是昙花一现，两河流域地区不久又处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公元前 539～前 332 年）。随着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崛起和他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征，庞大的波斯帝国又在转瞬间土崩瓦解，公元前 331 年他胜利进入巴比伦，这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希腊化”时代的开始。

亚历山大逝世后，他那由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也归于分裂，一些重要的将领据地称王，建立起独立的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塞琉古一世创建的塞琉古王朝（公元前 312～前 64 年，又称叙利亚王国，即中国史籍中的“条支”）统治，这是当时希腊化诸王国中版图最大的。

在塞琉古王朝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星占学特别值得注意，虽有希腊语波斯的长期统治，但是巴比伦—亚述文明作为一种较高的文化成分，依然继续存在并对周边产生着很大的影响。近百年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在塞琉古王朝时期，有一个高度发达、令现代人惊叹不已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当然它的起源和形式还要更早得多。现今已发现的巴比伦星占学——

天文学原始文献（泥版文书）绝大部分属于这一时期。

之所以要发展这些数理天文学体系，是因为星占学分析活动中的逻辑关系就存在于这种体系之中。正是在塞琉古王朝时期，随着异族统治带来的多种文明的撞击和交融，作为星占学家的迦勒底人将“迦勒底星占学”广泛传播到中东和欧洲各地，在西方科学史上，这属于非常重要的“希腊化时期”。

这说明，不管是人类文明的产生，还是人类将文明进行本土的转化，首先都要必须具有识别天象的能力，建立起一个天文学体系，而这个天文学体系与星占学又是密不可分的。

尽管统治阶级利用星占学的知识是更多在关心自己的政治、统治与文化、精神生活，而处在中低层的人们利用星占学的知识，却是更多地在关心自己的命运变化，这就使得星占学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空间，谁都无法改变。

二

所有著述世界文明的人都说过，苏美尔人是最早纪录天文学现象的人，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 12 个月，其中有 6 个月各为 30 天，另 6 个月各为 29 天，全年共 354 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 11 天多时间，于是他们也设置了闰年的办法。

这就有了一个疑问，今天两河流域的气候和自然条件非常差，气候干燥，土壤裸露，沙丘遍野，而且与所有的荒漠地区一样，降水稀少且温差较大。比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全年降水量平均为 156 毫米左右，六月至九月为零；夏季气温高达 50 摄氏度以上，而冬季气温最冷才可下降到 0 摄氏度左右。

虽然地理学家拉姆认为，在冰河后期最暖的时段，地中海附近大部分地区是气候干旱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西南季风的扩张和季风雨的滋润，在北纬 34 度到 35 度的伊拉克北部却存在着湿润的气候。就是说地质学们以及环境变迁的研究提出了创见性的论断：在距今 6000 年至 4000 年时，两河流域存在着湿润而不是干旱的气候。

但笔者认为，即使现在与那时相比，两河流域的气候是会发生一些变化，但那时两河流域气候变化的四季自然景观也不会像中国的中原地区一样呈现出春、夏、秋、冬那么明显的变化。而中国中原地区的古人对天时的观察，却是建立在明显的四季变化上的，这是自然环境与自然条件所致。中国中原地区夏季的酷暑与冬季的冰雪，能形成一年当中气候上巨大的反差，而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一年长时间的酷暑与短时间雨季却形不成这样巨大的反差。即使在距今 6000 年

至4000年时，两河流域存在着湿润而不是干旱的气候，冬天也只能是雨水，而不会是冰雪；也不会有小雪与大雪、小寒与大寒这样的自然景观现象；更不会有惊蛰时期，天上隆隆的滚雷会将地下蛰伏着冬眠的万物能够惊醒的自然景观现象。

这样，中国中原地区智慧的古人就会发现，大自然中动物、昆虫、植物所处的生长环境和状态，每一年都会按春、夏、秋、冬的规律，非常自然、均匀地分布在12个月中，像龙一样的进行着轮回、循环地变化，并呈现出春生、夏停、秋收、冬藏的四种状态。按照十二进制的方式，到了下一年又会像龙一样的重复进行12个月的轮回、循环变化，又会重复进行春、夏、秋、冬的轮回、循环变化。

另外，中国中原地区智慧的古人对每一年12个月的划分，与十二平均律的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舞阳贾湖遗址中期（公元前6600～前6200年左右）M282号墓出土的两支骨管（20号、21号）可以吹奏出的音阶变化上就可以看出，十二平均律以十二进位的方式在距今约8600～前8200年时期，就已经被中国智慧的古人应用了。

十二吕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六吕		○		○		○		○		○		○
六律	●		●		●		●		●		●	

中国音乐的律名是建立在哲学、美学基础上的，并与历法、数学、度量衡等许多方面紧密的联系着。

这样，中国智慧的远古智人，就把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十二律吕与四季的十二个月、昼夜的十二个时辰周而复始联系在了一起，又基本上是间隔均匀的，按照十二进位的方式，像龙一样的重复进行着12个“数”的轮回、循环。

吕律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季节	仲冬	季冬	孟春	仲春	季春	孟夏	仲夏	季夏	孟秋	仲秋	季秋	孟冬
月份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时辰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古巴比伦的月份是这样排列的：

1月：尼萨奴（Nisan）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卯二月中旬至辰三月中旬。

2月：伊亚尔（Iyyar）相当于中国农历的辰三月中旬至巳四月中旬。

3月：西马奴（Siman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巳四月中旬至午五月中旬。

4月：杜乌朱（Duuz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午五月中旬至未六月中旬。

5月：阿布（Ab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未六月中旬至申七月中旬。

6月：乌鲁鲁（Ulul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申七月中旬至酉八月中旬。

7月：提什瑞图（Tisrit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酉八月中旬至戌九月中旬。

8月：阿拉散奴（Arah - samn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戌九月中旬至亥十月中旬。

9月：基斯里穆（Kislim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亥十月中旬至子十一月中旬。

10月：台贝图（Tebet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子十一月中旬至丑十二月中旬。

11月：沙巴图（Sabatt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丑十二月中旬至寅一月中旬。

12月：阿达加（Addaru）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寅一月中旬至卯二月中旬。

这些月份的名称来源于阿卡德人的塞姆语，但所用的符号却是苏美尔人的楔形符号。这种以阿卡德语发音读苏美尔人月份符号的方法一直被延续，直到楔形文字死亡。

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古巴比伦人把进入每一个月的时间完全定在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每个月的中气时间上，每一个月的时间长度是中国易学文化中此月中气加上下个月节的时间长度，而没有转折点（就是中国易学文化中节气中的节），而节点在中国易学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相当于人体骨骼的关节点。

不可否认，古巴比伦人是最早对星象命名的国家，因为他们使用苏美尔人的系统楔形文字就比我们中国的甲骨文早。虽然他们有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可以记录，但他们划分黄道十二宫的星座、月份与日子却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天学部分相通。比如：

1月：尼萨奴（Nisan，白羊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春分—清明”时期。

2月：伊亚尔（Iyyar，金牛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谷雨—立夏”时期。

3月：西马奴（Simanu，双子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小满—芒种”时期。

4月：杜乌朱（Duuzu，巨蟹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夏至—小暑”时期。

5月：阿布（Abu，狮子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大暑—立秋”时期。

6 月：乌鲁鲁（Ululu，室女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处暑—白露”时期。

7 月：提什瑞图（Tisritu，天秤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秋分—寒露”时期。

8 月：阿拉散奴（Arah - samnu，天蝎之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霜降—立冬”时期。

9 月：基斯里穆（Kislimu，人马之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小雪—大雪”时期。

10 月：台贝图（Tebetu，魔羯之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冬至—小寒”时期。

11 月：沙巴图（Sabattu，宝瓶之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大寒—立春”时期。

12 月：阿达加（Addaru，双鱼之月），对应中国二十四节气的“雨水—惊蛰”时期。

古巴比伦人将地球大自然中的天时春分点作为起算点，算作每年一月的开始。然而周天上的黄道十二宫则是人们定义的，亘古不变。这样古巴比伦人以春分点为起算点，每一宫对应每一月占据约 30 度的宽度，就可以把 360 度的周天分为 12 个等份、12 个月了。

三

前面笔者说过，在公元前 3500 年时，苏美尔人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依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成功地开掘了沟渠，建立了复杂的农业灌溉网，从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第一个文明，所以说苏美尔文明与中国黄淮流域的中原文明一样，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两河流域在远古时期流行对自然神力的崇拜，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无神论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当汉谟拉比六世统一两河流域后，原有苏美尔各城的神地位降低，巴比伦的主神马尔都克却逐渐达到了独尊的地位。这是由于巴比伦的祭司编造出马尔都克创造世界的神话，从而为了达到论证底下诸城市皆须服从巴比伦，也论证神授的巴比伦王权至上的目的。

马尔都克本来是两河流域民间的农业神，但是一经统治阶级利用，就摇身一变成为了战神，为“伟大的统治者”，为“天与地的君主”，天上的神

祇和人间两河流域的统治者汉谟拉比六世成为互相表里的一体。这也充分说明苏美尔文明与中国黄淮流域的中原文明一样，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关于小麦的起源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只留下“人类最古的粮食”、“神下凡的时候留给人间的粮食”这样的说法，这似乎让我们相信小麦是和人类一起诞生的粮食。

为了探索小麦的起源，综合地理学、植物学、考古学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普遍认为小麦大约公元前15000～前10000年起源于亚洲西南部。

从地理学来看，占全世界栽培小麦90%以上的普通小麦主要是集中在从阿富汗到高加索地区。其根据不仅是因为这些地区形成了遗传因子的中心地，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古代连接欧洲及亚洲的陆地。

从植物学来看，以小麦的构成为基准，它属于禾本科，因而小麦所有的特征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便是麦穗结果的粒数，麦穗结果的粒数是决定小麦数量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决定了现在占全世界栽培小麦90%的普通小麦主要的分布地。

最后根据考古学研究结果，在6700年前的伊拉克遗址中发现了和现在小麦特性差不多的古代小麦，同时，通过综合观察研究埃及5000～6000年前几处遗址的小麦及瑞士遗址还有尼罗河古墓变化等各种事例来看，推测小麦的起源应该是在公元前15000～前10000年左右，起源于伊拉克和伊朗的两河流域。

在我国春小麦的播种期在4月初（中国农历的春分期间）左右。春小麦苗期，地上部分生长最适宜的土壤墒情中的温度为20℃～24℃，后期为12℃～16℃，8℃以下或32℃以上很少抽穗。在我国北方许多地区特别是在寒冷地区，许多地区都开展冬麦北移的研究，改种春麦为冬麦。

根据两河流域的气候温度比我国中原地区同期的气候温度要略高一些，以及小麦野生种原来都是春性的特征（冬小麦品种是后来经过人类选择、改良、培育的），春分在两河流域地区正是春小麦的播种期，说明他们将春分点作为一年的开始与农作物小麦的播种、生长也是有关系的。

根据太阳的视运动，当初古巴比伦人观察一月这个时候的天象，太阳的视运动行到白羊座时，恰好对应着中国易学文化中天学历法中二十四节气的春分点，这说明古巴比伦人的黄道十二宫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十二地支也是对应的。

春分是中国历法二十四节气中的词汇，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

的天学历法中，表示这天是阴历卯二月节气中的中气是最足的一天。在中国易学文化中，春分、秋分是天学昼夜时空中的阴阳分界点，也是天地阴阳和谐的平衡点，就是说这两天地球上任何一点，白昼与黑夜的时间都基本上是相等的。所以他们人为地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里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点，作为每一年的开始，与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天地人和的理想效果有共通之处。

远古的中国是把立春作为每一年的开始，古埃及却是把尼罗河泛滥与天狼星偕同日出同时发生的这一天（大致在夏至这一天左右）作为每一年的开始，这被称为是“三合一新年”。

这也说明古巴比伦人的历法思想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里的天地、阴阳、平衡、和谐的系统知识和观念有相通之处。

四

古巴比伦人把黄道所经过的那片环状天区被称为黄道带，本意是“兽带（zodiac）”，这可能是较为后出的名称。这个概念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在巴比伦人那里出现了。在约成于公元前700年的星占学文献《纲要》（MUL. APIN）中，黄道带被称为“月道”（the path of the moon）；沿月道排列的星座那时有18个，如下表①：

《纲要》说这18星座“沿月道排列”，其实只能是大致如此——按照现代仍在使用的西方星座对天区的划分，黄道并不经过第11～18各星座，它们只是位于月道附近而已。最末的一个，“北鱼座”，早已不使用。而后来定型的黄道十二宫中，金牛（Taurus）和巨蟹（Cancer）却未在《纲要》中出现。

巴比伦名称	拉丁名称	中译名
hunga	Aries	白羊座
mastabba－galgal	Gemini	双子座
ur－gul－la	Leo	狮子座
ab－sin	Virgo	室女座
zibanitu	Libra	天秤座
gir－tab	Scorpius	天蝎座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24页。

续表

巴比伦名称	拉丁名称	中译名
PA－BIL－SAG	Sagittarius	人马座
suhur－mas	Capricornus	摩羯座
Gu，an－na	Apuarius	宝瓶座
zibbati	Pisces	双鱼座
zappu	Pleiades	昴星团
Gu，an－na	Hyades	毕星团
Sib－zi－an－na	Qrion	猎户座
Sugi	Perseus	英仙座
gamlu	Aurige	御夫座
la，lul	Praesepe	鬼星团
sim，mah	Piscis Austrinus	南鱼座
aninitum		北鱼座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黄道十二宫体系实际上是古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三方共同创造完成的。比如，象征白羊宫的公羊形象，就来源于埃及；而金牛宫的公牛则是巴比伦的，巴比伦人称之为戈特·安（Gud. anan）；狮子宫的形象则又是埃及人的贡献，这个星座在巴比伦人那里称为大犬（Great Dog）。还有一些星座是双方共有的，比如双子宫的双星。至于巨蟹宫的蟹，本来是巴比伦人的，然而埃及人则有与之对应的双龟形象，后来这又被希腊人继承过去，有人甚至认为这可能还是古代中国“四灵”中“玄武”（龟蛇）的来源。

当初巴比伦星占学家提出黄道诸宫的概念，并最终确立黄道十二宫体系时，沿黄道的十二星座正与他们所定义的黄道十二宫一一对应，所以才取了这些星座名称来代表各宫。以后因岁差的作用，星群逐渐向西退移，诸星的黄经值也已大大改变。比如，今日的春分点早已不在白羊座内（尽管仍用白羊的符号来表示）而是移到了双鱼座。

D. 帕克（D. Parker）与 J. 帕克（j. Parker）二人曾将黄道十二宫体系流行到世界各地后所出现的多种符号名称加以比较，包括巴比伦、印度、希腊、中国的以及梵文和拉丁文名称。他们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当成黄道十二宫的对应物（每宫两气），随着从天文学原理上来也不算大谬，因为从本质上说这两者都是以太阳周年视运动在黄道上所走过的路径为基准的，况且古巴比伦人也早有类似的认识，比如在一块公元前 12 世纪的尼布甲尼撒一世纪念石柱上，就有以公牛（金牛宫）和蝎（天蝎宫）代表春与秋的内容。

从18星座演变为十二宫，究竟完成于何时，学者迄今无法确定。能够明确的只有如下几点：18星座的月道直到公元前6世纪~前3世纪期间仍在使用；十二宫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已用于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以用于埃及；然后十二宫体系直到公元元年时仍未最后定型。

在目前学术界泛东学西来的环境氛围影响之下，许多学者都认为，二十四节气与星占学并无关系；而我们只要把十二宫中的星座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出，黄道十二宫体系的产生和确立与星占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内容还可以通过中国最伟大的经典之作《周易》可以看到。

古巴比伦人的黄道十二宫，不但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二十四节气系统是对应的，而且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十二地支系统也是对应的，只不过是每个宫位会有中国24个节气中的一节和一气（对应两个地支），例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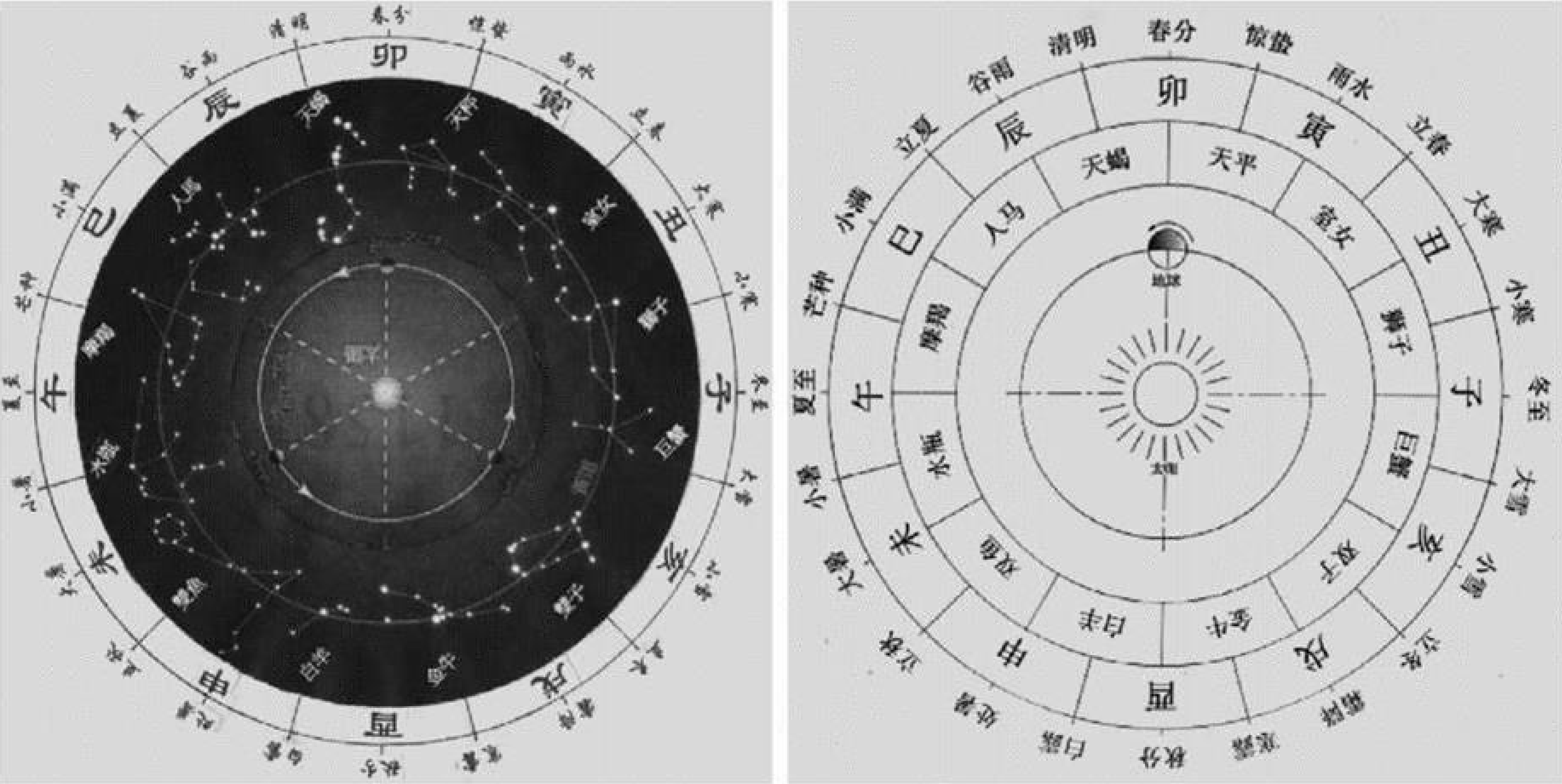
黄道十二宫	十二地支	二十四节气	黄道十二宫	十二地支	二十四节气
白羊宫	申－酉	春分－清明	天秤宫	寅－卯	秋分－寒露
金牛宫	酉－戌	谷雨－立夏	天蝎宫	卯－辰	霜降－立冬
双子宫	戌－亥	小满－芒种	人马宫	辰－巳	小雪－大雪
巨蟹宫	亥－子	夏至－小暑	摩羯宫	巳－午	冬至－小寒
狮子宫	子－丑	大暑－立秋	宝瓶宫	午－未	大寒－立春
室女宫	丑－寅	处暑－白露	双鱼宫	未－申	雨水－惊蛰

如组图17－30所示，地球进入一月（尼萨奴［Nisan］、白羊之月）时，对应中国易学文化历法二十四节气的“春分—清明”这段时间，实际就是太阳的视运动正处在周天黄道的酉位（快出白羊座了），这时黄昏以后的南天黄道带上的卯、辰位会呈现出天蝎座星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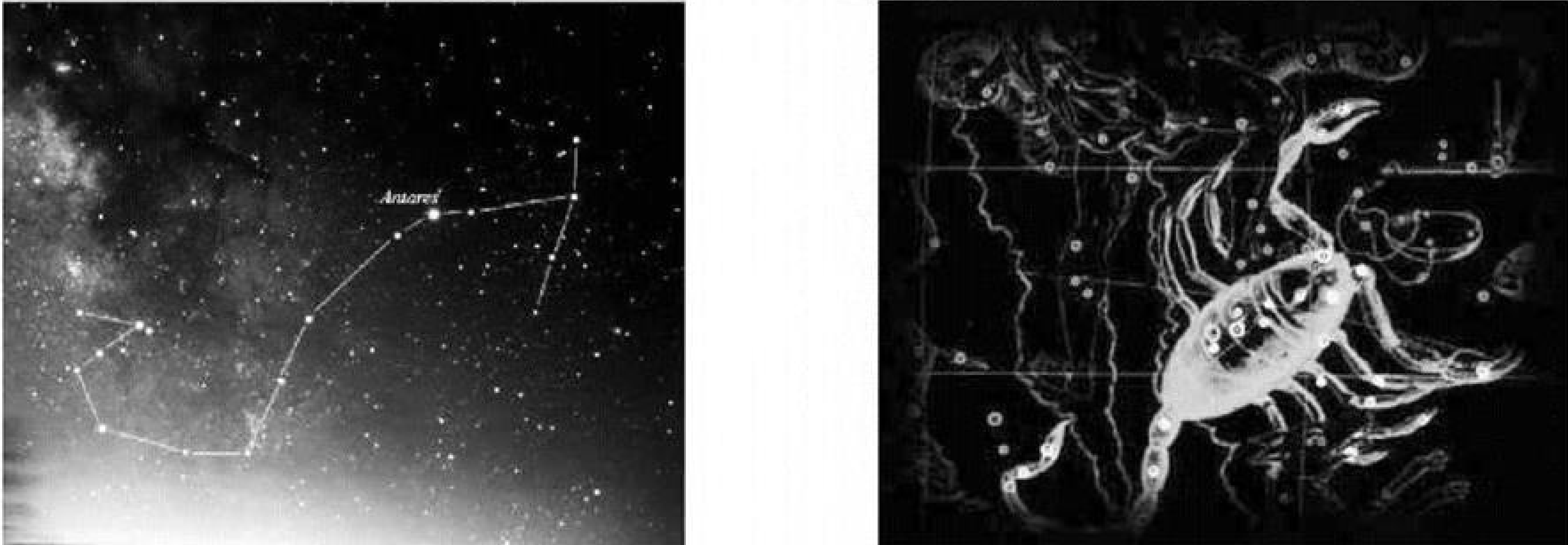
从组图17－31、组图17－32我们可以看出古巴比伦人组成天蝎座的十五颗星，也是形象思维的结果，与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东方青龙的房、心、尾宿的十五颗星构成的结果是一致的。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古巴比伦人的思维与中国文化中“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和“在天成像，在地成形”以及形象思维的模式有相通。只不过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里历法十二个月中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上更加突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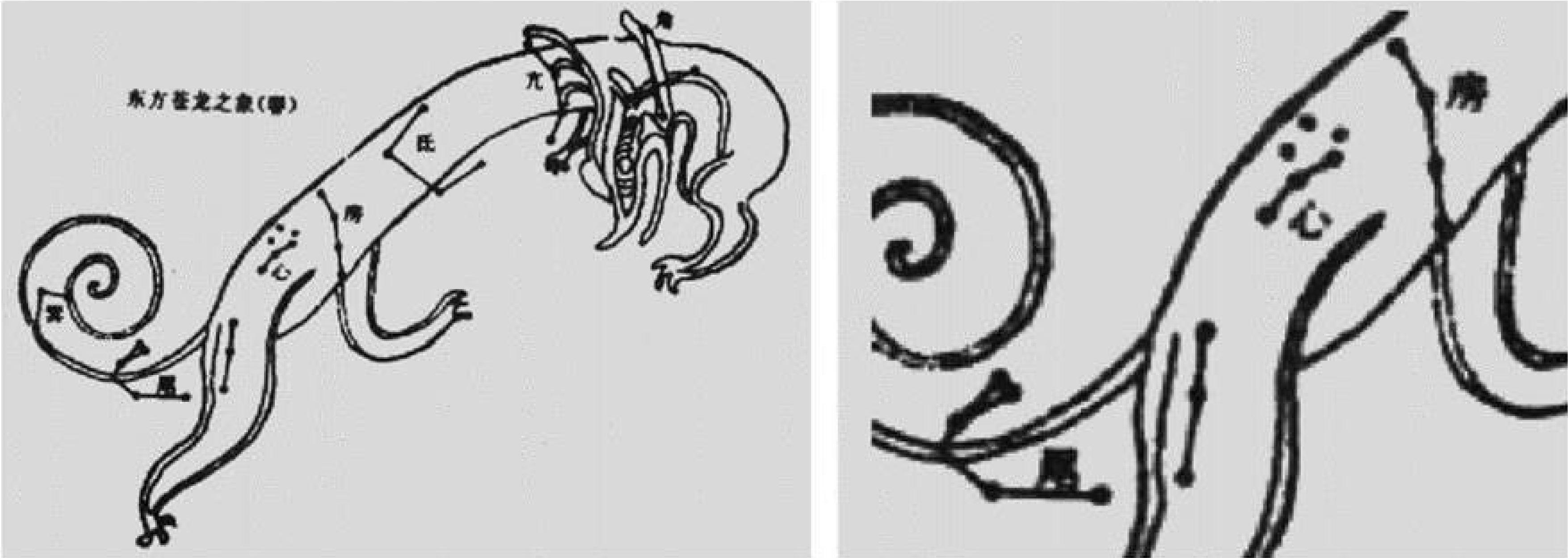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28页。



组图 17－30　周天黄道带上的十二宫与十二地支



组图 17－31　天蝎座星象图



组图 17－32　东方青龙中的房、心、尾宿星象图

节与气、气与候的意义，而在古巴比伦文化中历法里的 12 个星座之月的名称上却更加突出了天文与天象的意义。从这我们就能看出中西方文化的一点差别。

在中国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 M45 发掘出的那具年代距今约 6460 ± 135 年尸骨，旁边还摆有用蚌壳龙虎图案以及在位居 45 号墓最南端发掘出的第三组蚌塑龙与虎的形象（组图 3 – 7、图 3 – 8），就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龙的内涵逼真地表现了出来。

这些蚌塑的龙虎形象，就是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青龙代表东方、春天，白虎代表西方、秋天的概念。那组龙虎相背、运动左旋的形态，也同样表现出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天体、东西、春秋在旋转、轮回、运动、变化的系统概念与状态。

在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历法里，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传统的四季划分方法，主要强调了四季的天文意义，是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作为四季的始点，以春秋的二分日和冬夏的二至日作为中点的。而且中原大地上万物的生长也符合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随着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如春季就以立春为始点，太阳黄经为 315°，以春分为中点，以立夏为终点，太阳黄经变为 45°，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了 90°。

西方文化中历法里四季的划分则更强调四季的气候意义，前面说过这主要是受两河流域气候的特征而制定的，是以春秋的二分日和冬夏的二至日作为四季的起始点的，如春季以春分为起始点，以夏至为终止点。这种四季比中国划分的四季分别迟了一个半月（图 17 –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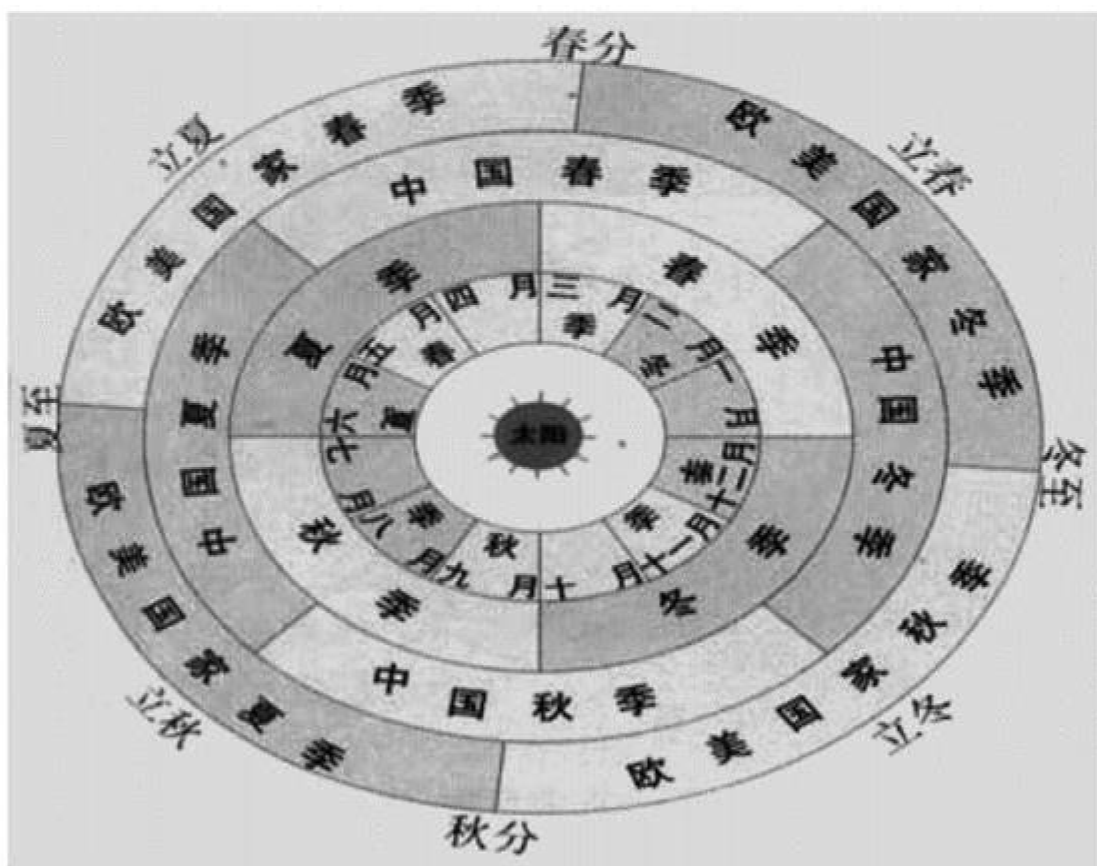


图 17 – 33

从天文意义上讲，中国智慧的古人以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界限来划分四季则更为科学。春分、秋分这两个二分日，全球各地昼夜长短和太阳高度都等于全年的平均值，具有从极大值（或极小值）向极小值（或极大值）

过渡的典型特征。

因此，把春分作为春季的中点和把秋分作为秋季的中点是非常合理的。夏季里昼长夜短，太阳高度最大的是夏至那一天，该日地表获得太阳能量是最多的。所以，夏至作为夏季的中点也是很合理的。同理，冬至作为冬季的中点也是很科学的，它们的确定对于中国古代这个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社会来说，符合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

这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四季的认识、区分、规定上，也就出现了时间上的差别，（图 17－33）中由内向外的第一圈为公历或阳历 12 月、第二圈为原则上的四季。

通过考古发现，舞阳贾湖的先民能在 8000 多年前就具有了将野生稻逐渐驯化为栽培稻的能力，按逻辑推理，说明贾湖先民在那时就能严格遵循大自然的节气规律，进行农业的优化育种了。同时也说明，贾湖先民那时就已经总结出了历法系统，并掌握了节气的系统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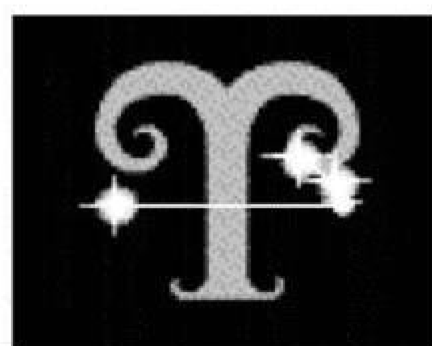
舞阳与濮阳的直线距离不过 200 多公里，又都是农业生产之地，那么这种历法中的节气知识，濮阳的西水坡人肯定也是知道的。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本身就包括天学（天文学或天象学）和历法知识。青龙对应“四象”中的春天，也对应在春天仲春之气（春分）黄昏时，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会出现天体黄道上的“龙星”，所谓“龙星”就是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组成的东方青龙，是古人的形象思维将几组星宿进行了形象的组合，表示万物在春天皆开始了生命的希望。

巴比伦历的新年第一天，为年尼萨奴（一月/白羊之月）的第一天，这一天始于日落之后、新月出现的黄昏，这是因为黄昏之后，才能看得见星象。每昼夜分为四个部分：黄昏、午夜、中午、午后。他们的计时单位为 Kasbu（每 Kasbu 等于 2 小时），与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时辰（每个时辰等于 2 小时）也是一样的，采用的也是 12 进位。

另外，黄道带上十二宫中的许多星座都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有相通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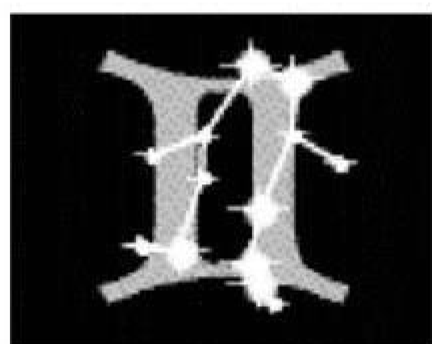
古巴比伦人当初对黄道 12 宫上 12 座星象的确定，包括代表这些星座的符号设计（组图 17－34）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法也有相通之处，只不过中国人叫相［象］。例如，古巴比伦人相信天相是人生吉凶的征兆，有专门的祭司观察星象，预告凶吉，称作占星术。但他们的占星术却缺乏阴阳、五行理论上的系统逻辑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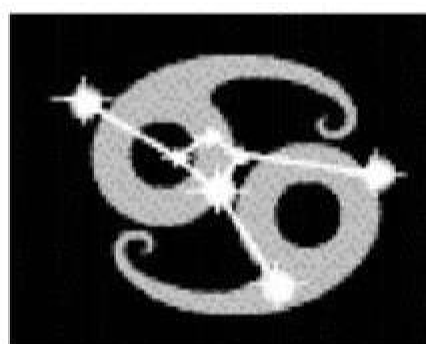

白羊座




金牛座




双子座




巨蟹座




狮子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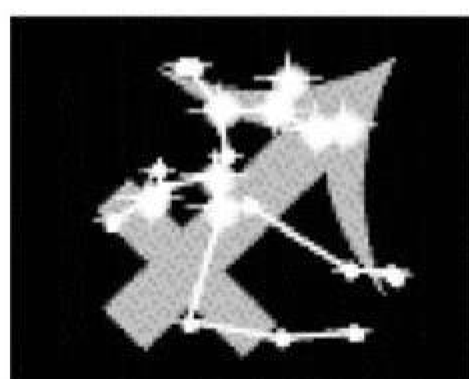

室女座




天秤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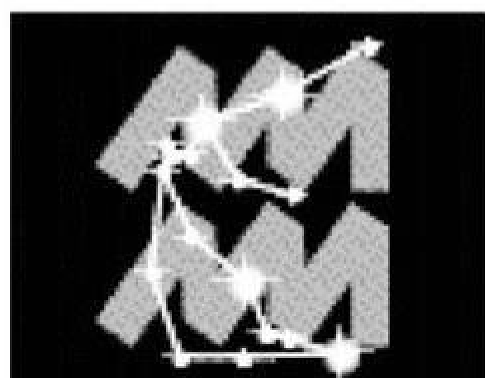

天蝎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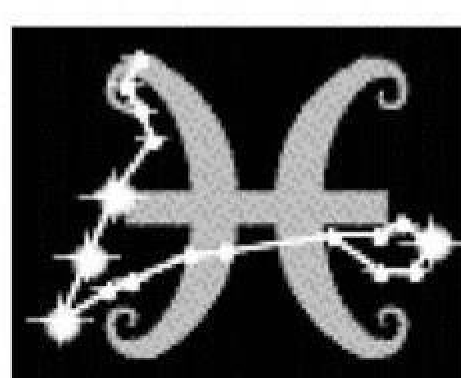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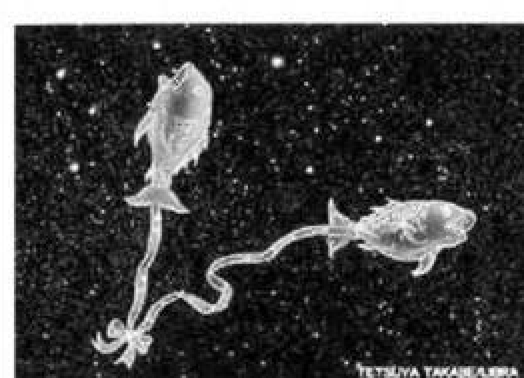

人马座




摩羯座




水瓶座

双鱼座

组图 17－34

五

三宫一体与五大行星的关系

在古巴比伦的星占学体系中，行星的“过宫”，即从黄道十二宫的某一宫进入下一宫，只是具有星占学上的重要意义，而没有其他意义。就是说五大行星依照某种理论（比如根据各星的性质、特点、大小等）排成序列，让它们依次“统治”各宫中的一定位置。巴比伦星占学采用的序列有两种。较早期的一种是这样：

木　金　土　水　火

稍后一种流行于波斯—希腊化时期，系将水星与土星互换，即：

木　金　水　土　火

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学者们尚未探明，较早的那种序列构成一套“星占约定”（terms）的理论基础。在托勒密的《四书》中的，这套体系被称为“迦勒底体系”，可简述如下：

黄道上每三个相差120度的宫构成一个“三宫一体”（tripliciti），比如白羊、狮子、人马三宫就是一个“三宫一体”。在这一体的三宫中，五大行星一次统治每个宫中的4度、5度、6度、7度、8度的区域，由于恰好有：

4度+5度+6度+7度+8度=30度

30度正好填满12宫中的一宫，“统治”没有空缺。黄道十二宫共可构成4个“三宫一体”，这样五大行星依据上述早期那种序列周而复始，各自统治自己的天区，就还缺少一个“三宫一体”。为此，又将“双子—天秤—宝瓶”这个“三宫一体”一分为二，分为昼、夜两部，于是5个“三宫一体”对五大行星，恰可配齐循环一周。这可以列出一览表[①]：

迦勒底体系循环周期表

五大行星 每宫度数 三宫一体	8度	7度	6度	5度	4度
白羊-狮子-人马	木	金	土	水	火
金牛-室女-摩羯	金	土	水	火	木
双子-天秤-宝瓶［昼］	土	水	火	木	金
双子-天秤-宝瓶［夜］	水	火	木	金	土
巨蟹-天蝎-双鱼	火	木	金	土	水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30页。

迦勒底体系循环周期表中的意思是：在第一个“三宫一体”即白羊、狮子、人马这三宫中，每宫的初始 8 度，由木星统治，接下来的 7 度，由金星统治，土星则统治再往后的 6 度，如此等等，其次依次类推即得。所谓某行星统治某几度天区，当指该行星运行至这几度天区之内时，该行星的影响力最大。

有的学者认为上面这套行星星占学的理论系统，其基础是来自巴比伦的，搞得如此精致且形式化，这些学者们认为其中也可能有希腊星占学家的贡献。

巴比伦星占家在行星运动的观测和推算方面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当然是和他们的行星星占学体系的特点分不开的。要想密切掌握五大行星的过宫—它们在各个“三宫一体”中相应统治天区内的穿行，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情况，星占家们精确掌握五大行星的各种周期，这样对他们实施星占活动能够得心应手，因为巴比伦的星占家们对各种行星天象的观测及推算与“星占预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国的易学文化中，根本就没有“三宫一体”之说，如果我们把古巴比伦星占学体系十二宫中的“三宫一体”与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十二地支进行一下对比（图 17－35），就会发现他们所谓的“三宫一体”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基础理论中的“三合局”有相通之处。



图 17－35　周天黄道带上的十二宫与十二地支

在古巴比伦的星占学体系中，每一个“三宫一体”都会有两个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系统基础理论中的“三合局”，这是因为十二宫的每个宫位都占据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两个地支。比如：

“白羊—狮子—人马”会对应“申子辰三合水局”和“巳酉丑三合金局”；

“金牛—室女—摩羯”会对应“巳酉丑三合金局”和“寅午戌三合火局”；

“双子—天秤—宝瓶”会对应“寅午戌三合火局”和“亥卯未三合木局”；

“巨蟹—天蝎—双鱼”会对应“亥卯未三合木局”和“申子辰三合水局”。

从这就可以看出，四个局全部产生之后，却没法对应五星［五行］，这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把“双子—天秤—宝瓶”人为地分为了昼、夜两个部分，对应上了五星［五行］。

我们从这就可以看出，古巴比伦星占学体系中的“三宫一体”，好像只是星占家们为了纯粹的占星和算命而设立的。这样为星占学而人为设立的东西，好像与宇宙大自然的运动法则和变化规律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体现不出来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本身就具有那种特定的自然运动法则与客观变化规律。

可是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系统基础理论中，三合局里都有一颗驿马星，而且所有的驿马星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里面所包含的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字中，都是活跃的动词要素，表示事物是发展的、是运动的、是变化的。这是中国远古智慧的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三合局是在归类的特指和泛指自然界中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动态变化的。例如：

申子辰三合水局，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雨水自然形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寅午戌三合火局，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太阳运动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巳酉丑三合金局，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形成金属物质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亥卯未三合木局，其中就是在指大自然中形成湿地植被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客观规律。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系统基础理论中，每一个三合局中都有属土的五行，辰、戌、丑、未为四墓库，五行都属土，每个三合局中都有土，而且每个三合局都描述了一种自然现象，可古巴比伦星占体系中却没有五行，只有五大行星，他们的“三宫一体”也描述不出来自然现象。

另外，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系统基础理论中，还有申子、子

辰、申辰的半合局，寅午、午戌、戌寅的半合局，巳酉、酉丑、丑巳的半合局，亥卯、卯未、未亥的半合局，这些都是中国远古的古人在易学文化体系的系统基础理论中用于描述自然法则与客观规律一种合的趋势。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系统基础理论中，子时分为早［前］子时与晚［后］子时，子时五行属水，可古巴比伦的星占学体系中，却把“双子—天秤—宝瓶”人为地分为了昼、夜两个部分，这就使得古巴比伦人昼夜之间的分界点应当在双子、天秤、宝瓶这三个宫中，如果我们对照（图 17－35）后就会发现，你无论怎么找也不会在古巴比伦的星占学体系中将昼夜之间的分界点——0 点与中国的子时和冬至的时刻对应起来，反倒将两河流域与中国中原地区的自然时差给基本近似的对应了起来（如今北京与巴格达时差为 5 小时），就是说古巴比伦人昼夜之间的分界点应当在天秤座［宫］中间的位置（对应中国寅时与卯时的分界点）。这样他们一年的开始点（春分、天蝎座与天秤座之间）与一天的开始点（天秤座）就基本近似对应起来了，这两个临界点差也差的不太多。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系统基础理论中，早［前］子时与晚［后］子时的分界点——0 点，却恰恰就与冬至时刻是对应的，体现出了大自然阳升阴降、阴升阳降，阳盛阴衰、阴盛阳衰的阴阳两仪之间的交替变化。

黄道十二宫体系的建立和完备，再加上对五大行星运动状况的观测与推算也日益精密准确。当这两个要素逐渐具备时，使用算命天宫图的生辰星占学也得以诞生。

星占学与后来的算命天宫图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环节，他称之为“原始兽带星占学”。这种星占已与黄道上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预言已涉及木星在黄道宫座中的位置，或是月亮当天狼星初见之日在黄道上的位置，等等。

按照这个思路，星占学家们就在婴儿诞生时匆匆观测一下天象而做出某些预言，预知他未来一生的祸福，生辰星占学的主题就明确地浮现了出来。

这类预言虽然可以在古希腊文的著作中发现，但西方相关学者们却认为生辰星占学起源于古巴比伦迦勒底王朝时代。使用生辰星占学进行测算，出生的年、月、日是最基本的数据之一，早期的算命天宫图及其预言的形式，与后世“标准化”的形式相比，有相当的区别。

西方相关学者们认为，正是生辰星占学的发展以及排列算命天宫图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巴比伦数理天文学知识的成长。因此继迦勒底王朝之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塞琉古王朝和波斯统治时期迎来了星占学与天文学发展的辉煌时期。

小结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上溯到距今约6000多年前（约公元前43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那时苏美尔人已活动于两河流域的南端，另有一些考古发掘甚至表明这一文明能上溯到约公元前5000年，1946年开工挖掘的埃利都遗址就被认为是证据之一。可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又是起源于哪一门学问呢？这就是一个谜了。

我们从苏美尔人的文明当中发现其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有相通之处，这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吧。

| 第十八章 |

哥贝克力巨石阵遗址反映出的文化*

1994 年，一名库尔德牧羊人在土耳其东部靠近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发现了一块块矩形和平顶 T 形巨石。几周后，这一消息传到了土耳其东南部桑尼乌法（Sanliurfa）古城的博物馆馆长那里。于是他们和伊斯坦布尔的德国考古学会取得联系后，于 1994 年下半年，以德国考古研究所（DAI）研究人员克劳斯·施密特为首的考古专家来到这里，对哥贝克力山丘的这一有着非凡考古价值的遗址开始了挖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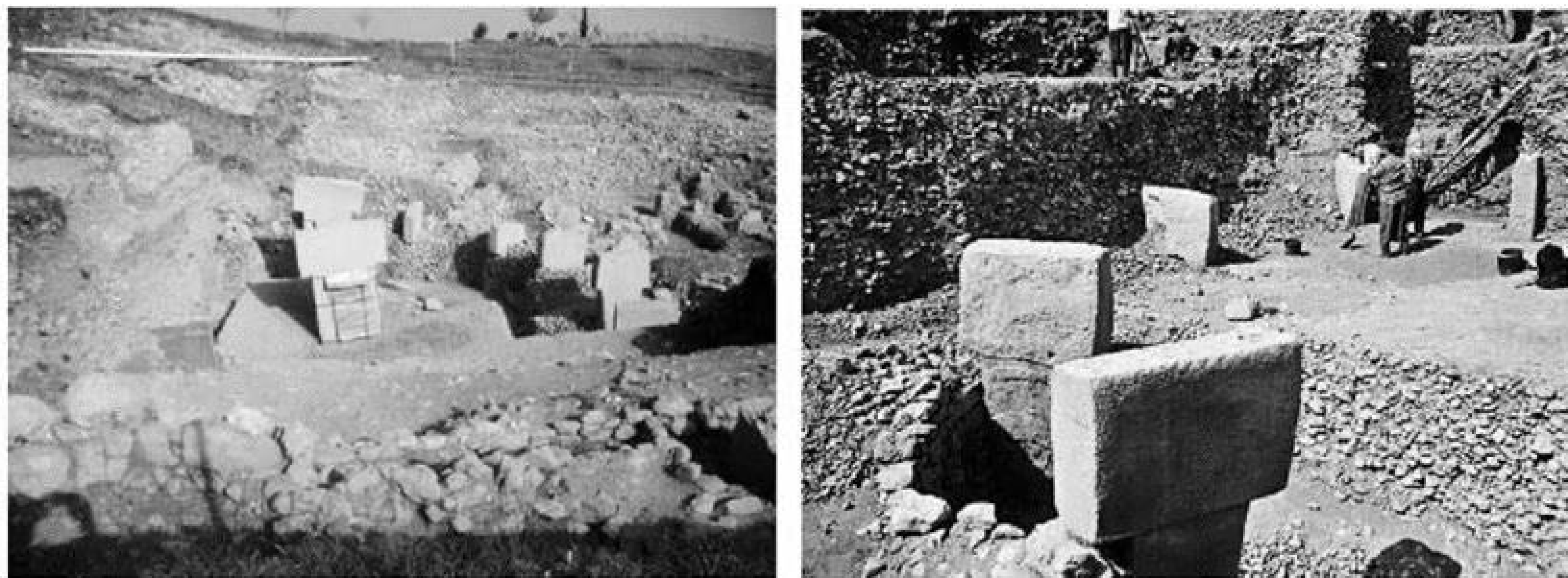
目前考古学家已挖出 45 块 T 型巨石，逐渐拼凑出几个直径为 5 到 10 码的石头圆圈，有些石柱高达 5.5 米、重达 16 吨，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刀、斧头、投射机械同时被发掘出来。这些矗立在哥贝克力山丘的巨大石柱非常引人注目、大多浮雕都充满想象，既有奇特精致的图案和纹饰，还有野猪、野鸭、狩猎和娱乐的场面，盘旋的巨蛇是一个常见的图案，有的还雕有小龙虾或狮子，而 T 形巨石形状似乎又代表着伸展双臂的人形，甚至还有风格各异的“胳膊”，从侧面沿一定角度垂下（组图 18－1、组图 18－2）。

经 ^{14}C 测定，这些遗址距今至少已有 11600 年左右的历史，西方考古专家推测甚至可能到距今 13000 年左右，这就意味着它是在公元前 1 万年前建造的。相比之下，英国的巨石阵建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埃及的金字塔建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有迹象显示，哥贝克力遗址还有更多的巨石尚未出土，为此考古学家专门透过仪器进行了勘测，确信至少还有数百个巨石尚待挖掘。

西方考古学家们感到，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们能建成哥贝克力巨石这样的

---

* 哥贝克力巨石阵遗址反映出的文化是笔者根据互联网的介绍整理出的。http：//baike. baidu. com/view/2261910. htm 和 http：//baike. soso. com/v37894047. htm 以及 http：//www. tianshannet. com. cn/edu/content/2009－03/06/content_ 3883264_ 2. htm。



组图 18－1　哥贝克力山丘的巨石阵



组图 18－2　巨石上雕刻着诡异、精细的动物

巨型建筑，改变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重新认识，它显示了在土耳其地区古老的狩猎采集生活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先进得多，那个时期的发达甚至让他们难以置信，仿佛是上帝从天堂降下来在这里建造了哥贝克力石阵，这使得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们都认为该遗址可堪称是考古领域最重要的发现。

想象一下人类在居住洞穴、靠狩猎采集为生的远古时代，何以建成了如此宏伟的建筑？这样的建筑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克劳斯·施密特估计，在数十年的建设期间，是因为大批猎人可能偶尔聚集到这里，住在用兽皮搭起的帐篷中，猎杀当地动物充饥（在哥贝克力遗址周围发现的很多燧石箭头支持了这一推论，还支持了该遗址的年代）。或许是信仰的力量推动了他们万众团结、一心建造了这样的巨石阵，又或许是信仰需要拜神，又吸引更多的人陆续聚集在了这里。但他们随后发现，常规的狩猎和采集无法养活那么多人，于是在周边地区又开始了耕作，同样这也是因为信仰才推动了农耕的生产活动。在古人聚居于此非常明显的证据中，一些令人惊异的发现也让哥贝克力遗址成为了考古圣地和充满奇幻色彩的地方。

克劳斯·施密特认为，这里就是《圣经》中提到的曾经的伊甸园

(图 18－3)，更明确地说哥贝克力遗址就是伊甸园的一座神殿。在《创世纪》中，伊甸园故事向我们讲述了在很早以前的那个时候，狩猎者和采集者能够随意从树上摘取果实，从河里捞取鱼儿，单纯的人们可以在悠闲和快乐中度过美好的时光，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有许多研习艺术、建筑和复杂的典礼仪式的时间，才创造了他们的天堂。但后来的人们却掉入了农耕劳作和苦活不断的生活之中。哥贝克力巨石阵的这个考古证据，使我们知道了伊甸园的变化以及与相对轻松的狩猎相比，原始耕作显得更加辛苦的原因。



图 18－3 《圣经》中的伊甸园

还有很多历史证据显示，《圣经》的作者们在谈论伊甸园的时候的确描述了土耳其库尔德的这个角落，《创世纪》中描述伊甸园位于亚述西部，就在哥贝克力庙的位置。同样《圣经》中的伊甸园附近有四条河，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哥贝克力遗址正处于这四条河中的两条之间。

古代亚述的课本中提到过“伯伊但”小邦——伊甸园的一处，这个小国距离哥贝克力遗址约 50 英里。《旧约》中记载了“在斯拉萨的伊甸园的儿童”，斯拉萨是叙利亚北边的一个小镇，与哥贝克力遗址相近。另外伊甸园这个词来自闪族语的“平原”，而哥贝克力遗址有刚好位于哈伦平原。

所以，当这些西方的考古学家们把所有这些信息汇聚一起后就发现这些证据很有说服力，哥贝克力遗址实际上就是“伊甸园的一座神殿”。

现在的哥贝克力遗址周围，土地干涸而贫瘠，而考古遗迹显示这里曾经是一个富饶的田园式地区，与石头上的雕刻的野味成群、鱼儿在河里游来游去、野鸟到处都是、周围到处都是翠绿葱葱的树木和野果树的图样完全一样。

原因就是这里靠近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从采集到耕种的转变最早也发生在这片地区。安纳托利亚平原是农业的摇篮，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 60 英里之外的恰约尼遗址，绵羊、山羊和牛也最早驯养于土耳其东部，

全世界的麦种都来自单粒小麦——最早种植于哥贝克力附近的山上，而世界最原始的如黑麦和燕麦的谷物也都开始于这里。这就说明大约在 1 万年前，库尔德沙漠曾经是一个“天堂般的地方”。

是什么破坏了这种美丽宜人的环境？考古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人类的活动。

这里的人们在开始耕作之后改变了土地和气候，树木被砍伐，土地日趋贫瘠，耕作和收割让土地遭到腐蚀和裸露，这样才致使曾经美不胜收、无比惬意的绿洲变成充满压力、疲乏和土地收益递减的荒芜之地，所以曾经的天堂没有了。

但哥贝克力遗址从功能用途上来说，似乎又更像是一处神庙和祭祀之地，因此西方考古学家们认为，哥贝克力巨石阵很可能是一处上古时代最大的宗教祭祀场所或宗教中心，而巨石上雕刻的那些动物和其他东西就是当时的人们对神灵的崇拜。

即使哥贝克力遗址是一处祭祀的神庙，那么当时这里的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中的神灵是什么？是巨石上雕刻的万物中的动物吗？如果他们把这些巨石上雕刻的动物奉为神灵的话，它们又显得太松散。既然这里的人们在距今约 12000 年左右就有了如此之高的雕琢技艺，为何不能雕刻出一个拟人或拟物的核心神灵或图腾呢？

如此看来，这个上古时代的原始宗教场所仅仅只有巨石阵和精湛的动物浮雕艺术，而与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们就完全可以断定这个宗教缺少文化的凝聚和沉淀，这样的宗教与人类所追求的文明就没法内外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会普及、流传下来，而必然会断代。

为此笔者有一点感触，即即使西方的考古学家把哥贝克力的巨石阵遗址与《创世纪》中的伊甸园的地址联系到一起，把巨石上的动物浮雕内容与《创世纪》中描述伊甸园的环境吻合了起来，也不能证明真正的世界文明就诞生起源在这里。

如果他们真的是在信奉巨石上雕刻的万物，就是信奉万物之灵，那么这个宗教与今天欧亚大陆许多地区的人们所信奉的萨满教和万物有灵反倒十分相似。

如今，考古学家们仍在继续发掘哥贝克力石阵，对它所包含的意义则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不过有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发现改变了西方人对人类文明史的认知，同时也提出了人类的文明来自于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即神灵崇拜的宗教，这也促使了西方的考古学界开始重新评估宗教对文明的作用。

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坚定地认为，这里就是《圣经》中提到的曾经的伊甸园，更明确地说哥贝克力遗址就是伊甸园的一座神殿是非常出乎人们的预料

的，因为在西方的很多学者都把伊甸园的故事看做是民间的传闻或者寓言，而像施密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竟能说出如此惊人的阐述以及西方考古学界开始重新评估宗教对文明的作用，笔者认为这里面有想把《圣经》与文明之源硬扯在一起的嫌疑，更确切地说这些个考古学家无非就是想要说《圣经》曾经就是文明的起源罢了。

笔者认为，如果重新考虑评估宗教对文明的作用，那我们就要在整个文明系统中看一看《圣经》，再把《圣经》与《周易》比较一下才行。西方人不是老说《易经》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吗？只要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易”也可以是《易》，她既可以是由日月变化组成的大自然，也可以是一本书；《易》既在拟人，也在拟物，也同时强调了万物之灵；在“易”之内的人类既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经典之作《周易》，在“易”之外又有人类龙文化的图腾——龙；我们从《周易》的卦爻辞中既能看出中国古人智慧的哲学思想和科学论述，还能从其中的六爻易术中看出所蕴含的推理逻辑；“易”教我们既能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去看问题，也能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去看问题；“易”使我们既能知道过去，又可预测未来；“易”既可让人崇拜，又可让人使用；在中国最古老的自然哲学的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每一个“数”和“字”及“概念”都可以是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库，而《圣经》却没有这样的功能。

西方人一直说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但他们不知道，甚至连我们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自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诞生以后，中国人就从神秘主义的困惑和迷信当中脱离了出来，开始崇尚自然的环境、崇尚万物之灵的自然变化（这在《周易》林［临］、乖［睽］、无孟［无妄］、既济［既济］等卦的卦爻辞中就已经阐述得很明白了），崇拜大自然、崇拜和信奉无神论。所以说中国人所信仰的是无神论。

中国智慧的古人在这个思想文化体系中早就明确阐述了宇宙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宗教中的“宗”在汉字中就有根源之意，而能够称得上是真正“宗”的教化体系只有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只有大自然本身，而“易”又来自大自然，这从世界各地还存在的萨满教以及信奉萨满教的民族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其中还遗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元素和影子。

通过中国近代考古，发现与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五行有关的音韵学系统竟可上溯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贾湖文化遗址，而与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阴阳哲学观念有关的锐与钝，竟可上溯到距今1.8万年以前的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文化遗址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文化遗址。所以说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最早地

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文明体系。即使在当今所有的世界文化中，她仍然备受瞩目，她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全世界人类的宝贵财富。

注：《易经》就是《周易》，要想真正的读懂《周易》，与《圣经》进行比较，请读者参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易卦爻辞真解》。

| 第十九章 |

尼罗河流域文化与易学文化

第一节 古埃及的自然、地理、历史

埃及，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代埃及的地理位置位于非洲西北部，一方面扼守着亚非两洲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优越；另一方面，它东濒红海和印度洋、西临撒哈拉沙漠、北挨地中海、南依东非高原和埃塞俄比亚高原，也形成一系列天然的地理屏障。

全长6000多公里的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纵贯埃及南北，它是埃及的母亲河。埃及南部主要为河谷地带，地形狭窄，气候较为干燥；埃及北部主要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形平坦开阔，气候为地中海型。

流经埃及境内的尼罗河由上游的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汇合而成。白尼罗河发源于东非高原的维多利亚湖，由于有湖泊调蓄，终年水量稳定；而青尼罗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山区，处于干、湿两季分明的热带草原气候区。

因此，埃及境内的尼罗河也会在每年7～11月定期泛滥。这种泛滥一方面浸灌了两岸干旱的土地；另一方面，还给尼罗河流域两岸的耕地带来了大量富含磷酸盐和腐殖质的沉积淤泥，丰富的有机质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由于淤泥的沉积使河岸增高，所以泛滥时河水不是冲出堤岸，而是缓缓地通过河渠漫延出去，进而在两岸的旧河道和低凹处形成许许多多的大小池塘。在进入干旱期后，池塘中的水倒流出来，既为逐渐干旱的河谷及时补充了水量，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又把土地中由于先前泛滥而产生的盐分冲洗掉，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困扰两河地区的土壤盐碱化问题。

古代埃及农业是与河流紧密相连的。早在公元前2686年的旧王朝时期，农业耕作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这主要得益于古代埃及的农业是与河流紧密相连的。古埃及人一向十分乐于开发这片土地，农夫们几乎只需在每年泛滥季结束后把种子撒在潮湿、肥沃的土地上，就可静待收获季的到来。这一系列良好而稳定的自然条件，使古代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非常适合农业生产。

所以说是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正如被誉为“历史之父”的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5）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这就说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与中国黄淮流域的中原文明一样，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古埃及文明的创造者是由北非土著和来自西亚的人种融合而成的，其语言属“哈姆—塞姆”语系。此外，西部的利比亚人和南部的努比亚人也与古埃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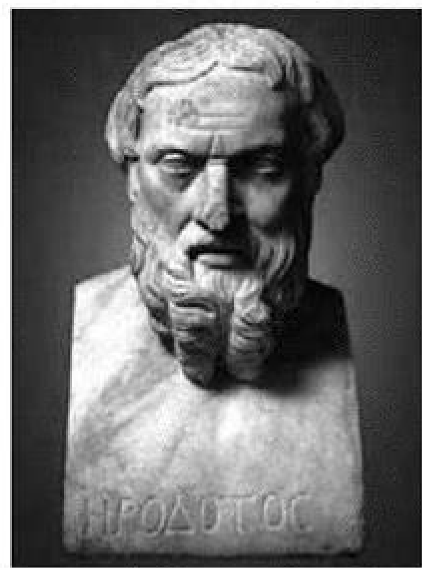


图19－1　希罗多德像

古代埃及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100年，终于公元前332年。生活在公元前4～前3世纪的埃及祭司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分为31个王朝，现代学者沿用了这种分法，并根据古埃及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主要线索（如埃及的统一与分裂、新都的建立、物质文明的突破性进展等）将31个王朝分为若干历史时期。由于对这些线索的关注各有侧重，所以学界在分期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目前普遍较为接受的一种分期是：

前王朝时期：前4500年～前3100年

早王朝时期：前3100年～前2686年（第1～2王朝）

古王国时期：前2686年～前2181年（第3～6王朝）

第一中间期：前2181年～前2040年（第7～10王朝）

中王国时期：前2040年～前1786年（第11～12王朝）

第二中间期：前1786年～前1570年（第13～17王朝）

新王国时期：前1570年～前1085年（第18～20王朝）

后王朝时期：前1085年～前332年（第21～31王朝）

托勒密埃及时期：前332年～前30年

罗马埃及时期：前30年～公元3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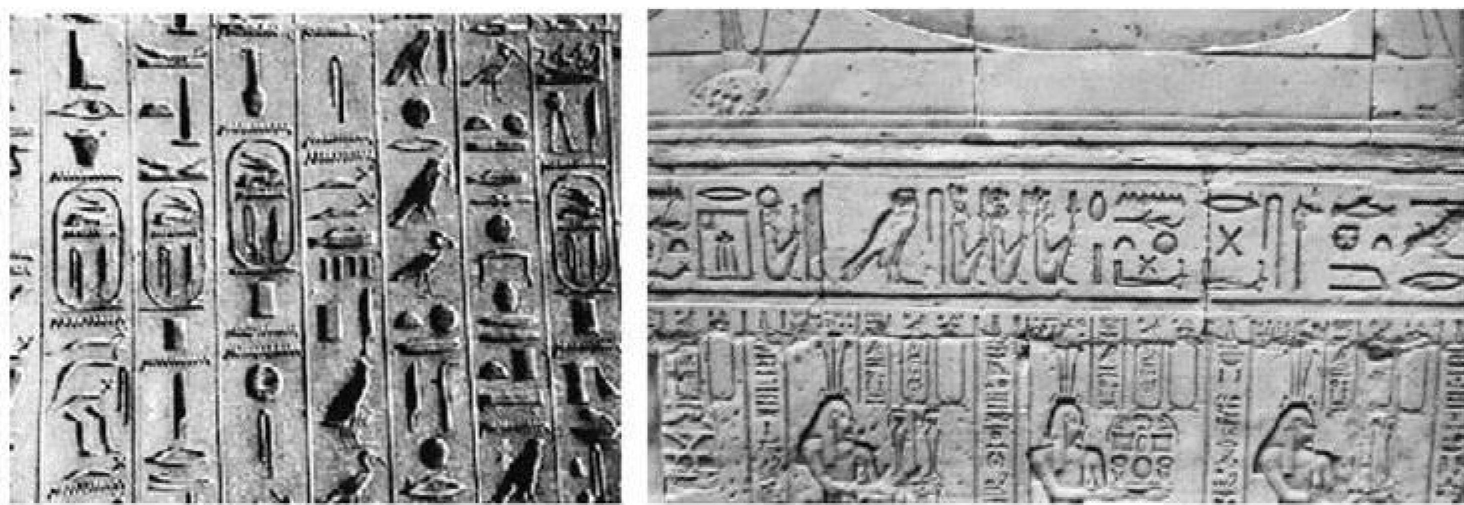
古埃及的居民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而是北非当地土著和周边地区其他民

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从早王朝起，两河流域就与埃及发生联系；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后，西亚移居埃及的人也日渐增多；而进入帝国时期后，埃及在近东地区霸主地位的确立以及争霸战争的频繁胜利，更使大量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战俘流入埃及[①]。所以在古埃及的文明文化中，也同样汲取了两河流域的文明文化。

揭开人类文明史的序幕，古埃及文明无疑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星。希罗多德说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奇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尼罗河、金字塔、木乃伊、神秘的象形文字……它们穿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向后人彰显出了古埃及文明独特的魅力。

第二节　古埃及文字与易学文化

埃及的象形文字（组图 19－2）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3000 年，一直使用到公元 4 世纪，存在时间达 3400 年之久。但是后人对古埃及文字的了解，只是近一个多世纪的事。曾有 1000 多年的时间，这些美丽的文字在沉寂中无人知晓。在古埃及后期的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埃及本土文化逐渐丧失，象形文字也逐渐被受希腊文影响的科普特语所代替。公元 3 世纪后，随着基督教的影响逐步扩大，象形文字渐渐被人们遗忘。到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埃及，把埃及纳入伊斯兰教文化圈内，从此，埃及在文化上和地理位置上都与欧洲有了更大的隔阂。



组图 19－2　埃及象形文字

① 颜海英：《守望和谐——古埃及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 35 页。



图 19－3　古埃及的纸草书

glyph	translit.	phonetic	glyph	translit.	phonetic
	ꜣ	[ʔ]		ḥ	[ħ]
	ỉ	[i]		ḫ	[x]
	y	[y]		ẖ	[ç]
	ꜥ	[ʕ]		s	[s]
	w	[w]		š	[š]
	b	[b]		ḳ	[q]
	p	[p]		k	[k]
	f	[f]		g	[g]
	m	[m]		t	[t]
	n	[n]		ṯ	[t^y], [c]
	r	[r]		d	[d]
	h	[h]		ḏ	[d^y], [j]

古埃及象形文与现代字母对照表

Aa Bb Cc Dd Ee Ff Gg Hh

Ii Jj Kk Ll Mm Nn Oo Pp

Qq Rr Ss Tt Uu Vv Ww Xx

Yy Zz

组图 19－4　古埃及的象形字母

那么，古代埃及人是怎样理解他们的象形文字的呢？下面我们看一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882～1944），在他写的《人类的故事》中有一段描述了法国教授向波伦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方法。①

古埃及文字超越了表记语言，他们那些图像，除了表示图中的对象外，还另有许多意义。假如你是向波伦，正在研究一叠有象形文字的纸草书，你突然发现一张男人持锯的图像（图 19－5），你一定会说："好啊，那当然意味着农民去伐树。"而后，你拿起另一张纸草



图 19－5

① 〔美〕房龙：《人类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 19、20 页。

书，它表明了一个终年82岁的王后的故事。在一个句子中间，也出现了一个男人持锯的图像，而82岁的王后是不会去使用锯的，所以那张图像一定还有另外的意义。但这另外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就是最终被向波伦所破解的谜。他发现古埃及人首先使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表音文字”。这个文字系统把口语单词的“声音”（即语言）再现出来，并借助于仅仅几个圆点、长划和歪歪斜斜的笔画，把我们所有的口语单词变成了书面形式。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下那个持锯的小伙子。“锯”（saw）这个单词，意为你在木工房可以看到的一件工具，或者表示动词“看见”（to see）的过去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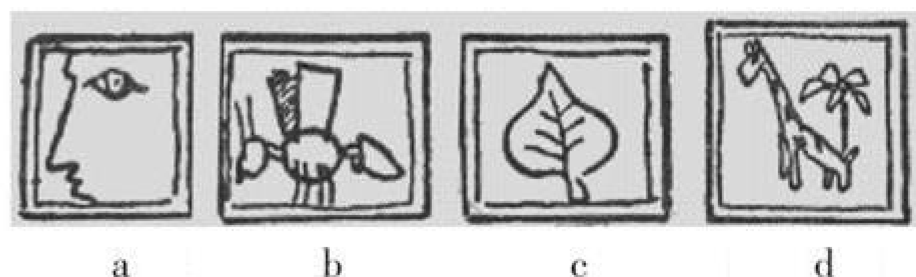
以下所述，乃是该单词若干世纪间演变的情况。最初，它仅意为它所代表的那件工具。其后，它的那个原意失去了，又有了新的意义，变成了一个动词的过去时。几百年以后，古埃及人把这两个意义完全忘却，图19－5这个图像终于代表了一个字母“S”。

现举例一个短句子向大家证明，此处是用象形文字写出的一个现代英语句子（图19－6）。



图19－6

组图19－7a表示你头上两只看东西的圆形物之一，或者代表“我”（I），即正在谈话的那个人。



组图19－7

组图19－7b表示采蜜的昆虫，或者表示动词“存在”（to be）。再者，它也许相当于“成为”（be－have）之类动词的头一部分。在这一例句里，组图19－7c紧随其后，意表“叶子”（leat）或leave或live（这三个词的声音相同）。“眼睛”（eye），前面已经说过，大家都已知道。

最后请看组图 19－7d，它是长颈鹿。它是古表记语言里的一部分，象形文字就是从古表记语言发展而来的。

读了这样的解释，那句用象形文字写出的现代英语句子，就不难读懂了。意思就是“我相信我看见了一头长颈鹿。”（I believe I saw giraffe.）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发明的象形文字绝不是纯粹的图画，那些象形文字同样也来源于实物，也具有表意的功能。他们发明象形文字以后，这个文字系统在数千年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直到能写他们所要写的任何事物。

从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结构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代埃及人起初创造文字的时候，采用的也是形象思维的方式。这与中国古人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尽管在中国发掘出最早的系统书写甲骨文字比较晚，但从贾湖遗址出土文物的刻符上，我们也发现了形象思维的象形文字刻符（组图 7－10），并且我们还可以将这几个形象刻符进行五行归类。

我们只要用形象思维的方式，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几个刻符与汉字“目”、“日”、“火”、“雷”、“电”极为形似，而且它们的五行属性也都属火，都可以归类、归纳在八卦的离卦中，而离卦其中又包含着雷电、火神、太阳、白昼、眼睛、光明、希望与文明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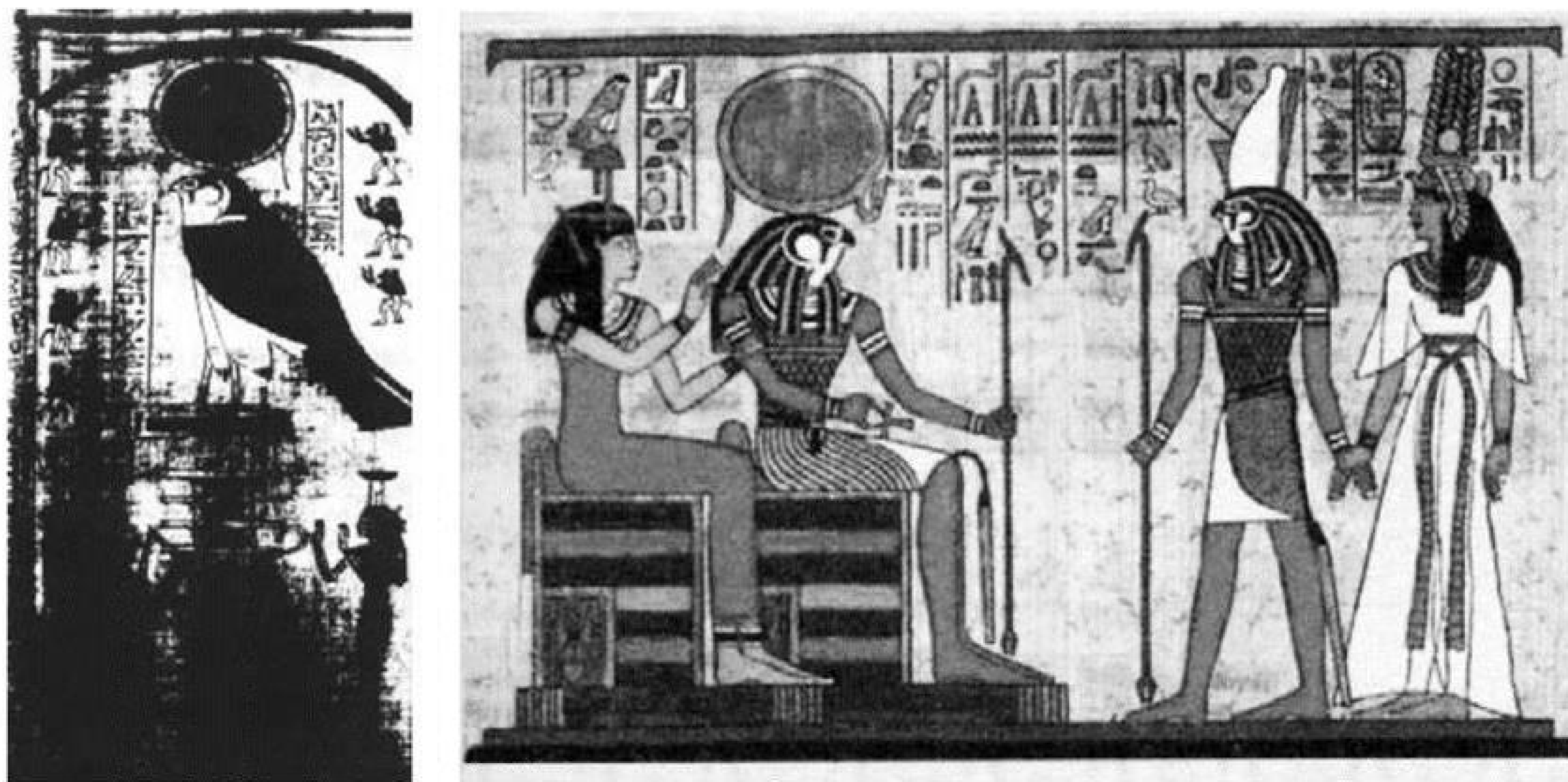
然而，在中国出现最早的系统书写甲骨文字之前，中国一直是既沿用了贾湖时代八卦之“数”的归纳方法在记事（也就是传说中的结绳记事），也沿用了形象思维的简单象形文字刻符在记事。这说明在古埃及文字诞生之前，古埃及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古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形象思维有相通之处。

第三节　古埃及人所崇拜的多神与易学文化

古埃及人是崇拜多神的。诸神中最显赫、最尊崇的是太阳神拉（Ra）（组图 19－8）[①]，他又是天地之神，主管宇宙间的秩序和尘世间的正义。拉神又常与别的神结合，成为组合神，最显赫的一种是与阿蒙（Amun，又拼作 Amon）

① 〔英〕葛瑞姆·汉卡克、〔英〕罗伯特·鲍威尔合著，石尚仪译，王季庆校订《创世纪的守护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第 345 页。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45 页。

的深结合，成为阿蒙·拉神，仍是太阳神。



组图 19－8　太阳神拉

月神透特（Thot）（图 19－9）[①] 不甚显赫，常以灵鸟（朱鹭鸟头）或狒狒之形出现，他是诸神的信使，又司书写，交给人们书写、计算和历法，同时又掌管知识与魔法，所以古埃及人称自己的文字为“神的文字”。后来他与希腊化时代的星占学也有了某种特殊的关系。

在埃及众神中，还有一神与天象有极密切的关系，即伊希斯（Isis）女神（图 19－10）[②]。伊希斯是拉神的后裔，她又是其兄奥西里斯（Osiris）的妻子（古埃及王室盛行兄妹相婚，故神话中的诸神也常如此）。伊希斯象征忠贞之妻与尽职之母，在神话中，奥西里斯被害之后，她上天入地，悲痛欲绝，终将奥西里斯的遗体找回，使其复活，并为他生下了王位继承人。伊希斯又极擅长巫术，神通广大，因而受到广泛崇拜。她后来又成为司生育、繁殖的女神。古埃及人又将伊希斯也尊为天狼星之神（或者也可以说，将天狼星也尊为伊希斯神），他们相传泛滥的尼罗河水是伊希斯的眼泪。

诸神大多是居住、活动于天界的，即便是专司阴曹地府之神，他们要与天界交往也是轻而易举，这种观念几乎在所有古代文化中都无例外。古埃及人就是用这种形象思维的方式，营造出了崇神、敬天的文化氛围。

从太阳神拉和月神透特的造型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太阳神拉、月神透特、伊希斯女神以及其他居住、活动于天界的诸神，要么是飞禽头顶太阳的造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46。
②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49 页。

型，要么是长着鸟头头顶太阳的神人造型，要么是神人伸展双翅的飞禽造型，要么是神人们头顶上有展翅飞翔的飞禽造型。



图 19－9　月神透特



图 19－10　伊希斯女神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个居住、活动于天界诸神（组图 19－11）[①] 的造型，与距今约 7000～5000 年左右中国仰韶文化时期远古的古人们将太阳比喻成神鸟，用飞翔的飞禽来比喻太阳正在天空冉冉升起，用神鸟驮日（组图 19－12）来表示人们对太阳、阴阳、文化的崇拜，也如出一辙。







组图 19－11　居住、活动于天界的诸神

这也说明，古埃及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形象思维有相通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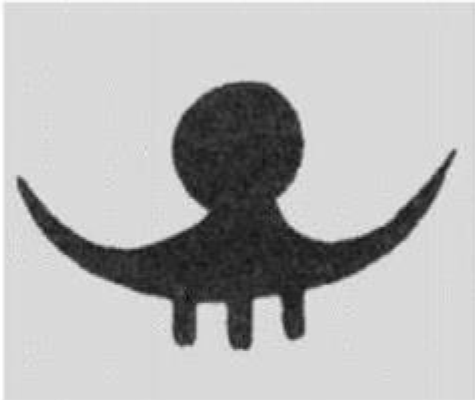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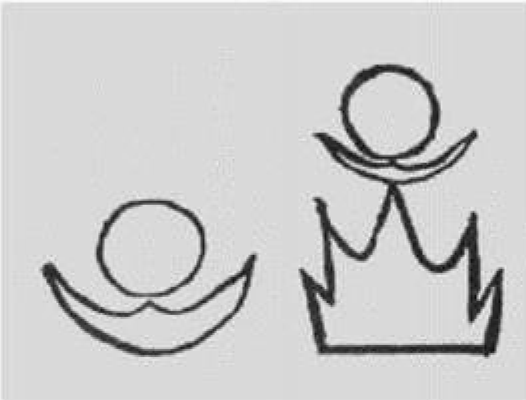
太阳鸟飞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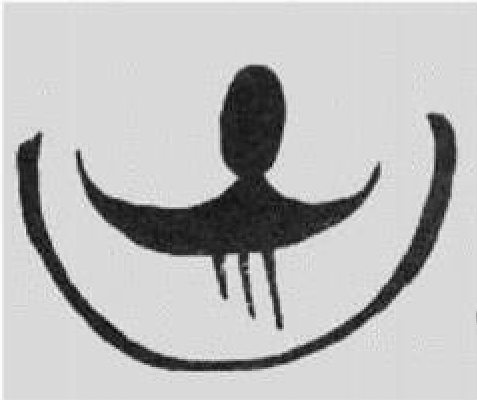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庙底沟村飞鸟驮日图



仰韶文化马家窑太阳鸟符号



大汶口文化太阳鸟符号



菘泽文化三足太阳鸟图案

组图 19－12

第四节　古埃及二元性思维方式与易学文化

古埃及人的世界观完全是天地二元[①]和宇宙大同的世界观，他们似乎原封不动地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种世界观。这种观念形成于他们历史文明的开端时期的大约5000年以前。

上天与法老神权，上埃及与下埃及，“两块疆域”的统一，黑土地与红土地，尼罗河的涨与消，人们对自己和祖先的认识，他们的法律和历法制度，庙宇和金字塔体系的对称建筑，壁画和纸草画艺术中的人或坐（静）或站（动）的表现形式，甚至宇宙与埃及大地、银河与尼罗河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宇宙中的二元观念，这种“二元对称”观念，推动了古埃及人的“均衡”、“和谐”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他们把天上的宇宙环境（即天空、银河、太阳、星星、月亮和行星，以及这些天体的周期变化）都看成是与大地环境（土地、尼罗河、现世的国王、祖先、三季交替、年代变迁等）息息相关的完美二元体系。

---

① 〔英〕葛瑞姆·汉卡克、〔英〕罗伯特·鲍威尔合著，石尚仪译，王季庆校订《创世纪的守护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第165页（二元性的线索）。

这个概念记载在包括意在给亡者灵魂指引旅程的神秘的远古文献里，诸如《亡灵书》（即被古埃及人所说的“白日现身”之书）、《二途之书》、《大门之书》、《二元的奥秘之书》和《棺文之书》。在这些悼文和再生文献中，最古老神秘的就是所谓的《金字塔文》。

早期古埃及流传下来的宗教典籍利用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象征术语来描绘“亡者世界”这个涉及天文上的概念及特征。那个世界指的就是二元。二元这个概念一再被现代埃及学家们翻译成“地府”，有时还被翻译成“地狱”。

可是，在埃及的古文献里，二元明显是指天空中的一块位置。像塞里姆·哈桑、瓦里斯·巴杰和库尔特·塞斯等早期埃及学家无疑都知道这一点。甚至学术界的先驱们也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因为他们缺乏对天文学的足够认识而未能领略二元这个概念的含意和特征。

举例来说，塞里姆·哈桑曾分析出，在整个埃及历史上，二元这个词以象形文字雕刻成两种不同方式。他说过：“要是我们分析一下旧王国（即金字塔时代）留给我们的证据，我们就会看出古人最初所指的二元以及未来的地府是在天空中。”接着，他引述了库尔特·塞斯的话：“二元或是日出（即曙光来临）前红色的光晕，或是这种光晕在东方天际出现时占据的一块广阔天空……”

哈桑曾引用了金字塔文中第151行，他写道：“猎户带被包围在二元之中；居住在地平线以下的他（即太阳神拉）给自己净了身；索提斯（即天狼星）被包围在了二元之中……在（他们的）父亲阿图姆的怀抱之中。”

哈桑说：“这里清楚地描述了太阳升起之时，也就是太阳神在地平线上为自己净身之时，猎户带的群星和视同索提斯（天狼星）的这位国王被包围在二元之中。这是真实的自然景观，看上去真的就像群星在每一天破晓之时被二元的天空所吞噬。也许二元（视同国王的那颗星被包围在其中的一个圆圈中）这个决定性的词表明了索提斯被包围起来的想法。当死去的国王前去与群星会合的途中，他的灵魂首先一定要通过（或穿过）二元的天空，他的灵魂经此被导入正途。所以，我们在（金字塔文）第610句读到：‘二元引导你的双足，二元引导你的双手，带你前往猎户带的栖息之地……’”

哈桑关于二元的天空景观描述并非完全正确，这与他的认识有关。他以为只有在东方天际，才能在被称为“曙光”的黎明前那一刻观察到二元里的出现的一切——猎户带（欧塞里斯）、天狼星（艾瑟斯）、太阳神（拉），以及另外代表“阿图姆”（众神之父）的星体。

古埃及人在象形文字中用一个黑色的圆圈来表示这个“地府”或“地狱”

一般的惩罚之处。在他们的心目中，那里没有阳光照耀，没有生命的气息，听觉和视觉都不复存在，散成碎片，人们直接面对彻底毁灭的恐惧。就像站在虚无的黑洞门口，在那里世界将在时间的末端消失。

正如《亡灵书》第 99 章所说：“这是一片恐怖之地，在这儿倒置的星星跌落在他们的脸上，不知如何从新升起。”

然而古埃及人又相信，消失和灭绝是每一次新生的前提，复苏的生命必须跟随在消亡之后到来，因此衰退和消亡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走入木乃伊（组图 19 – 13）的世界，就可以看出古埃及人从来世看今生的人生观。古埃及人非常看重身体，这从他们的墓葬习俗当中（特别是制作木乃伊）能够清楚地看到，古埃及人的艺匠们用各种材料为人和神制作雕像（即所谓的“另一个身体”），使之能永久保存并栩栩如生，并能被唤醒、复活并得到一个新的灵魂。


木乃伊的制作过程


埃及挖掘出保存完好的木乃伊棺


木乃伊

组图 19 – 13

这个复活的过程通过一种叫“开嘴”的宗教仪式来完成，这种仪式的对象是死者的木乃伊或是他的雕像，目的是使死者在来世能够张开嘴吃饭和说话，同时也使其他感官都复活，这样死者就可以在来世接受各种供奉。

如果我们站在属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国濮阳西水坡的 45 号墓（组图 3 – 7）的北边，面对墓主人躺着的平面，在我们的左前方（墓主人的东方、表示万物在春天皆开始了生命的希望）摆出了青龙的图案，而且死者左边的殉葬者面朝上（代表出生）。在我们的右前方（墓主人的西方、表示万物在秋天皆开始了萧条与死亡）摆出了白虎的图案，而且死者右边的殉葬者面朝下（代表死亡）。在我们的前方（墓主人的北方）也摆着一具殉葬者，面部朝上，头部朝向东南方

（代表投胎、孕育）。

古埃及人二元的概念以及木乃伊的这种墓葬形式，与距今 6460 ± 135 年属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国濮阳西水坡的墓葬文化形式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当时的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正如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所描述的，所有的事物在周而复始地自然运动变化过程中，都会表现出了一个圆的生生死死的循环、轮回，是相互吻合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人为死者所制作的，是活着的人们寄予墓主人再次投生的希望。

所以，从这就可以看出，古埃及人所拥有的“二元”概念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阴阳”系统观念有相通之处。如果我们把“阴阳”的概念代替“二元”，再来理解塞里姆·哈桑的那些描述，就会充满中国易学文化的意境。

第五节　古埃及“三合一新年”与易学文化

古埃及人观察天空的位置在现开罗以南，所谓的“孟菲斯墓址”（这个墓址是根据孟·奈弗尔来命名的，后来改名叫“孟菲斯”，这也是历史学家确认的第一个古埃及都城），那里耸立着吉萨金字塔（和较小的旧王国金字塔，诸如建于阿布若斯、阿布希亚、萨卡拉、大苏尔和美的姆等各朝各代的金字塔，组图 19－14）。




组图 19－14　吉萨的狮身人面像建筑群

不管从孟菲斯还是从吉萨观察到的太阳从二分点和二至点上升起来的情况（图 19－15），就是将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夏至时初升的那一点到正东点算为一

元，从正东点到太阳在东方地平线上冬至时初升的那一点也算为一元；天空和银河算为一元，大地和尼罗河也算为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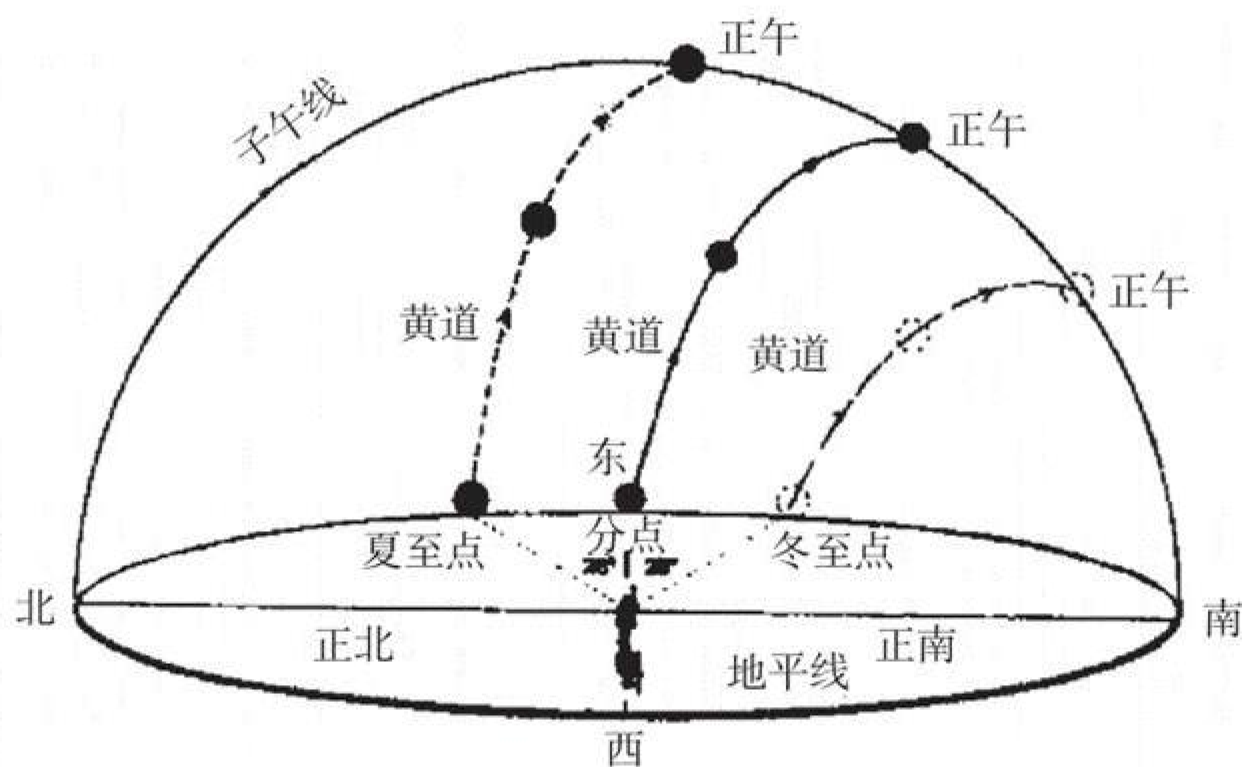


图 19－15　从吉萨观察到的太阳初升图

他们认为只有太阳在孟菲斯和吉萨狮身人面像的东方地平线上夏至点上初升的时候，“二元”才会活跃起来，也就是这个时候太阳与天狼星会同时升起，尼罗河水也开始泛滥了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天空（一元）与大地上的尼罗河（一元）相互对应着活跃了起来。

前面说过伊希斯在埃及神话中是掌管生育、繁殖的女神，而在古代埃及的大地上正是尼罗河水的年年泛滥，才会给古代的埃及人带来收成，所以泛滥的尼罗河水也被认为是伊希斯女神的眼泪。

古埃及人又将天狼星尊为是伊希斯神。那么，古埃及人为什么要把尼罗河的泛滥与天狼星联系在一起呢？这就涉到了古代埃及人的历法。

前面笔者说过，埃及的母亲河是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它纵贯埃及南北，从南部狭窄的河谷地带，到了埃及北部就形成了平坦、开阔、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所以希罗多德所说的——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一点也不过分。甚至我们都可以说古代埃及的文明是尼罗河的文明，就像我们中国的文明是黄河的文明是一样的。

由于埃及北部的气候为地中海型，南部的气候较为干燥，所以古代埃及就不能像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一样，能够自然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春、夏、秋、冬四季气候，只能自然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三季气候，就是洪水季、播种季、收获季。因此古埃及人将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尼罗河流域的变化特征与植物的自然生长变化特征结合起来，把洪水季、播种季、收获季均匀地进行了分配，形成了一年的三季。每季四个月，每月各有名称，这些名称在古代著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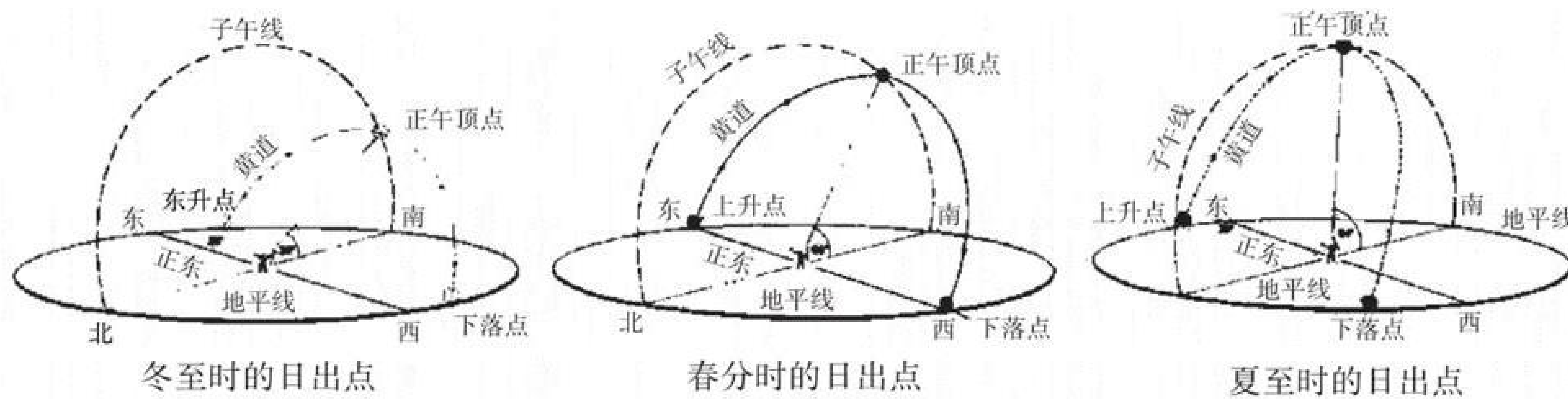
常被使用，比如托勒密《至大论》中的天象观测资料日期就都用埃及月份表示。①

Ⅰ洪水季	Ⅱ播种季	Ⅲ收获季
1Thoth	5Tybi	9Pachons
2Phaophi	6Mechir	10Payni
3Athyr	7Phamenoth	11Epiphi
4Choiak	8Pharmuthi	12Mesore

早期的古埃及历法也是规定每月30日，每年12月，一年360天，这与中国远古时期最初的历法和十二平均律是一致的。后来随着历法的精确，古埃及人把另外5天放置岁末，分别献给奥西里斯家族诸神的附加庆典日，这样就填满了每年365日，这种历法显然还是很粗糙的。

那么古埃及人究竟为什么要将新年的第一天与一种天文现象联系在一起，就是将尼罗河泛滥与天狼星和日出联系起来，现代西方学者尚无一致意见。

我们从组图19－16和组图19－17中可以看出，夏至这一天太阳会从狮子座升起，此时的天狼星也出现在了地平线之上的天空，就在银河的对岸。这一天太阳在向上升的视运动过程中，就像会穿过天上的银河一样。同时，这一天的尼罗河水就像猛兽狮子一样的开始泛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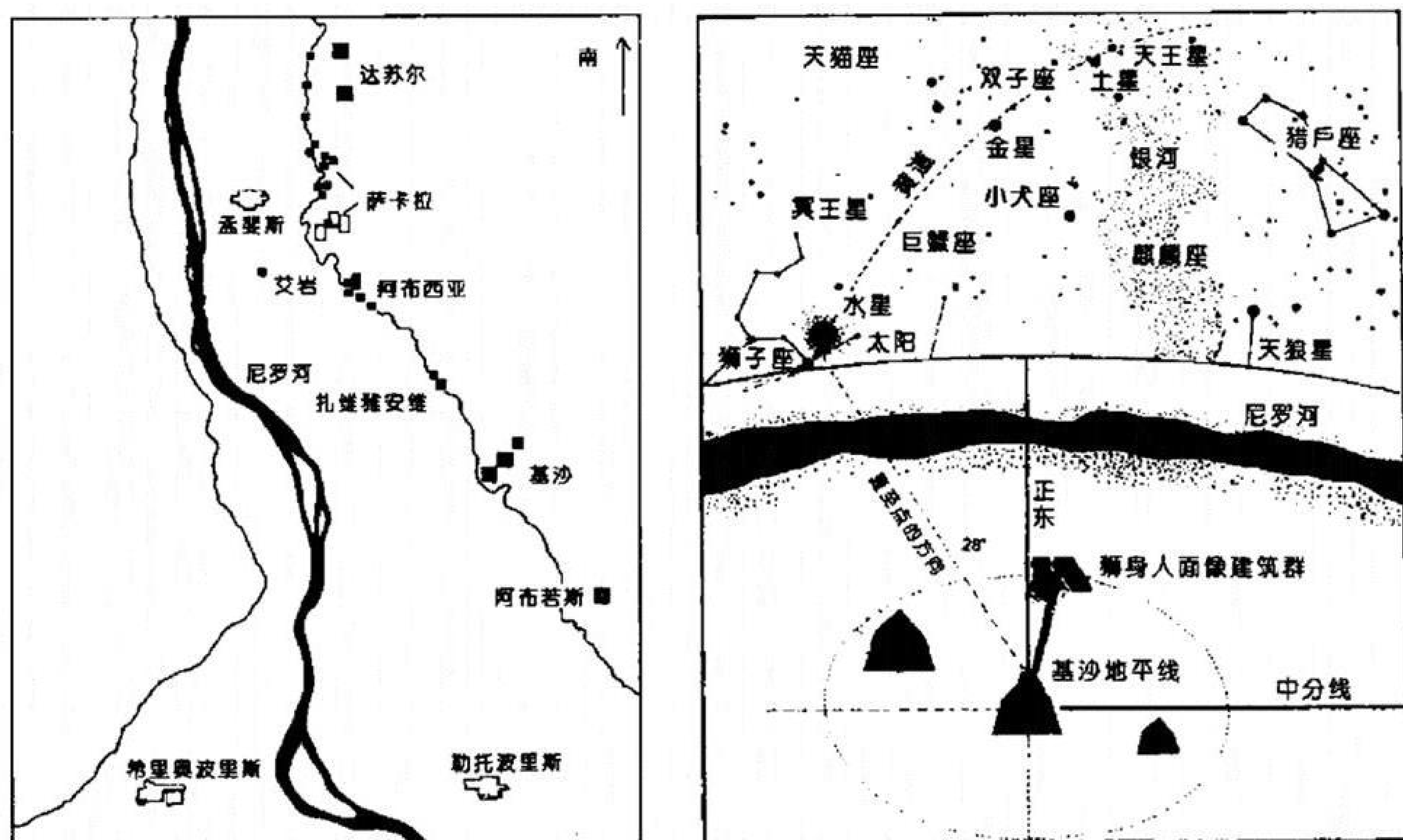


组图19－16

这样，孟菲斯和吉萨的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就会自然地出现狮子座、太阳、银河、天狼星排在一条线上的天象景观，孟菲斯和吉萨的东方大地上也会自然地出现尼罗河水像猛兽狮子一样的开始咆哮着的景观（组图19－17）②。天地之景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49页。

② 〔英〕葛瑞姆·汉卡克、〔英〕罗伯特·鲍威尔合著，石尚仪译，王季庆校订《创世纪的守护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第172、188页（二元性的线索）。



组图 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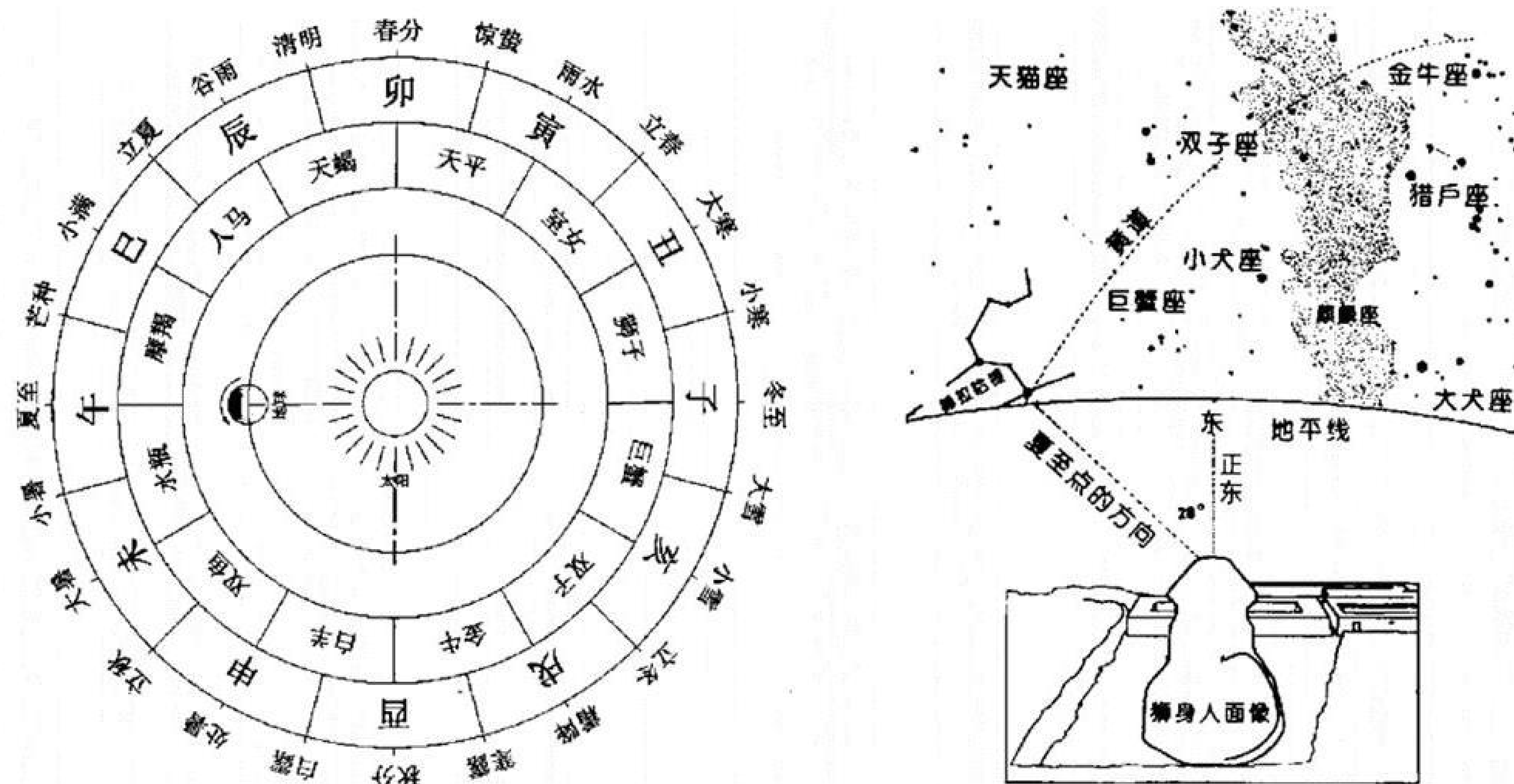
观在此竟然如此巧妙地吻合在了一起，按照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理论，这就叫天象与地象相合了。孟菲斯和吉萨的区域就成为了中国易学文化中的一个太极点(或天地人和中的人)。

这样的自然天地之景象既符合古埃及人天地二元和宇宙大同的世界观，也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理论中天地、阴阳相合的哲学观念相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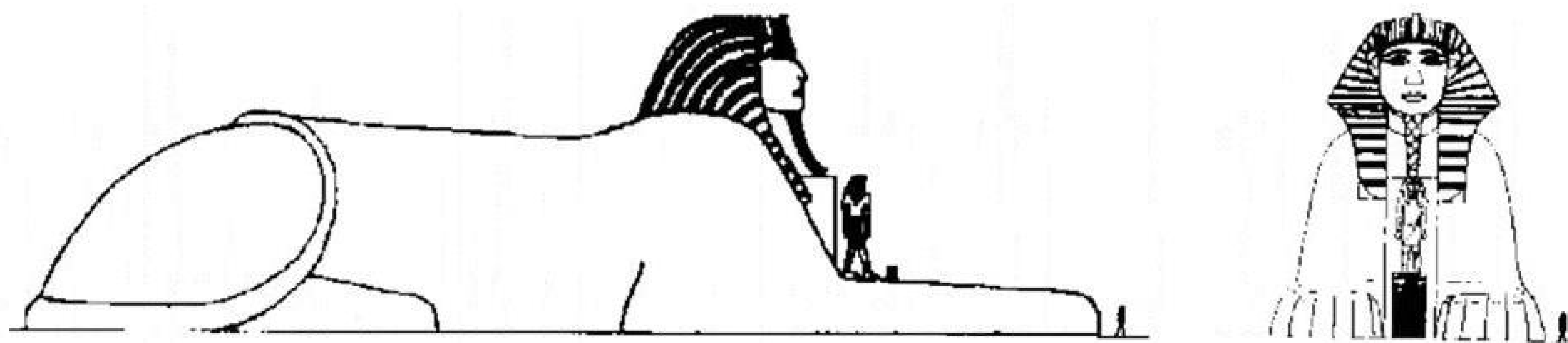
所以古埃及官方颁布的钦定历法规定：新年的第一天，应是尼罗河泛滥与天狼星偕日升同时发生的那一天，这被称为“三合一新年”。

埃及最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描述的是古埃及史前时代的一个原始神阿图姆与太阳神拉和长着禽鸟头的赫拉哈提的结合体。狮身人面像究竟建造于什么年代？目前尚无可能用任何合乎情理的标准来给这一独特古迹的确切归属和历史下最后的定论。然而，认为人面狮身像是出于大约公元前 2500 年那个年代的卡夫拉之手的这一传统观点已广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已经深入人心。

如果狮身人面像真是公元前 2500 年建造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将自然天地之景观与人文景观如此巧妙地吻合在一起。那就是，夏至这一天的太阳会从狮子座升起，此时的天狼星也出现在了地平线之上的天空，就在银河的对岸。这一天的太阳在向上升的过程中，就像会穿过天上的银河一样。同时，这一天的尼罗河水就像猛兽狮子一样的开始泛滥了。所有自然发生的这一切天地之景观，却都覆盖在了人面狮身像时刻注视的正东方范围之内（组图 19－18、组图 19－19、图 19－20）。



组图 19－18



组图 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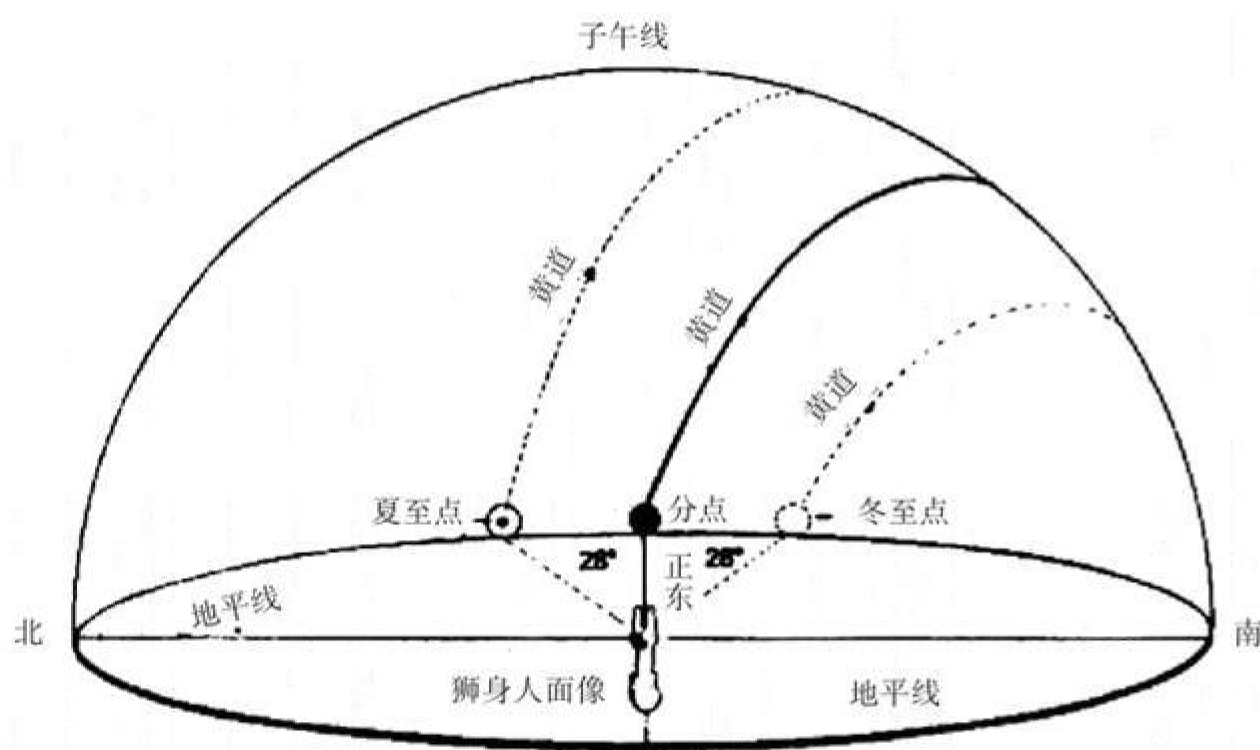


图 19－20

这种自然天象与地象和人文景观（人为因素）就这样在古代埃及大地的尼罗河流域，如此地巧合了。按照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理论观念，

这就叫天地人和。

这样的自然天地之景象与人文景观（人为因素），正好表现出了古代埃及人在努力追求天地二元和宇宙大同的世界观。这样的自然天地之景象与人文景观（人为因素），也正好符合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理论中天地人和的哲学观念。

不论是古中国人、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他们都先后共同认识到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能够区分开的，是否能够准确地区分开天地大自然的头与尾、始与终，是衡量智者们是否掌握了天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是否能够确定历法的最基本的关键要素。

如果我们把“年”也作为一个太极生命体来看待的话，那么这个“年”也一定是遵循着这样的法则与规律，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这就说明，他们的方法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基础理论知识来认识、区分、规定、判断自然事物有共通之处。

中国古人把子月、子时作为每一年和每一日的开始，是因为“子”具有阴阳、新旧兼备的属性；古巴比伦人把中国人节气中春分的这一天作为每一年的开始，是因为春分这一天的白天［阳］与黑夜［阴］的时间是等长的；古埃及人把中国人节气中夏至的这一天作为每一年的开始，是因为夏至这一天的自然景象与人文景观符合了天地人和的哲学观念，而这些做法又全都符合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系统基础理论。

因此，我们就可以十分地肯定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在开始确定历法中每一年和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也同样考虑到了自然当中天文的因素和意义，这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的历法知识有共通之处。

组图 19－21 是上埃及有名的登得拉黄道带图①，图中描绘了黄道十二宫的太阳之路（黄道）。在每一个太阳年（太阳的视运动）里的每一个月，太阳的视运动都会与十二宫里的一个宫相“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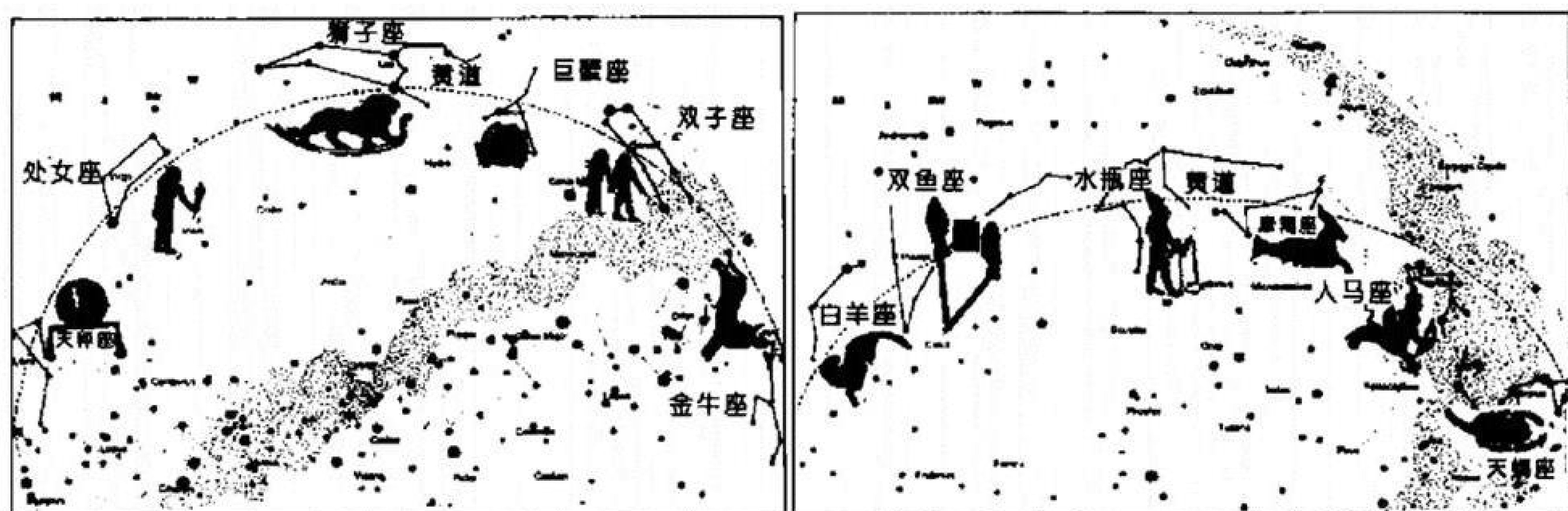
从登得拉黄道带图和拿破仑一世埃及探险队发现的长形黄道带图（图 19－22）②以及拿破仑一世埃及探险队发现的圆形黄道图（图 19－23）③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狮子宫［狮子座］中的狮子，乘着一条具有典型古代埃及风格的船，就像夏至这一天太阳在向上升的过程中，太阳的视运动会穿过天上

---

① ［英］葛瑞姆·汉卡克、［英］罗伯特·鲍威尔合著，石尚仪译，王季庆校订《创世纪的守护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第 199 页（二元性的线索）。

②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64 页。

③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62 页。



组图 19－21　登得拉黄道带图

的银河一样，这正好与笔者的分析是一致的。这说明古代埃及人所追求的天地人和的自然、和谐哲学观，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理论中天地人和的哲学观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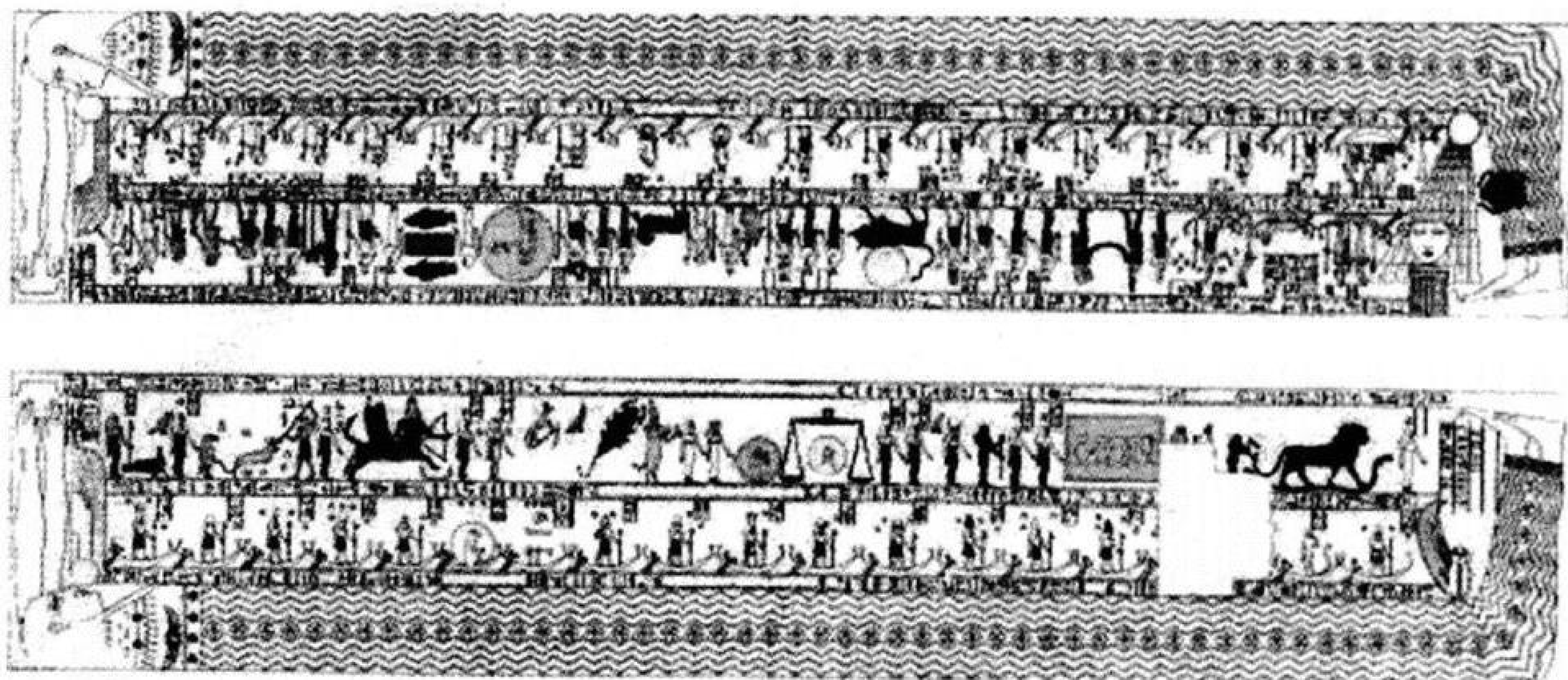


图 19－22　拿破仑一世埃及探险队发现的长形黄道带图

所以在古代埃及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孟菲斯和吉萨东方的古埃及地平线上的天空都会自然地出现狮子座、太阳、银河、天狼星排在一条线上天象景观，孟菲斯的东方大地上也会自然地出现尼罗河水像猛兽狮子一样的开始咆哮着的景观。天地之景观在此竟然如此巧妙地吻合在了一起，这正好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理论中天地人和的自然、和谐文化观相符合。

当然，古埃及也有阴历，由朔望月长度（29.53 日）确定，12 个月共得 354.36 日，因此每三年要加入一个闰月。这种历法在埃及历史上也很常用，与官方太阳历并行不悖，各司其职；阴历用于宗教祭祀等方面，自然历用于农业，官方历法则普遍通用。这种情形，直到现代竟还没有多大改变。现代埃及通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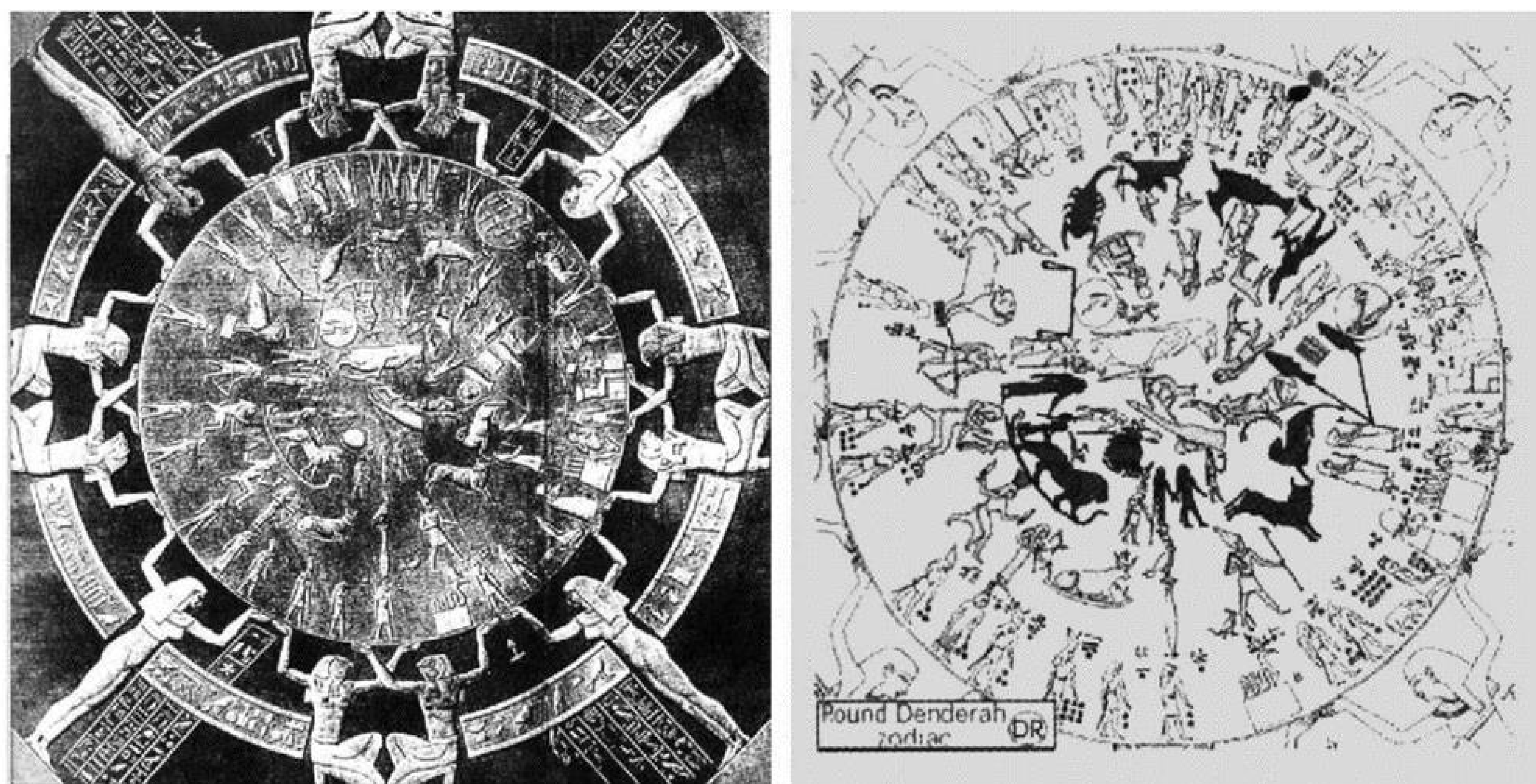


图 19－23　拿破仑一世埃及探险队发现的圆形黄道图

部历法，就是公历、伊斯兰历（也是一种纯阴历）和“科普特历”（即古埃及历，用于农业）。

金字塔的形状一律都是三角形，这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五行属火，与太阳对应。从属火的三角形金字塔就可以看出它与太阳神拉有着紧密的关系。

第六节　哈夫拉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以及太阳神庙与易学文化

前面说过，考古和史学专家们普遍都认为人面狮身像是出于大约公元前2500年那个卡夫拉统治的年代（图 19－24），这一观点现已深入人心，为人们所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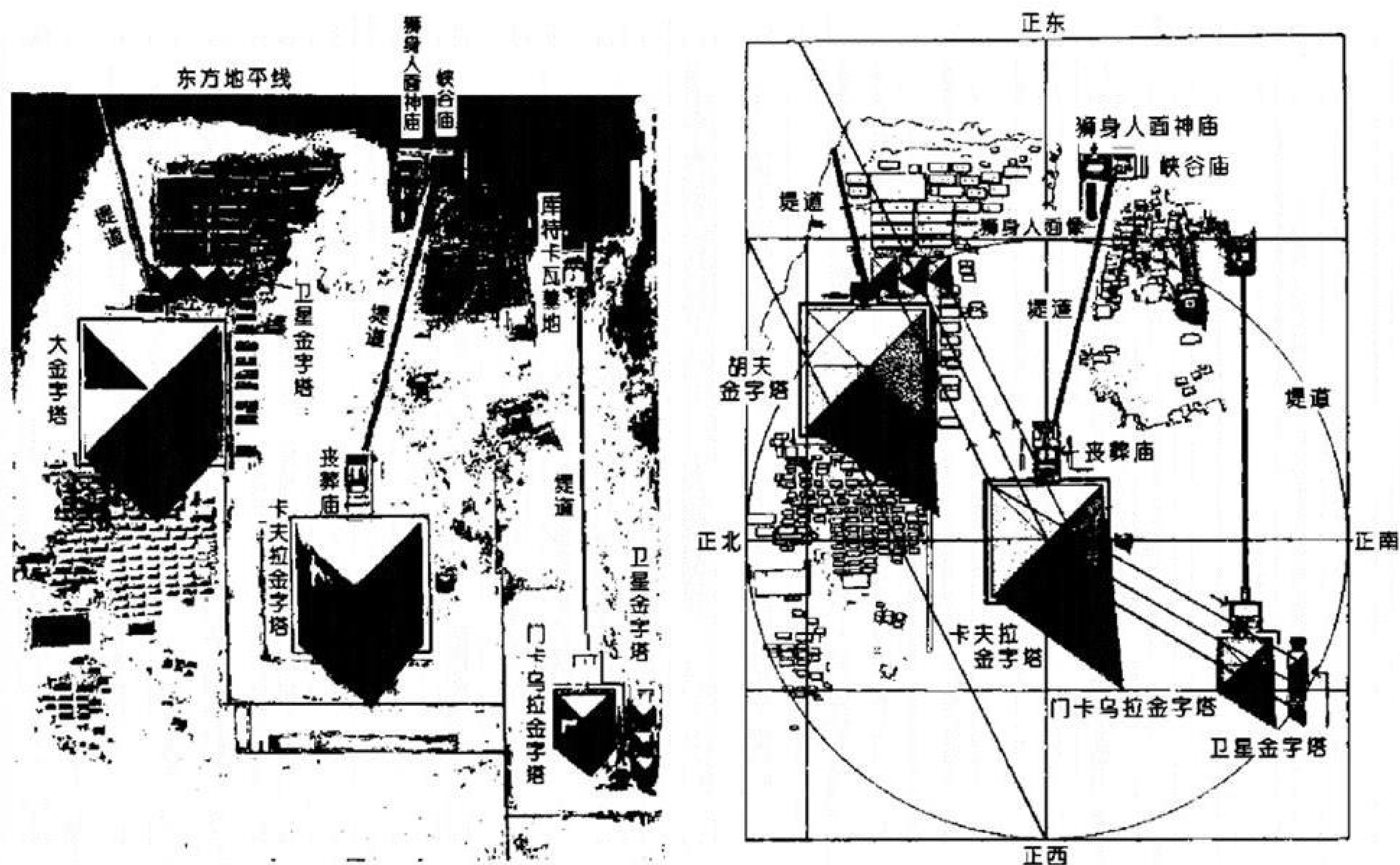
如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成了埃及的标志，是古老神秘的象征（组图 19－25），但它对于当时的古埃及人，它们又有着何等的现实意义呢？

随着古王国时期的覆灭，曾经的基沙高原也伦为了废墟，狮身人面像也被人们所遗忘了很长时间，长期的风沙侵蚀了狮身人面像精美的外表，沙漠也将它头部以下部分全部淹埋。大约过了一千年后，就是在公元前1500年，法老的势力又再次崛起，史称新王国时期。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狮身人面像的两爪之间，竖立着一块重达



图 19－24　基沙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与太阳神庙的复原图



组图 19－25　金字塔卫星照片及各建筑遗迹的方位图

15 吨的巨大花岗岩石碑，在石碑上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记录了一段铭文，讲述了一位英雄拯救狮身人面像的故事：一位年青的王子清走了石沙，修复了狮身人面像，而狮身人面像便任命他为国王以示回报，他就是新王国时期的图特摩斯四世。

当法老们想要记录某件他们希望能够永存的事情时，他们就会把它镌刻在巨大的石碑上。以这块石碑作为线索，就揭示了狮身人面像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人的意义。

石碑上刻着有小鸟一样的象形文字，其实是代表着猎鹰（太阳鸟、太阳神），也就是荷鲁斯，荷鲁斯以鹰的形象出现，是古埃及众神殿中最古老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埃及人相信法老是荷鲁斯的化身，正下方的符号代表着阿克赫特，是两端各有一座山峰的地平线，中间有着代表太阳的圆形符号。

当象形文字的神鹰与地平线联系在一起，就组成了“地平线上的荷鲁斯”（组图 19－26），这正是一位埃及神祇的名字，他守卫着通往来世的入口，这就是狮身人面像在新王国时代的地位。从这两个象形文字上，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出古埃及人在距今约 3500 年使用的象形文字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形象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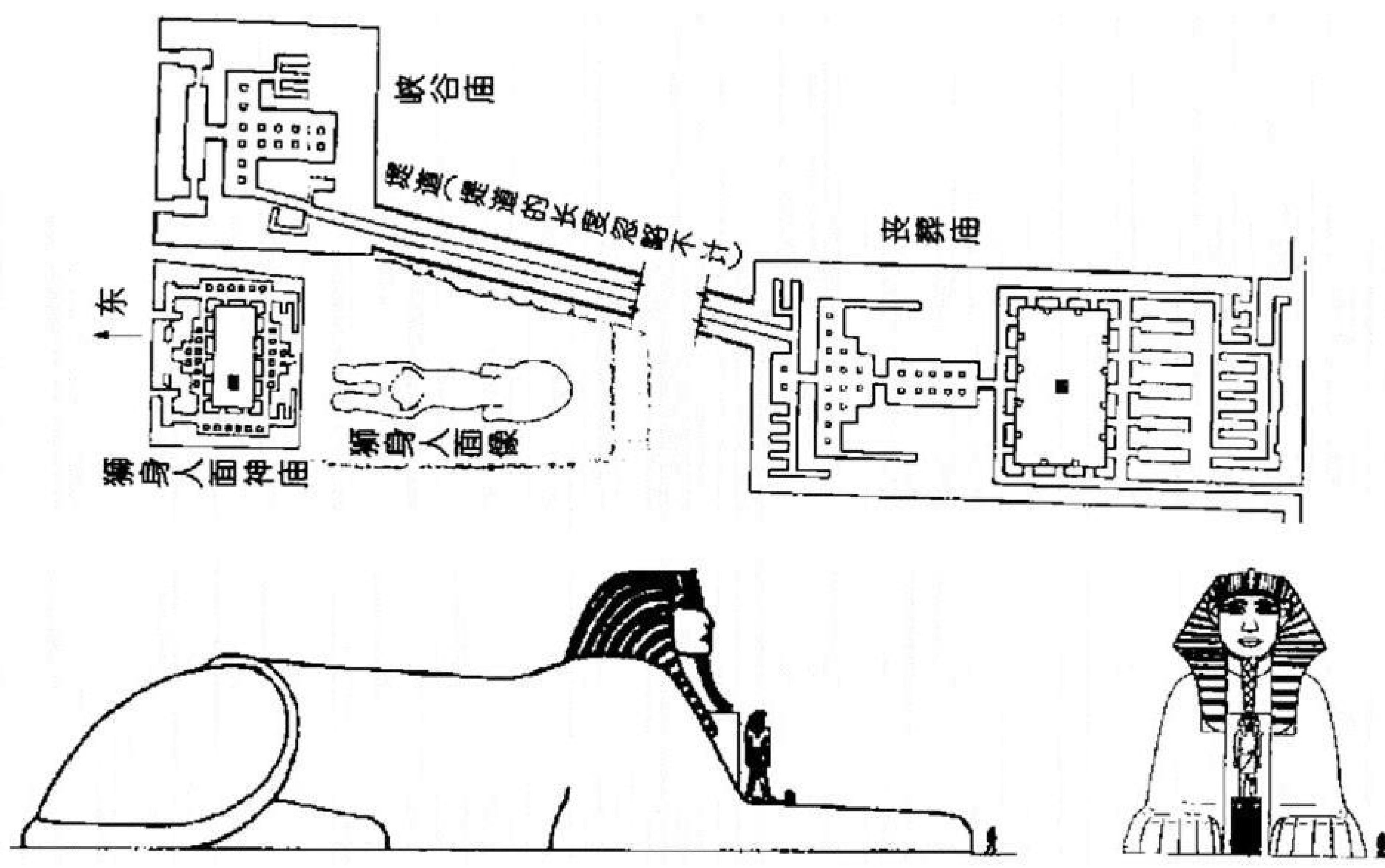


组图 19－26　地平线上的荷鲁斯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地平线是通往来世的入口，正如太阳每日从地平线上落下，次日从地平线上升起一样，他们相信自己也能够像太阳一样得到重生，而作为通往来世的守护神，狮身人面像也是重生过程中的关键。而图特摩斯通过清理沙尘，不仅仅拯救了狮身人面像，更是在拯救一位神祇，他所做的还不止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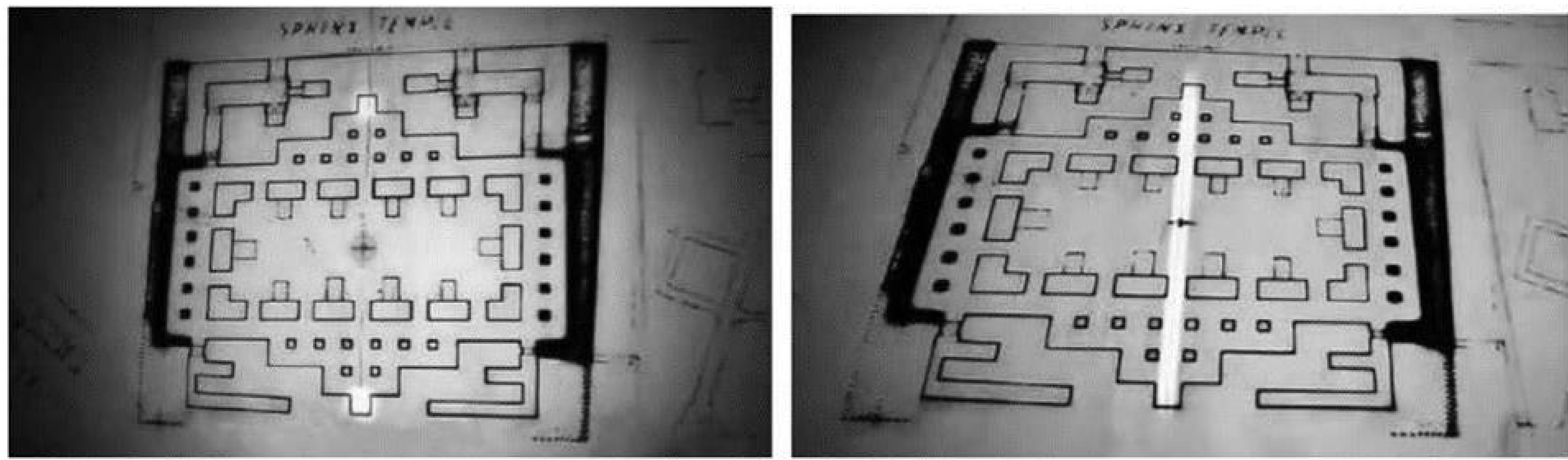
吉萨的狮身人面像，令人敬畏的神明，守卫着通往来世的入口，它的拯救者图特摩斯的雕像则站立在狮身人面像胡子下的前方，远眺着坐落于狮爪之前的皇家教堂——狮身人面神庙（组图 19－27），也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

狮身人面神庙的废墟坐落在狮身人面像的爪前约 9 米之处，在这儿矗立着一些看起来有点像巨石阵的神秘石柱，在它们的后面原本一共有 24 座石柱，考古学家们认为它们应该与一天的 24 小时有关，这看起来就又像是一座宏伟的古代太阳神庙，而庙宇两头发现的两处地下教堂（或壁龛）也巩固了这一观点。这两个壁龛（或教堂）分别在对称的东西两方，它定位了庙宇在东西两方所形成的中轴线，专家们认为这也许是用来标志每年在春分和秋分时节的东方日出到西方日落之处。如果真是这样，笔者也可认为那 24 座石柱或许也与中国的 24 个节气系统有关。因为在一年春分和秋分这两天的时节，昼夜是完全相等的，太阳出没方位所形成的连线也正好贯穿了庙宇两个壁龛圣所的连线。当



组图 19 - 27

太阳初升时，太阳光线会经过狮身人面像的肩部，径直射向第二座大金字塔的南端，并向西延伸，而太阳光线延伸照向的西方也正是春分或秋分时太阳落下的地方（组图19 - 28、组图 19 - 30），（图 19 - 29）中的 AB 连线。



组图 19 - 28　太阳在春分和秋分出没的轨迹贯穿了庙宇两个壁龛的连线

每年这两个特殊时期太阳落山时，便将狮身人面神庙与哈夫拉金字塔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唯一的目标是保证法老能够安全通过来世。狮身人面像依据哈夫拉的形象所建，目的就是护送这位法老的木乃伊躯体，一路追随地平线上太阳的轨迹，去往金字塔安息和通往东方再生。

从以上的描述我们就能看出，这条太阳光所形成的连接直线在此同样也具有一种天文上的意义，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将狮身人面神庙与狮身人面像和哈夫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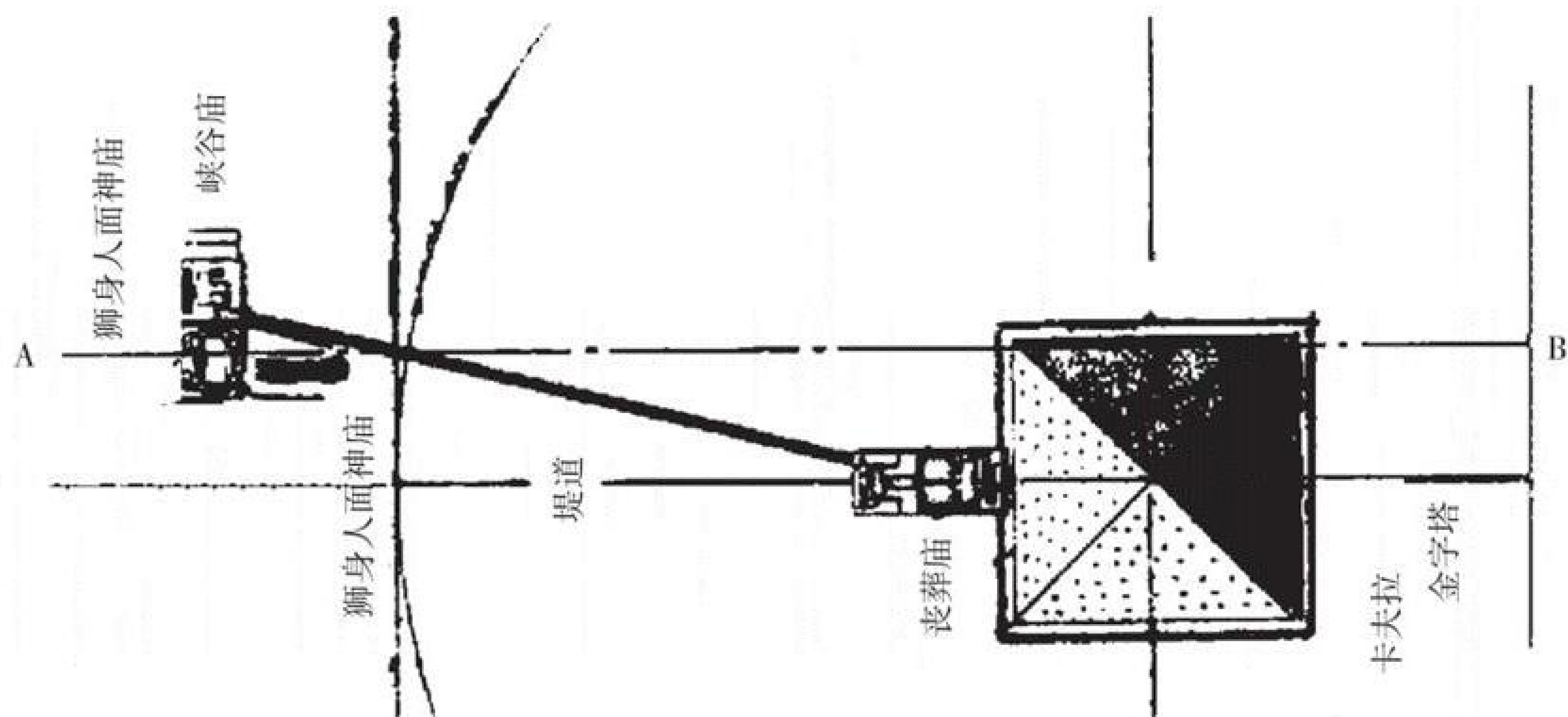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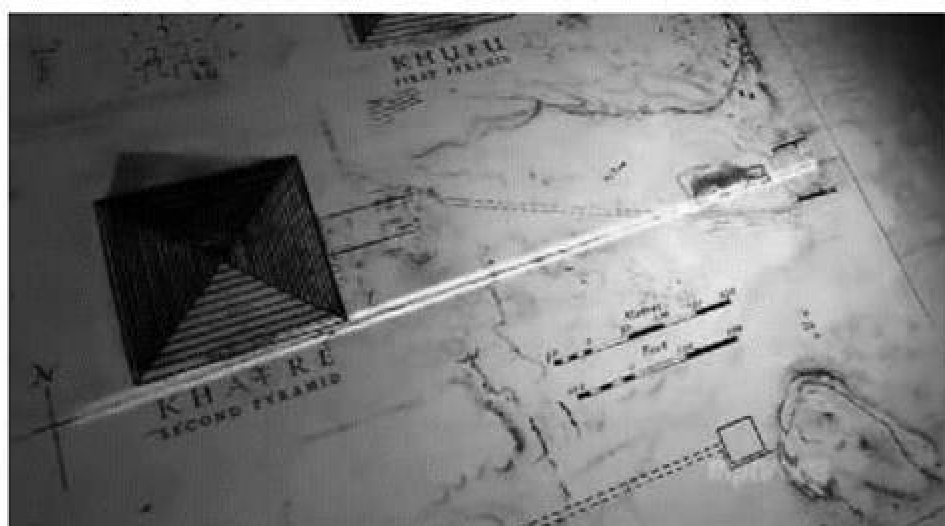


图 19－29　AB 连线经过狮身人面像肩部，指向第二座金字塔南端，向西延伸





组图 19－30　太阳在春分和秋分日出和落山时移动的轨迹贯穿连线

统治时期联系起来的线索。因为太阳和神鹰是国王在天空的象征（或者说国王是太阳和神鹰在人间的象征）。

此处既然说到了狮身人面神庙里隐含着春、秋二分日的概念具有天文的意义，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历法中春分与秋分的概念。

在中国历法中，春分与秋分不但只是具有天文（就是每一年这两天的昼夜是相等的）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阴阳平衡的文化意义以及春天之中气、秋天之中气最浓厚的自然气候意义。

前面笔者说过，尼罗河流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就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在古埃及也没有严格气候意义上的春秋之分，只有三季（洪水季、播种季、收获季）之分。所以笔者认为专家们认为的狮身人面神庙里的春分与秋分概念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它只具有天文上的意义，而不具有气候上的意义。

但在民俗的文化意义上反倒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阴阳平衡的分界点是有紧密联系的，否则，哈夫拉国王与法老也不会将自己再一次投生的希望与狮身人面神庙里东西壁龛圣所、雕刻成自己模样的狮身人面像、哈夫拉金字塔和正东的日出、正西的日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充分说明，在公元前2500年的古代埃及文化里的历法也曾和古巴比伦历法（古巴比伦以春分为每一年春天的开始）发生过碰撞和交汇，也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历法有相通之处。

当然，狮身人面像所要表达的现实意义还不只这些。前面，我们在本章第五节曾提到古埃及把新年的第一天，定在了尼罗河泛滥与天狼星偕日升同时发生的那一天，这被称为“三合一新年”。这样古埃及人确定新年的第一天，虽然达到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天地人和的理想效果，但如果我们把前面提到的“二元”与“三合一新年”联系在一起进行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古埃及文化中代表开始新年的夏至日期，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是一年白昼最长、阳气盛极、即将转衰的日期，而此时一年的阴气却将要转旺了。

如果我们把狮身人面神庙里东西壁龛圣所、雕刻成哈夫拉自己模样的狮身人面像、哈夫拉金字塔和正东的日出、正西的日落联系在一起进行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古埃及文化中代表开始、投生的春分与秋分日期，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是一年昼夜、黑白平衡的日期，而此时一年的阴阳之气却是相对平衡的。

这样，古埃及文化中这两种确定开始的日期中的“阴阳”“二元”之气与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相比，就相差甚远、对应不上了，反而是有些不伦不类了。

而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代表新年、开始的日期却是把立春这一天作为一个年、太极、生命的首尾交替转折点；代表新日、开始的时辰却是把子时作为一个日、太极、生命的首尾交替转折点；代表生命、开始、转生的时期却是对应着青龙、东方、春天，这都是阳气旺盛或开始转旺的时间，符合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这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易学太极文化体系中独特的物以类像原理。

从这就可以看出，由于古埃及最主要的文化中虽然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基础观念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差异。

第七节　古埃及星占学与易学文化

一　《神使之书》中的旬星[①]

《神使之书》即所谓《赫尔墨斯星占之书》，其中包括宗教、几何、炼金术、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61页。

天文、星占和许多其他方面的古老知识。这些知识在古埃及是属于禁秘的，只有最高贵的祭司阶层才被允许接触它们。

《神使之书》中的旬星（decans）系统是纯粹埃及天学家的发明。这一系统既可作为古埃及星神崇拜的典型例证，希腊化时代之后又成为西方星占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同时还是古埃及人数理天文学知识的一个关键部分。

流传下来的星空图，其年代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星空图的星座通常都用固定图像来表示，比如今大熊星（Ursa Major）被置于公牛前腿，而今牧夫座（Bootes）诸星则画成站立的河马与鳄鱼，等等。

划分星空的同时也划分了时间，这正是星占一天文学的大奥妙之一。从保存下来的表格可知，古埃及人记录了363旬星（decans），然而到底是36颗恒星还是36个星座，尚未能完全确定。一年由36个“星期”构成，每个10天，所以称为“旬星”。旬星是每个“星期”内于特定夜间时刻升起的亮星或星座，每10天轮换一个，一年恰好轮遍一周。36个旬星原是沿着天赤道分布的，并等分周天，每个占10°。

“旬星”除确定年份外还有可确定夜间时刻，所以又被称为“星钟”（star clock）。反之，也可以根据观测“旬星”升落来确定日期和季节。

“旬星”体系起源极早，在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133～前1991年）陵墓的棺盖上已经有这种表了，而学者们普遍相信，这种体系至少在第三王朝（公元前2686～前2613年）时就已发端，甚至可能更早。

古埃及人是崇拜多神的，而且他们还有着这样观念，就是每个不同的时刻，都有某种冥冥之中与之对应的“主导神性”（Presiding deity），在操控、主宰着尘世的事务。旬星体系的建立，正与这种观点有关。从一些旬星出现在法王墓室里这一事实来看，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墓室本来就是法老灵魂不灭、在冥界继续沟通天人的神秘场所。

随着波斯帝国的昙花一现和希腊化时代的开始，巴比伦星占学体系进入埃及，已有2000余年历史的“旬星”很快就与黄道十二宫结合起来。例如，在底比斯遗址中曾发现一张完整的表，为公元前4世纪之物，表中有36个旬星名称，它们已与黄道十二宫对应，[①] 每宫三个旬星。此后“旬星”与西方星学联系在一起，并又“反输”出去，以致在希腊、罗马、印度和欧洲中世纪星占学中都见到了它的踪影（图19－31）。

---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61、26页。



图 19－31　黄道十二宫图

图 19－31 中最外圈分为 36 小格，每宫各 3 格，正是埃及的 36 旬星。关于 36 旬星与尘世的关系，或者说神性对人间事务的影响，有一侧比较晚期的材料，所述较为生动。有斯托布斯（Stobaeus）其人，在公元 5 世纪时，收集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古希腊作品选段，其中一段说：

> （旬星）自上天施行影响力于人体。它们又怎么可能不作用于我们，这作用因人而异却有无人能免？所以，我的孩子，放眼宇宙，没有一种巨变不是由它们发射出来的大力所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证，牢记我的话：王位的变更、城市和家族的崛起、瘟疫、潮汐、地震。所有这些，我的孩子，无一不是由于那旬星的形成发生。

这虽出于希腊著作家的转述，但仍能反映古埃及人的观念。有这种观念作基础，当巴比伦星占学进入埃及时，被埃及人欣然接受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　《神使之书》中的“四宫四神”①

后世西方星占学中，有不少重要内容被西方相关学者们认为是与古埃及人有着渊源关系，这里略述其中一项。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61 页。

西方星占学家们将黄道十二宫分成了三类，分别为“主宫”（cardinal signs）、“定宫”（fixed signs）、“移宫”（mutable signs），每类又各包括四宫，对应如下：

主宫	定宫	移宫
白羊	金牛	双子
巨蟹	狮子	室女
天秤	天蝎	人马
魔羯	宝瓶	双鱼

西方相关学者们认为，有证据表明，埃及人早在距今约 3000 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四个“定宫”。在法老赛蒂一世（Seti I，死于公元前 1298 年）的石棺上，发现了代表“四神性”（four deities）的神祇形象，即豺首（Tuamutef）、犬首（Hapi）、鹰首（Qebhsennuf）、人首（Mestha）。

这被认为显然是代表着金牛、狮子、天蝎、宝瓶这四定宫的，尽管此处的“宫”的概念与后世星占学家占持尚有区别。但这却让我们看出了古埃及人的这四个“主宫”、“定宫”、“移宫”，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的系统基础理论有共通之处。

在古巴比伦的星占学体系中，十二宫的每一个宫位都占据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系统基础理论概念中的两个地支（图 19－32），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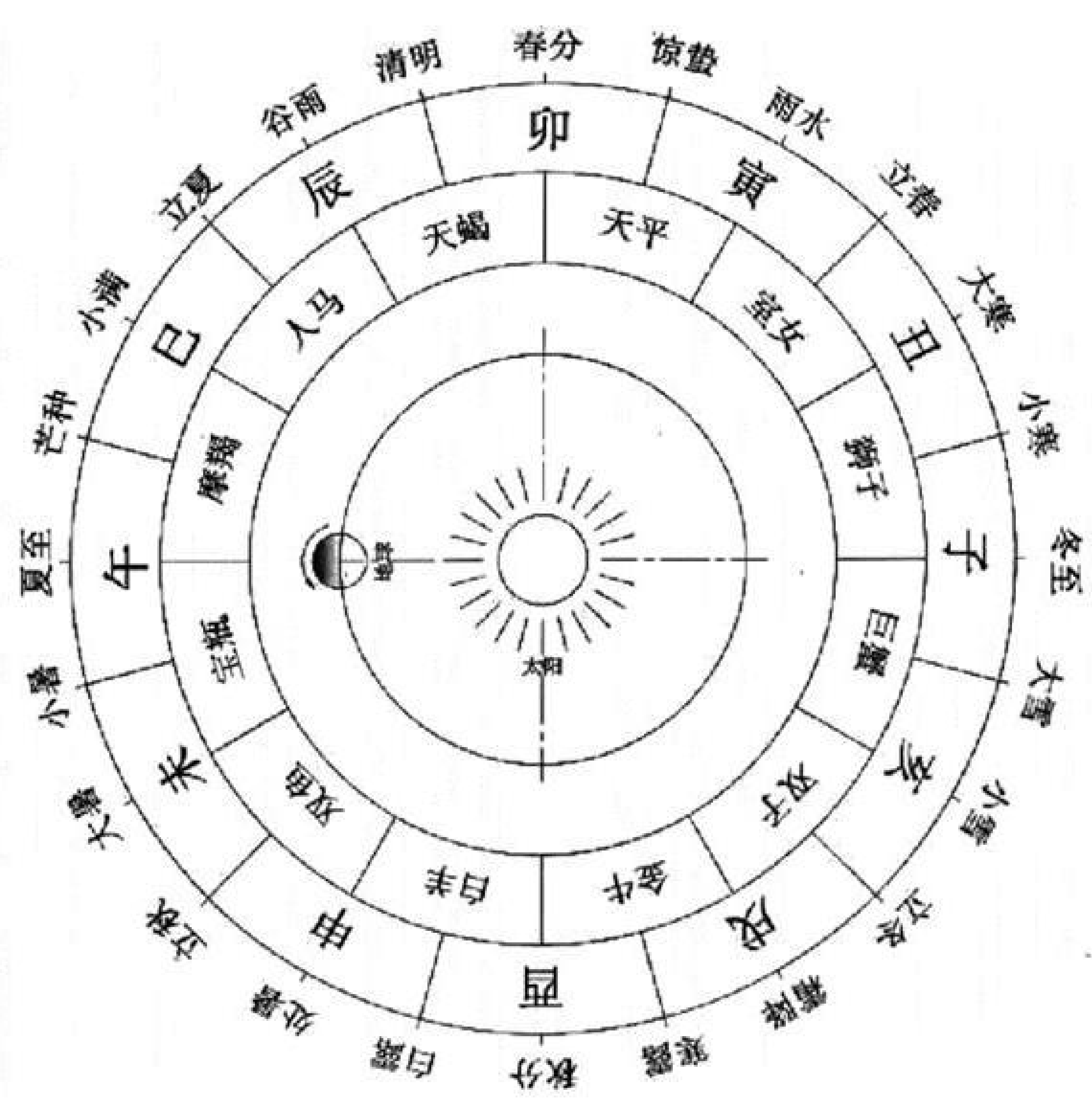


图 19－32　周天黄道带上的十二宫与十二地支

白羊宫会占据申、酉两个地支；金牛宫会占据酉、戌两个地支；
双子宫会占据戌、亥两个地支；巨蟹宫会占据亥、子两个地支；
狮子宫会占据子、丑两个地支；室女宫会占据丑、寅两个地支；
天秤宫会占据寅、卯两个地支；天蝎宫会占据卯、辰两个地支；
人马宫会占据辰、巳两个地支；摩羯宫会占据巳、午两个地支；
宝瓶宫会占据午、未两个地支；双鱼宫会占据未、申两个地支。

在中国易学文化的基础理论中，12 个地支中分别有四正宫、四墓库、四驿马，它们分别是：

四正宫	四墓库	四驿马
子	辰	申
午	戌	寅
卯	未	亥
酉	丑	巳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的基础理论中，十二地支的排法在不同的应用时会有不同的排法，但是在应用易学文化理论进行星占和预测时，它们的排法却是固定的，具体如下：

巳　午　未　申
辰　　　　　酉
卯　　　　　戌
寅　丑　子　亥

这个排法非常清晰地将四个驿马星排在了四个角的转折点上，驿马星在中国易学文化体系里面所包含的最古老的汉语言文学中，都是活跃的动词要素，表示事物是发展的、运动的、变化的。

如果我们看图 19－32，就会发现，子、午、卯、酉之所以叫四正宫，是因为它们不论在上下左右的位置上，还是在东南西北的位置上，永远都处在最正的位置。并且在空间上能分别代表着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在方向上分别能代表着东南西北（从罗盘和时钟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辰（水库）、戌（火库、土库）、丑（金库、土库）、未（木库）为四墓库，它们的五行全都属土，可以表明自然界中所有可以归类到五行中的事物，最终都会归入土中。

所以，不管是古巴比伦人还是古埃及人，他们的星占学思想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天学、星象占卜学、历法学有相通之处，只不过他们的星

占学体系反而独立于其他学科，好像只是为了星占而星占。

三　后来的古埃及星占学

从根据现代西方学者研究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古巴比伦的星占学传入希腊是在传入埃及之后。这源自于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对埃及人的一段描述："他们把每一个月和每一天都分配给一位神，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他的命运如何，一生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希罗多德的记载，显然就是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

据后来西方学者考证，天宫图星占学传入埃及约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现今所知用埃及文写成的天宫图中，年代最早的一份可以确定为公元前39年。以下几份依次为公元前10～前4世纪写于埃及且写在纸草上，然而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这正是希腊化时代产物的标志。再往下的埃及天宫图，无论是用埃及文还是希腊文写成，都已晚至罗马统治时期。

现存的一份著名的古埃及算命天宫图，原来绘于一座两兄弟墓葬的墓室顶上，年代是公元141年[①]。图19－33中的埃及象形文字与图形交错共处，仔细观察，有头绪可寻：上部，从左至右，依次排列着天蝎宫、人马宫、魔羯宫、宝瓶宫（一跪着的女子双手各托宝瓶）、双鱼宫、白羊宫；下面一行，从有段开始向左排列，依次为金牛宫、双子宫、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天秤宫。五大行星及日、月各在何宫，图中也绘得清清楚楚。五大行星多用鹰隼之形代表，在图中的位置依次如下：

水星：敛翼，有蛇形尾，在魔羯宫；

木星：展翼，在宝瓶宫；

金星：双面站立人形，在双鱼宫；

土星：长着公牛之首的鹰隼，展翼，位于双子宫；

火星：展翼鹰隼，头有三蛇，尾亦作蛇形，在狮子宫。

图中，太阳与水星同宫（在摩羯宫），月亮在人马宫。此外，还有三艘小船，分别为天狼星（画成母牛形）和日、月所承载。两臂伸展的男人，按照古埃及星空图绘画的传统习惯，应该是天鹅座（Cygnus）或仙后座（Cassiopeia）。图的四周则是神秘符号和埃及象形文字。从上述诸要素来看，图19－33确实是一张完全够格的算命天宫图，尽管其形式与后世的标准形式相差颇大。当然，希

---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58页。



图 19 – 33　绘于一座两兄弟墓葬的墓室顶上的古埃及算命天宫图

腊化时代的埃及算命天宫图，毕竟还只是早期作品，比较简单、原始，也在情理之中。

希腊化时代与生辰星占学有关的埃及星占文献，除绘于墓室顶上的算命天宫图外，还保存下一些纸草书。与生辰星占学有关的纸草文献中，比较重要的有《柏林纸草书》（Papyrus Berlin）8279 号和《斯托巴特表》（Stobart Tablets）。

最后还需要指出，这些所谓“纯粹希腊化的”埃及星占学文献，其最终来源，都是巴比伦的。按照西方学者比较普遍的看法，埃及人在生辰星占学，特别是算命天宫图这一方面，只是接受、采纳和传递而已，几乎没有任何由他们作出的新发展。

纯粹的星占学在古代的记载中，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有预占战争胜负、年成丰歉、王朝盛衰之类的功能，就是在理论上将夜晚天空中所呈示的天象，与大地上的人事、方位对应起来。

从已发现的史料看来，在西方世界，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后来以“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在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 334 年）之前，军国星占学就被希腊人传入了埃及，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第八节　古埃及的分野与易学文化

一

在现今所知第一手古埃及纸草书的星占文献中，年代最早者当推著名的《维也纳世俗体交蚀征兆纸草书》（A Vienna Demotic Papyrus on Eclipse and Lunar-Omina，由 R - A - Parker 将此件整理发表，系由 Providence，R - I - 1959 出版）。虽已是罗马统治时代的抄本（约公元前 2 ~ 3 世纪），但因其中全未提及黄道十二宫，西方学者普遍相信它是公元前 4 世纪亚历山大远征之前的作品，但显然仍是“源于巴比伦的”。维也纳指该件收藏地（本书中称引纸草书而冠以地名者，皆同比例），世俗体（Demotic）指该纸草书所使用的埃及象形文字的字体（图 19 - 34）。与碑铭文（Hieroglyph）及祭司体（Hieratic）相比，世俗体最晚出，笔画也最简洁。许多已发现的埃及纸草书星占文献都系用世俗体所书写。



图 19 - 34　埃及纸草书星占文献

在《维也纳世俗体交蚀征兆纸草书》中，保存着埃及星占学的几套时间分野体系。这些分野体系所涉及的地区，除埃及本身外，还有其周边诸国：叙利亚、克里特（Crete）、希伯来、阿莫（Amor）。第一套分野将日、月天象分别对待，对于太阳天象的对应之法如下：

冬 4 月至夏 3 月：希伯来

夏 4 月至洪水 3 月：埃及

洪水 4 月至冬 3 月：(缺损)

这里的冬、夏、洪水三季，就是本章第一节一中提到的播种、收获和洪水三季。上表的意思是，自冬季第四月至夏季第三月，有关太阳的天象（如日食等）兆示希伯来土地上的国运；自夏季第四月至洪水季第三月则兆示埃及本土的国运，其余类推。关于月的天象，则分配对应之法又有不同，将一年 12 月分为 4 组，每组 3 个月，分别对应各国：

洪水 4 月至冬 2 月：希伯来；　　冬 3 月至夏 1 月：阿莫；

夏 2 月至 4 月：埃及；　　洪水 1 月至 3 月：叙利亚。

其意义与上述太阳部分相仿。第二套分野体系更为规则，将各国逐月分配，每年轮流，可列表如下：

季 / 月 / 国	洪水	播种（冬）	收获（夏）
阿　莫	1	1	1
埃　及	2	2	2
叙利亚	3	3	3
克里特	4	4	4

该表的意思是：每季第一月呈现的天象兆示阿莫国土上的吉凶，第二月兆示埃及的……这套体系对日、月天象一样适用。

古埃及人将一天分为昼、夜两部分（图 19－35），自日出至日落为昼，自日落至日出为夜，昼、夜各 12 小时。古埃及人的这种二元世界观来源于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的阴阳世界观，只不过中国以早子时和晚子时来分昼夜。古埃及人的 24 小时与各国分配对应，也形成一套时间分野：

昼 12 时	夜 12 时
1～4：埃及	1～3：埃及
5～8：克里特	4～6：希伯来
9～2：阿莫	7～9：阿莫
	10～2：叙利亚

这样，每昼夜 24 小时之中，“埃及世界”的诸国各有其地位。

除上述各种时间分野外，《维也纳世俗体交蚀征兆纸草书》中也有一种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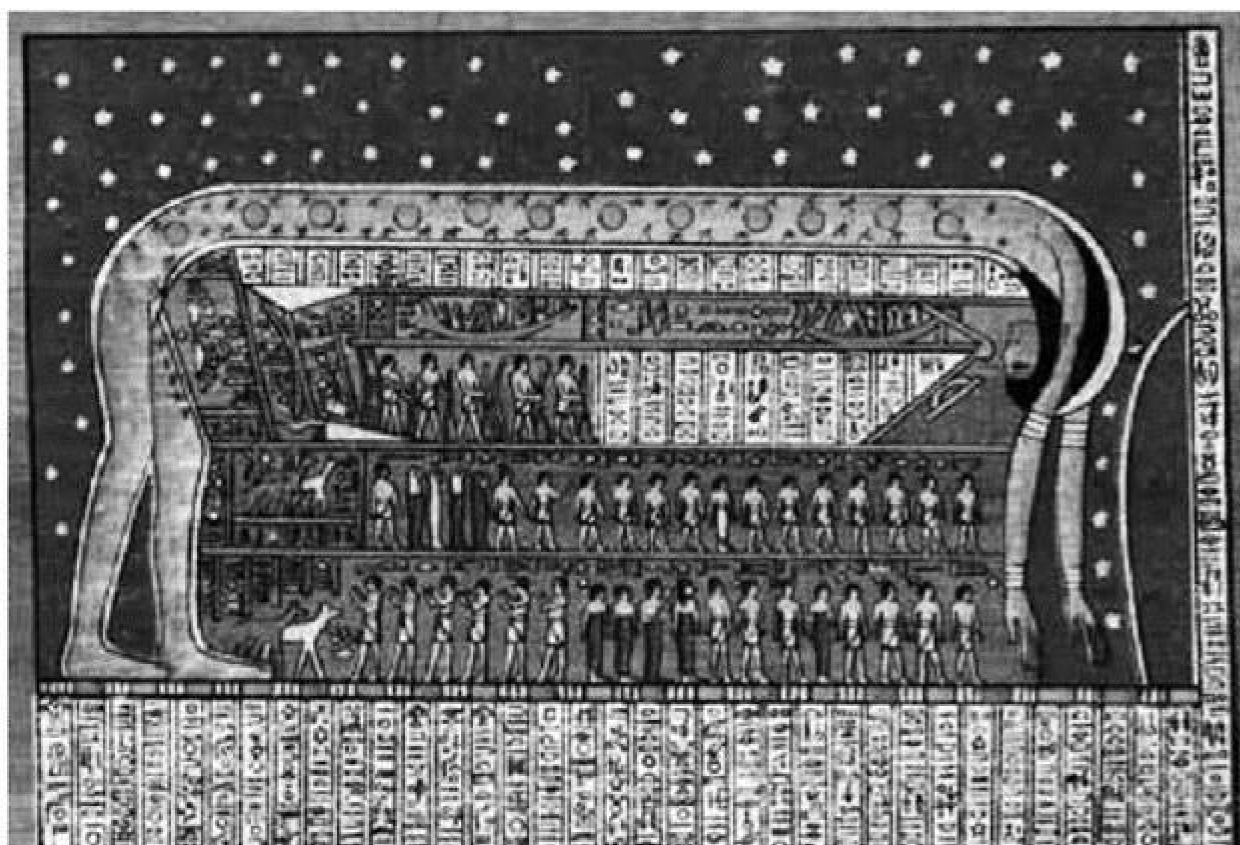


图 19 – 35　来自拉美西斯六世墓室天花板的一幅作品，描述了关于天神努特和昼夜的创生

简单的天区分野，将天区与地区作如下对应：

北天—希伯来；中天—克里特；南天—埃及。

这种对应是专为日蚀征兆而设的。关于月的天象及征兆，也有类似分野，可惜纸草书在此处残缺了，仅剩下“天区四部……”等几个字，详情已不得而知。

分野体系设定，就可以依据所见天象对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事进行预占了。这些故辞通常有着比较一致的表达形式，以《维也纳世俗体交蚀征兆纸草书》中一则为例：

如果月蚀发生于夏季第二月，因该月属于埃及，它名下促进大部必遭征伐，军队必荷戈出战。

而在《开罗纸草书》（Papyrus Cairo）31222 号中，可以见到更为典型的埃及风格的军国星占学占辞：

如果索雪斯（Sothis）星（古埃及人对天狼星的另一称呼）升起时，木星适在人马宫，那么埃及之王将统治整个国家；将出现一个敌人，但国王能再次将其摆脱；许多人将会反叛国王；一次固有的洪水将到来；谷价腾贵；……一位神祇的葬礼将在埃及土地上出现……

埃及星占家特别关注天狼星升起时刻的天象，往往依据这类天象来作出预言，除上引一例之外，还可见到，如：

若索雪斯星升起时，月亮正在人马宫，那么……

如果索雪斯星升起时，水星位于双子宫，则……

从广大使用黄道十二宫这点来看，这种星占模式显然是巴比伦星占学输入之

后所形成的。当然，埃及的本土色彩仍很浓郁。

这种用星占学预测的案例记载，中国的史料就曾记载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这样的案例。而且在中国的《地母经》中，也预测描述了哪年什么地方（分野）会有水患，收成、物价会怎样等。

二

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述人对黄道十二宫系统的共同贡献，又经过了希腊—拉丁化的承传。其中明显还保留着埃及色彩的有白羊（Aries）、金牛（Taurus）、室女（Virgo）和魔羯（Capricornus）四宫。

白羊宫[①]：神物形象为人身羊首，神明为阿蒙。埃及神祇阿蒙，在埃及神话中，有时被表述为牧羊，更经典的神像又头戴羽冠（图 19－36）。

金牛宫[②]：神形为牛，神名为阿匹斯，阿匹斯即古埃及神话中的圣牛，又名天牛（图 19－37）。



图 19－36 头戴羽冠的阿蒙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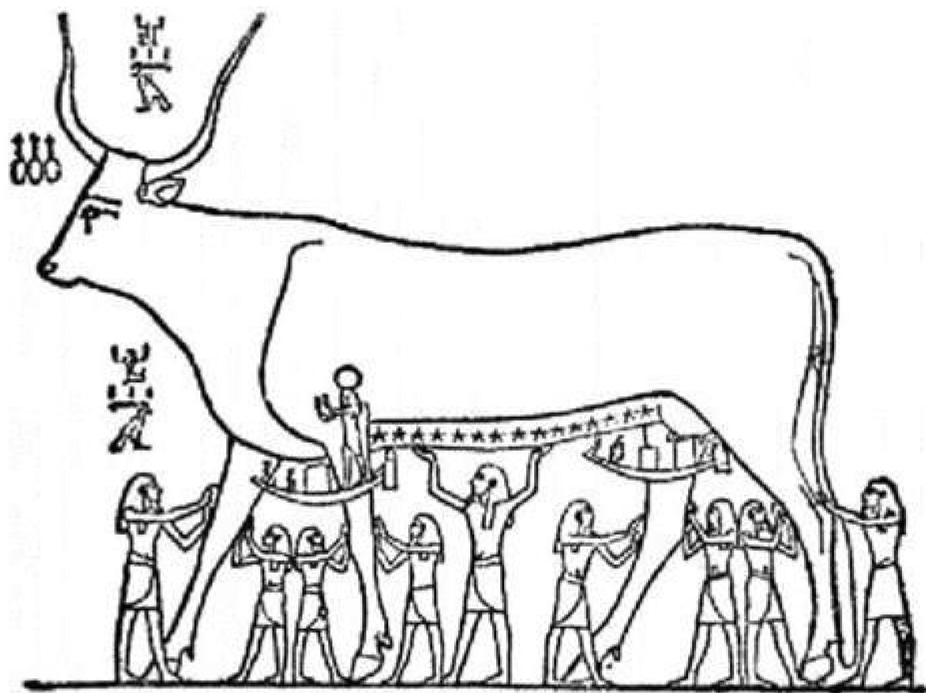


图 19－37 圣牛阿匹斯

室女宫：神形为手持双穗的女子，神名则是大名鼎鼎的伊希斯。女神手中的谷穗是生育、繁殖的象征，室女座中的第一星——室女座阿尔法星名叫斯比卡（Spica），正是拉丁文“谷穗”之意，其间的历史脉络清楚可见（图 19－38）。

魔羯宫[③]：神形为犬首人身之物与另一怪兽，神名为安努毕斯。安努毕斯为古埃及神话中的墓地之神，他要负责将尸体制成木乃伊。在“冥间审判”中，

---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61 页。
②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60 页。
③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61 页。

安努毕斯长官巨大的天秤，称量死者之心是否合乎正义，这种场合中他又常被绘成豹首之身。安努毕斯的标准形象则为犬首人身之物（图 19－39）。



图 19－38　阿蒙神与伊西斯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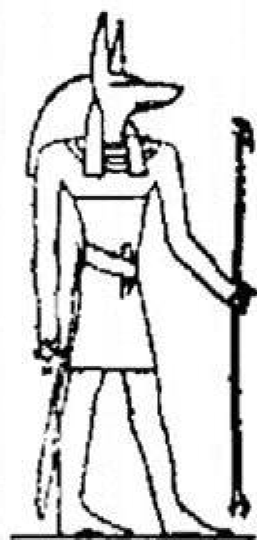


图 19－39　犬首人身的安努毕斯神

此外，埃及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黄道十二宫，或者成为兽带（zodiac，也译作黄道带）。1798 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时，在一座女神庙的室顶上发现这个兽带浮雕。原件现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女神庙是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统治时期建的，兽带的天象日期被标定为公元 17 年 4 月 16 日，但这种环形兽带系统（参本章第五节的图 19－22）在埃及的起源究竟有多长历史，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十二地支是相通的。

小结

从古埃及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象形文字、二元思维方式、新年第一天的选定、昼夜的划分、分野以及星占学的“四定宫”，还有春分、秋分具有天文意义的概念中，都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有相通之处。

古埃及的金字塔虽然宏伟，但在文明当中只能算作坟墓，不能当做古埃及文明的外在标志性器物。如果我们把人面狮子像作为古埃及文明的外在标志性器物，那么这个人面狮子像却又不能单独说明什么，只有与天地人文景观结合起来，才表达说明了天地人和的意境。

| 第二十章 |

古希腊文化与易学文化

第一节　古希腊的地理与神话

一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北部，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还包括爱琴海、马其顿、色雷斯、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这片土地见证了欧洲最早的两大文明：米诺斯文明及迈锡尼文明。公元前五六世纪，产生了璀璨的希腊文明。

希腊半岛上的气候分为地中海型气候及大陆型气候。北部和内陆由于多山，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南部地区及各岛屿则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气温变化不大，冬季气温在 6 ~ 12 摄氏度之间，夏季则在 28 ~ 31 摄氏度之间，而且夏季比较长，由 4 月一直持续到 10 月中旬。

由于在希腊的地理位置上具有多山多岛、海岸线长而曲折、土地贫瘠、雨量稀少、淡水资源匮乏的特点，所以希腊的山岛上缺少林木，而盛产各种大理石和岩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希腊贫瘠的半岛上根本就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发展。

奴隶社会的希腊半岛，建立了 200 多个奴隶制城邦国家，每一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城郊农村组成大小不等的国家，各自为政。其中最强大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由于国穷民贫，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城邦国家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弱肉强食，为了保存自己，掠夺财富，城邦国家实行强国强兵政策，在城邦内部实行民主政治，自由民直接参与城邦治理。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会促使他们思考，正所谓穷则思，思则变，变则能通，他们就要走出去学习人家的东西。所以他们在吸收、消化了埃及和西亚等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转化、建立、形成了古希腊的文明，也称爱琴海文明。

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没有希腊，就无法想象欧洲文明会是什么样子，今日西方世界无处不遗存着希腊文明的传统。

二

希腊神话产生于希腊的远古时代，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曾长期在口头流传，是古希腊人的集体创作，关于神的故事与英雄传说的总汇，散见于《荷马史诗》、赫希奥德的《神谱》以及古典时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等著作中，因而同一个神话人物的形象或故事情节，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往往会有出入，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现在常见的系统的希腊神话都是后人根据古籍编写的。

古希腊神话中的许多神都是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神中转化过来的，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宙斯（Zeus）就来源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马杜克（Marduk）；古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就来源于古巴比伦神话中的伊什塔尔（Ishtar）。

第二节　古希腊哲学、数学观与易学文化

一

西方学者们普遍都认为，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都为后来的希腊提供了某些方面的知识，但他们谁也没有发展出哲学和科学。我们现在的许多人所了解的哲学和科学，大多都是西方的古希腊人所发明和定义的，古希腊文明的出现，导致了西方人类思想活动的迸发，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件之一。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西方的文明发展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巅峰时期。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古希腊人在艺术、文学、科学和哲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些成就汇聚成了源源不断的激流，从而奠定了西方文明文化的普遍标准。

而西方文明的根基却是始于2500年前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在古希腊能形成这样的传统基础，首先要感谢公元前六世纪初期米利都哲学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泰勒士（图20－1）。他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他认为“万物皆

由水构成”或“万物皆水成”[①]，哲学与科学也由此而产生。这种“万物归一”的观点是一种相当可敬的科学假说，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功绩。但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他却未能做出解释。

更加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观点与中国易学文化中“太一生水”的观点却是惊人的一致（参中篇第十二章第六节“‘太一生水’的准确意思”）。

当泰勒士把万物的基始归结于水的时候，这俨然已经是对世界总体图像的一种笼统的把握了，而它也常常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管子·水地篇》上的话：“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



图 20－1　泰勒士



图 20－2　毕达哥拉斯

二

公元前 532 年曾名噪一时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图 20－2），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点，就是“万物皆数”。[②]

伯特兰·罗素认为：由此如果想认识周围的世界，我们就必须找出事物中的“数”。一旦数的结构被抓住，我们就能控制整个世界。这的确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观念。虽然它的意义在古希腊人文主义时代之后被暂时埋没，但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对古代资料产生兴趣的时候，它的意义得到了更多的认同，这是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一个主要特征。[③]

西方人普遍认为，是毕达哥拉斯在几何学方面发现了一个著名的定理——“勾股定理”。[④] 如果我们读懂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洛书》就会发现，“勾股定理”隐藏在其中（参中篇第十四章第二节）。

---

①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 19 页。
②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 29 页。
③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 29 页。
④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 30 页。

毕达哥拉斯提出了排列卵石或符点的计数方法。这种计算方法的确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拉丁文中的“计算（calculation）”就有“摆布石子”[①] 的意思。如果我们把从贾湖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石子与此联系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拉丁文中的“计算（calculation）”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数”“术”结合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毕达哥拉斯早年曾在埃及游历,[②] 在那里获得了他的数学知识。前面笔者曾说道，古埃及人的世界观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许多观念是一致的，那么毕达哥拉斯是否也在古埃及游历的过程中接受过这样的观念和知识呢？

这个问题，笔者不敢十分肯定地给出答案。但笔者可以十分的肯定，在是“迦勒底星占学”被带入希腊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已经具有了一些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知识与概念。

如果我们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中的“数”，来理解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这个观点，就会发现，《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中的“数”才是“万物皆数”真正唯一的准确解析答案（参中篇第八章《贾湖人“数”之哲学》）。

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哲学事物，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由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诡辩家篇》中完成的。事实上，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之一正是逻各斯，我们首次遇到这一术语是在论及毕达哥拉斯与赫拉克利特的时候。它包括语词、量度、准则、论证、原因等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想抓住希腊哲学的精神，就必须牢记这一系列含义的重要性。“逻辑”这个术语显然就是由它派生出来的。逻辑学就是有关逻各斯的科学。[③]

我们在研究中国汉语言的时候，同样就采用了这样逻辑思维的方式，在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中，就找到了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逻辑关系（参中篇第十一章《易学与汉语言》）。正好符合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语言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哲学事物。

① 〔英〕伯特兰·罗素著《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11月，第30页。
②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27页。
③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175页。

四

希腊哲学在各个时期都受到许多二元论对它的影响。它们一直以不同的形式成为哲学家们撰写或争论的主题。其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对真和假的区别。在希腊人的哲学思想中，与真/假密切相关的是善/恶论与和谐/冲突二元论，其次还有至今仍然属于热门话题的现象/实在二元论。同时，还有精神/物质的问题、自由/必然的问题甚至还有宇宙论的问题，以及事物是“一”还是“多”，是简单还是复杂等问题。最后，还有混乱/秩序以及无限/有限二元论。[①]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古希腊的二元论无非就是古埃及二元思维方式和二元世界观的翻版。它们的这种二元世界观又都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阴阳学说或阴阳世界观有共通之处。

第三节　古希腊的星占学

一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位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

希腊人真正正面接触到巴比伦星占学，恐怕要到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远征之时。古希腊作家阿利安（Arrian）留下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有这样的一件事：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渡过底格里斯河之后，就向巴比伦进军。半路上遇上一些迦勒底占卜家。他们把亚历山大从后友那里拉到自己一边，请求他停止向巴比伦进军。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从别卢斯（Belus）神那里得到神谕，说亚历山大那时到巴比伦去一定会凶多吉少。可是亚历山大却说道：“预言家，预言家，预言最好的事，才是最好的预言家。”那几位迦勒底人说：“不过，国王陛下，您可别朝西看，也别带您的部队往西走。您最好带着您的部队向后转，往东走吧。”

亚历山大并未听从这几个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不过，我们前面说过，亚历

①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第16页。

山大倒真是死在巴比伦城中。当然，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是否有无先见之明不是我们要关心的星占学问题，但从上面的故事中足以见到端倪了。[①]

二

贝罗索斯把星占学传入希腊，还建立了一所正式的星占学学校——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这种学校了。据说，他在这所学校里向希腊生徒系统地讲授巴比伦星占学，他使用的教材名为《别卢斯（Belus）之眼》。

有些现代学者相信，从亚述王朝末年名王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的王家图书馆中出土的大量泥版文书中（图 20－3），有 70 份表，正是这部星占学教材的原本。[②]



图 20－3　尼尼微的王家图书馆中出土的泥版

贝罗索斯在他的《迦勒底》一书中谈历史时，也同样谈论星占学，例如他谈到行星与太阳发生“合”时，会导致地震。他还谈到行星如果聚合在巨蟹宫中，洪水就将遍布世界，人类将会靡有孑遗。

贝罗索斯去世之后，他在科斯岛上的星占学教学事业由安提帕特路斯（Antipatrus）和阿基拿波罗斯（Achinapolus）两人继续下去。后者教授星占医学，并且在巴比伦之外的星占学家中第一个提出，排算算命天宫图应该依据此人受孕成胎的时刻，而不是依据他降生的时刻。这种主张后来在一些波斯星占学那里曾颇有影响，但生辰星占学的主要流派还是依据出生时刻排算天宫图。[③]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42 页。
②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43 页。
③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43 页。

此外，从各种迹象来看，贝罗索斯虽然很可能将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都一起介绍到希腊去了，但希腊人似乎对军国星占学的兴趣不大，后来在他们手里大大发展的，是生辰星占学这一支，从此成为西方星占学的主流。

许多中西方的相关学者都认为，在星占学从巴比伦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中，传入希腊无疑是意义最为重大一步。因为正是在这里，星占学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并在希腊化时代以及继之而来的罗马帝国时代，向几乎整个西方和中近东地区扩散开来。诺吉鲍尔的权威性概述就认为："星占学的根，无疑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它从所有关于征兆的文献中浮现出来。……我们从希腊星占文献中可以发现，希腊人大大发展了星占学。古代星占学的真正中心，无疑是在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从这里，星占学向外扩散，最终遍布整个世界。"①

笔者认为，这样轻易地下出结论，实在有些欠妥。

第四节　古希腊星占学与易学文化②

在古希腊自身的传统知识和思想中，也有完全适宜星占学生长的土壤，这样就为日后希腊化的星占学提供了很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就是说在"迦勒底星占学"被带入希腊之前，古希腊人自己也有自己的神秘文化，他们这些神秘的文化既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神秘星占文化有些联系，其中也有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相通的一些元素。

一　择日之说

所谓择日，基本思想是：一年中的不同日子（或一月中的，或一日中的不同时刻）有吉有凶，有的宜做某些事而不宜做另一些事物，因此行事时要选择合适的日子和时刻。

赫西奥德（Hesiod，图 20－4）是古希腊继荷马之后最早的诗人，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约在公元前 7 世纪上半叶。赫西奥德有多种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43 页。
② 参见江晓原著《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65 页。

著作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长诗《工作与时日》。这部长诗的最后部分，竟全是讲择日的，非常详细，兹摘录若干如下：

下述这些日子是无所不知的宙斯（Zeus）定下的，只要人们不把它们搞错了。

首先，每月的第一、第四、第七天皆是神圣至日。……第八天、第九天——上旬里至少这两天是特别有利于人类劳动的。十一日和十二日两天都是好日子，无论用于剪羊毛，还是用来收获喜人的果实……

每月中旬的第六天非常利于植物，但有利于男孩降世，不利于女孩出生，不利于姑娘出嫁。每月上旬的第六天不适宜女婴出世……这天适宜男孩降世。但是，那天出生的人将喜欢挖苦、说谎、狡辩和私通。

在伟大的第十二天，聪明人应该诞生，这样的人最有深谋远虑。每月第十天是男性降生的吉祥日，每月中旬的第四天是女性降临的吉祥日……

要躲过每月第五天，因为这些天艰难可怕。在某个月的第五天，据说厄里倪厄斯（Erinyes，复仇女神）曾帮助了誓约女神的降生，而誓约女神是斯特里夫（Strife，不和女神）生下来追究违誓者的。

每月中旬第九天愈晚愈好，但中旬的第九天完全不害于人类，这天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出生吉祥日……

以上说的这些日子对大地上的人类是一大恩典。其余日子捉摸不定，不那么吉利，不带来任何东西……一个人能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做自己本分的工作，不冒犯永生的神灵，能识别鸟类的前兆和避免犯罪，这个在这些日子里就能快乐，就能幸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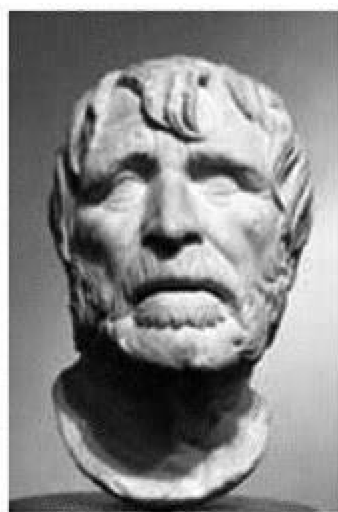


图 20－4　赫西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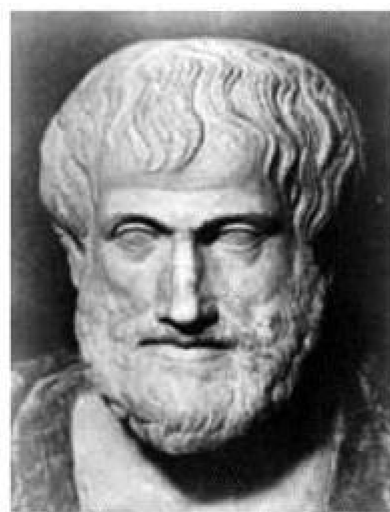


图 20－5　亚里士多德



图 20－6　希波克拉底

这种择日的学说，在本质上与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实有相同之处。在古代印度星占学中，择日之说发展得更为完备周密，而且印度古代的星占—天文学与巴比伦及希腊都大有渊源。

而这种择日的思想学说，在古代中国堪称源远流长。周文王著于公元前1100多年前的《周易》，里面勒［革］卦的卦辞就非常明确地谈到了择日，而它比古希腊的历史却要早得多。

帛书和通行本《周易》勒［革］卦的卦辞原文如下：

勒［革］，巳日乃復［孚］，元亨，利贞，悔亡。

经笔者用六爻易术的逻辑理论进行分析后，解读如下：

有时太阳还没落下去，月亮已出现在天空中了，而有时太阳已经开始升起了，可月亮也还在天空没有落下去，这个日月同辉的情景，就像是大自然这个主人用牛皮绳把太阳和月亮都同时勒在了天上一样。选择形象像蛇与绳子的“巳”日，作为制作牛皮绳的好日子，是会有收获的，这是开始就亨通和有利的征兆。日月同辉分离开后的情景，就像是大自然这个主人后悔勒不住了，松开了牛皮绳一样。又像在制作过程中没有控制管理住质量和工艺，而造成了损失，心里在后悔、难受一样。

而且在《周易》的这个卦中，还涉及日月同辉的天象自然景观（请参笔者所著的《周易卦爻辞新解》或《周易卦爻辞真解》）。

二　星占气象学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学术的代表人物，他曾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也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作者。在他流传下来的大量著作中，集中讨论天学的有《论天》和《天象学》两种。还有一个短篇《论宇宙》中也谈到一些。

在《天象学》中，亚里士多德（图20－5）用了不少篇幅谈论彗星。他认为彗星的构成性质类似火，彗星出现常常是干旱和大风的预兆。

这种认为天象能够影响气象的思想，在古代是常见的，后来又由此演化为所谓“星占气象学”，专据星象以预言气候气象。

还有一件广为人知的著名故事不妨在这里一提，即吕底亚人（Lydians）和美地亚人（Medians）之间因一次日食而罢战言和，而这次日食曾由古希腊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Thales）作出预报。希罗多德《历史》中记其事云：

> 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爆发了一次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五年……不过在第六个年头的一次会战中，战争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即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伊奥尼亚人（Ionians）预言了这个事件，他向他们预言在哪一年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而实际上这话应验

了。美地亚人和吕底亚人看到白天变成了黑夜，便停止了战争，而他们双方便都十分希望达成和平的协议……这两个民族像是希腊人一样地宣誓缔盟。此外，他们在宣誓时，在臂上割伤一块，并相互吸吮了对方的血。

三　星占医学

在公元纪元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星占学曾激起古希腊社会中许多群体的强烈共鸣。其中不仅包括哲学和科学家，也包括像“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这样的人物。希波克拉底（图20－6）向他的门徒传授星占学，以便让他们掌握病人的“凶日”，这与前面所谈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中的择日之说是一脉相通的。

他曾说：“谁要是不理解星占学，那就不是医生而是白痴。”希波克拉底的这些观点后来成为欧洲医学界的悠久传统，也使“星占医学”这一脉日渐光大。继他之后的大医学家盖伦（Galen）也坚信星占学。一些希腊医生是根据星占学的象征和兆示来决定医疗措施的。

希腊上层人物对星占学的兴趣之大，在许多传世的典籍中都有反映。

当时风靡希腊世界的是生辰星占学，即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日、月和五大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位置，预言其人此后岁月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生老病死、穷通祸福以及此人在性格、体质等方面的特征。

在中国，易医同源，它们都来自大自然的法则，在《周易》中就有许多卦的卦爻辞涉及疾病，比如：鼎［鼎］卦、豫［豫］卦、夺［兑］卦、无孟［无忘］等。

四　五星与五行

在这个时代的星占学家心目中，尘世间各种事件与日、月、五大行星之间，有着密切的对应及互动关系。例如，太阳常与生命联系在一起，而且一天之中不同时刻的阳光有不同性质，据说这种观念来自埃及人。又如，火星在星占学家那里总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金星则对应于爱情，水星对应于速度和情报讯息，等等。同时，行星又与古代神话传说联系在如土星和克洛诺斯，木星与宙斯之类。关于这些联系的记载和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关于五大行星的“性质”或“性格”，又有一套说法。比如，木星和金星被认为是仁慈的，火星和土星则会相冲相克，而水星则是中性的。行星和月亮的影

响力，则依据它们对于地球与太阳相对位置而有大小不同，金星、水星、月亮的影响力弱，火星为中等，木星与土星则强。与此相对应，金星和月亮是“湿性”的，而湿性代表雌性、女性；反之，木、土二星则代表雄性、男性；此外竟还有“雌雄兼性”的水星。在这类玄虚荒诞的说法中，有一条是关于各行星的冷与热，距离越远的行星，被认为越冷，这一点倒与事实相符，不过恐怕应该视为古时星占家“歪打正着”的结果。

这里不妨谈一下古代西方星占家“行星”一特殊的用法。古人只知道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在西方和中国都一样。西方人将此五个天体称为“行星”，中国古代则称为“五星”和“五纬”（古代中国人将行星称为“行星”一词之内，这显然是因为这七大天体都是相对于恒星背景下不断运动之故；与这一意义相对应的措辞，中国古代也有，即所谓“七政”。五行与七政，总是古代星占学家特别重视的对象）。

这里还可以顺便看一下五大行星名称在西方古代星占学中的演变。先列表如次[①]：

	金	木	水	火	土
迦勒底名	Ishtar	Marduk	Nebo	Ninib	Nergal
希 腊 名	Aphrodite	Zeus	Hermes	Ares	Cronos
罗 马 名	Venus	Jupiter	Mercury	Mars	Saturn

今日全世界通用的西文名称，都是罗马名，就是上表中的最后一行，来源于罗马人的神话。表中所有星名，其实全是三个民族神话中的神名，其中有些我们已经在前面多次提到。而且各民族神话虽不同，但五星对应的神却有着非常类似的身份和使命，比如马杜克（Marduk）、宙斯（Zeus）、朱庇特物系（Jupiter）在神话中都是众神之王，与木星对应；而伊什塔尔（Ishtar）、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维纳斯（Venus）都是爱之女神，与金星对应，等等。

从西方神话中众神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古罗马神话中的众神是来自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是来自于两河流域迦勒底神话中的众神；两河流域迦勒底神话中的众神是来自于金、木、水、火、土五星。那么这金、木、水、火、土五星的知识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这只要从汉语言对金、木、水、火、土这五个汉字的读法上，我们就找到了金、木、水、火、土这五星具有易学文化中五行之间的逻辑关系（参中篇第十一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71 页。

章第二节）。而古巴比伦文化中金、木、水、火、土这五星的迦勒底名，却找不出这种任何的逻辑关系。他们的所谓“五星”既表示五星，也表示众神，还将五大行星的五行特性或性质与众神的性格进行了对应。

后希腊化时代的星占学，又几乎被罗马人全盘继承。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希腊——拉丁化的星占学又向波斯传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密特拉教的僧侣们有关。

再稍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化星占学又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影响，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就是这样传入印度的；印度星占家有时同时使用两套星座名称，一套是希腊语的音译，另一套则是梵文的意译。

有人甚至猜测，希腊化的星占—天文学有可能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传入中国。尽管有由于亚历山大远征的激励，希腊文化有经过中亚、印度而传入中国的可能，但就星占学而言，迄今为止却还未发现希腊影响中国的确凿证据。

小结

从古希腊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星占学、星占医学中，都含有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的元素，只是在古巴比伦文化中金、木、水、火、土这五星的迦勒底名字中，找不出任何逻辑关系。

| 第二十一章 |

古罗马及之后的西方文化与易学文化

第一节　古罗马星占学与易学文化

罗马人与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对于天球、星象、星神之类与星占学有关的事物，很早就感兴趣。就星占学本身的发展而言，罗马人几乎没有作出过什么重要贡献。但是在世界性的罗马帝国中，星占学却能长期广泛流行在西方星占学体系中，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不少罗马人特有的色彩。

罗马人与古代埃及人、希腊人一样，喜欢将本民族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与天上的行星和星座对应起来。将五大行星与五位著名神祇对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五位神祇的拉丁名字至今仍是全世界天文学界通用的行星名称。当现代天文学又发现了另外三颗行星时，天文学家们决定遵循罗马人留下的先例，继续使用罗马神话中的神祇来命名。五大行星的拉丁名称及对应的神依次是：

水星：Mercury（墨丘利），旅客、商人，甚至盗贼的保护神，又是诸神的使者。

金星：Venus（维纳斯），众所周知的爱与美之女神。

火星：Mars（马尔斯），战神。

木星：Jupiter（朱庇特），众神之主，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同时还是光明之神、雷电之神、护军之神、胜利之神。

土星：Saturn（萨图恩），农耕之神；先前也曾经是罗马人的主神，后来让位给朱庇特。

后来发现的三颗行星，命名也循此例：

天王星：Uranus（乌拉诺斯），此神是地球之神盖亚（Gaia）女神的丈夫，既与地球相对偶，中译名就定为“天王”。

海王星：Neptune（尼普顿），海神。

冥王星：Pluto（普路托），冥王，与中国人所熟悉的“阎王”相对等。

将自己民族的诸神与五大行星对应命名，当然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出于星占学的考虑。因为这样一来，诸神的特长、司职、性格乃至性别，都可随着该神所对应的行星的运行而与尘世事务附会在一起，再由此参照、综合、平衡，星占学的花色就可大为丰富。因此，诸行星就具有了与神同名的特性。例如，水星跟旅行、商业和盗窃发生了联系，金星跟爱情有联系，火星跟战争有关，木星与力量和“健爽”有联系……

但是，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只有五星与五行相对应，根本就没有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之说，这是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当他们观察到了新的行星后，加入到星占学中的。

以神话来丰富星占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罗马人也很热衷于用星占学去丰富、装饰他们的万神殿。流传至今的各种十二宫图形、星神雕像等实物（图 21－1）[1]，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图 21－1　十二宫星神图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81 页。

罗马人使用的星占学，纯然与生辰星占学一路，而且又特别注重从算命天宫图中推算、预言人的死期，其次是该人的权位极限（比如有无登基为帝之望），为此罗马星占家十分重视一个人出生时的“诞生之宫”（natal sign，或可译为“命宫”）。“诞生之宫”的定义是：当某人诞生的时刻，黄道十二宫中恰好在东方升上地平线的那一宫。

在西方星占学发展史上，罗马人留下的色彩，比较明显和突出的就只有上述几点。他们最主要的表现，则是将星占学广泛用于无休无止的政治阴谋之中。

第二节　西方星占医学与易学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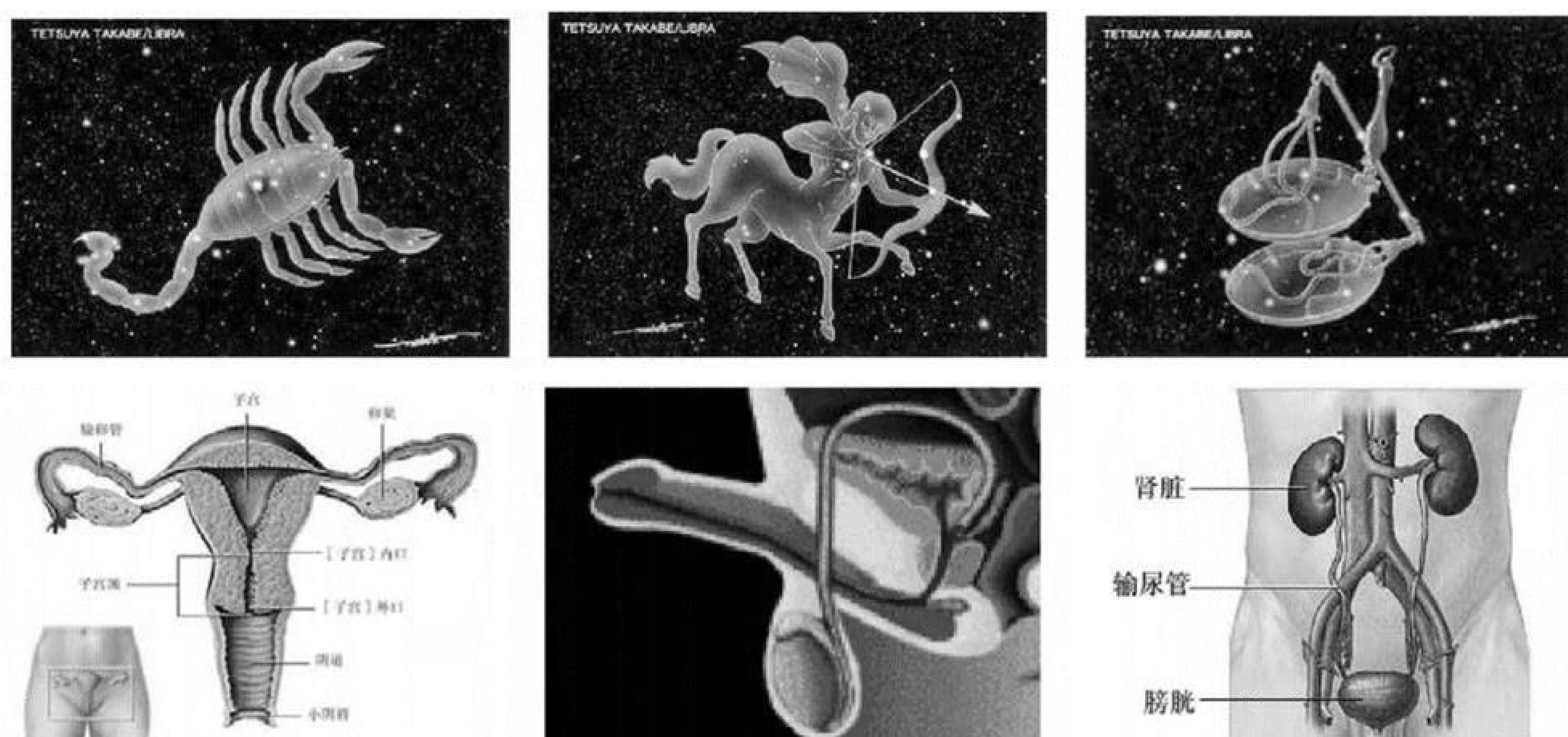
一

西方的星占医学有些与中医思想相通之处，它们有一本《神使之书》，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可归入生辰星占学范畴，但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将黄道十二宫的神及兽与人体各部位一一对应（图 21－2、组图 21－3），这种对应在后世西方星占学中广泛采用。



图 21－2　十二宫与人体位置图

图 21－2 中的人体，从头至足依次为：白羊宫（头顶）、金牛宫（右颈），双子宫（两肩）、巨蟹宫（锁骨下），狮子宫（胸前），室女宫（腰带正中），天



组图 21－3

秤宫（腰带两侧），天蝎宫（右腹），人马宫（左腹），摩羯宫（右膝），宝瓶宫（右小腿上持瓶女子，瓶正向外倾水），双鱼宫（右脚上）。这种对应又很自然地与星占医学联系在一起，让十二宫各自“统治”该宫所在处的人体器官或内脏，比如天秤宫，它“统治”人的两肾，等等，其余可类推。

如果我们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一物一太极的理论，把任何的“事”与“物”就都可以拟人化的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太极。这样，我们就能把“年”和“人体”也都可以分别看做相互对应的两个太极了。

西方每一年春天的开始，白天太阳的视运动在白羊座［宫］，夜晚就会看到中天的天蝎座［宫］和人马座［宫］（射手座［宫］）。如果我们把每一个独立的“年”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那么“年”这个独立的生命体就从天蝎宫开始诞生了，而人这个独立的生命体却是以父母腹部中的精华交合后才开始孕育诞生的。

如果我们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方式来看，就会发现位于男人腹部的生殖系统就像是射手座［宫］；位于女人腹部的生殖系统就像是天蝎座［宫］；人体的两肾就像是天秤座［宫］。所以西方人早先把人马座［宫］（射手座［宫］）和天蝎座［宫］分别代表人体的左、右腹，也是采用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相互对应方式，表达了“事”与“物”生命的开始，既像大自然中春天的万物生发一样，也像人类生命的孕育、诞生、繁衍一样，是生生不息［升升不息］的。

西方人把天秤座［宫］代表人体两肾，也是采用了中国易学文化体系中形象思维的相互对应方式，它既表达了人体精气神平衡的意思，也表达了大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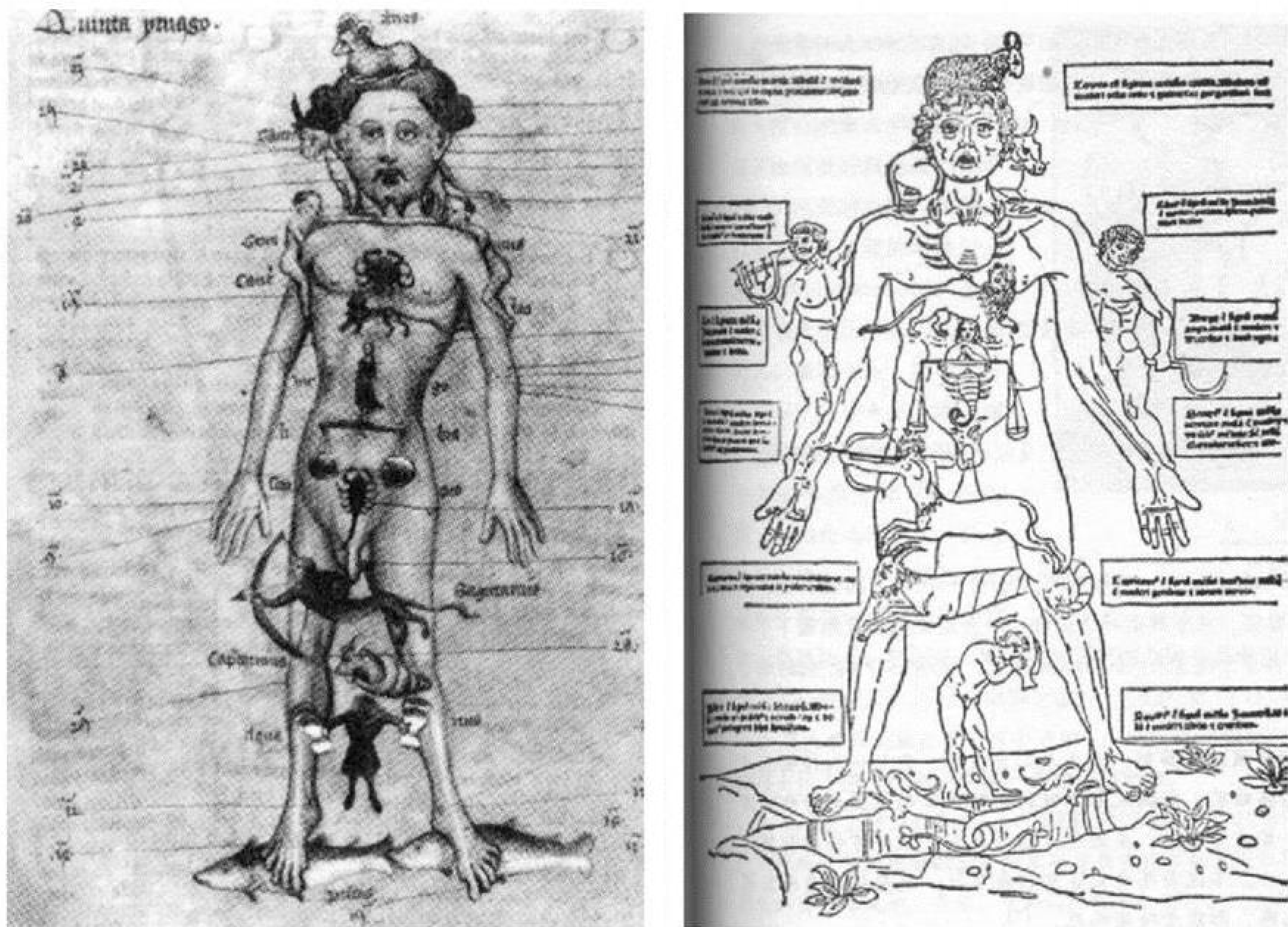
年头年尾、每一年的自然都是平衡之意（组图 21－3）。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西方人的思维与中国易学文化中“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和“在天成像，在地成形”模式有共通之处。

这就为西方的星占医学提供了一个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上黄道十二宫与人体各部位的对应。表现这种对应的图画，在西方古代星占文献中十分常见。这种被称为“人体黄道带”的图，是医生诊所中常备之物，医生们据此推知不同治疗手段在不同时刻的宜忌。

在西方古代传统的医术中，无论什么病，都给病人放掉一点血，被称为放血疗法。幸好由于星占学与放血的密切关系，才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放血疗法的危害，因为放血必须依据黄道十二宫的天象来决定可行与否。

以用星占学作解释的放血用人体图（组图 21－4）[①] 为例，人体从头至脚盘踞着各种神像，表明黄道十二宫与人体是一一对应的。太阳运行在指导放血用的“人体黄道带”。当太阳运行到金牛宫、双子宫、狮子宫、室女宫、摩羯宫时，不能放血。



组图 21－4　黄道十二宫与人体各部位的对应图

① 江晓原：《12 宫与 28 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 129 页。

对人体的不同部分施行不同的治疗及手术时，也要参照所对应的天象或时刻（时刻就是通过天象的变迁反映出来的），加以选择后方能定夺。

日、月和五大行星，也可以与人体各种器官对应，这同样为医生们提供指导原则。例如在帕拉塞尔苏斯的《评论书》中，可以看到如下的具体论述：

医学在于星辰的意志之中，它被星辰所引导和指点：

> 属于大脑的东西被月亮引向大脑；属于脾脏的东西被土星引向脾脏；属于心脏的东西被太阳引向心脏。
>
> 同理：水星将属于肾脏的东西引向肾脏；木星将属于肝脏的东西引向肝脏；火星将属于胆汁的东西引向胆汁。
>
> 不仅这些器官的情况是如此，所有无法在此提及的器官也尽皆如此。

黄道十二宫、日、月和五大行星，在西方除了与人体器官等对应外，它们也在星占草药学中与各种植物相对应。有十二种与黄道各宫相对应的草类，还有三十六种分配给炼金术和星占学的植物。一些药物则与日、月、五大行星相联系，特定药物被认为必须在特定的日子和时辰采集，方才有效，例如：

星期日：榛树、油橄榄树；

星期一：芸香、三叶草、芍药、苣荬菜；

星期二：马鞭草；

星期三：长春花；

星期四：马鞭草、长春花、芍药、金链花、委陵菜；

星期五：苣荬菜、曼德拉草、马鞭草；

星期六：草花、车前草。

以上种种与星占医学有关的理论，都曾在中世纪及以后一段时期流行于欧洲。

二

他们这种星占医学中，既有与中医基础理论相通的元素，也有与中国易学文化基础理论相通的元素。在中国文化中，易医是同源的，例如：

12 支配身体：子为耳，丑为胞肚，寅为手，卯为指，辰为肩、胸，巳为面、咽喉，午为眼，未为脊梁，申为经络，酉为精血，戌为命门、腿足，亥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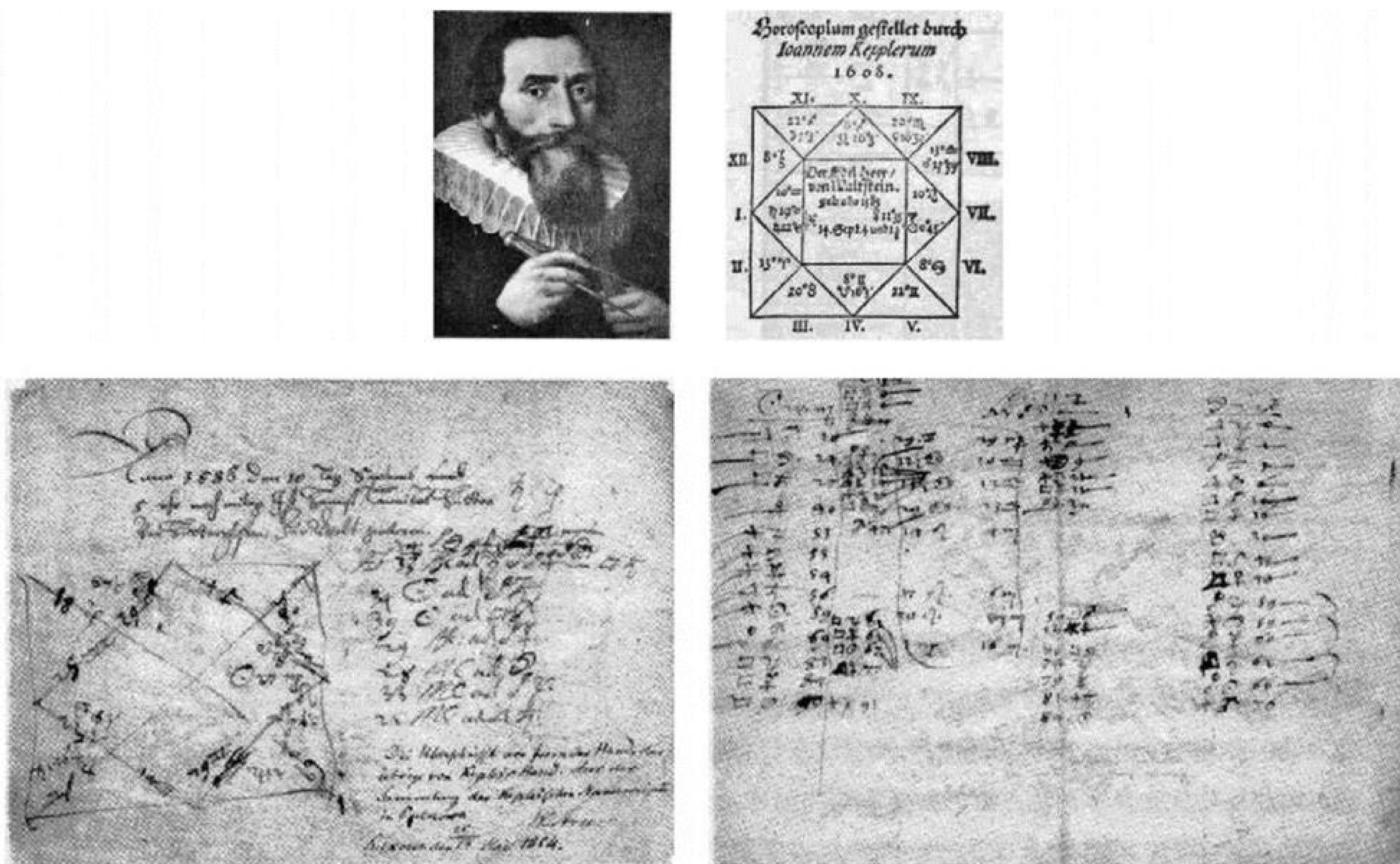
12 支配腑脏：寅为胆，卯为肝，巳为心，午为小肠，辰戌为胃，丑未为脾，申为大肠，酉为肺，亥为肾、心包，子为膀胱、三焦。

中国智慧的古人在开始的形象思维中，将人体与大自然进行了整体模糊的类比，发现微观的人体与宏观的大自然有着极其近似的对应关系，把他（它）们之间用形象化的自然写意，能够进行真实的对应参中篇第八章第一节先天八卦第三部分。

第三节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易学文化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星占学始终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解释系统在起着作用。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都极为缓慢的古代，几千年来没有任何别的体系能够有效地取代星占学，这才是星占学在古代长盛不衰、几乎所有杰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要和星占学牵涉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就是到了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像开普勒这样一流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流的星占学家。① 从组图21－5中我们可以看出，开普勒与他的算命天宫图及手稿与中国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紫薇斗数的格式是一致的。



组图21－5 开普勒与他的算命天宫图及手稿

①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168、169页。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批评教会和神本思想，崇尚自然科学；发展海上交通，扩大认识世界范围；人文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各门科学、专业也已经完全的独立了出来，神秘的星占学也与神学独立了出来，它们不再搅和在一起了。

现代科学以极强的生命力在生长和扩展，而更加趋向于感性的实际，更加相信能够给视觉感官带来冲击的物质。这样就使得星占学旺极的局面由盛转衰，发生空前巨变，人类对物质知识的增长开始进入有明显加速度的快车道，在与以往的文明史相比显得极为短促的时间内，人们发现大量先前必须借助于理性的星占学和其他神秘主义学说来解释的事物，已经由科学实验作出了更为简明也更为直观切实的解释。

换句话说，理性的星占学的功能大大萎缩了，人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再需要它了，不再非常需要神秘主义者利用星占学来判断事物的吉凶了，它的衰落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样，人们由过去对事物发展所关注的吉凶问题就逐步开始转向了对事物发展所关注的真假问题。当然，这也与他们西方早期哲学注重于物质的思维方式有关。不过能够把人们从对事物吉凶的关注转变成对事物真假的关注，也实在是一次成功而又伟大的重大文化事件。所以爱因斯坦才会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英国生物化学家和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将中国与欧洲的哲学进行了研究之后，也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欧洲的哲学倾向于在物质中发现实在，而中国的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发现实在。"

在 16、17 世纪星占历书曾经是最为畅销的读物，据说销售册数能超过《圣经》，而今天的《圣经》在世界书籍销售的排行榜上，依然位居第一。星占学衰落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许多学者进行文化研究的对象。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现代科学知识的边界毕竟也是有限的，因此理性的星占学之类神秘主义（这里的意思是与现代科学不相容），或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知识系统，依然还继续存在着相当大的知识空间和市场。古老的、曾在几千年中与天文学难分彼此的星占学，要想在现代社会中从科学的理论上彻底驳倒它也并非易事，因为它与自然科学和文明的根源紧紧地连在一起。

小结

西方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试图用世界的普遍特征来解释它像什么。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河图》、《洛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太极图等在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具有因果和逻辑关系的符号、图案和标识，对宇宙间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和法则所作出的推演描述和诠释，要比起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先哲一直到近代和现代的哲学家、神学家、科学家对宇宙自然规律和法则的描述，以及比西方针对人的科学研究所做出的描述出现得更早、更简单、更明了、更完美。

从古罗马之后的西方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星占学和星占医学中，都含有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相通的内容。

| 第二十二章 |

阿拉伯文和字母与易学文化

刘智（约1660～1730），字介廉，号一斋，清康熙年间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出生于回族家庭，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著名学者、中国伊斯兰教“汉学派”的著名代表。他在中国明清穆斯林学者中，就伊斯兰学术上的造诣和贡献而言，是居于前列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15岁开始学习生涯，前后一共学了18年。其间，“阅遍”儒释道经集和伊斯兰性理之学，他在游学过程中，搜集到写作中不可缺少的原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图书、资料，接触到当时的名人学士。这些名人学士曾为他的著作校正、刻板和写序。这对他的著作得以早日问世和广为流传有很大帮助。

他的著作在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被奉为“汉凯塔布”（即汉文经典：“凯塔布”一词是阿拉伯文的音译，其原意为“书”。中国穆斯林使用该词则有神圣经典之意。这里指“汉文经典”）。因此，研究他的思想对研究中国汉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方字母解义》撰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约5000余字。它以宗教的和理学的观点对阿拉伯的28个字母的起源、字形、笔画、字母分阴分阳、字母的读音、字母间的组合等方面讨论字母的神秘奥义，其基本思想在于说明“文字，载道之器。文字其记，为道之瘁”。

下面，我们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伊斯兰教学者金宜久先生所著的《中国伊斯兰探秘》中第十一章“神秘观”里的《天方字母解义》全篇摘录如下，供大家来研究分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28个字母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天方字母解义》

天方字母即阿拉拍字母。《天方字母解义》[1] 是一本赋予字母以神秘奥义的小册子。刘智在对阿拉伯字母解义过程中，对阿拉伯字母的起源、字形以及个别字词做了神秘的说明。这是我们对该书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第一，阿拉伯字母起源。

刘智在该书序言中说：

粤稽初古，元皇诞降。辟居中土，敷治四方。帝庭下迁，作天人向。定八极准，生万物光。庭前右畔，一沁清渠。形如弦月，澄若玻璃。中涵异石，石面见文。二十八象，点画攸分。帝降神命，示觉元圣。凝眸澄碧，识厥形韵。圣智天通，受制文字。审物象形，命名取义。始授语言，创立书契。编类属辞，乃自施位。初惟一点，应点成画。画配成字，字配成文。文以寄道，道以文明。故惟点画，万汇之根。（刘智：《天方字母解义》序）

这里说的“中涵异石”，疑即“中涵（hán，意为包含）异石”。一方面，他说阿拉伯字母源自先天、理世。它的“二十八象”，在先天已经“点画攸分”。另一方面，他又说阿拉伯字母在后天有个发展过程，即“初惟一点，应点成画”，而后才有人们所见的字母。如何来解释他的这一说法呢？可以设想的是，源自先天的这些字母，其字其形最初是无形的，而后才有后天有形的字母。就是说，后天的字母虽然由点发展而来，但这些字母在先天已有其原型、摹本；正是先天“点画攸分”的原型或摹本，才有后天人们书写的字形。他接着对阿拉伯字母的字形、读音做了如下的说明。他说：

四七为形，四九为音。形音相生，千有八字。字为一本，本十二源。源十二支，支十二派。阴阳易制，分呼明晦。强弱音别，时际义殊。一字变化，六千四百。千千相乘，为数无极。（刘智：《天方字母解义》序）

根据他的说法，就字形而言，阿拉伯字母共 28 个（四七为形，即 4 乘 7 为 28），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14 个太阴字母和 14 个太阳字母。就发音而言，他提出有 36 音。如何理解阿拉伯字母有 36 个音呢？

---

① 金宜久：《中国伊斯兰探秘》，东方出版社，1999，第 298 页。

很可能刘智除了把28个阿拉伯字母作为辅音外，另加上3个短音、3个长音和2个软音，共为36个音（四九为音，即4乘9为36）。他所说的“形音相生，千有八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即28与36相乘，得数为1008。至于“字为一本，本十二源。源十二支，支十二派……”的说法，无外乎是说世界上的文字均源自阿拉伯文。应该说，随着伊斯兰教在各地的传播，一些接受了伊斯兰信仰的民族，或是放弃了原有的书写体而借用阿拉伯语书写体，或是直接应用阿拉伯语的书写体。迄今，继续使用或一度使用阿拉伯语书写体的，有波斯、乌尔都、印尼、土耳其、斯瓦希里等语，我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亦用阿拉伯书写体。然而，这不是说，世上所有的民族都用阿拉伯书写体，更不是所有的文字均源自阿拉伯文。所谓“字为一本”之说是毫无根据的。至于阿拉伯的“一字变化”是否有“六千四百”，而“千千相乘，为数无极”的说法，可能是有所夸张的。

他又说：

字母二十有八，太阴之数也。为音三十有六，太阳之数也。二十八承三十六，共得六十四以合天地相承之数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

如何理解28个阿拉伯字母合于太阴之数、为音36合于太阳之数呢？对于“太阴之数”，蓝煦甫有一个解释。他说：“字母四七为形者，大天地二十八星象，小天地二十八气体。四九为音者，形音相生，千有八韵。”（蓝煦甫：《天方正学》卷二“字母释义”）这里，大天地显然指的是天地大世界，小天地指的则是小世界，即人。他所说的四七为形、四九为音以及形音相生，千有八韵，与刘智说的相同。“太阴”即月亮。所谓“太阴之数”，很可能指的是月球在天体中运转历经28星宿。蓝煦甫以此来解释阿拉伯字母的28个字形，使之与“太阴之数”相符，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刘智所说“太阴之数”似可做此解。只是蓝煦甫说“小天地二十八气体”不知所指为何；同样的，他对太阳之数也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尽管如此，他对“太阴之数”的解释，为我们理解“小天地二十八气体”，以及刘智所说的“太阳之数”大致提供了一把有用的钥匙。对我们解释刘智的上述说法多少有所启示。

关于“小天地二十八气体”问题，小天地指人，如认为人有28种气体，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难以为人们接受。不过，在伊斯兰的秘学中，却有以人体的某一部位作神秘主义解释的先例。譬如，人有左右手，通常每个手有五指；五指的指骨为14。左右手相合，正好是28。常人的左右脚趾骨也是28。以此来解释阿拉伯字母的28个字形与小天地的指骨或趾骨相合，是完全说得通的。

所谓“太阳之数”，可否作如下理解：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可将全年划分

为24个节气，而这些节气，是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过程中，它每昼夜自转有12时辰为基础推算数出来的。合24与12为36。这可能是“太阳之数”。刘智可能也正是以此作为阿拉伯字母“为音”的“太阳之数”的。至于他所说的“二十八承三十六，共得六十四以合天地相承之数”，在前述的两个数字（即28与36）相加也就不难得出64之数了。

刘智的《天方字母解义》是从他的思想模式出发，应用了一套理学的术语、概念，对每个字母的含义做出神秘性的解释。这里不妨就其有典型意义者，做一讨论。

第二，阿拉伯字母成化之序。

根据刘智的说法，点（·）为万字之源。28个阿拉伯字母均由这一点发展而成。刘智把阿拉伯字母的造化之序和成物之形做了严格区别。这种区别的根据为何呢？在他看来，阿拉伯字母的形成过程，像宇宙万物一样，除有先后顺序之别外，这种区别还在于它们分别源之于先天和后天。

其一，点之奥秘。

点，在刘智的字母形成方面，具有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所有的阿拉伯字母都由点发展、演化而来。他说：

此一点乃万字之根源（即源）也。凡字皆由此一点而出、而变化生焉。（刘智：《天方字母解义》天方字母解义题）

在刘智的“真”论中，“真”被视为宇宙万有之根源。以其原理应用于阿拉伯字母，点则成为字母的根源了。当然，点本身不过是“真”的自我显化，这在他的序言中已有所交代。有趣的是，他把字母的变化完全纳入“真”的自我显化的思想模式之中。对此，他作了如下说明：

·，一点体也。··，二点体与用也。∴，三点体、用与为也。～，默德，长也，·之舒也。有承上起下之象，即ا，额里甫也。但ا额里甫为先天之化，～为后天之化也；ا为直序，～为横排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天方字母解义题）

二十八字为·画之体，·画为二十八字之用。一·为本然这体，二·为分别之用，三·为显著之象。故ث用三·，明万理为本然内里之显著也。ڛ、ش用三·，明三光三子为造化外表之显著也。（刘智认为，س的意思是天。它原有三∴在下，成ڛ形。后省略其下的点，而成今字形。此三点代表日月星“三光”。ش的意思是地。它的三点代表金［矿物］、木［植物］、活［动物］三类，

称“三子”。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由上可见,既然刘智把点视为字母之源,让它担负起创造其他字母的作用,他势必要赋予点以体、用、为三种特性和功能。就是说,只有当点具有了与“真”类似的体、用、为三种特性和功能后,点才得以有其后的种种变化、得以演变为先天和后天的具体字母,这多少具有一定的神秘性。

其二,造化之序。

既然点为字母之源,由点最初发展的则为圆;“此一圆乃万字之本质也。凡字皆从此一圆而为两半、两错宗之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天方字母解义题)。圆或是O展开则成ه,或是分为两半并错开而有其他字母。刘智对些称之为“造化之序”。他提出,ا、ب、ت、ث、ج这五个字母(或“五画”)的造化,是在先天中进行并完成的。他说:

此五画总述先天之化,乃本然自动、自见而于本知中预定万化之理。虽有数,而实为一体。所谓万物未形而其理森然已具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初惟一点,点实体也。动则为圆,O,妙体也。ا者,O之化,妙用而流行也。ب者,ا之变,气著而理隐也。ت者,ا之明,形著而气隐也。ث者,ا之著,象著面理见也。ج者,ا之成,理气浑同,色妙同然之会也。万化之理,至此而条。ح,气也,天命流行统体一太极也。خ,物也,各正性命,各一太极也。万造之形至此而止。(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何谓“至此而条”?意思是说,阿拉伯字母在先天的成化之“理”,到此时而条理有序、层次分明,此后的变化则为后天的字母造化过程。尽管刘智没有像他的思想模式中就有关“真”的显化那样,对字母的先天演化过程,做详细说明,但从他的字里行间,仍可看出他是故意安排这五个字母为先天的字母,使之与先天的性理变化相适应、相匹配的。因为在他看来,点是“字母之源”,这完全相当于“真”为先天性理、后天形器之源;“真”的自显和外化过程共分六品,六品之后承接先天理世、后天象世的是元气。元气剖而为阴阳,此后就有了天地万物的整个造化过程。点的变化也大致如此。这就是他所说的“至此而条”,即有条有理、层次分明的字母造化顺序的全部含义。

如前述,“真”所显化的先天六品,以及与此六品相应的先天字母分别是:

1. “不动品,体也”(体)——“初惟一点,点实体也。动则为圆,O,妙体也”;

2. “初动品，用也”（用）——“ا者，O之化，妙用而流行也”；

3. “主宰品，体用分也”（为）——“ب者，ا之变，气著而理隐也”；

4. “初命品，真理现也”（真理）——“ت者，ا之明，形著而气隐也”；

5. “性命品，万理分也”（性理）——“ث者，ا之著，象著而理见也”；

6. “形气品，气象著也”（元气）——“ج者，ا之成，理气浑同，色妙同然之会也，万化之理，至此而条”。（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这里，·或O相当于体。就“真”而言，其真体于此际“不动”；就·或O之体而言，此时它也未发生任何变化。

ا相当于用。“真”于此际为“初动”而显其用；ا为O之化，此时其妙用刚开始流行而“化”。

ب相当于为。“体用分”为“为”，此际“主宰品”现；ب为ا之变，“气著理隐”同样相当于体用之分，即点之“为”在这时显现。

ت相当于真理现。“真”之“初命”于此际显，有代理、大笔、道之称；ت为ا之明，此时以二·以示“分别之用”，犹如真理现。

ث相当于万理分。因真理现、化理的流行，“真”于此际显化为万理（即人性物理）；而ث之三·以示此时其“显著之象”，犹如人性物理之分。

ج相当于元气。因为元气在此时际“有浑沦之象”，“先天无色无象之妙，至此而终。后天有色有象之迹，于此而始”。而ج则为“理气浑同，色妙同然之会”，而字母的“万化之理，至此而条”。可见，刘智是按性理先天演变的模式，来安排上述五个字母在整个阿拉伯字母中的神圣地位的。而ج以后的23个阿拉伯字母均为“后天之化”。

既然ا、ب、ت、ث、ج五个字母（五画）源自先天，那么，它们也就象先天的性理一样，是其后的23个后天字母的原型，或模式。

其三，成物之形。

实际上，在“真”的后天显化过程中，元气既是先天之末，又是后天之始。元气介于先、后天之间。为使先、后天得以衔接，以便由无形而变之为有形，刘智安排了包括元气在内的六品变化。如前所述，元气剖而为两仪（阴阳），阴阳分之为四象。阴阳和四象二品与其后三品（天地定、万物生、人类出）形成过程中，起着“起化”和“广化”的特殊作用。起化和广化与作为具体的、有形的物体的出现又有所不同。与此相应的是，在他的字母顺序中，他同样安排了ح、خ作为其后字母形成的前提。他说：

ح气也，天命流行、统体一太极也。خ，物也，各正性命、各一太极也。万

造之形，至此而止。（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就是说，作为“天命流行、统体一太极”的ح，相当于“真”显化过程中的阴阳；而作为“各正性命、各一太极”的خ，则相当于阴阳之后显现的四象。后两个字母，虽以“气”和“物”的形式而存在于后天，但它们是“万造之形”，同时又非具体的、有形的物体。在他看来，这是与其后的字母代表有形的物体之间的不同之处。

刘智在خ之后，按阿拉伯字母的顺序，使之分别与物体相对应。这就是他所说的“成物之形”。此种安排的依据，既有从阿拉伯文字中找出有关的词以代表该字母的，也有纯乎象形的。他说：

د，心也。ذ，性也。ر，知识也。ز，状貌也。س，天也，日星丽乎下。ش，地也，品物陈乎上。ص，男也，刚健中正，自立之质也。ض，女也，柔顺附从，依赖之象也。ط，鸟也，禀天地与气而生者。ظ，兽也，禀地与气而生者也。ع，金也，合地与水而生者也。غ，石也，合地与火而生者也。ف，草木也，合天与地与水与火而生者也。ق，山也，盘根峙山所以固（地）者也。ك，川也，旁流行回所以适地者也。ل，豆谷也，所以食人者也。م，果实也，所以补人者也。ن，人也，生也，即نون，墨池也，万物之所由出也。و，人之死也，即واي，约会也，万物之所由归也。ه，还O之初，而有ۥ之迹也。即两弓相对而中有弦影之象也。天人之往复造化之始终至此而止。ي，我也，万化归终于我也，我外无物。故ي之后不复有字矣。此见万化之序，至我而止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应该说明的是，他赋予字母所代表的物体，既要考虑到字母的形似，又要考虑到字母的含义。而它的含义并非外在的，应从该字母为首的字词中去寻求。这在他的《天方字母解义》的“中篇”里，对每个字母都有所说明。要从字词中寻求所能代表的字母，是不难的。因为每个字词的开头，其字母不可能是重复的、由两个字母代表的。例如，ط，不仅像鸟，而且鸟的阿拉伯文字词طيور以ط开首；它不可能再由其他字母开头。因而其成物之形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第三，字母奥义。

严格说来，字母并没有什么奥义，更谈不上有什么奥秘可言了。可是，刘智为了说明它们有奥义，也就很自然地要从不同方面去揭示它、赋予它，并极力去

自圆其说，以求人们肯定它、认同它，从而接受其神秘性。

为了概略地阐述刘智所赋予的字母奥义，这里仅列举数例以资说明。

其一，关于·。

如前述，·作为“实体”，为字母之原。由·而有其后的O、ا以及其他字母。这是字母成化之序中已经涉及的问题。就·而言，他认为，凡字皆有·，在O剖而为两半的过程中，其·或是在先半圆，或是在后半圆。无·是因为省去的缘故。例如，ح、د、ر的·因在后半圆而省去；而خ、ذ、ز的·，正好在先半圆则被保存下来。由于ا乃·的自我，因而无·。“无点，因其原即点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实际上，在刘智那里，·在字母中具有“真”所含有的性理的意义。

他对·具有什么含义所做的回答，说明了·的神秘性。他说：

或问ب从一·而在下，ت从二·而在上，何也？答曰：一·，理也。理无对待，故一·；理本隐，故在下。二·，象也。象有阴阳，故二·；象显著，故在上。或问ث从三·，何也？答曰：上一·，即理也。理因象而显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

这里，刘智赋予点以“理”的含义。与他关于性理为“真”所显化，以及形器出而性理隐的思想是一致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都代表“理”呢？并非如此。他说：

或问س、ش俱三·，而在上、在下之义？答：س，天也。天之所丽乎下者，三。日月星也。故三·而在下。ش，地也。地之品物陈于上者，亦三。金木活类也。故亦三·而在上。（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

这里，他赋予·以形象化。∴或是分别代表日月星，或是分别代表金木活类。按照他的说法，在古字中，س之下有三·（即ڛ），后省略而成现在的字形（即س）。尽管如此，·已失去他所说的“理”的含义。然而，他关于·的说法，仍是不统一的。

或问ق空无·，而反用二·，何也？曰：非本·也，乃以分别و之·也。曰：然则ف当无·，而当加·，以别于و；ق当有一·，即加一·以别于ف，有何不可？曰：似可也，若则因一字而更二字，殊为不合矣。何若ق原该无·而在前增·以别و而置后。因凡增者当居所增者之后也，理不更顺乎！或曰：

> ل当用·。曰：去·以别ن也；曰：何不去ن之·以别ل？曰：ن去·则蒙闭多矣，ب、ت、ث、俱为所浑矣。不可因少而浑多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

这里，可以看出刘智回答关于·问题，同样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人们很难从中寻求某种应有的条理和规律。

其二，关于ا。

如前述，ا为O之化，它作为妙体之用而流行，从而有ب、ت、ث、ج等先天字母之化。由于它是先天的字母，如何使之与后天的字母连贯起来呢？一个方便的做法是，赋予ا以能与后天相连的特性。这一特性，亦即使ا由竖变横，使之得以承先天以起后天。他说：

> ~，默德，长也，·之舒也。有承上起下之象，即ا，额里甫也。但ا额里甫为先天之化，~为后天之化也；ا为直序，~为横排也。ی，罕则，即~之竖也。有继天立极之象。上承下授，包天、地、人三极之全义。ا，为化之始，~为化之中，ی为化之末。终万化，归终于人也。故ی与ا、~三画，同义而同用。（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 ا为起字之始，O为收字之终也。ا至O，O至ا，始终如环（圆）也。合O与ا为ه，又两弓之象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可见，刘智由ا出发，不仅使它把先天和后天贯通起来，而且安排ا与ه相通并通过ا与ه的关系，使后天再与先天联系起来，这样一来，ه在他的字母之中，实际上，正如人在大化循环中一样，肩负着尽终返始的作用。

其三，关于ه与و。

在刘智的字序中，字母的后天之化，实际上以ه而告终。刘智安排的字母顺序，同当前语言学所教授的字母顺序，有些微的区别。即و在ه之前而非在其后。显然，这纯粹是根据其神秘释义的要求而被故意安排的。这是说，他赋予ن以人的含义；人之后，很自然的是人的去世。ن后的字母只能代表人的死亡。是让什么字母代表死亡呢？从字母被赋予某一特定含义的原则而言，恰好，能代表人的死亡含义的词的字首是و而非ه，这就很方便地把و置于ه之前。

ه与وه的含义为何？他指出，在28个字母中，ه和و不仅是阴阳对待的，更为重要的是此二字代表了“归化之境”（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当然，ه的含义还不限于此。如前所述，ه为“还O之初”，“天人之往复，

造化之始终，至此而止”；它以后虽有字母 ي，但他认为 ه 即 O。实际上，在他那里，“ ه ”的意义虽是“他”，但这个他并非你我他之他，而是“物主也”，即指的是真宰之他。苏非派就有千百次诵读“他!”的诵词以赞诵真宰。

其四，关于 ي 。

就一般的意义来说，ي 指我。可是，根据刘智的说法，“ ي ，我也。万化归终于我也。我外无物。故 ي 之后不复有字矣”。显然，这个 ي 指的是真宰的自我而非你我之我。

实际上，在他那里，ي 有二义。他在引用《妙喻经》时说：

> ي ，即 ا 之屈。ا ，即 ي 之伸。执我则为 ي ，还他则为 ا 。此归根复命之谓也。由 ا 而至于 ه ，则归复之迹化，浑同一体之谓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就是说，ا 至 ه ，被视为先天和后天之迹，ا 至 ه 而化。此后则是 ي 之境。这个 ي ，当然不是你我之我的 ي ，而是作为真宰的自我之 ي 。他提出，在 28 个字母中，除去 ا 、ب 、ت 、ث 、ج 5 字外，在其余的 23 个字中，自 ح 至 ه ，皆有阴阳对待，“惟 ي 为单字，无你，无对。盖 ي 者，我也。万化总归之我也，我外无物也。故先辈增一 لا 字格之，其义深矣”（按照目前的一般说法，阿拉伯文的 28 个字母中，有 14 个太阴字母，14 个太阳字母。刘智的说法与此多少有所不同。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就是说，在古阿拉伯文的字母顺序中，在 ه 和 ي 之间还有一 لا 字（蓝煦甫：《天方正学》卷二）。他对此做了如下说明：

> ه 与 ي 之间增一 لا 字，何说？曰：ه ，他也。即是物主也。ي ，我也。即受造者也。لا ，不也。他不即我，我不离他也。又非也。他非我，我非他也。又无也。只有他，无我也。又勿也。只视他，勿视我也；只归他，勿归我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这是说，这里的 ي 是指作为具体的人的你我之我，而非真宰的自我之我。可见，他把 ه 和 ي 又紧密地联系起来，极其强调 ه 与 ي 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根据具体情况把 ي 的两种含义区分开来。

然而，在他看来，ه 与 ي 的关系还不限于此。他说：

> ……要其实，ي 即 ه 之表也。此字之形包含以前 27 字之形，此字之义包

含以前27字之义。(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中篇)

从刘智的思想体系来说，很自然地把真宰之显化归结于人。人肩负着归终返始的使命。这是“复归”论中讨论过的问题。而在他的字母中，同样有个由什么字母肩负返本还原的问题。这个字母也就由“我”体现出来。前引《妙喻经》所述“ي即ا之屈，ا即ي之伸。执我则为ي，还他则为ا”，完全表明了他在字母问题上的大化总归的思想。

第四，道载于文，文寄于字。

根据刘智的说法，“点者，文字之根原也。画者，文字之资始也。字者，点画之显象也。文者，字画之变化也。是故，文之千变万化不离乎字；字之千变万化不离乎点画也”。就是说，点画是文字存在和变化的基础；而“文字者，理道之盛器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文字作为“理道之盛器”和载体，“文字其纪，为道之瘁”，真宰之道就体现在“三十大藏，六千余章”的《古兰经》中(刘智:《天方字母解义》序)。可惜，刘智对“道载于文，文寄于字”(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的说法，在该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列举了三个人们熟悉的字词(الله、محمد、احمد)为例，揭示“道载于文，文寄于字”的奥义。根据他的说法，这里引用二例以资说明。

其一，关于محمد(穆罕默德)。

他提出，作为“吾圣人名”，محمد一词由四画四音、即四个字母组成。这四个字母是م、ح、م、د。他分别从象形、取义和论理三个方面讨论该词。

就象形而言，他说:“محمد为人极之样子”，因为“م象首，ح象两臂，又م象腹，د象两足，盖如……此状也”。

就取义而言，他说，“محمد为普天赞颂。普天之神，盖地之祇，尊自真主，贱而生灵，莫不称颂其德而赞扬其美也”。

就论理而言，他提出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م、ح、د三个字母分别代表果实、气、心，“造化如一株树，محمد为其种又为其果。先天地为种，为万理之根元。后天地为果，为万圣之封印”。محمد一词有两个م;“ح居م两之间之气，实居先、后天之间也”;当“先后天成而命立焉，承命者心也。故د居于其末”。第二种说法是，“第一م即第一本质，第二(م为)本质的延续，是妙世，是色世。先后天总一真主(预定的)大限的形象。故曰，محمد是真主(预定的)大限的形象。”(根据《天方字母解义》上、中篇，刘智赋予各个字母以含义，就م、ح、د而言，“د，心也”;其义为“心也，人之身命统会之所也。取万物各具一太极之义”。“ح，气也。天命流行、统体一太极也”，其义为

“耻也，窍也，又如旧也；喉中音诵之，可代呼吸。取其理化，而气生之义”。“م，果实也，所以补人者也”；“万物之遂也”）。这是说，无论哪种说法，محمد一词的字母安排系先天妙世、后天色世宇宙万有的缩影，以及该词第“真”所显化的先后天周期内的真正体现。

其二，关于أحمد（阿赫默德）。

按照刘智的说法，أحمد一词是“吾圣先天之名也”，该词也由四画四音所组成。这四个字母是ا、ح、م、د。他同样从象形、取义和论理三个方面阐释该词的含义。

刘智提出，宇宙万物“不离乎四”，即指矿类的金石、长类的草木、活类的鸟兽以及“万有之至灵”的人类。就象形而言，他有两种说法。一说，“人像ا，顶天立地，中立无倚；活类像ح，背天伏地，傍驱横走；长类像م，抱着下垂，花实上长；矿类像د，下盘、上锐、中虚，藏育一名也，而万象兴焉”。另一说，“أحمد像人礼拜之四仪。站立像ا，鞠躬似ح，叩头似م，跪坐像د。是故礼拜为奉主、体圣所从”。

就取义而言，أحمد的意思是“可嘉许的”。刘智依据此义进而引申为“至善赞者”。他说：“所谓赞者，即礼真、敬真之功也。惟圣人至善礼拜，惟圣人至善奉主，皆取أحمد之意。”

就论理而言，他说：“ا，安拉也；ح，性智也；م，王国之君主也；د，阿丹也。”这是说：“安拉，乃万化之主宰；性理，乃主宰首显之大命；君主，乃色世，王国，乃妙世；阿丹，人类也。”因此，可以说，此四字母的全部含义是：他奉真主之命而开色妙两世，故称他为“人道之极”（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下篇）。

其实，马注在《清真指南》中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按《讨喇特》经中，真主称穆罕默德圣人为额核墨都，其额核墨都之文，乃额利府、哈、蜜目、打勒四字合而成者。真主按此四字，造化世界中人品、禽兽、草木、金石之四形。人品体额利府、禽兽体哈、草木体蜜目、金石体打勒。又按此四字，命为朝拜中站立、鞠躬、叩头、跪坐之四仪。站立体额利府，尽为奴之礼，因人贵于万物，故头圆者戴天，足方者履地。鞠躬体哈，尽禽兽之礼，因人禀贪愚之性，故脊平而首低。叩头体蜜目，尽草木之礼，因人禀生长之性，故头伏而脊高。跪坐体打勒，尽金石之礼，因人禀刚顽之性，故静止而不移。”（《讨喇特》系《圣经·旧约》所指的《摩西五经》。这里，额利府，即ا；哈，即ح；密目，即م；打勒，即د。见马注：《清真指南》卷六，问答）就一般的意义来说，人们是难以想象普通的字母具有如此的奥秘的。而就刘智、马注等穆斯林学者而言，无论他

们所受的神秘主义影响，还是他们自身的学识，都会通过简单的字母以阐释其深邃的神秘奥义。如果不把阿拉伯文说的玄妙一些、神秘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对“天方字母”价值的贬损。唯有把它说的玄妙一些、神秘一些，才符合他在序言中所说的文字降自天庭；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使28个字母（及其演变的万千字词）通过 ي 而返本还原，正如宇宙万有通过人极而归真复命一样。

第五，两弓之象。

《古兰经》称：“他相距两张弓的长度，或更近一些。他把他所应启示的启示他的仆人，他的心没有否认他所见的。难道你们要为他所见的而与他争论吗？他确已见他二次下降……”

一般的经注家都主张这里的仆人指的是穆罕默德。这段经文的含义是说他见到真宰的情景，神秘主义的经注更是持这一主张。刘智赞同此类注解。他在援引这段经文后，做出了如下说明：

> 经云，两弧界合，或复至近。两弧者，来降为一弧，复升为一弧。升降既全，则两弧界合矣。或复至近者，超越名相之界，立无何有之乡。全体沕合本然，此至圣独践之境也。（《天方性理》，卷四，升降）

实际上，刘智对于两弓的神秘主义解释，还不限于此。他在《天方字母解义》中，根据阿拉伯字母的含义，他对何谓两弓之象，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

> 或问两弓之象。曰：人人有个两弓之象。但未收圆到头耳，如 هـ 两弓之象也。ي，我之象也，使 ي 而成 هـ，最易也。何以易？设一近乎之象，如 ي 展之，则为 ي，收之则成 هـ，不至易乎。（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如前所述，在阿拉伯字母中，ء 作为0之化生、妙用和流行，它在无形中构成其他字母的基础。因此，他在解释 ء 的含义时，很自然地把它们联系起来并赋予神秘主义的解释。他说：

> ء 为起字之始，O 为收字之终也。ء 至 O，O 至 ء，始终如环也。合 O 与 ء 为 هـ，又两弓之象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
> هـ 还 O 之初，而有 ء 之迹也。即两弓相对而中有弦影之象也。天人之往复，造化之始终，至此而止。ي，我也，万化归于我也，我外无物。故 ي 之后不复有字矣。此见万化之序至我而止也。（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

这里，表面上是说“ي之后不复有字”，因为它是28字母中最后一个字母。实际上，它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万化归于我”、“我外无物”。显然，这里说的“我”，指的不是别的，而是真宰的自我。其实，这里说的意思是：即使像“至圣”这样已达到“两弧界合，或复至近”的人，也只能到此（即两弓）境界；一般的人，尽管前面说到“人人有个两弓之象”，但他们的圆都没有收到头，因而也就不成其为圆，要达到“两弧界合，或复至近”，就很困难；至于修道者能否达到这一境界，虽说“所易而无难也，几于返矣”（刘智：《天方字母解义》上篇），“几于返”，终究不是完完全全的返。

刘智关于阿拉伯字母的神秘释义，是他个人的独创，还是有其文字的依据？对此，我们从《天方字母解义》中看到，他提到的两本书（即《妙喻经》和《字母经》），可能是他写作此书的主要依据；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解义中，还应用了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或概念（如太极、元气、两仪、阴阳、四象等）。这里拟不具体讨论。同样的，我们在其后的《天方正学》中，看到了对阿拉伯字母类似的神秘解释。其实，《天方正学》比《天方字母解义》做了更为明确的说明。例如，关于字母在先天的“造化之序”问题，蓝煦甫说：

> 初惟·，实体也，主也，静也。动而为O妙体也。妙体之显然为ا，乃妙体流行者也。ب者，ا之真一气。气著而理隐者也。ت者，ا之著此两仪。形著而气隐者也。ث者，ا之显象，象著面理见者也。ج者，ا之化成，理气浑同，色妙同然者，万化之理，至是条然矣。（蓝煦甫：《天方正学》卷二）
>
> ·，主也。体也。··，两仪也。用也。体与用，互相得也。∴，体与用与为也。作用相参也。天地人三才者也。（蓝煦甫：《天方正学》卷二）

从蓝煦甫的说法中，人们不难看出，他把体用为视为天地人。刘智虽然在说法上与蓝煦大同小异，但他还没有把体用为视之为天地人。这是他和蓝煦甫最大的不同之处。

刘智作为一个穆斯林学者，他的思想首先源自伊斯兰教，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出身于宗教家庭，自幼耳闻目染，已开始接受宗教教育。从他的著作来看，主要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这是他的主体思想，其中尤以苏菲主义影响为最；二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尤以儒家思想（宋明理学）为著，此外还杂有释道思想。

无可怀疑的是，刘智的思想体系是以深受苏菲主意影响的伊斯兰思想为主体的。苏菲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神秘主义思想，早在10世纪时，已在新疆地区的一些维吾尔族穆斯林中产生影响。

从金宜久摘录刘智《天方字母解义》的内容和金宜久研究《天方字母解义》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智以宗教的和理学的观点，对阿拉伯文 28 个字母的创造起源分析和字形、笔画、字母阴阳、字母读音、字母间的组合等方面探讨它们的神秘奥义与基本思想，都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特有的阴阳二元二分概念和形象思维的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خ Xaa'	ح H`aa'	ج Jiim	ث Th!aa'	ت Taa'	ب Baa'	أ 'Alif
ص Saad	ش Shiin	س Siin	ز Zaay	ر Raa'	ذ Thaal	د Daal
ق Qaaf	ف Faa'	غ Ghayn	ع 'Ayn	ظ Th:aa'	ط Taa'	ض Daad
ي Yaa'	و Waaw	ه Haa'	ن Nuun	م Miim	ل Laam	ك Kaaf

图 22－1　阿拉伯文的 28 个字母

到目前为止，阿拉伯字母的排序和诵读以及阿拉伯文的书写和朗读方式，一直是沿着从右向左的方向进行的，这与中国古老的串联起来的一排排竹简和古书从右向左进行书写和朗读的方式几乎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的古老书写和朗读方式中先自上而下，后自右而左，而阿拉伯文的书写和朗读方式是先自右而左，后自上而下。这是因为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观念中是天在上地在下的，就是天尊地卑的观念。

注：在伍麦叶王朝时期，自从伊斯兰与东方的基督教和其他东方的宗教有直接的接触后，在伊斯兰的领域里就发起了一场非常神秘的运动，从它的动机和原理来看，它在许多方面或许是受到这些宗教信仰的影响，虽然如此，仍然是一个纯粹在伊斯兰的社会和传统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独立的通灵学派。这个运动被称为苏菲主义，它的信徒被称为苏菲派。苏菲一词的阿拉伯语词根为“羊毛”之意，表示苏菲派是穿着粗羊毛衣服的人。在伊斯兰之前的时期，苦行者经常穿着用粗羊毛制成的衣服作为他们特殊生活行为的象征，早期修炼苦行的穆斯林也就立即被称为“苏菲派”。后来，当伊斯兰的禁欲主义被神秘主义所取代时，这个名字被用来称呼那些通过不同阶段的精神上的自我克制来寻求认识真主的人。

| 第二十三章 |

美洲大陆文化与易学文化

第一节　人面岩画与易学文化[①]

一　人面岩画：4000 年以前中国人到达北美洲

美洲的土著居民来自亚洲，这在体质人类学上，获得确证，但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长期以来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但是随着人面岩画研究的深入，出现了突破。

谁发现了美洲大陆？一般人的回答是“哥伦布”。事实上，据考古研究，史前亚洲人不只一次到达美洲；欧洲人也不是一次就发现新大陆。早在公元 1000 年时，北欧挪威的维京人，就在加拿大的东部建立过居住营地。然而，史前中国人到达北美洲，最早可能在距今 4000 年以前，证据是他们沿途留下的众多人面岩画遗址。

二　东亚北美，找到连接点

美洲的土著居民来自亚洲，这在体质人类学上，获得确证。但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长期以来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即没有在文化、宗教或艺术方面找到一种相同的形式或器物，广泛存在亚洲和美洲两地。但是随着人面岩画研究的深入，出现了突破。史前岩画种类很多，其中有一种主要磨刻人面图形的岩画被大量发现在东亚地区，主要在中国，另外南韩和俄罗斯东部的黑龙江流域也有少

---

① 本节内容主要摘自美国《世界日报》。作者宋耀良曾在哈佛大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岩画研究。其中的几幅图片系笔者自加。

量，总共数量在五、六千幅。而同一类型的岩画也大量地出现在北美洲西海岸，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西海岸，经美国西部几个州，止于加州北部。遗址有 230 余处，数量也约 5000 余幅（组图 23－1）。


贺兰口岩画中的人面像代表作——“太阳神”


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黑龙江下游舍卡奇—阿连村的人面像


美国印第安人崖壁人面像

组图 23－1

这些凿刻在两大洲山岩或海岸礁石上的人面岩画，具有共同的制作技法、构图特征、表现风格，以及对岩画凿刻地的要求。在遗址中也都出现三种相伴随的符号：太阳形、同心圆和众多的小圆凹。

史前图形岩画，在世界各大洲都有发现，但仅以人面为表现对象的岩画，却只出现在环北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中，其他各洲没有或极少。在中国，有风格多样的岩画，人面岩画却是一个独立的类型和系统。虽然它不集中在一个大的区域里，但它以连续线性的方式，构成三条大的传播带。总长达数千公里。

在北美洲，人面岩画集中在一个大的区域内，沿着阿拉斯加岛屿，沿海岸向南延展到北美中部。美国学者将北美洲岩画分为九大区域，人面岩画为一单独岩画区，称之为西北滨海岩画。由此看来，只要在东亚和北美两大人面岩画区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这两大系统的岩画就贯通了，成为只因大洋而阻隔的同一岩画区。而最早发现的两个人面岩画遗址，恰是这样的连接点。

三　亚洲最东面，找到遗址

在 100 多年前的 1897 年，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了一次著名的“杰斯伯的探险活动”，首次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作科学探险。考古学家 Bertold Laufer

在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的江边，发现了第一个人面岩画遗址，百余个人面形岩画凿刻在江边的大石头上，考古报告发表在1899年的《人类学》刊物。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是亚洲最东面的一个人面岩画遗址。

但是100多年来，美国学术界几乎没人注意到它。50年后的1947年，美国考古学家Robert Heizer发现了北美洲的第一个人面岩画址（图23－2），位于阿拉斯加西南的科迪亚克岛上。这个岛在阿留申群岛东端，凿刻在面西海岸岩石上的百十来个图像，主要是一种无轮廓人面像，即两眼带一嘴。在表现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嘴的两角下方各凿有一个圆凹，大部分人面像都是如此表现，这其实是白令海峡地区，史前文化中一个基本图式。众多发掘出的骨、角器上，刻有的无轮廓人面嘴下都有两个小圆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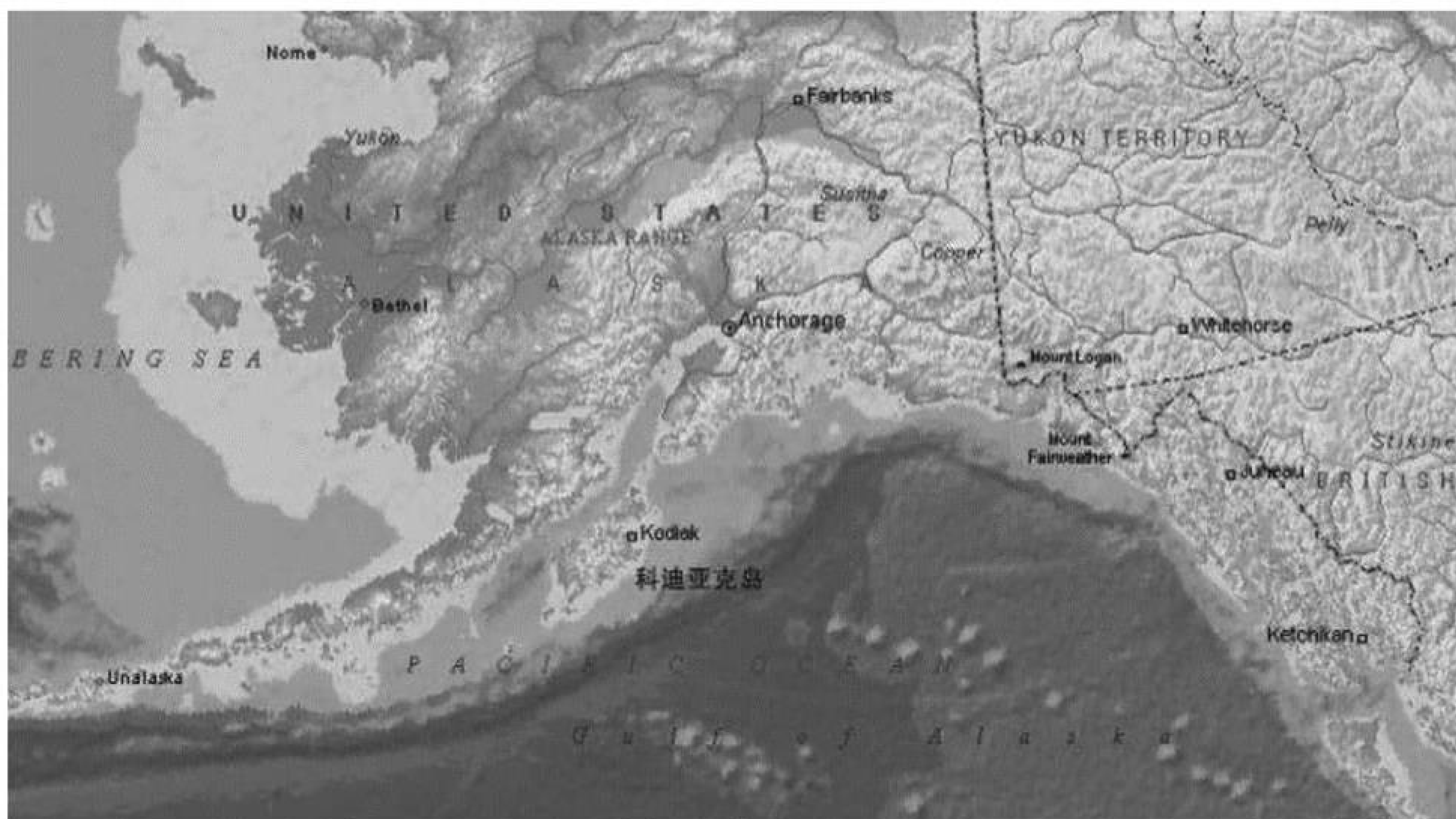


图23－2 北美洲的第一个人面岩画遗址，位于阿拉斯加西南的科迪亚克岛上

科迪亚克岛岩画的发现，意义同样重大，因为它是北美最西面的一个人面岩画址。其实，只要将这里的人面岩画与隔洋相望的黑龙江下游岩画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的相同。然而，那时人们的视野没有那么大，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来，也无人做这样的比较研究，认为只是一则单独的案例。

时至20世纪70年代，美、加学者在西海岸发现了众多而密集的人面岩画。这些发现指证着这样的事实：它们都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内涵，自成体系；其次，它们为传播所致，而且是贴着海岸窄窄地在南北上下几千公里内传播。

于是问题提了出来：它们怎样传播的，由北到南还是由南到北？直到20世

纪 90 年代，美、加学术界主流观点仍是：人面岩画由南往北传播。他们不能想象寒冷如阿拉斯加的地区，会出现一种具有强大动能和活力的文化因素，顽强地沿海岸朝遥远的南方传播。而大洋彼岸他们又没有朝那里望上一眼，毕竟那时那里只发现了一处人面岩画址。

四　加国女学者，力排众议

只有研究者 Beth Hill 发出不同的声音。她是实地考察北美人面岩画最多的学者，自己有一条海船，同丈夫一起，断断续续，几十年来一个岛接一个岛地沿西海岸寻找岩画，刻有“太平洋西北海岸印第安岩画”。也许由于大量实地接触岩画，她感悟到：“在我们的岩画区域中，确实有些证据能够说明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岩画的某些艺术传统，源自于古代中国的文明。这种文明曾扩散到环太平洋区域。”

然而，她只是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一个地区图书馆管理员，她的声音无人重视。1993 年，她说：“……我重返剑桥大学，希望作这样的课题：环太平洋地区岩画研究。但是后来发觉无法完成这样的课题。因为要翻译中文和俄文的考古报告，实在太困难了。”事实上不仅是语言，那时中国的人面岩画尚未发现。但是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学者，以其敏锐的悟性，感觉到中国存在这样的史前艺术。

五　三大分布带，中国衍生

岩画在中国大量发现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盖山林先生发现阴山岩画，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发现 10 万幅以上的各类岩画（图 23 - 3）①。人面岩画的发现也在其中。但是各地在公布时，往往将其混淆在其他岩画中。确实，中国人面岩画没有出现在一个独立和同一的区域内。

有学者在实地考察中国当时几乎所有岩画遗址后，才发现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以连续线性的方式，一个个遗址地传播，在中国境内衍生出三大分布带。

一条是沿内蒙古高原与华北，河套平原的边缘线，从赤峰往西，沿各山脉的南麓，经狼山、阴山，到达巴丹吉林沙漠。还有一条是逆黄河而行，从内蒙古经宁夏，到甘肃，在两岸面河的山谷口，留下众多遗址。另一条则是从赤峰向南经江苏连云港，沿海岸线到达福建闽南和台湾万山。人面岩画是中国境内制作最精

① 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彩页。


新石器时代贺兰山太阳神岩画


广西花山太阳神巫祝图

组图 23－3

美，图像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一种岩画。

在如此广大地域内传播，岩画符式的规定性，基本恪守如一，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些5000年前凿刻在山里的人面岩画，在很多方面构成中国上古文明的源头。如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与岩画中的无轮廓人面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古书“山海经”中很多记载，能在人面岩画遗址中得到印证。岩画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与中华民族上古的文化哲学相一致。甚至它的不少图形，成为某些与巫术和祭祀有关汉字的祖形。特别是“皇”字，其祖型几乎与晚期变异的人面岩画相一致。人面岩画正由于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文化原动力，才能翻山越海地传播。

相同的表现方式最具有表现特征的北美科迪亚克人面岩画，是在嘴角下凿两个点。但这样的表现方式，是源于东北亚黑龙江下游的那个遗址。在那里有三种体现法：一是在人面鼻孔下出现四个孔；二是将下面两个孔的距离拉开，分别凿在两边脸颊之中；第三种是将这两个圆凹降到嘴的两角之上，只是没有落到嘴角之下。而这三种小圆点的表现方式在中国人面岩画中都有大量存在。尤其是两个圆点凿在两边脸颊中间，表现得更为规范、典型。不少龙山文化的玉器上都铭有此图。

六　中俄岩画，相似处更多

中国人面岩画与俄罗斯黑龙江下游遗址间的相同之处，则更多。那遗址中的很多表现因素，如人面眉心纹，脸颊上的弧形刻纹，无轮廓人面的形状，都能在中国，尤其在赤峰地区的人面岩画址中找到。1990年，在大连郊区三面环海的北吴庄，发现一座6000年前的大型聚落遗址，出土有三片刻有人面图形

的陶片。其中一个人面的嘴角下两侧各钻有一孔，与科迪亚克人面岩画中表现的相一致。

传播的途经与年代翻开地图就能看到，在东北亚与西北美洲之间的大洋中，躺着一条有十几个岛屿构成的阿留申岛链。20 世纪的 60 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该岛链中的田那克岛，发掘出 20 块刻有图像的鹅卵石和三个人头雕像。其中五个卵石上刻有无轮廓人面像，一个残破卵石的人面图显示，两嘴角处都刻有一个小圆凹。极似黑龙江下游遗址中的表现，两个小圆凹尚未落在嘴角下。到了更东面的科迪亚克岛，就落在嘴角下了。卵石刻纹的年代为距今 3100 年到 1500 年。有一个骨质人头雕像，其嘴处理为一贯透性圆孔，甚似中国北吴庄遗址中一个陶刻人面图的表现。刻有无轮廓人面的卵石片，在阿留申的其他岛屿中也有发现。

由此可以推测，东北亚的人面岩画在向美洲西北海岸传播时，经由了阿留申群岛。现在想来，那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过程。

具有镌刻人面岩画宗教文化需要的中国史前居民，先经由赤峰，沿着大兴安岭东麓，到达黑龙江；再沿江而下，在乌苏里江河口和黑龙江下游，分别留下人面岩画遗址；而后出海，在阿留申群岛上，以跳岛的方式（图23－4），向美洲大陆前进。携带刻有小型人面像的卵石，或就地制作此类图像。当登上美洲西海岸时，又恢复了在山岩上制作人面岩画的传统。在沿海岸线向南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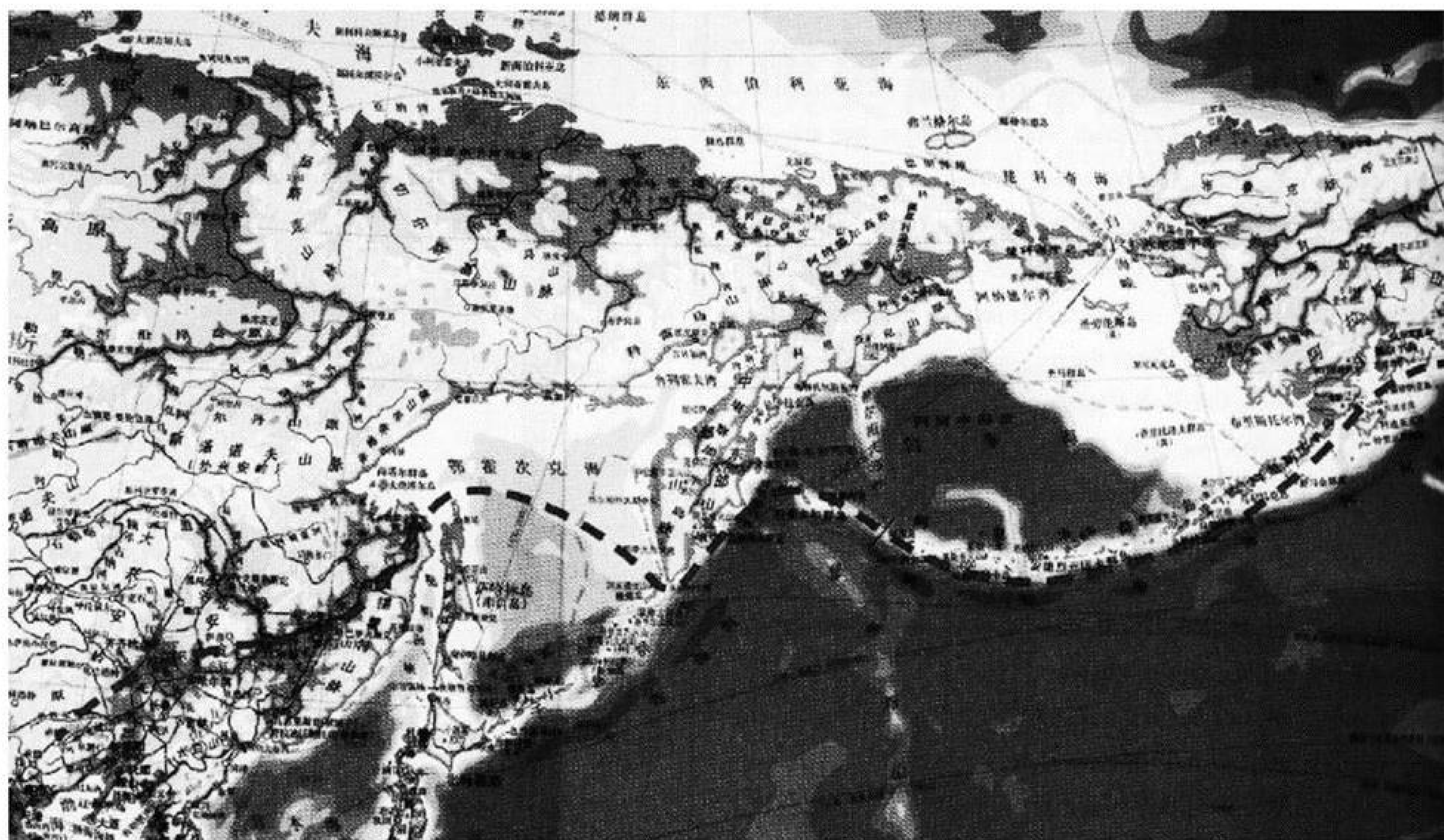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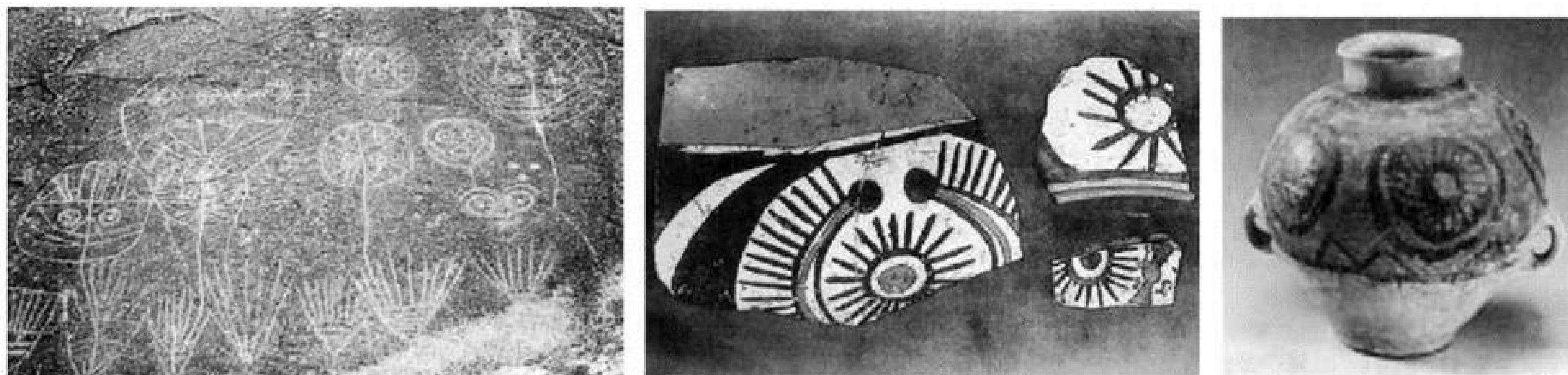


图 23－4　中国史前居民跳岛路线图

移至加州北部时，一路留下密集的人面岩画。完成这个过程，大概要有数千年吧。

1909 年一艘蒸汽拖船带着吊车，想把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海滩上的一块刻有精美人面岩画的礁岩，运到西雅图的博览会上。他们挖了 15 尺深，仍然没见到礁岩的底，令人惊奇的是那里仍有凿刻的岩画。海水涌了进来，无法再深挖，又吊不起那岩石，他们只得放弃。由此看来，北美洲的人面岩画也很古老。

从考古发掘获知，在美洲西北海岸较大范围内出现，并且数量一下增多的滨海冬季营地遗址，是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开始的。而那些遗址的发现，恰与人面岩画密集出现的区域相重叠。由此有理由认为，人面岩画从东北亚传播到美洲西北海岸的时代，应在这一时期，即距今 4000 年左右。



组图 23－5　江苏连云港太阳神岩画与仰韶文化太阳纹陶片和仰韶文化太阳山水纹彩陶壶对比图

七　神秘图案留永久的谜

问题在于当时美、加的学者并不重视这批人面岩画资料。从 1977 年始，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与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合作研究一个课题："洲际十字路口——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文化交流"。研究逾时十年，两国共投入 40 位学者，于 1988 完成。同年两国举办同题大型展览，并出版一本极其辉煌的书，然而该研究没提及两洲间人面岩画。

因此，当该研究课题主席威廉·菲茨夫（William Fitzhugh）："人面岩画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两大洲间史前的文化交流，同时把这种交流延伸到了中国。"

然而，新的问题又提出：史前中国人为何要迁移到美洲去？他们何以知道在波涛汹涌的大洋彼岸，会有另一个大陆存在？

人面岩画千年旅程，以其神秘图形，留给现代人一个永久的谜。

第二节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文物与易学文化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是拉美最大的博物馆，馆中展示了实物和史料价值非常高的包括奥尔梅克、阿兹特克、玛雅在内的美洲印第安文明遗存。

从镇馆之宝——太阳历（组图23-6）与组图4-21的对比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有极类似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原始八卦图的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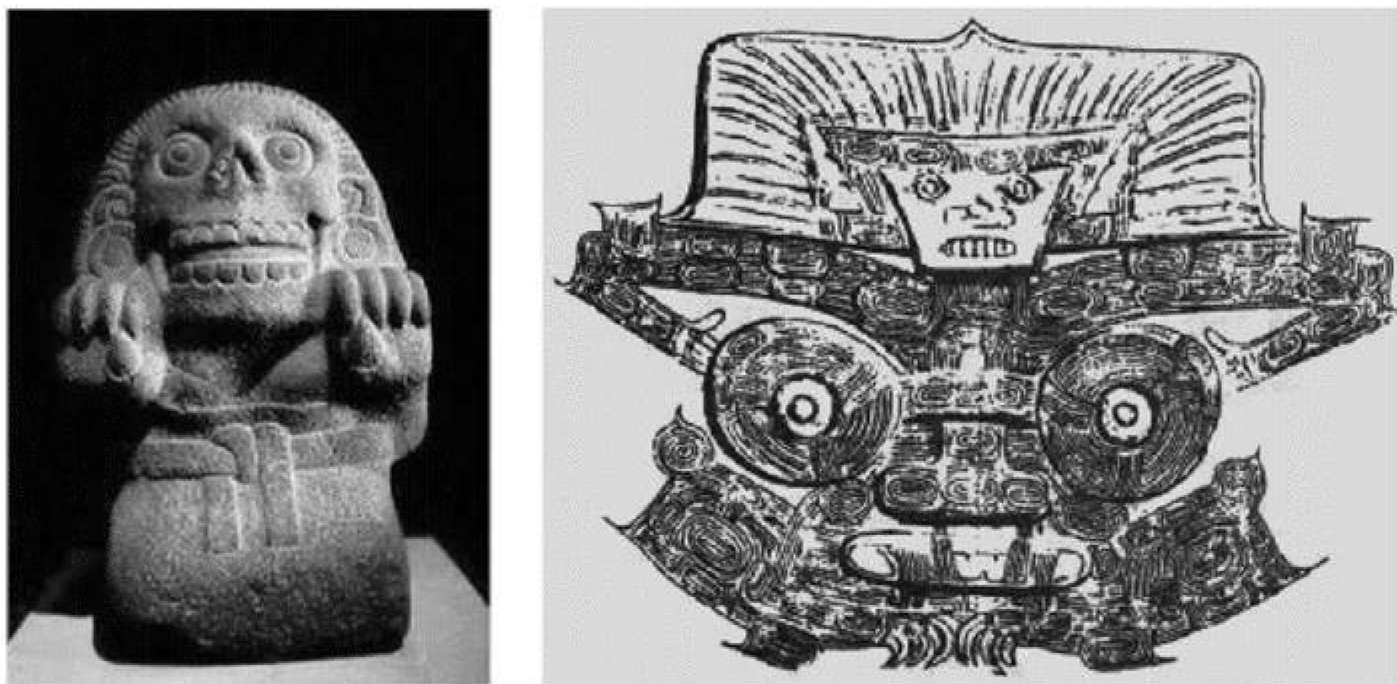


组图23-6 镇馆之宝——太阳历与还原后的太阳历

从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中的一尊石像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琮图案和玉器上带有宗教面具性质的人面神图案和贺兰口岩画中的人面像——“太阳神”的影子（组图23-7、组图4-37）。这就说明美洲大陆的文化雏形，也有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相通之处，而北美洲和南美洲也恰恰是在信仰萨满教的地区之中。

我们从出土的红山文化文物特征上（组图15-16、组图15-17、组图15-18、组图15-19、组图15-21），可以看出它与萨满教和萨满面具以及傩文化和傩面具都具有的共同特征。

我们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和世界各地的岩画上（组图15-20），从新疆阿尔泰和赛里木湖草原新石器时代的石画、石人、石头像上（组图15-22），还可以看出它们与萨满鼓面图案和萨满教面具（组图15-4、组图15-8、组图4-17、组图4-26）都非常相似，它们中既有着傩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



组图 23－7

又有着萨满文化中假面具的影子，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表达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古人崇尚太阳文明的愿望。

我们从傩文化非常兴旺的安徽，从安徽凌家滩文明偶像崇拜的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上，可以看出中国南北方的傩文化与萨满教文化都共同具有偶像崇拜的特征。

我们从傩文化非常兴旺的四川，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面具上（组图 15－23），可以看出它与萨满教面具和傩文化面具也都有着共同的特征，而且从三星堆还出土了许多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中太极八卦里的罗［离］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龙凤和太阳鸟、铜眼睛和铜太阳形器等铜器。

如果我们把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算起的古今中外各类岩壁画、石人、石像、面具等文化文物的表现特征，与萨满教文化和傩文化串联起来，再结合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太极八卦和龙凤的系统观念，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些共通的特征。

|下 篇|

总 结

一

对于考古学中的文明标准，国际上现在有一些通行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外国学者在考古工作中提出的，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可是直到今天为止，国内学术界还是使用这样的标准。

那么这些标准是怎么出现的？这些标准得以流行是由于一本很流行的书。

在1968年，主要研究欧洲考古、研究考古学的历史、长期担任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担任过世界考古学史会议主席的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出版了一本《最初的文明》、副标题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的书籍。这本书虽然很小，可是很流行，不单在英国出版，美国等一些地方都有版本，同时也成为西方国家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必读书。

正是这本书把考古学上通行的文明标准普及到了全世界。其实这些标准并不是由丹尼尔提出的，而是在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近东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权威的，这个研究所当时召开了一个“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一位学者叫克拉克洪，他提出了文明的三条标准，而后经丹尼尔补充，通过《最初的文明》一书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

这三条标准是什么？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的遗址中应该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还有量的限制，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第二个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复杂的礼仪建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

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权力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比如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任何人去参观，站在金字塔前，对着狮身人面像，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文明，这是没问题的。你不能说它是原始的，还是处在蒙昧、野蛮的状态，因为金字塔是坟墓，如果仅为了一般需要，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建造这样大的建筑。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神灵可以永存，这就代表了文明时代的阶级分化和统治。

由克拉克洪归纳提出、经过丹尼尔推广的考古学上的文明标准，就是这三条。他们说，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两条就够了，而在这两条里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种，就可以认定是文明社会了。这个看法传到东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最好再加上一条，就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现在在我们国内，冶金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有四条标准了，当然我国考古工作者也更加强调政治和权力的出现。当然，这些标准是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状况，看来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二

从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十二平均律的标志器物）、石圈环和骨圈环（龙文化的标志器物）、龟甲石子（占卜预测工具或占卜预测文化的标志器物）到赤峰兴隆洼出土的古笛、玉玦，我们可以看出在远古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交替的贾湖时代以及兴隆洼时代，中国就已经诞生了系统的文明。同时我们也看出了在贾湖时代这个系统的文明中，却清晰地交织着占卜预测的文化。就是说中国的星占学也好，预测学也好，它的诞生与中国文明的诞生是彼此紧密、和谐地联系在一个系统中的，是不可分离的文化。

从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太阳三足鸟图案，到流传下来的斗拱挑沿外在形式的中国古代建筑，他们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和意义，那就是在追求天地人和的文明。这既是一种外在的龙、凤文明，也是一种可以用表象的手法表达的太阳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思想蕴含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思想整个体系。

《周易》这部作为里程碑式的巨著和百科全书，不但能够支撑起中国文明的整个系统，还具有预测信息的功能。在中国思想、文化文明中独占鳌头的《周易》，也是世界文明科技史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使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她极高的评价。在世界各地区的文明中，也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庞大的思想

文明体系。

三

易学作为一个文化刚开始建立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体系，既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和系统的文明，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按现代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一个跨越了多个学科的系统工程。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文明文化在对世界进行根本性认识的探索当中，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精髓——“关系实在论”，这个关系既不是阳，也不是阴，而是中间的气——阴阳依存、共同和谐的那个中气）。

在此，笔者有必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人最古老的易学（或哲学）文化观念中比较关注的是吉凶问题，能数据化和可量化的东西大多应用在了事物吉凶的应期判断关系上了，而西方人的哲学文化却更加注重真伪问题，可量化和数据化的东西大多都应用在了与实在物质有关的研究上了，这是文明后来演变出东西方文化后的一个差别。

但作为一个系统文化，我们不可否认易学文化的缜密性是环环相扣和面面俱到的。因为这个文化既利用了自然界的事物之间具有的形象相似的关系和人们具有形象思维的方法，也具有直观的创造性形象思维的信息；既利用了自然界的事物之间具有的逻辑关系和人们具有逻辑思维的方法，也具有严谨缜密、能够推导论证的逻辑思维的信息。如同今天科学技术中发明创造的飞机、轮船、汽车一样，造型和模样就是形象思维的结果，结构尺寸、动力系统、智能系统等数据是否合理是通过反复演算和求证而获得的结果，它们都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共同产物。这两种思维缺一不可、完整互补。

所以当中国系统的甲骨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后，哲学、天文学、数学、音乐、度量衡、政治学、中医学、语言文字学、军事学、建筑学、星占学、预测学、风水学等诸多学科就都从最古老的易学文化体系中分离了出来，分别走向了更加细致的独立研究之路，并可以用文字能够进行记载了。这样，以《周易》为代表的最古老的易学体系全方位的实用性功能研究基本上就停滞了（比如在信息预测中，形象思维的方法就基本不用了），甚至是隐藏起来了，停止了通过易学文化整体系统的方式继续向前发展的步伐，完成了易的使命，结束了易学文化系统整体的功能性研究。

就像西方的神学在形式逻辑体系诞生以后，就渐渐退出了一样，它仿佛隐藏起来了。我们想一想，古希腊的数学家最早可都是哲学家呀。

由于时代不断进步，物质生产不断丰富，人们也开始更加适应感性的认识，

追求感官的物质刺激的文化。这样就使得易学文化中的星占学、预测学、风水学等学科甚至从易学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萨满教和傩文化开始流向社会的民间，被边缘化了，被隐藏了起来，充满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科学走出了自己的独立之路，一直到今天，数字信息、电子技术、机械制造等领域走向了更加精密的发展之路（从这就可以看出，这其中明显表现出了西方哲学的精髓——物质实在论）。我们在清晰地看到这个优势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今天的这些成就是顺着传统文化知识的脉络发展起来的，可今天的这些成果并不是传统文化知识所能够完全替代和解决的。

但是，每个人在社会上进行生存的时候，需要明白许多的事理，需要明白许多真善美的东西，需要探索和明白宇宙、人类和生命的本身意义，需要用理性把握、调整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这就需要去读文、哲、史，读了就能够使人明理，能够使人自强不息，能够使人厚德载物，能够使自己生命的旅程显得更加具有意义。

四

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中，我们知道自贾湖时代和兴隆洼时代开始，中国智慧的古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就是从循环、运动、渐进、变化的“道”（乾、天、龙、圆、○）开始的，可以用0数来表示，虽然“道”这个字被赋予哲学意味是在比较晚的春秋时期的老子时代，但笔者认为只有用这个汉字表达最为合适。

有了这个循环、运动、渐进、变化的“道、乾、天、龙、圆、○”的认识，随后又总结诞生了以此为基础的对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的一系列的科学认识概念，如一进位、二进位和二进制、三进位、四进位、五进位、六进位、七进位、八进位、九进位、十进位、十二进位、十五进位、二十四进位、三十进位、六十进位，但这些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却充满了哲学的意境，其中有一些是先天的，有一些是后天的。

一进位：就像是0或1，0之后再到0或1之后再到1，它在哲学上就像我们使用的概念就是一进制（一进制没有结果，一切都是孤立的概念），又像是人在原地蹦跳，没有变化位置一样，这种情况一般没有用。在易学上的概念叫孤阴或孤阳。

二进位：就是阴与阳、明与暗、雌与雄、上与下、左与右等，即自然先天始

终是在进行阴与阳的转变，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就像是两脚在原地倒来倒去、原地踏步一样。

二进制：在中国原名为“加一倍法”或“一分为二”法，就是将阴与阳形象思维成 0 与 1，0 与 1 的可变化组合出 01、10、11、00，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就像是迈开两条腿在步行着前进一样。（注：笔者认为“二进位”和“二进制”在自然、哲学、数学上的认识、理解和定义还是有所区别的。）

所谓“数学二进制”，便是逢二便进位的数学方法，因而在数学上只需用 0 和 1 两个自然数来表达，如果用易学符号来表达就是阴“－－”和阳“—”。八卦符号的变化与数学二进制的变化就是如此（图下总－1）。

二进制加法的形式			十进制加法
0＋0＝0	或	000000	0＋0＝0
0＋1＝1		000001	0＋1＝1
1＋1＝10		000010	1＋1＝2
10＋1＝11		000011	2＋1＝3

卦名	卦像	自然	性情	家族	方位	二进制
乾	☰	天	健	父	西北	111
兑	☱	泽	悦	少女	西	110
离	☲	火	丽	中女	南	101
震	☳	雷	动	长男	东	100
巽	☴	风	入	长女	东南	011
坎	☵	水	陷	中男	北	010
艮	☶	山	止	少男	东北	001
坤	☷	地	顺	母	西南	000

图下总－1

11＋1＝100	000100	3＋1＝4
100＋1＝101	000101	4＋1＝5
101＋1＝110	000110	5＋1＝6
110＋1＝111	000111	6＋1＝7
111＋1＝1000	001000	7＋1＝8
1000＋1＝1001	001001	8＋1＝9

1001 + 1 = 1010	001010	9 + 1 = 10
1010 + 1 = 1011	001011	10 + 1 = 11
1011 + 1 = 1100	001100	11 + 1 = 12
1101	001101	13
1110	001110	14
1111	001111	15
1111 + 1 = 10000	010000	15 + 1 = 16
10000 + 1 = 10001	010001	16 + 1 = 17
…	…	…
…	…	…
11110	011110	30
11111	011111	31
11111 + 1 = 100000		31 + 1 = 32
100000 + 1 = 100001		32 + 1 = 33
…		…
…		…
111100		60
111101		61
111110		62
111111		63

由此得出从0～63这六十四卦，而且《周易》中的64个卦（图下总－2），就是以这个庞大精密的自然科学系统——“数学二进制”作为基础来支撑的。

为计算机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从一位天主教神父手中，得到了我国宋代易学家邵雍先生的《读易图》和伏羲氏的先天八卦图时，才发现原以为是自己高深发明的数学二进制的原理早已被中国人发明了，从而表现出了极度的惊异与叹服：“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所有科学中最古老的纪念物……这是不可思议的发现……尤其是对于三千多年以前中国最初君主的理解，伏羲氏却是最早唯一发现古代文字秘密的哲学者。”

三进位：就是天、地、人；上、中、下；你、我、他；过去、现在、未来等，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四进位：就是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天	☰	澤	☱	火	☲	雷	☳	風	☴	水	☵	山	☶	地	☷
天	☰	䷀	乾	䷉	履	䷌	同人	䷘	無妄	䷫	姤	䷅	訟	䷠	退	䷋	否
澤	☱	䷪	夬	䷹	兑	䷰	革	䷐	隨	䷛	大過	䷮	困	䷞	咸	䷬	萃
火	☲	䷍	大有	䷥	睽	䷝	離	䷔	噬嗑	䷱	鼎	䷿	未濟	䷷	旅	䷢	晉
雷	☳	䷡	大壯	䷵	歸妹	䷶	豐	䷲	震	䷟	恒	䷧	解	䷽	小過	䷏	豫
風	☴	䷈	小畜	䷼	中孚	䷤	家人	䷩	益	䷸	巽	䷺	渙	䷴	漸	䷓	觀
水	☵	䷄	需	䷻	節	䷾	既濟	䷂	屯	䷯	井	䷜	坎	䷦	蹇	䷇	比
山	☶	䷙	大畜	䷨	損	䷕	賁	䷚	頤	䷑	蠱	䷃	蒙	䷳	艮	䷖	剝
地	☷	䷊	泰	䷒	臨	䷣	明夷	䷗	復	䷭	升	䷆	師	䷎	謙	䷁	坤

图下总－2

五进位：就是木、火、土、金、水；宫、商、角、徵、羽；东、西、南、北、中；耳、鼻、目、口、舌；心、肝、脾、肺、肾等，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六进位：就是六爻、六腑、六仪、六气等，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七进位：就是古代音韵学当中的音节音序宫、商、角、清角、徵、羽、变宫，相当于现代音乐当中的音节音序 1234567，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八进位：就是先天八卦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应的键［乾］、夺［兑］、罗［离］、辰［震］、篝［巽］、习赣［坎］、根［艮］、川［坤］这八卦、八门、八方等，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九进位：就是《洛书》与后天八卦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应的习赣［坎］、川［坤］、辰［震］、篝［巽］、中、键［乾］、夺［兑］、根［艮］、罗［离］，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十进位：就是《河图》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天干；10 进位数的 12345678910 等，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十二进位：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地支，即表现在年上、月上、日上、时辰上，也表现在方位上，还表现在十二平均律上等，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十五进位：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节 15 天、气 15 天，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二十四进位：就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山、二十四方位，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二十八进位：就是黄道上的二十八宿，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三十进位：就是阴历每个月都是 30 天，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五十进位：就是大衍之数 50，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六十进位：就是 60 甲子，像龙一样在循环、运动、渐进、变化，以致无穷。

五

如果我们把西方毕加索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中国半坡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他们所要表达阴阳文化的思想是多么的一致，几千年的时空都没能阻隔这种中外艺术和思想文化的一致性，就是从今天陕西农民的画和剪纸艺术当中，还能清晰地看到他们那种表现出来的艺术张力。

下面通过组图下总－3 几组图画和剪纸，对古今、中西阴阳概念的艺术表达，进行一下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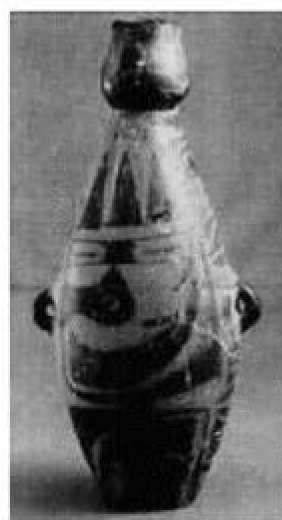

古[中]


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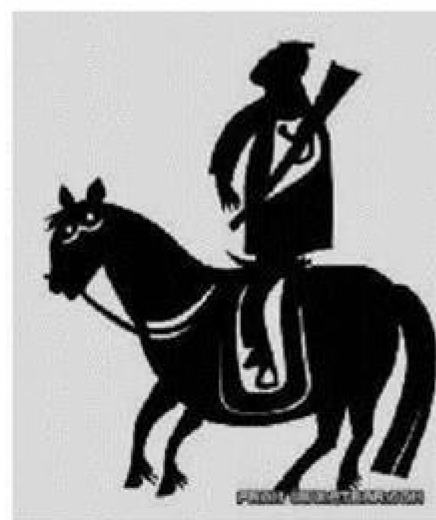

今[西]


今[西]

第一组(四幅)







古[中]　今[中]　今[西]　今[中]

第二组(四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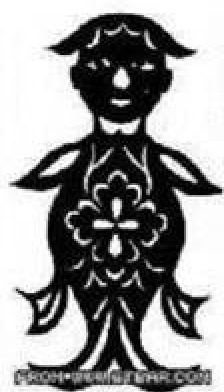





今[西]　今[西]　今[西]　今[西]

第三组(四幅)







古[中]　今[中]　古[中]　今[中]

第四组(四幅)





古[中]　今[西]　古[中]

第五组(三幅)



佛教文化中的阴阳写意——今[印度]



今[中]

第六组(两幅)

组图下总 -3

外国人称为抽象，中国人称为形象，艺术思想文化的表达不论有多么抽象，但归根结蒂还是人对自然产生的形象思维的东西。艺术思想文化与哲学是一样的，它们就是抽象到了天上，但根却始终在地上，是地上的形与象，是离不开大自然的。

通过以上几组非常典型的中西思想文化在艺术上表达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努力表现男与女、正与侧、动与静、上与下、左与右、忧与乐、心里与外在、灵魂与肉体，是毕加索在绘画当中，努力寻求阴阳和谐与平衡的艺术表达方式。而中国人只要用一个太极图和阴阳这个概念，就全部归纳包括了。

六

在文明史的研究中，每当人们识别和判断远古时代某一区域或民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或文明社会时，常常需要一些个标志性的器物［文物］。这些个器物［文物］非常重要，能够严谨准确地判定出文明的起源性质。正是由于一百多年来考古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就成了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资料和证据。

“文明”与“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准确地讲，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其中包含有文化、技术、思想、认识、精神、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原始意义上的文化、技术、组织等。当然这些因素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以及这些因素是否全部具备或具备多少才算是文明，也很耐人寻味。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文明的诞生也一定与某一种先进的文化认识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反过来说，文明一定是直接建立在这种先进的文化认识基础之上的，而与地区的联系则是间接的。

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虽然都有自己的文明体系，但这种文明体系却比较松散，既缺少一个属于阴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可以循环、变化、凝聚的内在中心思想，也缺少一个属于阳的、具有核心象征意义的标志性符号和标志性的外在形体器物（即所谓的图腾），因此无法将他们的思想、文化文明表里如一地合并呈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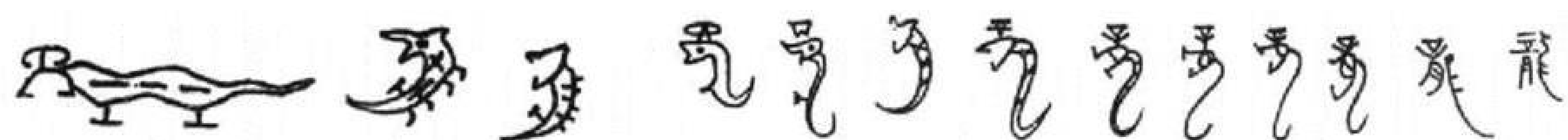
而我们中国的文明，自 9000 年甚至是 10000 年以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中心和主脉，就集中反映在中原地区和龙文化上，反映在易学文化上。这个文明的内在有一部庞大的巨著《周易》在相互贯穿始终的灵魂，外在的形体、形式就集中表现在了龙、凤图腾（组图下总－4、组图下总－6）与龙、凤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上（组图下总－9）和易学太极八卦的标志性符号(组图下总－8)以及大家都熟悉的“龙”、“凤”、“易”的汉字形体演变上(组图下总－5、下总－7)，这样就将中国龙的思想文化表里如一地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具有魂魄和生命力的文明生命体。这与所有史料记载的“伏羲始创八卦”是一致的。

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区别在于，中国的文化文明是具有中心的——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而欧洲却没有；中国的文化文明是有外围的——萨满教和傩文化，欧洲却没有，而且中国文明的外围与中心又像是交织在一个网中，相互联系和支撑着。当然，这里的中心与外围之意，与地理位置也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样，中国的文明就处在东边和东南边是海洋；东北边是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北边的蒙古高原；西北边的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山脉；西边、西南边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山脉、横断山脉的中间地段，它们将以中原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地区、红山文化地区、大汶口文化地区、良渚文化地区、石家河和屈家岭文化地区团团围住、保护起来，既形成了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国文化和文明发展空间。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既是独立的，也是向外辐射影响的，与“东学西来”和“西学东渐”没有什么任何关系。就像被西方人称作太阳最早升起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那样，太阳的文明光芒以及随之转化过来的人类的文明也是最早照耀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原大地之上的。这是谁都不可否认的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



组图下总-4 崇尚自然变化的龙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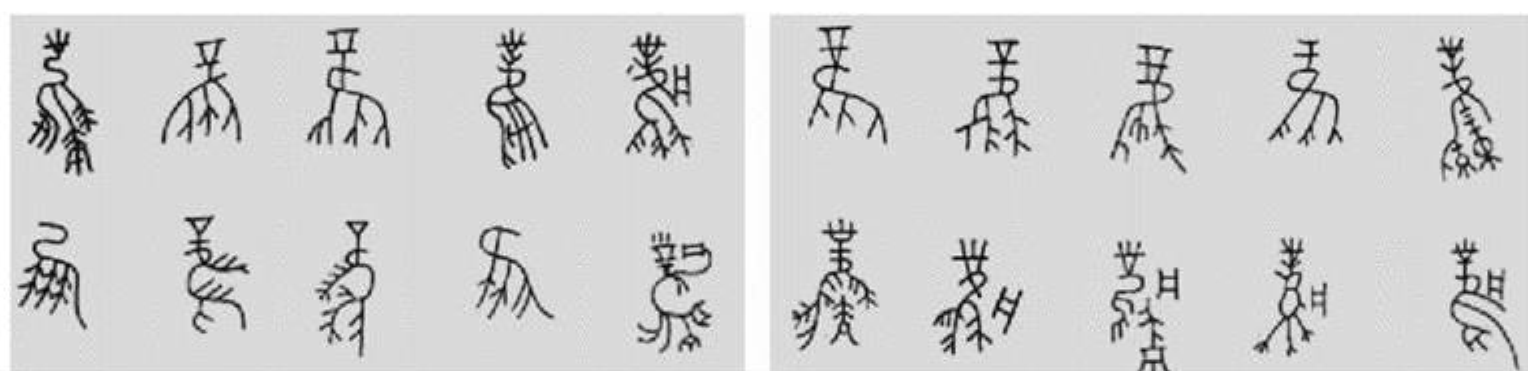
由于汉字具有形象和指意的功能，我们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就可以从组图下总-12中看出“易”字甲骨文既有日月之意，也有太阳文明从大地上升



组图下总－5　龙字从甲骨文到繁体字的演变



组图下总－6　崇拜太阳文明的凤图腾



组图下总－7 “凤”字的形体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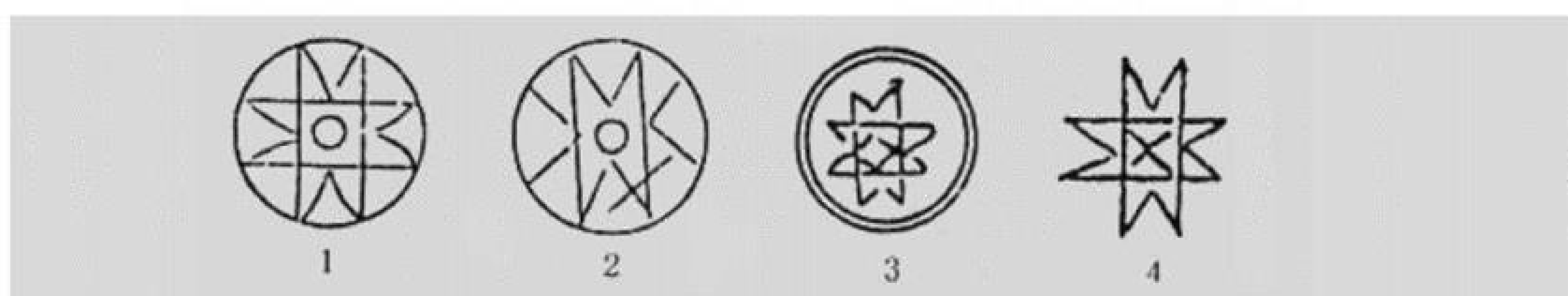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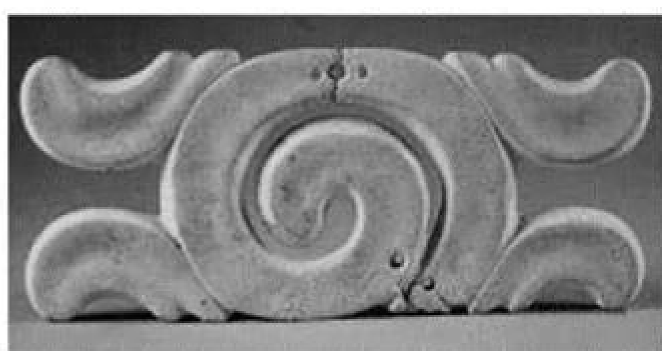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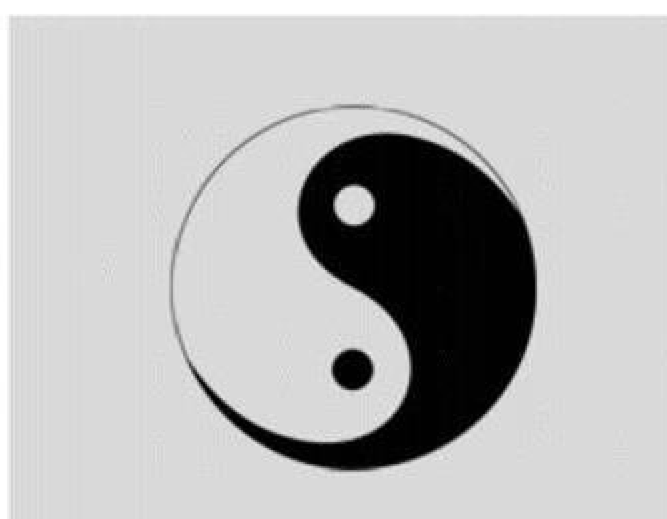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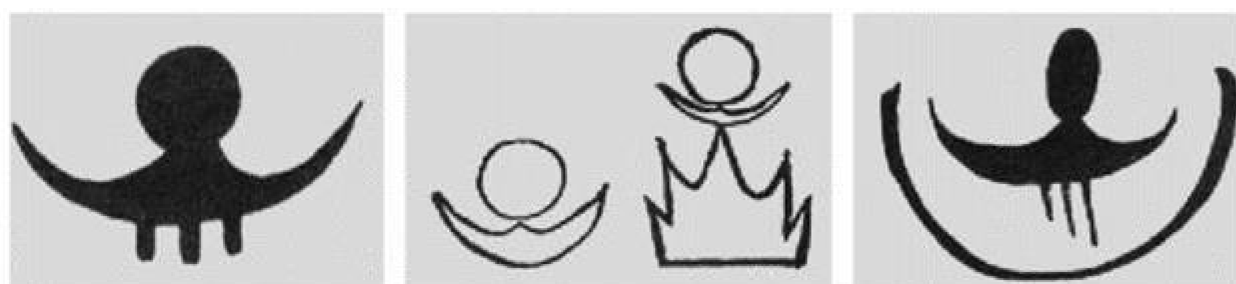


组图下总－8 易学太极八卦的标志性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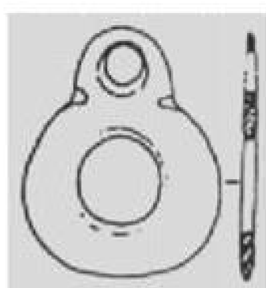


组图下总－9　龙、凤文化的标志性器物

起之意，而且“易”与“明”的古汉字结构都是由“日”和“月”组成的（组图下总－10～15），这就非常清晰地表达出了中国古人创造的“易”字，既有“日月”变化的意思，也有“日月”三足鸟的意思，还代表了日月的“光芒、光明”和“文明”之意。



组图下总－10　崇拜日月光明［文明］的易学文化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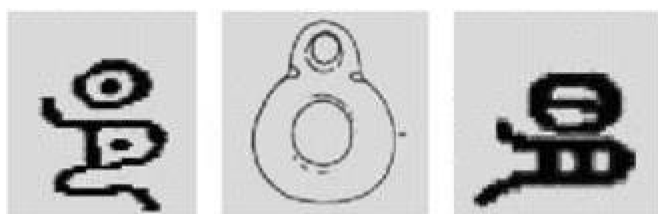
图下总－11　红山文化时期崇拜日月变化的日月象形玉片



组图下总－12　“易”字甲骨文及“易”字与日月光明［文明］的易学文化图案



组图下总－13　“易”字的形体演变



图下总－14 “易”字与红山文化时期日月象形的“易”字玉片对比



组图下总－15 文明的“明”字形体演变

七

今天，在世界文化大交流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大环境下，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中国具有了高深而莫测、玄奥之哲理的老庄哲学以及其中“玄之又玄”、“可道非道”的确定与不确定论、可知又不可知性的学说之后，才启发激励着人们能够对奥秘进行不断地探索，而这恰巧又符合西方人颇为较真的秉性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性。

也正是这个原因，现实中的西方社会民众发现，他们在不断地思考中所产生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两千多年前老庄之道中“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颇为相同和接近的。例如：老庄思想中“道法自然”的观点，与西方社会强调的遵从自然法则，要求政府顺应民意就是同道的；老庄思想中“无为而治”的观点，与西方社会强调的保证公民权益，崇尚个性自由的观点也是相近的；老庄思想中“视若刍狗”的观点，同西方社会主张的消除贵贱等级，缩小贫富两极分化，限制特权阶层，政府对民众一视同仁，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诸多平等意识也是相通的；老庄思想中“谦和慈柔”的观点，与西方社会主张的互相尊重、谦让、宽容的博爱精神也是共融的；老庄思想中“真善美”的观点，其本质就是西方社会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结合体。

也正是以上这些原因，才致使博大精深的老庄哲学自从传入西方社会后，《道德经》被西方人称为是《金律》的早期中文版（其实是不一样的），人们对他的关注、谈论、喜爱就从未停歇过，风生水起，至今延绵不衰。

正是由于西方社会民众的理念却更接近于对人性本身的关怀，所以他们对儒家思想中某些“愚忠”的观念还是持有怀疑或排斥的态度。西方社会民众通过对老庄学说和孔孟学说的了解对比，发现中国以孔孟之道倡导的儒家学说，其核

心就是崇尚“仁义”，正如孔子所说的“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所说的“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认为孔孟之道主张的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似乎与西方宗教的理念是有所迥异的。

如果把中国国学中的儒家文化单独拿出来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以及人类对宇宙和生命本身意义的探索等大舞台上进行全面综合的比较、考量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显得非常单薄，而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却不然，因为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本身就来自于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这就是世界莫大于《易》，自然莫大于《易》!

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比儒家思想更全面系统、更伟大这一结论，我们只要从孔子同弟子们一起述著的《系辞》上传中就可以看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所以，别看现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国学热，可是我们只要冷静地想一想、看一看周围就会发现，今天的人们有多少真正了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呢？又有多少人真的了解老庄之道呢？又有多少人了解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呢？其实今天的西方人可能都不知道，甚至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可能都不知道，中国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变化玄奥、高深莫测的老庄之道原本就来自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来自《周易》，来自大自然。

八

中国科学院院士、卫生部部长陈竺在预言中医将带来医学模式的变革时强调说：“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类似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和古典的西洋静物油画。”

西方早期医学的发展曾经也是与星占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也曾用类似“一物一太极”的整体思维方式，将人体与宇宙联系在一起过。如果他们对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之源有了同一的认知度之后，就会知道他们的医学为什么也曾经走过这样一段路的原因了。

就像今天，中国最古老的中医药学和中医针灸在世界各国都逐渐有了不同程度的认同，也正好说明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易学（易医同源）文化文明中的理论与实践是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全世界的人们对文化文明的根源都具有了同

一的认知度之后，就会发现东西方原本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只不过人类的历史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文明的交流，随着文字［或字母］的诞生，东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比如：

东方的中国人在看待事物时，绝大多数会更注重形象思维［感性的］的方法，这与汉字的象形和指意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人从出生到学习语言、文字和书法时，就已经开始接受了这样的系统培养和训练，一代代下来，甚至都有了这样的遗传基因，同时与中国文化中在诗词里所表达的那种形象思维的意境也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与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和科举制度下，更注重文章的华丽与诗词的意境和文治的管理而没有更加注重理化的科技创新和发展也同样是分不开的。

易学同理学一样在很长的一段中国历史当中曾受到过很多有学识的政治家和文哲学子的推崇和研究。但是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人们往往谈易色变，致使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学相比易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政治家黄帝与医学家岐伯非常平等地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哲学境界，在《黄帝内经》中将易［自然］与医放在同一个高层次上进行过充满哲理的对话以外，以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有远见的皇帝能上升到如此高度看待过中医了。

现在我们研究易学与中医学的人基本都知道在中国文化中易医是同源的，是需要兼而研之并相互参悟和触类旁通的，也都知道在所有钻研易学和钻研中医学的学者当中，没有非凡的天赋与悟性，是很难在此科学领域有较大的突破和较高的成就的。所以社会等级的观念致使许多悟性极高之人研易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士”的社会地位，忽视了博大精深之国学当中的易学文化和中医学科是需要相互参研才能共同发展的道理。

而西方人在看待事物时，却更注重逻辑思维［理性的］的方法，这从西方人语言单词中的拼法顺序上就直观地反映了出来，以至于西方人从出生到学习语言单词时，也同样开始接受了这样的系统培养和训练，一代代的下来，同样也就有了这样的遗传基因和先天优势。所以西方人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衍生出来的与数据分析有关的更注重逻辑思维的学科领域里，会更有优势，会更加能够创造出新的成绩来；在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仰等综合大格局的趋势成功走向把握和调控的逻辑判断上，以及在对技术的精细化研制和管理的精细化控制的逻辑分析上也会更有优势。可我们中国人却没有将易学思想文化中的系统逻辑思维方法与时俱进，在科技发展中不断地推陈出新，当然这与中国几千年以来重文不重理的封建体制和科举制度也不无有关。

美国著名心理生物学家斯佩里博士（Roger Wolcott Sperry，1913～1994）通过著名的割裂脑实验，证实了大脑不对称性的“左右脑分工理论”，因此而荣获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他认为：左脑主要负责与逻辑思维有关的分析、推理、判断、理解、排列、分类、记忆、时间、语言、书写、抑制、五感（视、听、嗅、触、味觉）等，思维方式具有连续性、延续性和分析性。因此左脑可以称作“意识脑”、“学术脑”、“语言脑”，是人的“本生脑”。右脑主要负责与形象思维有关的记忆、直觉、情感、身体协调、视知觉、美术、音乐节奏、想象、灵感、顿悟等，思维方式具有无序性、跳跃性、直觉性等。右脑具有图像化机能（如企划力、创造力、想象力），与宇宙共振共鸣机能（如第六感、透视力、直觉力、灵感、梦境）等，超高速自动演算机能（如心算、数学），超高速大量记忆（如速读、记忆力）。右脑就像万能博士，善于找出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高级思维功能取决于右脑。所以右脑又可以称作“祖先脑”、“本能脑”、“潜意识脑”、“创造脑”、“音乐脑”、“艺术脑”，是潜能激发区和创造力的源泉。

现代西方科学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这个一度只有哲学家才会钻研的课题，提示我们从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的体系中，就可以看出曾经的东方中国人最早在思维模式上，是既有着形象思维的方式，也有着逻辑思维的方式，左右脑的思维都在均衡地发展，但这一切现在却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当中，“易”本身就包括“日月”和“自然变化”之意。不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来自远古的哲人们对大自然的变化进行的归纳和总结，或者说东西方文明的起源也皆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只不过在中国叫“易”，在西方叫“哲学”，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这既像泰勒斯提出的“万物皆由水构成”与中国的“太一生水”一样，又像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万物皆数”与中国易学八卦当中的八个“数”都被归类代表了许许多多的事物一样，只不过在东方的文明当中，中国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在此就显得更加古老、更加成熟，影响也更加久远一些。

最后，笔者不妨引用《爱因斯坦文集》中的一段话：“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圣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这就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在对自然世界进行根本性认识的探求当中，比较关注的是物质间或物质中的关系世界，就像现代的中国文明依然是非常关注“关系实在论”（如相生相克的观念认

识等）的哲学观。而西方哲学在对自然世界进行根本性认识的探求当中，却最终把东方哲学演变成了比较关注物质间或物质中的物质世界，以致西方文明把东方文明演变走向了更加注重“物质实在论”（如分子、原子、中子、质子等概念认识）的哲学观，以致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的东西方的哲学和文明是相互对立的。其实这两种文明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而她们原本实际上是共同和谐依存的一个文明体系。

后 记

一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蒙古人、满族人都曾经以当时的异族身份入主中原，当他们遇到了中原文明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都主动融入了进来，被汉文化影响、改造和潜移默化了。

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的文明都曾经盛极一时，但后来也都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唯独中国文明从没有中断过，一直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顽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始终在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风风雨雨地走过了这漫长而艰难的几千年历程？答案就是从中原地区诞生的中国史前文化和史前文明。正是史前的中华民族，从宇宙大自然的自然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中总结出来的这个核心文化，与我们民族的魂魄融合成为了一体，而产生了天地人和的巨大能量，才使得中华民族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奋发图强、勇往直前。

所以看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是否是与时俱进的，是否具有先进性。因为文化这个东西是一个体系，有一种具有灵魂的精神。这样，自然的能量有多强大，这个民族的能量就会有多强大，这是能量转换最基本的原理。

不论是哪个民族，一旦具有了像大自然一样强大的思想文化体系，就具有了与大自然一样强大的能量，就不会轻易地被灭亡了，因为大自然自身的变化始终就是与时俱进的。

二

世界上研究大国崛起的各大著名学者在谈到大国崛起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思想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盟军三巨头之一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思想文化”对英国这样一个面积只有约 24 万平方公里、但在近代的世界舞台上却始终扮演着一个大国的重要角色的岛国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也可想而知这个强国的民族对“思想文化”又是多么重视和爱惜。

从思想文化的意义上来讲，塞纳河畔的先贤祠也超过了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是巴黎真正的象征，是法国精神的殿堂。先贤祠的建筑风格刻意使用了古希腊神庙的样式，在这个建筑的楣饰上还刻着一句话：“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这句发自法兰西民族的心声更加显示出了这座建筑的内涵是多么的崇高和神圣，并因此超过了巴黎的任何建筑，表达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历史精神和思想文化的精神。

先贤祠里面供奉着代表法兰西精神的 72 个伟人中仅有 11 人是政治家，还不到 1/6，其余的全是哲学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等，其中包括人们所熟悉的伏尔泰、卢梭、居里夫妇、雨果、大仲马、莫泊桑和巴尔扎克等。在这里安放着的伟人们所奉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种美，也不只是具有永久的哲学价值和杰出的科学与艺术，而是一种博大的思想文化和积极而崇高的精神。

密特朗在任法国总统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里来拜谒这些法兰西民族的先贤。法国的这些做法就是在向人们发出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号：一个拥有伟大思想文化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不断取得进步的国家！这也是使得今天的法国成为能制约世界均衡的一个强国和大国的原因之一。

三

世界文明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课题。最近一些年，关于世界文明的研究课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学术界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与中国的崛起和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进行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上的交流、分工与合作，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广泛使用，克服了过去历史上长期把各个国家、地区、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民族都分隔开的地理障碍，使世界的各个部分都联结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乃至将整个世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都融入了一个庞大的数字信息网络。当今社会进入了一个向全球化迈进的新时期，全球化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础和方法。

近年来，在大国博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及军事力量的激烈较量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一些大国把文化作为一种战略早已不停留在理论研究的务虚阶段了，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力量的作用和建设。因为文化文明就像温暖的阳光一样，比起那些强权和枪炮，她更具有亲和力、感染力、认同力等许多魅力，所以她的传播速度会更加迅速，传播范围会更加广泛，传播时间会更加久远，传播效果也会更加深入人心。那种简单地凭几件新武器、靠枪炮发言以图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成为过时之论。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了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其中，硬实力主要由领土、人口、军事、科技、经济、自然资源等组成；软实力则包括文化、文明、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nel，1927～2008）在 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认为在冷战之后的世界，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现在一种反思英语文化的思潮也在悄悄地酝酿。

四

21 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文化是否强大将决定一国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因此，一些个强大的国家早已不再单纯片面地只追求物质上的发展、繁荣和强大了，已不再只单纯片面地追求 GDP 了，而非常清晰地将影响人们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文化软实力同样纳入了大力提升国力的战略之中。

实际也正是这样。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一些发达国家就把文化作为一种战略，将其植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博弈之中。众所周知，由少数国家在东欧、中亚一些国家策划的"颜色革命"，就是将军事硬实力借助文化软实力，用文化影响力撬动金融原动力，相辅相成地形成太极推手，已经让世界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力量的博弈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各国进行经济博弈的过程中，在众多产品的领域里，所有的产品都会产生供大于求的饱和现象，唯独绿色的文化文明产品不但不会饱和，而且始终是供不应求的。这是由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是永不满足的，才造成了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永不饱和。正是由于文化具有能够净化人类心灵的功能，才使它的影响力成为了最高的管理境界，才使得全人类社会许许多多能够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对它的追求永不停息，一直都对它怀着无比的崇尚、敬仰和向往。就像太阳系的行星始

终都在围绕着太阳在旋转一样，地球上的人类也会始终围绕着文明的体系进行生和活，这才是人类进行自然运动和变化的本质和主旋律，这就是自然的核心。

虽然当前的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只取决于军事实力，而更取决于国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总体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文明的性质和程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会长期发挥着作用。因此，不少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文明的比较研究，认为文明因素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过程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代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源远流长，是历史和现实紧密联系的生动体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文明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远古时代生活和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也不是已经永远消逝的僵死的存在，而是依然活在当代的现实之中。人类昨天的文明才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能够保证和谐的根，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了人类昨天的文明，才能更好地把握住人类的今天，才能自觉地创造人类的明天。

2011年6月作者于克拉玛依市金龙镇

参 考 文 献

1.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2.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
3. 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5. 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
6. 刘军:《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
7. 王宁远:《遥远的村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8. 俞为洁:《饭稻衣麻》，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9. 张光直、徐苹芳等:《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2004。
10. 华梅:《古代服饰》，文物出版社，2004。
11. 巩启明:《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
12. 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13. 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
14. 张敬国主编《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
15. 张满飚主编《伏羲时代的社会画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6. 常秉义:《周易与历法》，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17.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6。
18. 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
19. 庞进:《凤图腾》，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
20. 何新:《龙：神话与真相》，时事出版社，2002。
21.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
22. （汉）张苍等辑撰，曾海龙译解《九章算术》，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23. （清）江慎修著，孙国中点校《河洛精蕴》，学苑出版社，1995。
24. 〔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25. 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6. 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

27. 《庄子》，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8. 何新：《大易新解》，时事出版社，2002。
29. 何新：《宇宙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
30. 张志春：《神奇之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
31. 傅海伦编著《中外数学史概论》，科学出版社，2007。
32.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3. 赵伯乐：《永恒涅槃——古印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34. 〔美〕房龙：《人类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5. 〔英〕米歇尔·霍斯金主编，江晓原、关增建、钮卫星译《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36. 江晓原：《12宫与28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37. 颜海英：《守望和谐——古埃及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38. 〔英〕葛瑞姆·汉卡克、〔英〕罗伯特·鲍威尔合著《创世纪的守护神》，石尚仪译，王季庆校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39. 杨善清、杜久明编著《中国殷墟》，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40.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编《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
41. 金宜久：《中国伊斯兰探秘》，东方出版社，1999。
42.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43. （清）汪绂：《戊笈谈兵》，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
44. 康殷：《文字源流浅说》，荣宝斋，1979。
45. 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
46. 任应秋述，任廷革整理：《任应秋运气学说六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

作者声明

本书用到了一些图片，由于作者无法联系到图片原作者，请图片原作者见到后联系本书作者许钦彬，以支付相应的使用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

www.ssap.com.cn

1. 查询最新图书　2. 分类查询各学科图书

3. 查询新闻发布会、学术研讨会的相关消息

4. 注册会员，网上购书，分享交流



本社网站是一个分享、互动交流的平台，“读者服务”、“作者服务”、“经销商专区”、“图书馆服务”和“网上直播”等为广大读者、作者、经销商、馆配商和媒体提供了最充分的互动交流空间。

“读者俱乐部”实行会员制管理，不同级别会员享受不同的购书优惠（最低7.5折），会员购书同时还享受积分赠送、购书免邮费等待遇。“读者俱乐部”将不定期从注册的会员或者反馈信息的读者中抽出一部分幸运读者，免费赠送我社出版的新书或者数字出版物等产品。

“网上书城”拥有纸书、电子书、光盘和数据库等多种形式的产品，为受众提供最权威、最全面的产品出版信息。书城不定期推出部分特惠产品。

咨询/邮购电话：010-59367028　邮箱：duzhe@ssap.cn

网站支持（销售）联系电话：010-59367070　QQ：1265056568　邮箱：service@ssap.cn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社科文献出版社　学术传播中心　邮编：100029

银行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092003673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与古文明／许钦彬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2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3934－1

Ⅰ．①易…　Ⅱ．①许…　Ⅲ．①《周易》－研究　Ⅳ．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9742 号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
易与古文明

著　　者／许钦彬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人文分社（010）59367215　　责任编辑／于占杰　周志宽
电子信箱／renwen@ ssap. cn　　责任校对／张　羡　史晶晶
项目统筹／宋月华　　责任印制／岳　阳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8.5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彩插印张／0.5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725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97－3934－1
定　　价／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

周易卦爻辞真解　　许钦彬 著

解读《推背图》　　许钦彬 著

解读《地母经》　　许钦彬 著

易与古文明　　许钦彬 著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www.ct1900.com

周易文化研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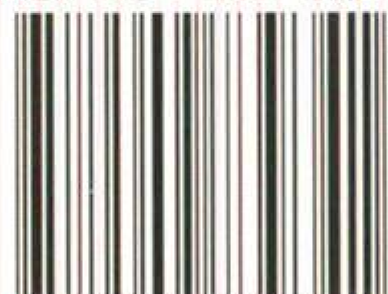
易与古文明



该作品是作者根据近20年对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的研究，在参考国内外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所著的研究心得。

作品从新石器与旧石器交替时期开始讲起，以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遗址的大量考古实物和碳十四所测定的历史年代为依据，将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文化思想与大自然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客观变化规律结合起来，再以中国易学文化中的形象思维和逻辑分析为突破口，经过仔细的研究和剖析，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华古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都有着若干相通之处，足见中国最古老的易学思想文化体系的魅力。

上架建议：周易哲学



ISBN 978-7-5097-3934-1

定价：128.00元